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著 ・ 杜蒲 譯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第三版 (1999)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莫里斯・邁斯納 著
杜蒲 譯

中文版 © 香港中文大學 2005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ISBN)：962-996-173-3

本書根據Free Press 1999年出版之*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翻譯而成。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 1977, 1986, 1999 by Maurice J. Meisner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圖文傳真：+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電子郵遞：cup@cuhk.edu.hk
網　　址：www.chineseupress.com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Chinese edition)
By Maurice Meisner
Translated by Du Pu

©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996-173-3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 1977, 1986, 1999 by Maurice J. Meisner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 Agency, Inc.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6692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中文版序言 v
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 ix

第一部：革命的遺產

第一章　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軟弱性 3
第二章　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反叛 11
第三章　資產階級的失敗與無產階級革命 21
第四章　毛主義革命與延安傳統 31

第二部：新秩序 1949–1955

第五章　新國家 53
第六章　城市：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衰 71
第七章　土地改革：農村的資產階級革命 85
第八章　工業化引發的社會與政治後果 97
第九章　農業集體化 1953–1957 121

第三部：烏托邦主義 1956–1960

第十章　百花齊放：社會主義、官僚主義與自由 145
第十一章　不斷革命：大躍進的思想淵源 179
第十二章　大躍進期間的經濟 191
第十三章　人民公社與「向共產主義過渡」1958–1960 199

第四部：熱月的反動 1960–1965

第十四章　官僚的復辟 227
第十五章　新經濟政策 1961–1965 241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1965 253

第五部：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 1966–1976

第十七章 文化革命的概念 271
第十八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291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社會結果 327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後果與毛主義時代的終結 1969–1976 349

第六部：鄧小平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 1976–1998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383
第二十二章 鄧小平的復出與對毛主義的批判 397
第二十三章 市場改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417
第二十四章 爭取民主的鬥爭 451
第二十五章 鄧小平時代的結束：1990年代的中國 481

有關文獻的說明 515
參考文獻 521

中文版序言

中國，這個在1949年前的一百年被西方人士輕蔑地稱之為「東亞病夫」的國家，現在擁有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經濟，重新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裏，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8%的速度增長，經濟發展長期保持這樣的速度，在現代歷史上絕無僅有，令經濟史學家瞠目結舌。

人們很輕易就忘記——許多人已經忘記或也許根本不知道——今日的中國是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的產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毛主義革命的頂峰，它是所有現代革命中規模最宏大、最受人民擁護，並且可能是最富有英雄氣概的革命。然而，它又是以深刻的矛盾、特別是以革命自身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衝突為其標誌；這種矛盾以多種怪異、晦澀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要理解革命後中國痛苦的歷史進程及其社會結果，就必須了解這種矛盾。

我在使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概念時，不是指毛主義說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無休止的鬥爭這種令人誤入歧途的含義。同樣，在我看來，簡單地認為這種鬥爭意識反映在主要領導人的思想及其政治「路線」上的觀點也不足取。那些加入並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人（在1949年前，要冒巨大的個人風險）所以這樣做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儘管他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多種多樣，對以什麼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認識也不盡一致。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主要矛盾，不是兩種不同形式的「意識形態」矛盾，而是革命者的主觀目標與其所處的客觀條件之間的衝突。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者的目的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主義目標，正是這一理論教導說，社會主義不可能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或在產業工人階級尚不成熟的國家裏實現。簡言之，馬克思主義教導說，中國不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物質和社會條件。因此，中國革命必然地只能

限於「資產階級」革命，就是說，中國革命的社會結果將是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

在延安時期的鼎盛年代，毛在1940年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部分地承認了這些馬克思主義的限制條件。但在1950年代初期，為了在建設工業基礎的同時，加速實現對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匆忙取消了「新民主主義」(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階段。本書即是探討這種「社會主義改造」嘗試的歷史及其結果。

在本書中，我的結論是，這一嘗試是失敗的 —— 原因我在下文中將會談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社會結果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與社會。自從1980年代中期後，這種結果日益昭顯 —— 儘管為了 (日漸式微的) 意識形態宣傳需要，當局盡力論證所有政策及其結果都具有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使結果模糊一點。

自1998年我完成了本書的英文版寫作之後，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特徵更加明顯。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速度加快；國外投資急劇增長；能否取得盈利成為進行經濟決策最終的、唯一的判斷標準；經濟自由化的語言和標準支配了社會精神生活；社會福利銳減，社會經濟不平均等現象更為突出；《福布斯》(*Forbes*) 雜誌發佈年度中國富豪排行榜。國內外都要求中國經濟遵守國際資本主義秩序的規則，並加以實踐，壓力越來越大。

顯然，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現在導致的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的結果。有人以此作為正統馬克思主義關於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觀點的佐證，即馬克思說的：「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資本論》前言) 。有人則認為，如果勝利了的共產黨人在過去半個世紀，實行不同的政策、採用不同的方式，社會主義是有可能在中國實現的。

猜測如果歷史人物採取與他們實際做的不同的做法，歷史會變成為什麼樣，這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問題上，人們只能遵從G.M.特裏威廉 (G.M. Trevelyan)[1] 的結論：「人就是他之所是，後世遲來的智慧

[1] G.M. Trevelyan (1876–1962) 英國歷史學家。

對他不產生影響，他只做他做的事。」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驗已被證明是失敗的，這就是事實。

然而，毛主義革命並沒有失敗。現在流行的看法是，毛主義革命其實大可不必進行，如果國民黨繼續掌權，那麼「現代化進程」也會產生出相同的社會和經濟結果，中國也會因此而避免革命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壞。但是我認為，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就不可能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取得這些積極的成就(這並不是要原諒或否認這個時代人的野蠻行徑)。這些成就包括在這片飽受外國野蠻侵略和軍閥混戰之苦的國土上，實現了民族獨立和政治統一。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停滯、衰敗和人的巨大痛苦之後，獨立和統一是社會與經濟進步之首要的、最根本的前提。政治上的勝利為共產黨國家取得其最重要的成就，即為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提供了保障。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使共產黨政權能夠調撥農村剩餘產品，為現代歷史上有記載的規模最宏大、發展速度最快的工業化進程提供資金。

* * *

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為工業化付出了高昂的社會代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在底子極薄、國內與國際環境惡劣的條件下開始的，因此中國付出的社會代價也格外沉重。正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所説的：「事實的可悲之處在於，無論是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窮國為現代化付出了最沉重的代價。這種代價的唯一正當理由在於，如果不付出這種代價，情況會更糟糕。」

誠然，執政的共產黨人取得的主要成就——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土地改革、工業化——也是國民黨要實現的目標。但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和它的社會基礎，可能恰恰是阻止它徹底完成對工業化進程至關重要的土地革命的障礙。無論如何，這一歷史成就應歸功於實際完成了這一任務的政黨，與假設在不同的環境下也能這做到這一點的政黨無關。

除了口頭上的宣傳外，這些成就本身與社會主義並無多大關係。一個長期分崩離析的帝國的政治統一、一個現代的獨立的民族國家和

全國性市場的誕生、農村的前資本主義關係廢除、現代工業化的開始——這些全都是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產物，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並沒有資產階級的參與。儘管在發展道路上人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並加以政治上的錯誤與罪行，中國和中國人民在後革命的轉變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前還被視為亞洲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一的中國，今天可以宣稱是世界上強大的工業經濟實體之一，而且是迄今為止最有活力的經濟實體。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過去半個世紀增加了一倍——從1936年的平均35歲增加到毛時代結束時的1976年的65歲，今日已達到70歲。

毛主義企圖使革命超越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然而徒勞無功。1978年，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進行「市場經濟改革」，實際上也是默認了這一點。由此出發，繼之是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伴隨著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典型的經濟活力與社會瓦解。社會主義及作為其本質的民主先決條件，依然是中國懸而未決的歷史議題——也許會由未來幾代人來實現。

莫里斯・邁斯納 (Maurice Meisner)
威斯康星，麥迪遜
2003年10月

英文原著第三版序言

《毛澤東的中國》(*Mao's China*) 第一版手稿完成於1976年夏季稍晚時，即毛澤東去世前的幾星期。在我準備將手稿送往自由出版社付梓之際，我匆匆地將毛去世這一事實 (以及後來發展表明的，毛主義的結束和農民革命時代的終結) 補充進了手稿。

在《毛澤東的中國》中，我試圖按照中國共產黨人宣稱的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目標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作出歷史的評價，然而，其結果不盡人意。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四分之一世紀既是一個取得巨大的社會與物質成就的時代，也是一個極其野蠻和罪惡的時代。它使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在上個世紀淪為世界上最落後和最悲慘的國家開始了向現代工業的轉變。毛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嘗試把現代化的需要與社會主義目標融合在一起，引人注目，儘管這一嘗試是不完全的並最終失敗。最明顯的失敗是，曾為眾多人滿懷希望地稱頌的中國「社會主義過渡」，卻沒有為創造設想的新社會所必需的基本民主政治前提進行努力。毛主義不是一種能夠接納馬克思說的「生產者自治」這一根本真理的理論，這對任何一個可被稱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來說都是一個根本性的失敗。因此，在毛時代結束之際，中國仍然是一個由官僚體制支配的社會，它既不像是資本主義，但也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1]。簡言之，這就是《毛澤東的中國》第一版得出的結論。

以《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Mao's China and After*) 為名的第二版出版於1986年。基於在後毛時代初期得到的關於毛時代的新資料，特別是關於不幸的大躍進運動 (1958–1960) 和19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資料，第二版部分地更正了一些史料和解釋上的錯誤。第二版更多地描寫了鄧的改革給中國帶來的始料不及的深遠變革。在

---

[1] 莫里斯・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紐約：自由出版社，1977)，頁386–389。

1980年代初寫作時，我曾把市場力量的運用解釋為服務於中國共產黨國家——這個官僚的龐然大物似乎既是橫亙在社會主義、也是橫亙在資本主義前面的不可逾越的障礙——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需要的權宜之計[2]。

我的結論下得太早了。事實上，共產黨的中國非但不是中國資本主義的障礙，而且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根本代表和推動者。在過去20年裏，無論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在1979年時的初衷是什麼，中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最密集的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因此，第三版在寫這段歷史時，首先要探討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特殊本質及其社會結果。

新版必然要在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史再增加15年，將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寫到千禧年的最後一年，這一年還標誌著共和國成立50週年。新增的這15年歷史，再加上試圖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易於理解的分析，使得新版篇幅較上一版要長。因此，我對全書中的多餘的詞和句子作了刪除，在敘述中還刪除了那些在1970年代看來十分重要和引人注目、但在今天已意義不大的章節。

還要指出的是，原版中使用傳統的韋德–賈爾斯 (Wade-Giles) 羅馬標音體系來標示中國的人名和術語，現均改為由更廣泛使用的拼音體系來標示，但那些在書出版時就使用傳統方式標示的人名或書名，依然保持原樣。

* * *

下述篇幅的大部分內容是來源於許多學者和記者的努力，他們發表了數以千計的有關近現代中國的著作、論文和報告。在註釋和文獻選錄裏我簡略地列上了他們的著述以示感謝，但這還是遠遠不夠的，我擔心，我使用了他們的成果卻得出了他們許多人未必能同意的解釋。

---

[2] 莫里斯・邁斯納：《毛的中國及毛後的中國》(紐約：自由出版社，1986)，頁482–485。

我非常感謝我的許多朋友和同事們，多年來，他們閱讀了手稿各版本的部分或全部內容，提供了寶貴的評論或建議。在他們中間，唐納德・克萊因 (Donald Klein)、 詹姆斯・謝爾登 (James Sheridan)、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tik)、羅伯特・波林 (Robert Pollin)、林春 (Lin Chun)、羅伯特・馬茨 (Robert Marks)、崔之元 (Zhiyuan Cui) 特別慷慨地提供了自己的時間和智慧。我還要感謝卡爾・瑞斯金 (Carl Riskin)，他允許我大量地使用他關於1949年後中國經濟史的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中的材料及其他富有真知灼見的著述。我特別感謝弗里德里克・范德比爾特・菲爾德 (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 —— 一位十分特殊的朋友。

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系的許多同事，特別是西奧多・哈默若 (Theodore Mamerow)、斯坦利・庫特勒 (Stanley Kutler)，他們對本書的寫作給予積極的鼓勵並發表了十分有益的見解，在此一並致謝。比爾・布朗 (Bill Brown) 和湯姆・麥考密克 (Tom McCormick) 也許不知道，他們的許多真知灼見 —— 多數是在裏海咖啡館共用午餐時非正式地表達的 —— 最終在這一新版中得到了反映。

我很感謝那些在二十多年間裏參加了當代中國史專題課程的研究生，他們以特別的方式為本書的寫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在課堂上提出和討論的許多獨到的問題，也正是本書要探討的問題；有時，我將手稿的一些片斷和章節拿給他們，他們不厭其煩地提出自己的見解；他們慷慨地允許我借用他們在論文中的觀點。我從他們身上受益匪淺。我在這裏難以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但我必須特別感謝鮑伯・馬克斯 (Bob Marks)、畢克偉 (Paul Pickowicz)、凱瑟琳・林奇 (Catherine Lynch)、李斐工 (Lee Feigon) (音)、布倫達・桑森 (Brenda Sansom)、王彥一 (Wang Yaan-iee) (音)、C. K. 孔 (C.K. Kung)、丹・邁斯納 (Dan Meisner)、湯姆・盧茨 (Tom Lutze)、利薩・布倫南 (Lisa Brennan) 以及不幸英年早逝的林蔚南 (Lin Weinan) (音)，他們對本書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還要特別感謝自由出版社聘請的特約評稿人瑪莉琳・楊 (Marilyn Young) 和威廉・約瑟夫 (William Joseph) 就本書新增的第六

部份內容的報告，在我完成最後部分的關鍵時刻，他們的評論給我以巨大的鼓勵。他們的建議使本書避免了不少史料錯誤及遺漏。

我希望表達對自由出版社原高級主編喬伊斯·塞爾策（Joyce Seltzer）熱忱切的謝意，本書第二版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策劃和督導，他還為第三版的出版作了初步的安排。我非常感謝自由出版社的現任高級主編布魯斯·尼克爾斯（Bruce Nichols），讚賞他的鼓勵、專業水平及與難以駕馭的作者打交道的高超技藝。我還有幸得到自由出版社編輯助理卡瑞恩·艾米·金（Caryn-Amy King）的幫助，她的鼓勵和耐心令人稱道。

我對林恩·盧布科曼（Lynn Lubkeman）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她就本書的內容和風格慷慨地貢獻了她的學識和時間，一如她的愛。

本書的第二版是獻給哈維·戈德堡（Harvey Goldberg），他在第二版出版後不久辭世。本書的新版也是對他的最好紀念——紀念這位最偉大的導師、最好的朋友、最忠誠的同志，這些形容詞雖常被濫用，但在這裏，恰是用其本意。

莫里斯·邁斯納
麥迪遜，威斯康星
1998年8月

第一部

革命的遺產

第一章

西方帝國主義與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軟弱性

十九世紀中葉，基督教農民起義失敗，標誌著當代中國革命史的開始，它的頂點是二十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農民革命取得勝利，儘管這決不是革命的終結。意味深長的是，無論是1850–1865年的太平天國起義，還是近一個世紀後的共產主義革命，他們的思想體系都不是源自數千年的中國傳統，而是源自近代西方的理論。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起義幾乎推翻了滿清王朝的統治，它的領袖洪秀全自稱是基督教上帝的門徒(相信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弟弟)，而毛澤東則以其特有的方式成為馬克思的現代信徒。無論他們各自的思想體系是如何地「中國化」，並配合了中國的歷史條件(他們的思想體系也確實比較順應中國國情)，洪秀全和毛澤東都不是作為中國聖賢傳統中的聖人出現的，相反，他們二人都是以反傳統、新社會理想的代表和新社會制度的先知形象出現在歷史舞台上，而這種社會制度是以西方理性和政治傳統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為基礎。

借助於西方的思想體系為中國革命的目的服務，反映了西方帝國主義在當代中國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革命就是帝國主義所起的意義深遠的作用之一，儘管這完全是出自偶然。帝國主義的革命作

* 這裏所說的"social classes"，中譯為「社會階層」較為合適，然而其中又提到"bourgeoisie"或"proletariat"，則譯成「中產階級」或「無產階級」較為妥當。故此，「階層」及「階級」時或互用，難以作嚴格的區分。

用不僅表現在社會和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文化和知識方面。帝國主義不僅破壞了舊的儒家秩序，使革命成為可能，並在實際上成為必然；而且，作為副產品，它為當代中國革命者提供了反對舊傳統和舊制度的新觀念和思想體系。中國革命者運用西方的工具和觀念，不僅要打破西方帝國主義的枷鎖，而且也要擺脱中國傳統的束縛。未來的新藍圖排除了以儒學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和西方對中國的統治。太平天國激進的基督教平均主義綱領擯棄了中國文化歷史的過去，奏響了反傳統的和弦，在一個多世紀裏，其聲響一直在中國迴盪。

從中國歷史發展的總進程來看，中國是一個傳統已僵化的國家，中國人保守地執著於傳統的儒家社會和文化價值觀，因此，人們往往形容中國人實際上對「西方的反應」無動於衷。但是，要切記的是，中國當代革命史是以反傳統的方式開始的。在強烈的反傳統意識的驅動下，擯棄了中國文化歷史遺產的太平天國以激進的基督教平均主義綱領，為後來的革命運動以不同的方式所繼承，特別是為「五四」時期的反封建的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的創造人和早期領袖正來自這批知識份子。

無論傳統文化價值的保守性如何阻礙了中國保守派實現現代化(中國保守派改革中國的失敗不只是文化上的原因)，但因此假定只有依據中國傳統思維和行為模式的生存狀況，才能理解當代中國革命，這種廣為流行的觀點是缺乏理據的。中國革命者傾向採用西方提供的被認為是最激進的觀念和思想，並從中推演出偏離傳統方式的激進的未來藍圖。他們總是關注中國未來的困境，但目的不是要復活舊的中國傳統，而是尋求埋葬舊傳統的途徑。

然而，單憑觀念和思想造就不出革命的環境，更不能創造革命。由於當代中國的社會條件潛在地具有革命性，才使得革命的觀念(和反傳統的衝動)在特定的歷史背境中成為能動力量。此外，在關鍵的社會領域中，西方帝國主義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這卻是自相矛盾的作用，既是革命的又是反革命的，它創造了當代革命的的環境，但又阻礙革命的實現。正如馬克思預言的，帝國主義作為「不自覺的歷史工具」，為中國革命、事實上也為所有受到其衝擊的非西方世界的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創造了社會條件。無論帝國主義的行為動機多麼卑

鄙，也無論它使用的方法多麼野蠻，對那些單靠自身力量無法進入現代歷史的民族來說，帝國主義是打破僵滯的、受傳統束縛的社會的必然歷史力量。套用馬克思的話，帝國主義是「摧毀一切萬里長城」的力量，「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裏推行所謂文明制度，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1]

但馬克思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最終社會經濟後果過於樂觀了。誠然，帝國主義的進攻確實摧毀了舊中華帝國的萬里長城，以連綿不斷的戰爭和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蒙受了巨大的恥辱，加速了中國傳統政治結構的瓦解。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引進在很大程度上破壞和改變了傳統的經濟秩序，特別是在外國政治和軍事力量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及周圍地區更是如此。然而，新的中國並不像馬克思預期的那樣而為西方資產階級世界的翻版。在西方帝國主義扶持下引進中國的近代資本主義，依然保持其外來的特徵，只能以有限和扭曲的形式發展。雖然當代中國出現了資產階級，但這只是一個人數不多、經濟力量弱小的階級，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賴以產生的西方帝國主義力量。此外，中國資產階級主要是商業和金融資產階級，而不是產業資產階級，它的主要作用是在中國市場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間充當中間人。在一個當代經濟為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裏，無論其個別成員可能對外來統治懷有多麼強烈的民族主義仇恨情緒，依然羽翼未豐，中國資產階級除了充當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外，還能指望它幹點別的什麼事情？因此，伴隨著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一個主要從事商業和金融而不是工業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弱小而發育不全的城市無產階級，這是極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1911年滿清帝國垮台時，中國有4億人口，產業工人人數不超過100萬，其中多數是在缺乏機械動力的小作坊裏工作。工人多數來自農村，而不是傳統的城市手工業工匠，因此他們與故鄉村莊和農民傳統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些因素，再加上人數少，妨礙了當代無產階級自覺意識的發展。

這樣，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徵是當代社會各階層的軟弱性：一個弱小的資產階級和一個更弱小的無產階級。但是，弱小的還不只是

這兩個階級，當代中國的歷史特徵是所有社會階層的軟弱。伴隨著處於不發達狀態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是傳統的豪紳地主統治階級權力和聲望的衰落。當帝國主義破壞了與豪紳息息相關的封建帝國官僚機構的基礎後，豪紳地主發現沿用傳統的寄生方式剝削農民更有利可圖——隨著舊政治秩序的解體，通過官僚體制的傳統機會(以及傳統的官僚和儒家對剝削的道德制約)衰減，這種方式越來越具有寄生性。由於缺乏遠見、機會和資本，舊統治階級的成員中只有相對很少的成員轉而從事現代商業、工業或現代形式的商業化農業。所以，傳統的中國豪紳在後傳統的中國社會和知識世界中，依然維持其主要傳統，豪紳階級產生不了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雖然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前，豪紳在當地農村的經濟和政治領域中還居支配地位，但它已是一個日趨衰敗的寄生階級，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破產，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更是毫無作為。

腐朽的豪紳地主是阻礙從內部改造封建帝國制度的主要因素，因此加速了革命形勢的形成。除此以外，由於缺乏一個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中國未能走上巴林頓・穆爾(Barrington Moore)稱之為「通向現代化的保守道路」，即類似於明治時期的日本走過的道路。當然，中國曾進行過這樣的嘗試。繼鎮壓了太平天國和鴉片戰爭蒙恥之後，保守派的「自強者」尋求中國現代化之路，使中國對外能抵禦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保護滿清帝國，對內鞏固舊的儒家社會秩序。但這是徒勞的掙扎，在1895年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可見一斑，而在十九世紀末中國已被瓜分為一個四分五裂的殖民地。垂死的滿清王朝又苟延殘喘了十年，在1911年的那場準革命中默默地退出了歷史舞台。

長期以豪紳地主為社會基礎的封建秩序分崩離析，又反過來加速了豪紳地主在現代社會的衰落，封建帝國的終結不僅使儒家思想體系失去了政治上的代表——這種思想體系在傳統上認可豪紳地主在中國社會的統治地位——而且也使豪紳地主失去了他們長期賴以獲得財富和政治保護的官僚網絡。垂死的豪紳地主階級蹣跚地步入了二十世紀，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實行最野蠻的傳統形式的社會經濟剝削，而這已不再受傳統政治和道德法令所約束。作為這種剝削的犧牲

品的農民，最終有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儘管方式不同——農民以無情的土地社會革命方式，最終於二十世紀中葉消滅了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豪紳地主。

在這裏，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豪紳地主的衰敗所產生的不同歷史結果：在當代中國，政治和軍事力量與社會和經濟力量，兩者有分離的趨勢。至少在西方的歷史經驗裏，一般的歷史情況是，一個曾是社會統治階層的力量與聲望的衰落總造就一個新社會階層的興起。我們關於社會階層的興衰、關於經濟力量與政治權力的一般關係、關於革命的主要理論，都為從近代西方歷史經驗中推演出的各種範疇所支配。我們歷史意識中最突出的部分，就是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在這個轉變時代裏，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交換方式，貴族力量遭到破壞，近代資產階級逐漸上升為社會和政治的支配力量。

然而，當代中國的歷史情況卻並非如此。雖然豪紳地主的衰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帝國主義的衝擊，但是，在豪紳地主被迫放棄支配地位的中國社會裏，與資本主義生產力相聯繫的社會階級卻沒有上升到支配地位。如上所述，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都極端弱小。他們是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物，但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暗淡的摹本。

當然，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依然是農民。在傳統中國社會秩序解體的時代裏，農民依然保持著傳統的生活方式；新的經濟力量增加了農民原來已經不堪承受的巨大負擔，在日益沉重的傳統壓迫形式之上又增添了新的剝削形式，但卻沒有改變舊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和傳統的生活與思維方式。地方化和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的本質，決定了農民是一個軟弱的社會階層，眼界狹隘，缺乏在國家政治舞台上表達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政治途徑。與傳統時代一樣，當代中國社會建立在農業勞動基礎之上，但在當代中國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農民對中國發展的社會政治方向幾乎沒有發言權。中國農民具有採取有效政治行動——實際上就是革命——的潛力，但僅靠農民自己是發揮不出這種潛力的，它需要由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領導、組織和思想體系，使中國農民成為當代歷史的參與者，而不僅是當代歷史的犧牲品。作為

一個階級本身，農民不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而且缺乏社會與經濟權力。

然而，重要的是，曾統治中國社會二千多年的豪紳地主衰落和腐敗，而且當代資產階級太不發達，以致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社會階級。日益腐朽的豪紳地主所以能夠在1911年封建王朝垮台後生存，大概因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實際上也不願意)消滅它而已。

我們在這裏看到了當代中國歷史現象的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政治權力對社會和經濟力量的相對獨立性。在一個沒有任何階級能居於支配地位、所有社會階層都軟弱無力的社會裏，政治權力日趨獨立於社會各階層之外，並從總體上控制社會。十九世紀下半葉地方政治軍事力量的割據，1911年辛亥革命創建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迅速崩潰(名存實亡)，其後袁世凱實施軍事獨裁(1912–1916)，以及接踵而至的十年軍閥混戰，無不反映了這種趨勢。以軍事實力為後盾的獨立的政治權力，不僅歷久猶存，並制約著二十世紀政治生活傳統的殘餘特徵，而且也是中國當代兩大政黨(即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特徵。單單依據政黨所代表的特定社會階層利益，既不可能理解國民黨的歷史，也不可能理解共產黨的歷史。誠然，這兩個政黨都以不同的方式牽涉不同的社會集團及其利益，但是，雖然地主和沿海城市的商業和金融資本家支持國民黨，國民黨並不簡單地就是地主和銀行家的政黨，與其說蔣介石的國民黨依靠城市資本家的經濟支持，不如說「上海金融家」更需要依靠蔣介石的軍事和政治權力。共產黨取得政權是靠農民的支持，但在它領導的以農村為基礎的革命進程中，它並沒有變成一個農民的政黨；農民的支持是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但事實證明共產黨比農民更革命。在中國當代兩大政黨活動的歷史環境中，與其說是社會階層的利益決定政治和政策，不如說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佔有者決定社會各階層的命運。

既有特殊的革命潛力，又有保守的歷史內蘊，這就是當代中國的狀況。滿清政府末年出現的半獨立的地方政權割據，二十世紀初的軍閥統治，1927年後的國民黨政權，是其保守性的反映。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政治權力不是用來改變中國社會，而是保護既存的社會經濟關係，尤其是農村社會經濟關係。革命的潛力則表現在文化–政治精英的

出現，他們賦予革命運動以更激進的動力，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階層所能允許的範圍。

註釋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55。

第二章

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反叛

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起義已經開始挑戰士紳階級和儒家社會政治制度，但直到十九世紀末，士紳階級的成員開始反對本身階級的儒家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時，當代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才真正開始。在1890年代，一批人數不多但有影響力的傳統地主官僚精英的後裔開始不信任儒家價值觀念的作用(及其道德準則)。在受西方觀念影響的同時，他們敏銳地認識到，西方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生存構成了日益嚴重的威脅，而舊的統治階級沒有能力對此作出有效的反應，他們在理智上逐漸背離了傳統的價值觀念和信仰。其中一些人不願意無條件地接受傳統的、被奉為神聖的價值觀念，因此不願意在舊制度中接替父輩成為統治者。一批屬於傳統統治精英後裔的年輕學者，開始遊離於本身階級之外，形成了中國社會一個新階層的核心——現代知識分子，現代革命運動的領袖正由此產生出來的。正是士紳的後裔——他們實際是本身階級的叛逆者，將為最終摧毀士紳這個社會階級的革命運動提供理論和領導。

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歷史中，具有如此顯赫的政治地位，並非如通常所認為是仰賴中國士大夫的傳統聲望，而是當代中國歷史環境的特定條件使然。在一個以大規模社會與文化解體和極端的政治動亂為特徵的環境中，在一個所有社會階層都極其弱小、因而沒有任何階層能居於統治地位的社會裏，知識分子才能作為自主的力量而發揮作用，並對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但是，知識分子本身並不能夠創造歷史。由於切斷了與其所屬社

會階層之間的聯繫，知識分子雖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但在政治和歷史上還是處於軟弱無力的地位。只有當知識分子意識到自己必須與其他社會階級建立聯繫，並把握住時機，成為反映窮苦大眾在社會與經濟領域內不滿情緒的政治代言人，將大眾的活動納入新的政治活動形式中——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才能認識和利用當代中國歷史環境所造就的革命潛力；也只有在這時，知識分子才能利用時機按照自己的觀念、理想和藍圖去改造社會現實。1890年代，當士紳的後裔拋棄了接替父輩統治者地位的道德權利，作為一個獨立社會階層出現時，他們播下了現代中國革命的種子。但嚴格地說，只有在30年後，知識分子的命運與人民大眾的命運息息相關時，現代中國革命才真正開始。

1920年代，隨著帶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的出現，這種極其重要的歷史連繫也得以開始形成。然而，這些知識分子並非直接啟蒙於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而突然在歷史舞台上出現。那些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知識分子認為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具有啟蒙意義，是由於他們認識到它是解決中國社會危機的途徑。然而，他們認識中國國情的方式，及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問題的方式，無不深深受到以往知識分子稟性所影響。

民族主義與傳統的破滅

民族主義與傳統文化破滅這兩者不可思議的結合，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一個顯著特徵。毫無疑問，中國知識分子有著高度的民族性，因為民族主義和反帝主義是中國知識分子賴以產生的歷史環境中的內在因素。所以，現代知識分子的首次意義重大的政治行動，發生在中國面臨遭侵略成性的西方列強肢解和殖民化的時候，決非偶然。1895年，現代化的日本軍事力量使中華帝國顏面掃地。也正是這一年，孫中山發動了首次意圖推翻滿清王朝的革命運動。更意味深長的是，康有為也在這一年組織了約一千三百名年輕的士紳知識分子精英，聯名抗議北京政府與日本簽訂投降條約，鼓吹實行變法，把變法視為拯救中國的良策。這一事件標誌著知識分子反叛舊制度的開端：

它不僅反映了統治階級最傑出後裔中一大批成員，對傳統體制的普遍感到不滿，也反映他們不願意在他們已經喪失信任的體制中為官。到1890年代中期，民族危機迫在眉睫，中國已不再是一個具有精神優越性的中華文明國家，不值得自鳴得意的儒家學者津津樂道了。

隨後幾年，帝國主義按各自的殖民地勢力範圍，瘋狂地瓜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行動也採取更為緊迫的新形式。他們的努力在1898年的「百日維新」中達到高潮，這是一次試圖從上層變革中國的著名政變，英勇但卻時運不濟，一場反政變使其流產，中國又回到了維新前的狀態——依然受到腐朽的官僚階層和衰敗的士紳統治階級控制。

1890年代，在對傳統不滿的知識分子的政治行動和有影響力的著作中，都反映出一種新的民族主義責任，即中國如何在一個由帝國主義支配的弱肉強食的世界裏生存。因此，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不是如何維持特定的中國文化或特定的中國社會制度(儘管一些有志之士努力挽救那些看來值得挽救的傳統)，而是建立一個能夠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生存，成為一個既富強又繁榮的國家與社會。正是這種關注，決定了知識分子對所有新觀念、新思維——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理解及其政治用途。

從某種意義上說，具有強烈民族主義情感的知識分子是當代中國歷史環境的產物，但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強烈的反傳統意識會與民族主義的追求相伴？畢竟，一般而論，民族主義要求尊重本國的歷史，民族主義者也總是要歌頌和美化本民族獨特的歷史和文化遺產。然而，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卻並非如此。它把傳統的價值觀念和文化當作不適應民族生存的東西而摒棄，繼而又把它們當作中國現實問題的根源而加以鞭撻。

產生於世紀之交的第一代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言人是嚴復和梁啟超，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現代民族國家力量的基礎，不單純是西方取得的物質成果，而且還有產生這些物質成果的西方思想和價值觀念——競爭與進步的觀念、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的個性解放的價值觀念和征服自然的觀念等。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儒家學說裏沒有類似的價值觀念，導致了現代中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落後，所以要將這些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引進並運用於中國。

從宣稱傳統不再適應現代國家的目標，到從道德方面抨擊傳統，只有一步之遙。隨著中國的危機日益加深，隨著要求解釋危機和尋找解決辦法的需要日益增長，邁出這一步並非難事，也是必然的，梁啟超和嚴復闡述民族主義理論的著述便預示了這一點。雖然抨擊和根絕傳統並非是梁啟超和嚴復所想要或期望的民族主義結果，但他們對現代世界力量根源的探討，導致他們在思想上徹底與過去決裂，這是他們不能夠也不願意認識到的結果。他們把維護國家生存和國家強盛作為判斷所有觀念和制度的民族主義標準，表達了在本質上是反傳統的兩層含義：其一，他們相信，在現代世界，只有在西方理論和思想的智慧中，才能找到為國家強盛所必需的價值觀念，因為正是西方理論和思想保證了列強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其二，從上述觀點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傳統的中國信念和價值觀念不可能有助於國家強盛這一根本目的，所以必須將之拋棄。

因此，雖然許多早期的民族主義者對傳統儒家道德觀念懷有深厚的感情，但恰恰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就潛藏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否定。1920年代，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以更激進的方式表現了這種反叛傳統的潛在力量。面對日益盛行的現代西方觀念，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聯繫也日益淡薄；但驅使他們如此強烈地反傳統的動力，卻是來自新世紀來臨前20年發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1911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儒家倫理秩序的象徵），使傳統價值觀念失去最後的合法性，但政治機會主義者出於純粹反動的目的，將儒家的某些觀念玩於股掌之上，作為維護腐朽社會和寄生其中的腐敗官僚與軍閥的支柱。儒家學說與社會政治保守主義的繼續聯結，使整個傳統文化遺產都受到了猛烈抨擊。

1915年至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猛烈抨擊傳統文化，號召要徹底摧毀舊的傳統和價值觀念，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年輕熱情的親法者（Francophile）陳獨秀首次發出了在中國進行一場文化革命的號召。他於1915年結束了在日本的自我流放，返回中國創辦了《新青年》雜誌，為了更明確地反映他反對傳統的決心，他後來用法文「新青年」（La Jeunesse）給雜誌命名。1921年，這位近代法國民主與文化的崇拜者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領袖。

《新青年》對因其聚合的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實在不容低估。他們的著作鑄造了整整一代青年學生的信仰，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後，這些學生成為政治上的主力軍和現代中國革命的領導人。在《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年輕的毛澤東，他深受該雜誌的影響，1917年，他在該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一篇強調體育文化重要性的論文）。《新青年》灌輸給毛和他的同時代人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是文化觀和道德觀的徹底改變是任何有意義的社會變革和政治運動的根本前提。他們要求的不是革新傳統文化，因為他們多數認為，中國的過去幾乎或完全沒有什麼東西值得保留。他們要求徹底革除過去的一切價值觀念、傳統和習俗，以一種建立在他們仰慕的西方民主與科學基礎上的嶄新文化取而代之。《新青年》雜誌充滿了對儒家學說的辛辣嘲諷、抨擊和對傳統的無情批判，這不單單反映認為傳統已經過時、無用的觀點，而且還表達了一種情感，即傳統在道德上也是腐朽的，並且可能歷來如此。

與無情否定中國的過去相應的，是對青年一代熱切的信任。青年將是新文化的載體，因而代表的是一個嶄新的、朝氣蓬勃的中國社會的誕生。青年被認為較少受到舊傳統的腐蝕，還沒有被病態文化和病態社會所浸染，比其前輩更易於接受新思想和新價值觀，他們被視為拯救民族必須進行的文化變革的代表。

《新青年》知識分子的另一顯著特徵——實際上也是現代中國分子的總體特徵——是堅信觀念具有改變社會現實的力量，始終確信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的變革必然是社會、經濟和政治變革的先導。毫無疑問，強調（和過分強調）觀念特別是自己的觀念的重要性，是知識分子的一般傾向，但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中，這種趨勢的強度和韌度都是空前的，而強調思想意識對歷史發展方向的決定性作用，更是這種趨勢的總體特徵。

在陳獨秀於1919下半年皈依馬克思主義前，《新青年》還尚且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刊物。但是，一旦政治事變迫使它的許多撰稿人和讀者放棄了西方的自由主義觀念，它最終生產出了馬克思主義者。《新青年》編輯部有兩個來自北京大學的教授——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是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早期的黨員主要是由追隨他們、為這份

非比尋常的雜誌所發表的觀點培育起來的青年學生組成。中國共產主義的領袖，即後來人民共和國的領袖，都是出自這個青年革命者的早期團體，當然，其中最著名的是毛澤東，他曾是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圖書館助理。在他們新樹立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帶有許多早期知識分子的烙印，如民族主義、反傳統文化以及堅信觀念可以鑄造社會現實的唯意志論等。

這些不同的信念是難以調和的。賦予觀念和思想意識以決定性作用，遠遠超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範疇。強烈的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內具有深遠意義的國際主義內容和目標，或與馬克思主義要求的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難以兼容。進而，民族主義又與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否定互相衝突。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中，這些相互衝突的信念多次導致具有深遠而重要政治影響的緊張局面。1915年至1919年間的馬克思主義勃興前的文化革命產生的這些問題和緊張局面，又以新的形式在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重現在1960年代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兩次文化革命涉及的中心內容都是批判和否定歷史傳統，都存在著協調反傳統的衝動與民族主義感情的問題，都堅信人的精神力量能夠鑄造社會現實，都相信青年是社會道德變革的主要力量。青年毛澤東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精神產物，老年毛澤東則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

1915年至1919年的新青年運動最典型地反映了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反叛。新知識分子徹底的反傳統精神，表現了他們高居於社會之上的取向以及對歷史傳統和制度在精神上的否定。反傳統也表明了知識分子的社會獨立性，他們作為一個新社會階層出現於中國社會之中，不依附於任何社會階級，也不是這些階級的代言人。這樣，在垂死的士紳階級中，產生了一個肩負建立新社會制度的自主的知識分子階層，在這個新社會制度中，他們所背叛的這個階級將不復存在。

然而，這批知識分子缺乏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國的手段。他們自主地位的另一面是在社會上孤立與政治上無權。他們提倡的現代西方資產階級觀念和制度，在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幾乎無人響應。現代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扭曲，使其沒有能力作為一個承載自由觀念和促進民主發展的階級。

所以，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與現代城市處於隔絕狀態，一如其在精神和物質上與落後的農村分離一樣。社會上的孤立與政治上的無力，使他們沒有根基，屢遭挫折，迫切需要在中國社會中尋根。對文化變革的疾呼吶喊，不僅是他們醫治中國痼疾的理性良方，也表現出他們社會與政治上的孤獨狀態，沒有能力進行他們渴望的變革。直到1919年，中國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轉變後，知識分子的處境才出現變化。這種轉變使許多知識分子對西方自由主義的幻想破滅，給他們帶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新信仰。馬克思主義為有效的政治行動提供了時機，也為結束他們的孤立狀態提供了希望。

「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導致在中國「無根」的知識分子與普通民眾相結合的一系列事件始於1919年5月4日。這一天標誌著現代中國革命的真正開端。這一天，三千多名學生走上北京街頭示威遊行，抗議西方民主國家在凡爾賽和會上將德國原在山東的勢力範圍作為戰利品轉讓給日本。抗議活動以學生包圍和焚燒北京政府的親日部長官員的住宅和官邸而達到頂點。政府出動軍警鎮壓和逮捕學生，激起舉國上下對軟弱腐敗的中國政府和長期以來剝削和壓迫中國的外國政府的憤恨。示威抗議規模越來越大，方式日趨激烈，很快就蔓延到全國所有主要城市。

「五四」運動的政治意義在於它不僅僅是一場學生運動，北京大學的許多教授、工人和商會都加入到學生鬥爭的行列。大規模的群眾示威、罷工、抵制洋貨，與當局不時發生的暴力對抗席捲中國各城市。「五四」運動喚醒了長期處於呆滯狀態、死氣沉沉的中國社會。大規模的反帝浪潮橫掃各個城市，全國(即使還不算農村)陷於政治和思想上的激烈動蕩之中。

這一重大的新政治形勢使一批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從根本上政治化了。許多曾自認為是自由的世界主義者的知識分子，現在成了富有戰鬥精神的民族主義者，奮起捍衛國家，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許多原來拒絕參加政治活動的人，把中國的悲慘現狀歸咎於民族文化有根本缺陷，認為政治手段只能解決表面問題，現在也開始熱衷於直接

的政治行動，以從外部威脅中拯救中國，解決來自內部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威脅。滲透在城市中的新型政治行動主義精神，為組織群眾進行有效的鬥爭，為知識分子能夠有效地領導群眾鬥爭提供了希望。與此同時，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看法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凡爾賽的致命決定引起了強烈的民族憤恨情緒，國內民族政治行動主義也日益增長，這一切導致「先進的」西方國家會按照民主與科學的原則指導中國的信念迅速破滅。西方老師現在被視為壓迫者。西方世界會為中國復興提供先進模式的形象消毀，取而代之的是以為西方世界是由不可信、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國家組成的新形象。由於擯棄了中國傳統的思想與價值觀念，知識分子仍然從西方尋求指導，但他們開始把目光投向批判西方世界的西方社會主義理論，不再維護既存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制度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

正是在「五四」運動創造的新政治與思潮的環境下，部份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理論。此前，1917年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曾引起中國知識界的極大興趣，但少有人真正皈依。在對西方民主的信仰已經破滅、國內的政治覺醒要求採取更有效和更直接行動的形勢下，十月革命提供了新的精神信仰和新的政治模式。馬克思主義被視為近代西方最先進的精神產品，但又否定了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形式，拒絕對中國實行帝國主義政策——這一點在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這一理論十分重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中有關民族主義的呼籲，和新蘇維埃政權宣佈放棄沙皇帝國在中國的特權等事件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證。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擯棄西方對現代中國的支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不失為一種出路。接受俄國革命，成為共產主義者，是尋求改變中國社會的具體政治行動方案的出路，也是在世界範圍的革命進程中為中華民族謀求一席之地的出路所在。

布爾什維克革命似乎為世界革命的前景提供了榜樣，儘管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深受這一榜樣的鼓舞，但他們卻是通過一條有深遠意義的民族主義道路來追求新社會主義的理想。正如20年前在民族主義反叛傳統中國價值觀念的長期進程中產生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如今，對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觀念幻想的破滅，孕育出了新的馬克

思主義知識分子。兩種歷史環境下的中心問題都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與隨後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憂慮。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產生後，民族主義將服務於社會革命的目標，此外，從民族主義產生出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將始終制約著解釋和運用這種新理論的方式。這是一個必然的條件，由於中國是一片需要國家獨立和社會革命的土地，這兩個任務恰恰是不可分割的。

正由於「五四」運動激發起民族主義，使人有衝動採取政治行動，並與列寧和托洛斯基著作中對即將來到的世界革命形勢的樂觀預期相結合，在這個基礎上，正由於「五四」運動激發起民族主義，使人有衝動採取政治行動，並與列寧和托洛斯基著作中對即將到來的世界革命形勢的樂觀預期相結合，在這個基礎上，新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承擔起了組建共產黨的任務。1920年，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各種共產主義小組(名稱不盡相同)，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基礎。在巴黎、東京和柏林留學的激進的中國學生也建立了類似組織。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來自各共產主義小組的12名代表在上海秘密舉行了成立會議，由於租界巡捕的搜查，會議最後一天移至杭州附近南湖的一艘遊船上舉行。在新成立的(受莫斯科領導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代表的幫助下，會議通過了採用標準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並宣告奉隨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目標。

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人數甚少，成員年輕，缺乏革命實踐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會議代表的全國黨員總數僅有57名。對一個建立在缺乏社會主義政治傳統的國家裏的新組織而言，人數的確太少了。黨的領袖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吸收的黨員多數是自己的學生。在這個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精神傳統的國家中，黨的領袖及黨員對指導其革命活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知識，無可避免地是膚淺的。這似乎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端。

第三章

資產階級的失敗與無產階級革命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27年蔣介石發動的幾乎將中國共產黨置於死地的反革命政變，這期間最重要的事件是兩次革命失敗：一次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稱為「國民革命」的失敗；另一次是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雖經英勇鬥爭，但最終還是陷於失敗的中國新生的城市工人階級對社會進行的社會主義變革。兩次失敗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義。1920年代的失敗幾乎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雙雙從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1927年後，革命從城市轉移到了農村，正是在農村，誕生了毛主義，鑄成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 * *

1921年，當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知識分子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時，他們堅信，主要的任務是組織中國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場革命是馬克思曾預言、俄國革命所預示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進程的一部分。他們首先致力於組織工人運動，取得了顯著成效。各大城市的產業工人組織和偏遠地區的煤礦、鐵路工人組織如雨後春筍，蓬勃發展。工人罷工活動此起彼伏，其動基往往既有政治目標，也有反帝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起碼的生活和勞動條件要求。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年輕的共產黨人就建立起了代表50萬工人的全國總工會，能夠發動成千上萬的工人參加「五一」勞動節的示威遊行。

然而，共產黨人不久就認識到，在一個由殘暴的軍閥勢力統治的

國家裏，純粹的軍事實力是決定政治事件發展方向的關鍵因素，鎮壓和摧毀工會和其他群眾組織，遠比創建這些組織容易得多。因此，他們雖然沒有放棄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設想，但不得不推遲它的實現。共產黨人很快還認識到，世界革命同樣也不得不推遲了。由於在西歐的工業化國家並沒有發生預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在充滿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中，蘇聯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無論是俄國的民族利益，還是列寧主義革命戰略的邏輯，都要求中國革命的進程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把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留給未來——因為共產黨人通常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性革命爆發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而布爾什維克革命未能點燃世界革命。1922年，以莫斯科為基地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代表將蘇聯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判斷轉告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者勉強地接受了這個令人沮喪的信息。但是，無論是莫斯科的政治權威，或是中國的政治現實，都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把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準備與國民黨結成聯盟。國民黨是一個仍然由孫中山領導的老革命黨，它借助於「五四」運動的政治行動主義而恢復了元氣，在廣州市及周圍地區初步建立了政治和軍事根據地。國共聯盟的目的是實現民族統一和國家獨立，即消滅軍閥割據，驅逐帝國主義。共產黨是這一聯盟中弱小的一方。共產黨承認國民黨在資產階級或稱「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共產黨員在這個統一戰線中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國共聯盟正式建立。蘇聯向廣州的國民黨提供了武器、金錢、軍事和政治顧問，旨在建立一支現代軍隊進行北伐，最終統一中國。而莫斯科向共產黨人提供的只是精神鼓勵和政治建議。

回顧這一段歷史，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共產黨國際的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解是如何淺薄——至少在涉及中國問題時是如此。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場變革，它要掃除舊封建主義（或前資本主義）遺留的陳腐制度，代之以符合資產階級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財產關係發展的新政治制度。這一進程的中心環節是國家的統一，即建立一個擁有統一的法律體系、國家貨幣和稅收體制的中央政府；簡言之，即消滅所有封建割據的殘餘，創造有利於建

立全國市場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政治和法律環境。至少從理論上講，這一進程還應包括建立議會民主，這是最適合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形式。此外，資產階級革命還應給予其他社會階級(特別是正在成長的無產階級)一定程度從事政治活動的自由，廢除依然束縛著農民的封建關係，加速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發展。

依照特定的列寧主義模式，亞洲和中東地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包括擺脱帝國主義枷鎖的民族主義革命，更重要的是，還應包括在農村進行反封建主義的社會革命——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強調無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的巨大政治作用，可以部分地彌補工業資產階級的軟弱不足。

然而，國共聯盟矢志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只是一場十分有限的革命。在時代的革命辭藻下，國民黨領導人對革命這一概念的理解沒有超出他們願意接受的程度。對他們來説，革命只有兩個目標：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至於民主共和國的理想，他們不過嘴上説説而已。事實上，革命從其開始之際就暗示著中國的新政治制度在本質是一種軍事制度。它非常明確地排除了、或至少推遲了在農村進行社會革命。一句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要實現的是純粹的民族主義目標。

當然，中國確實需要一次成功的國民革命。1911年的革命只不過是推翻了不合時宜的滿清王朝，它既沒有造就一個強盛的國家，也沒有促成一個民主的國家；相反，繼之而來是黑暗的軍閥時期的政治動亂和分裂。辛亥革命既沒有觸動使中國深陷於外國強權下的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經濟侵略網絡，也沒有動搖既存的國內的社會結構，特別是農村中傳統的社會經濟關係和士紳地主的統治。到了1920年代，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已成為中國所有政治上有識之士的共識，從而促使傳統統治階級與現代社會各階層和政治派別聯合起來。對一直恪守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教條、此時卻又深深涉足於中國內部政治的孤立無援的蘇聯領導人來説，這場國民革命可能產生一個親善的中國政府，實是壓倒一切的目標。

但中國需要的不僅僅是一場純粹的國民革命，它需要革命的深入發展。已出現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的社會階層和團體給予了「國民革命」

莫大的動力，使其遠遠超過了構成國共聯盟基礎的那些有限目標。在城市，新生的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反抗工業化初期的不平現象；在農村，農民組織(或被組織)起來，推翻傳統的地主階級統治。已經政治化並在政治上組織為現代政黨的激進知識分子，熱切地領導著群眾革命運動。正如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所展示的，這些力量是不可能為「民族」革命或更廣泛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狹隘範圍所左右的。

1925–1927年的大革命

與國民黨的聯盟為共產黨人走向中國社會，提供了更廣泛的途徑和可資利用的潛在於社會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國民黨旗幟下活動的共產黨人，重新開始組織反抗精神日益強烈的工人和農民。1924年到1927年間，城市和農村的有組織或自發的群眾運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還越來越激進。正是群眾運動，使現代中國的兩大政黨在幾年時間裏迅速地獲得了巨大的力量，為國共聯盟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但是，激進群眾運動日益增長的特點，造成了政治的緊張局面，加劇了社會衝突，從而導致統一戰線的破裂，其結果幾乎摧毀了中國共產黨。

1925年的「五卅」運動標誌著中國革命進入激進與衝突的階段。1925年上半年，工人罷工的浪潮席捲上海——帝國主義在華的中心和象徵。5月30日，工人和學生舉行抗議示威活動，租界裏的英國巡捕在驅散示威者時，開槍打死了12名示威者。「五卅」慘案產生了爆炸性的結果，在所有大城市中引起了一系列罷工、示威遊行和抵制洋貨運動，大規模的反帝浪潮席捲全國。6月23日，在廣州的外國人居住地，群眾與外國人發生了激烈衝突，英法軍隊開槍射殺了50名示威者，毆傷多人；廣州慘案激起了在香港的中國工人的總罷工，這次罷工使英國這塊殖民地陷入癱瘓達16個月之久，並在全國掀起了抵制英國貨運動。10萬名香港工人來到廣州，表達了其強烈的戰鬥精神。他們還組織了省港罷工委員會，使其成為不斷發展的革命運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1925年夏季出現的具戰鬥精神的群眾運動，在其後兩年以迅猛的速度和力量發展，它不是一場純粹的民族主義運動，其目標也並不僅嚴格局限於反帝的範圍。誠然，強烈的反帝民族情緒加劇了革命運動，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屠殺中國人的慘狀更激化了反帝情緒，但是，其中一個促使工人奮起反抗的原因，是早期資本主義工業化所造成的惡劣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生活在外國勢力統治下的城市並在外國人的工廠勞動的工人，很自然地把經濟剝削與外國人的存在劃上等號。正是社會經濟壓迫與外來壓迫的結合，使工人運動具有特殊的鬥爭性。

伴隨著1925–1927年間的城市工人運動，同樣富鬥爭性的農民運動也在農村興起。除了利用秘密社團、暴力群體等傳統組織形式進行抗議和反抗外，還出現了新型的農村組織，即農民協會。農民組織的成員多數是貧苦農民，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革命知識分子的思想與組織活動的產物。農民協會成為士紳的主要威脅。1925年中期，單單在國共聯盟的主要政治、軍事所在地廣東省，就有50萬農民加入了農民協會。其後兩年內，廣東農民組織的成員翻了四翻，農民協會在各省也迅速發展。民族主義和反帝情緒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根本動力來自對社會正義和經濟生存的要求。

「五卅」運動燃起的群眾運動對國共兩黨都造成了直接的重大影響。城市和農村的群眾運動使國民黨能夠鞏固在廣州的勢力，並從廣州向其他地方發展。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蔣介石憑藉對受過蘇式訓練的軍隊的控制，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大權。同年底，他又將國民黨的統治範圍擴大到廣東全省和鄰近省份。1926年夏，國民黨開始了準備已久的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在北伐軍的攻勢下，各路軍閥紛紛土崩瓦解。北伐軍的輝煌戰績得益於革命群眾運動的援助，蔣介石軍隊連續的軍事勝利，又進一步推動了工農運動。

「五卅」運動既導致國民黨勢力的迅速壯大，也同樣使共產黨同盟的力量和影響急劇擴大。1921年共產黨成立之始不足百人，1924年也不過只有500名黨員，但到了1925年底，在前六個月群眾運動迅猛發展的基礎上，共產黨宣稱已有2萬名黨員。而在1927年上半年，黨員人數又幾乎增加了兩倍，達5.8萬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更是龐大，

特別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吸引了越來越多具鬥爭性的學生和青年工人。此外，負責工會和農民協會的共產黨活動家，雖然打著是國民黨的旗號，對這些新群眾組織有巨大的號召力。共產黨員在國民黨，或在以廣州為基地的國民政府及在蔣介石的新軍中，都佔據著重要的職位。

群眾運動給國共聯盟以巨大的政治推動力，但也正因群眾運動節節高漲，最終破壞了聯盟的政治基礎，使國共分裂，共產黨遭到鎮壓，幾乎被摧毀。然而，群眾革命運動一經發動，便獲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已不可能被限制在「國民革命」的狹隘範圍之中。城市工人不僅打擊外國資本家的工廠和企業，而且把目標指向中國資本家的工廠和企業；工人運動威脅的不僅是外國人的財產和特權，而且威脅到一般的財產權。在農村，農民運動攻擊的對象不是外國領主，而是中國地主和農村上層人士的權力。這樣，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導致了爆發社會革命的威脅，它直接威脅到構成國民黨社會基礎的那些階級和團體。社會革命威脅日益增長，使與國民黨血肉相關的城市資產階級內部得以鞏固；蔣介石軍隊的軍官群體，多是地主家庭出身，對平均主義的革命開始感到恐懼。在有產階級的利益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國民黨越來越成為維護有產階級和社會秩序的政黨。

1926年下半年，隨著國民革命軍的北進，工人和農民組織迅速發展，群眾運動的目標和手段也日益激進，越來越具有革命的特點，尤其是在農村更是如此。由下而上的自發群眾運動的發展速度和規模，足以讓最激進的共產黨人也瞠目結舌。這種驚奇 (和興奮) 的感情，貫穿於毛澤東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文。在文章中，毛澤東形容農民自發的革命行動是天然的、根本的力量，「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強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1]

然而，社會革命與國共聯盟的條件是不相容的。共產國際的代表正式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傳達來自莫斯科的斯大林主義的指示，要求限制群眾的激進行動，不惜一切代價維護國共政治聯盟；指令中國共產黨應該限制而不是促進群眾運動，應該壓制群眾運動的革命熱情而不是站在鬥爭前列，這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退維谷，故並非所有共產黨人都聽從了莫斯科的「勸告」。即使中國共產黨人想貫徹共產國際

的指示，也是力不從心，因為群眾革命(特別是在農村)的發展已遠遠超出任何黨派所能控制的範圍。雖然許多個別的共產黨員企圖領導運動，但總的來說，共產黨處於茫然不知所從和無所作為的狀態。其結果是，工農群眾面對正在準備鎮壓群眾運動的有組織的反革命力量，前者沒有防禦能力，基本上是群龍無首。

1927年最初幾個月，國民革命軍在中國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征討所向披靡，軍事上明顯處於優勢，群眾革命運動也發展到高峰。國民黨純粹的民族主義目標與群眾的社會革命需求之間的矛盾，也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蔣介石羽翼豐滿，具備了摧毀群眾運動及拋棄俄國施主和共產黨同盟的軍事實力(並得到上海大資本家的財政支持)，衝突隨之爆發。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反革命政變。3月21日至22日，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起義，控制了上海，迎接國民革命軍的來臨。3月26日，蔣介石及其軍隊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開進了上海，群眾視他們為解放者來歡迎。然而，解放者很快就成了劊子手。4月12日黎明，聲名狼藉的青紅幫和其他黑社會的打手，與國民革命軍的精銳部隊一起，向共產黨和激進工會組織的總部發動進攻，開始了大屠殺，摧毀了在上海這座中國最大城市中的共產黨和工人運動及有組織的激進運動的中心。鎮壓活動從上海開始，擴大到國民黨控制的長江以南所有地區，隨後又擴展到尚未處於國民黨勢力範圍的、由軍閥控制的北方地區。在反革命暴力的狂濤中，蔣介石把這支在蘇聯幫助下建立起來的軍隊，變成了摧毀中國共產黨和激進群眾組織的工具。城市中所有的工會和學生組織都被取締了。但最駭人聽聞的屠殺發生在農村對農民協會的鎮壓。曾擁有數以千萬會員的農會慘遭鎮壓，短短幾個月內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曾迅速興起、給中國農村的變革帶來希望的偉大的農民革命，近乎於銷聲匿跡。如果說在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中被屠殺的有成百上千人，那麼在1927年至1930年的白色恐怖下，被屠殺的人數則又何止成千上萬。

中國共產黨幾乎不復存在。在國民黨軍隊一系列急風暴雨的打擊下，黨的組織基本解體。為逆轉這股反革命潮流，共產黨人鋌而走險，多次舉行起義，但為時已晚，反而使黨的隊伍遭受更大的損失。1927年12月，共產黨人在廣州舉行的最後一次大型起義，卻又慘遭鎮

壓。1927年初，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擁有5.8萬名黨員的強大組織，到同年底，僅存萬餘人，處於分散的無組織狀態，士氣低落，缺乏領導。一些黨員叛變，但多數黨員或戰死疆場，或遭敵人處決。死裏逃生的黨員轉移到偏遠的農村地區，重新開始了新的革命。

共產黨從毀滅性的失敗中汲取了慘痛教訓，在其後的歲月裏，這場教訓指導著黨的革命戰略。他們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訓是，在現代中國的歷史環境下，軍事力量是決定政治鬥爭和社會階級鬥爭成敗的決定因素。國民黨正是憑借其軍事優勢，在1927年擊垮了共產黨。中國政治生活中這一基本事實，深深銘刻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心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的論斷。儘管蔣介石在毛澤東之前就已實踐了這條原理，但毛澤東汲取了蔣介石給他的教訓，成為一個更高明的實踐者。共產黨人現在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軍隊，革命必然要採取武裝鬥爭形式。許多共產黨人還進一步認識到，至少就涉及中國革命的情況而言，莫斯科不是革命智慧的唯一來源地，正是莫斯科制定的「統一戰線」戰略，使中國共產黨慘遭敗績。中國共產黨不是要拒絕統一戰線，而是決心要保持自己在政治和軍事上的獨立性。他們在農民身上看到了新的革命潛力。這一方面是出於需要，因為共產黨已無法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效地開展活動；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是發動一場新革命的前提。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已擺脱了正統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農民革命局限性的教條。

1927年的事變標誌著兩場而非一場革命的失敗：城市的工人運動和農村的農民運動。城市無產階級運動在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運動，或至少是潛在的社會主義運動，它既反對國內資本主義，也反對國外資本主義，其目標是廢除私有制。在當時，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確不合現實，但這並不意味著它的歷史必然性就是不能實現。無產階級只構成中國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卻是舉足輕重的一部分。到1920年代中期，大企業僱用的產業工人數量已達200萬人，他們高度集中地分佈在現代中國經濟的各戰略重地。如果加上城市的半無產階級，其數量則更大，大概有一千萬人，毛澤東曾稱他們為「都市苦力」。他們壯大了城市革命運動的力量[2]。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與1917年俄國產業工人的人數差距並不大[3]，政治戰鬥力也毫不遜色。事實上，中國無產

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幹勁、有組織的創造力、非凡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是二十世紀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運動都難以與之相比的。此外，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個各方面條件都有利於革命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軟弱性，中國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富有戰鬥精神的無產階級運動，再加上強而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這些有利因素，使建立在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其所缺少的，與其說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如說是主觀條件。中國共產黨由於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缺乏經驗，把自己束縛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政策內，把命運依托在國民黨身上。在中國共產黨內，缺乏一個像列寧或托洛斯基那樣勇敢果斷、富有遠見卓識的領袖，未能把握住革命形勢所提供的機會。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但沒有領導群眾，相反，無論他們如何不情願或是出於無奈，他們都接受和貫徹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給群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1927年降臨到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身上的災難，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歷史的必然。俄國人幫助創建了一支現代中國軍隊，又把這支軍隊交到一個用它來摧毀中國革命的人的手中，也決非是預先算定的。這一諷刺性的歷史悲劇所以能成為現實，不是因為群眾運動的軟弱，而是由於其領導人的軟弱和局限，歸根到底是因為莫斯科制定的致命政策。蘇聯的國家利益與中國革命的真正利益發生衝突，這並非是最後一次。

但是，1927年發生的事件——儘管其發生並非必然，卻對決定中國革命的未來和性質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城市工人運動和黨的力量喪失，已無法挽回。1927年後，共產主義革命再次興起，但革命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它是一場發生在偏遠農村的以農民為基礎的革命。經歷了1927年血腥鎮壓的城市無產階級，在其後20年的大部分時間，政治上無所作為；直到1949年勝利後的農民軍隊開進城市以前，共產黨人在城市中也一直未能重振旗鼓。

如果說1927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現實的，那麼，資產階級革命也被證明是不成功的。誠然，1927年到1928年間，在群眾運動的廢墟上，國民黨軍隊勝利地進行了北伐，確實獲得了某種國家統一的外觀。但是，以城市為依托的南京新國民政府，卻幾乎沒有為城市的現

代資本主義發展提供動力和機會。它在農村則極力維持社會現狀，滿足於依靠當地士紳地主精英的勢力。即使就純粹的民族主義革命而言，國民黨的勝利也只是表面的、不完全的。所謂的「國家統一」與其說是建立在消滅軍閥勢力的基礎上，不如說是建立在與北方較強大的各股軍閥武裝結成的脆弱聯盟的基礎之上。所謂「民族獨立」，則是與帝國主義列強握手言和，讓外國經濟繼續左右本身民族經濟的發展。這樣，資產階級革命尚有待完成，這一歷史任務落在共產黨人肩上。

註釋

1. 毛澤東，〈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頁13。
2. 毛澤東，〈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8。
3. 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前夕，俄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約三百萬。

第四章

毛主義革命與延安傳統

1927年10月，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率領殘部進入井岡山——位於湖南與江西交界處的偏遠山區，這裏曾是土匪出沒的地方。中國共產主義革命自此悄然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通過招募無業農民、收編當地土匪武裝，毛創建了一個小型武裝根據地。1928年春，朱德率一千餘士兵來到井岡山與毛會師，壯大了井岡山的力量，朱德擔任了紅軍總司令。其後21年的革命戰爭年代，朱德一直是毛的親密戰友。

正是在井岡山的邊界地區，毛開始形成了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戰略思想。從1928年到1930年，毛的軍隊學會了運用遊擊戰的策略，這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手段。通過大量吸收農民入伍、頒佈激進的土地改革方案，「朱毛軍隊」迅速壯大，逐漸從軍事上控制了江西省南部地區，並於1931年在這裏成立了中華蘇維埃政府。

雖然毛開創了農村革命的獨立進程，但從總體上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尚未步入這一軌道。在毛致力於鞏固江西農村根據地的幾年時間裏，其他共產黨領導人正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率領小股農民起義部隊進攻大城市。但是，士氣低落的工人階級沒有回應這些革命召喚。1930年底，共產黨人重新獲得城市無產階級支持的希望破滅了。失敗後的共產黨力量或是轉移到了江西蘇區，或是退到十多個較小的農村蘇維埃根據地，多數位於長江上游地區。在以後的十年裏，中國共產黨內部，共產國際支持的領導人與毛及其擁護者之間，在黨和紅軍的領導權問題上發生了激烈鬥爭。鬥爭發生在與外界隔絕的、革命與革命者都被圍其中的農村地區——地理位置顯然對毛有利。

1931年11月正式宣告成立、定都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存在了三年。共產黨人建立了一個有效的政府機構，管理著約一萬五千平方英里的領土和約三百萬人口。以後陸續建立的十多個小的農村蘇維埃地區擴大了中央蘇區的面積，總人數約六百萬人。紅軍數量也增加到30萬人，成為一支令人生畏的戰鬥力量。

中華蘇維埃的歷史是短暫的，並以失敗而告終，但它提供的歷史經驗卻有深遠影響。共產黨在江西建立了一個頗見規模、卓有成效的文職政府機構，雖然這個政府垮台了，但幸免於難的政府成員成為有經驗的政治管理者和成熟的革命者。1930年代初，毛澤東和朱德在江西創造的遊擊戰術不斷發展，在大規模的戰爭中經受了考驗。但最重要的或許是，共產黨人懂得了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發動農民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他們認識到，發動農民革命的首要條件是紅軍在軍事上的優勢能保證農民的安全。農民願意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作出犧牲，但如果在形勢毫無希望並面臨反革命力量報復的情況下，他們就會畏縮不前。他們還認識到，在一個僅處於生存水平的農業社會裏，要獲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不能實行激進的社會平均主義政策，這會威脅到生產水平較高的中等農民利益，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有害的。他們明白，要實行有深遠意義的土地改革，不能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強加給農民，只有通過各個村莊的農民組織和農民的參與，才能實現土地改革。

正如列寧將1905年的俄國革命看作1917年「十月革命」的「預演」一樣，短暫的江西蘇維埃是中國革命最重要的延安時代的「預演」。但是，這場「預演」使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農民支持者付出了慘痛的代價。1934年，在國民黨軍隊的大規模進攻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始瓦解。同年秋季，共產黨人被迫放棄了江西根據地，開始了歷時一年的非凡的北向進軍，這就是聞名於世、可歌可泣的長征。

長征的政治和心理意義

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的殘餘部隊，突破了甘肅省六盤山敵軍的最後一道防線，進入了陝北。在中國西北這塊偏遠、原

始、人口稀少的土地上，來自各省的共產黨人找到了自己的避難地。這是一個不穩定的天堂，但卻能為建立一個新根據地以重新發動革命提供了充裕的時間和機會。

1934年10月15日夜，有約八萬名紅軍士兵和35名婦女從江西出發開始長征，在艱辛的歷程中，只有不到一萬人幸存，跟隨毛到達位於長城南面的陝西。在迂回曲折的漫漫長征途上，無數紅軍戰士長眠在中國西部變幻莫測的高山、河流和沼澤中，其中許多人是毛的親密朋友和同志，他們與追趕的國民黨軍隊和沿途的軍閥武裝份子拼搏，在血腥戰鬥中犧牲。在那些失蹤並永遠找不到的人中，有毛的兩個孩子，他們與其他許多孩子一樣，因為年齡太小，無法參加6000英里長征而被留在有同情心的農民家中。留在江西抵抗國民黨進攻、掩護紅軍主力北上的人中，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他在1935年初的一次戰鬥中陣亡。

如果不談個人政治觀點，那麼，無論以何種人類壯舉的標準來衡量，人們都會同意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 把長征比喻為「現代無與倫比的奧德賽」(an "Odyssey"* unequalled in modern times) 的說法。[1]但是，不應用英雄主義和偉大的人類詩史來模糊這樣一個事實：長征始於政治與軍事的失敗，其結局幾乎是災難性的。共產黨人在成功地擊退了蔣介石的前四次「圍剿」後，無論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無力再對付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為第五次圍剿設計的「圍堵」戰術。

放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聽任支持過自己的農民慘遭國民黨軍隊的報復，這是一場重大的政治失敗。在次年的殘酷環境裏，紅軍的大部分力量被摧毀這一事實，也很難被當成一場勝利。長征後到達陝北那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所能慶祝的充其量是他們還活著這一簡單的事實。

然而，長征揭開了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勝利時期的序幕。從這個意義上說，長征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和心理意義。從政治上看，正是在長征中，毛澤東獲得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有效控制。在江西蘇區時，毛

---

* 一首史詩。詩人荷馬 (Homer) 描寫奧德修斯 (Odysseus) 自賽津戰役 (Trojan War) 後經過十年時間，歷盡滄桑，回到故鄉倚色佳 (Ithaca)。

曾被共產國際支持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剝奪了領導權力，被迫離開了領導核心。「28個半布爾什維克」是一個由在莫斯科孫中山大學受訓的一些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組成的小團體，負責在中國執行斯大林的指令。直到在1935年1月的長征途中，這個小團體的權力才被剝奪，毛澤東成為黨中央政治局主席。在後來的歲月裏，毛的領導地位也曾受到過挑戰，但是，他現在已經能夠有效地控制黨（和軍隊），實施自己的革命戰略。中國共產黨終於甩掉了共產國際的夢魘。不管斯大林的臉色如何，毛確立了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在斯大林時代的共產黨歷史上，這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這樣，長征使毛登上了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位置，使他領導的革命者抵達了一個地理上相對安全的地方。在這裏，他們發表對日作戰宣言，為愛國和革命的雙重目標而激發中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感情。

長征的心理意義是無形的。至少就毛而言，長征經驗強化了他的唯意志信念，即人只要具備相應的意志、精神和革命覺悟，就能克服所有的物質困難，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改造社會現實。對那些經受了長征考驗的幸存者和受長征精神鼓舞的人來說，長征經驗——無論這種經驗在當時多麼痛苦——使他們恢復了對革命的希望，增強了他們的使命感。人們必須先有希望而後才有行動；不但必須具備理想和使命感，還必須具備希望和信心，堅信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實現自己的理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沒有任何事件能像長征和長征的傳奇故事那樣，能夠給人帶來根本的希望和信心，即使身處絕境，意志堅定的人也能戰勝命運。正是毛澤東將這種對未來的信念灌輸進人們的心靈，激勵起人們的鬥志。這種信念不僅存在於那些能夠根據共產主義理想創造未來的人們心中，而且貫穿於最終實現這些理想所必須的價值觀念之中。那些已為人熟知的毛主義情操，如不斷鬥爭、勇於獻身、自我批評、勤勞勇敢和大公無私等，不僅是毛自己信奉的價值觀，也是所有參加過長征的老戰士們信奉和實行的價值觀，對他們來說，這些價值觀是他們得以幸存，也是他們為之獻身的革命事業得以幸存的根本原因。這些禁慾主義的價值觀，成為後來大力提倡的「延安精神」的核心。

長征中死去的人數遠比幸存者多，這一事實本身就是長征對「延

安精神」的特殊貢獻。這麼多人都死了而我卻還活著，幸存者的這種意識使他們肩負的革命使命具有神聖的性質，產生了宗教式的獻身感。後來，毛也對自己還活著感到驚奇，他評論說，「看來死神對我不感興趣。」[2] 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其後成為一種象徵，長征對那些死裏逃生的人來說，都是最終和最高的考驗。毫無疑問，長征經驗對毛形成這樣一個信念起了巨大的作用，即他的命運就是帶領追隨者完成他們的革命使命。其他人即使沒有毛的這種特殊使命感，也都有著類似的經驗，對人員的巨大傷亡感到痛心，銘記活著的人應盡的義務；這種心理遺產對延安共產主義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把革命鬥爭進行到底的特殊使命感，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只有這樣，才能使無數犧牲烈士的鮮血不至於白流，隨時為革命而獻身的準備不至於無謂。

所以，僅僅還是活著這樣一個事實，就成為一件具重大心理影響的事情。它同時還產生了重大的政治作用。它不僅證明了革命使命的合理性，還證明了領袖政策的正確與領袖智慧的高超。事實上，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 這樣說似乎並無不當 —— 起源於長征。毛是把紅軍幸存者帶出荒原的先知。雖然陝西不是理想之地，但後來革命的不斷勝利，實現了毛的預言，證明他制定的路線是正確的。儘管在延安時代還沒有出現1949年後那種對毛及其「思想」的極端崇拜形式，但在毛的名字和他本人周圍，已經有了一種神秘和令人敬畏的氣氛。早在 1937年，斯諾就報道說，毛已經獲得了「頗具魅力」的聲望。[3]

中國人在後來稱頌長征時，把長征說成是一場偉大的勝利，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必然成功。然而，在當時看來，勝利似乎並非如此必然。紅一方面軍所歡呼雀躍的，是他們的生存，僅此而已。1936年，毛在分析形勢時，比後來的筆桿子們要坦率得多：

> 喪失了除了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30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30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到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4]

誠然，毛把失敗歸咎於剛剛失勢的黨內對手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錯

誤，充分地表達了他對最終勝利和他為奪取勝利制定的新戰略的信心，但是，他對長征結束時黨的情況的評價是悲哀和準確的。

1935年底，劉志丹率領自1931年就一直在陝北進行遊擊戰的數千紅軍戰士與毛會合。劉志丹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原是國民黨軍官，他的英雄業績使他在陝西享有羅賓漢式的聲望。此外，1935年9月，在毛率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前的幾星期，還有數千名紅軍放棄了湖南的小塊根據地，來到陝北。1936年，又有兩支紅軍殘餘部隊到達陝北，一支是原在湖南活動的由賀龍領導的第二方面軍，另一支是由張國燾、朱德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張曾率部隊脫離規定路線，最後取道新疆到達陝北。儘管如此，到1936年下半年，陝北紅軍總數也不超過3萬人。比起圍追堵截的蔣介石軍隊來，這實在是一股小得可憐的力量。

延安時期與農民革命

1936年，共產黨的軍事形勢不容樂觀，他們所處的經濟環境也十分困難。陝北是中國最貧窮落後的地方之一。多少個世紀以來，水土流失使陝北的土地貧瘠荒蕪，只能供養很少和極端貧窮的人口。毛澤東曾對一個外國參觀者說，陝北「是中國一個非常貧困、落後、不發達和多山的地區。」[5] 1936年，周恩來認為，陝北是復興中國革命最不利的地方，「陝北的農民太窮了。」他當時抱怨說：「這裏土地貧瘠……江西蘇維埃的人口有300萬，這裏最多不過60萬人……在江西和福建，人們都是帶著包袱參加紅軍的，這裏的人參加紅軍連雙筷子都不帶；再也沒有比他們更窮的了。」[6]

至於延安本身，特別是毛和其他領導人曾居住和工作的窯洞，如今已成為供人們參觀瞻仰的革命聖地。延安雖然是一座建於約三千年前的古城，但在歷史上一直默默無聞。在中華文明逐步南移的數世紀裏，延安逐漸變成一座偏僻的邊城，主要是抵禦來自中亞游牧民族入侵的一個軍事前哨。1936年底，共產黨軍隊佔領延安並把它作為陝甘寧邊區首府時，延安只是一個約有一萬人的貧困市鎮。延安的蕭瑟反映了整個陝甘寧邊區的貧窮落後。延安現在的博物館和聖地展示的，

不是歷史的名勝，而是現代革命歷史的實物——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歷史偶然性的結果。一位同情中國革命的美國作家曾禮貌地讚揚延安的艱苦環境，毛則簡短地回答說：「我們別無選擇。」[7]

但是，中國人讚頌的是延安時期而不是延安這個地方。然而，人們怎麼會在頌揚那個時期的同時又不喜歡那個地方呢？一支衣衫襤褸、與世隔絕、缺乏物質條件的革命隊伍，又是如何在短短十年間成長為擁有百萬之眾的強大軍隊、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並在此基礎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對那些熱衷於考察歷史偶然性作用的人來說，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無疑是一件最有吸引力的事件。可以很容易地假設，如果沒有1937年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就不會出現共產黨贏得勝利的根本條件。延安就還是地處遙遠西北省份的一個貧窮市鎮。今天，北京也不會有人頌揚「延安精神」，也就不會有外國的中國觀察家去思考「延安現象」了。

日本的侵略破壞了國民黨政權的基礎。國民黨人被趕出了大城市，失去了其獲得財政和政治支持的主要來源。對國民黨來說，戰爭的破壞導致了經濟上的巨大混亂和官僚腐化，最終導致全面的腐敗墮落。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在農村的政權管理機構基本上都被摧毀，作為國民黨在農村統治基礎的豪紳地主，或逃離農村，或在軍事和政治上處於無助狀態。與此同時，富有農村工作經驗、擅長遊擊戰爭的共產黨人則打開了進入廣大農村地區的通道。日本侵略者雖然能夠佔領城市，但卻沒有足夠的人力對農村進行有效的控制，共產黨遊擊隊的根據地得以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農村迅速發展。隨著國民黨軍事力量向西部節節敗退，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多數地區土崩瓦解，使共產黨人能夠走出在陝西偏遠的藏身地，將其軍事影響和政治影響擴大到華北和華中廣大的農村地區。日益強大的延安根據地雖然還是革命的政治與思想中心，但共產黨幹部的足跡已遍及中國農村的許多地區，他們贏得了數以千萬計農民的政治支持，在敵後戰線組織了許多遊擊戰爭。事實證明，共產黨於抗戰時期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建立起來並逐漸增強的政治與軍事中心，對共產黨贏得1946年再次全面爆發的國共內戰，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抗戰時期，共產黨人所以能夠贏得群眾的廣泛支持，主要基於

他們提出的全民抗戰的愛國主張。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為政治合法性的象徵，現代中國民族主義以新的形式取代了舊的「天命」。國民黨領袖先因對日本侵略採取不抵抗政策，繼而因無力抵抗而失去民族信任，共產黨則贏得了民眾的信任。抗戰時期的延安，不僅是革命中心，而且(在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中華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徵。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從城市來到延安，獻身於共產主義(同時也是民族主義)事業。在延安，他們中許多人先進入西北抗日軍政大學接受訓練，進行思想「改造」，成為迅速發展的共產黨根據地的政治、管理和軍事幹部。

日本的侵略不僅加劇了農村的經濟危機，而且激發了農民強烈的反帝情緒，共產黨人則成功地將農民的反抗情緒轉變成現代的群眾民族主義運動，利用它服務於革命的政治目標。在日本侵略者無法控制和佔領的華北和華中的廣大農村地區，日軍實行了慘無人道、兇殘野蠻的三光政策，更是給共產黨創造了這種新的政治機會。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綱領的基礎上動員農民，共產黨這一方針對延安時期在軍事和政治上取得成功具有重大的意義。

有這樣一種傾向，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解釋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形式，或把這場革命視為新的社會精英借助於群眾民族主義運動的偶然浪潮而獲得權力的一個事例。有鑑於此，把整個「農民民族主義」現象放在一定的歷史環境下來看待就格外重要了。中國農民把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認同感，與農民對外來侵略的反抗，並非始於1937年，兩者都是中國歷史久遠的特徵。即使是農民武裝反抗近代帝國主義的入侵也已有很長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839–1842年鴉片戰爭。因此，無論是高估農民對現代民族意識的的自發性，還是低估共產黨在給農民灌輸這種現代民族意識中的作用，都同樣會導致極大的誤解。早在1937年很久以前，共產黨人就是熱切的中國民族主義者，在把農民反對日本侵略者的基本反帝情緒改造成現代民族意識的過程中，共產黨起了主要的作用。共產黨人通過加強全國各地農民之間的聯繫，創造了全國範圍的抵抗運動，使這場運動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民族使命感。共產黨不僅僅只是代表民族主義，它在很大程度上還把民族主義灌輸給農民。

此外，無論是共產黨提出的民族主義主張還是群眾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都沒有減輕農民的社會經濟苦難，也沒有削弱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的承諾對農民的吸引力。準確地說，在共產黨人發動農民並贏得農民支持而獲得巨大成功的大多數地區，情況正好相反。戰爭進一步加重了農民本已可怕的經濟負擔，反而增強了共產黨土地改革綱領的吸引力。誠然，延安時期官方的土地政策相對於江西時期的標準是比較溫和的。這時的土地改革綱領不再重提剝奪和瓜分地主財產，而採用了減租減息的方式，這樣做部分是為了遵守戰時與國民黨結成脆弱聯盟的條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不僅力圖獲得貧農和中農的支持，而且要爭取地主和富農的支持。然而，不得超過收成三分之一的地租、廢除地主和官僚賴以剝削農民的許多傳統的非法方式，對於長期處於最殘酷的社會、政治、經濟壓迫的農民來說，不啻為福音。

再者，並非所有地區都嚴格遵守這種「溫和」的官方土地政策。在許多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地主與國民黨軍隊一同逃走的地區，渴望土地的農民分去地主的財產。在豪紳地主沒有逃走的地區，他們與日本佔領軍合作的情況則十分普遍。作為交換，日本人為利用地主傳統上的「社會控制」功能在政治上為其服務，允許地主保留剝削農民的傳統經濟特權。在這種情況下，對農民來說，地主不但是經濟上的壓迫者，而且還是漢奸。新的民族仇恨更加劇了基於社會經濟的固有仇恨，共產黨關於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主張，恰恰迎合了農民的這兩種情緒。

在農村多數地區，剝奪地主財產是一項頗得人心的政策。凡剝奪了地主財產的地方，凡共產黨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衛農民的安全和他們剛得到的土地的地方，共產黨都贏得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當然，條件和政策因地而異。在一些地區，為了民族團結，就必須犧牲社會革命以獲得農村所有階級的支持；在另一些地區，激進的土地政策又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在其他一些地區，則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經濟主張均徒勞無效。但是，即使是在實行溫和土地政策的地方，傳統的農村社會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地豪紳精英的政治權力被剝奪，其社會權威和聲望受到嚴重損害，他們僅存的一點經濟權力，也依賴於新的政治-軍事權力執掌者、即中國共

產黨的軍事和政治幹部的恩賜。在延安時代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在長達兩千年中一直居於統治階級地位的豪紳地主階級的權力受到破壞甚至被剝奪，標誌著自公元前221年封建帝國建立以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社會革命的開端。

日本侵略者迫使國民黨軍隊及其官僚機構從中國多數地區撤走，使共產黨人能夠以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這兩重目的去組織農民，客觀上為革命作出了貢獻。侵略本身並沒有創造革命形勢 —— 因為它已經存在，但侵略的確強化了革命形勢，為革命行動提供了新的時機。然而，無論「革命形勢」如何成熟，它自身也不會產生革命。只有革命者才能製造革命，也只有在革命者能夠正確地估量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各種可能性時，他們才能製造革命並採取相應的行動。要理解延安時代共產黨人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必須考慮到當時所有的主觀和客觀因素，特別是毛澤東在思想和理論上的各種傾向。

毛主義的起源

毛主義要到1940年代初才成為共產黨的正統教條，但它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獨特（純粹中國式的）解釋卻始於此前20年。把毛主義簡單地看成是延安時期「客觀」條件的理論反映，忽視了這樣一個公理：人既是歷史的創造物又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創造自己的歷史，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根據自己的設想來創造歷史。無論是延安的共產主義或是毛澤東，一概不能例外。正是毛在當時已經成名的「思想」，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延安的共產主義。1935年，毛到達陝北時，腦子決不是一片空白。

1920年，毛成為共產主義信徒時，那些決定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及革命概念的思想傾向業已存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革命經驗進一步鞏固了這些傾向。毛早期的思想信念是深刻的唯意志論，即歷史（以及發動革命）的決定因素是人的意識，即人的觀念、意志和行動。這一點至關重要。當毛在其革命實踐的進程中開始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時，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原則並未使毛放棄這種信念，忠誠的革命者有能力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觀念改造社會現實。

誠然，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性理論，使毛對社會主義未來的歷史必然性有了某種程度的確信，但最終的分析表明，毛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並非基於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關於歷史發展的客觀力量這種信念之上。對毛來說，決定歷史進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覺的人的活動，革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如何思考以及他們決定參加革命活動的決心。這意味著，中國革命無須依賴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既定水平，革命活動也無須受制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教條。它還暗示著要特別注意形成「正確的思想意識」，這是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在毛看來，正確的思想是進行有效革命活動的根本前提。正是這種信念，使毛主義十分強調在延安時期形成和發展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設」。

強調思想上的統一對延安時期成功地進行遊擊戰爭至關重要。在遊擊戰爭的環境中，難以實行集中的組織控制，培養人們對共同信念和共同的思維方式(進而是共同的行動方式)的強烈責任感，具有異乎尋常的重要性。共產黨人為什麼採取「人民戰爭」戰略和遊擊戰策略，為什麼他們能夠成功地運用這些戰略和策略原則，都與毛和毛主義者著力強調「主觀因素」密切相關。

如果說毛的唯意志主義沖淡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決定論含義，那麼，在他根據中國革命的需要來採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中，他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也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從其馬克思理論生涯之初，毛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衝動便使他確信，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進程的中心。早在1930年，毛就預言：「中國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8] 這種自信反映出他確信，中華民族在建立未來世界革命秩序中有著十分獨特的作用。毫無疑問，國際主義的抱負和目標在這裏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衝動密切交織在一起。但是，正是在這個托洛斯基曾稱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義」的危險領域裏，毛與那些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更多地受到馬克思主義正統教條束縛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分道揚鑣。

毛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的民族主義成份，不僅反映在他對共產國際長期的敵視態度，還反映在他對中國革命進程的理解，這一點更為重要。其中心思想是，真正的敵人與其說是來自中國社會內部，不如說是來自中國社會外部。真正的敵人是外國帝國主義，面對帝國主義的持續威脅，中國將作為一個潛在的無產階級國家而自立於充滿敵

意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中。為了對抗外部敵人，中國社會各階級都能夠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高舉的民族主義旗幟之下。那些不能夠或不願意聚集在這面旗幟之下的人，應該被作為帝國主義的代表從中華民族，或至少從「人民」的行列中驅逐出去。因此，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階級鬥爭可以從屬於民族鬥爭，實際上，這兩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並不矛盾的。所有的中國人都潛在地是革命者，這種看法使毛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革命潛力予以熱情的評價，使他可以利用民族主義感情服務於共產主義目標。

在毛開始其革命生涯的1919年，他就倡導過「民眾的大聯合」的思想。[9] 這種民粹主義思想也影響了毛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它強化了毛關於中國人民在面臨外部敵人時要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信念，導致他認為「人民」本能地具有革命的社會主義意識。「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是源自早期民粹主義信念的一項毛主義口號。1919年，毛就斷言：「中國人民有著巨大的內在力量。」[10]

毛的民粹主義思想、本質上的農民傾向和他對「生活與勞動之和諧」的農民理想的浪漫稱頌，使他把「人民」這一概念限定於農民群眾(因為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畢竟是農民)，並高度評價農民具有自發的革命熱情。這樣，當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還是以城市為中心時，毛的民粹主義就驅使他把注意力放到農村。1927年2月，毛在其著名的(異端之說)〈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他發現中國農民身上蘊藏著巨大的革命力量，他預言說，這股力量能夠橫掃它面前的一切障礙，包括那些不願意與農民打成一片的革命知識分子。後來，毛還表達了他對城市知識分子的「知識」的不信任和對農民固有「智慧」的欽佩。

毛主義精神的許多特徵都是典型的民粹主義的：對職業專門化的蔑視、對知識分子和專家的極度不信任、對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反城市的偏見、革命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的浪漫氣質等。毛並不簡單地是馬克思主義外觀下的民粹主義者(正如他並不簡單地是共產主義外衣下的中國民族主義者一樣)，但是民粹主義思想和衝動深深地影響了他吸收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式。

毛的民粹主義對農民的信念，支配著毛主義備受讚揚的「群眾路線」，以及黨的幹部在與農民群眾打成一片時所遵循的各種原則和規

定。知識分子要當群眾的先生，必須先當群眾的學生，這項毛主義的準則在延安時期是一種普遍的實踐。假若情況不是這樣，共產黨人就不可能得到群眾的普遍支持，也就無法實行「人民戰爭」的戰略。

毛關於農民具有潛在的社會主義意識的觀點，不僅與馬克思不同，也與列寧不同。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意識的載體只能是城市無產階級。在列寧看來，社會主義意識是由組織成具有高度紀律的共產黨的革命知識分子灌輸給「自發的」無產階級群眾運動的，農民在革命進程中只起輔助作用。毛之不同於列寧主義，不僅表現在他對城市工人階級全無興趣，而且反映在他就黨的性質和作用的觀點。列寧認為，黨是神聖的，因為它是「無產階級意識」的具體體現，不存在誰是先生誰是學生的問題。而在毛看來，這恰恰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他不願按照列寧主義的方式，反而充分地定義有組織的黨的意識與群眾的自發革命意識之間的關係。他關於黨是革命意識的載體的信念是不完全的，因為這裏涉及他對農民所持的民粹主義信念，他相信，真正的革命知識和創造性最終源於人民自已。雖然毛在組織和戰略問題上堪稱大師，但他設計的組織方式或他實行的革命戰略與嚴格的列寧主義原則大相徑庭。毛可能絕對相信他自己的革命智慧，但他對黨的革命智慧的信任卻遠不如列寧主義那樣絕對。

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幾乎不可能充分把握戰爭時期提供的革命時機，更不消說利用這種時機發動一場純粹以農民為基礎的共產主義運動。而恰恰是毛的非正統思想，才使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捕捉到這些機會。正是毛關於人的意志和意識的力量能夠創造歷史現實的這種唯意志信念，才使他對那些本來可能抑制革命活動可能性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前提與社會階級的考慮置之不顧。正是毛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思想，才使他著眼於最大限度地獲得群眾的支持，使他從城市走向了農村。也正是毛對農民群眾自發的革命力量的民粹主義信念，才使他採取和實行了非正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

延安的馬克思主義

延安時期是毛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戰略家最多產的時

期。後來被奉為「毛澤東思想」的大量著作，都是寫作於這個時期。雖然毛延安時期的著作與其説是澄清，不如説是更模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主義版本的本質，但這些著作卻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這些著作奠定了毛作為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事實上獲得政治的獨立，現在可以宣稱他們在思想上亦已獨立，他們有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即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其次，毛關於辯證法的論述為中國共產黨在理論和實踐中一些獨有的特徵提供了基本的哲學基礎。最後，延安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毛與其他人所撰寫的），旨在重申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性，為許多新黨員灌輸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以論證了中國共產黨政治實踐的合理性。

然而，即使毛和黨的其他領袖實現了上述最後一個目標，這是令人滿意的，但尚未解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最關鍵的理論問題。毛的著述中沒有涉及這樣一個問題：一個幾乎完全與城市和城市無產階級隔絕、完全依靠農民支持的共產黨，如何實現旨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革命（雖然要經過一個不定期的「資產階級」革命階段）。這個問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解決的難題，而且更是一個直接關乎革命的目標和未來的重大實踐問題。農民雖然熱衷於社會經濟改革和土地再分配，但即使相信農民自然具有「社會主義積極性」的毛澤東，實際上也不相信農民作為一個階級願意（自發地或以其他方式）走向社會主義。農民最激進的要求，也不過是在個體農民所有制的基礎上，平均分配土地。誠然，這也是農民革命，但無論是按照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它都不過是一場排除了社會的社會主義組織的革命。不管是在毛主義或是在中國的社會現實中，都沒有什麼能説明這樣的農民會是社會主義未來的載體。

那麼，誰將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代表？在毛的理論文獻中，我們看到的不過是對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的重複——無產階級將領導社會主義革命；或是對列寧主義的重複——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無產階級思想」的具體體現。毛只是補充了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這產生於延安時期的統一戰線戰略，於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前正式宣佈。這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理論公式，政府代表四個階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但聯盟是在「無產階級統治」之下的聯盟，這就是說，最終的政治權力掌握在共產黨手中。

分析這類理論公式不會有什麼收穫。實際情況是，在重要的延安歲月裏，中國共產黨缺乏城市無產階級的積極支持，他們也沒有努力爭取這種支持。事實上，以農民作為革命根本力量，發動農民後，就會形成革命的農村包圍非革命的城市這個局面，並最終奪取城市，這種戰略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爭取城市無產階級支持的努力。

歷史中的「主觀因素」，特別是黨的領袖追求社會主義目標的自覺決心，是決定革命將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根本因素，這是毛主義不遺餘力強調的觀點。無論這種革命戰略是如何地非正統，毛主義者依然堅定地信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目標。雖然他們沒有把自己等同於實際上的無產階級，但他們追求的卻是馬克思賦予無產階級的政治、社會目標和歷史責任。這種「主觀因素」對決定中國革命的特點和方向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

這樣，在毛主義的理論中含蓄、實踐中明確表達的觀點是，社會主義的載體是那些具有「無產階級意識的人」，他們獨立於任何社會階級而存在，既不依賴於無產階級的實際存在，也不隸屬於農民階級。革命精英（黨及其領袖）在思想上堅定地把握著社會主義目標，領導群眾運動去實現這個目標。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無產階級意識」是作為整體的「人民」的固有意識，因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通過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和社會主義世界觀，（通過革命活動）實現精神和思想上的轉變。

當然，強調意識在創造歷史和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反映了毛由來已久的唯意志思想和民粹主義觀點，以及毛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獨特理解。誠然，毛一直密切地關注中國社會的客觀階級狀況，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他都是階級鬥爭熱心推動者。但是，他同樣也傾向於按照道德和思想的標準，而非按照客觀的社會階級標準來判斷人的「地位」。馬克思認為，一個潛在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存在是產生

革命的無產階級意識的前提；而在毛看來，具有「無產階級」思想的人的存在就足以證明一個革命階級的存在。

延安傳統

延安時期不僅對共產黨1949年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還給勝利者留下了革命鬥爭的英雄傳統，這就是後來被奉為神聖的「延安精神」。既然那些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人就是那些在勝利後建立的新社會的領導人，因此，毫不奇怪，他們在1949年後實行的政策深深地打造了他們在早期的英雄年代獲得的經驗的烙印。所有的共產黨人都把「延安精神」作為英雄的革命年代的象徵而頌揚。但對許多人來說，革命年代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紀念革命年代，但它已經不能適應當代的需要了。對於成為統治者的革命者來說，這種看法是十分自然的。但對其他人、特別是對毛和深受毛影響的人來說，延安經驗不能簡單地成為紀念的對象，它是一種能提供未來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傳統。

毛主義者高度珍視的延安傳統，部分是制度上的遺產，部分是神聖的革命價值觀念的遺產，二者難以截然分開。毛主義在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教育領域中許多獨特的作法，在延安歲月中就已有端倪。在政治領域，備受推崇的群眾路線政策，制約著自上而下的官僚控制；「精兵簡政」運動；根據地方的需要和條件下放權力、調整政治結構；要求黨的幹部、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定期與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的「下放」與「下鄉」運動……這些措施旨在縮小（還談不上根除）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鴻溝，它們也是毛時代的人民共和國歷史中反官僚主義運動的前奏。

此外，戰爭和封鎖造成的艱苦條件，使邊區和遊擊區在經濟上不得不自給自足，各種經濟活動的試驗和相應的經濟政策也應運而生。為了維持戰爭年代的農業生產，共產黨人吸取了農村傳統的互助方式，推行合作勞動的組織形式。在共產黨控制的農村地區，建立了一些新工廠，以滿足軍事需要，同時也給農民提供基本的非農產品——農民過去通過與城市的貿易獲得這些產品。在整個農村地區，由於沒

有資金來源，新的合作制工廠主要依靠勞動密集方式，採用簡單的土法技術，利用當地的資源和原材料。自給自足，自力更生，發揮地方創造性——成為延安時期的口號和經濟政策原則，從運用這些原則的經驗中，產生了在農村環境中把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結合在一起的理想。同時，教育與勞動相結合，形成了延安時期的教育政策。其重點是通過半工半讀學校、夜校和各式各樣邊勞動邊學習的計劃，實行普及教育。這些教育政策不僅是促使人們看書識字和提高政治覺悟，還提供了切合當地特殊需要的實用技術知識。

延安時期形成的這些政治、經濟和教育方針和實踐，對毛主義解決革命勝利後面臨問題的方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隱藏在這些方針和實踐背後的價值觀體系，也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事實上，「延安精神」主要涉及精神和道德問題，更具體地說，是涉及對繼續革命的進程至關重要的那些社會與價值觀念及生活態度。毛主義在延安時代形成並成為英雄的革命年代特徵的那些觀念，從根本上說是禁慾主義和平均主義的；這些觀念包括為人民利益無私鬥爭、自我犧牲、勤奮努力、自我批評、勤儉節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及自我約束等。在延安的十年裏，中國共產黨人在事實上實踐著這些觀念，艱苦嚴峻的革命環境以及這種環境所要求的斯巴達式的苦行主義和平均主義的生活方式，使他們別無選擇。在毛看來，這些觀念不僅是過去勝利的泉源，也是未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中國革命的進程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觀念、體系和價值觀念相去甚遠，但正是從這一進程中，（在許多方面）派生出對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目標獨特的、富建設性的做法。無論是馬克思還是列寧，都肯定不會想到，在一場導向社會主義的革命中，農村的革命力量會包圍和戰勝不革命的城市，城市工人階級只是被動地等待由農民組成革命軍隊來解放自己。而在延安時代，在實行最不正統的革命戰略的過程中，卻產生了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預言的烏托邦社會目標奇妙地和諧一致的社會理想和實踐。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延安實踐，顯然是實現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馬克思主義步驟。[11]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這些步驟是實現消滅城鄉差距、工農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這

個更高的共產主義目標之首要而根本的步驟。後來，毛主義也正是如此評價和頌揚延安傳統的。延安時期要求幹部和知識分子定期參加生產勞動，對中國傳統上特別突出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鴻溝，至少是象徵性的一擊。毛主義關於延安遊擊隊領導人應是思想純潔的，能夠從事各種經濟、政治和軍事工作的理想要求，與馬克思主義關於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全面發展」的人的觀念不謀而合。正是通過革命鬥爭實踐，在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裏形成了(至少是以萌芽形式)新社會的社會主義形式和價值觀，這是二十世紀中其他任何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無法比擬的。

然而，延安傳統不是通向解放的唯一價值觀念。延安時期還是這樣一個時代：毛和毛主義者制定了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嚴格教義和正統理論，對那些背離正統的人進行迫害，對政治和思想上的不同政見者進行無情鎮壓。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上的「解放」，另一方面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壓制，這種矛盾現象既是1949年前、也是1949年後的毛主義的特徵。

* * *

延安十年的經驗，強化了毛主義的各個觀念，例如精神力量高於物質力量、人的因素重於機器因素的信仰、真正有創造性的革命力量是在農村而不是城市、思想和道德上的團結比任何官僚組織人為地強加的團結更為重要等。更重要的是，正正有賴千百萬農民的積極支持，規模宏大的人民社會革命才得以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共兩黨脆弱的停戰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內戰，國民黨軍隊比共產黨正規的軍隊力量除了在人數上擁有四比一的優勢外，還擁有主要由美國提供的現代軍事技術和裝備。然而，無論犧牲和困難有多大，共產黨最終以驚人的速度贏得了1946–1949年內戰的各大戰役。正如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 Schram)生動描寫的那樣，這是「歷史上弱小但具有獻身精神的、組織良好、得到群眾支持的軍隊，戰勝強大但不得人心、士氣低落、領導無方的軍隊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12]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正式宣告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而此時的蔣介石及其軍隊和政府的殘部，已逃到了台灣島，對懷有敵意的島上人民實施統治，並向美國的第七艦隊尋求庇護。

共產黨人正確地把自己的勝利歸功於延安時期的思維和實踐。這些思維將不會被遺忘。在革命勝利後的歲月裏，它們將不時被一再提出，成為新革命紀元的開始。

註釋

1. 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頁177。
2. 斯諾，〈與毛澤東會晤〉("Interview with Mao")，《新共和國》(*New Republic*, February 27, 1965)，頁17–23。
3. 斯諾，前揭書，頁67。
4. 毛澤東，〈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71。
5. 引自米達爾(Jan Myrdal)，《來自中國農村的報導》(*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65)，頁xxvii。
6. 引自斯諾，《紅色中國隨記，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頁60–61。
7. 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明天的中國》(*Tomorrow's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948)，頁18。
8.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96。
9. 這是毛澤東1919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
10. 前揭文，參見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9年)，頁41。
11.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提出，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而在革命後採取的步驟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I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73。
12. 施拉姆(Stuart R. Schram)，《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87年)，頁210。
13. 在這裏"gentry"譯「豪紳」，前此譯成「士紳」。因清末科舉已廢，故也。

第二部

新秩序
1949–1955

第五章

新國家

1949年，奪取政權後的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像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領袖那樣，懷有強烈熾熱的革命期望。對列寧來說，俄國革命是實現馬克思主義預言的世界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前奏。然而，面對內戰、外國入侵和革命在落後，俄國孤立無援，這些無情的現實，粉碎了烏托邦式的革命希望。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期望成立的、很快就會「消亡」的工人公社性質的「半國家」非但沒有建立起來，相反，純粹為了政治生存的需要，建立起日益集權和專制的國家機器；在經濟生存的壓力下，所謂在「工人自身的自由和自覺紀律」基礎上由工人管理工廠的承諾，被官僚機器自上而下強加的紀律，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手段的採用所替代；蘇維埃政權在俄國的生存這一國家利益，很快就使關於世界革命的夢想煙消雲散。隨著斯大林專制主義萌芽，消亡的不是國家，而是烏托邦的幻想。列寧只是在臨終前，才憂鬱地質疑他所領導的革命在道義和歷史上的合法性，並質疑革命夢想是否在他被迫的領導下粉碎一事。在去世前，他動情地坦言，他「在俄國工人面前感到內疚。」[1]

相比之下，1949年的中國勝利者是憂鬱的現實主義者。他們沒有像其俄國先驅那樣懷有雄偉的革命幻想，因此也沒有幻滅破碎後的挫折感。在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歲月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注意力不是放在對世界革命的憧憬上，而是國家面臨極待解決的政治與經濟問題。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裏，中國革命還是在一片孤立的國土上進行的，它獨立於國際革命的潮流而發展，在物質和思想上都與國際革命潮流無關。中國革命經驗中深刻的民族主義特點，與跟1917年完全不

同的國際環境，使「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僅僅是一個象徵性的理論口號。毛澤東與列寧和托洛斯基不同，他是一個傑出的民族革命領袖，而不是世界革命的代言人。此外，到1949年，一國——即使是一個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已不再是異端邪說。

1949年的中國在許多方面不同於1917年的俄國。1949年，毛不必再寫一部中國版本的論述像列寧烏托邦思想的《國家與革命》，一篇〈論人民民主專政〉就已足矣。毛在文章中重申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的目標，但將這些目標的實現推遲到遙遠的未來，與此同時，他強調，建立強大的國家政權和經濟體系是當務之急。中國與俄國不同的是，建立一個能統一國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集權國家（無論其正式的理論表述是什麼），非但不是對革命承諾的背叛，恰恰相反，正是順應了人民群眾的要求。新政權早期社會經濟政策也實行得比較順利。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與他們曾許諾過的及人們所期望的基本一致。在城市工業部門，基本上是由新的國營企業家與舊的資本家共同行使管理權，與30年前的俄國不同，中國工人並沒有因此而要求由生產者直接管理工廠。長期以來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中國無產階級沒有提出什麼主張，也不可能成為「工人反對派」的社會基礎。在農村，新國家證明有能力滿足長期受壓迫的農民的直接要求。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和他們新的共產黨領導人來說，1949年是充滿了樂觀和巨大希望的一年。但是，認識實際可能，使他們的希望趨於冷靜。當時的可能性就是徹底完成中國革命長期被延滯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國家政治上的統一、土地改革，以及曾許諾的長期艱苦的經濟發展。最初幾年，這些工作是在相對溫和的政策基礎上、在一個革命勝利後政治與社會空前穩定的環境下開展的。中國與俄國不同，政治上的勝利沒有驅使人們期望立即建立一個完美正義的社會制度。正如毛在共產黨勝利時所說的：「過去的工作只是像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2] 在中國，新長征要解決的是中國政治與經濟建設中的特殊問題；沒有人指望「世界革命」會及時到來以加快中國建設的進程。當時的口號是「三年建設十年恢復」，反映了這一時期相對冷靜的特徵。

穩定政治和發展經濟是當時的主旋律。沒有人會認為當時的毛澤東是一個烏托邦幻想主義者。因為當時的毛以及其他黨的領導人都承認一個基本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是實現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根本前提。在新秩序得到鞏固並似乎已制度化以後，革命烏托邦才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　*　*

在短時間內鞏固革命的勝利，並為向社會主義的最後過渡創造條件，就此而言，中國在許多方面具有比俄國更有利的條件。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共產黨被迫在物質和精神上進行一場令其精疲力竭的內戰，而在中國，內戰發生在革命年代，並且已經取得勝利。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國家政權時，只遇到了反革命的零散抵抗。此外，數十年的革命鬥爭，使中國共產黨人創造和發展了自己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機構，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培養了大批有經驗的管理者。因此，他們比當時的俄國共產黨更少地依靠舊政權留下的官僚機構。也許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群眾基礎要比俄國共產黨更廣泛得多，特別是他們贏得了佔中國八成人口的農民的支持。與列寧遇到的情況不同，在中國廣大農村裏，毛澤東獲得了農民的支持。儘管共產黨人在城市沒有什麼組織基礎，但至少他們的民族主義主張和為長期忍受苛政壓迫的人民帶來秩序的許諾，贏得了主張民主的知識分子和城市一般市民的同情與合作。在俄國革命中無足輕重的民族主義因素，卻是有利於中國新領導人的一種重要力量。中國共產黨崛起於抗日戰爭，成為全民抵抗日本入侵的領導力量；在戰後的最初年代，他們同樣有能力喚起人們的愛國熱情，這進一步擴大了共產黨的群眾基礎。

此外，與早期蘇聯不同，人民共和國既沒有完全與世隔絕，也沒有面臨像蘇聯那樣的外部反革命勢力入侵的威脅。不管北京與莫斯科的關係多麼曖昧，僅僅是這樣一個強大的共產黨鄰國的存在，就為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的新中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證。何況，新中國還有蘇聯提供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雖然這些援助較之預期的要少得多，但其意義卻不可低估。

但是，中國在社會和經濟上的極端落後，卻使這些相對有利的因素黯然失色。落後是一個世紀來革新與革命的失敗的歷史遺產。1949年，中國共產黨繼承的是一個慘被戰爭摧毀的經濟，它遠不及十月革命時的俄國經濟水平。這種極端落後貧窮的條件正構成中國歷史環境中最關鍵的因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對決定1949年後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至關重要。

* * *

在正式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幾個月，毛澤東再次提出了新政權所據之以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各項原則，為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提供了理論根據。毛首先指出，由於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的長期壓迫，所謂的「資產階級民主」在中國已經破產，毛宣稱，新國家將不會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人民共和國」，更準確地說，新的人民共和國將是「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此外，新政治制度將建立在更廣泛的社會基礎上，工人和農民只是「統一戰線」的一部分，統一戰線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根據這個公式，允許發展本土的中國資本主義(與外部帝國主義勢力沒有聯繫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資產階級)以加快現代經濟發展。毛宣佈，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我們現在的方針是節制資本主義，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毛反復強調，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定地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因為它的最終目標是使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毛沒有明確提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具體時間和方式，但其含義是說，只有經過一個漫長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才能從一個農業國轉變成一個工業國家。[3]

在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歲月，毛主義的這些主張與中國的社會政治實踐是什麼關係？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毛用來說明新國家特徵的「民主專政」這一概念明顯是自相矛盾的。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一個民主國家還是一個專政國家？就毛願意涉及這一問題而言，他的回答是兩者兼而有之，一方面，對人民實行民主，另一方面，對那些不屬於人民的人

實行專政。新國家的專政職能規定的十分明確：政府將「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凶們實行專政」。剝奪這些集團和階級的民主權利 —— 所有國家暴力機構的職能就是確保鎮壓完成。[4]

如果企圖理解「民主」在毛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含義，那就會進入一個更加撲朔迷離的境地。毛寫道，民主是區別於反動派「人民」享有的權利。毛自己恰恰提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人民是什麼？」還可以補充一個問題：「誰來決定誰是人民，又是根據什麼標準來確定誰是人民？」這些時而明確時而模糊的問題，在人民共和國的整個歷史過程中不斷出現，在不同的時期答案也迥然不同。

1949年，毛的回答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人民」是由要進入政治統一戰線四個社會階級的成員組成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當時的毛主義理論中，「民主」這個詞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通常理解的資產階級民主；根據毛的說法，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他們有權利投票，「選舉自己的政府」，而政府又反過來對不屬於人民行列的反動派實行專政。[5]至於這些基本的民主權利是否兌現，則是一個有待驗證的問題 —— 根據新國家的政治實踐進行驗證。

第二，民主是指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更準確地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表述，就是指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任務的完成。在城市中鼓勵資本主義經濟企業的發展，在農村中把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這些都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而是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對一個歷史時期的描述。在這個歷史時期裏，組成人民的四個階級在現代經濟發展的漫長歷程中進行合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奠定物質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社會既是一個後封建社會，又是一個「前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便是「民主的」。

第三，民主意味著四個被定義為「人民」的階級的政治代表。這裏，我們遇到了毛主義理論和實踐中最晦澀的方面：政治權力與社會各階級之間關係的問題。在人民共和國創建之始正式參政的十多個非共產黨的「民主黨派」的作用，僅僅是象徵性的；毋庸諱言，其作用也

是從外部預先決定的。甚至那些最著名的準黨派，如據說是代表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盟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最多也只在名義上是政黨。沒有一個民主黨派擁有一定意義數量上的群眾追隨者，即使是在其正式組織機構裏，人員也很少。共產黨贏得了內戰的勝利，因此毫無疑問(也無人置疑)，新國家(無論其正式結構是什麼，也無論官方理論是如何描述)的實際政治權力將掌握在共產黨和紅軍手中。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沒有企圖掩飾這一基本政治事實。

共產黨的政治權力與革命勝利後的兩大社會階級——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兩者的關係也是模糊不清的。一方面，官方理論宣稱，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然而，黨與城市工人階級的關係早在1927年就切斷了，共產主義革命在農村蓬勃開展時，城市工人階級在政治上卻是消極的。實際上，即使到了1957年，當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十分龐大，城市中的黨組織亦已健全時，黨員中的工人比例也只有14%。另一方面，儘管正是農民保證了毛主義政黨的政治勝利，黨員中絕大多數成員也一直來自農民，但中國共產黨從未宣佈過自己是一個農民政黨。[6] 這是一個悖論，一個革命政黨卻宣稱自己是一個政治消極的階級的政黨，而不把自己看成——至少是含蓄地——構成自己實際社會基礎的革命階級的政治代表。

1949年9月21–30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建立了共和國的國家機構，但依然沒有澄清這個悖論。政協這個詞(姑且不論其機構)是共產黨在二戰後向國民黨建議成立聯合政府時提出的。國民黨垮台後，在任何意義上，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已沒有必要，也缺乏政治基礎。不過，一個不是純粹共產黨人組成的聯合政府，至少在表面看來對真正的國家政權在政治上是有利的。一大批非共產黨的政治和社會團體及其成員(當時被稱為「民主人士」)參加了政治協商會議。[7] 會議經過充分協商，正式批准了根據毛澤東在三個月前提出的新政府機構的建議，任命毛為國家主席。

許多非共產黨人在新國家的政府機構裏擔任要職，或至少獲得很高的頭銜。例如，在最初的24個部委中，11個部的部長是由非黨人士擔任的。共和國的六位副主席，有三位是黨外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是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新國家的這種人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是裝

飾性和禮儀性的，但也不是毫無意義。與眾多非共產黨的傑出人士的政治合作，反映了革命有著廣泛的民族感召力，也可見新政權廣泛的群眾支持基礎。此外，這種作法也有利於一些具體目標的實現：它有助於獲得非共產黨的中國人對國家建設事業的支持；使私營企業家和技術知識分子消除對允許資本主義企業暫時存在所產生的疑慮；為毛主義關於新國家是建立在由「人民」組成的四個階級聯盟基礎上的理論；為隱含在這一理論中的政府將實行相對穩健的政策提供佐證。

對新政府的管理結構作更多分析，委實沒有必要，它本身並無什麼獨特之處。政府管理部門一開始就由周恩來領導，最初稱為政務院，1954年，新憲法頒佈後，更名為國務院。在國務院之下，形成了延伸到省、縣和鄉的中央官僚體制。最早是毛澤東以共和國主席的身份任命周恩來為總理，其後，又由不同的權力機關繼續任命周為總理。在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動盪的前25年裏，正是周恩來的作用保證了文職國家機構的連續和穩定。

在建國後的前五年裏，文職政府籠罩在軍事管理機構的陰影下。革命的勝利和新政權的建立，都是出自強大而具有高度紀律性的紅軍。勝利之初，由軍隊負責在全國建立秩序和新的管理機構，保護國家防止外敵入侵。1949年，中國被劃分為六個軍區。直到1954年，整個國家實際上處於軍管之下。

正是中國共產黨把文職管理與軍事管理凝聚在一起，建成了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國家。1949年，獲得勝利的共產黨人面臨的政治任務，不是把舊的國家機器碎片重新拼裝起來，因為過去遺留下來的已不能適應現代國家統一的需要，而是建立一個全新的政治體制。共產黨人不得不在極端落後的經濟條件下完成這一使命：整個國家只擁有最原始的交通運輸系統；在這片國土上，強大的傳統地方勢力和地方觀念阻礙著現代民族意識的發展；經濟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為民族統一提供了極其脆弱的物質基礎。要在這樣的條件下（何況還是在其中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領土面積最大的國家）完成現代政治上的統一，確實是一項巨大而艱難的任務。而這一任務卻在1949–1952年短短的時間內有效完成，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因

於這一事實：中國的新統治者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高效率的組織工具。

產生於革命年代的共產黨，當時有著近五百萬黨員，具有高度紀律性和嚴密的組織系統。20年的武裝鬥爭使其組織和黨員的行為習慣都帶有軍人般鐵的紀律。黨的幹部不僅是富經驗的革命組織者，而且還是有經驗的政府管理者，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和明確的目標。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很長時期裏，共產黨就行使著準政府的職能，這為新國家提供了組織基礎、領導幹部和組織群眾的方法。無論毛澤東的個人聲望有多高，也不論周恩來的管理才能多麼出色，都取代不了黨的組織機構，及忠誠而有紀律的黨的幹部。

當然，黨組織與國家政府機構是有區別的，但這種區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黨的領導人在正式的國家機構中擔任主要負責人。這種現象在最高層的代表就是毛澤東，他既是黨的主席，也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從上而下的國家機構，直到最基層都是這種模式。黨的幹部或是正式在官僚機構中任職，或處於監督非黨幹部工作的位置。當然，由於採用蘇聯的「政委」制度，貫徹毛著名的「黨指揮槍」的原則，類似的情況在紅軍中早已存在。1949年，人民解放軍的將領和多數軍隊幹部在黨內都有很高的地位，嚴格的政治控制體系遍及軍隊各級。此外，在1949年前後成立的(或重新組織的)各種群眾組織和準政府的機構裏，都成立了黨的組織。在工會、農會、教育界、「人民法庭」和民兵組織中，或是共產黨員擔任領導，或是由平行的黨組織實施領導。在1949–1952年間，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遍及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雖然官方稱新政治制度是代表著四個社會階級的聯盟並以此為基礎，並相應地有各種各樣的「民主人士」作為點綴，但國家權力掌握在自稱是無產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手中。準確地說，政治權力掌握在黨的中央委員會手中(1949年時有44名中央委員)，具體說是在14人的中央政治局手中，更準確地說，國家權力的槓桿掌握在1949年的政治局五名常委手中，他們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層的內部政治史。

* * *

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勝利的中國共產黨人所承襲的混亂政治形勢，是革命的一個有利因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任何持久的革命勝利，都要求徹底摧毀舊政權的政治機構。馬克思在評論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名文章中寫道：「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建立真正的革命政權前，必須徹底廢除馬克思稱之為「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 官僚架構、軍隊和警察。[8] 這也是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反復強調的觀點：不能夠「接管」現成的國家官僚機構，而必須「砸碎」它。在逝世前不久，列寧將十月革命的失敗（或至少是其未能兌現諾言）部分地歸因於舊沙皇官僚體制的頑固。

在這個問題上，1949年的中國政治形勢預兆著未來革命的前景良好。中國共產黨人幾乎沒有必要去砸碎舊國家官僚機器，因為它基本不復存在。舊制度的官僚機構殘餘不構成前進的障礙，使共產黨人有著前所未有的機會去創造自己嶄新的政治機構。但是，這並沒有解決尚未解決的官僚主義問題。傳統的官僚思維和行為模式（即使不是這類官僚機構）的頑固存在，尤其是革命勝利後特殊的社會條件，以及中國共產黨本身的列寧主義組織結構，都是導致官僚主義迅速發展的動因。雖然中國共產黨沒有背上舊官僚機構的包袱，但他們很快就會背上本身產生的官僚機構的重荷。

領土統一：一項仍未完成的任務

1949年10月，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時，尚有大片國土還沒有在新政權控制之下。在蔣介石逃到台灣前的數月，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已經土崩瓦解，但中國南部、西部和西北的偏遠地區，仍為國民黨軍隊殘餘部隊，或在內戰時與國民黨聯手的地方軍閥佔據。因此，新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在軍事上控制這些地區。

人民解放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南方推進，只遇到了零星抵抗。當時這被稱為「腳的戰役」，與其說這是嚴肅的軍事鬥爭，不如說是國民黨軍隊逃跑的速度能否比解放軍進軍的速度更快的問題。

10月12日，國民黨軍隊放棄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最後一個都會廣州市，次日，解放軍進駐。隨後兩個月，南方各省均為解放軍佔領。11月中旬，貴州省落入解放軍之手。12月初，第四野戰軍佔領了廣西省，國民黨桂系一些軍隊逃到了海南島，1950年4月，解放軍攻佔了海南島。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主席於1949年12月向共產黨投誠，但產生了一個尷尬的國際副產品：殘餘的國民黨軍隊逃到了緬甸的撣族地區，在其後的20年裏，他們依靠非法的鴉片貿易和台灣空投的美國物資維持生計。

在中國西部和西北的軍事行動更困難，時間也拖得更長。1949年12月底，解放軍控制了四川全境，但國民黨在新疆的抵抗一直持續到1950年3月，這個日子標誌著國民黨在大陸有組織的軍事抵抗的終結。中國重新恢復對西藏的控制，與其說是個軍事問題(弱小的藏軍在1950年10月就被擊潰)，不如說是一個文化和政治問題。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裏，政治上不明確與文化上的敵意，是中國與西藏關係的主要特徵。十八世紀時，清王朝收併了西藏。隨著清王朝於十九世紀末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開始解體以及英軍通過印度的入侵，西藏開始脫離中國的控制。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後，西藏正式獨立。雖然英國對西藏模糊的宗主國關係，及與西藏與新獨立的印度接壤部分的利益關係，使西藏的政治問題更形複雜，但二十世紀所有的中國人，無論其是否共產黨人，都認為西藏是當代中華民族國家的一部分。雖然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出於民族主義和戰略地位的原因，決心恢復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但他們處理涉及的文化和政治問題十分慎重。經過與印度和西藏領導人的談判，達成了1951年的協議，協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賦予西藏高度的文化和社會政治自主權。同年秋，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但1959年的西藏暴亂表明，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最大的憂慮來自被國民黨佔據的台灣，這不僅意味著領土統一的任務尚未完成，還意味著內戰尚未結束。中共顯然準備於1950年夏天進攻台灣，但這一計劃因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於6月27日派遣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使其「中立化」而未能實施。美軍干預的藉口是朝鮮戰爭爆發。但這僅僅是個藉口而已，因為直到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發出發時的「進軍鴨綠江」命令，從而直

接威脅中國邊境之前，中國人並沒有捲入朝鮮戰爭，何況，為什麼台灣局勢與朝鮮戰爭相關，也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實際上，即使是在1953年朝鮮停戰協議簽字後，台灣海峽的所謂「中立化」依然如舊。美國軍事力量對台灣事實上的保護，使國民黨政權得以繼續存在，並在各種國際組織中代表中國政府。從朝鮮到東南亞，美國建立了環中國的軍事包圍圈，台灣便是其中的一環。

中國與蘇聯接壤的漫長的北方邊界，構成中國實現領土統一的又一障礙。除了老沙皇在十九世紀末從清王朝攫取的大片土地外(主要是東部沿海省份和西部的新疆地區)，由於二戰中日本戰敗，俄國人趁機恢復了在滿州的支配地位。他們佔領了旅順港、大連和中國東部鐵路，盡量把滿州的工業設施都拆走運回俄國。

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著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但民族主義要求的領土統一的任務尚未實現。美國的干涉阻礙了台灣與大陸的統一，俄國長期的擴張政策使中國無法收回北部失去的領土，這兩種局勢都潛伏著危機。

鎮壓與恐怖

新中國政權的力量最終建立在軍隊和警察等暴力機器的基礎之上，所有國家都是通過暴力機器來控制社會。如果不是人們喋喋不休，說通過思想教育和「道德感化」進行統治，本是毛的國家的獨具特徵，其實沒有必要重複這種老生常談。就宣傳這種當代流行神話而言，許多外國觀察家，特別是那些熱衷於在儒家的過去和共產黨的現實間尋找歷史共同點的外國觀察家，比中國共產黨人還起勁。在漢學研究中，承認儒家思想對傳統中國的合理性——即帝王和官吏通過「道德楷模」統治國家的神話，但據此便把毛澤東當成一個舊式君主，按照某種永久的「天命」以道德示範為基礎進行統治，以復興「天朝」，則未免只是一廂情願了*。

* 作者原文用“mandate”及“Middle Kingdom”。這裏駁斥不少西方漢學者比喻共產黨奪到政權，尤如中國歷史中的改朝換代，也就是說毛澤東承受了「天命」，以「天朝」心態自居，垂治萬邦。

至於毛澤東本人，從來沒有宣傳過這種廢話。他在1949年寫道：「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不是儒家學說去界定了新政權的本質，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什麼「仁愛」。[9]新中國的生存當然是依他說的暴力工具，最重要的是軍隊和警察力量。新中國的領導人充分利用了國家這些常規工具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誠然，毛澤東提倡使用「民主的即說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對人民施「仁政」，以區別於「對反動階級實行專政」。雖然反動階級的個別成員有可能通過教育「改造」洗心革面，但如毛所說，作為階級的地主和官僚資本家，將被「最後消滅」。[10]但在毛所說的「說服」——包括教育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思想改造」運動——背後始終矗立著「強迫」的常規機構，即所有國家最終都依靠的有組織的暴力機構，這些機構畢竟不是擺設而已。

除了解放軍外，新統治者還擁有在革命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強大的秘密警察組織。軍隊所有的單位都設有一個「公安部門」。因為直到1954年，中國在本質上處於軍事管制之下。這些機構在社會中行使著警察的職能，其成員監督著城鄉地方警察部門履行職責。此外，黨內還有一個由康生領導的秘密警察機構(黨內另有一個處理紀律問題的監察委員會)。由於黨組織已遍及正式的國家機構、群眾組織和大型工礦企業，顯然黨的警察機構也同樣強而有力地控制著普通民眾。1949年，隨著政府的成立，還設立了一個國家秘密警察組織，稱為「公安部隊」，隸屬於由羅瑞卿領導(1949–1958年)的中央政府公安部，這支部隊很快發展成滲透到國家機關最基層的內部安全機構。公安部隊除獨立行使警察職能外，還監督和控制著所有的地方警察機構。在城市中，每個居民委員會(平均由一百戶左右居民組成)都設有治安組，每個鄉級政府也都設有類似機構。

要詳細說明上述各種機構的政治作用是不可能的。秘密警察的活動(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畢竟是「秘密」。在當代中國，黨、軍隊和國家政權機構的功能重重交叉，各自擁有自己的警察組織，在對國內社會進行控制的層層機構中，他們的活動重合在一起，使情況更形複

雜。雖然中國的秘密警察不像蘇聯的那樣擁有巨大的政治權力，但它依然是令人生畏的政治控制武器，也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毛澤東形容為「一種鎮壓工具」。

從1949年到1953年，新國家的鎮壓功能的表現特別明顯。這幾年既取得巨大的社會與經濟成就，也常有嚴厲的政治鎮壓，是一個政治恐怖的時期。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總是伴隨著恐怖的統治，因為在舊政權下居於經濟和政治支配地位的階級和集團不願意放棄特權，而勝利的革命者又一定要捍衛自己的勝利成果。成功的革命總是會遭到反革命的反撲，而反革命活動又迫使新統治者動用自己擁有的一切暴力手段，以保衛新政權。

相對來說，中國的反革命活動不算猖獗。早在1949年以前，舊制度就已基本解體或遭摧毀。買辦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勢力相對弱小，在政治上又缺乏凝聚力。這些階級中許多有錢的或有機會外逃的成員，都逃到了香港、台灣，或到了更安全的美國。許多留在大陸的成員雖然敵視或害怕共產黨（各有充分的理由），但卻沒有能使他們集結起來的政治旗幟。受到共產黨蔑視、國民黨鎮壓的所謂民主的「第三種力量」，早已被證明不過是少數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的政治幻想的產物，其領導人多數流亡在外。國民黨軍事上的失敗和長期以來政治上的腐敗，使那些曾經支持、並尚且願意支持國民黨的人，也喪失了對國民黨的信心和希望。就連國民黨政權的財政支柱，一度極有勢力的宋、孔家族，也逃出了大陸，還拋棄了台灣的國民黨，攜帶著舊政權的大批財產隱退到紐約和新澤西；其他政黨和組織也早已退出歷史舞台。從1949年底到1950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幾乎沒有理由擔心反革命的反抗活動。

共產黨最關注的是統治大陸的內部問題。建立全國的行政管理機構，及恢復崩潰的經濟，都是非常棘手的工作，需要強制性的政治手段。但是，相對來說，國內有組織的政治反抗是微不足道的；在建國起初的幾個月裏，新中國的領導人的確不必為此擔心。

1950年6月下旬爆發的朝鮮戰爭是一個外部的、對中國來說完全是偶然的事件，但卻誘發了反革命的幽靈，威脅新共和國的生存，繼而啟引一個國內政治恐怖時期。我們這裏無意討論戰爭爆發的原因，

它至今還是一團迷霧，但我們注意到，中國起初決無意捲入這場戰爭。[11]當時，中國領導人正致力於從內部鞏固新國家，開始進行大規模的軍隊復員轉業工作，此時的主力部隊都部署在南部沿海一帶，準備進攻台灣，土地改革運動又剛剛開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當然不可能歡迎一場可能在邊界地區產生嚴重國際後果的戰爭。直到11月美軍節節推進，威脅到中國東北邊界時，中國軍隊才跨過鴨綠江，使麥克阿瑟將軍率領的美軍遭受美國軍事史上最大的失敗。

這場實際上是中美之間的戰爭，中國宣稱中國軍隊僅僅是幫助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志願軍」，美國則聲稱美國軍隊是應聯合國的「要求」而行動的，雙方的說法都不真實。在兩年半內，中美雙方的軍隊主要是沿「三八」線一帶進行血腥的磨擦戰。「三八」線既是戰爭爆發的地方，也是戰爭結束的地方。雖然中國從蘇聯獲得了大量軍事裝備（但比中國預期的要少，而且不能及時到位），但戰爭給剛剛開始從侵略和內戰的廢墟上恢復的脆弱經濟造成了沉重的負擔。中國軍隊的傷亡人數也是驚人的，犧牲者包括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

儘管戰爭給中國在物質和人員上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但在政治上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收穫。外國勢力又一次的侵略威脅，鞏固了群眾對政府的愛國支持。「抗美援朝」運動成功激發起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更重要的是戰爭初期中國軍隊的勝利。在一個多世紀裏，中國多次受到西方列強的凌辱，但是現在，中國軍隊第一次打敗了一支西方軍隊，然後，在一場大規模的常規戰爭中，又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打成了平手。這場戰爭也許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事件都更有力激發起中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即使許多反共的中國人也有同感。長期以來受到恥笑和嘲諷的中國士兵，在戰鬥中洗刷了自己，也使全世界記住了這一教訓。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戰勝了俄國，標誌著日本作為一個重要力量現身在世界舞台（並激發了整個亞洲的民族主義感情），中國的軍事勝利也震驚了西方的軍事界，莊嚴地宣佈了新中國是世界舞台上一個不可輕視的國家，它證實了毛澤東在1949年所自豪地宣稱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12]

然而，這是回顧歷史後的看法。當時，即1950年底到1951年，中國與美國的衝突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中國領導人當時顧不上為新中國最終在世界上「站起來」而自豪，他們更擔心的是新生共和國的生存問題，這種擔心不無根據。這場中美衝突不僅可能導致美國直接入侵中國，爆發一場全面戰爭(美國許多軍事和政治領導人都鼓吹這種做法)，它還誘發了國內的反革命幽靈。朝鮮戰爭爆發時，美國已建立了對台灣的軍事保護，不但延長了殘存的國民黨政權的壽命，還把中國國內的政治衝突與爆炸性的國際政治衝突捆在了一起。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非常現實的危險，正是致命的內戰與外敵入侵的結合，曾扼殺過多次革命。這兩股「復辟」勢力的合併曾扭曲了法國大革命，鎮壓了巴黎公社，幾乎摧毀了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外部與內部反革命力量的結合的漫長歷史，深深地銘刻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記憶之中。中國領導人在當時清楚地意識到這種現實的危險，也同樣肯定不會忘記這些前車之鑑。如果說內部的反革命力量相對弱小，那麼外部入侵的威脅卻是非常嚴重的。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年的短短時間裏，一場由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支持的新內戰的可能性迫在眉睫。

在美國有影響的「中國院外集團」的幫助與鼓勵下，台灣國民黨政權恢復了元氣，想把這種可能性變為反革命現實。國民黨的政治特務通過香港潛入大陸，國民黨軍隊則跨過「中立化」的台灣海峽，在大陸沿海地區進行突襲活動。在美國，催促杜魯門政府把朝鮮戰火直接引向中國和「放生」蔣介石的喧囂聲不絕於耳。

對革命存亡的外部威脅，使新國家最初採取的溫和政策和實踐變為愈演愈烈的鎮壓政策，並最終在1951年幾乎遍及全國的恐怖統治。1951年2月21日，毛批准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正式公開使用恐怖手段。不用說，懲治反革命分子並無什麼新奇之處，無論是在1949年前還是其後，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國民黨特務、支持者和同情者一直受到鎮壓。在朝鮮戰爭期間，對實際與潛在的政治敵對勢力的鎮壓也不斷升級。但二月條例卻有所不同，它不僅更廣泛地界定了什麼是反革命活動，擴大了政治鎮壓的範圍，而且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反對所有形式的不同政見者，從而在全社會製造了恐怖氣氛。在其後的幾個月，除了秘密警察的鎮壓活動日益加強外，各大城

市都舉行了一系列群眾大會，對那些被指控為反革命中堅分子的人公開宣判處以死刑，對次要的反革命分子，則由警察逮捕後移交國家司法機關進行審判。報紙每天都刊載長長的死囚名單，顯著地報道他們令人髮指的政治罪行及懲治方式。如果說這場運動的目的是製造公開的恐懼和恐怖氣氛，及清除國家潛在的反對者，那麼這場運動是十分成功的。

人民共和國從未公佈過這場恐怖運動的犧牲者的全部數字(假如有準確的記錄)，外部觀察家估計的數字，又因觀察家自身不同的政治傾向而極不相同。然而，這些不完全的官方報道也足以說明，死亡者的數量是巨大的；例如，單單廣東一省，當地官方報道說，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十個月中就有2.8萬人被判處死刑。[13] 周恩來在1957年的一次講話中提及，在1952年由政府正式審理的反革命案件中(未提及具體數字)，有16.8% 的人被判處死刑，42.3% 的人被判處「勞動改造」，32% 的人處於「監督」之下，8.9% 的人屬於「重新教育」的範圍。[14] 按照官方公佈數字，1951年上半年受理了80萬件反革命案，那麼僅在六個月時間裏就有13.5萬人被官方處死。毫無疑問，實際數字要大得多。考慮到持續的時間較長，再加上很多人未經正式司法程序就被處死，不少相對比較客觀的觀察家估計，在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三年裏，約有二百萬人被處死。在資料不充分的情況下，這大概是人們能夠估計到的比較接近實際的數字了。這個數字也包括了在1950–1952年土改運動中，以及在公審時，長期受壓迫的農民半自發地要求立即處死的人數。在這三年中，還有二百多萬人被關進監獄或遣送到勞改營。

無論實際死亡的人數是多少，如果按人口比例來說，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後繼之而來的恐怖統治下，處死的人可能更多，但這並不能減輕問題的嚴重性。同樣，也不能因為在1949年前的中國每年就有千百萬人死於飢餓和營養不良，或回憶起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期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下，被官方處死和被野蠻屠殺的人不計其數(這些都沒有統計數字，也沒有人進行過統計)，就認為在鎮壓中死亡的人數無足輕重。

這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對比，不是要為革命進行辯解，僅僅是為了

對事物保持一定程度的歷史感，使人們不至輕易地表示道義上的自豪或義憤。在大多數革命形勢下，人們並不能在恐怖與非恐怖之間自行選擇，而只能在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之間自行選擇。由於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裏，中國飽受反革命恐怖之苦，所以，現在也不要輕易對革命恐怖進行道義上的譴責。正如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指出的，「革命暴力是人們為與受壓迫的過去決裂、建設一個較少壓迫的未來的努力的一部分」，這是一種歷史現象。[15]但是，在革命的承諾與革命者的實際行動間的差距如此之大，同樣也是一種歷史現象，所以不能單憑對未來的許諾，而理所當然地證明革命暴力的合理性。就中國的情況而言，在試圖評價對革命的社會成就和付出的人的代價之前，需要作更多的分析。

如果說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史中有什麼令人驚奇之處，那就是公開的政治恐怖時期的相對短暫和新國家制度的迅速鞏固。隨著國內實際的或可能的反對力量受到鎮壓，以及到1951年朝鮮戰爭處於相持階段，美軍入侵的的可能性減小，運用恐怖作為政治控制手段的勢頭也減弱了。到1951年底，雖然在一些完成土改任務尚需一年時間的農村地區仍實行恐怖手段，但國家開始回復到較為「正常」的行政控制和官僚統治的方式。不過，回到「正常」只意味著公開的政治恐怖時期的結束，並不標誌著持續的政治壓制時代的終止。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年後，強大國家的目標已經實現。毫無疑問，1951年的恐怖統治和朝鮮戰爭的經驗，賦予新制度一種更嚴厲、更專制的特點，而情況本來可能不會是這樣。但是，如果能從這些政治事件中得出什麼明確的結論的話，那就是毛澤東曾說過的一個簡明道理——國家是鎮壓和強制的工具。中國這些年的歷史和其後的歷史，充分證明了恩格斯提出的、列寧曾多次說過的，馬克思主義命題的真理性：「只要國家還存在，就沒有自由。」

註 釋

1. 轉引自多伊奇爾(Isaac Deutscher)，《歷史的諷刺》(*Ironies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頁173。
2.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69。

3. 前揭書，頁1368。
4. 前揭書，頁1364。
5. 前揭書，頁1364。
6. 根據官方數字，1957年共有1272萬名黨員，其中工人黨員人數為174萬名，農民黨員人數為850萬名，知識分子黨員188萬名，其他60萬名。參見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頁132。
7. 出席會議的662名代表中，只有16人是中共黨員。
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372。
9.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65。
10. 前揭書，頁1366。
11. 關於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有這樣一些解釋：北朝鮮獨自作出的決定；蘇聯鼓勵和操縱北朝鮮發動戰爭；加上美國的教唆，南朝鮮李承晚集團挑起戰爭。幾乎沒有外交史家再相信曾一度盛傳戰爭是由中國預設的。實際上，最近有證據表明，雖然蘇聯人知道戰爭正在醞釀之中，但他們沒有通知北京這一情況。有關中國的作用，參見惠廷(Allen Whiting)，《中國跨過鴨綠江：參加朝鮮戰爭的決定》(*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關於朝鮮戰爭的複雜原因，參見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出色著作，《朝鮮戰爭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12. 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13. 引自傅高義(Ezra Vogel)，《共產黨統治下的廣東》(*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頁64。
14. 周恩來，《關於政府工作的報告》，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
15. 摩爾(Barrington Moore)，《民主與專政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頁506。

第六章

城市：
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衰

「統治一個處於革命餘波後的國家是極端困難的。政治才能是一種稀有商品」[1]——這一公理適用於大多數革命勝利後的局面，但套在1949年後的中國卻顯得勉強。在共產黨人取得勝利後的三年時間，他們對中國的統治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好，他們也不乏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正是中國革命的獨特性質，而不是什麼特別的統治天才，造就了革命勝利後的這種特殊局面。中國共產黨人的取勝方式不同於以往傳統的起義模式，即革命者突然上升到了陌生的統治者的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武裝鬥爭才獲得的，在鬥爭中，他們既是革命者也是統治者，按照自己的組織方式來治理相當的土地和人口。

但是，他們的經驗只限於農村。城市落入共產黨手中的速度之快，甚至超出了共產黨人自己的預期。在城市，政治和行政管理人才確實是非常稀有的產品；這一問題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指出：「奪取作為敵人主要根據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達此目的。」[2]當共產黨軍隊實際佔領城市後，毛澤東便宣佈「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及「我們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3]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最初都是出身於城市的知識分子，但在長期革命考驗中幸存下來的大多數領導人，二十多年來都生活和戰鬥在偏遠的農村地區。對軍隊中農民出身的幹部來說，城市則完全是陌生和怪異的地方。正如一位當時生活在北京的美國學者觀察到的：「一些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到

過大城市，他們甚至不知道怎麼關電燈。」[4] 此外，陌生還伴隨著不信任感。集合農村的革命力量以包圍和攻佔不革命的城市，這種革命戰略滋生了強烈的反城市情緒。在1949年以前，革命者把城市看成是保守主義的陣地、國民黨的堡壘、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也是產生社會不平等、思想墮落和道德腐敗的溫床。1949年，他們既是解放者，也是進入城市的佔領者。對那些沒有為革命勝利作出貢獻的城市居民來說，同情與強烈的懷疑感交織在一起。長期的革命經驗使革命者把革命的農村與保守的城市截然區分開來，這種二分法在毛主義的思想裏根深蒂固。新統治者處理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即城鄉關係問題)，這種革命的殘餘觀念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中國雖然基本上是個農業國，但有6,000萬以上人住在人口在10萬以上的城市裏，城市人口增長迅速。1949年，上海有六百萬左右居民。北京、天津各有200萬以上居民。廣州人口超過了100萬。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歲月裏，城市生活十分悲慘，一片混亂：大量的失業與半失業人口湧現，地方管理機構腐敗無能，龐大的黑社會、幫派和秘密團夥對肆無忌憚地欺侮民眾，吸毒現象普遍，妓女眾多，人民沒有起碼的衛生條件和市政設施等等，這些因素提高了共產黨治理陌生城市的難度。除了這些長期存在(並不斷惡化)的問題外，戰爭和垂死政權的殘暴統治摧毀了城市的經濟生活，使問題更加尖銳。嚴重的糧食短缺導致營養不良、饑荒、暴亂和搶劫，在長期充斥著犯罪問題的城市引發了各種新的犯罪浪潮。由於沒有原料，工人亦因營養不良而無法工作，工廠和車間不得不關閉；戰時和戰後的通貨膨脹達到天文數字。國民黨在統治城市的最後六個月裏，生活費用平均每星期上漲25%；例如，在共產黨接管北京的前一年，北京麵粉價格上漲了4500倍。[5] 貨幣變得一錢不值。南京政府頒布的各種「貨幣改革」不過是生產了大量毫無價值的廢紙片，經濟生活基本上倒退回以物易物的原始境地。在中國最主要的工業城市瀋陽市，這種情況十分典型：

> 已有50萬人離開了這個城市，他們或是去了解放區，或是到北方避難。工業生產已基本停頓。基本原因是由於圍困造成的糧食短缺。一個工人每月配給的糧食只夠維持十天。許多人不得

> 不吃過去用作家畜飼料或肥料的豆餅充飢。可能是由於缺乏維生素，最終使成年人患上夜盲症，孩子永久失明，有時甚至導致眼球破裂。缺乏食物引起煤炭生產下降，進而導致供電中斷，又反過來引起煤礦大量出水。生產似乎已完全癱瘓。即將到來的冬天肯定會是餓殍遍野。[6]

在上海，黃包車夫因營養不良，虛弱得拉不動車上的客人。許多城市都有瀕臨餓死的人無人照看、最後暴屍街頭的報道。

這就是國民黨的最後遺產：一貧如洗的城市。共產黨統治者缺乏管理城市的準備，但現在，他們要管理的城市卻是一片廢墟。共產黨既缺乏有組織的城市群眾的支持，又缺乏經濟上的物質支持。除了原始的農業經濟負擔外，又增加了新的意料之外的負擔：現代經濟成份的崩潰。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就是從這種赤貧的條件下開始的。

共產黨在城市裏擁有一種政治資本：對國民黨的普遍仇恨。悲慘的經濟狀況導致政治上的不滿，垂死的政權行為腐敗，借助於恐怖手段以維持政治統治，任意捕殺，鎮壓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對二戰後初期成立的、反共但卻是獨立的工會運動的鎮壓等等，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滿。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不了解共產黨人，恰如農民革命者不了解城市居民一樣；但是，僅憑共產黨的勝利會帶來和平與秩序這一點，他們就衷心歡迎農村蓋過城市。

雖然各種文獻都反映了城市居民對舊政權的普遍憤恨，但這種情緒很少表現為公開的或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也缺乏用以客觀估量人們對新政權的感情的可靠資料。人們對新政權的感情取決於他們所屬的地位和社會階級，發自北京的報道說：「人們夾道歡迎共產黨人的到來。走到街上，就能感受到一種新的寬慰感和輕鬆感，儘管這很難用準確的語言來描述。」[7] 有人形容說，廣州市民以「謹慎而不是歡欣」的情緒等待著解放軍進城，「他們的主要感情是城市和平移手的輕鬆感」。[8]

在城市地區，中學和大學的學生是共產黨最熱情和最積極的支持者，儘管真正的理想主義總是與機會主義和偽善混雜在一起。大多數政治上獨立的知識分子看來都願意在新政權下工作。1948年9月，在人民解放軍進入北京前的四個月，一位自由主義的教授評論說：

中國多數知識分子都不願意捲入政治。但是，他們一方面聽到政府反復宣稱要給中國帶來一個民主和廉潔的政府，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諾言在實際生活中反復受到嘲弄。事實上，政府的情況不但沒有改進，反而每況愈下，越來越糟。所以，時至今日，很少有人認為人民對政府的改革還抱有什麼希望……最初，我們大多數人都支持國民政府，儘管它有許多錯誤，但寄望它會改革……我們徹底失去了對現存政府的信心，希望它垮台的越快越好。既然中國共產黨是唯一能進行這種變革的力量，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們願意支持共產黨。當然，我們希望走中間道路，但這是不可能的。[9]

許多有錢的資產階級成員已隨著國民黨一起逃走。但是，大多數被共產黨歸類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人留了下來，這些人形形色色，有商家、小店主、小工廠主、小作坊主、企業或商業機構裏的管理人員等等。腐敗官僚機構的非法掠奪和內戰的動盪局面，已使他們幾乎破產，沒有什麼可以再失掉的了。他們本來不會對一個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的政府抱什麼熱情，但他們寄望新統治者能夠兑現諾言，限制而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毫無疑問，他們對新政權的態度十分曖昧，恰如共產黨以曖味和懷疑的方式看待他們一樣。至於工人階級和城市貧民——受壓迫的流氓無產者，包括人力車夫、當苦力的臨時工、乞丐和小偷——對共產黨的政治態度和感情，更難以準確地描述。他們構成了大多數的城市人口，但卻是最少發言權。他們是城市居民中在新政權下獲益最多的人，又是最少被人了解的人。他們當中大批人參加了1949年慶祝勝利的集會，參加了其後幾年城市裏的各種群眾遊行和集會，但他們慶賀的是跟自己沒多大關係的革命的勝利，對此，他們的感情肯定是複雜的；人們只能根據不完全的資料推斷，1949年，城市工人是懷著希望和熱情迎接共產黨的勝利。工人階級的成員是長期遭受極端的社會經濟壓迫的受害者，在舊政權的最後幾年，他們處於失業和半飢餓的狀態，因此，即使他們對執政黨竟然宣稱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感到不可思議，他們也還是真誠地迎接新政權的勝利。

城市居民眼看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軍隊佔領城市，心情雖然十分複雜，但單憑對舊政權的憎恨，就足以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歡迎新制度。他們的希望和擔憂交織在一起，正如共產黨不熟悉城市一樣，城市居民也不了解共產黨。但是，他們願意與國家的新統治者合作，以結束聲名狼藉的國民黨政權留給城市的混亂局面。彼此的懷疑和不信任依然存在，最重要的是通過雙方合作，落實和平的社會秩序、充足的糧食供應、恢復崩潰的經濟和推行根本的社會變革等，這些都是共同的願望。城市居民參與恢復城市社會和經濟生活，他們普遍而真誠的願望，多少彌補了共產黨缺乏有組織的政治支持的缺憾。

新政權首要的任務是建立公共秩序和恢復城市的市政服務，城市的情況跟農村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照：共產黨在農村有一套組織形式和熟悉情況的幹部隊伍，但在城市，他們不得不依賴舊政權留下的官僚機構；儘管大多數國民黨高官都與國民黨軍隊一同逃離，但官僚機構中的許多低級職員依然留在市政管理部門，在更低的層次上，地方警察機構的情況也是這樣。為了恢復秩序，新政權保留了原來的民事警察機構，留用其中許多成員。多年後，黨的幹部取代大部份舊官員，許多幹部是從城市青年中新吸收的。

城市行政管理和警察機構的形式結構與國民黨統治時期沒有太大的差別，但這些機構現在是由北京中央政府和軍隊的公安部門控制。雖然舊的城市行政管理部門的組織形式還保留著，許多舊官員和職員仍被留用，但關鍵職位都由共產黨員擔任，以確保地方官僚機關向新的國家政府及其政策負責。各式各樣在表面上自治、實際上與政府機關密切相關的城市群眾組織相繼建立，目的也是進一步加強中央的控制。這類全國性的組織有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學聯和各種職業協會，它們把城市社會中的主要階級和團體組織在一起，這些組織是在原來存在的組織基礎上建立的，在本質上是中央政府機關的延伸，由控制著國家政府的同一個黨控制。各種協會則控制著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中央制約當地行政管理機構和工礦企業地方主義的重要砝碼。

1952年開始建立的「城市居民委員會」(一般由100–500戶人家組成)，是對城市居民進行組織控制的又一個層次。居委會有許多令人迷

惑不解的職能，除了向所屬居民宣傳和普及政府的政策和計劃外，居委會還向政府反映居民的看法和意見；在處理家庭和鄰里糾紛時，它又起著準司法機關的作用；就控制和告發犯罪行為和政治不同見解而言，它又行使著警察的職能；居委會還要承擔市政服務工作，比如公共衛生和消防；它還具有社會福利功能，如提供社會救濟予困難家庭，組織居民進行文化和娛樂活動。雖然居委會提供福利及其他積極的服務，是必要和值得肯定的，但它在本質上是實行控制的強制性工具。正如弗朗斯·舒爾曼 (Franz Schurmann) 評論：「居委會的一個基本任務是監視它管轄範圍內的居民的活動，定期向派出所彙報，這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來自人們所知道的保甲制的辦法。」[10] 與1949年前的保甲制情況相似，居委會的準警察和準司法功能干涉了人們的私生活，引起人們普遍的不滿。然而，雖然共產黨依靠的是舊的官僚機構形式及許多舊官員，但他們迅速而穩固地在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執政的革命者決不會被舊官僚的殘部所推翻，共產黨不過是利用他們而已。

雖然共產黨的政治權力是穩固的，但它在最初幾年要實現的目標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沒有太大關係。他們推行的城市政策和實施方案，是任何強而有力的國家政府在這種環境下都要做的；實際上，這也是舊的國民黨政權打算做的事。任何一個新的中國政府都面臨的任務是：建立社會秩序、進行人口登記、收繳私藏武器、控制通貨膨脹、建立穩定的貨幣體系、恢復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恢復市政服務功能、改善衛生設施及加強中央對地方城市行政機構的控制；並不是只有共產黨政府才要解決城市中長期存在的社會頑疾，如普遍的吸毒現象、妓女和龐大的黑社會、秘密社團與黑幫的犯罪活動及由此而來的腐敗行為。

鴉片問題是反映舊政權的無能和新政權的成功的一個典型的例子。自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毒品問題就一直折磨中國社會，1839年鴉片戰爭後，毒品在中國迅速蔓延。國民黨政權上台時，毒品交易主要由犯罪組織經營。國民黨的反鴉片法和反鴉片運動勞而無功，一方面是由於政權的無能，另一方面還有政治和經濟利益方面的原因。國民黨發現，在毒品交易中謀取暴利的黑社會和幫夥在政治是可以利用

的，腐敗的官僚機構和警察部門則因有利可圖而保護毒品交易。然而，在中國歷屆政府統治下持續和發展了近兩個世紀的毒品問題，新政府在兩年內就徹底解決了。共產黨將不同的方法結合起來使用，對毒品的主要供應商和交易者採取嚴厲的制裁手段(包括死刑)，赦免小毒品商，對吸毒者實施戒毒方案，開展全國性的大規模教育運動，召開「禁煙」大會，通過宣傳十九世紀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喚起人們的愛國主義熱情等。到1952年，鴉片已不再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問題，在中國已很難找到吸食鴉片的人了。共產黨還通過鎮壓、改造、發動群眾和教育等方法，同樣有效地解決了城市其他的普遍問題。廣州是舊中國犯罪問題最嚴重的城市之一。傅高義(Ezra Vogel)在總結了共產黨統治首三年取得的成果時説：「最終掃除了妓女、吸食鴉片者、賭博和酗酒。一個世紀來第一次公共道德恢復過來，人們不再擔心搶劫，也不再害怕夜間在街上行走。幫助與嚴格監督雙管齊下，沒有改變人的本性，但卻遏制有組織的犯罪活動。」[11]

正如城市的社會改造，實現了中國長期以來屢受挫折的振興意願，驅逐外國人出境，也滿足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感情。驅逐外國人的行動，並非像當時西方媒體描述和譴責的那樣，是「共產黨暴政」的結果，而是一個深得人心的中國民族主義行動，標誌著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時代的結束。雖然在驅逐過程中發生了一些群眾排外的偶然暴力事件，但整個過程還是比較有秩序的。開始是要求外國人向新政權進行登記，限制和監督他們的活動和旅行。外資企業受到控制，最後被沒收和國有化。1950年下半年，在朝鮮戰爭緊張局勢的影響下，中國政府要求所有西方人都離開中國。當時大多數西方人已離開中國，還有少數外國商人、傳教士和教師留在中國；翌年，隨著一系列群眾反帝集會進行，他們被強令匆匆離境。雖然當時正是恐怖時期，朝鮮戰爭又激起人們強烈的民族主義感情，但大多數外國人還是和平離境的。所有外國資產都被凍結，外國企業被沒收。中國的基督教徒被迫中止了與外國教堂的聯繫。在被驅逐的外國人中，有不少人對新政權懷有好感，希望能繼續留在中國工作。全面的反帝運動使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和貿易關係基本中止。但是，當時國內的政治和心理需要遠遠壓倒了這些考慮。正如一位非共產黨的開

明知識分子向一位美國朋友解釋這種局面時說：「共產黨的反帝運動是過去一個世紀中國飽受欺凌和壓迫的結果。共產黨要向人民表明，人民才是自己家園的主人，決不允許任何外國人奴役。」[12] 這裏面不涉及具體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或類似的問題，毋寧是對一個世紀飽受侮辱的心理補償。驅逐外國人，是中國將來在平等條件下與西方國家打交道必要的心理前提。自從1842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和歷屆政府，以及傳統的和現代的民族主義者，都曾立誓要擺脫外國的枷鎖，但只有人民共和國，才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顯示出自己有這種能力的政府。

最初幾年的城市經濟

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從來都不純粹是「民族主義」的，但在最初幾年裏，他們實行的經濟政策，與毛提出的革命尚處在「民族的」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思想是基本吻合的。1949–1952年在農村進行的土地改革，促使大量小資產階級的個體經營農戶出現，而沒有造就社會主義經濟。城市出現了獨一無二的結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形式的「混和經濟」。「官僚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與國民黨結盟或在經濟上與外國利益息息相關的人士) 擁有的工業、商業等企業和銀行被國家直接無償沒收，成為國家所擁有。到了1949年，官僚階級的大多數成員已逃離中國。新中國通過國有化，從一開始就已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如果簡單地 (有可能是簡單化地) 把社會主義定義為國有制，那麼城市經濟的主要部分從一開始就是「社會主義」。然而，經濟的主要成分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最初幾年裏，新政權基本沒有觸動一百多萬小業主和手工勞動者，除此之外，還有原則上是按政治態度標準確定的「民族資產階級」，依然被允許繼續擁有私營的工商企業，按照形式上是資本主義的方式進行經營，實際上，政府鼓勵他們擴大經營，建立新企業。到1953年，私人工業企業數量從12.3萬個增加到15萬個，在私人企業裏就業的工人數量從164.4萬增加到223.1萬人。私企產值佔中國工業的37%。[13]

不過，私人經濟的活動受到嚴格的限制，產品價格、工資水平和

勞動條件都是由國家決定的。在私人工廠中，由共產黨領導的工會和工人組織，負責執行國家的政策和規定，對企業的管理起監督作用。更重要的是，私人工廠在生產產品的過程中，依靠國家分配原料，並通過國家的渠道銷售產品，私人商業企業在批發和零售業務上都依賴國家的商業組織進行。簡言之，這不是自由經濟，而是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經濟。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比舊的遭受批判的「官僚資產階級」更加依靠國家官僚機構。兩者的差別本質上是政治上的差別，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追求新目標的新國家，但這畢竟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所有者從他們生產和銷售的商品中獲利，雖然利潤受到控制，但賺的錢足以使「民族」資本家享受舒適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復興「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完全是出於純粹意識形態的原因。共產黨不是純粹要兑現「新民主主義」的諾言，也不是拘泥於馬克思主義提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先於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歷史觀點；原因要實際得多——要重建崩潰的經濟，為未來的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最有利的方式是重建既存的經濟，然後在此基礎上發展。如果馬上宣佈沒收資本主義企業並將之國有化，將導致組織上的混亂。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復興，要運用唯有資產階級才具備的管理技能和技術知識。通過結合經濟需要和政治要求，新政府獲得了留在大陸的資產階級成員和技術專家的支持，使移居海外的許多人得到鼓舞，返回祖國，投身於國民經濟的重建工作。

1952–1953年間，「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峰，此後，隨著私人工商企業變成完全國有化，或較典型的「公私合營企業」發展起來，「國家資本主義」迅速走向衰落。在公私合營企業中，國家利用政府投資的形式，控制並最終完全掌握了企業的利益，原來的私有者一般繼續留在企業從事管理工作，領取政府根據他們佔有的股份給予的5%的定息。事實上，如果不看名義的話，企業已為國家所有和國家管理。到1956年，城市經濟中的私有成分已不復存在。任何有一定規模的工商企業都已被有效地收歸國有了。保留下來的小部分私有成分只限於手工勞動者、工匠和小商小販。「國家資本主義」只作為一種殘餘存在，民族資產階級只得到國家根據原屬他們的工商企業中的「資本投資」而確定的紅利，按季度領取微不足道的金額，或是獲派不可兑付的債券

的利息，聊作補償。雖然他們在城市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但他們已是一個正在消亡的階級，他們的債券也不能由後代繼承。然而，即便國家資本主義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只有過短暫的興旺，它卻實現了既定的經濟作用。1952年，城市工業和商業都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在國家的重建進程中，共產黨尋求具備專業技能的城市精英與之合作：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技術人才、舊政權留下來的官員和管理者，以及民族資產階級。一旦實現了政治和經濟上的穩定，共產黨很快就不再依靠這些被認為是城市居民中最不可靠的人。從1953年下半年開始，共產黨進行了三次壓制性的政治運動，包括主要針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反對官僚腐敗和浪費的「三反」運動，及主要是反對資產階級的「五反」運動。這些與先前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不同，後者旨在從總體上根除社會上的政治反對者，而這些運動都是針對城市中特定精英集團的。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不同，後者是要摧毀對新社會毫無用處的農村地主階級。城市運動的目的只是為了進一步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這些社會集團，而不是摧毀它們。在保留他們的一技之長為社會服務的同時，使他們政治化。他們與地主和反革命分子不同，在政治化後依然屬於「人民」的行列。

1951年秋季，毛澤東宣佈：「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4] 開始了革命勝利後第一次思想改造運動。這樣，思想改造運動便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及為未來朝社會主義而轉變，創造經濟前提三者結合一起。運動開始是學習毛的著作，重點是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在這篇講話中規定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政治責任。所有主要的城市都開展了這場運動，使用的是人們熟悉的毛主義方式——群眾大會、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小型「鬥爭會」、公開批判，思想上被定為有罪的人的書面或口頭「坦白」等等，並要求知識分子拋棄個人主義傾向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思想，接受禁慾的毛主義價值觀和「為人民服務」的集體主義精神。運動一般是從大學的知識分子開始，然後擴大到中小學教師、學生以及作家和藝術家。雖然很少有公開的強制（儘管有一些知識分子被送到農村去「通過勞動接受再教育」），但知識分子承受的社會和心理的壓力卻非常大。改造成功

的模糊標準完全依循「思想改造者」的主觀判斷，就是觀乎一個人通過「坦白」或自我批評去承認自己過去的錯誤，進而接受新社會思想的態度是否「真誠」。知識分子是否真正實現了毛主義要求的靈魂深處的根本轉變，還有待商榷，但思想改造的外部效果是明顯的。運動結束於1952年，黨更牢固地控制了教育界，取消了知識分子在人民共和國成立最初兩年謹慎地享有的一點言論自由。四年以後的「雙百運動」時期將表明，此次壓制是如何在知識分子心中引起深深的不滿。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始於1952年初，與思想改造運動基本上同步進行。三反運動的目的是撤換政治上不可靠的政府官員和黨的幹部，糾正新國家的管理機構在職能方面的一些具體問題。這場運動的特點是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集會，批判腐敗的或暴虐的幹部，這是典型的毛主義的政治手段，後來成為所有運動的特徵。雖然還遠遠談不上群眾對官僚機構的控制，但無論在精神上還是方法上，都是一種與斯大林主義完全不同的實踐。

三反運動的重點是反官僚主義，特別是反那些留在城市管理部門而可有可無的舊國民黨官員、在內戰後期吸收入黨但已被證明不勝任革命勝利後的管理工作的新黨員，以及受城市資產階級影響而腐化墮落的老幹部。最後一點是典型的毛主義的觀點，即城市生活滋養了官僚主義的習氣，腐蝕了革命價值觀。不過，運動到最後並沒有形成對官僚機構的大規模整治，只有不到5%的政府幹部正式受到懲罰，一些人被關進監獄，但多數人只是簡單地被撤職或降級。[15]

五反運動（反對行賄、反對偷税漏税、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是一場範圍更廣、意義更重大的運動。總的來說，運動是直接反對城市經濟中的腐敗行為，重點是反對資產階級。從1952年到1953年初，共有45萬個企業受到國家當局的正式調查。雖然一些資本家因不法經濟活動入獄，但主要的懲罰措施是罰款。通過追繳拖欠的税款，課以重金和其他經濟上的強制手段，進一步剝奪了資產階級剩餘的財產，大多數企業和工廠不得不成為公私合營企業，這實際上是實現國有化的一條捷徑。1951–1952年的運動鞏固了共產黨在城市的統治，標誌著「新民主主義」時代的結束。1953年初，中國城市的市政管理機構、經濟和教育部門牢固地控制在黨和黨

領導的中央國家政權手中。新政權是集權和壓制的，但在現代中國歷史上，城市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有效的治理。

* * *

1949年，共產黨曾宣佈他們的目標是「三年恢復，十年發展」；1952年底，隨著城市復興、農村土地改革(下一章將探討這個問題)完成，新統治者實現了他們前半部份的諾言。政府的注意力轉向了「十年發展」，即在一個仍然貧窮落後的國家實現工業化的任務。但是，工業化卻導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毛澤東亦不願看到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後果。城市工業的發展導致新社會的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關係更加尖銳，無論是在為共和國的誕生而奮鬥的革命年代，還是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城鄉關係都是共產黨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日益加劇的城鄉對抗也許是現代工業化的內在本質；但在中國而言，由於革命源自農村並帶有農民革命的特點，以及城鄉在經濟和政治權力上極端不平衡，城鄉關係的矛盾變得更為突出。在城市，共產黨成功地恢復了國民經濟，建立了對城市地區實行有效控制的強力國家機構，但共產黨與人數日益增多的城市工人階級，兩者的社會政治聯繫依然十分脆弱。儘管在建國初期，共產黨曾努力鞏固和擴大在無產階級中的影響，但直到1953年，在中國共產黨的600萬黨員中，工人或工人階級出身的黨員比例卻不超過10%。在其後幾年裏，這個比例基本沒有什麼變化。另一方面，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進一步加強了共產黨在農民中原有的雄厚政治根基。黨的絕大多數黨員都是農民，從這個意義上説，共產黨還是一個「農民黨」；然而，黨的這種政治根基是建立在生產率低下的農業經濟和個體農民所有制基礎上的。這樣，在脆弱的小農經濟基礎上，黨與城市工人階級的關係還不明確，人民共和國開始了自己工業化進程。

不過，雖然中國共產黨的基礎依然是農民，但黨的高層機關現在則以城市為基礎，黨的多數領導人很快也城市化了。儘管根據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理論[16]來判斷，他們還不能算是工人階級中的「有機」知識分子，但他們確實把自己的命運、中國的前

途與與城市工業的發展聯結在一起了，也就是說，至少與中國無產階級的發展聯結一起。但黨的另一些領導人 —— 可以把他們視為是農民中的「有機」知識分子 —— 卻很難接受城市生活以及城市領導鄉村這樣一種前景，其中最重要的人當然是毛澤東。1949年，他宣佈中國開始進入「城市領導鄉村」時期的同時，也警告說，對先前獲勝的革命者而言，城市化可能腐蝕他們的意志和思想，這便存在危險。就是說，城市生活產生的「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作風，有可能取代「艱苦奮鬥」的農村作風。[17] 他的警告被證明是有預見性的。在迅速發展的城市工業化的影響下，城鄉之間業已存在的差距更加擴大。這種差距也反映在中國共產黨身上，從注重城市的領導人與注重農村的領導人之間出現分歧，到把社會主義的前途寄託在現代城市工業的發展上，已可見一斑，以至黨依然把自己作為農民的代表，更看重農村的社會主義變革之間的兩種觀點的差距。

註 釋

1. 鄧恩 (John Dunn)，《現代革命》(*Modern Revolu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頁17。
2. 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599。
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前揭書，頁1317。
4. 卜德 (Derk Bodde)，《北京日記》(*Peking Diary*,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頁72。該書對國民黨統治末期和共產黨統治初期的城市作了十分具體和生動的描寫。
5. 前揭書，頁100。
6. 前揭書，頁33。
7. 前揭書，頁99。卜德注意到，參加解放軍歡樂遊行的平民，「多數人的喜悅顯然不是由衷的……另一方面，街道兩邊的旁觀者的表情，像多數中國人一樣，十分平淡。不過總的來說，他們喜歡這種場面，權力的顯示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頁104。
8. 傅高義，《共產黨統治下的廣東》，頁45–46。
9. 卜德，《北京日記》，頁23–24。
10. 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376。保甲是國家進行社會

政治控制的一種傳統體系。從理論上說，它是由百戶人家組成，每個成員都要為其他成員的行動和表現負責。

11. 傅高義，《共產黨統治下的廣東》，頁67。
12. 卜德，《北京日記》，頁158。
13. 數字引自理查曼(Barry M. Richman)，《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頁899。
14. 《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4日。
15. 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318。
16. 有關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有機」知識分子的理論，以及他關於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村知識分子的區分，參見他的論文〈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s")，載於葛蘭西，《獄中札記選》(*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頁5–23。
17.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28–1329。

第七章

土地改革：農村的資產階級革命

1952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年之後，作為一個階級的地主豪紳已不復存在。曾統治中國社會達兩千多年的地主階級的覆滅，標誌著一場重大的社會革命已經完成，但這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雖然消滅地主階級的進程是在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下進行的，但地主階級的滅亡，無論是從社會意義還是從經濟意義上來衡量，都是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革命行動。正如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擁有土地的貴族的權力，並清除了阻礙資產階級所有制成長的封建制度一樣，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革命，通過沒收地主的財產，重新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創造了一個由從事小資本主義生產 (petty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的個體農民所有者 (individual peasant proprietors) 組成的龐大階級。

地主和前資本主義的農村社會經濟關係一直維持到二十世紀中葉，反映了現代中國歷史中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失敗。共產黨承擔了這一項歷史任務，目標是消滅私有制的共產黨，卻要在農村創造促進資本主義所有制繁榮發展的條件。當然，這種歷史矛盾並非沒有歷史先例。在俄國，類似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迫使布爾什維克領導了一場農村的資產階級革命，其結果是，在蘇維埃歷史的最初十年，資本主義農民的人數不斷增加。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俄國，農村的資本主義經濟存在的時間都很短。允許農村資產階級革命發生的政治權力，同時也被證明是摧毀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工具。

這裏，我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歷史諷刺。在俄國和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失敗反而為社會主義提供了政治上的有利條件。

假若資產階級革命發生得再早一些，即發生在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奪取政權的政治條件成熟以前，那麼這兩個國家的農民很可能成為堅決維護自己的資產、反對革命的政治保守力量。西歐多數國家、尤其是法國的情況就是如此。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的農民激進主義之後，是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政治保守主義。馬克思常對這種現象作出評論，在一篇總結性的評論文章中，他挖苦地說道：「波拿巴 (Bonapartes) * 王朝是農民的王朝。」[1] 但是，在農村革命發生得較晚、並與社會主義革命互相關聯或社會主義革命涉及的地方，情況就不同了。在俄國，新的個體農戶沒有時間強化自身，成長為一個足以與斯大林的集體化恐怖互相抗衡的階級。在中國，政治條件更有利。與布爾什維克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在廣大農民支持的基礎上取得政權的，在農村有雄厚的組織根基。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抗微不足道，而對激進的社會變革卻給予了巨大的支持。中國農業的社會化以一種完全不同於蘇聯的方式進行，兩者產生的社會和政治結果也截然不同。

土地改革：1950–1952年

1949年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時，中國農村已有五分之一的鄉村完成了土地改革。共產黨決心把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迅速推進到剛剛解放的其他各地農村。進行土改的決心不僅出於農村消滅封建社會經濟關係的意識形態上的要求 (即完成「新民主主義」的一個重要承諾)，還包含著各種重要的政治和經濟考慮。其中一個原因是，要維護新政權的群眾支持基礎，就需要進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是共產黨向佔中國農村5億人口70%的貧農許下的諾言，貧農是共產黨最大的支持者。還有另外兩個原因決定了普遍進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第一，土改會

---

* 指路易・波拿巴 (Louis Bonaparte)，拿破崙 (Napolean Bonaparte) 的姪子。他於1851年12月2日摧毀國會成立獨裁政體。一年後改稱拿破崙三世。馬克思撰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即法國革命日誌的1799年11月9日，當時拿破崙推動政變而成為獨裁者。── 編者按

消滅地主階級(從而也消除了潛在的反革命威脅)，建立共產黨在鄉村的政治權力，進而有助於建立一個牢牢管理和控制著農村的集權化國家。第二，土改出於新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共產黨期望通過土改，至少能夠在傳統耕作技術的條件下，提高農業產量；為農業技術革命奠定政治基礎，而農業技術革命又是現代工業發展的希望所在；為未來農村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奠定基礎。

共產黨決心完成農村的社會革命，但他們也決意避免在內戰末期北方一些省在進行土地改革時出現過的暴力事件。1949春季，隨著軍事上的勝利，農村的工作重心也由在政治上發動農民去建立國家的新秩序，變為穩定農村經濟。黨的領導人號召結束鄉村的革命恐怖，努力控制自發的農民激進勢力。對已從革命者變成統治者的共產黨來說，激進勢力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是破壞性的。1950年初，許多被指責為「極左分裂者」和「濫殺無辜」的年輕村幹部被開除出黨。與此同時，在重新制定國家指導方針的過程中，土地改革的進度放慢或停止了，在華南和華中的新解放區裏，當地幹部的行為也受到約束。

從1949年末到1950年初，黨內對如何遏制土地改革初期的暴力行為和混亂局面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爭論圍繞著兩個問題展開：其一，堅決消滅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主豪紳；其二，在保持農業生產穩定的前提下堅決完成土地改革；這兩個問題並不矛盾。地主階級傳統上是一個寄生階級，它靠收取自己擁有的土地的租金取得財富，但對農業生產幾乎沒有任何貢獻。除了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考慮外，人類學家費孝通還指出了這樣一個簡單的經濟事實：「地主離開了佃戶就無法從土地上得到收益，但是沒有地主的幫助，佃戶也能耕作土地。」[2] 地主階級與城市資產階級不同的是，後者具備新政權需要和利用的經濟和技術才能，而地主階級對社會毫無用處，是一個經濟上沒有價值、社會和政治上又令人生厭的階級。

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報告中，概括了共產黨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觀點，兩星期後政府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中正式採納了這些觀點。雖然在18年後，劉少奇的這次講話被當成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證據，但沒有理由認為毛澤

東當時不同意報告中的穩健觀點，即「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3] 在社會革命的轉變時期，保持農業生產穩定發展的需要，對新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生存至關重要，這是所有共產黨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一致同意的。實際上，在劉少奇做這一報告的一星期前，他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的報告已為將要實行的穩健的土地政策定了調。他說：「保存富農經濟，有利於早日恢復農業生產」，這是出自發展經濟的需要。[4] 劉少奇提出的土地改革運動要遵循的「總路線」，即「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是毛澤東在1949年前後一直提倡和實行的基本原則。它的實際社會經濟含義是，保護在經濟上有效率的富農和中農，使他們不會受到要求馬上實行徹底社會平等的激進平均主義的傷害。

在土地改革法中涉及如何對待佔農民人口30%的、沒有被劃為貧農和僱農的這部分農民的條款中，以及1950年夏季政府頒佈的法令中，都體現了保持農業生產穩定的精神。地主(佔農村人口的4%左右，擁有30%的可耕地)的土地和財產都被政府無償沒收，分配給無土地農民或貧農。對公有土地，如鄉村祠堂、寺院、教堂、學校等(通常也是由地主家庭間接控制)，也採取了這樣的政策。但對被剝奪了財產的地主，也同樣分給他們一份與貧農相等的土地，「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並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經過五年自食其力的勞動，在政治上老老實實，「地主分子」的帽子也可以摘掉。更重要的是，有關條款禁止沒收「地主兼營的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這一條款與1949年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政策是一致的。通過這一條款，城鎮中從事工商業的地主家庭成員可以被劃為「民族資產階級」成員。這樣，在消滅地主階級傳統上的寄生一面的同時，也保留了他們有利於經濟發展的一面，雖然後者也存在著勞動剝削。

更能顯示共產黨將迫切的經濟問題置於社會問題之上的，是對富農採取的比較寬厚的政策。富農人口雖然只佔農村人口的6%，但其農業產量幾乎佔了農業總產量的一半。土地改革法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此外，還允許富農繼續出租土地給佃農，但「超過其自耕和僱人耕種的土地數量，應予以沒

收」。[5] 這樣，富農被允許從事兩種傳統形式上的剝削：能僱用農業勞動力，可以向佃戶出租土地。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共產黨還不遺餘力爭取中農的政治合作。中農雖然只佔農村人口的20%，但農民協會的領導有三分之一來自中農。土改法規定，不得沒收中農的土地和財產。「富裕中農」這樣一個新提法的出現，使他們有可能通過剝削，即僱用農業勞動力和出租部份土地，獲得總收入的25%。[6]

雖然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保護了中農和多數富農的經濟地位，那是一項比較穩健的政策，但它也同時規定了土地改革的主要社會目標，即消滅地主豪紳階級。儘管如此，它並沒有完全實現共產黨關於「均分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保證，而在內戰期間，農民正是在這兩個口號的感召下集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的。

沒有完全兑現諾言的原因，在於任何企圖在農村實行絕對平均主義的做法，都會給農業經濟造成巨大的混亂，如1947–1949年北方的土地改革中出現的那種情況。新土地綱領減弱了社會激進主義的勢頭，正是汲取了過去的教訓，反映共產黨對政治和經濟穩定的關注，這也正是革命者在成為統治者後應予考慮的問題。在當時官方的文件和聲明中，出於這些政治和經濟方面考慮的內容比比皆是。摧毀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主階級是一個良好和必要的目標，但不是目的本身。正如新土地法開宗明義地提出的，長遠目標是「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7] 也正如共產黨領導人當時反覆強調的，不管土地改革的結果如何平均，都不會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生產總量，發展現代工業和現代技術，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無論如何，在共產黨看來（不過當時農民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土地改革只是農村長遠的社會革命和經濟革命發展的第一步，是最終實現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進程的第一步。與此同時，保持農村地區的社會秩序和農業生產的穩定，最大限度地符合了國家的利益。相比而言，對富農和中農作出的暫時讓步，只是為實現長期發展而作出的微不足道的讓步。

1950年中旬，多數黨的領導人認為，如何貫徹實施土地改革法的這些特殊條款，比這些條款本身更加重要。在中國北方早期進行的土

地改革中，左右土改工作的基本是年輕激進的村幹部和貧農中的激進勢力。這次情況不同，土改工作是在上級的領導下進行，參加土改的幹部必須遵守黨中央和政府的指示。如果政治和經濟的形勢要求土改採取更加漸進的方式，那麼這也是應該付出的代價。如劉少奇在1950年6月的報告中指出的：「如果在某些地區開始土地改革後，發生了某些偏差，並引起了某種混亂狀態，而不能迅速糾正時，則應該停止這些地區的土地改革，到明年再去進行。」[8]

1950年夏季的土改運動並不像設想的那樣有秩序地進行。鄉村裏的階級鬥爭力量一旦被釋放，就把官方的規定和政府的約束置諸腦後。農村中較有特權的階級的反抗程度和貧農對土地的要求(以及懲罰從前壓迫者的要求)程度都比北京領導人預期的要強烈得多。

1950年夏季，運動以非常平穩的方式開始，一系列工作都有條不紊地進行：培訓進行土改的黨的幹部；組建和發展當地農民協會和議事機構；在華南、華中新解放區開展土地情況調查，在農民中劃分階級成分；開展教育運動；樹立和推廣「先進」的工作典型等等。由於各地的社會、經濟情況都不相同，北京強調，各省當局要根據當地情況和需要來指導運動。誠然，土改運動開始時也存在著一些嚴重問題。南方的宗族勢力(超越不同階級的組合)比在北方要強大得多，而黨組織又比在北方弱。在許多新解放區，地主的社會經濟力量也比在北方各省強大。地主利用宗法聯繫盡可能地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財產，免受即將來臨的社會革命的侵犯。許多地主逃到城市，躲藏在親戚家中，把自己的土地和財產「借給」本村中同族的貧苦成員。有時，地主乾脆直接賄賂農民，讓他們出面反對關乎傳統的變革。此外，從北方派到南方和西部的土改幹部，常與當地黨的幹部發生政治衝突。北方幹部希望盡可能徹底和迅速地進行土改，南方幹部則常受到宗族聯繫或個人私交的束縛。但是，總的來說，到了1950年底，運動進行得比較平緩，發生的暴力事件也不多。

土地改革通常是由農民協會和民兵組織發動進行。農會取代了農村中由富裕家庭的長者構成的傳統組織體系。民兵組織取代了過去由地方上的軍事「自衛隊」構成的保甲體制，自衛隊多是由當地的「惡霸」組成，就是武裝的匪幫，通常受地主驅使，專門對農民進行敲詐勒索

和恐嚇。共產黨軍隊一進入農村，便槍斃和關押了許多這樣的惡霸。共產黨在農村的政治權力通過農會和民兵組織建立起來後，運動就轉向社會和經濟目標。首先是地主發還農民的租金，然後，開始在農民中進行複雜的劃分階級成分、調查土地隸屬情況的工作。由於鄉村的階級界限十分複雜，又常與宗族連繫糾纏在一起，以及土地隸屬情況有時並不明確，所以，一些問題難以定論，作出的決定也帶有任意性。但從總體上看，雖然存在著政治判斷的干預，但其結果與社會經濟現實還是吻合的。社會學家楊慶堃 (C.K. Yang) 曾在國民黨統治的最後一年和共產黨統治的最初兩年在廣東進行過鄉村研究，他報道說：「在土地改革的調查中確定的各階級的總的比例，與我們知道的在共產黨統治以前的鄉村階級構成比例，基本上是一致的。」[9]

階級成分和土地隸屬情況的確定，是沒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前奏，它導致了一種十分反常的社會現象：村民都盡可能地叫窮，降低自己的社會地位。還在富裕農民中引起普遍的恐慌：

> 強烈的焦慮和緊張氣氛籠罩著整個村莊，因為現在每個家庭都被指定了一種能產生社會、經濟和政治後果的階級身份。那些被劃為地主成分的家庭等待著將要落下來的斧頭。劃成富農成分的家庭極度不安，他們知道，雖然現在的政策是「保存富農經濟」，但自己的命運尚未確定……中農心中也惶恐不安……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土地還能保留多久。此外，許多相對富裕的農民被當做富農看待，他們不知道是否有一天會把他們「提升」到富農的行列裏。[10]

階級路線的劃分宣告了公開階級鬥爭在農村的開始。土地改革的目的不僅是要在經濟上剝奪地主，而且在社會和政治方面，要使他們在農民心目中威風掃地，聲名狼藉。通過發動村民開「鬥爭會」，共產黨鼓勵貧苦農民表達他們長期壓抑的憤怒，公開批鬥過去的壓迫者。對視為鬥爭對象的地主來說，最好的結局是在群眾面前「低頭認罪」後，領到一小塊自己耕作的土地，最糟的結局是在群眾大會公審後立即遭槍斃。毫無疑問，在土地改革運動引發的農村社會的內在衝突

中，本質上就潛伏著暴力和恐怖的可能性，但如果不是朝鮮戰爭的爆發，對地主採取的恐怖行動可能不會有如此大的規模。

朝鮮戰爭的爆發與土地改革法的頒佈發生在同一個月，雖然中國軍隊直到年底才直接捲入戰爭，產生了中國與美國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它對中國國內情況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影響。許多地主感到共產黨政權不會維持多久，國民黨政權很快就會捲土重來，從而抗拒土改。對新政權來說，戰爭引起了對反革命擔心，焦點是對地主的擔心。在共產黨要消滅的兩個社會階級中，官僚資產階級已逃離大陸，基本不復存在。但是，地主階級的大多數成員卻依然留在大陸，或是在農村，或是躲進城裏。1950年下半年，隨著朝鮮戰爭的加劇和國內政治形勢日益緊張，北京發出指示，要求採取更激進的農村政策，加緊農村的階級鬥爭，全面加快土地改革運動步伐，以粉碎依然存在的地主階級可能造成的威脅。政治因素的考慮壓倒了經濟需要，各個村莊越來越頻繁地召開鬥爭會，對地主的公開審判也更加嚴酷。早些時候在北方土地革命中發生的恐怖主義，成為現在土地改革中的特徵，但已不再是自發的了。土改運動仍然在中央的指揮和控制下開展，逐漸地與1951年秘密警察對反革命嫌疑犯採取的恐怖相結合。許多地主被判死刑或被送進勞改營。但被劃為地主家庭的約二千萬成員中，絕大多數人得到了一小塊土地，開始了他們尚不習慣的種田人的生活，不過在社會上他們依然被稱為「地主」。

到了1952年底，除了少數民族居住的地區外，土地改革運動基本上已經完成。土地改革運動的偉大歷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運動開始時宣佈的目標，即消滅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主階級，儘管在這一進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預期中更多暴力和恐怖手段。事實證明，擔心土改運動會破壞農業生產是沒有根據的。在1950–1952年間，農業總產量以每年15%的速度遞增，1952年增幅最高。[11] 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政治秩序的建立（以及貿易和交通運輸的恢復）。雖說經歷了十多年的外敵入侵和內戰，但1952年的農業產量依然比戰前最好的一年——1936年——還要高得多。1949年開始興建新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逐漸擴大可耕土地的面積，組織消滅害蟲活動，農藥與化肥的使用量有了顯著增長，這些足以彌補了土地改革運動帶來的副作用。由於現在耕作的是

自己的土地，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和勞動效率都比過去更高，並且開始採用了更好的耕作技術。

土地改革實現了中國農村的重大社會革命，但它並沒有導致農業的經濟革命。土改本身沒有改變鄉村的生產模式，技術的改進也是微不足道的。誠然，農民勞動果實的分配比過去平等，穿著長袍馬褂修剪著指甲的「紳士」們再也不可能靠別人的勞動過活。農民對舊制度的恐懼已經消失，但是，普遍的貧窮情況依然如故。即使按照官方數字，1952年的農作物產量比戰前最好的年份還要高9%，也很難跟得上人口增長的速度，更不要說還要為工業和農業的資本投入提供大量的剩餘農產品。傳統的農業技術和生產方式極大地限制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何況農業生產還依賴於變幻莫測的天氣。

土地改革的經濟局限從一開始就被認識到了。劉少奇在運動開始前就提醒說：「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救濟窮苦農民……只有農業生產能夠大大發展，新中國的工業化能夠實現……農民的窮困問題才能最後解決。」[12] 在現代經濟革命實現以前，中國還得承受落後的重負，只不過現在是大家比較平均地承受這種重負。

然而，在沒收和重新分配幾乎佔全國一半的可耕地的過程中，最直接受益的是貧農和無地農民。佃農和農業工人現在有了可供自己耕作的土地，而最窮的僱農還得到一份額外的、通常是最好的土地。儘管他們是新制度下社會和政治上的寵兒，但在農村，他們依然是相對最窮的，繼續受著普遍貧困條件的折磨。土地改革是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平等運動，但決不是一場平均主義的運動。農村人口中依然存在著突出的經濟差別。貧農擁有的土地數量約為當地平均數的90%，中農佔有的土地數量略高於鄉一級的平均數，富農佔有的土地數量則一般為平均數的兩倍。此外，勞動剝削還沒有完全廢除，富農和一些中農仍然向佃農出租土地並僱用受薪的短工。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帶來的經濟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它所產生的問題所抵消。土地的重新分配產生了大量分散的、經營規模更小的農戶，強化了對提高生產率的傳統制約。雖然廢除了高利貸，但小農戶缺乏足夠的農業資金這個老問題更加嚴重了。擁有資金的富農和中農不願意按照新國家規定的低利率出借資金，而國家只擁有非常有限的

建立農村新的信用體系的手段。總稅收額比舊政權時還要高，一般的估計是，土改後國家的稅收約佔農業總產量的30%左右，是1949年前的兩倍，儘管現在主要是由較富裕的農民來承擔高稅收。大多數從前的佃農雖然從土地改革中受益，但普遍的情況是，土地的再分配沒有提高他們的生產率和收入。在佃農數量比較多、佃農權益相對有保障的南方一些地區，土地改革的結果是出現了規模更小、效率更低的農戶，他們的收入反而不如原來當佃農時的收入高。不過，總的來說，雖然存在著農民貧困這種普遍問題，但大多數農民的物質條件還是得到了改善。

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以生活條件的直接改善來衡量土地改革的意義。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與消滅了最壞的剝削形式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土地改革為農村未來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造，奠定了社會和政治基礎。由各村農民群眾中的政治積極分子進行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為在鄉村穩固地建立集權制的國家政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從貧下中農產生的年輕的政治積極分子組成了新的農村領導層，取代了地主階級，與國家的政治機構建立了直接的聯繫。雖然國家的政權機構只設在鄉一級，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組織已將國家的權威向下延伸到了「自然村」。隨著傳統的地方觀念和家族觀念的崩潰，以及層層建立的中央國家政權機構，鄉村的地方隔絕狀態也被打破，農民成了國家政治中的一部分，並逐漸納入國家市場經濟中。

毫無疑問，隨著國家政權延伸到村級，以及寄生的地主階級的滅亡，其中最重要的結果是使政府能夠大量調撥農業剩餘產品。我們將看到，這是中國工業化的根本前提。

土地改革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結果是農民政治意識的普遍提高。土改運動不是通過行政命令，而是通過發動階級鬥爭的方式開展起來的。所有的村民都參加了階級鬥爭，因為無人能避開階級鬥爭產生的後果。群眾鬥爭大會和公審大會，激發了農民潛在的能量和埋在心底的仇恨，從前受壓迫的被動受害者，今天在大會上控訴、審判和懲罰過去的壓迫者。如果說土地改革的目標是由上面決定的，那麼土改的進程則是由下面的農民完成的。農民感到，正是他們自己改變了自己的生存條件，他們能夠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特別是對那些沒有參加

1949年以前革命鬥爭的農民來說，土地改革不啻為一種深刻的創傷性的心理體驗，是一場賦予他們權力感、使他們對未來有了新的希望的深刻政治運動。

土地改革的完成導致了個體農民所有制的建立，它是中國革命進程中的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映。政府給新的土地所有者發了地契，他們現在可以合法地自由買賣和出租自己的土地。雖然政治權力掌握在致力於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共產黨手中，但1953年農村的社會經濟形勢，還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發展，有利於農村資產階級的成長。

共產黨從來沒有隱瞞他們的觀點，即個體農民所有制只是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暫時階段，是通向集體化道路的一個過渡階段。在土地改革運動開始的前一年，毛澤東曾宣佈，農業集體化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但當時他認為這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 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完全鞏固的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的步驟，必須和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相適應。[13]

在什麼時間、如何實現農業生產的集體化，以及城市的工業化和農村的社會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是共和國今後十年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註釋

1.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692。
2. 費孝通 (Fei Hsiao-t'ung)，《中國的士紳階級》(*China's Gentr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3)，頁119。
3.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劉少奇選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43。
4. 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1950年6月6日。

5.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六款。
6. 前揭文。土地改革法規定只能獲得總收入的15%，但1950年8月4日的政府法令增加到了25%。
7. 前揭文。
8.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頁31。
9. 楊慶堃(C.K. Yang)，《共產主義變革初期的中國農村》(*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59)，頁143。
10. 前揭書，頁143–144。
1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人民中國》(*People's China*)(北京，1956年7月16日)。
12. 劉少奇，〈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頁34。
13. 《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66。

第八章

工業化引發的社會與政治後果

如果我們按照中國共產黨過去的革命歷史，來看它今天所謂保守的一面，我們就很難理解人民共和國的這段早期歷史，也無從評論1949年的勝利者為決心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提出的社會主義目標。無論毛主義的革命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有多大差別，在長期農村革命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來沒有放棄未來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這種理想正對勝利的革命者最初實行的政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共和國的首三年裏，共產黨使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過去兩千年從未有過的根本變革。到1952年底，共產黨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任務（也許尚未成熟，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說）已基本上完成，所以開始準備向革命進程的新階段前進，即他們所說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說共產黨和國民黨都主張在現代社會裏實現中華民族的「繁榮富強」，那麼，共產黨與被其擊敗的前朝的區別在於，對共產黨來說，繁榮富強不是最終目標，它只是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至少1952年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經濟落後與社會主義

如果說，對馬克思主義堅定信念激發了中國共產黨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那麼，也恰恰是馬克思主義教導說，在經濟落後的環境裏是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則是，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先決條件，只有在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所創

造的物質和社會成就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有成為現實的歷史可能性。對馬克思(還有列寧)來說，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現代工業組織、以現代技術為基礎的分工的高度專業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勞動的協作化模式，都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前提。只有這些進程才能創造出未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經濟條件。此外，不能從歷史決定論的立場退縮。針對有人鼓吹在資本主義完成它必然的歷史任務以前就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觀點，以及希望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引起的邪惡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馬克思曾回答說：「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1] 毛澤東之前的馬克思主義先哲們常常提醒人們，一場「不成熟」的 —— 社會主義革命 —— 在資本主義工業化充分發展前就企圖廢除私有制的革命 —— 在歷史上將是徒勞的，甚至可能是退步的。在經濟不發達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只不過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平等」的「原始」和「粗糙」形式，它為更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和更有壓迫性的政治專制開闢了道路。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並非不知道馬克思主義規定的進行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他們痛苦地認識到，前工業化時期的落後中國並不具備這些前提條件。但是，他們面臨著嚴峻的歷史兩難境況：一方面，正是現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使社會主義革命者最終奪取了政權；另一方面，也正是資本主義的失敗使執政的革命者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假如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能成功地建立現代工業經濟，如日本或德國，那麼在中國，通向革命的道路就關閉了，因為保守的現代化取得成功的地方是不會發生革命的，正如在工業化道路上作為「後來者」的那些國家裏發生的情況一樣。事實上，在保守政權下工業化的失敗，創造了有利於在社會主義政黨領導下進行革命的社會經濟條件，但也留下了不利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所以，共產黨既是中國現代資本主義不發達及經濟落後遺產的受益者，也是其受害者。在掌握政權後，他們除了利用政權尋求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外，別無選擇。

中國人不是第一個面臨這種兩難選擇。十九世紀俄國的民粹派把經濟落後看作是俄國實行社會主義的優勢，他們認為，正是相對缺乏資本主義發展這一點，使俄國在社會和道德方面具備成為社會主義先

驅國家的特殊有利條件。俄國有可能「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在前資本主義農村公社的基礎上，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在新社會主義的體系框架中，通過採用西方先進國家的現代技術，俄國就能避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社會弊端和官僚社會的精神墮落。馬克思沒有輕易否定俄國民粹派的觀點；馬克思承認，當中可能存在著一些「落後的優勢」，例如文化交流的作用，借鑑國外的情況和使用傳統社會生活的公社制等，都有可能縮短現代經濟的歷史發展階段。[2] 但馬克思最後的結論是，只有當在前資本主義的俄國進行的革命，與西歐工業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時爆發的情況下，這些優勢才能在向社會主義轉變中發揮作用。[3] 歸根到底，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存在於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創造的物質和社會條件中，即以現代工業和現代無產階級存在為前提。

馬克思的結論成為列寧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前所持的基本理論觀點。不管列寧的革命戰略觀與原本的馬克思主義有多大距離，他還是認為，俄國革命是一顆「火星」，它將點燃西歐長期延滯的社會主義革命。俄國革命沒有被看作是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而是一場政治事件，它能否導向社會主義，取決於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無產階級能否及時採取行動。但是，與馬克思和民粹派不同的是，對列寧來說，繞過資本主義的可能性很快就變成一個具體的政治問題，而不僅是理論問題。當預期的西歐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發生時，在一個經濟落後政治封閉的國家裏進行了反資本主義革命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面臨的問題是下一步應該怎麼辦。無論是馬克思理論還是列寧理論都沒有預料到這個問題。列寧雖然對在一個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的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和道義上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但他解決問題的答案，與後來斯大林進行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基本一致。簡單地說，列寧的結論是，布爾什維克政治權力能否生存，取決於它能否運用這種權力去實現資產階級革命，以及能否在社會主義政黨的領導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任務。這意味著首先要迅速實現城市工業化，而城市的工業化又要求有一個專制的國家機器，能夠有效地控制農村，從農業生產中徵收城市工業發展所必需的資本。列寧對迅速發展經濟的關注（1918年中旬後他日益重視這個問題），反

映在他常常流露出來的「技術官僚傾向」(集中表現為：他關於「電氣化加蘇維埃等於社會主義」的著名公式；他提出的「向資本主義學習」的口號；他對「泰羅制」(Taylorism) 工作效率和管理方式的推崇；強調重工業發展為主軸等；也表現在他對高度集權的政治與經濟生活的無條件的肯定。雖然在列寧主義中還看不到斯大林主義的殘暴和非理性，但斯大林主義在強制的農業集體化基礎上實現快速的城市工業化的戰略，其理論和政策要點卻來自列寧。列寧曾對民粹派的觀點進行過無情的抨擊，但他現在卻不得不承擔「通向社會主義的非資本主義道路」(或更準確地說，一條以社會主義為目的的道路) 的先驅者的角色，這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諷刺。列寧關於革命勝利後的指導理論，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迅速的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存在，以及關鍵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這三者的結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動保證社會主義的實現。1952年，中國共產黨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種假設，這是他們全盤接受蘇聯的發展與組織方式的理論前提。

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與向社會主義過渡

與30年前俄國布爾什維克不同的是，經濟發展不濟給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造成的困境，並沒有為中國共產黨帶來什麼麻煩。蘇聯的經驗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可以運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力量在落後國家裏實現工業化。不過，如果說中國人還能從俄國經驗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安慰，他們面臨的客觀經濟問題卻沒有這麼簡單。儘管中國經濟已經恢復到1949年前的最高水平，但中國經濟中的現代工業成分還不到沙皇俄國時的一半，而中國人口卻是俄國的四倍。即使進行這樣的比較，也不足以弄清中國的落後程度。中國的現代工業基礎不但弱小，而且主要是由帝國主義建立的，所以，中國經濟比俄國經濟更依賴於外國經濟。此外，中國的農業技術甚至比革命前的俄國還要原始。中國的文盲率比俄國更高，普遍的教育水平比俄國更低，特別是在現代科學技術方面，情況更是如此。

在中國政府宣佈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952年，雖然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但工農業總產值勉強超過1930年代中期的水平。與

俄國革命後的同期歷史相比，在斯大林開始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1927年，俄國的人均工業產值比1952年的中國人均高出四倍之多。1952年，中國的人均農業產值僅是25年前蘇聯的20%。因此，中國從農村獲取城市工業化需要的資金數額也要比俄國少得多。此外，中國現代的交通運輸設施也比當時的俄國落後得多。

這樣，在比俄國實行工業化進程時更不利的經濟環境中，中國開始了發展現代工業的歷程。如果說俄國缺乏馬克思主義規定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那中國的情況就更糟。然而，正是缺乏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這一點，激發了中國共產黨為創造這些條件而進行奮鬥。如果說中國比俄國更落後，那麼，正是意識到這種落後，促使中國共產黨以更大的決心克服落後。正如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沒有站在歷史的進程之外，消極地等待資本主義為革命奠定物質和社會基礎一樣，執政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依賴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產生社會主義或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中國共產黨不得不在此時此地，運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和人力資源，對社會進行改造並創造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兩者必須同時進行。所以，在1953年1月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宣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已經結束，開始社會主義革命階段。1953年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週年之際，政府正式宣佈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雖然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正式的毛主義理論中佔有顯著位置，而且也預示中國將有一個長期的資本主義(或至少是半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但中國革命歷史中的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在僅僅發展了四年後就被突然中止了。無疑，匆忙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持有民粹主義式的敵意，也與他在思想上不接受馬克思主義認為的社會主義以資本主義為先決條件有關。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巨大的實踐問題，而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理論問題，其部份原因可能是他們沒有背上理論包袱，諸如馬克思主義正統理論中關於歷史進程中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問題。但是，他們也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夠建立在貧窮的基礎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文章不斷

強調社會主義要求(即便不以此為必然前提)工業化這個命題，現在毛澤東比任何人都更強調這一點。他當時堅持説，「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強大的工業的發展」，是農業集體化的前提，而後者又是「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的前提。[4]

1953年的時代主題是工業化，第一個五年計劃在本質上是重工業發展計劃。誠然，在開始實行五年計劃的同時，共產黨還宣佈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但重點還是發展現代經濟，而不是社會關係的轉變。「社會主義」在當時意味著逐漸廢除私有制，從1953年到1956年，城市經濟中尚存的私有成分多數都實行了國有化。在農村，還僅限於把合作勞動形式逐步引進以個體農戶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村經濟中。直到1955年下半年，隨著農業集體化運動加快開展，農村的社會關係突然向社會主義方向轉變。但是，至少在整個1955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質還是加緊實現城市工業化，為社會主義建立經濟基礎。中國工業化進程全盤採用了斯大林主義的方式、措施和理論框架。

現在看來，中國人這樣毫無保留地接受蘇聯發展模式似乎不可思議。畢竟，毛澤東長期以來一直提醒套用外國方式解決中國問題的危險性，早在1940年他就寫道：「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5] 中國革命本身，就是毛主義根據中國具體的歷史環境的需要，靈活地運用西方理論和借鑑外國經驗的歷史明證。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自己的奮鬥、通過形成自己的革命戰略、通過拒絕俄國的指揮，才最終贏得政權。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黨內地位的確立，也是沒有聽斯大林意見的結果。然而，雖然中國人不信任斯大林對中國革命的意見，卻基本上毫無保留地接受了他關於革命後的發展戰略。蘇聯為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如何在社會主義政黨領導下實現工業化，提供了唯一的歷史模式，當時的中國人對斯大林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否實現預期的社會目標也沒有任何懷疑。至於蘇聯是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從未引起疑問。雖然中國人除了蘇聯官方的教科書的內容外，對蘇聯知之甚少，但毛澤東在1940年就在文章裏稱俄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49年又宣佈，俄國是「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6] 這已成為中國人的一種信念。毛澤東儘管一直對「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提出批評，但他卻引人注目地把蘇聯發展模

式全盤運用於中國。即使當時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他們沒有、也不敢將自己的意見說出來。

中國所以倒向蘇聯，除了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基本信念外，還有一些直接和實際的原因。中國領導人認為，俄國的經濟技術援助對中國的工業化計劃至關重要。中國幾乎不可能從資本主義國家中得到任何援助，特別是在冷戰年代。他們只能期待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1950年2月，在毛首次（前後兩次）訪問莫斯科期間，兩國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隨後俄國開始了對中國的經濟援助。俄方在條約中同意向中國提供50套重要設施。在由俄國經濟專家管理的工廠裏，要求採用蘇聯的經濟模式和管理組織形式。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行，俄國的援助，更重要的是俄國的技術和中央計劃的經驗，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重要。1953年、1954年和1956年這幾年，雙方又簽署了新的協議，以滿足這些需要。雖然，後來的事實表明，蘇聯的援助比中國希望得要少得多，援助的政治條件又高於中國的預期，但在人民共和國早期的工業發展中，俄國的援助仍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因素。

採用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也與中國對自身國家安全考慮密切相關。早在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很久之前，毛就宣佈，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將必然地「一邊倒」。他在1940年提出這個問題時說：「如果沒有聯俄政策，不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必然同帝國主義國家聯合。」[7] 無論毛主義者在革命戰爭年代在政治上對俄國人多麼不信任，但共產黨中國倒向哪一邊是毫無疑問的。美國人在內戰期間支持蔣介石，特別是美國出兵朝鮮和台灣，都極大地增強了中國在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與蘇聯在政治上結盟的必要，政治上的聯繫又促使中國加大了仿效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力度。

正是毛澤東本人率先號召走蘇聯道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8] 正如列寧曾提倡「向資本主義學習」一樣，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流行口號是「向蘇聯學習」。毛主義者當時相信，他們仿效的是社會主義社會模式，學習的是現代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技術，當時群眾集會喊的口號是「讓我們現代化、蘇維埃化」。

1915–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正是毛的思想逐漸形成的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他們相信，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就是向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科學」與「民主」。現在，中國共產黨人也以同樣的虔誠和熱情，期待俄國教給中國現代技術和現代社會主義。毛主義者對蘇聯模式的期望不久就將破滅，正如40年前青年毛澤東及他的知識分子導師對西方資產階級模式的期待已經破滅一樣。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結果（1953–1957）

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以工業化的高度發展為前提，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裏，有高度集中的強大社會主義國家機器的指引，就能夠實現工業化。根據這樣的思路，1953年1月，中國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列寧和斯大林的理論，社會關係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或毛主義所稱的「無產階級化」，在工業化後會自然而然地實現。中國領導人還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的一般觀點，即工業化要求城市化。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這些問題的爭論展開的。但是在1953年，當中國開始追求「繁榮富強」和社會主義道路時，這些理論觀點都是被作為前提而獲普遍接受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詳細內容直到1955年中旬才公佈——自相矛盾的是，也正在這個時候，毛主義者對這些理論前提產生疑問，但它的總體大綱在1952年秋的黨中央會議上就決定了。[9] 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幾乎是蘇聯1928–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翻版，期望能在工業產量和就業方面獲得與蘇聯相若的發展速度。[10] 在期望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領導人當時認為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毛預期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才能奠定社會主義社會必需的經濟基礎，然後在二十世紀的其餘時間，「建設一個具有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強大國家」。[11]

1952年，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以決定生產目標和指標，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和指標。以後幾年，又陸續成立了各類更加專業化的中央經濟部門，進行計劃與控制的機構，作為對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補充。比起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國的計劃經濟的重心主要放在重

工業的發展上，如鋼鐵、機器製造、燃料、電力、冶金和基礎化學工業等。國家對工業投資只有11.2%用於輕工業(消費產品)，88.8%用於發展重工業。[12] 優先發展重工業有其合理性——1949年前，中國工業經濟總體上十分落後，工業經濟中的現代成分由帝國主義支配，又是以依賴於進口原料的加工業為主，使結構嚴重失衡。[13] 因此，重工業基礎的建立，是消費工業和農業技術現代化發展的前提，但國家對農業經濟的投資量卻是微不足道的。[14]

從1953年到1956年，剩餘的城市私人企業已全部國有化，但農業的社會化被視為一個依賴於城市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漫長過程。李富春說：「要使勞動農民和手工業者徹底擺脱個體的小生產的道路，而轉向一條新的社會主義發展大道，這就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艱苦工作，通過一些必要的過渡形式，才能逐步地完成。」[15]

在致力於發展日本人在東北建立的重工業基地的同時，政府強調必須「積極地進行華北、西北、華中等地新的工業基地〔相對於上海、廣州這樣的通商口岸而言〕，並在西南開始部分的工業建設」。在五年時間裏將建成的限額以上的694個工業建設項目中，有472個分佈在內地。其目的是逐步改變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佈局不平衡的狀況，使新建工業靠近原料生產地和消費、分配地區。[16]

俄國同意提供的156個大型工業項目被中國計劃決策者看成「工業建設計劃的中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樣板。[17] 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熱情洋溢地讚揚蘇聯的慷慨大方，一如他們後來切齒地譴責蘇聯的背信棄義。在當時，最典型的説法是「蘇聯兄弟般的援助」和「最偉大和最崇高的國際主義的表現」。[18]

實際上，蘇聯的財政援助十分有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只佔中國經濟發展總投資的3%。對於同意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俄國人只提供了不超過三分之一的費用。[19]

比較起來，蘇聯的技術和中央計劃經濟的經驗比其財政援助更有意義。俄國人為盡快安裝樣板工廠提供了必要的設備和管理需要的人員(包括培訓中方人員)。此外，蘇聯還提供了建立各類其他工廠和建築項目的詳細設計圖紙和技術信息。1950年代，蘇聯和東歐國家向中國派出了12,000名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六千多名中國學生在蘇聯的各

所大學學習科學技術，七千多名中國工人在蘇聯的現代工廠裏實習。這樣，中國人就不必完全依靠自己薄弱的技術資源。不過，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97%的基本建設投資是中國人民自己籌集的」。[20]

1952–1957年間，中國工業發展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規定的、已經不算低的14.7%。[21] 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實際年增長率為18%，根據西方一些較為保守的估計，增長率在16%。[22] 中國整個工業總產值幾乎翻了一番多。主要工業部門的增長速度更高，例如，鋼材產量從1952年的131萬公噸增加到1957年的448萬公噸，水泥產量從286萬公噸增加到686萬公噸，生鐵產量從190萬公噸增加到590萬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公噸增加到1.3億公噸，發電量從每小時72.6億千瓦增加到193.4億千瓦。[23] 此外，中國第一次生產了數量有限但意義重大的卡車、拖拉機、噴射式飛機和商船。總之，事實說明中國人是蘇聯模式的出色學生，中國在1952–1957年間的工業發展速度遠比蘇聯在1928–1932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發展速度要快。[24]

與此同時，城市工業的就業人數也大量增加。1952年時有約六百萬工人(包括建築工人)，到1957年，產業工人階級的人數達到1000萬人。在五年時間裏，中國的城市人口也從7000萬人增加到約一億人，在北方和西北地區新興的工業化城市裏，人口增長速度更快。1957年，人口超過100萬的城市已有13個，而在1949年時只有五個。

第一個五年計劃為中國提供了重要和穩定的現代工業基礎，雖然與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還很弱小。但是，這種成功付出了社會代價與經濟代價。絕大多數代價是中國農民承擔的，城市的工業化主要是建築在剝奪農村的基礎之上。城市的工業化得到了迅速發展，而農業生產卻停滯不前。根據官方很可能誇大了的數字，1952–1957年間，糧食產量以每年3.7%的速度增長。根據國外的估計，增長速度約為2.7%，勉強趕上2.2%的人口年增長率。然而，城市工業化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村，國家徵收高農業稅，農民被迫以國家規定的低價把大量的糧食出售給國家糧庫。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1950年代的工業化都是傑出的經濟成就，但與歷史上所有的經濟進步一樣，它是建立在社會的某一部份對另一部份的剝奪基礎之上。城市工業化沒有解決長期存

在的城市失業與半失業問題，來自貧困農村地區的數以百萬農民自發湧入發展中的城市，使這個問題更加嚴重。

毛澤東和其他人一樣積極地投入到迅速發展城市工業化的事業之中。但是，在這一工業化的進程中，還沒有出現獨特的「毛主義」發展模式。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發展獨特戰略的「毛主義」還沒有出現在歷史舞台上——只是作為對蘇聯式工業化導致的社會和政治結果的反應，才有了毛主義的獨特發展道路。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政治後果

採用蘇聯工業化模式必然要求採用蘇聯式的政治組織和國家管理形式。集中的經濟計劃要求國家和社會的官僚化和常規化。毛主義對管理簡單化的偏好讓位於複雜的日益專業化機構。革命政黨的幹部轉變成管理者和官僚職員。工廠裏的工人越來越受到工廠管理者的控制。「遊擊隊」多面手的革命觀念，為備受推崇的專業化和技術專家所取代。在新的等級制和新型的社會不平等面前，舊的平均主義觀念徹底破碎。工業化要求嚴格的紀律、社會穩定和經濟理性，這使堅信群眾創造性的革命理念黯然失色。為了直接的經濟發展目標，社會主義目標正被擱置並局部儀式化了。革命者成為官僚統治者的趨勢開始於1949年，但現在這一趨勢成為潮流。計劃經濟的目標日益決定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總體特徵；雖然這裏沒有斯大林主持的工業化過程中的非理性和暴行，但這正是斯大林主義的典型發展。

在國家機關的擴展與集權過程中，特別是在負責現代工業經濟的發展與管理的政府部門的建立過程中，官僚化的表現最為明顯。1952年11月，成立了類似斯大林的國家計劃部門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任國家計委主任是高崗，他是東北地區政治和經濟的沙皇。東北地區是受蘇聯影響最大的地區，也是最普遍採用蘇聯政治和經濟方式的地區。1954年，新成立的國務院作為中央政府的主要機關，取代了原來的政務院，正式建立了官僚化的集中體制。國務院的權力，也即是國家權力，集中在它的常務委員會手中，常委會的成員幾乎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統轄和指導著一大批處理經濟事務的的專門機

構，包括各種各樣臨時的或常設的委員會(如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科學技術委員會等)，以及許多中央經濟部門。數量最多、權力最大的部門都是與重工業發展相關的部門，例如，單論負責機器製造業就有六個獨立的部門。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另一個政治結果是1954年成立的國家監察部權力的擴張。監察系統官僚機構遍及各地，它的職能是監察工業經濟部門中的低效益和腐敗現象，防止地方偏離國家經濟的指導和指標。它與秘密警察機構密切合作，與蘇聯情況相似，秘密警察的權力隨著國家監察部權力的增長而增長。但是，在羅瑞卿任部長的公安部領導下的秘密警察，從未有斯大林俄國秘密警察那樣大的恐怖權力。然而，1950年代中期在中國開始出現的總體政治結構，越來越類似於蘇聯中央集權制下的「垂直」官僚統治形式，恰如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十分相似一樣。

隨著正式的國家官僚機構的規模和權力不斷增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威和意識形態權威開始削弱，黨的作用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採用蘇聯「一長制」的工礦企業中，這種聲勢十分明顯，雖然除東北地區外，一長制的採用都沒有達到蘇聯那種極端和狂熱的程度。大工業的迅速發展和有效經營，要求有高度專業化的分工體制和建立在技術專長標準基礎上的責任制。適應這種需要的關鍵是有一個專業的、職責和權限明確的工廠廠長，他負責貫徹來自上面中央政府的指令，有能力在自己作主的企業中完成這種指令。「廠長負責制體系」的需要是蘇聯時代特徵的反映，列寧的話賦予了這一制度以合理性：「任何大工業 —— 它是社會主義的物質源泉和生產基礎 —— 必須無條件地具備能夠指揮數百人、數千人甚至於數百萬人的嚴格的統一意志。但是，如何才能保證意志的統一？只有成千上萬的人的意志服從於一個人意志。」[26] 採用蘇聯的管理體制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邏輯結果，它反過來加強了國家和社會的官僚化，因為「一長制」建成了一條從北京的中央政府到最基層的各個企業的指揮鏈。

這種體制對工廠黨組織的作用和在工廠工作的工人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如弗朗斯・舒爾曼 (Franz Schurmann) 指出的：

> 在1950年代初期，中國人借鑑蘇聯的經驗，賦予廠長們以極大的權力。黨的作用只限於思想上的領導。在管理體制中，一級服從一級。工人必須服從管理者的指揮……人們認為，一長制下的工廠，就是在權威的廠長的指揮下，對工人進行冷酷的理性管理。[27]

職業化的工廠廠長主要是從1949年前的技術知識分子中選拔的，因為很少黨員具備必要的經濟工作經驗。那些具備這些技術專長的黨員首先是一個企業管理者，然後才是黨的領導者。工廠廠長主要對中央政府各部的經濟指令負責，工廠黨組織對廠長的政治制約力越來越小。地方黨的官員和幹部也沒有能力向廠長的權威挑戰，他們也要向上級黨組織負責，最終同樣是向管理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黨的領導人負責。雖然反復強調廠長要在「黨的思想領導」下工作，但這種要求只是流於形式。畢竟，廠長的權威是黨給的，黨在當時的指導思想是以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目標為中心。

對於工人來說，工業化進程意味著服從越來越嚴格的各項勞動紀律，它還在工人隊伍中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工資差別和地位差別。比較熟練的工人被任命為車間和小組的負責人，成為監督從前夥伴的監工。工資政策也越來越強調物質刺激，給熟練工、有專長的或效率高的工人發放獎金。1956年的「工資改革」集中體現了這種趨勢。根據技術熟練程度和效率確定工資標準，工人間工資差別更加懸殊。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前，工會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還有一定的自主權，但是到了1950年代中期，工會成為貫徹國家政策、提高工人勞動生產率的工具。當然，城市工人的政治地位從一開始就是模糊不清的，在一個從農業革命中誕生的社會裏，情況必然如此，因為工人在革命中無所作為。1950年代中期，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無產階級的數量和在社會經濟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無產階級與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卻變得更加模糊。雖然工業化給工人帶來了經濟和物質上的利益，但實現工業化的方式使工人對自己工廠事務的發言權，較之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小。獨斷的管理體制使工人管理工廠的社會主義原則成為空想，政治生活的普遍官僚化又進一步使工人遠離政治權力的中心，遠離在

理論上是由他們「領導」的國家，遠離在理論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

黨的社會成份和吸收黨員的方式也說明了這一點，雖然這類數字說明不了真正的政治權力槓桿置於何處及由誰操縱。1949年，針對黨員基本上都是由農民組成的情況，黨的領導人強調要大力吸收城市無產階級成員入黨。但是，使「無產階級的政黨」成為真正無產階級政黨的努力，似乎湊效不大。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的1957年，被官方認可是工人的黨員勉強佔黨員總數的13%。知識分子的黨員數量遠遠超過工人黨員數量，發展知識分子入黨的步伐也較發展工人更快。自從1949年後，黨員的總數翻了四倍，從300萬發展到1270萬，但多數新黨員都來自農村。[28]此外，1950年代中期發展黨員的重點，是那些已經在社會經濟領域處於重要崗位的人，以提高黨的影響力。在黨員發展上，優先考慮的是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在同樣條件下，熟練工人比非熟練工人優先入黨。

比社會組成成份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正在轉變成一個官僚組織，革命精神逐漸褪化。在1950年代中期，這種趨勢主要表現在黨的幹部性質和作用的變化。「幹部」這個詞，狹義地說，是指在一個組織內擔任領導的負責人。在實際生活中，它是指在黨的組織，或在黨領導的機構及群眾組織中擔任領導工作的中共黨員。在革命戰爭年代，幹部這個概念包含著比革命領導者更廣泛的含義。理想地說，幹部是無私的人，具有正確的革命價值觀，能獻身於革命目標；他是一個「多面手」，有能力從事各種不同的工作，能迅速地使自己適應變化了的形勢和要求；他「又紅又專」，但首先是在政治和思想上「紅」，其次才是「專」；他忠誠地執行黨的政策，但又能獨立地、創造性地工作；他遵守黨組織的紀律，但又密切聯繫群眾，像毛澤東說的那樣，幹部「既是群眾的先生，又是群眾的學生」，實際上，在當群眾的先生前必須先當群眾的學生。理想的幹部與那些「在辦公桌打盹」的官僚或是在桌子後發號施令的官員截然不同。共產黨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這樣一個事實：他們擁有一大批基本符合毛理想的革命領導人標準的黨員幹部。這些黨員幹部是一批獻身於革命目標和革命理想的人，他們不是為了度假或是謀一份職業才投身革命。

在革命者成為統治者的1949年後，幹部的現實(且不論幹部的理想標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在新國家機構中任職的幹部，不得不承擔政治和經濟管理中更為具體的任務，新的職務要求他們具備專業知識。在革命環境下曾是群眾領導的黨的幹部，正在成為統治群眾的國家管理者——而且主要是在辦公桌上管理，這進一步加深了新管理精英與被管理的群眾間的隔閡。1949年前，黨吸引和吸收的是革命者；1949年後，黨吸引的是那些把黨員身份當成在政府中進身之階的人。此外，1949年後，越來越多的具有管理和經濟工作經驗的人進入日益膨脹的政府部門，變成了幹部，他們後來所以被吸收入黨，主要是因為他們在新的國家機構中的領導位置，他們的政治信仰反在其次。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受工業化職業規範和價值觀影響的「新幹部」，使那些堅持樸素價值觀和革命英雄主義理想的「老革命」相形見絀。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技術員、工程師亦取代了革命者成為新的社會楷模，「新」「老」幹部之間的衝突和矛盾日益加劇。「老革命」曾批評，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官僚化是對革命傳統的否定，有悖於社會主義理想。政府部門官員則批評老幹部的「農村習氣」和「遊擊作風」不能適應工業化發展要求的合理分工和職責。老幹部來自於革命戰爭環境，在生活和工作方式上，他們習慣了艱苦樸素和平均主義的價值觀念。在人民共和國初期，他們享受的生活待遇比較平均，政府給他們提供住房、食物和基本生活必須的一小筆津貼。然而，到1955年，幹部級別被分成了26級，相應地每月工資也從30元到560元(12美元到224元)不等。至少在城市中，工資主要是根據幹部在工業化進程中作用的大小來決定級別的。官方為新的、不平等的薪制解釋的理論是，中國還不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還是處於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這就要求實行按勞分配，不能搞按需分配。那些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老革命幹部被說成是鼓吹「絕對平均主義」的異端。

黨和幹部的官僚化順應了時代的普遍趨勢，是追求現代工業化過程中的產物，它的主要特徵是對現代科學和專業技術化力量的信仰。「合理化」、「系統化」和「制度化」是當時流行的口號，反映了傅高義說的「與打遊擊思想分道揚鑣」。[29]實際上，也是對毛主義革命遺產的變

相否定。在工業化進程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宣佈的目標逐漸變成儀式化的東西。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的宣傳和信仰依然如舊，但是，真正的行動目標是迅速發展工業，真正起作用的價值觀是最有助於工業化的價值觀 —— 經濟理性與管理效率的價值觀。

高崗事件

雖然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也願意採用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他們決不能容忍蘇聯利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獲得對中國政治上的支配。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了防止莫斯科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攫取革命勝利的果實，他們曾進行了長期的艱苦鬥爭。隱藏在人民共和國史上第一次黨內政治清洗背後的，正是這種擔憂 —— 它是中蘇關係未來發展的一個預兆。1953–1954年政治清洗的主要受害者是東北黨政領導人高崗。雖然當時沒有明言，但清洗的主要原因是蘇聯對東北的政治影響。

在革命戰爭年代，高崗對毛主義的信念顯然是無懈可擊的。1930年代初期，作為中國西北農民遊擊隊的領導人，高崗是陝北紅軍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1935年底，毛帶領紅軍長征的幸存者到達陝北根據地。在戰爭年代，他與毛密切合作，鞏固對黨的控制。在延安時，他是中央西北局書記。1945年抗戰勝利後，內戰爆發，他與林彪的部隊一起被派到東北，成為東北地區黨政領導人。他同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1952年，他被任命為新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因而負責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貫徹實施。

高崗在政治上的垮台和他的追隨者被清除出黨外一事，是在195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並於1954年2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認可。高崗被指控在東北地區搞「獨立王國」(也就是說，獨立於北京的政府)，並且密謀奪取國家政權。據說高崗以自殺作為對這些指控的回答。直到一年多後，即1955年3月，這次清洗才正式向人民公佈，反映出人民共和國把政治決定作為機密來處理。

公佈的情況裏絲毫沒有提及對高崗的東北「獨立王國」所象徵的蘇聯政治滲透的擔憂。雖然幾乎沒有什麼證據證明高崗陰謀奪取國家政

權這一模糊指控，但確有大量事實證明，高崗與俄國人有密切的政治關係。蘇聯人在戰後對東北地區軍事佔領雖然早已結束，但依然對東北施加重要的影響。在蘇軍佔領期間，他們把東北地區的大量工業設備作為「戰利品」運送回國。後來蘇聯幫助恢復了東北的重工業基地。蘇聯控制著1950年建立的中蘇合資木材公司，繼續控制著中國東部鐵路(及其下屬經濟企業)和大連港和旅順港。直到斯大林去世和高崗被清除後的1955年，中國才收回了控制權。在高崗統治東北時期，蘇聯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一直在東北處於支配地位。據説高崗早在1945年就曾帶著使命訪問過蘇聯。[30] 1949年7月，他又以東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去了莫斯科，與蘇聯就一項經濟協議問題進行談判，這比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正式成立及1950年2月毛與斯大林的談判，還要早了幾個月。此外，高崗最積極地提倡採用蘇聯工業組織模式，這些模式在東北地區、也即中國的重工業中心引進得最早，也採用得更為徹底。

高崗事件的部分事實正像官方所公佈的那樣，地方向中央政府要求自治權，這是中央政府難以容忍的。但是，高崗的東北「獨立王國」與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影響有密切關係，在歷史上，東北地區一直是蘇聯向東亞地區擴張的關鍵目標。北京控制東北地區，就意味著排除俄國人的控制。在斯大林去世後不久高崗便被清洗，這不完全是巧合。正是斯大林之後蘇聯領導人明顯的軟弱，才使北京有信心清除高崗，清除蘇聯在東北的影響。北京的舉動使兩國關係有了暫時的改善，兩國關係比過去平等一些，其標誌就是1954年下半年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訪問北京以及蘇聯同意放棄他們在東北的地位。

高崗的垮台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上難解的事件之一。不過，毫無疑問的是，毛把東北的前沙皇當作斯大林在中國的主要代表看待。高崗事件發生幾年後，在一次秘密談話中，毛在尖鋭地批評蘇聯在過去幾十年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時説，「斯大林很欣賞高崗，還送他一輛汽車，高崗每年8月15日都給斯大林發電報。」(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向蘇聯投降的日子*)毛還談到，東北和新疆是斯大林時期蘇聯在人民共和國的兩個「殖民地」。[31]

* 意為感謝蘇聯解放中國東北——編者按。

繼高崗後，負責上海地區(中共華中局)黨政事務的饒漱石也被清洗。饒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時的委員之一。饒和高崗一樣，也被指控為經營「獨立王國」，與高崗結成聯盟陰謀篡黨奪權。沒有證據表明饒漱石與蘇聯有聯繫或有親蘇傾向。他和高崗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控制著中國兩個主要的工業中心：東北和上海。為什麼兩人結成了後來被譴責的「高饒反黨陰謀集團」，至今仍是一個謎，如同被指控的陰謀的性質一樣令人不解。

肅反運動

1955年3月的黨中央全會還決定開展一場普遍的、大規模的官僚清洗運動，即肅反運動，或者叫「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這場運動一直進行到1956年上半年。在高崗事件之後，「暗藏」一詞具有不祥的含義。如果連高崗、饒漱石這樣身居要職的人都是反革命陰謀分子，那任何人都可能是懷疑對象。與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不同，肅反運動主要是肅清「偽裝成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反動分子的黨內運動。受到懷疑的黨的幹部被拘留審查，與過去採取的「整風」運動方式相似，被審查者要對自己過去和現在的政治觀點和政治聯繫作出書面或口頭的詳細「交待」。1955年下半年，約有十五萬名黨政幹部受到審查，恐懼的氣氛籠罩著官僚機關。成千上萬名被認為持有「錯誤觀點」的人，被帶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送往「勞動改造」營，通常都不經過司法程序，而是由行政命令決定。到1956年中期，多數人獲得釋放，官復原職，官方一般就對他們的錯誤指控進行道歉。

肅反運動的部份目標是清除被懷疑為高崗、饒漱石集團成員的人。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恢復黨中央對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成立經濟、政治官僚機構的控制。由親蘇的專業人士控制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權力被大幅度削弱，工廠企業中廠長的權力也受到限制。建立了黨對各種經濟管理機構，特別是國家監察部門的嚴密監督機制。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黨對監察部門的監督意義深遠。肅反運動的許多做法與斯大林對官僚機構的清洗有相似之處，但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肅反運動縮小而不是加強了日益膨脹的秘密警察的權力和獨立性。正如

後來官方解釋的：「(肅反)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加強黨對公安工作的領導，把公安機關置於黨的領導之下。」[32]

肅反運動雖然聲勢浩大，但對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官僚主義痼疾卻用處不大。解決官僚問題的唯一社會主義藥方是由人民群眾控制官僚統治機構，而肅反運動的目的顯然不在於此。毛長期以來深惡痛絕的官僚弊端仍然如故，而且還在發展——在毛領導的共產黨內部發展。

1955年，在知識分子中開展的肅反運動火藥味更足，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內官僚權力正不斷增長。在知識分子中進行肅反的先兆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評論家胡風的批判運動。胡風是著名思想家魯迅的追隨者，長期以來，他對共產黨官方文藝政策和黨對作家、藝術家的干涉直言不諱地提出意見。他是左翼文學運動時期最著名的非黨內人士之一。他與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家的爭論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中期。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風認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對黨的政策也表示贊成，但繼續反對用政治來窒息藝術和文化的創造性，警告說這樣會造成「文化沙漠」。因此，就像自1930年代後期一樣，他因為「主觀主義」和背離毛主義文藝原則的「資產階級」傾向繼續受到批判。他在左翼運動時的主要對手周揚，現在是牢牢掌握黨的文藝和文化事務大權的沙皇。

1949年後，胡風的著作很難出版，他的許多支持者也成為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和後來的「文學改造」運動的受害者。但他本人依然被視為一個革命作家來對待，他的錯誤思想也被認為可以通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改正過來。的確，在1953年知識分子相對比較自由的短暫時期裏，胡風被任命為中國作家協會的執行理事。感受到這種寬鬆自由氣氛來臨的胡風很是樂觀，1954年7月，他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批評黨在文藝界的官僚限制文藝的發展，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作才能的自由。但到同年底，對這份報告的公開討論變成對胡風進行批判的全國性運動。胡風被當成資產階級思想的典型代表。先是他的老對手周揚領導批胡風運動，在周恩來公開譴責胡風後，全黨都投入了對胡風的批判。1955年春季肅反運動開始後，胡風問題又升了級，從思想上的異端成了政治上的顛覆分子，據說是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特務。同年7月，他被當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

胡風從歷史舞台消失後，反對「胡風主義」的運動繼續進行，運動的真正目的是加強對知識分子思想上的控制。運動使持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沉默的同時，也引起了知識分子對黨產生了深深的不滿情緒。

社會後果

既然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採用的基本上是蘇聯模式的，那麼產生相似的社會後果也就不足為奇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最重要的社會後果是出現了新型的不平等。

迅速的工業發展，或至少是工業迅速發展採用的模式，必然導致兩類新官僚精英(雖然仍處於萌芽時期)的出現，他們在其各自擅長的領域裏掌握著越來越大的權力。一類是政治精英，是由迅速成為管理者和職業官員的黨的領導和幹部組成，分佈在控制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擴大的國家機關中。另一類是技術精英，是由工程師、科學家和廠長組成，他們負責日益擴展的現代經濟組織的經營。這兩類新的社會集團主要為職業和專業規範所支配，馬克思主義目標和共產主義價值觀對他們作用不大。地位、權力和物質利益的差別，使他們越來越脫離工人和農民。[33]

對工人來說，第一個五年計劃造成了壓抑日重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不管工廠是由職業化的廠長管理，還是由作為管理者的黨的幹部來管理，工人都不得不服從提高生產率所要求的越來越嚴格的勞動紀律。他們不但必須在工作單位服從強制性的管理，而且還要在居住地接受居民委員會的類似管理。此外，由於建立在勞動技能和生產率基礎上的工資和獎金的差異越來越大，工人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不平等現象。

不平等的現象突出地表現在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上。城市的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農村進行剝奪的基礎上。城市的物質條件得到了改善，但農村經濟卻基本上停滯不前，因此，現代化的城市和落後的農村之間的經濟與文化差別越來越大。

深受蘇聯方式和課程影響的新教育體制，也進一步強化了社會不

平等和社會分化的趨勢。正規教育的發展給人印象至深。1949–1957年間，小學生的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從大約2600萬人增加到6400萬人）。大學入學人數翻了兩番，從11.7萬人增加到44.1萬人。城市人口在新教育機會的受益遠遠超過農村人口的受益。雖然官方的教育政策是優先工農子女入學，但中學和大學的入學考試制度還是有利於特權階層的子女，即出身於舊的資產階級、黨政高級幹部、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家庭的子女。為了適應工業化的需要，總的教育制度、特別是大學教育制度，首要的重點是理工科。與蘇聯的教育制度相似，中國高等教育的功能是不斷製造出享有特權的技術知識分子。

在1953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同時，政府還宣佈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開始。雖然發展現代經濟和工業的目標十分明確，但社會主義的含義則越來越含混。中國社會似乎是遠離而不是接近革命曾許諾的那個社會主義前景。工業化的結果是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離越來越明顯。新出現的社會精英承擔了新出現的工業制度需要的複雜勞動。在日益官僚化的黨的領導下的國家機器更加強大、更具壓制性。現代工業發展曾被認為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工業化本身成了首要目標，社會主義目標被推到了更遙遠的未來。

毛與「毛主義」很快被迫面對第一個五年計劃造成的手段與目標的兩難困境。正如毛主義革命是在農村誕生和發展一樣，毛主義者再次把目光轉向農村，從農村復興社會主義目標和衰退的革命精神。

註釋

1. 馬克思，《資本論》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2. 有關馬克思對俄國民粹派的看法及民粹派對他的影響，請看瓦利基（A. Walicki）在《關於資本主義的論爭》（*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一書頁179–194中饒有趣味的分析。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給查蘇利奇（Vera Zasulich）的信中提出，傳統的農村公社有可能成為俄國社會新生的基礎。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頁166。
3. 在1882年《資本論》俄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指出，只有在俄國革命成為西

歐國家無產階級革命的「信號」(signal) 時，前資本主義的公社才有可能成為社會主義發展的「起步點」(starting point)。

4. 《毛澤東選集》，頁1366。
5. 前揭書，頁667。
6. 前揭書，頁628、1370。
7. 前揭書，頁651。在取得政權後，毛用更明確的語言闡述了這一點：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前揭書，頁1362) 在當時的情況下，社會主義一邊當然是指蘇聯。(前揭書，頁1370)
8. 〈論人民民主專政〉。前揭書，頁1357。
9. 1953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公佈了這個計劃的主要內容。在後來兩年裏，可能又對計劃的具體內容作了一些修改。計劃於1955年7月5–6日，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提交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參見李富春，〈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
10. 根據官方數字，在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產量以每年約18%的速度增長，產業工人的人數由300萬增加到800萬。有關中國人為什麼相信他們能夠達到俄國的發展速度，參見克裏斯托弗・豪 (Christopher Howe)，《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1949–1957》(*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102–104。
11. 李富春，〈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
12. 前揭文。根據李卓敏的計算，1953–1957年間實際用於重工業的投資佔87%，用於輕工業的投資為13%。參見李卓敏 (Li Choh-ming)，《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1960年1–3月)，頁40。
13. 前揭文。
14.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用於發展的總投資中只有8%用於農業、森林和水利。(數字引自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執行情況公報》，1959年)。
15. 李富春，〈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

16. 前揭文。
17. 前揭文。
18. 前揭文。
19. 李卓敏，〈經濟發展〉，《中國季刊》，第29期（1949年1–3月），頁38。
20. 前揭文，頁39。
21. 李富春，〈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在1952年的初稿中，規定的增長速度還要高，但由於初稿從未公佈過，所以無從知曉具體數字。不過據報道說，對數字的修訂分別是在1953年和1955年。
22. 關於中國政府公佈的數字，參見《偉大的十年》(*Ten Great Year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0)。關於西方經濟學家公認的數字，參見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編：《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23. 參見理查曼，《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社會》，頁636–637，圖表7–12。
24. 蘇聯官方宣佈的數字是年增長率為18.5%，但多數西方專家估計年增長率約為12%。
25. 參見克裏斯托弗・豪，《中國城市的就業和經濟增長1949–1957》中表8與表9。
26. 天津《大公報》，1953年12月31日。引文轉引自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255。有關這一複雜問題的詳盡分析，參見本書第13–17章。
27. 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256。
28. 前揭書，頁128–139。在1272萬黨員中，官方確定為工人黨員的有174萬名，知識分子黨員188萬，農民黨員850萬。「其他類別」60萬，主要是軍人。黨員人數佔總人口的2.5%，是當時所有共產黨國家中比例最低的。
29. 傅高義，《共產黨統治下的廣東》，頁127–128。有關幹部向官員轉化的分析，參閱〈革命者到半官僚：幹部「正規化」的過程〉("From Revolutionary to Semi-bureaucrat: The 'Regularisation' of Cadres")，《中國季刊》，第29期(1949年1–3月)，頁36–60。
30. 根據蘇聯的材料，1945年，高崗和劉少奇去蘇聯討論與蘇軍佔領東北相關的事宜，此後，高崗的西北局與蘇聯共產黨一直保持接觸。參見哈里

森 (James Harrison)，《通向權力的長征》(*The Long March to Power*, New York: Praeger, 1972)，頁376。

31. 參見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32. 何幹之 (Ho Kan-chih)，《中國現代革命史》(1958年)。轉引自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344。
33. 1950年代中期，級別高的工廠廠長和工程師的月薪達到280元，工人的平均工資是65元。此外，還為技術與管理精英中的上層成員提供更好的住房和帶薪假期，他們一般都有傭人。1956年初的工資改革認可和加大了工資差別。

第九章

農業集體化
1953–1957

1953年，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完成，中國基本上成為一個個體農戶所有制的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每家農戶都擁有大致同等的土地、自給自足的傳統中國農民的理想制度，卻是由當代共產黨國家一手建立的。中國漫長歷史上的傳統理想，在短短幾年內就可以真正實現。

人數最多的貧農與為數不少的「中農」和少數「富農」之間依然存在著社會經濟差別，但在擁有的土地數量和收入方面，差別則相對較小。事實上，現在每個農民都有一份地契，他們不用再擔心地主、典當鋪老闆、高利貸主、攤派非法苛捐雜稅的官僚、無異強盜的軍閥部隊和土匪的掠奪。這種社會接近於歷史上任何社會都想實現的「農民烏托邦」社會，即在一個相對平均的理想社會裏，絕大多數家庭都能擁有自己的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相對安全地耕作。從社會和經濟的角度來看，人民共和國在這一個時期裏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社會的樂園。

絕大多數農民都深深地依附於自己的土地，傳統的勞作習慣、宗教活動和社會價值觀強化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土地改革的絕大多數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勞動能給他們帶來相對富裕的生活。

然而，土地改革後農村的情況並沒有給農村帶來繁榮，也制約著國家現代經濟的發展。分散的土地和經營方式不利於採用更有效的勞動模式和現代農業技術，嚴重妨礙了生產率的提高。1953年和1954年的糧食產量勉強與人口增長率持平。此外，農民承受著高額的國家農業稅負擔，還必須以國家規定的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倉庫。國家雖然

從農業經濟徵收了大量資金用於城市工業化發展，但對農業投入的資金卻少得可憐。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還不到投資總額的10%。

除了1953年和1954年農業歉收外，農村還存在著許多其他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土地改革剛剛結束，農村就出現了傳統的高利貸活動。富裕的和生產率較高的農民開始向貧窮的、生產率低的農民放債。在一些情況下，債務人被迫將自己的土地出售給債權人。[1] 如果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農村經濟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傳統的剝削形式，舊的社會經濟差別模式就會重現。

由於農村經濟停滯不前，大批農民流入城市。一些農民是為了在工廠找工作，但大多數人是因為農村糧食短缺才流入城市。這種情況加劇了城市已經十分嚴重的失業與半失業問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城市人口的增長率遠遠超過了就業率的增長，部分原因是由於計劃制定者過高地估計了新的工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朝鮮停戰協議簽訂後，大量軍人於1954–1955年復員轉業到地方，也增加了就業問題的嚴重性。

共產黨從來沒有設想過單靠土地改革就能使農業生產實現必要的經濟革命，或在農村產生理想的社會組織。他們從一開始就把土地改革當成通向農業集體化道路中一個不可逾越的過渡階段。但是，他們認為從個體農戶所有制到集體農業所有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經過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組織互助組，互助組由六戶或以上的農戶組成，土地仍為個體所有，但他們在農業勞動中互相幫助；開始時這只是一個季節性組織，然後發展為長年組織；互助組的作用是擴大勞動單位，培養集體勞動的模式。第二個階段，互助組合併成「半社會主義的」或「初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雖然還是私有，但土地的經營耕作由集體進行；各個農戶收成或收益的分配，部分是按照各農戶的出工情況，部分根據他們交付給集體耕作的土地數量。在第三階段，「初級」農業合作社最終合併為「高級」的或「先進」的農業合作社，也即是集體化。「高級」農業合作社將廢除土地私有制，按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向社員分配勞動產品。

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的形成完全是自願的——至少這是官方的

政策，加入了互助組或合作社的農民可以自由退出。[2] 農村中黨的幹部被告誡只能使用說服的方法。政府鼓勵農村幹部建立互助組和合作社的模範樣板，提醒他們不要採用「命令主義」方式。黨的領導人十分了解農民對自己土地的依附性，所以當時黨的各種文件都反覆強調，對群眾進行長期的教育是實現社會主義轉變的前提。此外，總的設想是，農業社會化要求採用現代機械化工具和現代技術，這只有工業化才能提供。毛和其他領導人一樣，認為起碼需要三個五年計劃才能實現工業化。因此，農業集體化也是一個相當長的目標。那些要求盡快向集體化過渡的幹部，也因鼓吹「空想農村社會主義」受到批評。1953年2月，中共中央就這一問題總結說：「在我國現在的經濟條件下，農民的個體經濟在很大程度上還將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3]

對社會變革採取這種漸進和謹慎的方式，與毛澤東在1949年的觀點完全一致，即現代工業化是農業社會化的前提。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不同意黨在1953年採取的政策。直到兩年後，毛才成為「空想農村社會主義」的最熱心的提倡者。

第一個五年計劃關於農業發展的規定體現了這種循序漸進的方針。第一個五年計劃宣佈的穩健目標是，到1957年底，全國有三分之一的農戶將被組織在初級農業合作社中。計劃絲毫沒有提及建立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合作社。農村社會變革按照預定的步伐進行。到1955年中期，約有15% 的農民參加了初級社。但是，小農經濟產生的問題比預期的要嚴重得多。第一個五年計劃設想農業和農副產品產量以每年23% 的速度增長，[4] 而1953年和1954年的農業產量沒有達到這個目標。由於工業化依賴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更準確地說，依賴於從農村獲得剩餘產品以用於城市的投資。農業經濟停滯不前威脅著工業化計劃，造成農民經濟上的困苦。[5] 1954年中期關於禁止農民在自由市場上出售餘糧的決定，加劇了農民的困境。此後，農民除卻自己消費的部分外，其餘糧食都要 (以低價) 賣給國家。許多農民的收入因此而減少。由於1955年初糧食短缺，農民大量種植糧食作物，減少了經濟作物的面積，使收入進一步下降 (並威脅到工業化計劃)。後來，周恩來謹慎地承認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要求給農民造成嚴重的困苦：「在1954

年，由於我們沒有完全弄清楚全國糧食產量的情況，向農民多購了一些糧食，引起了一部分農民的不滿。」[6]

長期以來對「農民的個人主義」十分敏感的黨的領導人認識到，土地改革強化了農民對自己土地的依附性。因此，他們一直堅持農業集體化只能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要建立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重要的是通過向農民證明合作化將會增加農業產量和農民收入。共產黨決心不脱離農民階級，因為正是在農民的支持下，中國革命才取得勝利。但是，在1955年初，共產黨認為，農民的個人主義不但阻礙了農村的社會變革，也妨礙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停滯的農業經濟威脅著工業化，對新國家內部的政治穩定、外部安全和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目標都構成威脅。

除了農業生產外，農村社會的方向問題也引起黨的擔憂。毛在1955年中期抱怨説：「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農民力求把自己變為中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間走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7] 土地改革保留了「四大自由」，即買賣和出租土地自由、僱工自由、借貸資金自由和在自由市場上進行貿易的自由。黨的領導人越來越擔心這些自由會產生富農階級，使傳統農村社會的階級分化再度出現。

農村個人主義的另一種表現，是黨的農村幹部受到小資產階級「農民意識」的腐蝕。土地改革運動結束後，許多擔任運動領導人的農村幹部從政治積極分子變成只關心自己的土地和家庭福利的人。由於農村幹部本身就是農民，這種現象反映了他們內心的願望和農民對美好社會的設想，在某種情況下，也反映了他們對新國家把力量投入城市工業化，卻忽視曾是革命源泉的農村地區的不滿。還有一些農村幹部抱怨説：在政治重心移向充滿活力的城市後，他們卻不得不依然留在農村的窮鄉僻壤。許多農村幹部對黨的社會主義目標只有模糊的了解，認為自己的政治作用就是在新的和平穩定時期裏，代表一般農民想成為富農的願望。正如黨的領導人批評説的：「我們一些同志對待農民問題的看法卻還停留在老階段上……他們滿足於農民已經從地主手

裏取得了土地，希望穩定農村的現狀……而不了解這就會……放任農村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8]

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黨自己造成的。隨著黨的工作重點轉向城市工業化，共產黨滿足於通過正式的國家機關，即通過鄉政府和鄉屬公安機關去治理農村，這當然足以適應國家對農村的政治控制、收取農業稅和從農民手中強制購糧等直接需要。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發展受到忽視，農村幹部遭到冷落，他們在社會運動中已不再是先鋒，轉而經營自己的私利。

新土地革命

黨的領導人最初設想，農民的互助組組織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逐步發展，足以限制農村中自發的資本主義勢力，並提高農業生產率。他們相信，通過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勞動力和農具，農業產量就會增長，農民也會被合作化的優越性吸引，小農意識也會逐漸被克服。

農業的合作勞動在中國傳統中就存在，共產黨在早期也曾組織過農民合作勞動。在歷史上，合作勞動是農民的一種普遍實踐，特別是那些僱不起勞力的農民，在播種和收穫季節相互交換勞力，但合作通常只限於少數家庭，一般以血緣關係為基礎。在戰爭年代的根據地裏，共產黨也把農民組織起來互助勞動，也嘗試過合作社的形式。[9]

從數量上看，1949年後合作化運動的發展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農民是在自願的基礎上加入合作化組織的。在每個地區，一旦完成了土地分配，個體農戶就被組織進了互助組。與傳統的勞動合作形式不同，新的互助組成員更多（由6戶到20戶、甚至由更多的農戶組成），也不再依血緣關係組成，而且很快就由季節性的安排變成長年性的組織。此外，長年互助組的成員還在集體的基礎上從事副業生產。到1952年底，有40% 的農戶加入了互助組。1955年初，加入互助組的農戶增加到65%。土地改革完成得較早的北京地區加入互助組的比例要更高，而華中、華南地區的比例要低一些。雖然在1955年初只有15% 的農戶加入了「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但這符合當時實行的循序漸進政策。

然而，互助組和合作社的發展遇到了許多困難。經過多年的戰亂和鬥爭歲月，渴望回到正常生活的情緒支配著這個時代，革命年代和土地改革運動時期的熱情逐漸消逝。新聞報導埋怨說，互助組常常是個流於形式的組織。擁有更多土地和更好農作技術的富裕中農經常拒絕與貧農合作。有時中農和富農把持著新成立的互助組，損害貧農的利益。雖然互助組和合作社有利於國家徵稅徵糧，但沒有提高農業生產率。1953年和1954年農業連續歉收。幾乎沒有什麼跡象表明，「初級」農業合作社能在預期的「兩、三年內」達到使農業生產量提高30%–50%的目標。[10]

1954年底，儘管多數農民都被組織進各種形式的合作勞動的組織中，在經濟上相互依賴，但這並沒有阻止住農村兩極分化的趨勢。問題歸因於個體農戶所有制和與之相應的小農意識。報刊文章和黨的報告開始經常引用列寧的名言：「小生產經常地、無時無刻地、自然地和大量地產生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

農村經濟的停滯不前威脅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發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作為對毛提出的「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論斷的反應，北京再次把注意力放到了農村。1954年3月召開的黨的工作會議制定了在農村地區重振黨組織的計劃，5月的中央會議正式作出了加快農業合作化進程的決定。

在1954年10月和1955年5月兩次黨的會議之間，無論是在基層農村還是在黨的領導層的秘密會議上，都發生了一些至今尚為人鮮知的事件。根據毛澤東後來的說法，1954年10月會議決定把「初級」合作社的數量增加五倍，從10萬個發展到60萬個。根據他的說法，這個指標已在1955年6月完成，共成立了65萬個合作社，中國1.1億農戶中有1690萬戶加入了合作社。[11] 不過，各方面對加快發展農業合作化在政治上也出現不同意見。1955年3月，國務院下令停止進一步發展合作社，而五月政治局會議又決定繼續發展，但提出步子要放慢一些，即在今後一年半中只新增40萬個合作社；毛對此不滿，兩個月後，他以戲劇性的方式推翻了這個決定。

中國共產黨的內部歷史為秘密所籠罩。由於沒有公開的論爭，也就不可能十分準確地再現1955年前後圍繞著新農業政策發生的政治事

件和理論爭執。從現有材料來看，1955年初，黨的領導層基本達成了共識——但不包括毛澤東在內。中央委員會的絕大多數成員認為，要確保工業化的經濟需要，就必須加速農業合作化的步伐。確實，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但他們同時也認為，應當以有序和漸進的方式來建立合作社，以防影響農業生產的發展。此外，合作社仍然是「初級」的或半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他們總的思路是，高度的技術發展和農業生產機械化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合作社的根本前提，這只能在未來實現。

蘇聯農業集體化的經濟對中國共產黨在制定農業政策方面有重要的影響。他們從蘇聯經驗中總結出兩項教訓，一項是長期推遲農業集體化的實現會導致農村的階級分化，強化農村有優勢地位的富裕農民階級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抗。另一項教訓也是最深刻的教訓就是自上而下地快速推進集體化，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中國領導人對1930年代初期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農業集體化造成的流血動盪記憶猶新，1000萬農民被害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大片土地荒蕪，牲畜被成群屠宰，動亂之後饑荒接踵而至。中國共產黨沒有公開提到這些恐怖事件，並非因為無視歷史事實，而是出於意識形態上的謹慎。除了因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考慮他們不可能公開批判斯大林外，他們也不能一邊按照斯大林的道路實行工業化，一邊譴責斯大林農業集體化的道路。然而，無論蘇聯的總體發展模式對中國人有多大的吸引力，中國領導人決心要避免斯大林的集體化帶來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代價。

對農村中出現富農階級的擔憂還在其次。黨組織在農村的發展以及合作化組織的穩步增加，足以制約任何已經產生和將近要產生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

李富春在關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概括了黨在農業政策方面取得的一致意見。報告強調，要有一個穩定發展的農業經濟方可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合作社還要繼續發展，但必須採取循序漸進、有組織的方式進行，並必須建立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報告提出了一個穩妥的合作化目標，到1957年底，將現有的60萬個合作社發展到100萬個，包括全國三分之一的農戶。報告的重點是提高農業生產率，為城市工業化服務。誠然，要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是一個漫

長的逐步轉變過程，取決於農業機械化的程度。與此同時，對在可見的一個長時期內還佔農民數量多數的個體農民，國家還將給予「有力」的幫助。[12]

總之，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在7月初對農業問題上的共識。7月的最後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只他一個人便戲劇性地結束了這種共識。此後，中國便開始通過獨特的毛主義道路走向「農村的社會主義」。正如黨內一位領導人後來說的：毛的講話「解決了三年的爭論」。[13]

爭論是在黨的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方式「解決」的。毛發表這次講話，不是在只有少數人同意他的觀點的中央委員會上，而是在當時來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省和地方黨委書記的會議上。實際上，毛是越過了黨中央直接向全黨發出號召。直到同年10月召開的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才正式批准了毛的新政策。

其他黨的領導人在當時均認為合作社建立得太倉促，毛則宣稱合作化運動發展速度太慢。[14] 在原定到1957年底前實現建立100萬個合作社的目標的基礎上，毛要求再增加30萬個，並把時間提前到1956年秋季。他宣佈，到1958年春季，全國至少要有一半的農民加入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其餘的一半農戶將在1960年前加入合作社。不過，毛講話的意義，不在於他提出的加速合作化運動的日程表，而在於用唯意志主義的方式實現社會歷史的變革，以及他相信農民能完成這種變革的民粹主義信念，正是這種唯意志論和民粹主義信念，構成革命年代毛主義的基本特徵。毛的講話實際上也否定了1949年後指導黨的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這樣，毛的講話意味著中國將拋棄蘇聯的模式，「毛主義」出現在革命勝利後的歷史舞台上。

毛在報告中開宗明義便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這一精神貫穿於報告全文。農民中有一種自發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這篇報告的觀點和設想，與毛在約三十年前開始農村革命生涯時寫的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非常相似。1927年，毛看到，農民運動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將衝破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現在他又看到，「農村合作化中的社會改革高潮」在「全國也即將到

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農村中不久就會出現一種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在1927年預感到農村將是真正革命力量的策源地一樣，在1955年的今天，他又一次轉向農村去尋找激烈的社會變革的動力。如果說〈湖南報告〉宣告了作為非正統革命戰略的毛主義的誕生，那麼，1955年的報告則標誌著毛為解決在一個落後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而提出的新的非正統戰略的萌芽。

毛1955年的報告還提出了群眾運動與列寧式的黨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一點也可以追溯到「湖南報告」。1927年，毛認為，革命創造性的真正源泉不在黨內，而在農民採取行動形成的自發運動中，不是由黨來判斷農民的革命運動，恰恰相反，農民運動本身就是判斷黨是否真正革命的標準。[15] 1955年，毛又一次將革命的農民與革命性不強的黨作了對比。當絕大多數農民都投身於激烈的社會變革時，許多黨員「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不是農民落後，恰恰是黨變得太膽小謹慎。毛提醒人們要防止「左」的和「右」的錯誤，但是很明顯，黨現在犯的是右的錯誤。毛宣稱「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那些認為合作化運動「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的黨員，不過是暴露了他們自己對群眾的不信任。毛還對那些「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的黨領導人提出了尖鋭批評。[16]

對毛來說，真正重要的經驗是來自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革命歷史。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是延安時期形成的、1955年再次重申的「群眾路線」，群眾路線要求領導與群眾建立親密無間的關係，要求在革命活動進程中進行自我教育，這是毛主義獨創的觀點。無論是在革命勝利前還是勝利後，它都要求人們大膽地參加眼前的實際活動。「幹部和農民在自己鬥爭經驗中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幹。這樣，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17] 毛強調說，組織農民入社的領導「骨幹」應是「鄉村中當地的幹部」、革命年代和土地改革時期的老農村幹部以及黨和青年團的鄉支部，上面派下去的幹部只是「輔助力量」，他們的作用是「指導和幫助」，「而不是包辦代替一

切」。[18] 理想的幹部是延安時期的地方遊擊隊領導人，這樣的幹部來自當地農民，與農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毛在7月31日的報告不僅標誌著脱離了黨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步驟和採取方式的既定政策，還意味著毛在關於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目的、關於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革的關係這一更普遍的問題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新的觀點。1955年中期，黨實行的合作化政策是基於兩個毋庸置疑的理論觀點：第一，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農業產量，為城市工業化提供必須的資金。由於建立現代工業體系已經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而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所以，衡量農業合作化的效用和價值的標準，是看它能否提高生產率，又能否給國家提供更多的農業剩餘產品。第二，一般認為，農業的社會化以城市的工業化為前提，只有現代工業才能為大規模的集體合作社提供所需要的技術和農業機械。1949年，毛曾接受了(實際上是提倡)這些觀點；1955年，他推翻了這些觀點，他在7月31日的講話中，含蓄地否定了第一種觀點，直截了當地拒絕了第二種觀點。

一方面，毛盡可能地像強調集體化會為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金那樣，強調集體化將給農民帶來社會和經濟利益，毛指出，大多數農民依然很貧窮，農業集體化是「擺脱貧困，改善生活，抵禦災荒」的唯一出路，農業集體化決不單純是城市工業化的手段。他提出，工業化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項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革命任務，他警告「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導致為了城市利益而盤剝農村這種現象深深的不滿——以及對整個城市工業化戰略和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模式構成挑戰。

另一方面，毛現在否定了他本人在1949年提出的，農業社會化依賴於優先發展「強大的工業」，[19] 相反，他現在論證説：「由於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更長一些。估計在全國範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到五個五年計劃，即20年到25年的時間。」[20] 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革卻不能拖延，「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

1955年夏，毛還認為，雖然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實踐或可

能性上，要比多數黨的領導人設想的來得快，但仍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他強調合作化運動的發展要根據「自願和互利的原則」進行。跟其他領導人一樣，他也堅持要避免強制的方法，避免農業生產受到影響，但是他堅信，大多數農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貧農和下中農——將會自願走社會主義道路，其餘農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經濟優勢後，也會走上這條道路。合作化運動的直接計劃仍然是著重組織初級或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這需要四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建立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將是一個更漫長的過程，同樣也要建立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需要十年左右的時間。然而，1955–1956年冬季發生的異乎尋常的事件，動搖了毛在1955年夏初對漸進發展的合作化的設想。[21]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以〈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的文件形式，正式批准了已成為事實的農業政策；文件顯然出自陳伯達之手，他是毛在理論上的最親近的助手。決議基本上重複了毛在7月提出的觀點，補充了一些關於指導合作化運動開展的具體意見。

黨的領導層中仍有人不贊成毛的觀點，但是，毛的計劃已於秋收之後的10月正式開始執行，批評者怕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只好保持沉默。在毛7月講話至10月中央會議期間，各地黨的幹部致力於農村黨組織的建設，以便領導農村向「社會主義過渡」。

1955年的最後幾個月，合作化以異乎尋常的速度迅猛發展，其結果超出了毛最樂觀的估計。到年底，已建立了190萬個初級合作社，比毛提出的到下一年10月達到的目標還要高出50%。到1955年12月，63%的農戶已經加入了合作社，是同年中旬時入社農戶數量的四倍。合作化運動在農村基層全面發動，貧農的平均主義渴望和當地幹部的政治熱情，使運動如火如荼。毛的講話預示著大躍進時期狂熱的烏托邦實踐。他形容說，合作化運動是「大海的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衝走了」，他把合作化的成功歸因於他所說的「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22] 農民改造著中國農村，他們使1955年成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決勝負的一年」，農民的勁頭不僅來自經濟上的自我利益，更重要的是來自他們內在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對農民自發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長期信念，是毛有關農村「社會主義高潮」觀點的最重

要特點。合作化運動強化了他對農民的革命創造性、人的意志和意識創造社會現實的信念。因此，他充滿信心地預言，「這一年(1955年)過去，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23] 毛把農民的行動看成是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性因素，這是對毛主義未來革命的預言，也是毛主義過去革命歷史的回聲。由於毛在1955年夏季制定的目標在幾個月時間裏就被超過了，12月，毛又宣佈了新的目標——1956年底完成半社會主義的合作化，再用四年左右時間實現從半社會主義到全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轉變。[24] 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再次加快了時間表，號召到1958年實現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化。[25]

修改後的目標及農村迅速變化的社會條件，促使黨的社會階級政策加以修改。最初，合作化運動的核心是貧農和「下中農」，[26] 通過榜樣或教育的力量，逐步吸引上中農或富裕中農入社，這是因為擔心富裕中農(他們提供國家徵收的大部分餘糧)會由於自身利益受到損害，而將農業生產降到最低水平。另一方面，不允許富農和過去的地主入社，這是為了防止富農利用自己財產優勢控制「初級」合作社，使舊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得以改頭換面地繼續存在。[27]

但是，全面合作化的開展比預期要快得多，因此有必要吸收所有農民(包括富農在內)入社，因為富農擁有大量良田及性能較好的農具和家畜。由於集體合作社都是由「初級」合作社合併起來的大組織，通常包括全村的農戶，無論從組織形式上還是經濟需要上，個體農戶都已經沒有必要存在。集體化要求廢除土地和其他農業生產工具的私有制——以便所有農民都能按照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獲得報酬，因此，隨著集體化的迅速發展，對富農可能保持他們傳統經濟優勢的擔心也很快消失了。這樣，在1956年的最初幾個月裏，黨實際上取消了對加入新合作社的階級成份限制，把大多數富農和過去的地主當作普通農民來對待，不管是否自願，最終所有農村人口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員。[28] 1956年上半年，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沒有發生什麼暴力事件。在合作化運動迅猛發展的年初幾個月裏，許多原來的個體農戶加入了初級合作社，初級合作社很快又變成了「社會主義合作社」。到同年夏季末，約有一億農戶(佔農村人口的90%)成了大約48.5萬集體合作社的社員，官方稱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1957年春耕前，剩

餘的農戶也全部加入了合作社。除了農戶為自己消費或為在有限的自由市場出售農產品而耕種的小塊自留地外，土地私有制已被廢除。至少從理論上說，所有的農民都按照「同工同酬」的原則在集體土地上勞動。農村的社會階級差別已經消失，只餘下土地改革時劃分的階級成份，但這種政治上的標籤與新的社會經濟現實已經沒有關係。

從「初級的」或「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向「高級的」或完全的「社會主義」合作社的轉變速度之快，是合作化運動令人吃驚的特點之一，連北京最激進的領導人也對運動異常的迅猛頗感意外。畢竟，完全的集體化意味著農民要交出他們對私有土地擁有的全部權利，許多農民的土地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更多的農民是在新近的土地改革中把土地作為勝利果實拿到手的。集體化的迅猛發展，一方面反映了貧農對普遍社會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央政府向比較先進的合作社提供了貸款。[29] 但更重要的是，初級社裏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分配制度：一種是根據農戶入社時交出的土地和資金的數量給予合理等量的報酬（不管願意不願意），另一種是按勞分配，初級社解決不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正如維維恩・舒（Vivienne Shue）指出的：

> 完全的社會主義合作化可以解決主要由土地和資金引起的衝突，所以，它對幹部和貧農有特別的吸引力。初級社所以這樣迅速地過渡到了高級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了避免初級社中存在的收入分配矛盾和利益上的相互衝突。[30]

雖然農業集體化的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期，也沒有出現原來擔心的經濟混亂現象，但這並不是說集體化的實現在組織工作和其他方面都是一帆風順的。在1955年「社會主義高潮」的關鍵時期，農民的反抗是微弱的。佔農村人口20%左右的富農和富裕中農，對自己的社會地位降至普通農民肯定是不滿意的，但在強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壓力下，他們還是平和地接受了這個結果。關於屠殺耕牛和其他農用牲畜的情況也偶有報道，報紙上也籠統地指責地主和富農的「破壞活動」，但總的來說，農民的暴力反抗事件沒有發生，國家也沒有使用暴力手段。運動過程中發生的強制行動以及當地幹部的「命令主義」，已足以驅使那些自願也罷、不自願也罷的富裕農民加入合作社。直到合

作社完全建立以後，才出現農民嚴重不滿意的迹象，但即使如此，農民也是採取非暴力的方式，如拒絕出工或退出農業合作社，有些地方還解散了合作社(尤其是南方各省中匆忙建立合作社的地區)。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初，許多農民再次湧向城市。

儘管存在著這些問題，但中國的農業集體化與蘇聯野蠻的集體化形成鮮明的對比。眾所周知，斯大林是如何給俄國農民帶來「社會主義」的 —— 從城市派出軍隊到農村，集體化成了城鄉之間的內戰，村民在軍隊的包圍下被迫投降，不情願的農民在槍口下被圈進了合作社，公開反抗的農民被就地處決。斯大林「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意味著要消滅1000萬農民，因為富農即使想要加入合作社也不允許；數以百萬的農民被殺害，另有數百萬農民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不毛之地。大多數集體化了的農民對斯大林政權懷有深深的敵意，在納粹德國入侵時，莫斯科對農民的敵意深感棘手。直接的經濟後果更是災難性的，俄國有一半牲畜被屠殺，許多地區的農業生產陷於停滯，接踵而至的饑荒幾乎毀掉工業化進程，而進行集體化的目的又正是為了實現工業化。相反，中國的集體化基本上是一場和平的社會革命 —— 沒有動用軍隊建立合作社，農民的反抗只限於少數人，反抗方式也是非暴力的；國家沒有因合作化陷入經濟混亂。

僅僅是兩國不同的歷史條件，說明不了為什麼俄國和中國的集體化結果如此不同。從傳統上看，中國農民與俄國農民和其他地方農民一樣，都是靠土地為生。此外，即使不考慮俄國的所謂鄉村公社的「社會主義」傳統民粹理想，中國的集體村社傳統也比沙皇俄國的弱。任何工業化前的社會的土地私有制，都沒有像在中華帝國那樣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也沒有任何地方像在中國那樣，個體農民所有制的觀念如此牢固。依照社會和文化基礎來看，在中國廢除土地私有制遭到的反抗應要比在俄國更強烈才是。

這樣的情況沒有出現，其中一個原因要從中國農村在土地改革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尋找。在中國，土地改革後富農階級仍然存在，但人數遠比俄國富農少，更不具備俄國富農階級的力量。中國的富農階級不像俄國富農階級那樣，具備時間和條件來鞏固自己作為農村資本主義階級的支配地位。此外，與俄國不同，在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十

分貧窮，包括那些在土地改革後成為「中農」的農民在內，他們在集體化中不但不會損失什麼，反而可能獲益。相比之下，在1920年代末的俄國，三分之二的農民是「中等階級」農民，他們竭力想上升到富農的地位，堅決反對集體化。[31] 在1950年代中期的中國，三分之二的農民像毛澤東描述的「一無所有」。簡單地說，中國擁有願意進行激進社會變革的數量巨大的赤貧農民。

然而，如果不是因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性質，上述可能性也不可能成為現實。俄國布爾什維克在農民中幾乎沒有支持者，在農村也沒有什麼組織機構。1917年後的俄國農村，雖然沒有被置之不理，但也只是處在以城市為基礎的政權的鬆散統治之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革命是由以農民為主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是通過發動億萬農民來實現的。1950年代初的中國共產黨儘管已經城市化，但在農村依然有著雄厚的組織基礎，農村黨組織又在1955年重新恢復生機。中國農村的合作化，地方黨的幹部和積極分子完成的，是由他們本來出身於貧苦農民，又與農民保持密切聯繫。如果沒有廣大普通農民的積極支持，就無法想像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革能夠這樣迅速和平的實現；同樣，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農村革命的傳統，也很難想像農民能夠被組織起來，對自己的社會生活進行如此劇烈的變革。毛澤東完全沒有必要、也無意進行野蠻的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由於中國和蘇聯的集體化運動在性質和結果上都非常不同，因此，令人奇怪的是，發動中國集體化運動的毛澤東，大力稱讚斯大林在「1929年至1934年這六年時間裏」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功，宣稱「蘇聯所走過的這一條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32] 毛對斯大林——已故的斯大林——給予這樣的敬意，不是由於他不了解蘇聯歷史，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在這六年裏」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他也決不想讓中國重蹈這一災難的覆轍。他感到有必要宣稱跟隨「蘇聯的榜樣」，不過是反映了毛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尷尬關係，這種關連充斥著令人費解的地方。無論如何，在集體化問題上，毛借助於斯大林的理論權威，發動了一場完全非斯大林化的群眾運動，正如在1949年以前，毛在公開宣言中極力稱頌斯大林，但在革命實踐中卻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一樣。

農業合作化除了被稱為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決定性步驟外，還有一些更直接和具體的目標，人們相信這些目標既會給國家與農民帶來利益。首先，全國合作社系統的建立，能使國家更有力地控制農業生產，更有效地徵購餘糧。毫無疑問，黨對合作社經營情況的監督，確實促進了國家的稅收和糧食徵購工作，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穩定的糧食供應，為城市工業化提供了穩定的資金來源——儘管這很難說是農民的福音。其次，大規模集體耕作，促使技術知識普及得更快，有利於採用新的農業技術，特別有利於採用那些不適合於小生產的農業技術，或是個體農民缺乏手段或興趣採用的農業技術。按照設想，合作社最終將實現農業機械化。1956年，為了配合合作社的建立，政府匆忙推廣了幾項農業技術革新，最有名的是雙輪雙鏵犁、雙輪播種機和作物密植技術，但最初的結果並不理想。[33] 第三，集體化運動是為了至少在農村消滅土地改革後存在的經濟不平等現象，通過廢除所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即土地、大型農機具和牲畜，去實現這一目的。合作化基本上(還不是完全)拉平了當地農民的收入，這意味著大量的農民，即佔農民總數25%的原富農和富裕中農的收入比合作化前降低了，獲益的理應是貧困家庭，但其獲得的利益微不足道。集體化減少了農民自留地的副業收入，影響了農村手工業，使農民的總體收入下降。此外，集體化沒有觸動普遍存在的地方與地方之間的不平等，無論是在「社會主義高潮」之前還是之後的歲月裏，地方之間的不平等都是巨大的。

不過，對領導和群眾來說，合作社最大的吸引力在於當新的體制適當地建立起來後，可以大幅提高農業產量和農業生產率，既有利於國家，也有利於全體農民。儘管毛澤東寧可相信絕大多數農民是受社會主義精神的鼓舞，但無論是在集體化前還是其後，黨的政策所以對貧困農民有吸引力，主要還在於貧困農民自身的物質利益。[34] 對於那些懷著巨大熱情支持集體化運動的貧困農民來說，沒有理由不相信黨對他們的許諾，通過自己的努力，他們的生活水平很快就會得到提高。畢竟，正是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摧毀了寄生的地主階級，進行了意義重大的土地分配。在土地改革後的幾年裏，黨實行的市場和信用政策，都著眼於照顧貧困農民的利益，限制富裕農民的買賣和放

債行為。[35] 這時候，集體化不但保證帶來直接利益，即分享富農和上中農的多餘財產，還有可能獲得在合作社制度下人人有份的重大經濟利益。不過，在毛時代的20年裏，這種可能性一直沒有實現。

集體化既沒有像一些人擔心的那樣產生經濟災難，也沒有像其倡導者預期的那樣導致經濟增長。一些合作社辦得很興旺，另一些辦得很糟糕，大多數合作社的生產狀況沒有什麼變化。[36] 總的來說，從1956年到1970年代末期，農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沒有增加。[37] 這既有後來大躍進造成的經濟危機的影響，也由於國家繼續要求農業經濟為工業化提供資金，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在於絕大多數合作社沒有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調動不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除大躍進的幾年外，在毛時代的二十餘年時間，合作社的確千方百計地供養了快速增長的人口(雖然農村的勞動力也相應增加了)，農民也確實獲得了利益，但這種利益靠統計數字是無法反映的，如更大的安全感、照顧老弱病殘的福利事業、農村教育和農村醫療事業的發展，以及農村工業化的開展等。但總體上看，集體化經濟的發展並不如人意。

*　　*　　*

合作化的第一年(1956–1957)的組織工作比較混亂。合作社比它所取代的「初級」社組織規模要大得多，合作社最初平均由246個農戶(約一千二百人)組成，而初級社僅有幾十戶人家，陌生的經濟管理和財務計算使合作社面臨經營上的困難。由於合作社所有的土地、牲畜和傢具都是集體所有，而農民按其勞動所得的報酬主要是糧食，有時也有少量現金；這樣，每個合作社都面臨著算帳的問題。在國家宏觀指導的基礎上，合作社建立了一套評估勞動貢獻的「工分」計算體系，這不可避免地在社員中引起糾紛和不滿。此外，最初在餵養牲畜和看管傢具等問題上責任不清，經常有牲畜因缺乏照料而死亡。合作社還面臨長期規劃的問題，它要決定在完成國家稅收和上繳公糧後，用於分配給社員的糧食數量、用於福利和生產投資的比例等。許多出身貧苦家庭的年輕幹部在發動農民進行合作化運動時十分稱職，但他們缺乏管理合作社所必須的管理、簿記和算帳的技能；派到農村的城市幹

部和中學畢業生雖然具備這方面的知識，但他們鄙視農村生活，所以作用不大，農民也看不慣他們的「城市派頭」。

起初，黨的領導人把集體化初期出現的經濟和組織上的問題，歸咎於過去是地主和富農的反革命破壞活動；但他們很快認識到，剛剛集體化了的農民缺乏生產的積極性。隨後，在1957年的大部份時間裏，政府普遍放寬了對合作社的控制。毛澤東也以不樂觀的口氣預言說，還需要五年時間才能在穩固的基礎上建立起集體農業。與此同時，政府制定了給農民提供更多物質刺激的政策。1956–1957年間，政府的稅收和公糧派購下降到總產量的25%，允許農民在自留地的種植和在自由市場出售農產品方面，擁有更大的彈性，縮小了規模過於龐大的合作社；1957年，平均每個合作社有169個農戶。

國家緩解對農業經濟的壓力旨在提高農業產量，但是，寬鬆政策的實施卻產生一個難以解決的矛盾——提高農業產量的目的，一方面是解決農民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是為了給國家提供更多可用於交換的剩餘農產品和原料，給城市工業的發展籌措資金。國家為了提高農業產量，給予農民物質手段和物質刺激，然而，恰恰正是這些措施，卻使國家失去了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將於1958年後開始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更籠統的目標，兩者所需要的農業剩餘產品。國家通過減輕農村的負擔，增加對消費工業的投資，從而幫助了農民，但至少在一個短時期內，妨礙了國家本身迅速實現工業化的計劃。

1958年，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始進行大躍進冒險，解決了上述矛盾之際，但又製造了新的矛盾。正如1955年夏季毛通過個人干預，「解決」了關於合作化的爭論一樣，此時，毛將用更激進的方案同步加快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試圖調和農民與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

大躍進政策將在黨內領導中引起有關革命勝利後發展道路的漫長爭論，導致黨內領導層無可挽回的分裂。領導層的內部分歧在後來的十年裏一直沒有公開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黨自身四分五裂時才全面暴露。但是，衝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5年中期，毛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之時。迅速的合作社轉瞬就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許多黨的領導人認為毛及其追隨者是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者，推行的激進社會變革遠遠超過了中國脆弱的經濟基礎能承受的限度。而

毛則確信，官僚主義的黨機構成了他設計的社會主義新道路的保守障礙。1957年，在「社會主義高潮」勝利鼓舞和激勵下的毛澤東，又提出了更激進的政策，黨內分歧更加尖銳；衝突已不再限於農業問題，一系列國際、國內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與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交織在一起，分歧範圍越來越大。要理解大躍進前夕的分歧和當時決策的政治氣氛，有必要回到1956年，研究在人民共和國史上以「百花齊放」聞名的短暫但卻十分重要的這段歷史插曲。

註釋

1. 儘管這種特殊情況的程度難以準確地説明，但高利貸的情況看來普遍存在。例如，傅高義1953年在廣東一個地區進行調查時注意到，該地區有10% 的農戶從事借貸活動。傅高義，《共產黨統治下的廣東》，頁142。
2. 黨在關於這個問題的政策中規定：「退出互助組或初級社的農民，可以撤回他們投入的資金或保留金。但如果是購買了土地股權的農民要退出，最好是在每年莊稼收獲之後再退出。」引自趙國春 (Chao Kuo-chun)，《中國大陸的農業政策：文獻研究1949–1956》(*Agrarian Policies of Main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Study 1949–19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頁63–64。
3. 前揭書，頁61。
4. 計劃號召糧食產量增長17.6%，農副產品產量增長幅度更高。計劃強調説：「沒有農業的充分發展，我們就不可能實現國家工業化。」參見李富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
5. 在1955年10月中央會議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工作報告裏，談到這個問題時是這樣寫的：「中國工業增長很快；事實表明，如果農業合作化跟不上工業的發展速度，如果農業和農副產品的增加滯後，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將面臨極大的困難。」
6. 周恩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情況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周恩來選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16。
7.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87。
8. 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1955年10月11日。

9. 合作化源自1942年12月毛在中央會議上作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報告。有關延安合作化運動的敘述和分析，參見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416–427。賽爾登（Mark Selden），《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237–254。
10. 鄧子恢，〈關於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1954年7月15日。
11.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71。
12. 李富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1953–1957〉。
13. 此話是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陳毅於1955年11月說的。參見哈里森，《通向權力的長征》，頁470。
14. 毛澤東的〈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正式公佈於1955年10月，但毛講話的精神在此前幾個月已向全黨傳達。以下有關的討論均基於這一報告。
15.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接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
16. 毛澤東，〈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83。
17. 前揭書，頁169。
18. 前揭書，頁176。
19.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合訂本，頁1366。
20.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88。
21. 中共中央於1955年10月11日通過了這個文件。1955年11月，國務院發佈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表示新政策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認可。
22.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29。
23. 前揭書，頁233。
24. 前揭書，頁222。
25.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6–1967〉，1956年1月23日。
26. 土地改革的其中一個結果，是許多貧農進入了所謂的「中農」行列，發明了「下中農」這個詞，是指那些用毛的說法就是「貧困無依」的中農。
27. 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中說：「現在已經有不少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用各種偽裝混進到合作社中來。」企圖使合作社變成他們

的工具。不過，「在那些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合作化並且合作社已經鞏固了的地方」，可以有條件地接受那些早已放棄剝削和實行守法勞動的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分期分批地加入合作社。

28. 參見〈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56–1967〉和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於1956年6月30日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

29. 有關初級社向高級社的迅速轉變的有説服力的分析，參見維維恩·舒(Vivienne Shue)，《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s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80)，頁286–317。其著作對中國農村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運動的社會變革，進行了深入、透徹和有趣的分析。最近興起的對合作化問題的「重新評價」，絲毫沒有動搖這本資料豐富、富有見地的著作的結論。讀者若有興趣，不妨讀一下一位提倡重新評價的作者的「驚人的新結論」，但看來還是基於原來的老材料。見賽爾登(Mark Selden)，〈合作與衝突：中國農村的合作化與集體化的形成〉("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operative and Collective Forma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載賽爾登與利皮特(Victor Lippit)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82)，頁32–97。

30. 維維恩·舒，《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回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1949–1956》，頁300。

31. 據一般估計，在1920年代末俄國2500萬農戶中，只有500萬戶是「貧農家庭」，1800萬農戶是「中農」，200萬是「富農」。在中國，佔農民總數70%的「貧農」或「下中農」處於赤貧或貧困狀態。在俄國，只有20%的農民處於貧困狀態。

32.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84。

33. 關於1956年採用新技術及其缺陷，參見維維恩·舒，《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頁312及賽爾登，〈合作與衝突〉，《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79。

34. 正如維維恩·舒在詳盡描述後得出的令人信服的結論所言：「對無數農民來説，事情的本質在於真正吸引他們的是自身的利益，廢除小生產作坊，先加入前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然後加入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維維恩·舒，《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頁334。

35. 有關黨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時期之間農村的市場和信用政策，參見前揭書，《過渡時期的中國農民》第5、6章，頁195–274。

36. 有關集體化失敗方面的報道，參見韓丁(William Hinton)，《風陽縣之行：中國新家庭承包制的調查》("A Trip to Fengyang County: Investigating China's New Family Contract System")，《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第35卷第6期(1983年11月)，頁1–28。關於一個相對成功村莊歷史的詳細描述，參見韓丁，《翻身》(*Fanshe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37. 拉迪(Nicholas R. Lardy)，《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表4、表6，頁159–160。

第三部

烏托邦主義
1956–1960

第十章

百花齊放：社會主義、官僚主義與自由

1956年初，黨的領導人認為，中國已處在「社會主義過渡」的尾聲。毛澤東在這年的1月宣佈，1955年下半年的事件已證明是決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勝負的關鍵。他預言，「到今年(1956年)年底，社會主義的勝利將在實際上得到保證」。[1]同月，周恩來和其他領導人也歡呼「社會主義改造高潮」的來臨。[2]一年後的1957年2月，毛的注意力轉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當然地把中國社會當成了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承認這個新的社會制度還有待「完全鞏固」。[3]

至於說1956–1957年的中國社會是不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下面還要談到這個問題。這裏我們只要注意到這一點就足夠了：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年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信他們已成功將中國改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按照當時「共產黨陣營」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來看，他們確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廢除私有制，由社會主義政黨領導的國家掌握生產資料，那麼中國與「社會主義故鄉」的蘇聯一樣，也都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到1956年中期，農業集體化已基本完成，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工商業也於同年底實現了國有化。就連手工業的個體企業也被組織成社會主義的集體企業。與蘇聯一樣，直到1956年底，中國是一個只有兩種所有制的國家：城市經濟以全民所有制為主，農村經濟則以集體所有制為主。城市和農村都廢除了私有制。根據當時公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標準，中國的確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

在中國已經或即將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認識的基礎上，1956

年初，黨的領導人開始制定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藍圖，把注意力轉到因迅速的社會主義化而產生的、尚未解決的問題上。其中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落後的經濟，這個問題並沒有隨著社會主義社會降臨而自然解決。共產黨人慶祝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勝利，但他們不得不承認中國現代工業經濟依然十分弱小。農業合作化雖然沒有給國家造成經濟混亂，也沒有把農民推到政治上的敵對面，但合作化沒有帶來農業生產的技術革命。中國依然是一個貧窮國家，人民依然貧困。沒有人相信在普遍落後的條件下，社會主義能夠長期存在，更不用說繁榮昌盛了，即便毛也這麼認為。現代經濟顯然要按計劃發展，但由誰來發號施令，如何實現經濟發展，都懸而未決。1956年初，毛作出了與眾不同的激進選擇，要求徹底放棄經濟發展的「蘇聯模式」，彷彿存心要與正在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唱對台戲。

對毛澤東和毛主義者來說，如何實現現代經濟發展，與如何防止由現代經濟發展造成的國家和社會的官僚化，兩者是兩個不可分割的問題。伴隨著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還有從革命的組織形式向統治的官僚形式的過渡。革命勝利後官僚統治的普遍制度化，特別是借鑑蘇聯模式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導致新的政治與經濟精英出現，這也許是工業化進程的必然結果，但卻與工業化的社會主義目標互相矛盾，與毛主義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道路的理想更是直接相悖。至少就毛主義者而言，以「百花齊放」而聞名的運動，部分目的是為了解決官僚主義問題。

官僚主義問題反映一個更大、更普遍現象，可見國家與社會的日益分離。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是一個歷史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為國家所篡奪的社會權力將回歸社會。但是在人民共和國，情況與蘇聯一樣，「社會主義過渡」產生的恰恰是相反的歷史趨勢：越來越膨脹的龐大官僚機構日益異化於社會外，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問題並非全然沒有認識。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號召「用極大的努力……同脱離群眾、脱離實際生活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鬥爭」。[4] 1957年2月，毛澤東也專門談到存在於「政府和群眾」間的「一些矛盾」。[5]

共產黨人沒有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作為一個抽象的理論問題來看

待。從1956年到1957年，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重新估價政治上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人民的作用，正視來自人民的呼聲。最引人注目、具有強烈政治意義的要求來自城市各界，包括工人階級和知識分子，直接涉及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普遍本質、特別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等根本性問題。對迅速壯大的中國無產階級來說，「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是對工人日益強化的壓制性社會和政治控制，是工廠中越來越嚴厲的勞動紀律。1956年的罷工，反映了工人的不滿情緒日益增長，罷工是由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滿引起的。罷工活動比較分散，很快為政府所鎮壓，但由此卻提出了一個問題：無產階級在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問題，即根據官方理論，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問題。

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社會主義過渡帶來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有一段時間，共產黨似乎願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說的社會主義與自由不可分割的承諾。1956–1957年發生的事件，揭示了毛主義民主概念的局限性，以及根深蒂固的官僚主義對思想自由的禁錮程度。

1956–1957年「百家爭鳴」時期提出和爭論的根本問題，涉及到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與未來。在人民共和國裏，人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公開更坦率地討論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以及涉及人的自由、知識分子的自由等問題。一方面，這些問題是黨的領導人在反省「社會主義過渡」和工業化成就時，面對七年來迅速的社會經濟變革造成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另一方面，這也是被統治的下層提出的問題，黨對此不得不正視。

當時對這些問題或「矛盾」的理解方式、解決或不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以及1956–1957年公開爭論和黨內秘密爭論所導致的結果，所有這一切對理解中國社會主義的性質，對理解在這些來中形成的獨特的毛主義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理論，都是至關重要的。

*　*　*

1954年頒佈的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規定中國公民享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但顯而易見，長期以來政府的實踐和政策並不受憲法的約束，對待知識分子尤為如此。自1949年新政權建立

後，知識分子就不斷地被迫進行思想改造和觀念轉變。如果他們的思想一直沒「改造」過來，他們會痛苦地意識到，沒改造過來的思想還是以不說為佳。對知識分子屈從於國家意志的重負，憲法也無能為力。實際上，肅反運動和1955年胡風被捕入獄事件，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壓制，使一年前剛剛宣佈的法定「言論自由」的權利成為一種諷刺。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時，得到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擁護。現在，在國家強制的思想與政治專制下，知識分子的支持逐漸消失，1949年時的期望化為被動的順從。

在1955年的後幾個月裏，黨的領導人開始制定旨在重新獲得疏遠了的知識分子支持的新政策。這不是共產黨突然發現給知識分子以自由的恩惠，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儘管毛個人的動機要更複雜，我們下面還要談到)。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需要更快地發展科學技術，需要更多更好地訓練有素的專業技術人員。政府決定制定科學發展的十二年規劃。與此同時，毛提出了農業發展的十二年綱要，號召在農業生產中廣泛開展技術革新。知識分子對政治不滿，而且噤若寒蟬，很難提供國家需要的合作和智力創新，對知識分子的壓制成為發展經濟的不利因素。

1955年秋，全國人大的非黨內人士代表被要求就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情況準備報告。共產黨就如何更好地「團結」知識分子、如何使知識分子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等問題，徵求了民主黨派的意見。1955年12月，毛向政治局提交新的農業發展綱要時，特別敦促知識分子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國家的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這是不久後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開展的運動的首次號召。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專門會議，討論知識分子問題。學術機構和團體的非黨內代表應邀出席了會議，聽取了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反映了黨內領導層在當時的共識。關於知識分子的階級劃分問題，一直是個理論上的難題。與工人、農民或資產階級不同，知識分子的階級地位不可能套用馬克思主義關於劃分階級的標準，即按照他們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來劃分。無論知識分子在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有多麼重要，他們只能算是社會「階層」或「分子」，知識分子在四個階級的聯盟——這是人民

共和國的基礎——的地位也是最模糊的。但是，假如知識分子並不構成一個社會階級，他們畢竟是階級意識形態、特別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載體，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值得懷疑的。為了打消這種懷疑，周恩來試圖給知識分子一個前所未有的階級地位，他宣佈：「知識分子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所以，「知識分子問題」不再是一個他們在政治和思想上可靠與否的問題，而是一個專業人員數量不足的問題；他說：「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我們的知識分子的力量，無論在數量方面、業務水平方面、政治覺悟方面，都不足以適應社會主義建設急速發展的需要。」而這個問題能夠通過採取專門措施來解決。周建議，通過合理的組織和工作安排，知識分子就能更好地「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還應當給知識分子提供更好的設備、更多的書和更好的住房條件，給他們較高的工資和待遇，加快晉級，不要讓他們參加太多的行政工作和政治學習，以免荒廢專長。要增加大學招生數量，制定科學技術知識發展的長遠規劃。

周還提出，政治問題更多地是黨內而不是知識分子間的事情。他批評了「我們目前關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現象，特別是一部分同志對於黨外知識分子的某些宗派主義情緒」，批評了對知識分子「不應有的懷疑」，即動不動就把忠心耿耿的知識分子當成反革命分子來懷疑的傾向。這並不意味著不對知識分子進行政治控制和「思想改造」，但黨將更有耐心，「只要他並不在言論和行動上反對人民，甚至還願意用自己的知識和精力為人民工作，那麼，我們在批判他的錯誤思想的同時，就還要善於耐心地等待和幫助他逐步地覺悟起來。」與此同時，允許知識分子有較大的專業自主權，以更好地掌握對中國現代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科學技術知識。[6]

黨仍然是政治和思想上的主人，但黨承認知識分子是科學技術的主人，鼓勵知識分子掌握多方面的科學知識。黨主動採取措施結束周恩來說的知識分子與國家間的「某種隔閡狀態」。作為對知識分子這種新的信任，周號召克服吸收知識分子入黨的障礙。結果到了第二年，知識分子的黨員人數增加了50%以上。1957年，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內的知識分子黨員數量比工人階級黨員數量還多。[7]

毛澤東很可能不喜歡周的講話，因為新政策意味著要建立一支可以有效地把專業活動與政治和意識形態分離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條件是他們不公開表示對國家和馬克思主義的敵意。這種政策會加速專業精英階層的形成，他們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及經濟上的特權地位而脱離群眾；這恰恰是毛已經開始扭轉、不久還將公開反對的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結果。誠然，毛與周一樣，都主張發展現代經濟，認識到掌握現代科學的必要性，毛比周更強烈地主張搬掉壓在知識分子身上的黨的官僚重負。但是，他提倡的經濟發展路線，含有不同的激進社會意義，與黨當時正在實行的路線完全不同，對知識分子來説尤其如此。

即使毛覺得周講話的社會含義與自己格格不入，但周提出的其中一個政治觀點肯定是他所由衷贊同的。在周對黨對知識分子新政策的解釋中，他談到了有必要結束中國對蘇聯的依賴。他強調「我們不能無限期地依賴蘇聯專家」，他批評了「過於急躁、生硬和機械照搬」蘇聯模式的「宗派主義」傾向，他説，這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他還強調了中國在現代科學技術方面「自給自足」的必要性。這種典型的毛主義觀點是對未來的預言，或許，周和毛在當時都沒有完全意識到它的深遠意義。

* * *

1956年1月，在周恩來談論〈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時，毛澤東正在敦促黨採取更激進的社會和經濟政策。經濟發展將遵循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更「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同時要加快社會主義改造進程。[8] 黨內正在出現的爭論不僅涉及到社會經濟變革的步驟，而且涉及到變革的性質。當黨內多數人還沉溺於蘇聯的發展模式，把第二個五年計劃看成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簡單延伸時，毛澤東提出了以全面拋棄蘇聯模式為前提的各項政策。與官僚合理化、城市工業化和中央集權化控制的思路相反，新毛主義理論是延安「群眾路線」模式普遍化的產物，它的直接動因是毛1955年7月〈關於農業合作化〉講話後，農村興起的民粹主義高潮。迅速的社會主義改造與迅速的

經濟發展相結合，通過權力下放和依靠群眾的首創精神，使工業發展與農業發展同步進行。這種毛主義理論的出現對現存國家和黨的官僚機構形成了威脅，受到激烈的反對。1956–1957年，黨內就採取什麼方針發展社會經濟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直到1957年下半年，毛主義理論開始在大躍進中實行後，爭論才得以解決（可惜只是暫時解決）。

〈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爭論是公開進行的，但黨內關於社會經濟政策的爭論卻一直是秘密進行的，但兩者有密切的聯繫。周恩來1956年1月講話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前提的邏輯結果，它意味著建立一支蘇聯式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這對在官僚機構領導下的現代工業發展至關重要。但是，周及黨的多數領導人大都出於經濟目的利用知識分子，而毛則是出於政治目的利用知識分子，把它作為群眾社會經濟運動的組成部分，繞過現存的官僚渠道，來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變革。由於農業合作化的步伐走得太快，黨內已經有了對毛的批評意見。雖然中共中央於1956年1月正式批準了毛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毛後來還是指責多數黨的領導人對他的建議漠然置之。綱要本身在其後18個月裏被束之高閣，而黨繼續執行穩健的緊縮政策。

毛似乎要宣佈，解除對知識分子政治約束的建議，甚至比周的建議更徹底，以準備開始他的反官僚主義運動，但是，由於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帶來巨大衝擊，「百花齊放」運動不得不推遲進行。

*　*　*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罪行的批判，震驚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中國後來埋怨俄國人「事先沒有與兄弟黨進行磋商」，各國共產黨也都與中共一樣對此不滿。赫魯曉夫是在蘇共大會閉幕時發表秘密報告的，顯然是在最後一刻才作出決定。這篇報告明顯是匆忙擬就，許多內容是赫魯曉夫的即興演說。但是，報告給中共帶來的麻煩，不在於事件本身引起的震驚，而在於對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共黨內產生的政治影響。

儘管赫魯曉夫報告中詳盡描述的斯大林的怪譎個性和統治方法，可能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感到吃驚，但他們對蘇聯歷史還沒有無知到發現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發」內容聞所未聞，他們對斯大林犯下的主要罪行其實十分了解，當務之急是如何向普通的中共黨員和中國人民解釋這一事件。中國領導人該如何解釋，他們幾十年來一直頌揚的偉大革命領袖，為什麼現在被斥為血腥的暴君？不管毛和其他中共領導人私下裏是怎麼看待斯大林的，在公開場合他們都是極盡頌揚之事，而且歷來如此。1939年，毛在慶祝斯大林60歲誕辰時稱頌說，斯大林同志是所有被壓迫人民的救星。在這位蘇聯獨裁者70歲誕辰時，毛寫道，斯大林同志是全人類和中國人民的導師和朋友。1953年，斯大林去世時，毛在悼詞中說，人類失去了當代最偉大的天才；各國共產黨也都用同樣的語言讚美斯大林，類似的溢美之辭在其後幾年一直充斥著中國的新聞媒體。

如果僅僅是不公開發表赫魯曉夫的講話，固然可以延緩這個令人尷尬的問題，但解決不了問題。正如赫魯曉夫在結束他的報告時告誡的「家醜不可外揚」，結果是美國國務院發表了講話全文。而中國人一直沒有公佈報告。直到1957年，一個匿名者翻譯了這份報告的英文版摘要，然後寫成大字報貼出，中國公眾才知道了報告的詳細內容。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不久，雖然大家對細節尚不了解，但這份報告的矛頭所向，已在中共黨內和知識分子中流傳開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陷入窘境，因為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裏，他們不遺餘力地把俄國的獨裁者作為偶像公開頌揚。他們也對蘇聯在打破偶像前沒有事先打招呼感到惱火。但與蘇聯對斯大林的批判給中國共產黨造成的更嚴重的政治和理論問題比較起來，個人的窘境就無足輕重了，這一事件使中國正在倣仿的社會主義在社會與道義上是否合法成為問題。如果社會主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較高階段，蘇聯的社會主義又是最先進的模式，那麼，社會主義怎麼會產生像赫魯曉夫逼真(有選擇地)描述的這樣一個犯有野蠻罪行的領袖、與及其領導社會主義？對中國人來說，它提出了一個更具體、更直接的問題，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領袖與政黨之間的關係問題。畢竟，赫魯曉夫報告中的主要論點，以及他對出現的邪惡的「解釋」，是斯大林作為一個篡權者，

「把自己凌駕於黨之上」，通過培養「個人崇拜」使自己免受任何批評。毛1955年7月的講話和發動合作化運動，是否也是把自己凌駕於黨之上呢？難道毛澤東本人不也正逐漸成為類似形式的英雄崇拜的對象嗎？

中國領導人對上述問題思考了一個多月後，才對赫魯曉夫的報告作出評論。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以社論的方式發表了題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評論；這篇文章可能出自毛本人之手。社論很籠統地談到了斯大林的「失誤」和「錯誤」，基本上沒有透露赫魯曉夫報告中批判的內容。文章一方面稱讚蘇聯新領導人「對過去的錯誤勇於進行自我批評」，另一方面又稱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領袖，他「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貫徹執行了列寧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的方針。文章承認斯大林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更多是含蓄地批評赫魯曉夫沒有好好解釋這些錯誤是如何產生的。文章的主要內容是捍衛斯大林在俄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因而也是從側面捍衛正在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文章還試圖解釋（和辨解）「個人崇拜」問題。[9]

在解釋社會主義社會怎麼會產生斯大林的邪惡這一點上，中國人的評論與赫魯曉夫的講話一樣，難以令人信服。但毛澤東不同於赫魯曉夫，他不願意把斯大林與斯大林時代分開。赫魯曉夫解決問題的方法很簡單，把蘇聯社會主義的所有成就都歸功於黨，歸功於群眾和列寧主義，把那個時代所有的失敗和恐怖都歸咎於斯大林一個人，他反復重申，罪惡是由於「個人的獨斷專行」造成的。另一方面，毛卻堅持認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特點。」所以，蘇聯社會主義的成就應當歸功於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失誤他也負有責任。由於斯大林功大於過，斯大林的歷史形象總的來說應是正面的。因此，文章強調說：「斯大林的著作仍然和過去一樣是必須認真研究的，凡是他的著作中有益的東西，特別是他關於保衛列寧主義和正確地總結蘇聯建設經驗的許多著作，我們都需要當作一項重要的歷史遺產接受過來。」當然，人們要帶有批判性地研究斯

大林的著作。但是對毛主義者來說，斯大林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家」── 儘管他不是一個完人 ── 至少公開的記錄就是如此。[10]

毛還對「個人崇拜」問題進行了解釋，但解釋的目的不是要從政治層面正視這個問題，而是把它歸咎於歷史。他解釋說：「個人崇拜是過去人類長時期歷史所留下的一種腐朽遺產。個人崇拜不只在剝削階級中間有它的基礎，也在小生產中間有它的基礎。大家知道，家長制就是小生產經濟的產物。」出現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個人崇拜，是因為「舊社會帶有毒素的思想殘餘」，它「還會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保存下來」，由於斯大林對社會主義的貢獻，因此，「這個名字也就很自然地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榮譽」，但可悲的是他過分誇大了自己的作用並受到落後思想的影響。文章暗示，這種情況不可能在中國出現，因為中國共產黨「曾經不斷地反對脱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無論如何，防止出現個人崇拜問題的必要措施是現成的 ── 在「民主」與「集中」之間保持適當平衡；黨的領導人要謙虛謹慎；貫徹「群眾路線」。[11]

* * *

在暫時解決了斯大林問題後，毛即著手處理黨的領導層和黨的機構對他提出的激進社會和經濟政策日益增長的反抗情緒。他認為，黨已褪化成一個保守的因循守舊的官僚機構，恢復黨的革命精神的途徑之一，是從外部向黨挑戰。這一任務首先落到了非黨員的知識分子身上。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把知識分子從思想和政治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 雖然毛看到，知識分子有限程度的不安和反抗能帶來一定的好處 ── 而是為了恢復黨的生機。在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致辭中，毛澤東重新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5月26日於北京召開的藝術家、作家和科學家會議上的講話中，宣佈了毛主義的這項新政策。[12]

「百家爭鳴」的概念適用於科學家，而「百花齊放」的概念適用於作家和藝術家；這種區別是意味深長的。據說自然科學是沒有階級性

的，所以科學家可以提倡和探討不同觀點的科學理論，不必擔心政治上的干涉，目的是促使科學進步，它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另一方面，對作家、藝術家和學者來說，對自由範圍的界定則十分模糊。誠然，自由的允諾是對全體知識分子而言的。陸定一說：「歷史表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學術的發展就會停滯。」他聲明，新政策「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13]然而，自由的保證又受到種種限制。雖然藝術家和作家在藝術風格和題材選擇上可以自由「鳴放」——優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這不是唯一允許使用的方法，但是，他們不能自由地決定作品的社會內容和政治內容。藝術作品、文學作品、歷史和哲學作品不同於自然科學，它們是有階級性的，因此，在一個「階級鬥爭依然存在」的國家裏，這些作品還要受到政治監督。此外，自由只是「人民內部的自由」，藝術和文學作品的生產要以「為人民服務」為新的宗旨。陸定一沒有涉及誰是「人民」、用什麼為人民服務——以及由誰來決定的問題。此外，「大鳴大放」運動的目的早已預先規定了。陸指出：「只有經過公開辯論，唯物主義的思想才能一步步克服唯心主義的思想。」[14]自由的「思想鬥爭」可以進行，但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獲勝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等於零。

但是，毛澤東通過陸定一的講話要發動的運動，不是又一場整頓知識分子思想的運動。這一次，他調整了方向，需要整頓的是共產黨；非黨內的知識分子不過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工具。陸定一的講話充滿對黨員的傲慢和無知的尖銳和辛辣諷刺：

> 有一些黨員……自以為是，看不見甚至忘記了別人的長處，他們聽不得批評的意見。自己永遠以先生自居，把別人看做是永遠只配當自己的學生……這些同志應該趕快停止陶醉，放謙虛些，多聽別人的批評，多做些學問，多向黨外人士請教，同他們好好合作。
>
> 現在要提出的問題是黨員應該注意補足自己的缺陷了。辦法只有老老實實向懂得的人去請教，去學習。非黨員的知識分子，

> 絕大部分學習得很努力。共產黨員向他們學習各種知識的時候，不應落後。[15]

由於宣佈了自然科學沒有階級性，科學家們開始批評黨的幹部對科學的干涉和無知。蘇聯的正統觀念也遭到質疑，對在政治上仍然很敏感的遺傳學問題，科學家們展開了一場引人注目的自由辯論。但總的來說，知識分子對讓他們自由地「大鳴大放」持謹慎態度，一次講話不足以消除六年壓制產生的恐懼。陸定一的講話本身也不可能完全打消知識分子的顧慮。他反覆談到胡風的「反動」的、「反革命」的思想，只能產生唇亡齒寒的效果。他還警告說「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也沒有做完」，[16] 其效果與上面同出一轍。此外，陸還仔細地在「朋友」與「敵人」、「人民」與「反革命分子」之間劃了界限 —— 界限不清的界限。用什麼來保證知識分子公開發表的觀點不會被用來當作他們是「敵人」或「反革命份子」、而不是「人民」的證據呢？

多數黨員幹部公開的敵意更讓知識分子發慌。毛雖然鼓勵知識分子大膽發表批評意見，但他們日常工作中接觸的黨員幹部可不會進行這樣鼓勵。正如民盟主席、北京政府的部長羅隆基後來對問題的解釋所言：

> 一年來在學術思想方面，「百花齊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基本原因還在於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至花不敢開，家不敢鳴。這種現象的發生，在我看來，主要是某些黨員幹部和黨外少數進步人士，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缺乏正確的認識和體會。他們認為這兩個口號提出以後，今天社會是淫辭放恣，異端猖獗，他們就熱心於尊統衛道的工作。[17]

雖然如此，到了1956夏季，很多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在作家協會和文學雜誌組織的專門座談會的鼓舞下，開始就純粹文學意義之外的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批評的矛頭主要是官僚主義的弊端和官僚機構的臃腫，批評充滿了毛主義期待的時代精神。他們批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廉價的樂觀主義」，呼籲恢復十九世紀的西方現實主義，暴露而不是掩飾真實的社會情況和群眾生活的疾苦。他們批評黨忽視

了馬克思主義中的人道主義思想。一年前胡風曾因之入獄的許多思想，現在隨處可聞，1950年代初寫成後出版不了的作品現在付梓。在北京大學1956–1957學年的課程表上，排著凱恩斯的經濟學課和羅素的哲學課。一直被認為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異端的計劃生育問題(知識分子提出這個問題就是異端，但自從1954年後，官方內部一直悄悄地研究和提倡計劃生育)現在可以堂而皇之地公開提倡。

1956年9月黨的「八大」正式批准(較之同意還進了一步)了開展雙百運動，儘管如此，黨的絕大多數機構和黨的許多高級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反對這場運動，知識分子批評官僚主義的文章證實了他們的懷疑，即毛澤東的政策對他們的地位和權力構成威脅。11月發生反斯大林主義的匈牙利事變，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運動的敵意。雖然中國與匈牙利的情況毫無類似之處，但他們還是對兩國發生的事件進行類比。匈牙利知識分子的自由導致工人反對共產黨國家的暴動，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強烈騷動，尤其是在年初中國工人發動了空前的罷工浪潮之後，難道不會引起同樣的後果？中國領導人是否真的擔心會發生匈牙利事變姑且不論，但匈牙利革命卻給了他們反擊的藉口。同年底，黨的機關警告，「毒草」正在百花中蔓延。對黨內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批評突然變成了黨對知識分子的「右傾主義」的批判。1957年初的幾個月，雙百運動受到壓制，應邀對黨進行批評的知識分子，靜候著黨內官僚的報復。

1957年2月底，毛發表了著名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對知識分子的報復推遲了，雙百運動以更激進的方式復甦。毫無疑問，毛的這一長篇講話是社會主義時期「毛主義」最重要的理論文獻。要理解它的意義，就必須回到1956年後期黨內有關社會經濟政策的分歧，分歧把黨分成了「毛主義」和「非毛主義」兩派。

* * *

1956年，中國領導人在慶祝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工業成就的同時，著手準備將於1958年開始實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當時，中國經濟的計劃者儘管也調整了某些形式，但仍然遵循蘇聯的發展模式。雖然這

些調整並非毫無意義，但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框架和指導思想，依然與指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蘇聯模式基本一致。優先發展重工業，並相應地強調當務之急是培養現代科學技術人才。[18] 工業化意味著城市工業化和城市化，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正如周恩來在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熱情地宣佈的：「我們將要建設許多新的城市和擴建許多原有的城市。」[19] 此外，一般認為，建設現代的工業基礎是進一步朝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根本前提。這樣，毛由於過早地強行推進農業合作化而受到指責，因為落後的工業條件不可能完全滿足社會主義農業對機械化和技術的需求。

毛反過來加強了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批評。他認為，第二個五年計劃只會強化前四年迅速發展的工業化已經產生的不良的社會、政治和思想後果。這意味著官僚機構進一步膨脹，鞏固已形成的專業化精英和官僚精英，現代化的城市和落後的農村之間的差距更加拉大，推遲激進的社會變革，以及意識形態上的衰變。1956年4月，毛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他的建議，即他〈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原文十年後才發表）。這篇講話用詞隱晦，但明確要求放棄蘇聯式的五年計劃，並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戰略。同過去一樣，還是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但投資將集中用於發展輕工業和農業；除了利用和發展沿海先進的工業外，還要發展落後的內陸和偏遠地區的工業；除大規模的城市重工業外，重點將放到發展中小工業；除中央部門的行政指令（及下放到地方部門的控制）外，相對自由的地方企業將成為社會經濟的主要單位；更多地發展勞動密集型的項目以代替資金密集型項目；用精神鼓勵代替物質刺激。迅速的社會變革與迅速的經濟發展同步，這兩者的決定因素是群眾的創造性和思想覺悟。不是要放慢現代經濟發展的步伐，實際上，是要加快發展步伐，但發展的方式、產生的社會和政治意義都與過去大不相同。[20]

1956年黨的八大通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文件，基本上沒有反映毛關於經濟發展的非正統的觀點。由於毛當時已不像過去那樣在黨內享有絕對權威，因此他的意見才有可能被忽視；無論一個人可能享有多麼崇高的個人威望，但一個龐大的常規官僚機構很難聽命於某一個人的意志。1955年，為了實現迅速發展集體化的計劃，毛曾淩駕於黨

中央之上，直接向農村幹部和農民發出號召，這一舉動引起黨內領導層的不滿。1956年的形勢不再有助於這種「絕技」的再現，赫魯曉夫在2月對斯大林和「個人統治」的弊端的抨擊，削弱了毛的地位。1945年後首次舉行的黨的代表大會，即黨的八大，是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的；正是劉和鄧而不是毛，向大會作了主要報告——強調加強黨的集體領導。新黨章中刪去了「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的話。八大重新設立了1937年曾被取消的總書記一職，進一步削弱了毛的權力。鄧小平被任命為總書記，他開始行使對黨的組織機構的控制權。毛後來指責說，黨的多數領導人在1956年「不理會」他的意見，這種說法是有充分根據的。毛依然享有巨大的個人聲望，但黨內已大權旁落；他依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大師，但不再是政策大師。

正是當毛在黨內政治上相對無權，他又認為保守的國家和黨的機構阻礙著激進的社會變革，1957年2月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這樣，關於經濟政策問題的分歧與政治權力問題便聯繫在一起。消除官僚機構對毛提出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反對，是毛的當務之急，2月講話的目的就在於此——它確立了毛意識形態的合理性，觸發了一系列毛將自己置於黨之上（至少是黨的領導層之上）的政治事件，毛再次以最高領導人的身份直接向「人民」講話。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旨在重新恢復雙百運動，運動在過去兩個月被黨的官僚機構匆匆壓制下去。毛的講話不是在黨的會議上，而是在最高國務會議（即國家機構）擴大會議上發表的。正如他在1955年7月通過非黨論壇發表關於農業合作化的講話一樣，毛此時又一次繞過黨的正常渠道宣佈新政策和新理論。在這兩件事上，毛的立場都沒有得到政治局多數成員的支持，黨中央兩次面對的都是既成事實。毛的2月講話直到6月才正式發表（經過修訂的版本），但原文的主要內容很快就在知識分子內部流傳。

黨的機構已經把不同意見壓制下去，而且致力於清除1956年下半年有限的「爭鳴」產生的「毒草」，毛這時發表這篇講話，其意義不僅在於重新邀請知識分子暢所欲言，而且在於他講話的出發點是認為黨不是當然地具有對正確思想的壟斷權，因此，黨需要聽取來自黨外的意見。之所以有必要把雙百運動繼續開展下去，不僅是為了發揮知識分

子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矛盾不是新發明，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不可避免的、普遍的和永恆的 —— 這就是長期以來毛主義理論的主要原則。毛就「對抗性」矛盾與「非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與「敵我」矛盾的區分，也不是新提法。假如毛僅僅是重申這些眾所周知的觀點，那他的講話也就不會產生任何政治或思想上的轟動效應。這篇講話的政治意義 —— 和政治威脅 —— 在於提出了兩個新命題，這兩個命題是未來文化大革命的預兆。在毛列舉的許多矛盾中，他特別強調的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矛盾不僅僅普遍存在於政府與群眾之間，而且尤其存在於「領導者」與「人民」之間；而「領導者」不單純是指下層官僚機構的官員。毛沒有排除與人民發生矛盾的領導者可能是黨的高層領導人，也沒有排除在某些問題上領導者可能是錯誤的而「人民」是正確的：「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是毒草。」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是這樣。[21] 只有經過一定時間的思想鬥爭的考驗，才能夠區別正確的思想與錯誤的思想。既然黨和黨的領導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黨就應該接受來自人民的批評。毛宣稱：「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既然所有擁護社會主義的人都屬於人民的範圍，那麼黨聽取批評意見的範圍和領域也是非常廣泛的。這樣，從理論上講，凡在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的知識分子，都有批評共產黨的自由。那些「取得人民信任」的「民主黨派」在「互相監督」的政策下，享有「監督共產黨」的權利。[22]

相比起給所謂「民主黨派」提供進入政治舞台的機會而言，對列寧主義黨的一貫正確性提出的質疑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義。如果現在普通群眾能夠自由地批評黨，那麼，除了毛本人外，又有誰能作他們的代言人？畢竟，毛不僅是黨的主席，而且還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此外，作為人民革命的領袖，毛與人民有著他人無法企及的特殊聯繫。因此，如果人民能夠自由發表意見，那麼毛無疑是他們最傑出的代言人。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觀點，把自己從列寧主義黨的戒律中解脫了出來，使他能以人民代表這種獨一無二的身份從外部對黨提出批評，他亦很快就進入了這個角色。

如果說黨不是一貫正確（所以要接受人民 —— 和毛澤東 —— 的批

評）的觀點暗含著對黨的權力機關、特別是那些反對毛的政策與計劃的人的威脅，那麼另一個命題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威脅。毛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著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主要表現為思想鬥爭。社會主義社會在中國已經建立，階級剝削已被消滅，因此，在基本一致的人民中間依然存在的社會差別和社會矛盾，兩者在性質上是非對抗的，這是毛這篇講話的主要前提。但是，毛對這個前提作了限制，他指出，「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被推翻的剝削階級殘餘還存在。雖然主要不是與剝削階級的殘餘、而是與其思想影響進行鬥爭，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23] 雖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太可能發生實際的較量，但兩個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鬥爭，已足以說明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這一觀點是毛主義長時期發展的邏輯頂點，按照思想態度而不是客觀社會標準來劃分階級和階級鬥爭——它標誌著嚴格的思想決定論的出現，此後，它支配著毛主義。這與幾個月前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闡述的官方觀點直接發生矛盾。「八大」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已經決定性地朝著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階級差別已經縮小成「只是同一階級內部的分工問題」。[24]

毛恰恰在他力主恢復雙百運動之際宣佈階級鬥爭依然存在，這是不祥之兆。既然階級鬥爭已不再是各社會階級之間的實際較量，而是不同階級意識形態上的鬥爭，這就要把曾表達錯誤觀點的人說成是「階級敵人」開闢了道路。人民內部的非對抗性矛盾也就能很快轉化成人民與敵人之間的對抗性矛盾，這樣，就可以用「強制的手段」取代「細緻的說理的方法」。「大鳴大放」的第二階段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結束的。

新理論對毛在黨內的對手具有同樣的政治威脅意義。如上所述，如果共產黨及其最高領導人也不是一貫正確，那麼同樣可以說他們也有可能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如果階級鬥爭現在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那麼就可以用階級鬥爭來解釋黨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黨自身也能成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階級鬥爭」的政治舞台。

這些觀點的政治含義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才完全明晰，但是在1957年，毛已為最後的結論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其後的歲月裏，他步步朝著最後的結論靠近。

雙百運動的復興是毛2月講話的第一個政治結果，但不是立竿見影的。運動受到黨的組織的抵制，知識分子也持懷疑態度。很難想像黨的幹部對解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矛盾的運動會有什麼熱情，尤其是毛把黨的官僚主義行為說成是矛盾的根源，號召通過群眾對領導的批評和監督解決這種矛盾。黨組織的抵制增加了知識分子的疑慮，他們懷疑毛的號召會不會是個圈套。歷史學家翦伯贊形容說：

> 例如，知識分子不得不考慮關於百花齊放是出於真心或者僅僅是個姿態。如果是真誠的，知識分子還得琢磨允許百花開到什麼程度，是不是花一開就往回收……他們得考慮哪些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哪些問題是不能討論的……一些單位的領導幹部只是在嘴上響應號召，沒有採取實際行動促進百花齊放……知識分子還是不敢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25]

但毛的態度不變。雖然毛的2月講話沒有公開發表，但《人民日報》已披露了講話的主要觀點。黨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領導人保證會真誠地歡迎批評，各大城市都在3月和4月召開了座談會。毛在一次知識分子集會上，再次強調共產黨歡迎、也需要批評，他敦促黨中央正式同意開展「大鳴大放」。4月底，黨開始了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弊端的整風運動，運動採用「和風細雨」方式，但整頓的對象顯然是共產黨，非黨內的知識分子則成了進行整頓的人，批評的焦點是「領導與被領導」之間關係這一突出的政治問題。

一旦黨的領導和幹部受命不得干涉人們自由發表意見，3、4月在官方組織的會議上欲言又止的涓涓細流，在5月和6月初就匯成社會批評和政治批評的洪流。官方對批評意見沒有進行反駁，似乎證明黨的領導人真誠地歡迎批評意見的承諾的嚴肅性，因此，批評越來越大膽，意見也越來越尖銳。運動的發展也越來越帶有自發的色彩。除了「民主黨派」和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座談會外，一些其他社會組織也召開

了非正式的會議。報紙大量報道了批評的意見和講話，但是更尖銳的批評是貼在學校裏和公共建築牆上的大字報。人們感情衝動，用越來越嚴厲的語言表達長期受到壓抑的思想和感情。

一時間，氣氛很像1919年五四運動初期的情況，當時，整個國家都瀰漫著擺脱過去壓迫的解放意識和反對舊思想、舊體制的自由情感。確實，許多參加運動的學生都把自己比作五四運動的先驅。但與五四運動不同的是，雙百運動被禁止從城市知識分子圈擴大到城市其他階層的群眾，沒有召開過讓工人、農民參加的座談會。雖然一些知識分子也談到了群眾的生活條件，為群眾的利益呼籲，但運動基本上只限於知識分子和學生的範圍內。

在允許知識分子進行批評的短暫日子裏，知識分子的意見無所不有，小至對日常事務的不滿，大到對社會政治制度的批評。許多知識分子只限於呼籲專業領域的自由權，其他一些人則直接論及根本的社會與政治問題，諸如共產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公開討論這個問題。1954年的憲法規定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無論是憲法還是毛主義理論，都規定了民主黨派的自由和參政權利。然而，在政治實踐中，他們沒有這樣的權利，民主黨派只有同意中國共產黨秘密地作出的各項決定的「自由」。對於重大事件，共產黨既不事先與他們協商，也不允許他們反對。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級人民代表會議，情況都是如此；因此，有人問道，「統一戰線」、四個階級的「民主專政」以及共和國憲法意義何在？還有人對黨組織和黨員濫用職權的行為提出了詳盡的批評，進而涉及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即一黨執政的合法性，以及共和國政府與黨事實上沒有任何區別的問題。雖然大多數提出政治敏感問題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説自己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但他們還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是反對「黨對國家的壟斷」。

知識分子還要求實行「社會主義民主」，正如當時在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一樣。有人問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居住自由、特別是「不可侵犯」的「公民人身自由」實際情況到底怎麼樣？人們詳細列舉了對這些自由權利的種種侵犯，胡風事件也被反覆提起。為什麼不經過法律審判程序就逮捕胡風？還有建議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在三

反和肅反運動中發生的非法拘捕事件。人們還提出，現在應邀參加「大鳴大放」的人不會遭到類似的厄運。

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各個方面都受到了抨擊。例如，人們批評說，1950年的婚姻法的內容和精神都未得到貫徹執行，甚至一些黨員還繼續用封建態度對待婦女，中華全國婦女民主聯合會對依然存在的壓迫婦女現象不聞不問。

最引人注目的批評，是用共產黨自己的社會主義標準來批判共產黨的行為。儘管因為所謂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雙百運動時期的批評很快銷聲匿跡，但實際上，人們批評的並不是社會主義本身，而恰恰是共產黨沒有遵循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則。對共產黨來說，最具有威脅性的，是雙百運動中，有人批評共產黨背叛了自己的社會主義信念和革命理想。這些批評形式不同，但結論卻是一致的，即共產黨已經拋棄了革命傳統，正在成為一個「新階級」，正在加大而不是縮小社會經濟的不平等。中國農工民主黨的一位領導人這樣形容說：

> 黨在過去領導群眾進行革命的時候是站在群眾中間；解放後，黨的地位發生了變化，黨不是站在群眾中間，而是站在群眾後面統治群眾……(領導人)職務不同不等於身份不同。一些的人的官位意識強烈，吃飯和看戲都得有專門的位置。[26]

人們批評黨員幹部採取舊時達官貴人和國民黨官僚的態度，享受著類似的特權，住的是豪宅，僱著傭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貴族學校」讀書，享受專門的度假聖地、娛樂設備和醫療保健 —— 所有這些都與群眾無緣，以群眾的利益為代價。一位批評者問道：「誰在享受高級生活標準？是黨員和黨員幹部，過去他們穿的是草鞋，現在他們坐小汽車，穿毛料制服。」[27] 結論正如一位老革命在致毛澤東和黨中央的信中所言：「存在著一個特權階級。雖然還沒有形成全國性的階級，但這個階級的萌芽正在形成和發展。」[28] 黨脱離群眾，特別是脱離農民，以及黨佔有越來越多的不相稱的勞動群眾生產的產品份額，這意味著將再現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分裂。

對共產黨政權的馬克思主義批評家來說，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不是脱離社會發展的性質與內容的抽象原則。自由也不是知識分子獨享

的權利。自由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基本手段。全體人民享有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對於遏制官僚主義的發展、防止新的官僚統治階級的形成與鞏固、實現真正的社會平等都是必需的。一個享有特權的執政黨吸引著那些脱離群眾、高高在上的野心家和官僚。只有消滅了特權，才能吸收真正的革命者加入共產黨。因此，他們要求減少專職官員的數量，廢除他們的特權，讓群眾監督國家機構和黨的機構，由群眾參加管理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在黨內外實行「社會主義民主」。

批評家們不限於譴責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他們還指出，在人民中也出現了不願意看到的不平等現象。他們批評黨對壓在農民身上的沉重負擔視而不見，默認了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差別。他們嘆息工人不能參加工廠的管理、沒有自由工會以及在城市無產階級中造成分裂的新工資級別制度。

令人驚嘆的是，這些批評與毛主義對國家和社會的批評實在異曲同工。就在雙百運動開展之際，毛也嚴厲地批評過脱離群眾、拋棄了「艱苦奮鬥」革命傳統的黨的官僚機構的特權；在2月講話裏，他提出，領導的「官僚主義行為」是引起「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原因。他宣稱「我們要克服官僚主義」。毛對官僚主義的抨擊變得越來越激烈，很快，他就不僅僅指責「官僚主義行為」，而是要求消滅「官僚主義階級」，與1957年的批評者一樣，他發現這個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毛在1957年就批評説：「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願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29] 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中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特別是城鄉差別的發展。他在2月講話裏簡短地談了這個問題，指出：「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資以及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是高了一些，農民看了不滿意是有理由的。」[30] 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義各項政策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用平均主義方式來縮小城鄉差別，消除城市特權階層；甚至就在1957年內，毛便著手縮小城市工人中間的工資差別，推翻1956年的「工資改革」。

然而，1957年春季的社會主義批評家們，不久就被當成了「社會主義的敵人」，在反右運動中被指控為「反革命分子」，從而悲劇般地結

束了雙百運動。毛領導了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運動，運動的受害者中有很多人對中國社會的條件、以及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缺陷，持有與毛相似的觀點。具有諷刺和可悲意味的是，正是毛邀請知識分子參加「大鳴大放」運動，知識分子對社會和政治提出的批評與毛基本一致，但也正是這樣而為毛所迫害。毛雖然在平均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目標上與知識分子相同，但他不贊成他們關於自由和民主的觀點。毛不願意承認，建設政治民主制度，從制度上保證思想自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部分。事實證明，這正是「毛主義理論」的致命缺陷之一。

除了抨擊官僚主義和不平等現象外，雙百運動還涉及到其他一些為毛很快採納和支持的批評意見，特別是涉及到面對蘇聯及全盤採用蘇聯模式的批評。一些人抨擊俄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拆除中國東北的工業基地，迫使中國承擔朝鮮戰爭的代價，對給中國的經濟援助附加政治條件和高額利息。1957年，這些人被痛斥為「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分子」，但在三年以後，毛和其他領導人用更嚴厲的語言譴責蘇聯。還有一些人批評在學校裏「機械照搬」蘇聯的全部課程和教科書，「盲目模仿」蘇聯的科學與工業的理論與技術，這種批評正好發生在毛主義全盤拋棄「蘇聯模式」的前夕。教師與學生批評中學和大學裏的等級差別和形式主義的作法，這正是毛主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抨擊教育制度的內容。人們抱怨當局忽視群眾保健預防工作，醫生的主要精力都用於照顧黨的官員，傳統中醫不受重視等等；毛不久也提出了類似的批評。人們還批評政府「把過多的注意力放在城市」，1957年夏天，在反右運動的高潮中，文學評論家陳企霞被指控參與了一個反黨陰謀，指控的證據包括一份報告，其中説到農民或許會因為「城鄉生活水平的過分懸殊」而造反。六個月後，毛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運動的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要縮小城鄉差別。

大學生是雙百運動中最激進、最不受約束的批評家。所謂的「大學風暴」在5月19日開始於北京大學，學生們忙於在校園建築上和教室裏張貼大字報，表達自己的批評意見，教室裏空無一人。「大字報戰役」的主要場所被冠之以「民主牆」，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的第一份中譯稿就出現在這裏，是譯自紐約《每日工人》(*Daily Worker*)

的節選本。運動在這裏發展成集會、遊行和露天大會，活動的中心地點是重新命名的民主廣場。像五四運動一樣，全國各地的大學都傚仿北京學生的榜樣。學生的批評意見與老知識分子的意見基本一致，只不過學生更強調縮小黨委在大學的權力，消除蘇聯對中國教育的影響。此外，學生的「大鳴大放」更具有政治色彩。大學生成立了一些準政治組織(例如百花社)，這些組織散發傳單，組織集會，出版油印小報。討論會常常變成了「批鬥會」，黨員幹部和學校管理者成為鬥爭對象。一些學生領導人很快便在全國聞名，其中最著名、最敢言的是培養幹部的中國人民大學的林希翎。她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抨擊「新的階級」制度，指出除非中國實行真正的民主，否則中國就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到6月初，日益發展的學生運動(已從大學發展到中學)火藥味越來越濃，甚至出現了暴力行為。有報道説，一些學生佔領了大學辦公室，攻擊黨和政府機關，扣留學校幹部和黨員幹部作人質。學生們還模仿五四運動的先驅，企圖「走向人民」，去組織工人和農民，但沒有成功。

雖然剛剛萌發的學生運動在6月中旬就被制止，但學生如此迅速地自發組織起來參加反對當局的政治活動，預示著未來中國政治運動的特徵。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現象以更大的規模重現，但政治環境和政治目的已迴然不同。1957年的「大學風暴」比起九年後毛發起的運動，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　*　*

《人民日報》6月8日的社論標誌著雙百運動的結束。此前，黨的權威報刊一直未發表社論性的文章，只限於報道批評家提出的意見。現在，《人民日報》宣稱，「右派」濫用他們的自由權利去攻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相繼發表的社論具體駁斥了「大鳴大放」時出現的各種觀點，警告出現無政府主義的危險，強調要用階級鬥爭對付那些在運動中自我暴露的敵人。6月中旬，知識分子用來批評黨的座談會變成了黨的幹部批判批評家的論壇。反右運動開始清查黨內外持有異端的不同政見

者，運動持續了一年時間。「百花齊放」仍然是官方政策，但目的不再是栽培鮮花，而是為了根除「毒草」。

為了防止有人利用毛澤東尚未正式發表的2月27日講話作為繼續批評黨的根據，6月18日毛修訂後的講話正式發表，為壓制批評聲音進行論證。公佈的版本附了一個説明，稱作者對原記錄稿作了「一些補充」，補充的內容中將可以容忍及不可容忍的意見區分為六項準則。這些事後的標準模糊得足以把任何一個批評者逐出「人民」行列 —— 而且只能由黨來決定某一觀點是加強還是削弱了「共產黨的領導」，是有利還是有害於「社會主義改造」。從當時的講話的原始錄音稿(其中部分片斷當時見於波蘭)判斷，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增刪。例如，毛在2月講話中說：斯大林犯了錯誤，他把內部分歧當成外部對抗，導致了恐怖統治，殺害了成千上萬名共產黨員。6月發表的版本刪去了這段話，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正準備將迄今各種「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的階級矛盾。刪除的還有毛的警告，他說，用恐怖的方式處理內部的對抗性矛盾，會使這些矛盾變成以國家敵人的形式出現的對抗性矛盾，就像匈牙利的情況那樣。而6月版本卻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我國有些人感到高興。他們希望在中國也出現一個那樣的事件……」在反右運動中，一些知識分子被指控模仿匈牙利的裴多斐俱樂部(Petofi Club)，妄想在中國煽動推翻共產黨統治的暴動。毛在2月講話中批評了那些反對雙百政策的黨員幹部，把他們的反對歸結為「害怕批評」。因此，他說「沒有必要擔心雙百方針會產生毒草」，並補充道，即使是毒草也會是有益的，相比之下，在6月版本中，他強調需要辨別「香花和毒草」。官方出版的版本要比原來講話的口氣更加嚴厲，這樣做是出於壓制知識分子的需要，因為知識分子的批評已經超出官方能夠接受的程度。

反右鬥爭的最嚴厲的打擊對象首先是那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羅隆基和章伯鈞(兩人都是中央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是最公開的靶子，儘管他們都是最謹慎的批評家。經過無數次報紙的公開批判和整風會議後，他們被迫承認自己組織了一個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見不得人的陰謀」。最初的坦白被認為是不徹底的，他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交待。雖然「大鳴大放」時期不過才一個多月，但他們的懺悔卻一

直持續到1959年春季。這種公開交待與斯大林時期的俄國對待不同政見者的作法類似。例如，在「坦白」了各種令人難堪的政治罪行和思想罪行後，羅隆基在結束自我批判時說：「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領導黨，對不起民主同盟的幾萬個同志……我要徹底改造自己，並且今後要忠誠老實的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來為中國人民服務。」[31] 章伯鈞在詳細地檢查了「我的反動政治綱領」後屈辱地說：

> 當前全國人民要求給我這個右派分子以嚴正的處分，這是理所當然的，我願意接受。我恨自己的醜惡，要把舊的反動的我徹底打垮，不再讓他還魂，我要同全國人民一道來參加反右派的嚴肅鬥爭，包括對我自己的鬥爭在內。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過去救了我，今天黨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和教育下，獲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立場。[32]

反右運動前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在兒子對他進行公開批判後，又進行了自我批判：「我誠懇地承認我的錯誤，請求人民給我處分，我向人民投降。」[33]

在斯大林的俄國，自我鞭撻的「坦白」往往被當作判處死刑的證據。中國則不同，在經過一段心理折磨考驗後，懲罰也隨之結束。1957年，羅隆基和章伯鈞都被撤銷了部長職務，但還是恢復了他們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地位，1959年，又恢復了他們全國政協代表的資格。

學生在5、6月間是最激烈的批評家，但官方黨對他們的處理是比較寬大的，也很少讓他們作公開的交待。官方黨的政策是，青年學生是在新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是被舊社會殘留的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誘入了歧途。一些學生領導人被送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但大多數定為右派分子的學生仍然被准許在黨的監督下留在學校。

受到最嚴厲對待的是那些提倡自由反映現實生活的左派作家和藝術家。他們與黨的官僚長期相處的經驗，使他們比大多數知識分子更加多疑，他們只限於間接地對毛正統的文學藝術觀點提出批評，但這並沒有使他們幸免於難。在反右運動中重新確立了自己中國文學界獨裁地位的周揚宣佈，雙百口號不是像「某些資產階級作家……想像的那

樣」，是一個「自由化的政策，而是一個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戰鬥口號」。「社會主義文化」的戰鬥發展，意味著對社會主義作家進行壓制的戰鬥。周揚需要了結與老對手的宿怨，其中的一位受害者是馬克思主義者丁玲，她也許是中國最富創造性的一位作家。她早年就加入了共產黨，1930年代，曾因政治異端在國民黨監獄中被關押了三年。現在，丁玲因被指控煽動反黨活動、攪亂了青年作家的思想而被劃成右派。她被開除出黨，在作家協會的職務也被撤銷，遣送到北大荒進行「勞動改造」。她的作品也從圖書館的書架上消失了。類似的命運也降臨到那些不願意坦承政治罪行的其他文學作家頭上，作家協會成為懲罰異端作家的警察機構。

這樣，對雙百運動的鎮壓，摧毀了中國建立在普遍民主基礎上、伴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希望。它強化了黨對國家權力壟斷的事實，撕掉了「民主黨派」可以在國家政治領域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最後一層外衣。它使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緘口默言，在政治和思想上對知識分子進行更嚴厲的壓制；它恢復了毛主義觀念在文學藝術界的至尊地位，但卻窒息了中國的思想界和藝術界。

為什麼黨和毛背棄了自己關於一個更民主、更自由社會的諾言，又破壞了自己關於決不報復那些應邀自由地「大鳴大放」、公開向黨提出批評意見的知識分子的莊嚴保證？其動機確實令人費解，時間的流逝使這一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就雙百運動一直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當時在中國國內和國外都流行著一種看法，認為整個運動都是共產黨領導層為清查不同政見者設下的圈套，一個馬基雅維里式的陰謀 (Machiavellian plot)，一旦他們自我暴露便立即給予懲罰。反右運動確實使雙百運動變成了這種情況，某些黨的領導人後來也宣稱，這就是運動本身的目的。7月12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黨是故意讓「毒草」出籠的，以便摧毀毒草的栽培者。1958年5月，劉少奇在解釋雙百運動方針時說：「我們允許社會主義的毒草出籠，讓人民通過比較的方法，認清這些毒草的實質，產生義憤，團結起來連根剷除它們。」[34]

這種事後的解釋，對維護一貫正確、團結統一、始終如一的列寧

主義黨的形象大有好處。但1956–1957年時的黨不是磐石般的統一體，當時所有的迹象都表明，雙百運動是毛不顧多數黨的領導人的反對而力主發動的，故不存在著黨為什麼背棄自己諾言的問題，因為黨從來沒有作過任何承諾；問題在於為什麼毛在作出允諾後又違背自己的諾言，這個問題的兩部分都不易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在發生東歐動亂、特別是匈牙利事件後，毛要創造一種寬鬆的政治氣氛以防止中國出現類似暴亂，但當雙百運動看來要威脅到共產黨權力時，他又收緊了政治韁繩，這也許不無道理。毛在1957年2月講話中，或至少在6月的修改稿中，明顯反映出對匈牙利革命的深切關注。不過，雖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有可能影響雙百運動第二階段的時間安排和結果，即2月講話和5、6月的「大鳴大放」，但事實上，還是在1956年秋的波蘭動亂(中國支持這一反蘇聯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前，甚至在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發表關於斯大林秘密報告之前，毛就已經在提倡雙百方針了。毛的動機看來比「讓人講話」的理論更加複雜和矛盾。

雙百方針是以人民群眾團結一致支持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樂觀前提為基礎。顯然，毛在1955–1956年期間的講話和著述的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從民粹主義的角度出發，把「人民」看作有機的整體，六億人民「團結一致」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人民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以及人民對這種利益一致性的自覺意識，是毛反復強調的觀點。雖然長期以來毛不信任知識分子，他還是相信，儘管大多數知識分子不是社會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絕大多數是「愛國的」，「願意為蒸蒸日上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35]「矛盾」問題的主要方面不在知識分子，而在於黨的幹部「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36] 毛在1956年2月提出的設想(雖然有自相矛盾之處)，是在「所有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平穩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過渡。[37] 對黨實行自下而上的批評和接受來自黨外監督的雙百方針，有助於使黨的領導人不脫離人民，平穩地解決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非對抗性矛盾。毛認為，在向社會主義更高階段的過渡中，來自群眾的批評會帶來更高程度上的團結一致。他還認為，高度團結的人民會懂得，「自由」不應逾越社會主義「紀律」的界限，「民主」應該與「集中」相結合。

雙百方針的另一個思想基礎是毛主義長期以來對鬥爭觀的信念。鬥爭既是目的，又是社會主義過渡所需的正確思想所賴以發展的基本途徑。關於馬克思主義，毛強調說：

>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是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們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38]

因此，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依賴於馬克思主義者勇於接受錯誤思想的挑戰。如毛所說：「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如果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39] 沒有錯誤思想的挑戰，馬克思主義就會停滯不前，革命精神也會衰退。因此，「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所以有必要進行這種階級鬥爭。實際上，即使不存在這種階級鬥爭，它也會被製造出來。

一方面，大力強調鬥爭的必要性——而且是無休止的鬥爭——似乎與毛的這一主張相矛盾，即團結一致的人民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道路，和平地解決沿途出現的任何非對抗性矛盾。但另一方面，毛堅信，正是通過鬥爭，「人民」才能提高團結一致的自覺性，在更高程度的思想改造基礎上實現更高程度的團結，始終遵循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毛主義關於團結一致的人民和平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以不斷鬥爭和思想改造為前提。不僅是「人民」和黨外知識分子需要進行思想改造，黨本身更需要進行改造和整頓。來自黨內外的批評意見會促進鬥爭，即使(特別是)批評意見是錯誤的，批評本身也有助於使日趨保守的領導層和越來越官僚和僵化的黨組織恢復生機。

在5、6月間批評的性質和激烈程度，證實了黨的許多領導幹部最壞的擔憂。毛對團結一致的人民和支持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的信念發

生了動搖。儘管他後來也重複了「資產階級右派」的許多觀點，他還是把對中國社會主義缺點的批評，當成對社會主義的攻擊。最讓官方惱火的是青年學生直言不諱的批評，他們成長於1949年後的新社會，很難把他們的錯誤思想歸咎於舊社會的影響。

把雙百運動的結束歸因於黨內從一開始就反對毛政策的保守官僚們，或許不無道理，因為他們最害怕自由的批評，千方百計尋找借口壓制雙百運動，報復批評者；但這樣一來，就開脫了毛迫害響應他的號召的批評者的歷史責任。事實表明，毛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樣，無法容忍超出所謂「社會主義紀律」模糊界限的批評意見。早在5月25日，毛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就表達對運動發展方向的關注，他警告說：「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當運動在6月似乎有導致社會和政治動亂的危險時，他毫不遲疑地動用黨和國家的權力發動了反右運動。他斥責報紙刊登了「反映資產階級觀點的有害文章」。他在夏季幾個月發表的講話中，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的繼續存在，強調加強「紀律」(而不是「自由」) 和「集中」(而不是「民主」) 的必要性。[40] 儘管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根本就不同意開展雙百運動，但毛也決不是讓大家在運動中自由發表意見的倡導者。

如果說對雙百運動的壓制和隨之而來的反右運動，標誌著某些觀察家所說，毛關於全體人民形成新統一戰線的「自由化」理論是失敗的，而他黨內保守對手則勝利，那麼，恰恰是在毛雙百方針的前提中就蘊含著這一失敗。「人民」是團結的統一體，以及和統一體的目標是一致的，這兩個假設本身就埋下了迫害異端的伏筆。如果人民在其目標和利益上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意味著他們發表的意見也會大致相同；而那些發表違背了人民社會主義利益的意見的人，就應被逐出「人民」的行列，他們的言論自由權利也應被剝奪，因為這項權利只能給人民，不能給「敵人」。至於「敵人」，毛在他修訂後的講話稿中輕鬆地說：「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了。」[41] 既然決定一個人是否屬於「人民」的最終標準是看其思想態度，因而「言論自由」從一開始就是一項最受限制、最無力的權利。此外，雙百運動的目標不是以自由表達意見本身為目的，「大鳴大放」只是達到更高程度社會政治統一的手段；雙百運動所依據的毛主義公式是「團結 —— 批評 —— 團結」。

如果批評有導致分裂的危險，那麼毛主義的邏輯和必然反應就是通過運動來收場。

* * *

雙百運動雖然以毛的失敗和黨的機構的勝利告終，但毛主義者很快就把反右運動變成為自己政治目的服務的工具。反右運動以壓制和懲罰知識分子批評者開始，但在7月下旬在青島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毛宣佈要採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式，把運動從城市擴大到農村，目的是鞏固合作化，打擊農村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反對允許發展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的右傾政策。到秋季初期，實際上已經禁止農民在自由市場出售農產品，退出了合作社的農民也被勸説或強迫重新加入。毛對農村的政治控制普遍加強。

毛的最後一擊是把黨的反右運動變成對黨內「右派」的大規模清洗。中共中央於9月正式批准了清洗運動。毛借助於群眾路線的原則，對官僚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保守力量發動攻擊。自1957年初開始的「下放」運動聲勢越來越大，由於黨政幹部都被下放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城市各級機關幾乎空無一人。反右運動進行到1958年時，有一百多萬黨員受到了開除、留黨察看或警告處分。毛主義者在運動中重新控制了黨的機構。與此同時，毛的社會經濟政策也得到黨內最高層的認可。在越來越激烈的反右傾的政治氣氛下，提倡可能被視為保守的政策在政治上是危險的。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激進的農業發展十二年綱要，解決了長達兩年之久的有關經濟政策的爭論。實際上，這也意味著放棄了第二個五年計劃，並直接導致了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毛主義佔上風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推翻了1956年初的工資改革。物質刺激被當作右傾錯誤受到批判。1957年11月，實行了新的更加平均的工資政策，新政策突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

* * *

在雙百運動期間，中國拋棄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開始走上了中國自己獨特的的社會主義道路，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宣佈在意識形

態和社會領域方面與蘇聯及斯大林傳統分道揚鑣。然而，中國雖然打破了斯大林主義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卻未能相應地擺脱政治和思想領域內的斯大林模式，這是一個嚴酷和可悲的歷史嘲諷。對1957年5、6月中進行「大鳴大放」的批評者的鎮壓，使擺脱斯大林政治與思想模式的希望化為泡影。從此中國走上了一條新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這條道路並不是通向雙百運動曾允諾的政治民主與思想自由。

註釋

1. 毛澤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33。
2.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87。
3.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63。
4.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
5.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頁365。
6.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恩來選集》下卷，頁158–173。
7. 官方宣佈的知識分子黨員人數，從1956年的125萬增加到1957的188萬，工人黨員人數只127萬。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132。
8. 1956年4月25日，毛在〈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提出了關於經濟發展的新觀點。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本書第12章中將詳細分析這一報告。
9. 繼〈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後，1956年12月，《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長篇社論。這篇社論主要還是談「斯大林問題」，為斯大林辯解。這篇文章主要回應最新發生的事件，特別是匈牙利事件。
10.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毛私底下對斯大林的看法當然沒有這樣恭敬。例如，在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他說：「中國的革命是違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勝利的⋯⋯按照斯大林的作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的革命勝利了，斯大林又說是假的。」
11. 前揭文。

12. 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人民日報》，1956年6月13日。
13. 前揭文。
14. 前揭文。
15. 前揭文。
16. 前揭文。
17. 羅隆基，〈加強黨與非黨知識分子的團結〉，1956年3月18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6年3月23日。
18.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1962)的建議〉，1957年9月27日。
19. 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1956年9月16日。
20.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67–288。
21.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88。
22. 前揭書，頁394。
23. 前揭書，頁389。
24. 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956年9月16日。
25. 摘引自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雙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1960)，頁28。
26. 前揭書，頁49。
27. 前揭書，頁87。
28. 前揭書，頁75。
29.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9。
30. 前揭書，頁382。
31. 羅隆基，〈我的初步交待〉，《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
32. 章伯鈞，〈痛改前非，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人民日報》，1957年7月16日。
33. 《人民日報》，1957年7月15日。
34. 劉少奇，〈目前的形勢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未來任務〉，1958年5月5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35.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0。
36. 前揭書，頁384。
37. 前揭書，頁387。
38. 前揭書，頁389。
39. 前揭書，頁391。
40. 參見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和〈1957年夏季的形勢〉，《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434–439，頁456–465。
41.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1。

第十一章

不斷革命：大躍進的思想淵源

1958–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是毛主義對早期工業化產生的後果的反應。在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國共產黨人相信，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裏建設社會主義，必須首先實現城市工業化，為建立新社會創造必要的但失敗的資本主義未能提供的物質前提。1956年，毛澤東和黨的其他一些領導人得出的結論是，這條道路的社會代價太高了，社會主義者無法承受。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導致了官僚主義發展、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特權階層、現代化的城市與落後的農村之間差距日益擴大，以及意識形態逐漸衰退。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後果，似乎使中國日益遠離而不是接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毛主義認為，社會主義的目的只能通過社會主義的手段才能實現。毛主義解決城市工業化弊端的辦法是使農村工業化。在農村新成立的人民公社這種形式下，毛主義者找到了把社會主義目的和手段有機結合起來的理想載體。人民公社能夠適應現代經濟發展的需要，與此同時，它又能成為中國向共產主義社會烏托邦「躍進」的基本社會單位。在1958年夏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毛主義者通過實踐，否定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主義理論中已揚棄的蘇聯正統觀點，即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和迅速發展的工業化互相結合，就會自動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原打算於1958年開始實行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並沒有正式被取締，但只能靜靜地在經濟計劃者的繪圖板上蒙塵。

大躍進沒有具體的藍圖，它不是一個類似於五年計劃的經濟計

劃，而是一種烏托邦社會觀的產物。1958年1月首次提出大躍進口號時，毛描繪了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總的指導方針，但當時他的腦子裏還不可能有一個明確的「人民公社」的概念。然而，毛關於大躍進的思想背後，是一系列的理論假設和一種獨特的經濟發展觀，人民公社正是這些理論的邏輯產物。

大躍進的思想動力深深植根於革命年代的毛主義。革命年代奠定了毛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及將其付諸實踐的許多思想原則，在革命勝利十年後，這些原則再次浮現。毛把人的意識和道德品質當作歷史進程的決定性因素的唯意志信念，認為農民中蘊藏著真正的革命創造性的民粹主義觀，又視落後為革命的有利條件的特殊信仰等等——這些革命年代的信念再次發揮作用，並有了更激進的詮釋。這些信念與革命勝利後十年的經驗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在大躍進前夕宣佈的「不斷革命理論」。

1958年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的未公開的講話中，提出了「不斷革命」論，在將於三天後在黨內傳達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中，他詳盡地解釋了「不斷革命」的概念。[1] 1958年5月，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的講話中公開引用了這個概念，他宣稱，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的指導下前進的。[2] 這個概念在大躍進時期的理論文獻中十分醒目，不久，不斷革命理論就成為「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不斷革命」這個術語最初是托洛斯基提出來的，但馬克思也用過這個概念。簡略回顧一下這個思想的早期歷史，有助於理解毛如何因為這一理論的運用而奠定了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

馬克思主義與不斷革命論

「不斷革命」，或更準確地說，「不間斷地進行革命」這一概念，是馬克思於1850年提出來的。馬克思是針對在1848年那場失敗的革命中，相對落後的德國對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保守主義作出的反應而提出這一理論。馬克思預期，另一場歐洲革命即將到來，在這種情況下，他考慮的是在一個無法依靠資產階級實現民主革命的國家裏，尚

不成熟的無產階級的作用如何。他的結論是，無產階級一旦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就不能允許膽怯的資產階級使革命進程半途而廢。無產階級將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立即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3]

如果德國工人要追求自己的階級利益，不為資產階級所誘惑，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4]

「不斷革命」的思想，修正了馬克思原來關於社會經濟發展的每個階段都各有一個嚴格規定的政治階段的命題。這為後來經濟落後國家裏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權威理論根據，至少是在國際革命形勢的環境下，即使是弱小的無產階級也能夠抓住政治時機，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

1850年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再沒有明確出現過「不斷革命」的概念，在後來數十年裏，也沒有出現他們早期預料的革命形勢。1905年後，在不同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中，托洛斯基又提出了這一思想，並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因而他被看作是這一理論的最初倡導者。

托洛斯基認為，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特別是俄國工人階級，以及亞洲和中東地區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人階級)比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更有革命性。由於事實證明俄國資產階級太軟弱，政治上又太膽怯，因此它不可能承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這些任務自然落在得到農民協助的無產階級肩上。落後國家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戰鬥性，彌補了它在數量上的劣勢，因此，工人階級將承擔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一旦獲得了政治上的支配權，無產階級就不可能將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革命的必然結果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將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結果又反過來為西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動力，西歐國家革命的成功，則是落後國家無產階級政權生存的保證。1906年，托洛斯基在其經典的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聲稱，「在資產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落後國家裏，無產階級比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裏更快地奪取政權」是完全可能的。[5]

因此，托洛斯基認為，革命在兩個方面將是「不斷」的：首先，經濟上落後國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應該「不間

斷地」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於一個國家，落後國家革命的存亡取決於先進國家及時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在世界革命的環境中，革命才能不斷進行。

這些觀點成為列寧和托洛斯基在俄國十月革命時的指導思想。1917–1918年的事件，撮合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理論與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之間除了語義學意義外的一切差別。直到出現了斯大林主義後，「不斷革命」論才成為新馬克思列寧主義正統的異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取代了世界革命論，所有革命(大概除了俄國革命外)都必須按次序地通過各個經嚴格限定的社會政治發展的階段，這一教義取代了「不間斷」革命論。所以，當毛在1958年1月宣佈「要講不斷革命論」時，[6] 難免沾有「托洛斯基主義」之嫌，不久他也聽到了這樣的指責，儘管事實上這樣的托派分子只有在人民共和國的監獄裏才能找到。無怪毛又匆匆地補充道，不應把他說的「不斷革命」論與托派理論混為一談——儘管兩者之間確有極大的差別，但也有重要的相似之處。

毛主義與「不斷革命」論

在共產主義實現以前，整個革命進程的特點是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存在，只有通過對既存現實的革命性突破，才能解決這些矛盾和鬥爭——這是毛主義「不斷革命」論的出發點。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進步發展，「必然是一種從量變到質變的關係。各種突變、飛躍都是一種革命，都要通過鬥爭，『無衝突論』是形而上學的。」此外，矛盾的解決只能是暫時的，因為「不平衡是經常的，絕對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7]

毛強調「不平衡」是歷史發展絕對的和普遍的規律，主要針對制定經濟五年發展計劃的指導思想和思維方式。「不平衡」理論使中國經濟計劃者和多數黨的領導人十分傷腦筋。另一方面，對毛來說，要充分地發揮群眾的生產積極性，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必須把迅速發展經濟與社會改造和思想改造工作結合起來進行；如他在1月28日講話中宣稱的，搞革命必須「一個接一個，趁熱打鐵，中間不使冷場」，[8] 社會

革命和經濟革命要同時進行。「上層建築」的社會主義改造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前提而不是其產物，這是毛主義的中心思想。毛在1958年初提出「不斷革命」論時，還號召進行一場「偉大的技術革命」，但它的前提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已經或即將完成。[9] 毛主義的不斷革命的實踐，如大躍進所表現的那樣，在強調技術革命的同時，更強調培養群眾的「共產主義覺悟」和創造共產主義社會組織的萌芽。毛主義認為，現代經濟的發展始於奪取國家政權，繼而是對生產關係的改造，後者又反過來為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10]

毛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要否定的，不是迅速發展經濟，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種觀點，即相應於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有一個嚴格界定的、或多或少滯後的社會政治發展階段。毛所肯定的，是必須盡快實現「上層建築」變革，即社會關係、政治形式和意識形態的變革，如果要實現革命的目標，革命就必須「一個接一個」地進行。因此，毛在總結1949年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時，十分強調革命進程的不間斷性。幾乎在資產階級革命階段完成的同時（伴隨著土地改革運動的完成），中國就開始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按毛的說法，過渡時期於1956年「基本完成」。1958年這場大躍進運動，不但要實現技術革命，而且還標誌著中國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對毛來說，這是在社會、政治和思想領域內進行的根本性的革命「躍進」。顯然，社會變革的進程要比經濟發展的速度快得多。根據當時毛的看法，在革命勝利後短短十年時間裏，中國已經跨躍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正準備向共產主義社會躍進。但正如毛承認的，中國依然是一個經濟十分落後的貧窮國家。因此毛主義容易被指責為「超越階段」的托洛斯基主義觀點。毛主義者單純利用字面上的正統觀念反駁說：「我們既是『不斷革命』論者又是革命發展的階段論者。」不過，至少在理論上，超越社會發展的「各階段」的速度也太快了，就此而言，毛簡直就是一個超級的托洛斯基主義者。

與此同時，毛還是一個反斯大林主義者。畢竟，斯大林主義的一個根本觀念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是可以通過循序漸進的變革過程來解決的。而毛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鬥爭

需要質的「飛躍」，需要與過去徹底決裂，需要一系列的革命，這顯然是對斯大林理論的否定 —— 正如毛的大躍進實踐標誌著全面否定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持續的革命變革進程將迅速使中國的經濟實現現代化，使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一理論是建立在相信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能完成這種變革的基礎之上。這與當年毛的革命戰略的立足點一樣，相信由正確的思想和道德價值觀武裝起來的意志堅定的人，能夠克服一切物質上的困難，正如毛又以同樣的信念來處理革命勝利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問題。如果說中國缺乏馬克思主義所說的實現共產主義的經濟前提，那麼，在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奮鬥歷程中，人們能夠創造出這些客觀的物質條件，根據「不斷革命」論的要求，這一進程就是要從此時此地開始。在發動大躍進和提出大躍進的社會經濟目標時，毛寄希望於歷史的「主觀」因素，即他所說的人民群眾的「無限創造力」和「極大的社會主義熱情」。

單靠現代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實現，但現代經濟和普遍繁榮是共產主義未來的重要組成部分。毛並沒有幻想原始共產主義烏托邦能夠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生存。從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十分強調「偉大的技術革命」的必要性。他在1958年1月宣佈，中國的工業生產要在15年內超過英國，這成為當時群眾集會最流行的口號之一；毛是在論述不斷革命理論時談到進行技術革命的問題。他在這一問題上的思維方式，也同樣是把人的意識看作是決定性的因素。在分析經濟因素與精神因素之間的關係時，毛描述了經濟落後與思想落後互為因果關係的惡性循環。他指出，由於中國經濟落後，人民的思想仍然受到束縛，人民的創造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克服這一惡性循環的途徑，是提高群眾的覺悟，發揮他們的潛在能力，將其轉化到經濟發展的任務上來。這種任務就像一場打不完的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以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這樣就可以使幹部和群眾經常保持飽滿的革命熱情……」。[11]

這種進程一旦開始，思想和經濟就會在更高階段上形成充滿活力的進步循環，思想發展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同步前進。把「不斷革命」論運用於經濟領域，就是要不斷地用思想政治工作激發群眾的積極

性：「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12]

按照毛主義的世界觀，具有先進思想的人是新社會誕生的前提。從這種觀點中邏輯地得出了指導大躍進的口號：「人是決定性的因素」、「人比物更重要」。最典型的毛主義理論命題莫過於「主觀可以創造客觀」。因此，「不斷革命」論首先是不斷的思想革命化，這是實現中國革命提出的社會與經濟目標的關鍵。

毛主義「不斷革命」論的另一個突出方面──雖然沒有明確表述──是它的民粹主義色彩，認為真正的革命創造力源泉是在農村。正如毛的「人民戰爭」革命戰略是建立在深信農民的自發革命精神基礎上，毛的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同樣基於對農村的信任。1958年與1927年相似，「人民」主要是指廣大農民，毛再次把農村作為進步和新生的源泉。實現人的道德和思想轉變的主體是「先進的農民」，不是城市居民。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不再是城市無產階級的責任，而是由農村人民公社承擔。在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被當成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的機構，在實際上也被視為最終廢除國家的國內職能的機構。大躍進運動方針的重點是使「農村城市化，城市農村化」，「不斷革命」意味著「不斷的」農村革命。

在大躍進運動前夕，毛又提出了他長期信奉的另一個信念：「落後不是壞事」，它是「不斷革命」論的基礎，這亦與唯意志主義和民粹主義信念有密切的聯繫。它與我們通常熟悉的意思不同，不是指在現代世界中，經濟落後國家可以通過借鑑先進工業國家的技術，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毛說的不是壞事，主要是指落後造成的精神和社會的淨化以及有利於革命的政治條件，這與十九世紀俄國民粹派的觀點有相似之處。早在1919年，毛在信仰馬克思主義之前，一方面痛惜中國的積貧積弱和極端落後，另一方面，他看到，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蘊藏著充滿活力的創造性和革命力量，預示著中國光明的未來：「中華民族具有偉大的能力……壓迫越深，反抗越烈，蓄之愈久，其發必速。」[13]從毛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生涯的開始，他就致力於在受現代經濟力量影響最小的社會領域內尋找當代革命的源泉──尚未捲入資本主義生產

關係的農民和未被城市資產階級思想毒化的非城市知識分子。正是從中國的落後中看到革命的有利條件，所以毛在1930年自信地預言：「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14] 由此，在有關中國革命的問題上，他建構了關於革命的農村與保守的城市的二元框架。

1958年4月，毛把落後國家進行革命的有利條件歸結為一個最激進的非馬克思主義公式：「一窮二白」。這個公式集中地反映了毛認為中國人民在進行革命時的獨特優勢：

> 除了別的特點以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15]

「一窮二白」的條件，不僅要求用「不斷革命」的精神去克服它，而且也為向共產主義不間斷地發展提供了可能性。正是由於中國的落後，中國人民才具備特殊的革命精神，能夠把精神力量轉換為物質力量，能夠寫出「最新最美的文字」；何況，毛後來宣稱說「在歷史上，總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戰勝文化水平高的人」。[16]

十九世紀的俄國民粹主義者認為，歷史的「過渡成熟」和道德的淪喪窒息了西方先進國家人民的革命精神，而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能夠避免遭受這樣的厄運，因此比其他國家人民更有革命性。「一窮二白」的理論與俄國民粹派的這種看法十分相似。俄國民粹派宣稱，正是因為缺乏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前工業化的俄國比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更接近社會主義。無獨有偶，毛也宣稱，一窮二白的中國具有革命的特殊優勢，前工業化的中國正在開闢一條通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未來的道路。亞歷山大・赫爾岑 (Alexander Herzen) 曾以「我們一無所有」來宣佈他對俄國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17] 毛在中國的「一張白紙」的條件下看到了未來社會主義的偉大希望。

如果說中國人民的普遍特點是「一窮二白」，那麼其中的兩部分人尤其如此 —— 中國最「窮」的是農民，最「白」的是青年人；窮苦農民最願意革命，青年人最能夠接受意識形態和精神的轉變。「一窮二白」的理論不僅進一步加強了毛關於農民是中國社會真正的革命階級的信

念，而且還標誌著他對青年特有的信心的復活，這種信心是他在1915–1919年新青年運動時期的思想形成過程中產生的。1958年，毛在一次講話中說：「從古以來，創新思想、新學派的人，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18]

毛的不斷革命論與馬克思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是什麼關係？毛選擇了馬克思的用語，尤其在提出不同於蘇聯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時，方採用馬克思的用語，這本身就是意味深長的。毛遣詞上的選擇，標誌著中國在政治和思想上獨立於莫斯科，決心走獨特的中國式的共產主義道路，同時，還反映毛試圖把自己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聯繫在一起，從而建立自己唯意志主義的思想體系。但除了採用這一術語外，毛的「不斷革命」論與馬克思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幾乎毫無共同之處。中國的「不斷革命」論保留了(實際上是誇張了)落後國家可以縮短革命發展的階段，但這種觀點得以出現的歷史環境、它的理論假設的基礎和它提出的方式，這三者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許多重要前提的全盤否定。馬克思和托洛斯基提出的「不斷革命」論的可能性，指在世界革命的形勢下，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毛的這一理論，卻設想中國一國正處於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之中，與世界革命進程毫無關係。馬克思和托洛斯基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個經濟落後國家的成功，最終依賴於先進的工業化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為只有後者才能為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提供物質基礎。毛則認為，經濟落後不是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改造的障礙。實際上，在不斷革命的進程中，落後是激發人的幹勁、促使道德淨化的有利條件，因此，中國能夠在脆弱的經濟基礎上進入共產主義烏托邦社會。馬克思和托洛斯基相信，只有城市無產階級才能將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毛則相信農民是實現革命轉變的真正力量，農村是決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鬥爭結局的主戰場。

毛的「不斷革命」論是建立在對馬克思關於人類創造歷史這一命題的字面解釋的基礎之上，由此得出人的思想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決定因素這一極端唯意志論的觀點。誠然，馬克思認為「人們自己創造了歷史」，但他還說(托洛斯基也持這樣的觀點)：「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

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9] 對毛來說，基本上不存在著馬克思說的對人的意識活動的這種歷史限制，因此，用正確的思想和意志武裝起來而有獻身精神的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思想，「隨心所欲」地改造客觀現實，不必顧忌特殊的國內社會經濟條件，也不必考慮可能包含本國革命在內的世界革命形勢.

與毛的「不斷革命」論密切相關的「一窮二白」論，與馬克思上述觀點背道而馳。馬克思曾警告說(即使是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也堅持馬克思的這種觀點)：「人們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所臆斷的靠『地上的寶藏』，而是靠前人創建而又正在沒落的文化成果，任何強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們擺脫這個命運。」[20] 相反，對毛來說，重要的不是歷來所創置的產業，而是卸去歷史重負之後對現在的信念，正是「一窮二白」的條件使人們有信心創造一個新社會。在備受推崇的「落後不是壞事」的觀點裏，體現不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對客觀歷史力量的信念，與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內在於歷史的進步運動中的思想也大相徑庭；決定歷史發展結果的根本力量是「主觀因素」，即人的思想、道德觀念和具有獻身精神的人的活動。正是在這種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信念中，大躍進的方針得以形成和貫徹。

註釋

1.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2. 劉少奇，〈目前的形勢和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及未來任務〉，1958年5月5日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
3. 馬克思，〈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385。
4. 前揭書，頁392。
5. 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我們的革命》(*Our Revolution*, New York: 1918)，頁84。托洛斯基最初提出這一理論是在他寫於1906年的《結果與前景》(*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4)，頁29–122。

6. 毛澤東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7.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8. 毛澤東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9.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10. 毛澤東在1961年以〈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為題，批評了斯大林主義，詳盡論證了這一問題。參見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出版者不明，1969）。
11.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12. 前揭文。
13. 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湘江評論》7–8月號，1919。
14.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5.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
16.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
17. 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俄國人民與社會主義》（*The Russian People and Socialis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頁199。
18. 毛澤東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603。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171–172。

第十二章

大躍進期間的經濟

大躍進的發展戰略完全基於毛主義所說的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的「革命熱情」，但毛並沒有設想僅憑革命熱情就能帶來現代經濟的發展，伴隨著烏托邦狂熱的還有典型的毛的經濟發展理論。考慮到當時中國具體的社會經濟環境，毛的經濟發展理論並非像現在人們通常形容的那樣不合理。

要理解大躍進的經濟原理，有必要區分毛的經濟發展理論與這種理論在大躍進時期的實施方式。這種區分部份是人為的，因為毛主義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充分展現出來。但是在分析大躍進時，先作一定程度的抽象分析也許更為合理，因為在想做的事情與實際可以做到的，兩者存在巨大的差距。歸根結底，對毛主義者的最終的評價，與對所有歷史人物的評價一樣，必須以他們所做的、而不是他們想做的事情為根據。

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後，中國社會面臨著三個主要問題，獨特的毛主義理論正是在試圖解決這些問題中形成的：第一個問題是日益嚴重的城市失業和農村半失業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未能解決這個問題，而醞釀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也未能提出解決辦法。第二個更普遍的問題是如何加速「原始社會主義積累」的進程；由於幾乎得不到任何可觀的外國投資，問題就變成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國的主要資源，即人力資源；這又帶來了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的效率問題；除了城市工業化的社會後果以外，毛主義者還質疑繼續依賴蘇聯發展模式是否適應中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需要。第三個問題，人們普遍承認中國需

要「技術革命」，問題在於，在不允許享有特權的技術知識階層發展的情況下，如何掌握現代科學技術。

人口、失業與半失業問題

困擾現代世界經濟落後國家的其中一個問題，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業化的速度更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留給當代的遺產，不僅有現代城市和落後農村的「不平衡發展」現象，還有扭曲發展的城市經濟和畸型的社會發展。在城市裏，集中著虛弱的、結構失衡的工業基地，聚集著大量的人口，其中絕大多數生活在現代經濟邊緣的貧窮而骯髒的地方。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大都市，隨處可見這種可怕的社會現象。1949年前中國大城市的情況也是這樣。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最初幾年的統治中成功地解決了城市中最糟糕的混亂情況，但他們未能解決城市中更根本的「人口膨脹」問題。雖然城市工業和城市無產階級的數量在1950年代迅速增長，但城市人口從1949年的5700萬人增加到1957年的1億人，並不全是城市經濟發展做成的結果。大量的城市新居民來自湧進城市、但又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城市失業與半失業的人數越來越多。

政府不願意承認這一問題的存在。1953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多數經濟決策者都認為，迅速發展的工業會給城市迅速增加的人口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在這種設想的基礎上，他們拒絕進行生育和人口控制(計劃生育被批判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馬爾薩斯人口論)，放任農村人口湧向城市。

只是在雙百運動時期相對自由的思想氣氛下，人們才認真探討人口控制問題，並允許計劃生育的提倡者公開發表意見。即使是毛本人，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最初版本裏，也簡單地談到要提倡人口控制。[1] 官方對此事的興趣表明，他們逐漸開始承認工業化解決不了人口問題。而把城市居民送到農村的形形色色的「下放」運動，亦不過是加劇了農村的半失業問題。

1957年，由於前一年秋季歉收，再加上農業合作化的不協調結果，大量農民湧向城市，城市的失業問題到了危機的邊緣。同時，精

簡機構運動、軍隊人員大量復員轉業、中學畢業生上大學的名額削減等，使就業情況更加惡化。1957年下半年開始的大規模下放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緩解城市裏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不過下放的名義，當然不是説為了解決城市或農村的失業與半失業問題。中國領導人認為，城市失業是當時經濟政策中固有的問題，不可能很快就得以解決。即使是在毛非常樂觀的〈十二年農業發展綱要〉裏，也設想用五至七年的時間達到城市的充分就業。中國更正統的經濟計劃者在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承認今後的失業率會越來越高，每年失業人數可能會達到500萬人。[2] 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數量和人口的迅速增長，繼續強調發展大規模的資金密集型的現代工業，意味著更高的失業和半失業率。

1958年，毛主義的新經濟戰略，是要把發展的重心從資金密集型轉向勞力密集型——從重工業轉向相對投資少、主要依靠勞力投入的農業、輕工業和小型工業企業。從這個意義上説，實行這一方針的目的是一勞永逸地解決城市和農村的失業問題；與此同時，這一方針本身還旨在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從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的經濟發展戰略來看，人口的大量增加，不但不是現代經濟發展的負擔，相反還是經濟財富。1957年初，毛還熱衷於人口控制，到1958年初，他則宣稱：「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3] 這樣，便解決了關於人口控制的爭論，計劃生育的鼓吹者再次被指責為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異端。

勞動力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蘇聯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建設作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前提的現代工業基地籌措資金)的任務主要是靠剝奪農民完成的。斯大林有意識地決定從「集體化」的農民身上拿走工業發展計劃必需的資金，農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完全服從於創造一個巨大重工業基礎這個壓倒一切的目標。人們相信，現代工業基礎一旦建立起來，就會產生「幅射」效應，最終使整個經濟現代化。

和蘇聯的情況相似，1950年代中國工業化的資金也主要來自農村。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非常低，廣大農民依然處於生存的最貧

困線邊緣，在這情況下開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並繼續採取斯大林的發展戰略，正如第二個五年計劃所提出的，這樣能否使中國實現現代化是很成問題的，至少，繼續照搬蘇聯模式，就意味著實行越來越強制的剝奪農民的政策。避免因城市利益去剝奪農村，是毛主義經濟發展戰略形成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個重要因素是，通過大規模地發動尚未充分發掘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農民），可以更快地積累資金，也更合理地分配投資。

1958年採取的經濟方針，不是要放棄重工業的發展，更不是一般地對現代經濟採取盧德派（Luddite，即十九世紀初工業革命期間，工廠部份工作為機器取代，工人自發參加運動，並以搗毀機器等方式反對企業主的剝削 —— 譯注）的否定態度。中國人的確希望像鋼鐵、化工和機器製造業這樣的資金密集型戰略工業能夠比以往發展得更快 —— 但不能以犧牲農業和輕工業為代價。相反，所有的經濟部門都將共同發展，以「同步發展」—— 大躍進的主要經濟方針 —— 的方式快速發展。對先進的工業部門還將繼續大量投資，但與此同時，增加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三個經濟部門將有機地共同增長，互相促進。概言之，毛的戰略是，促進輕工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物美價廉的消費品，這對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至關重要，農業產量提高了，又會進一步促進輕工業的發展，這是國家為重工業發展積累足夠資金的根本前提。在三個經濟部門有機地相互促進的理論基礎上，毛曾說過：「你如果是真想發展重工業，那你就要注意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4] 從這一觀點出發，產生了把「同步發展」作為建設現代經濟最快途徑的政策。

「同步發展」在幾乎所有的經濟世界中顯然都是最好的發展道路，但毛的政策是否可行尚有待觀察。沒有人會質疑所有經濟部門以當時流行的「多快好省」為發展願望，問題是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一般認為，現代工業某一部門的迅速發展只能以犧牲其他部門的發展為代價 —— 大多數中國領導人也接受這種理論的社會結果。但如果不減少對重工業的投資，怎樣才能為輕工業和農業的「大躍進」提供資金？毛主義回答說，同步發展的關鍵是利用中國的勞動力資源，通過建立新形式的社會組織和正確的思想指導，就能在一場全面征服自然的鬥爭

中，利用尚未充分開發的人力資源，充分發揮其作用。工業中新的勞動力密集型部門和農業，不但不需要新的投資，還可以創造出資金，這是毛主義的主要觀點之一。

中國的主要人力資源、特別是尚未充分利用的人力資源位於農村，所以，經濟快速發展的新戰略重點是農村而不是城市。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即使是在最好的年景，也只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一部分；如今，促進農村的工業發展將會使農村的勞動力充分得到利用。農閒季節時大批剩餘勞動力，將轉向所需資金不多的中小型工業，農村裏諸如糧食加工業、工具製造、簡單的消費品生產、頁岩油生產以及小化肥廠等勞力密集型企業。也將與農業生產一同發展。這些地方性的工業項目，不僅可以有效利用農村的人力資源，而且還使工業企業更接近原料產地(從而減輕了對簡陋的交通運輸系統的壓力)，消費不適合城市大工業使用的質量差的原料，鼓勵立足於當地需要和條件的技術革新，加快支持大型建設工程和工業項目的資金積累。

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相結合，被認為是符合中國的社會與經濟基礎的選擇。地方工業的發展會促進中國比較落後地區的經濟發展，縮小地區間社會經濟的不平等，而農村的工業化將是消除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的第一步。

毛主義的經濟發展戰略以經濟權力的下放為前提。1957年秋季，曾進行過經濟權力下放的工作，當時中央政府及其經濟部門把相當程度的管理權限下放到省市一級和大型企業(與斯大林去世後在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的改革相似)，但比較起來，1958年實行的毛主義政策更加徹底，要全面剝奪中央官僚計劃部門的職權，把經濟權力下放到基礎生產部門。毛主義認為，要充分利用地方資源和人力資源，就必須下放經濟權限，由地方行使經濟決策權。只有人民群眾在自己的組織中參與經濟計劃，才能充分發揮他們在生產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權力下放和強調地方的發展，不意味或至少不表示要放棄國民經濟計劃，特別是涉及到現代經濟部門更是如此。國家甚至還制定了更加宏偉的重工業發展規劃——「兩條腿走路」的新工業方針，設定以本

地技術與本地資源為基礎，同時實現內地大工業和中小工業的快速發展。由於中小型工業都是勞力密集型企業，所以不會影響到對重工業的投資比例。

技術革命

通常人們說毛澤東的「反技術的偏見」，不是說他對現代科學技術有成見，而是說他對現代技術發展帶來的社會後果的擔心。事實上，大躍進宏偉的經濟藍圖，正是以快速採用大量先進的和中間的技術，以科學知識普及和教育發展為前提，沒有人比毛更重視對科學技術的需要。在發動大躍進時，毛在歡呼社會主義改造成功的同時，對國家的經濟落後感到痛惜，1958年1月，他宣佈：「現在要來一個技術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英國……提出技術革命，就是要大家學技術，學科學。」[5]

然而，對毛和毛主義者來說，經濟目標不能脫離社會和政治目標。雖然沒有人對學習現代科學技術的必要和迫切提出異議，但毛主義者關注的是怎樣掌握，及由誰來掌握現代科學技術。毛擔心的另一個方面是中國過分依賴蘇聯的技術，1956年，他警告說，對於外國的東西，「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6]這裏說的「外國」，無疑是指蘇聯。1958年，他更加明確地提出：「學習應與獨創相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他全面地批評了模仿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他說：

> 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工作幾乎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也相當厲害……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喝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喝雞湯……我們對整個經濟情況不了解，對蘇聯和中國的經濟情況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從。[7]

新的經濟發展戰略開始付諸實施後，毛決心打破對蘇聯的技術依賴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不僅因為蘇聯提供的許多技術不適應中國的情況，尤其不適應新經濟戰略重點發展的農村小型工業，而且主要因

為擔心中國對蘇聯經濟和技術的依賴會導致政治上的依賴，這種心理也是由來已久的民族主義情緒的反映。[8] 此外，經濟和政治依賴會導致心理依賴，心理依賴又遏制了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在毛主義看來，照搬外國的東西會使人的精神受到束縛，產生消極思想，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以及生產力的解放)，需要「自力更生」精神。因此，毛關於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的要求，是舊的民族自尊心與新的經濟考慮兩者結合的反映，這種要求蘊含著大躍進時期的主題——「自力更生」的原則。

雖然黨的多數領導人和非黨內的知識分子與毛一樣，希望結束照搬蘇聯模式的狀況——實際上，雙百運動中人們就此提出過尖銳的批評，但其中許多人對毛提出的技術發展方針持保留態度。毛的方針概括起來，就是在不依靠科學家和技術專家的情況下，自行發展和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對黨的經濟計劃者而言，這種方針近乎於荒唐；對技術專家來說，這是對他們職業的威脅。

但對毛來說，科學技術在政治上不是中立的事物，如果對之不聞不問，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就會導致技術精英集團的形成，培養官僚主義，產生社會不平等現象。雖然黨的領導人在1956年就免去了科學技術的「階級屬性」，毛在1958年1月又恢復了科學技術與政治和社會的聯繫，他警告說，關於「紅」與「專」的的關係，容易產生不問政治的傾向，「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9] 在毛說的「技術革命」裏，只有政治而不是技術人員，才能保證現代科學技術手段的運用符合社會主義的目的。

兩年前，即1956年，在談到技術人才時，周恩來認為問題主要是技術知識分子人數太少，缺乏專業技能。而毛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不產生特權技術階層的情況下，發展中國的現代科學技術。毛提出的解決方式出奇地簡單以致於流於空想——工人和農民群眾自行掌握現代技術——他們將透視日常的生產活動，邊幹邊學，掌握必要的技能和專業知識，再把新學到的知識，根據當地具體條件，直接運用到生產實踐中。不會再有什麼「專家」，只有又「紅」又「專」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新一代能工巧匠，才會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既能從事科學和文化工作，又能從事體力勞動。這樣，就會產生毛說的

「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所以，「又紅又專」不是簡單地意味著獲得了技術專長的「紅」的幹部，或是獲得了「紅」的政治覺悟的技術專家(雖然也包含著這樣的意思)，而是一種能夠全面實現的普遍理想。正如中華民族將要在科學技術上獨立自主，不依賴於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人民也要自力更生，在科學技術上不依賴於技術精英，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一場群眾運動。大躍進期間的群眾集會中最流行的其中一個口號是：人民群眾是文化和科學的主人；大躍進正是在這樣的烏托邦氣氛中進行的。

註釋

1. 參見麥克法誇爾，《雙百運動與中國知識分子》，頁273。
2. 克裏斯托弗·豪，《中國城市的就業與經濟增長》，頁125。
3.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
4.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69。
5.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6.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85。
7. 毛澤東1958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8. 毛澤東在對中國不加批判地全盤搬照蘇聯模式提出批評後，又對蘇聯、特別是斯大林提出了全面的批評；這主要反映在毛1961年〈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有關對這一問題的深入分析，參見萊維(Richard Levy)，〈關於毛的新視野〉("New Light on Mao")，《中國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頁95–117。
9.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第十三章

人民公社與「向共產主義過渡」1958–1960

1958年初，在人民共和國剛剛誕生八年之際，毛澤東確信中國已成功地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誠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實際上，毛認為這種鬥爭可能無限期地進行下去)，但倒退回資本主義、或至少是倒退回舊中國社會的現實危險仍然存在，但是，對中國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任務已經完成——至少毛是這樣認為的。因此，中國向更高的社會發展階段前進的時機已經成熟，這也正是「革命是一個接著一個的」「不斷革命」論要求的進程。毛澤東宣稱：「我們的革命和打仗一樣，在打了一個勝仗以後，馬上就要提出新任務。」[1] 新任務就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

對大多數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來說，對社會進行共產主義改造的號召無疑是不切實際的空想，因為幾年前才剛剛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工業化還處於初創階段。毛同意中國依然是一個極端落後的國家，但正是從這一事實出發，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論和實踐結論。

如果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尚未鞏固，那對毛來說，這恰恰為向更高的社會階段發展提供了機會，沒有必要停下腳步去鞏固既存的制度。他相信，正是相對不成熟的社會制度，為更大的社會變革提供了可能性。相反地，毛認為一個社會制度越是鞏固，變革的阻力也越大。毛比過去更加強調「思想意識」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決定作用。毛在有系統地對斯大林和蘇聯理論進行批評(一直未公開發表)時，指出：「一定的社會制度，在一定的時期內需要鞏固它，但是這種鞏固必

須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永遠地鞏固下去，認識不到這一點，反映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就僵化起來，人們的思想就不能適應新的變化。」[2] 在進行社會關係的革命變革中，毛主義的指導原則是「趁熱打鐵」。[3] 鞏固現存的制度 —— 從而拖延向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前進 —— 無疑於停滯和倒退。

毛認為，經濟落後不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障礙。1958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一窮二白」理論，論證了落後是進行革命的有利條件。不久，他又進一步發揮說，經濟越落後，就越容易進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改造。[4] 當然，毛也對經濟落後感到憂慮 —— 因此應該正視和克服經濟落後，但是，消滅經濟落後要與通向共產主義的社會變革同步進行。在發動大躍進時，毛號召開展「技術革命」和社會革命，既創造經濟奇迹也創造社會奇迹 —— 但後者不以前者的實現為先決條件。實際上，正是社會關係和思想的革命轉變解放了人的生產力，為「技術革命」提供了動力，同時也保證經濟發展方式與共產主義目標可以協調一致。在1955年合作化運動時，毛提出：「由於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現在，他更堅定地相信社會革命是經濟革命的必然前提，「無產階級化」必須先於「機械化」。

要試圖理解1958–1960年發生的這些異乎尋常的事件，重要的是把握毛關於社會變革與經濟發展之間關係的一些觀點。對毛及其追隨者來說，「大躍進」(幾年前就用過這一詞，但只是指生產的迅速發展)現在不但具有經濟含義，而且有社會含義。它表達了毛既要使社會關係發生質變、又要使經濟發展出現「躍進」的意願。毛主義認為，大躍進的理論和實踐表明，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和思想目標與迅速發展物質生產力的目標是密切相關的，前者被認為是後者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正是在大躍進時期，毛主義明確地否定了斯大林的正統觀念，即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制與迅速的經濟發展相結合，會自動地保證共產主義社會的來臨。相反，在毛看來，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要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立即採用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形式，培養人的共產主義覺悟，這是超越經濟落後條件的前提。也正是在大躍進時期，毛主義成為一種把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規定的經濟前提兩相分離的學說。

大躍進運動開始於1957年底，運動在1958年初的幾個月主要集中於增加工業和農業產量。這場旨在「多快好省」(大躍進時最流行的口號) 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是根據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的毛主義「同步發展」的經濟戰略開展起來的。在提高重工業生產指標的同時，這種戰略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為了加強地方當局和基層生產企業相對的自主權和決策的權威，部分中央官僚經濟部門被解散，在「精兵簡政」的名義下，機關辦公室大門緊閉，幹部被下放到農村和工廠從事體力勞動。思想教育和道德説教取代了物質獎勵，再加上「三年苦幹換來共產主義千年樂園」的激勵，成為鼓勵工人和農民更努力地長時間工作的主要手段。不依靠行政命令，而依靠社會動員來組織廣大群眾，是運動突出的組織特點，大躍進帶有很強的軍事工作色彩，人們把「向大自然宣戰」的大躍進，比做革命年代的戰爭，它們都需要同樣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

工業領域的大躍進以「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這一方針是三年前宣佈的，但在大躍進前基本上沒有實行) 為標誌。根據這個方針，發展現代工業，以本土技術為主的、勞力密集型中小工業並舉。對大工廠的工人來説，這個方針意味著增加工作量、延長工作時間 (對某些工人來説還意味著收入減少)，以完成更高的、不切實際的生產定額。新工業方針「第二條腿」的最典型的特徵，是發動城鄉億萬人進行的「土法」大煉鋼鐵運動，在新勞力密集型工業項目中，大煉鋼鐵是聲勢最浩大、浪費也最大的項目。其他一些小項目，特別是農村當地的小化肥廠和小煤礦等，雖然聲勢不大，但更能適應農村的需要。

在農村，家庭自留地的面積縮小了，集體勞動的規模和強度越來越大。數百萬城市幹部和技術人員來到農村，幫助農民建立和發展地方工業。浩浩蕩蕩的農民大軍被組織起來修建大規模的水利設施，「興修水利工程運動」開始於1957年秋季，到1958年初的幾個月，水利工程規模空前浩大。

如果説毛主義者對經濟發展的期望是「烏托邦」式的，那麼他們關於中國人民正準備實現「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想法，更是天方夜譚。隨著大躍進運動的規模和強度日益增大，毛主義者致力於尋找一種既能實現經濟革命——又能實現社會革命的新型社會組織。他

們找到了人民公社這種形式。1958年夏季，毛主義者把人民公社當成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社會組織。

農村人民公社

1958年夏季和秋季，大規模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村和五億農民的生活；但是，人民公社並不是某種深思熟慮的計劃產物。公社化基本上是自發形成的，在狂熱的運動過程中，許多最重要的政策都是倉促制定、或是由當地幹部就地決定的。運動的自發特點在一定程度上使公社化如脱韁之馬，勢不可當，進一步加劇大躍進的經濟混亂狀況。

人民公社雖然是毛的新經濟戰略，並為與共產主義即將來臨的烏托邦空想相結合的必然產物，但沒有證據説明在大躍進開始時，毛心目中就已有了人民公社的考慮。僅僅是在大躍進開始前的幾個月，毛還預期需要五年或更多的時間，才能鞏固現存的農村集體合作社。[5] 1958年初，毛在講話和文章中都沒有用過「公社」的概念，他也沒有明確提倡對社會進行全面的「共產主義」改造。儘管1957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決定發動大躍進時，曾號召把農業合作社合併成更大的單位，但這一要求主要是為了適應大規模的興修水利工程 (此前幾個月開始) 的組織需要，與共產主義烏托邦幻想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人民公社是在大躍進全面開展起來以後才出現的，毛也只是到了1958年夏季末時才發現人民公社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想形式。

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農村幹部和貧農自下而上的自發激進行動，與毛和毛主義者自上而下的激進空想主義構成了複雜的相互作用。這與1955年合作化運動時的情況十分相似，兩種力量相互壯大，使運動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其發展速度甚至遠遠超出發動者的預期。第一批人民公社於1958年4月出現在河南省的試驗基地。儘管沒有北京毛主義領導人的肯定，就不會有人民公社這種嘗試，但最初創造公社形式的顯然是當地合作社的積極分子。7月夏糧大豐收後，河南、河北和東北一些地區迅速興起了合作社併為人民公社的運動，這時的併社基本上還是由地方自發進行組織。公社化運動雖然沒有得到

黨的正式批准，也沒有中央指示，但它得到了毛主義領導人在思想上的鼓勵。創刊不久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在1958年7月1日發表了毛主義理論家、毛的個人秘書陳伯達的文章，陳在文章中首次用「人民公社」的概念來形容湖北省不斷發展壯大的合作社組織；他說，湖北的人民公社成功地把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結合起來，培養了新型的「多面手」人才，他們「邊幹邊學……懂得一些普通的科學技術知識」，把「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相結合」，在學習先進生產方法的同時，還學習和掌握了基本的管理技能。因此，人民公社正在實現馬克思主義關於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的目標，為「我國順利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開闢了道路，陳伯達又把這些成就歸功於勞動群眾的首創精神。[6]

7月初，在北京大學舉行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7週年大會上，陳伯達發表了長篇講話，用更激進的口吻進一步發揮了上述觀點，他還大量援引馬克思、列寧和毛的語錄作為論據。他用最淒美的詞藻描繪農村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公社化運動，把革命高潮歸結為「先進農民」的創造性，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鼓舞；他還把人民公社的觀念和思想也歸功於毛：

>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毛澤東同志關於公社的這種思想，是從現實生活的經驗得出的結論。[7]

根據陳與毛的個人關係和思想聯繫來判斷，陳在《紅旗》上發表的文章，標誌著毛同意(不代表中央必然同意)了正在興起的公社化運動。到7月下旬，當劉少奇和黨的其他領導人開始視察北方各省的公社化情況時，運動已全面展開。8月初，毛本人又進行了視察，為公社化運動增添了新的動力。報紙顯眼地刊登了毛對公社的頌揚以及把人民公社推廣到全國的號召。所以，當政治局委員們出席8月17至30日在海濱療養地北戴河召開的「擴大會議」(除全體中央委員外，還包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書記)時，他們面對的是又一個既成事實，許多人民公社已經成立，各地正以更快的步伐，爭先恐後地建立新的

人民公社，報刊早已公開廣泛地宣傳毛對公社的高度評價。雖然黨的許多領導人對此持強烈的保留態度，但他們除了正式批准已經發生的事情外，別無選擇；不過，會議的時間長度表明，他們是在激烈的爭論後才同意的。

8月29日在北戴河，黨的領導人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正式批准了人民公社化的決議。決議提出，「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已經普遍發展起來」，「很可能不久就會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一個發展人民公社的高潮，且有不可阻擋之勢」。決議批准在全國農村建立人民公社，承認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組織形式。決議認為，「就目前說，一般以一鄉一社，兩千戶左右」的規模較為合適。決議雖然接受了毛澤東關於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化、或至少在農村普遍化的主張，但也反映了非毛主義的領導人所持的保留和懷疑態度。決議指出，在建立人民公社時，要防止「強迫命令和急於求成」，防止出現任何可能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此外，決議強調人民公社的性質仍然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的；公社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不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雖然決議提出人民公社將為「逐步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作好準備，但對於什麼時候實現過渡卻含糊其辭。實際上，決議的意思是需要數十年時間，決議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不僅包括「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還包括「社會生產的極大發展」以及「收入的增加」。[8] 當時發表的毛主義文章，甚至主張立即採用共產主義的勞動形式和組織形式，認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指日可待，與這些激進空想的言論相比，8月29日的決議還是一個比較穩健的文件。

公社化運動發展的速度和激進程度都超過了黨的領導人的預期。年底以前，有75萬個合作社匆匆合併成了2.4萬個人民公社，幾乎所有農村人口都加入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規模比官方規定的要大得多，平均每個公社由5000個農戶（約三萬人）組成。不過各社社員數量不均衡，少的社有5000人，多的社超過了十萬人。許多公社無視8月決議的規定，在社會生活、勞動組織和分配方式上，都採用了共產主義形式。

1958年夏季和秋季是大躍進運動發展的高峰階段，人們對經濟繁榮和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希望最大，群眾的熱情也最高。也正是在這期間，那些延滯了的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目標成了直接的目標，毛主義領導人宣佈這些目標很快就會實現。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包括「國家自行消亡」的空想在內，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遙遠未來，而是時代的迫切任務，而實現這些史無前例任務的擔子落在了人民公社的肩膊上。人民公社不僅是生產組織，而且是「把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結合在一起」的、將「工農兵學商融為一體」的新型社會組織。通過把工業和農業、教育和生產、經濟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人民公社承擔起了馬克思主義者傳統上賦予「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即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社會變革任務。在大躍進時期的毛主義文獻裏，人民公社不但是生產的組織者，而且是「生活的組織者」，它不僅是實現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手段，也是當時正在中國形成的共產主義的社會雛型，這種雛型將成長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社會單位。

人民公社還被視為既是共產主義新人的產物，又是培養共產主義新人的組織，他們「又紅又專」，行使著各種各樣的社會職能，具有建立新社會所必需而又重要的「共產主義覺悟」。緊接其後，毛主義又宣稱，他們「每個人都是腦力勞動者，同時又是體力勞動者。每個人都能成為哲學家、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有關烏托邦的論點和段落，被廣泛引用來支持這種設想。在公社化運動初期，引證最頻繁的莫過於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偶然提及未來時對共產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

> 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範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但並不因此我就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未來沒有階級、沒有國家的這些烏托邦理想贏得了農民的積極響應，無疑使他們為實現這樣的理想而自願奮鬥和作出犧牲。所以，在公社化初期對美好未來的憧憬中，毛澤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繞過黨和

國家官僚機構的正常渠道，在他本人與群眾之間、在他的關於人民公社的烏托邦理想與群眾對社會變革和經濟繁榮的渴望之間，建立起暫時的直接聯繫。

早在人民公社之前，1957年秋季開始的大規模興修水利運動，已使農村的勞動組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來自不同村莊的農民組成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接受軍隊式紀律的管束，從事特定的勞動任務，像現代工廠一樣進行分工和分配。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規模龐大的生產大隊（一般由數千農民組成）逐漸定型，其功能也由農業生產擴大到經營新建立的公社企業和大規模的建設工程。生產大隊下屬有十多個生產隊，一般情況下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生產隊；公社則負責協調各生產大隊之間的工作。從理論上説，人民公社基本上是自主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和社會及政治單位。

農民組織成生產大隊後，相應地也要對農村的社會生活進行直接而意義深遠的變革，這種變革被稱為走向共產主義的進步措施。由於男性勞動者都從事興修水利、大工程建設以及在新建的農村企業工作，農業生產普遍缺乏勞動力，解決這一問題的措施是吸收婦女從事農業生產和輕工業生產。雖然這種措施是為了緩解勞動力緊張的壓力，但其結果卻是向男女平等前進了一大步，因此也被説成是人民公社要實現的共產主義目標之一。一些措施把婦女從傳統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以從事農業生產，以及通常由農村老年婦女營辦公社食堂和幼兒園等，被説成是「家務勞動社會化」。農村男女勞動力都被發動起來參加生產勞動，農民實行了新的公社集體生活形式，這些雖然暫時改變了農村家庭生活的原有模式，但農村家庭還是維持原樣。某些混亂狀況主要是由於男性勞動者被派到遠離自己村莊的地方從事工程建設，與妻子兒女分離而引發的。但是，與當時西方新聞媒體廣泛報道的情況正相反的是，中國並沒有廢除傳統的家庭結構，他們也無意這樣做；即使是最激進的毛主義者，也堅決維護核心制家庭，一如他們一直受到極端清教徒性觀念的束縛一樣。

家庭結構雖然保持穩定，但家庭的自留地卻不走運。對共產主義的期望越高，徹底廢除個人財產、實行社會平均的呼聲就越高，此外，實行普遍的集體勞動方式的邏輯結果也強化了這種呼聲。由於絕

大多數男女勞動力都參加了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集體勞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沒有時間和精力照管自留地和家畜。1958年初尚佔耕地總面積7%的自留地，到同年底實際上已被取消，變成了公社財產，家庭飼養的豬和家禽也充了公。在人民公社化搞得最激進的地方，社員家中從鍋瓢碗罐到鐘錶、傢具都成了集體財產，上交給了公社——至少從理論上說是如此。

下一步就是按照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原則來分配剩餘農產品，即扣除國家稅收和用於再投資、福利事業後的農產品。儘管官方在有關人民公社的決議中規定，人民公社屬於社會主義性質，要根據每個人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但是，如何確定集體勞動中的個人勞動量，其實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在當時狂熱的氣氛下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而簡單地平均分配、或按照實際的和想像的個人需要進行分配，委實更容易得多。年底時，國家制定了分配比例，規定30% 的產品實行按勞分配，70% 的產品實行按需分配，但這個規定實際執行到什麼程度並不清楚。實際上，由於缺乏資料，很難判斷公社化初期的激進做法在多大程度和範圍內得到實踐，因為在國內外，廣為人知的只是那些最激進的「模範」公社；在現實中，人民公社之間在規模、財產甚至性質上都存在著極大的差別。一些公社不過是原有集體合作社改頭換面的形式，另外一些公社則迅速採用了所謂共產主義制度，唯一普遍的特徵是密集型的集體勞動和漫長的勞動時間。

當時採取的激進政策和做法只是曇花一現，然而，當時實行的新的工業政策和教育政策，卻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社會意義。新工業政策是推進「農村工業化」，新教育政策是以「邊幹邊學」為原則的新的農村教育體制。毛主義者從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實行這些政策的理論根據。馬克思雖然不願意為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繪制藍圖，但他確實曾籠統地描述過（他極少這樣做）他心目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相應的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情況。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裏，他提出了工人政黨在推翻資產階級國家後應採取的十條「普遍適用」的措施，其中包括「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和「通過把人口更平均地分佈於全國的辦法逐步地消滅城鄉之間的差別」。談到教育政策時，馬克思敦促實行「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的普遍原則。[9] 雖

然毛主義的政策並非必然地出自馬克思著作的啟示，但這些政策與馬克思提出的、並在經典著述中從理論上反復論證過的措施是一致的。當然，毛主義是在與馬克思的設想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實行這些措施的。

建立人民公社所屬的小工業的計劃取得了正面的成就，但不應把這些成就與1958年開展的「土法」大煉鋼鐵運動的奇觀混為一談。土高爐浪費了大量人力，不久就被放棄了；但與此同時建立起來的聲勢不大的農村其他小型工業，卻往往充滿活力和創新。這些小型工業依靠當地的人力和原料資源，採用較原始的技術，促進了當地農業生產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別的地方不生產的小商品，充分利用了本來有可能浪費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較好地迎合了當地農村的直接需要，實現了建立這些小工業的目標。雖然這些小工業最初免不了存在浪費、低效和失敗的現象，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通過公社經營的製造和修理農用工具的小企業、生產化肥和農藥的小化肥廠、小規模的發電站以及當地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中國農業從這些小工業中受益匪淺。無論是農村社會還是國民經濟，都從地方煤礦企業、小煉油廠的生產以及地方生產的消費品中，獲得了利潤，它們正是後毛時代取得巨大成功的「鄉鎮企業」的前身。

新教育政策與重視農村工業化發展，兩者有著密切的聯繫。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建立由地方興辦的各種業餘教育學校——「紅專」大學、夜校、業餘培訓項目以及各式各樣的「半工半讀」學校。地方辦教育的指導原則是「教育與生產相結合」，主要目的是為農民提供從事地方小工業生產所必備的基本技術知識和文化知識，為以後採用現代農業技術作準備。教育計劃以當代中國關於教育的激進觀念和經驗傳統為依據，包括五四運動時為年輕知識分子提供的「半工半讀」學校（毛當時也參加了這種學校）、民辦學校和延安時代的其他教育模式。[10]

新型的農村學校體制除了服務於當地直接的需要外，還被視為實現毛主義「讓群眾成為技術的主人」的理想的手段，減少了農村對城市專業大學和學校的依賴，抑制了技術知識階層的增長，為實現馬克思主義消滅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目標作出了貢獻。在

當時烏托邦精神的感染下，各種基於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學校被形容是「用來培養具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保證他們在德智體方面全面發展，成為共產主義新人」。[11] 報刊宣傳說：「紅專和業餘大學不僅僅是為了適應暫時的需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社會主義教育的基本原則之一。」這種新型學校不但是結合兩者的理想形式，而且「使我們看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教育的萌芽」。[12] 新教育體制還在馬克思那裏找到了理論根據，馬克思說：「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恩格斯也曾設想過，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將培養「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根據社會的需要和自己的願望，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13]

公社化運動中的空想色彩不僅僅局限於社會和經濟領域，它還同樣浸染了政治領域——毛選擇「公社」這個詞作為新型社會組織的名稱決非出於偶然。「公社」一詞源於馬克思對1871年法國巴黎公社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把巴黎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樣板。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公社」一詞代表著一個全新的政治權力和組織形式的概念，即武裝的勞動群眾砸碎了既存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即馬克思說的「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後，用人民的「勞動組織」取而代之，把國家篡奪的社會權力完全歸還給社會。在馬克思對公社的描述中，武裝的人民群眾代替了常備軍和警察；國家官僚機構被摧毀，代之以行政職能和立法職能合一的群眾機構；行使社會必要的行政職能的不再是被任命的官吏，而是經過普選產生的勞動人民的成員，他們在履行職責時，只領取一般工人的薪金，沒有任何特殊地位和特權，處於人民的經常性監督之下；國家權力不再是集權制，而是掌握在由各自治地方公社組成的「自由聯邦」手中。[14] 政治權力經過這種改造後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由此，馬克思勾劃出通向無階級社會的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輪廓，在這一進程中，國家本身也不復存在。毛主義在把中國社會改造成人民公社時，也正是持這樣的理論。

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在毛主義實踐中的反映之一（扭曲的反映），是人們工作與生活的軍事化。毛在1958年1月宣稱，「我們的革命就像打仗一樣」，到7月，公社的農民像部隊一樣組織起來，在大喇叭播放的進行曲伴奏下，排隊出工勞動。當時流行的口號不但要求群眾

要集體化，而且還要「軍事化」、「戰鬥化」和「紀律化」。雖然工作的軍事化，在理論上是以馬克思關於由武裝群眾支配的共同體公社為根據，但主要目的是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然而，這種做法使農民筋疲力盡，他們不得不忍受難以忍受的體力消耗和不斷延長但不切實際的工作時間。

與馬克思關於公社的設想尚算一致的，是恢復了民兵並武裝農民，這些做法與人民公社化和1958年台灣海峽危機正好吻合。[15] 在當時官方的宣傳中，把國內「與自然的鬥爭」和對付外部入侵的威脅聯繫在一起，如1958年8月的《紅旗》社論所說：

> 現在農業勞動中的組織軍事化，雖然並不是為了對人間敵人，而是為了對自然進行鬥爭，但是在這兩種不同的鬥爭中，互相轉變並不是一件難事……如果外來的敵人敢於向我們襲擊的時候，就動員全民的武裝，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這些敵人而進軍。[16]

雖然在金門和馬祖島爆發直接戰爭的危險很快就過去了，但民兵運動一直繼續到1959年底，有二億人參加了民兵，3000萬人配備了老式的步槍。[17] 全民皆兵的復興(根據廢除常備軍的巴黎公社理想採取的行動)，不久就引起了關於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和作用問題的一場政治鬥爭。

也許，人民公社化最激進(人民公社一時非常接近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的方面，是它具有改組和行使政治權力的職能。1958年發表的毛的理論文章，強烈地主張要把人民公社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機構——儘管公社中沒有什麼無產階級。[18] 人民公社取代了鄉政府行使管理職能，官方對此的解釋是為了使公社成為「行使國家權力職能」的政治單位，它是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最理想的組織形式」。[19] 毛主義強調，人民公社不僅是生產組織，而且是把「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結合在一起」、「融工農商兵學為一體」的組織。毛主義還特別強調，人民公社具備把社會基本經濟單位和基本的「國家權力機構」結合起來的統一功能，又稱這是使國家的內部職能(至少在理論上是由人民公社行使)逐步走向消亡的開始。[20] 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廣為宣

傳的所有烏托邦目標中，最富有空想性質的莫過於「國家消亡」，但這也許得到了農民的積極響應，它適應了農民傳統上擺脱官僚專制統治、獲得絕對自由的無政府心態。

當時發表的毛主義理論文章經常引經據典，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模式。1958年9月，一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文章是這方面的典型，文章説：「人民公社與鄉的合併，即把經濟組織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這與巴黎公社非常接近。」[21] 比起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模式的影響來説，更重要的是毛主義在理論上賦予人民公社的政治職能和人民公社化的現實，對現存黨和國家的官僚機構的職能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假如人民公社真的按照毛最初設想的那樣發展，就會從根本上動搖中國的中央政治權力——即像馬克思在評論巴黎公社時所説，將那些被國家篡奪了的社會權力歸還給勞動者。人民公社化反官僚主義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那些在大躍進前享有既得利益的人很快便對這種威脅作出了反應。12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他們捕捉到第一個遏制人民公社化激進勢頭的機會。這次會議是處理有關農村經濟和組織方面面臨的困難問題的，這些問題恰恰是在毛主義鼓勵下的農村幹部匆忙貫徹毛的政策時所造成的。

第一次退卻

1958年夏季，農業生產取得了大豐收，農民的熱情普遍高漲，人民公社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實施的。但到秋末之後，由於糧食短缺，運動受到挫折，農民的勁頭也明顯下降。人民公社的草率建立引起了組織上的混亂，缺少有專長的人員去管理整個公社複雜的財務工作以及新引進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來自富裕合作社的農民，對與貧窮合作社合併後的平均主義十分不滿，為了發洩不滿，他們沒有把牲畜交給公社，而是宰了去吃。社員們普遍對任意攤派勞動、分配不公、食堂的低效率管理及其他公社機構十分不滿。由於農業勞動力都被抽調參加工業、水利和其他工程的建設，農業生產常常受到忽視，造成糧食短缺。國民經濟的計劃被打亂，導致產品和原材料的生產和分配失衡，負擔過重的交通運輸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財政政策的制

定以浮誇的生產報告為基礎，工業原料奇缺。地方幹部的「命令主義」使勞動成為一種強制行為，而不是人的自覺活動。為了完成脱離實際的生產指標而延長勞動日，使農民筋疲力竭。人民公社化的現實，與大躍進最初依據的合理使用勞動力的原則背道而馳，更談不上實現理想的公社生活和自願參加勞動。

由於經濟困難日益嚴重，群眾不滿情緒也漸增長，黨的領導人於11月28日在武漢舉行會議，研究如何穩定經濟的問題。12月10日，會議通過了一個決議：決議基本上還保持夏季和秋季的高調，重申人民公社將是中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組織形式，[22] 但決議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旨在限制公社化中社會與政治激進行為的政策；這些政策是克服了毛的反對後通過和實施的，標誌著一場激烈政治鬥爭的開始，而鬥爭亦在第二年夏季達到高峰。

武漢會議決定採取的重要措施，包括重新明確以「生產大隊」為生產和核算的基本單位，這實際上是回到了公社化前以自然村為基礎的合作社，雖然工廠企業還歸公社所有。決議詳盡地論述了(用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術語)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發展階段的區別，明確規定人民公社依然是社會主義性質，因此必須堅持社會產品按勞分配的原則，不能實行按需分配。決議強調，共產主義道路是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進程，共產主義的實現必須以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水平為前提，只有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實現共產主義。與此同時，決議警告人們不要急於求成，不宜過早地採用共產主義措施，也不可幻想超越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決議還相應地要求恢復房屋、傢具、生活用品和小傢具等家庭財產的個人所有權，恢復自留地作為對糧食生產的補充，把小家畜和家禽還給農民。為了抵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充當急先鋒的當地農村幹部的影響，中共中央還要求重建黨組織和國家行政機關在農村的權威。

1959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一系列會議，進一步淡化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建立了中央對運動的嚴格控制。這些會議與武漢會議一樣，都是由劉少奇主持。武漢會議上，中共中央宣佈了毛主動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決定，1959年4月，劉少奇正式接任人民共和國主席一職，這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趨勢。毛還擔任著更為重要的黨主席一職，但他

已不能隨心所欲地支配黨的機構。他後來抱怨說，自從武漢全會後，他就「大權旁落」了。[23]

毛也許被別人當做垂暮之人般對待，但他本人卻依然十分活躍。1959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圍繞著人民公社的社會經濟政策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政治辯論，毛主義者試圖重振大躍進激進主義政策的做法沒有成功。4月，毛個人向地方黨委發出指示，批評武漢會議的決議。但是，12月會議後開始的退卻仍在繼續，到1959年夏季，大多數人民公社僅是形式上的管理機構。公社食堂已被廢除，農民把更多的精力花費在自留地上，農村私人集貿市場(1957年下半年被取消)又重新出現。雖然北京領導人不遺餘力地恢復中央計劃和政治控制，但經濟形勢繼續惡化，原材料短缺和交通運輸困難嚴重地阻礙了工業生產，春季和夏季發生的前所未有的旱澇災害(受災面積達全國可耕地的一半)，使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蒙上不祥的陰影。

隨著經濟形勢日趨嚴峻，毛主義者和黨內其它領導人的政治鬥爭也日益激烈。鬥爭圍繞著毛主義者後來說的「兩條道路」展開：一條據說是復辟資本主義，另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過這兩條政治路線還有待於進一步劃分。8月初，在中共中央於廬山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鬥爭首次(還有多次)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廬山會議

在廬山會議上，中共領導人面臨著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前途、毛的政治未來、黨對軍隊的領導權。圍繞這三個問題(雖然這些問題後來暫時得到解決)，毛澤東與彭德懷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彭德懷是一位資深的老革命家，自從1928年率部到井岡山與毛會合後，他在軍隊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朝鮮戰爭期間，他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

1959年春季，彭德懷以國防部長的身份，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對蘇聯和華沙條約各國進行了訪問，這次訪問成為廬山事件開始的序幕。彭向赫魯曉夫和其他國家共產黨領導人表示了自己對大躍進政策和毛的領導的不滿(恰恰與蘇聯的不滿巧合)。彭和其他軍隊領導人認為，中國國內的社會經濟政策與國防政策及中蘇關係有密切的聯繫。中國

的軍事安全需要一個合理的經濟發展計劃(使彭領導的職業化軍隊實現現代化),需要尖端武器和蘇聯的核保護。大躍進對此構成了威脅,它破壞了中國的工業和技術發展及中蘇同盟;而且,毛關於大力發展民兵的思想亦對職業化軍隊構成了更直接的威脅。

6月中旬,彭返回中國後,即對大躍進的各項政策提出了全面的批評,他的批評集中體現在一個月後直接寫給毛的〈意見書〉中。他直言不諱地批評人民公社化運動、國民計劃的崩潰、黨脱離群眾的現象,以及各種強制性的經濟和政治措施,他把這一切都歸結為毛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24]

儘管彭不可能參與任何所謂俄國人反對毛的密謀,但看來毛和其他領導人不這樣認為。因為恰恰在彭6月結束對蘇聯的軍事訪問回國後,赫魯曉夫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的中蘇協議,根據協議,蘇聯將向中國提供現代軍事技術,據説還包括一枚原子彈樣品。也正是在彭呈交他的「意見書」時,赫魯曉夫於7月8日在波蘭發表講話,首次公開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説人民公社是那些「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或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人幻想的產物。[25] 無論如何,毛確信,彭德懷已經「背著祖國,裏通外國」了。[26]

應當指出的是,毛對自己在大躍進中的作用並不是全面肯定的。7月23日,毛在廬山會議上的一次講話中,就土法大煉鋼鐵運動(他説這是場「災難」)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推進的過於倉促作了自我批評:「我是一個 1070萬噸鋼,9000萬人上陣,這亂子就鬧大了,自己負責。」[27] 然而,毛的這個講話是一個矛盾的混合體,他既作自我批評,又從總體上捍衛大躍進的政策,特別是人民公社,既號召繼續推進公社化運動,又訴諸政治威脅。他依然認為,農民中有著極大的「共產主義積極性」,重申自己對人民公社及其前途的信心(又承認自己在過去犯了錯誤)。他否認他本人和黨脱離了人民群眾,嚴厲地批評了一些同志:「有些人在關鍵時就是動搖,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決的。」毛進而提出了他最嚴厲的政治威脅,他説,如果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不行了,「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28]

毛非常尖鋭地劃分了兩條政治路線,最大限度地限制了政治局和

中央可以選擇的政策範圍。毛不僅迫使黨在他與彭之間作出選擇，而且還把他個人對黨的領導問題，與他關於人民公社的政策和他對軍隊的領導問題聯繫在一起。由於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不可能冒一場大規模政治動亂(也許甚至是內戰)的危險去解除毛的職務，他們除了重申毛的最高政治地位，至少在形式上支持他的政策外，別無選擇。儘管毛不在乎一場全面的對抗以求徹底解決問題，但他的絕大多數對手畢竟要維護現存秩序，不想火上澆油，在經濟混亂的情況下再製造政治動亂。他們沒有彭德懷那樣的勇氣，無論劉少奇和其他人如何贊成彭的批評意見，但支持彭會引發難以預見的後果，所以，他們都轉向了批判彭德懷的鬥爭。

這樣，當八屆八中全會於8月2日正式召開時，彭發現自己在政治上陷於孤立，他對大躍進的批評成為嚴重的政治事件，毛決意讓彭在政治上名譽掃地。由於黨人普遍懷疑彭捲入了赫魯曉夫企圖干涉中國內政的陰謀，黨內無人敢拒絕毛的要求。對絕大多數中共黨員來說，無論內部分歧有多大，但在涉及中華民族主權和獨立原則上，他們的態度與毛一樣堅定。因此，廬山會議通過了譴責「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把這一事件與1950年代初期的高崗反黨陰謀聯繫在一起，譴責他對大躍進的批評是誹謗。彭被撤銷了國防部長職務，他的支持者也分別被撤銷了軍內領導職務。9月，當時比較出眾的毛主義者林彪接任國防部長。

8月26日發表的〈廬山會議公報〉十分坦率地承認了大躍進的失誤，公報特別批評了當時已經放棄的土法煉鋼鐵運動，批評了無視中央計劃和指示的現象；公報還承認，由於缺乏必要的統計核算程序，1958年的生產增長額被嚴重誇大。官方宣佈的糧食產量從原來說的3.75億噸降到2.5億噸，而實際的糧食產量可能只有2.15億噸。[29] 此外，廬山會議決議號召繼續開展大躍進運動，重申了人民公社的合理與合法性。人民公社化中出現的問題被歸咎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誹謗人民公社的成就，誇大人民公社的缺點。決議要求重新恢復公社食堂，縮小農民自留地面積。不過，廬山正式批准了武漢會議的決定，把生產大隊作為基本的「核算單位」，公社所有制的理論至少在當時被否定了。

1959年秋季到1960冬季繼續進行的大躍進，不過是這場運動的回光返照。毛在廬山會議上的勝利很快就被事實證明只是徒具其表。大多數農村地區的旱澇災害席捲全國，歉收後糧食短缺接踵而至，使毛的號召和思想鼓動化為泡影。面對嚴冬的威脅，農民開始抵制公社食堂和取消自留地的做法，士氣低落的農村黨員幹部也不再願意強制推行這些措施。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還不時以大躍進的詞藻作為點綴，但此時採取的政策實質，是審慎地從人民公社向後退卻，官方默許了物質刺激和自由市場的再現，農村生產組織也退回到以小隊(實際上就是過去的互助組)為基本生產單位。由於城市中也發生糧荒，工業生產因原料供應和分配問題而嚴重受到影響，直接的經濟需求取代了空洞的社會理想，成為指導城市工作的原則。前一年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時的烏托邦狂熱和群眾的積極性不復存在，現在，人們為基本的生存而掙扎。

到了1959年底，毛不得不承認經濟形勢十分嚴峻，被迫接受了(非常不情願地)結束大躍進的必然結局。在11月下旬傳達到農村黨組織的毛的一封信中，他不再談及促使大躍進發動的「不斷革命」原則，而是淡淡地要求人們要注意「現實的可能性」，這封情緒低落的信意味著大躍進的壽終正寢。在其後的幾個月裏，毛雖然還擔任著黨中央主席一職，但他已悄然退出了黨的日常事務管理和政治生活。由政治地位日益突出的劉少奇主持黨的工作，黨和國家組織重新建立自己的權威，毛默許了這種情況。事實上，種種迹象表明，毛此時已不再認為黨是進行革命社會變革的可靠工具。1959年9月，他指責説，「資產階級分子混進共產黨裏面來」。[30] 同年底，他也許得出了「資產階級」(他使用這一概念並不嚴格)已經支配的共產黨的結論。但無論如何，到1960年，毛已不再全面統治著黨或是國家，不再決定具體政策。廬山會議上的勝利碩果僅餘他的門生林彪對軍隊的控制。

* * *

大躍進的最後一幕是1960年初在城市中建立「人民公社」，但此時運動的宗旨和目的與大躍進初期相比已完全不同。1958年夏季和秋季

曾在城市中建立了一些人民公社，但城市的公社化運動到1958年12月就停止了，原因是城市生活的複雜性及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使城市公社化運動比在農村受到的阻力更大。[31] 1960年在城市再度建立人民公社，用的還是大躍進的烏托邦口號，但目的已不再是社會革命，而是為了經濟生存。城市人民公社是為了解決糧食和其他消費品短缺採取的權宜之計，它的作用是重新組織供應和分配渠道，將城市裏的失業人員、青年和婦女組織起來，在倉促建立起來的車間裏生產日用品，或在城市郊區的菜園子裏莊稼。農村人民公社儘管只是表面形式，但還是一直保留下來，而城市的人民公社則在1961年經濟形勢好轉後就立即全部取消了。

然而，在形勢好轉以前，中國的城市居民和農民不得不忍受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困難、災害最嚴重的一年；1960年的自然災害比上年更嚴重。颱風在中國南部省份和遼寧省造成了嚴重的水災，黃河（水量只有常年的三分之一）流域中下游地區飽受旱災之苦，害蟲威脅著農村大片地區。全國60%的農田都遭受澇災或旱災，農業生產直線下降，饑荒威脅著整個國家。工業生產由於經濟作物被毀而下降，交通運輸情況惡化。大批勞動力被抽調到災區救災，但由於食物短缺日趨嚴重，勞動群眾的體力衰竭，情況普遍惡化。

1960年夏季，赫魯曉夫突然撤走了在中國約二百五十個企業工作的1400名科學家和專家，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危機。幾年後，蘇聯官方才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蘇聯專家在中國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當然，真正的原因是中蘇關係惡化。在一系列不愉快的事件後，撤退專家的行動加速了兩國的最終決裂。俄國人對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和放棄「蘇聯模式」的做法感到憤怒，而中國對在1958年的金門馬祖危機、1959年的中印邊界戰爭中蘇聯人袖手旁觀憤恨不已。1959年9月下旬，赫魯曉夫在與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i）在戴維營（Camp David）舉行了「最高峰」會議後訪問中國。他對人民公社的冷嘲熱諷以及彭德懷事件，不僅加劇了兩國的敵意，而且也惡化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之間的個人關係。赫魯曉夫訪問結束後，兩國也沒有發表例行的會談公報。但是，1960年4月，中國方面在紀念列寧誕辰90週年時，發表了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專著，可能出自毛之手。這部專著實際

上是一份中國在國際事務和國內政策問題上獨立於蘇聯的公開宣言。6月，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舉行的羅馬尼亞黨代會上，赫魯曉夫激烈地指責了中國，中國代表團團長彭真也以同樣的方式回擊蘇聯，中蘇分裂正式公開化了——至少是在各國共產黨面前公開化了。幾星期後，赫魯曉夫返回莫斯科，他命令蘇聯專家撤返回國，而且顯然指示他們連技術圖紙也一塊帶走。

這一舉動不僅震驚了中國人，連蘇聯專家也都感到吃驚。化學家米哈伊爾·克洛奇科(Mikhail Klochko)——他也是蘇聯兩次派往中國的科學代表團成員——這樣形容說：

> 作為1960年被突然令人吃驚地命令回國的人員之一，我可以證明，對這一行動感到氣憤的不僅僅是中國人。我認識的在中國工作的科學家和專家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對合同尚未到期就被要求回國感到十分不安。當駐北京的蘇聯代表說，讓我們回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對我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感到不滿時，其他人和我一樣，幾乎無法掩飾自己的吃驚。實際上，我們中很少有人在其一生中能過得像在中國這樣好。我們的中國主人更是感到迷惑不解，他們一再追問我們為什麼要走，追問有什麼辦法可以使我們不走。
>
> ……到9月初，除了少數幾個外交人員和貿易官員外，已經沒有一個蘇聯公民留在中國。[32]

克洛奇科生動地描寫了蘇聯對中國的桀驁不馴所施的懲罰造成的直接經濟影響：

> 突然撤退專家意味著大批工廠停建，使許多在建的工廠陷入一片混亂。按照俄國圖紙建造的工廠得不到相應的配件。在俄國人幫助下建造的礦山和電廠也不得不下馬。由於俄國人同時中止了交付計劃和設備的合同，新的計劃項目也被迫放棄。在經常決堤的黃河修建一個發電廠和水利設施也是被迫放棄的項目之一。[33]

對經過了兩年自然災害、農業歉收和組織上的普遍混亂的中國來

說，俄國突然中止技術援助是對中國經濟的又一個沉重打擊。這樣，中國「親密的社會主義盟國」給中國1960–1962年間的「困難時期」雪上加霜。由於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2億噸急劇下降到1959年的1.7噸，1960年又下跌到1.44噸，飢餓籠罩著中國大地。1961年糧食產量略有回升，但直到1965年才恢復到1957年大躍進前的水平。只是到了1970年代初期，人均糧食產量才恢復到大躍進前的水平。[34]

眾所周知，1960年代初期，糧食短缺造成的營養不良和疾病，奪去了許多生命。人們一直以為，這個共產黨國家建立了一套有效合理的糧食儲備制，再加上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大量進口的小麥，避免了大規模的饑荒現象。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在後毛時代，開始出現目擊者關於當時各地餓死人情況的敘述，官方也含蓄地承認(拐彎抹角地)當時發生了饑荒。[35] 此外，1980年代初期官方發表的死亡率統計數字表明，1959–1961年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統計學者據此計算，約有一千五百萬人死於與飢餓相關的原因。考慮到還有別的因素，一些學者估計死亡人數達三千萬之多。[36]

不幸的是，饑荒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普遍現象。賈斯珀·貝克爾(Jasper Becker)在他關於大躍進饑荒一書的第一章(題為「中國：飢餓之邦」)中寫道，從公元前108年到公元1911年，有記載的「主要」饑荒就達1828次，隨著時間推移，饑荒的程度越來越嚴重，發生的頻率也越來越高。1876年，中國北方的一次大饑荒，導致1300萬人死亡，按人口比例來計算，死亡率比大躍進時期還要高。[37] 貝克爾寫道：「對在前半個世紀在中國的許多(外國)人來說，餓死人的現象已是屢見不鮮的事了。」[38]

多年以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國外，人們普遍相信，1949年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是徹底根除了中國歷史上循環出現的餓殍遍野現象。在事情過去二十多年後才逐漸為世人知曉的大躍進的真實歷史，打碎了人們的這種信念。雖然當時的饑荒程度和範圍至今尚無定論，但毫無疑問的是，用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的話說，大躍進付出了「血的代價」。[39]

作為大躍進的主要發動者，毛澤東無疑要對大躍進導致的人類災難負上主要的道義和歷史責任。但是，決不能因此就像現在流行的對

毛的看法那樣，把毛比作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樣的劊子手。事實並不像貝克爾或其他人所暗示的，指毛是有意要屠殺農民。[40] 非故意並沒有預料後果的政治行為——無論其後果有多嚴重，與有意識的、自覺的屠殺比較，兩者在道義上有著根本的區別，抹殺這種區別，無助於理解這類世紀災難的道義準則。

除了糧食短缺外，大躍進時期的政治氣氛也是導致運動最後悲劇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上級黨組織要求發射衛星的強大壓力下，農村幹部謊報農業產量的數字。各級官僚機構都刮起了後來說的「浮誇風」，使國家領導人得到的產量數字遠遠超出實際產量。即使是後來進行的「核實」生產結果的運動，得到的產量數字也是被極力誇大的數字。在農村有大量餘糧這種錯誤的假定下，國家放棄了一直實行的穩健政策，大幅度提高了糧食徵購(即農民必須以國家規定的低價向國家糧庫交購的糧食)定額。1959年，農業產量已大幅度下降，但國家徵購的糧食定額卻增加了。[41] 直到1960年後，北京才真正認識到問題的嚴重，削減了國家徵購的糧食定額。然而，這時饑荒已經威脅著大片農村地區了。

當地幹部竭力掩蓋糧食短缺和饑荒現象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危機。在大躍進初期，政治上的考慮迫使他們誇大糧食產量，現在，在大躍進快接近其悲劇性的尾聲時，他們唯恐承擔經濟失敗的政治責任，又極力掩蓋日趨惡化的當地形勢。在繼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者」的政治環境下，心懷恐懼的地方幹部向上級隱瞞了農民的艱難困境，[42] 造成了嚴重的惡果，許多遭受天災人禍的地區始終沒有得到救濟物資，或是救濟物資來得太晚，數以百萬計人因此而死亡。

多年以來，毛主義一直把大躍進的失敗(就其承認的失敗而言)歸咎於自然災害和蘇聯的背信棄義，但毛本人十分清楚地看到動機和效果之間的巨大差別，也看到他提倡的政策與實行政策的方式之間的巨大矛盾。1959年2月，他在談到壓制農民的政策和實踐時，提到了斯大林的錯誤，他說：「斯大林對農民竭澤而漁，我們現在也有這個毛病。」[43] 在同年晚些時候的廬山會議上，他批評了(也含自我批評)公社化及抽調勞動力中存在的草率和混亂情況、幹部的「命令主義」以及對

中央計劃的破壞。他承認，當時經濟混亂的「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44]然而，毛與那些將他視為導師的農村地方幹部相似，對個人政治上的考慮最終壓倒了對農民福祉的關注。正是在廬山會議上，毛堅決清洗了彭德懷，繼續堅持開展彭批評的激進政策，似乎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政治業績。在毛的堅持下，「共產風」再度刮起，造成巨大的人類悲劇，毛對此無疑負有主要責任。

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人們曾寄予巨大希望。中國因此賠上慘痛的經濟和生命代價後，1960年，大躍進以毛澤東政治上的失敗而告終。大躍進留下的是一份苦澀的遺產，它使農民和共產黨之間的彼此信任蕩然無存。大躍進加速了中蘇聯盟的破裂，使中國在國內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又面臨一個日益險惡的外部國際環境。中國南半部為充滿敵意的美軍基地包圍(從南朝鮮、日本、沖繩、台灣直到東南亞)，現在，它的北部又面臨來自蘇聯的威脅。無論是國內危機還是國外威脅，都要求有非凡的治國之才。但是，當中國進入又一個十年時，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家們卻陷入一場勢不兩立的內部鬥爭之中。

註釋

1. 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
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
3. 毛澤東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4.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
5.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
6. 陳伯達，〈新社會，新人民〉，《紅旗》，1958年第3期。
7. 陳伯達，〈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紅旗》，1958年第4期。
8.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18號。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273。
10. 關於民辦學校的情況，請參見賽爾登，《中國革命的延安道路》，頁270–274。
11. 張光春，〈半工半讀降低教育質量了嗎？〉，《時事》，1958年7月1日第20期。

12. 金浩，〈駁斥對紅專大學的詰難〉，《中國青年》，1958年7月1日第13期。
1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頁24。
14.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374–377。
15. 1958年8月下旬，在中美日內瓦會談破裂後，中共開始大規模砲擊國民黨佔據的金門和馬祖島。美國威脅說要針對中國採取海空軍事行動，中國則更堅決表示要解放台灣。砲擊在一個月後結束，中美又在華沙恢復了會談。
16. 《紅旗》，1958年8月第7期。
17. 施拉姆，《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頁478。
18. 人們也許注意到，在談及人民共和國國家權力的性質時，「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取代了「人民民主專政」。
19. 參見毛主義理論家關鋒的文章，〈簡論人民公社的偉大歷史意義〉，《哲學研究》，1958年第5期。
20. 參見1958年9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吳芝圃，〈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紅旗》，1958年第8期。
21. 吳芝圃，〈論人民公社〉，《中國青年》，1958年9月9日。
22. 決議一開始就說，人民公社是「融工農商兵學為一體」、把政府行政與公社管理結合在一起的組織。決議宣稱，人民公社為「最終消滅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為國家的內部職能的消亡開闢了道路。參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見新華社 1958年12月18日消息。
23. 參見毛澤東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彙報會議上的講話。
24. 參見彭德懷八屆八中全會給毛的〈意見書〉。
25. 在此以前，蘇聯公開的評論只是不點名地批評大躍進和毛澤東，常常是以批評布朗基主義式（"Blanquist" heresy）共產黨人的名義進行的，說他們不懂得歷史發展必然的階段論。只有一次引人注目的例外，1958年12月1日，赫魯曉夫在會見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Hubert Humphrey）時，公開表示他反對人民公社。漢弗萊把這個消息透露給了新聞界，12月下旬，紐約《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歐洲版發表了這一消息。1959年1月12日，《生活》（*Life*）週刊也轉載了這一報道。此事令蘇聯領導人尷尬之極。
26. 毛澤東1959年9月1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7. 毛澤東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28. 同上。雖然毛很具體地談了自己和別人犯的失誤和錯誤，但他無意作過多的自我批評，他指出，即使是孔子和馬克思也會犯錯誤。
29. 1959年，糧食產量急劇下降到1.7億噸，1960年只有1.44億噸。
30. 毛澤東1959年9月11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31. 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的若干問題的決議〉，1958年12月10日。決議還是要求把「舊城市」轉變成「新城市」，但推遲了這種轉變。原因如上所述。
32. 引自〈中蘇分裂——撤退專家〉("The Sino-Soviet Split — The Withdrawal of the Specialist")，多倫多《國際雜誌》(*International Journal*) 1971年夏季號，第26期，頁556。當然，克洛奇科不會在蘇聯寫對這些往事的回憶。1961年，他獲準在加拿大進行政治避難。
33. 前揭文，頁559。
34. 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頁149。
35. 有關大饑荒時期中國一個地區的情況，〈中國的餓殍〉("*Starving to Death in China*")，一文作了詳細的描述，作者匿名，英文版由白思鼎 (Thomas B. Bernstein) 作序，參見1983年6月16日《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3年6月16日，頁36–38。類似事件可見貝克爾 (Jasper Becker)，《餓鬼：中國的秘密大飢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96)
36. 班尼斯特 (Judith Bannister)，《中國人口的變化》(*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 貝克爾，《餓鬼：中國的秘密大饑荒》，頁9–11。
38. 前揭書，頁13。
39. 轉引自白思鼎，〈斯大林主義，饑荒，中國農民〉("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載《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 第13卷第3期，頁343。白思鼎在文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國饑荒及其原因。
40. 貝克爾雖然沒有這樣直說，但在他這部很有價值但充滿瑕疵、而又缺乏史料支持的著作中，他的基本看法是毛及共產黨的其他領導人發動了一場旨在對付農民的戰爭。在他的結論部分，他專用了一節錯誤地解釋和譴責儒家和毛對農民的刻骨仇恨——但卻沒有提供任何與兩者相關的史料證據。他寫道：「據黨的文件記載，在大躍進開始時，官方認為，必須把農民作為敵人來對待，因為他們阻礙歷史進步。所以要剝奪農民及其權利。對農民的輕視要追溯到孔子，他認為農民是『小人』是不可教的，

因此只能受剝削。」(本書譯者譯) 參見貝克爾，《餓鬼：中國的秘密大饑荒》，頁309。

41. 拉迪，《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表2.1，頁34。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2億噸急劇下降到1959年的1.7億噸，但糧食市場(主要是國家存儲)的糧食，卻從5200噸增加到6400噸，即從約佔總產量的31%增加到1959年佔總產量的45%。有關「浮誇風」的原因及這種反常現象造成的悲劇後果，參見白思鼎，《斯大林主義，饑荒，中國農民》，頁350–360。

42. 有關地方幹部為什麼要掩飾糧食短缺和饑荒及這方面的例證，參見白思鼎，《斯大林主義，饑荒，中國農民》，頁360–369。

43. 毛澤東1959年3–4月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44. 毛澤東1959年7月23日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

第四部

熱月的反動

1960–1965

第十四章

官僚的復辟

國家和社會的官僚化是二十世紀歷史的一個普遍現象，但官僚化的趨勢產生於所謂社會革命的「後資本主義」社會裏，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明顯。當然，龐大的蘇聯官僚是最奇特——也是最典型的例子。但是共產中國也不例外。自古以來，中國就有著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和複雜的官僚機構，因此，中國不可能免於源自歷史的官僚傳統和現代政治、經濟發展的官僚本質的影響。

1949年共產黨的勝利摧毀了以腐敗和殘暴而昭著的國民黨官僚政權，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產生官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與大多數其他現代革命的命運相似的是，隨著國家的統一和實現工業化的驅動，革命勝利後的進程成為建立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進程。

1950年代，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全面實行，共產黨官僚機構迅速發展膨脹。新設立而規模龐大的黨和國家機構，比起中國歷史上任何官僚機構，都更深入地滲透到社會的各方面。官僚的增長和常規化進程在大躍進時期暫時中斷，但大躍進悲劇結束後，官僚化進程又捲土重來。

儘管在對二十世紀共產黨政權歷史的研究基礎上，人們普遍地把馬克思主義與官僚聯繫在一起，但這裏有必要強調指出，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官僚化，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中關於社會主義本質及社會主義根本前提的觀點，並沒有任何聯繫。馬克思認為，國家是社會各階級進行鬥爭的產物，官僚機構是國家最典型的組織形式。在馬克思看來，官僚機構是淩駕於社會之上的異化權力，是對人

類社會權力的濫用。官僚國家植根於馬克思稱之為社會生活的「非社會本質」中，植根於「這種私有制、這種商業、這種工業、這種各個市民集團的相互掠奪……因為這種分散性、這種卑鄙齷齪的行為，這種市民社會是現代國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礎，正如奴隸佔有制的市民社會是古代國家借以存在的天然基礎一樣。」[1] 所以，社會主義要求廢除國家和官僚機構，正如以廢除它得以產生的階級社會為前提一樣。馬克思最初期望：「只要它（社會主義）的組織活動在哪裏開始，它的自我的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裏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哪裏放棄了政治的外殼。」[2] 馬克思認為，「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3]

馬克思認識到，在某些社會歷史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各階級都十分弱小的情況下，國家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獲得獨立性，自主的官僚機構能夠統治社會。[4] 但他並不認為這些條件在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還會繼續存在。他對自己在〈共產黨宣言〉中所作的樂觀預言確信無疑：「當階級差別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裏時候，公眾的權力就會失去政治性質。」[5]

正是從上述觀點出發，馬克思稱讚1871年的巴黎公社，稱它為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組織政治權力樹立了榜樣。也許，馬克思對巴黎起義過於浪漫化的分析，以及他的〈法蘭西內戰〉一文，如我們所見，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大躍進時期的思想和行動，並且，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再次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他強調，勝利的工人階級應當摧毀，而不是簡單地接管他說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佈各地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僧侶和法官」。他讚揚巴黎公社採取的做法，是把政治權力全部歸還社會的反官僚措施，由普通的勞動者從事必要的行政管理工作，他們由群眾選舉產生，直接對群眾負責，只領取相當於普通工人的薪金，沒有任何特殊的地位或特權。[6] 簡單地說，這就是馬克思為解決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中的官僚問題提出的對策。

在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上，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凡是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國家，非但沒有縮小官僚權力，

更談不上開始國家消亡的進程，相反，比起革命所推翻的官僚機構，新國家的官僚機構的規模更大、職能更強、本質上也更加獨立。人們通常注意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低估了官僚化對革命後社會的威脅。但是，我們同樣也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馬克思沒有想到，社會主義革命會在經濟落後的國家發生。事實上，馬克思認為，正是在經濟落後的國家，存在著滋生強大官僚國家的歷史條件。在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不久，就出現了這個問題。在俄國革命後不到五年的時間裏，列寧就在思索，為什麼新的蘇維埃機構這樣快就變得如此官僚和專制。在病榻上，列寧十分悲觀地得出結論，他已經目睹舊沙皇官僚機構的復活，布爾什維克不過是給這種官僚披上了蘇維埃的外衣。不久，隨著斯大林時期蘇維埃國家和社會全面官僚化，列寧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多伊奇爾把這種狀況稱為「官僚肆虐的不散狂宴」。[7]

在共產黨奪得政權後的中國，客觀歷史條件為官僚的生長提供了比俄國更肥沃的土壤。中國是一個經濟更落後的國家，一個典型的農民社會，一個各社會階級都十分弱小的國家；中國的無產階級數量比俄國更少，在政治上不如俄國無產階級成熟，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聯繫纖若游絲。此外，中國缺乏民主傳統，卻有著根深蒂固的官僚傳統。革命本身則在一個完全是民族主義的環境下發生，無論是在客觀歷史現實裏，還是在中國領導人的主觀世界中，都與國際革命毫無關係。總之，1949年的中國，苦於不存在著馬克思主義者所設想的由勞動者直接管理社會的基本條件，有的只是易於產生官僚的社會土壤。

除上述條件外，在長期飽受政治動亂和貧困折磨的中國，政治集權化的必要性和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有利於官僚化的發展。此外，有產階級即地主階級和和資產階級的滅亡──雖然這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掃除了官僚化的最後障礙。1949年後的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存在著社會階級差別，不如說僅存在著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差別，就是毛所說的「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矛盾。[8] 隨著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化，「領導者」不但壟斷著政治權力，而且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在這樣的條件下，官僚機構不可避免地凌駕於社會之上，成為統治力量。不過，人民共和國的統治官僚的權力相對受到限制，沒有發

展到像蘇聯那樣極端的程度。官僚化的發展受到兩個因素的制約：第一個因素是革命傳統的影響。一方面，1930年代和1940年代形成的平等和平均主義的價值觀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按照仍在實行的「群眾路線」的要求，領導與被領導之間要保持密切的聯繫；第二個因素，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個人的巨大權威和在群眾中享有的崇高聲望。他對官僚主義的深惡痛絕和與人民之間保持著的特殊個人關係——這種關係超越了所有正式的組織結構，制約著官僚化的發展。

有關毛反官僚主義的動力和性質，是一個複雜而有爭議的問題，我們在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還要探討這一問題。這裏，只要注意到對毛反官僚主義的兩種主要解釋就足夠了。如果認為毛是真誠地厭惡官僚組織和官僚程序，而不是簡單地出於權宜之計，那就會看到，五四運動初期，毛在信奉馬克思主義前，深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當他後來又為反權威的馬克思主義吸引後，進一步強化了他受到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把巴黎公社作為理想模式，對毛的影響尤為深刻。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一直號召大家學習馬克思的這一著作；另一方面，一些分析家傾向於否定毛受到這樣的思想影響，他們認為，毛的反官僚傾向，不過是受世俗的實際政治利益驅動，目的是粉碎黨組織對最高領袖個人的仲裁權威構成的威脅。按照這種看法，毛本質上是斯大林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翻版。

無疑，毛與斯大林一樣看重保持自己凌駕於黨組織機構之上的個人地位，但他的方法完全不同。斯大林慣用操縱不同官僚部門之間互相爭鬥以維護自己的個人至尊地位；毛則是通過發動群眾運動來反對官僚政敵，1955–1960年間發生的革命復興就顯然屬於這種情況。例如，1955年毛發動合作化運動時，他拿出了革命年代的民粹主義精神，撇開黨的官僚機構的領導，繞過新國家的正式官僚部門，直接號召群眾開展合作化運動。雙百運動對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權構成明顯的威脅，毛特別指出，「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要求「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時，威脅的意味更突出。大躍進的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也含有深刻的反官僚內容，因此遭到官僚的強烈反對。1950年代後期的革

命並沒有克服官僚主義，但確實限制了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官僚權力的發展。

然而，1960年大躍進的向後退卻和毛退出政治舞台中心，導致黨和國家官僚權力捲土重來。處於純粹為生存而掙扎的境地的群眾，情緒十分消沉，厭惡政治。毛主義的意識形態要求被人們當成耳邊風。情緒低落、厭惡政治的群眾，正是官僚主義得以盛行的重要條件，這就是大躍進後中國的情況。工農業生產急劇下降，糧食和物資供應緊張，交通運輸和物資流通混亂不堪，國家計劃受到破壞，饑荒的威脅，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陷入一片混亂之中，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加強中央集權的經濟和政治控制。毛主義者重新開始強調列寧關於紀律、秩序和組織觀念的原則就是這種要求的反映。人們對毛式的群眾運動普遍頗為反感，希望經濟穩定，建立社會政治秩序。回歸秩序就是當時的要求和氣氛。因此，官僚統治的恢復具備了強有力的客觀和主觀條件。

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支配著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但這種現象最主要的發生地是在中國共產黨內，黨控制著國家行政機關、軍隊和所有的群眾組織，控制著城鄉社會組織的基層單位。從1960年到1965年的中國共產黨及其1700萬黨員的歷史，就是按照列寧主義關於政治組織的根本原則、特別是關於黨的先鋒隊作用的基本原則來重新塑造黨的歷史。黨是高度集中的組織，由具有真正社會主義覺悟的領導人指揮，像軍隊那樣精確地行使職能，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性。黨組織(列寧曾譽為「總參謀部」)用紀律管束黨員幹部，黨員幹部以紀律管理和組織群眾進行有效的行動。列寧主義關於黨的性質的思想，與群眾的「自發性」是不相容的。至於黨和群眾的關係，用列寧的話說，黨存在的目的，就是「走在群眾前面，領導群眾」。[9] 正如黨的領導人訓練和用紀律約束黨員幹部一樣，黨員幹部則同樣以紀律來訓練和組織群眾。

恰恰是毛主義高度評價的「群眾自發性」，被指責破壞了革命後社會的穩定，尤其是損害了黨的權威。到大躍進結束時，黨的組織結構被嚴重削弱，黨員意志消沉。黨員幹部把更多希望寄託在劉少奇而不是毛澤東的領導上，他們最關心的是恢復黨的列寧主義權威和正統，

重新確立牢固的領導路線，全面恢復黨對社會的控制。[10] 從流行的列寧主義觀點來說，這些步驟是解決經濟危機和恢復社會秩序的迫切根本前提。

黨採取的第一個措施，把大躍進的災難歸咎於基層黨員幹部(大多數是受毛主義影響的農村幹部)，他們指責基層幹部缺乏起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犯了「命令主義」的錯誤 —— 無視群眾的要求、願望和不滿情緒。當時，群眾已經喪失了對激進社會行為的興趣，處於貧困境地的大眾需要的是秩序和穩定，所以，這類指責很容易為群眾接受。許多地方幹部被撤銷職務，留職的幹部則被要求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黨組織下達的命令，所以，中國社會面臨的困境不是黨的過錯，而是一些黨員的錯誤所造成。這樣，暫時保住了一貫正確的列寧主義政黨的面子。

一方面是基層幹部(直接與群眾接觸的工廠、人民公社、學校和居民委員會的幹部)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黨的中高層機構的權威、特別是省、地區和市黨委的權威提高了，這個層次的黨委是由黨委書記領導，他們通常都是中央委員，直接對中共中央負責，他們成為自己管轄區內最有權勢的人物。1960年，成立了直屬中央的各大黨區的委員會，過去在黨內生活中作用不大的監察委員會重新受到重視，這些措施加強了中央的集權，並成立了培訓黨員幹部的各級黨校。黨內生活比過去更加強調列寧主義的嚴格組織觀念，強調服從黨的紀律和程序，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及其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則是權力階梯的頂端。在1961–1962年黨的整風運動中，恢復列寧主義黨的精神的重點，是恢復「民主集中制」，核心顯然是「集中」。由於黨牢固地掌握著國家機構的關鍵部門，黨的領導人多數同時也是政府部門領導人，所以，黨的日益集權化和官僚化，也就意味著國家機構的日益官僚化，還意味著上級黨組織對農村人民公社的控制不斷增強，中央各經濟部門恢復了對城市工廠和其他大企業的管理權威。

大躍進後黨的人事制度也反映了這種官僚集權化和職業化的趨勢。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充當先鋒的激進的農村幹部受到處理，重新起用了一批在1957–1958年反右運動中被清洗的幹部。新吸收入黨的

主要是有技術和管理才能的專家，階級成分和思想覺悟這些一度是決定性的因素已成為次要因素。在這樣的環境中，黨吸引的是機會主義者，而不是革命者，這種環境也有利於滋生黨內的個人野心家。1957年春季，毛在「大鳴大放」中邀請黨外人士對黨提出批評，批評的主要問題就是官僚化、機會主義和野心。1960年代初期，官僚化的趨勢只不過比五年前更明顯一些，實際上，黨和國家的官僚化基本上是1950年代初期趨勢的繼續，大躍進的烏托邦主義和民粹主義只是暫時地中止了這一趨勢。官僚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有，黨政幹部被分成30個級別的體制被制度化；相應於幹部的不同級別建立了一整套等級工資制；黨政機關的幹部職能分工更加專業化；革命幹部轉變成官僚職員和管理者；享有特權的官僚階層的迅速發展；官僚的職業化和職業的特殊化；普遍生成的官僚機構日益脫離並凌駕於社會之上——所有這些現象都於大躍進前植根，又在大躍進後的幾年裏進一步發展。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從革命組織轉變為保護和維持自己既得利益的專業官僚機構，那麼，黨對維護官僚機構由之產生、並受官僚機構統治的社會也有同樣強烈的利害關係。要維護社會的存在，首要的是克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經濟危機。不論官僚機構有哪些弊端，但在使中國擺脫經濟困難、重建一個生機勃勃的國民經濟方面，黨的官僚機構卻顯示了它的長處。通過恢復中央對經濟工作的控制，給生產者提供物質刺激，依靠整頓後的列寧主義黨組織的效率，北京領導人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成功地恢復了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北京的中央各部委重新建立了對現代工業經濟部門的集中控制和計劃，廠長和技術專家(在黨的領導下工作)的權威得到加強。上級黨組織對人民公社乃至整個農村經濟實行集中指揮，在對經濟生活進行集中控制的同時，為了提高群眾士氣，促進生產發展，對工人和農民進行物質刺激方面，地方生產單位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權——在工礦企業，這意味著進一步加大內部的工資差距，實行獎金制度；在農村，這意味著鼓勵農民發展自留地，恢復自由市場，默許向市場經濟發展的趨勢。到1961年底，城鄉經濟已基本穩定，生產在連續三年下降後開始回升。瀕臨崩潰的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效率和官僚運作的精確性。

* * *

1960年代初期，毛澤東在人民共和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模糊。他依然是黨的主席，但他既沒有控制黨的機構，也不再決定黨的政策；實際上，黨所奉行的政策與他提倡的越來越不一致。毛的口號和語錄依然到處被引用，但目的不是為了實現毛主張的社會目的，而是為了促進國家團結，維護社會穩定。作為革命和黨的領袖，毛依然受到人們的尊敬，但他卻不再是國家的領袖。當毛出現在黨的會議上時，人們對他的講話習慣地報以「熱烈的掌聲」(根據官方的記錄)，但多數黨的領導人對他的話置若罔聞。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激進的毛主義與黨的官僚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最終達到不可調和的程度。

毛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擊敗彭德懷後，便馬上退出的黨的日常事務。毛的隱退也許是出於自願，或至少是體面的。但是，毛之所以隱退，是因為他清楚，雖然黨的其他領導人缺乏彭德懷那樣的勇氣，但他們對彭提出的批評意見是贊成的；他還意識到，他已無法再領導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繼續貫徹大躍進的社會激進政策(即使他想這樣做)，他也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隨心所欲地凌駕於中央委員會之上——崩潰的經濟和沮喪的農民不可能再給他提供這樣做的有利環境。這樣，黨的控制權和決策權落入了「熱月黨人」的手中，他們感興趣的不是社會變革，而是政治秩序和經濟效率。最著名的熱月黨人是劉少奇——人民共和國正式的國家元首、黨的第一副主席、毛非正式的接班人，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正統的列寧主義者。另一位著名人物是鄧小平，作為黨的總書記，他掌管著黨的組織權力。隨著劉鄧政治地位的上升，在大躍進中曾失去權力的黨的其他領導人的地位和權威也得到了恢復，包括陸定一、彭真和羅瑞卿，還有設計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濟計劃家陳雲、李富春和薄一波。他們都對大躍進持批評意見(但多數人沒有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現在，他們著手取消大躍進的政策，使中國恢復到「正常」情況。

1960年代初的這幾年，無疑是毛澤東長期政治生涯中最失意的一段時間。雖然他仍被尊崇為革命領袖，但他不再能決定新社會的前進方向。他試圖發動革命運動的努力要麼受挫，要麼被曲解，甚至被置

之不理。由於1959年下半年做出退出第一線領導層的致命決定，毛發現他已不可能駕馭日益官僚化和程式化的黨的機器。正如他後來抱怨說，他在這幾年裏被當成「老祖宗」。1966年，他批評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麼事情都不找我」。[11]

隨著大躍進的崩潰，自己在政治權力中心又隨之被孤立，毛開始苦於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他已不再指望立即實現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也不再認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是一種突然的質變，相反，這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大躍進許諾要創立的經濟奇跡也成了泡影：1958年，毛宣稱中國要用十五年時間達到工業化西方的經濟水平；1962年，他則沮喪地得出結論：「要使生產力極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他指出，西方資本主義已發展了三百多年，恐怕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共產主義的實現大概也要花這麼長時間。[12]

在共產主義理想凋謝的同時，毛澤東對現在的制度能否繼續生存也產生了懷疑。他開始認真考慮革命成果喪失後，是否要被迫開展新革命的可能性。他認為，革命制度也許會「夭折」，為不革命的國家所取代。他比過去更執著於歷史復辟的可能性。他越來越確信，社會主義社會產生著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13] 沒有理由認為在這場「長期的」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必然會取得勝利。1962年秋季，毛提出了「反動階級復辟」的可能性，警告說，「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14]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年，毛考慮的主要問題就是這種歷史的不確定性——它反映了一種深刻的信念，即意志堅定的革命者能夠按照自己的觀念和理想創造歷史。這是人民共和國的不祥徵兆。

毛雖然對人民共和國的前途不像過去那樣充滿信心，但他沒有陷入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狀態，他也不甘於被人家當成「老祖宗」供養起來。儘管他不再把黨當成可靠的革命工具，或至少不把黨當成原來的那個黨，他堅信自己有能力通過其他方式重新點燃革命烈火。毛控制不了黨的官僚，黨的官僚們也控制不了毛。如果他們想讓毛離開政治舞台或放棄黨主席的職務，他們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甚至可能引起內戰。毛在中國社會依然享有崇高的個人威望（他和他的追隨者通過

「個人崇拜」培養起來的威望），在黨內的普通黨員中有大量的追隨者，他們中多數人可能根本不知道黨高層內的政治鬥爭。最重要的是由於林彪任國防部長，軍隊顯然掌握在毛的手中；毛失去對黨的控制，但他依然擁有權力。

1960年代初期執掌黨和國家官僚機構的領導人，也不可能考慮撤銷毛的黨主席頭銜。畢竟，熱月黨人最關注的是秩序，因此，他們致力於恢復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穩定，他們無意挑起一場後果難以預測的政治危機，使混亂局面雪上加霜。他們借助於毛的名聲維護國家統一，利用毛的語錄達到他們建立非毛主義的社會秩序；然而，正是由於借助於毛的權威和「思想」，熱月黨人為自己政治上的滅亡埋下伏線。與此同時，他們竭力避免公開的衝突，但挑起政治衝突和公開對抗的是毛澤東本人。

1960年和1961年，毛基本上沒有插手黨的工作。他的主要精力用於從政治和思想上鞏固對軍隊的控制。1962年1月，他結束了政治上的相對隱居狀態而開始復出，在包括省、地方黨組織負責人在內約七千人參加的中央黨的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毛在講話中，對大躍進後幾年裏支配黨內生活的官僚主義的方式和實踐，提出了全面的尖銳批評。毛批評的焦點，是劉少奇和其他領導人在過去兩年中反覆強調的民主集中制的列寧主義原則，劉少奇就以超列寧主義和極端集中制的方式解釋和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也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對列寧主義黨的組織綱領及其造成的「官僚枷鎖」頗有預見的批評，非常形象地說明了這種情況，她在1904年寫道，這種綱領要求「盲目地服從黨的核心，黨的核心思考、指導、決定和包攬一切事情」，這意味著「革命者的組織核心嚴重地脫離了」群眾運動。[15] 除此之外，恐怕沒有更合適的語言來描述1960年代初期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方式。毛肯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合理性，但他對這一原則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釋，實際上，他把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等同於自己的群眾路線，認定黨已放棄了群眾路線。他批評說，「我們有些同志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他們給民主集中制製造了分工，「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同群眾相結合」。[16] 這裏說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主，而是指領導在制定政策時，

是自下而上的作決定還是自上而下地發號施令。毛強調民主而不是集中，反映了他長期以來對群眾的自發性和創造性的深刻信念——而正統的列寧主義理論排斥群眾的自發性。與此同時，毛指責黨的領導人不相信群眾，對他來說，民主意味著讓群眾先講話，雖然他們未必有最後的發言權。

黨的幹部缺乏對毛主義「民主集中制」的正確理解，表現在毛所批判的

> 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現在有些同志，很怕同志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的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制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愚蠢。[17]

持這種惡劣態度的是省、地方、縣黨委的第一書記——黨的官僚機構的中堅，毛稱他們是「獨裁者」，對他們極盡批判和譏諷之能事。

毛提出的另一個命題是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著階級鬥爭。這不是一個新觀點，但毛說的階級鬥爭已與過去大不相同。中國的階級鬥爭已不再是毛在1957年說的，主要是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非對抗性的矛盾形式。現在，他告誡說：「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但毛擔心的不是這樣的反動階級和資產階級會重新奪回國家權力，他擔心的是黨的狀況：「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並不是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並不純粹。」無疑，毛對他在黨的高層中處於少數派的地位耿耿於懷，於是開始捍衛少數派的權利：「許多時候，少數人的意見倒是正確的。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他在結束自己的講話時，威脅說：「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家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18]

據官方記錄，人們對毛的講話報之以通常的「熱烈的掌聲」，但這對黨的政策和實踐似乎沒產生多大影響。

1962年9月，毛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發表講話。他在全會上的講話（及在全會前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基本上是重複他在1月「七千人大會」上的那些觀點，特別強調為日益加深的「修正主義」危險而進行

階級鬥爭的必要性和必然性。[19] 毛還號召要根據1942–1945年延安整風時的原則，對黨的幹部和群眾進行大規模的思想教育運動。中共中央正式同意了毛的意見。以後的三年半時間，「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便以各種形式、通過不同的途徑在全國開展起來。毛主義者開展這場新運動的目的，是要使黨和幹部的思想和行動革命化，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社會主義覺悟，糾正國家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所謂的「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傾向，特別是在農村的這種傾向。但是，根深蒂固的黨的官僚機構，既不希望毛的領導，更不願看到毛的群眾運動給社會造成混亂，這使運動受阻，轉移了運動的目標。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受到官僚的抵制和普遍的冷遇，增加了毛和毛主義者的擔心。毛本人的挫折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政治挫折。毛已無法控制他在二十多年的革命鬥爭中建立和指揮的黨，這使他痛心疾首。他最痛苦的是，他親眼目睹黨從一個革命工具變成保守的官僚機構，黨竟然屈服於他畢生與之鬥爭的官僚，他對此卻無能為力。對毛來說，官僚是最大的社會弊端。毛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把官僚看成社會各種弊端的產物，而是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把官僚看成為外加於社會的弊端，是社會邪惡和不平等的主要根源。馬克思主義者一般不認為官僚階層是一個社會階級，但毛卻不然，1965年他提出：

>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我們怎樣認識到他們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20]

對毛來說，「官僚主義者階級」就是「資產階級」的同義詞，官僚統治等於是「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統治，或至少是導致「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根源；毛所指的「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領導人，當然是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但是，毛所關注的決不僅是單純的政治權力，毛為獲得政治權力而鬥爭，決心獲取政治上至尊地位，又矢志消除阻礙他達到目的的官僚障礙，這一切也許都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如果說毛認為官僚主義是一種邪惡，那麼官僚主義者推行的社會經濟政策也同樣是邪惡的；如果說他無法容忍大權旁落，那麼他更不能容忍中國社會正在發展的方向。

註 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頁479。
2. 前揭書，頁479。
3. 前揭書，頁443。
4.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692。
5. 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273。
6.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頁375。
7. 多伊奇爾，《當代馬克思主義》(*Marxism in Our Time*, San Francisco: Ramparts Press, 1971)，頁201。
8.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
9. 列寧，〈全俄政治報「計劃」〉，《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 381。
10. 舒爾曼指出，在劉少奇主持的幾年時間裏，出版了大量列寧的著作。舒爾曼，《共產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頁520。
11. 毛澤東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2. 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3. 前揭文。
14. 毛澤東1962年9月24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15. 盧森堡(Rosa Luxemburg)，〈社會民主的組織問題〉(“Organizational Questions of Social Democracy”)，《盧森堡的談話》(*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頁118。
16. 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7. 前揭文。
18. 前揭文。
19. 毛澤東1962年9月24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20. 毛澤東1965年1月29日在一份蹲點報告上的批示。

第十五章

新經濟政策
1961–1965

在1966–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文革前五年的經濟政策被批判為要使中國從「社會主義」倒退回「資本主義」，制定和實施這些政策的黨的領導人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最後因為要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而被打倒。

然而，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毛的路線與劉的路線之間的差別並非如此之大。把劉少奇在1960年代初期實行的經濟政策與列寧在40年前在蘇聯實行的經濟政策作一比較，也許不無益處。1921年，列寧實行了「新經濟政策」，以恢復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和正在進行的內戰破壞的俄國經濟。列寧坦率地承認，從戰時共產主義激進政策退卻到新經濟政策，是要鼓勵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新經濟政策建立了一種「混合經濟」，部分是國有經濟，部分是私有經濟。布爾什維克掌握著大型工業企業，也允許(實際上是鼓勵)小工商業私營經濟的發展。國家除了徵收統一的農業稅外，基本上對農村放任自流，就是說，允許小規模的資本主義農業和自由市場的自由發展。國家鼓勵外國資本向俄工業投資，即使是在國有工業企業中，也醒目地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管理方式和勞動組織形式(如泰羅制〔Taylorism〕*)。列寧的直接目標是恢復國民經濟，他的長遠考慮則是在基本上和平的經濟競爭中，社會主義部分逐漸發展壯大，最後取得勝利。

---

* F. W. Taylor (1856–1915)，美國人，首先提出科學方法管理工業(scientific management)。細分為時間管理、功能專務分工、標準化等項。——編者註

40年後，中國領導人採取的經濟政策在某些方面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相似。為了解決嚴重的經濟危機和1960–1961年的饑荒，他們採取了從大躍進的激進主義大幅度退卻(不是名義上，而是事實上)的政策。在農業方面，對「小生產者」作出了一定的讓步，主要是允許各農戶擴大自留地。在工業方面，強調企業經營中的「利潤」指標，加強廠長和技術人員的權威。市場力量和市場價格發揮作用的範圍更為廣泛，物質刺激比精神鼓勵更受重視。不過，雖說是被批判為「向資本主義倒退」，中國的新經濟政策僅僅是早期蘇聯新經濟政策的蒼白反映。農業生產基本上還是合作形式，只允許不超過可耕地12% 面積作為自留地。大小工業企業都是國家所有，商業活動總體上依然受到中央政府的嚴格控制，不允許外資進入。如果劉少奇是「走資派」，那麼比起劉少奇在1960年代走的資本主義道路，列寧在1920年代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更寬，步子也更大。儘管如此，「毛路線」和「劉路線」之間的分歧十分尖銳。1960年代初實行的政策產生了具有深遠影響的社會後果——毛主義者無法接受的後果。

1960年，中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解決全國性糧食短缺和饑荒威脅的迫切危機。其中一個問題是糧食的分配，中央政府機關重新確立權威，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糧食定量分配制度和發放機制，從而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主要問題還是農業生產連續三年(1959–1961)大幅度下降。為了恢復農業生產，黨加強了對農村的控制，放鬆了人民公社對個體農民生產者的限制，發動城市對農村提供援助，農業生產終於恢復 —— 雖說這是在數百萬人死於饑荒之後的事。成千上萬的黨員幹部被派到了鄉下，激進的農村地方幹部被撤職(並受到批判)，士兵、學生和數百萬城市無業居民也被下放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自留地還給了農戶，農村的自由市場重新開放。「公社化」了的個人和家庭財產退還給了農民，允許農民開發荒地，城市為農村提供了農藥、化肥和小農具等緊急援助。到1962年底，農業生產已經穩定。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提出了把「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先導」的口號，上述措施就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實施的。黨的領導人認識到，充滿活力的農業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至關重

要。這意味著國家將優先發展農業，降低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躍進時對工業發展速度的要求。這是一個毛主義者和非毛主義者都能接受的方針，它說明中國將不再回到斯大林的老路，把農業隸屬於重工業。

然而，這個方針還有不明確之處。雖說要優先發展農業，但以什麼樣的社會方式組織農業生產並不明確。此外，工業與農業的關係，城鄉關係以及毛主義關於農村工業化計劃的命運等問題也都有待解決。在具體政策問題上，「以農業為基礎」的實際含義，還取決於由誰來決定和實施政策。

人民公社的衰退

放棄了大躍進，但人民公社依然保留下來，不過，公社的規模大大縮小了。全國2.4萬個人民公社分解為大約7.4萬個，每個公社約有1600個農戶，大約與過去的鄉相當，管轄區域約等同於一個傳統的農村集貿區域。[1] 人民公社仍然是農村基本的行政單位，但公社的工作由脱產領工資的國家工作人員負責，他們貫徹執行中央決定的各項政策。

但是，人民公社不過是一個政治單位，它最初的社會經濟職能基本上被取消了。1960年代初期，黨的文件批評了農業產品分配中的「平均主義」，鼓勵使用物質刺激手段促進生產。農民不僅重新有了自留地，還被鼓勵從事「副業」生產，在自由市場上交換農副產品。為了鼓勵農民購買城市工廠產品，公社企業的發展受到人為限制。此外，基本的生產單位逐漸由人民公社過渡到生產大隊，最後到生產隊。生產隊一般由20–30個農戶組成，相當於過去的初級農業合作社。到1962年初，生產隊成為組織勞動生產的主要單位。[2]

隨著人民公社的商業和財政權移交給縣政府，人民公社的自主性進一步縮小。縣政府隸屬於中央政府系統，還恢復了對公社民兵、學校和醫療衛生站的領導。大躍進期間分配到公社的拖拉機和其他大型農具，重新集中在約二千個蘇聯式的拖拉機站管理，出租後的利潤上交給國家。

這個時期的政策促進了農村小資本主義的發展，但規模遠比40年

前列寧和俄國其他領導人容許的規模還要小得多。然而，從集體經濟的退卻意義深遠。雖然官方規定的自留地面積不得超過可耕地的6%，但自留地的實際面積比規定的多一倍。由於自由市場上的水果、蔬菜和家畜的成交價格較高(城市裏黑市價格更高)，絕大多數農民自然把主要時間和精力都放在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上，集體勞動只是應差了事。到1960年代中期，私人生產大概佔到農民總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生產隊的集體勞動也不再搞平均主義，實行了一套複雜的工分制度，根據個人的勞動效率而不是出工時間和出勤率進行分配。

無論是集體勞動的工分制度，還是在自留地經營副業生產提供的機會，都必然有利於那些有生產技能、身體強壯、經驗豐富和懂經營的農民。結果是農民的收入差別不斷擴大，農村黨員幹部的腐敗問題也加劇了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在196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當地幹部貪污公社錢財，比較普遍的現象是生產隊基層幹部和一些農民(多是過去村子裏頭面人物)相互勾結，在工分分配上作弊，為自己謀利。

在處理農村的腐敗和不平等問題上，「毛主義者」與「劉主義者」之間的差別，決不像後來文化大革命說的那麼大。在根除幹部腐敗、制止農村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等問題上，劉少奇與毛一樣堅決；他們的分歧更多是在方法上，而不在目的上。劉和黨的多數領導人主張運用黨和國家機構來整頓農村局面，毛和毛主義者則希望在思想和政治上動員貧農，在此基礎上開展群眾運動。

整頓工業

與農村情況相似，城市也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採取緊急措施緩解日益惡化的嚴峻經濟形勢。在1960和1961年，關閉了部分工廠，多數工廠因缺乏原材料和物資而縮小了生產規模。大躍進期間匆忙建立起來的一大批小工廠和小作坊，效率低下，浪費緊缺資源。到了1962年，工業生產從1958–1959年的水平下降了約40%。城市裏大量工人失業或處於半失業狀態，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從貧困的農村地區湧向城市，使就業問題更加嚴峻。

政府為恢復城市經濟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緊縮財政。數千個小工廠和效益差的工廠與作坊被關閉，大躍進期間招工到大企業的工人多數被解僱。全國招工工作凍結。全國工廠企業的勞動力精簡了一半。第二個步驟是開展「回鄉」運動，運動在1962年春季達到高潮。動員城裏人「回鄉」，與民粹主義無關，方式也與過去的「下放」運動不同，主要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糧食供應嚴重緊張局面，與因為原材料短缺和資金不足而削減工人一樣，都是出於經濟需要。

為實現工業現代化這一長遠問題，國家在重新強調計劃經濟的同時，還採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例如，給各企業一定程度的經濟自主權、引進一些市場因素、加強廠長的權威、重視科技人員的作用，及提倡對工人進行物質刺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總的來說，北京的中央經濟部門又獲得了對經濟的控制權，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策者恢復了對經濟工作的發言權。與地區和省級黨組織有密切聯繫的工廠和企業的管理層，在大躍進期間名存實亡，現在又掌握了工廠和企業的經營權，建立了一套名為「獨立經營權」的更靈活和自主的體制。管理者與工人之間傳統的差別再現，天平的重點擺向了業務上的「專」，政治上的「紅」不再是第一位；工人再次被置於管理者的權威之下，但旨在提高生產率建立的物質刺激機制及改善物質生活的前景，使他們得到了補償。工人階級內部的收入差別，主要不是因為改革後的工資體制，而是因為普遍地採用了計件工資制，個人的生產率越高，拿的工資和獎金也越高。物質刺激在實踐上的根據，在於它以生產效率為基礎——在經濟落後國家裏提高生產率是迫切需要；其理論上的依據在於按照標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國家的產品分配，必然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絕不能實行「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

新工業政策在許多方面不過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翻版，但這不等於它全盤回到了「斯大林模式」。國家在事實上嚴格地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政策，原來用於工業的投資現在大量地用於農業，就是這一政策的具體體現。為了增加化肥和農業機械生產，國家對現代工業中的一些重要部門進行了改造，還新建了進行良種研究試驗的科學研究所，農村電氣化的方案也在實施之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策者在重返崗

位後推行的工業發展計劃，較之十年前他們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目標，要更加慎重和穩妥，現在，農業的現代化成為優先考慮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的時期標誌著中國徹底擺脫了重工業發展壓倒一切的斯大林模式。

面臨1960–1961年如此嚴峻的形勢和艱難的任務，應該說，經濟復甦和恢復增長的速度是驚人的。1962年，農業生產基本恢復正常，在其後幾年裏，雖然還說不上突飛猛進，但至少是穩定發展。糧食產量從1961年的1.9億噸增加到1965年的2.4億噸，[3] 國家還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大量的小麥作為補充。到1962年底，工業生產恢復穩定。在1963年至1965年期間，工業生產以每年平均約11%的速度增長，就業率年均增長7%，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5.5%。[4]

劉少奇的政策使國民經濟得到復甦和發展，但其導致的社會結果和思想影響卻不盡人意，經濟進步付出了社會代價——新形式的不平等。農村中的自由市場和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導致出現了一個相對富裕的農民階層，他們常常與地方幹部和官員串通一氣，利用新經濟政策發展既得利益，並影響執行政策的當地政府。在城市裏，出現了一個享有一定特權的、有經驗的技術工人階層，他們受益於計件工資和獎金制度，這些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措施同時也使得工人之間開始競爭，削弱了工人隊伍的團結；缺乏集體意識又反過來加劇了工人內部的差別和分化，由於強調專業能力和技術特長，普通工人與技術官僚精英之間的收入差別越來越大。

不平等最突出的反映莫過於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差別。儘管有少數農民已經富裕起來，但整個農村依然十分落後，與現代化的城市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大躍進期間實行的農村工業化政策已經放棄，大多數農村小工廠不是倒閉就是不景氣，這樣，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工人與農民之間，又出現了難以逾越的鴻溝。賣給農民的工業產品(例如化肥、農用機械、布匹、食鹽、煤油、火柴，以及只有少數農民才買得起的收音機和自行車)的價格十分昂貴，城市從價格差別中得益。這與毛提倡的縮小工業產品與農民產品的差價、鼓勵農民消費的政策背道而馳。[5] 此外，由於工業生產率的提高速度遠遠高於農業生產率，因而獎金制進一步拉大了工人與農民之間業已存

在的收入差別。而且，發展重點放在城市的教育政策，以及醫療和其他社會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也加大了城鄉之間的差別。這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為了城市利益而盤剝農村的情況相似。

1964年12月下旬，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劉少奇再次當選為人民共和國主席，周恩來在會議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間接地談到了新形式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現象。在讚揚了過去兩年的經濟成就後，他說：

> 同時，在社會上，在黨政機關、經濟組織和文教部門中，還會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新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新的剝削分子。這些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和其他剝削分子，總是要從上級領導機關中尋找他們的保護人和代理人。新的和舊的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他剝削分子總是結合起來，反對社會主義，發展資本主義。[6]

周恩來說的「新顯然的資產階級分子」是指誰？不是指財產所有者，而是指那些在現存「社會主義」制度下享有經濟特權、社會聲望、掌握著政治權力的人，而不是憑藉財產、而是憑藉地位和收入享有特權。新的富裕農民和收入高的工人也稱不上是「新的剝削分子」，無論人們願意不願意，群眾間的經濟差別不過是更深的社會弊端的反映而已。周的報告中已談到（和作出判斷），這種弊端的實質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主要產生於「黨政機關」，這無疑是說，黨政官僚本身即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根源。

周恩來談到這一問題時還閃爍其辭，毛不久後的談話更直截了當。1965年，他開始指責「官僚主義者階級」是工農群眾的壓迫者。他認為，官僚機關成為產生新剝削階級土壤，從這一觀點出發，他認為，在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必須強調進行「階級鬥爭」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已經到了誰勝誰負的關鍵時刻。毫無疑問，毛的這些看法受到了當時與蘇聯日益加深的衝突的影響——相應地，毛認為實行「修正主義」政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復辟，但是，毛的擔心主要源自中國社會的具體現實，對毛來說，那是大躍進後實行的經濟政策導致的問題，是社會

主義的目標能否通過非社會主義的手段實現。從歷史的非決定論和毛主義自身的思維方式出發——即不能當然地認為社會主義是歷史的必然結局，毛相信，人們可以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目的，但與此同時，道德律令要求人們必須選擇與其目的相一致的手段。在毛看來，黨的大多數領導人選擇使用的手段與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他們正在(毛的用語)「走資本主義道路」。

除了關注社會不平等和官僚階層問題外，毛同樣擔心由此引起的意識形態變質問題。雖然「毛澤東思想」依然受到尊重，但這主要是出於禮儀。如果說毛在政治上被人當作「老祖宗」，那他的思想和理想的命運也不濟。執掌黨政權力的領導人關注的是社會秩序、政府效率、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問題，群眾普遍期望的則是社會安定和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處於黨的領導人和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大眾之間的，是技術階層和各級黨政幹部，他們熱衷於官僚機構的職業規範，無視毛主義的政治標準。這種趨勢與當時的政策和群眾的普遍情緒相吻合。毛從未來共產主義全面發展的人的理想出發，提出的「又紅又專」概念被完全倒置了，職業和技術專長高於政治和思想原則。人們注意到，城市群眾熱情響應國家關於增加生產的號召，因為這也是增加收入，為了能夠購置所謂的「四大件」：手錶、自行車、收音機和縫紉機。在農村，毛主義者看到，農民的這種「不健康傾向」表現為傳統宗教儀式的復活、買賣婚姻、迷信崇拜、逢年過節的鋪張浪費、賭博，以及農村幹部政治熱情和思想覺悟的急劇下降。[7]

教育

在一個社會的階層形成主要依賴於收入和地位而不是財產的社會裏，教育制度對形成社會的平等——或不平等，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1960年代初期中國的教育制度促進了社會的不平等。

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的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發展。從1949年到1957年，小學學生的數量從約2600萬增加到6400萬，大學學生數量幾乎翻了四倍，從11.7萬人增加到44.1萬人。人民共和國的早期教育政策和實踐與其經濟政策一樣，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特別是高

等教育體制。教育事業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工業目標所必需的科學技術專家，全盤搬用了蘇聯的教育方法、教育組織形式和教科書，數以千計的大學生被送到蘇聯深造，學習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知識。[8]

1950年代，中國的教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人民群眾比在舊政權下有了更多的受教育機會，但是，教育資源仍然是有限和不均等的。儘管國家新教育制度的目的是為工人和農民服務，但是中學和大學的正規教學標準還是有利於中國社會的新老特權階層——城市資產階級殘餘、黨政高級幹部和技術知識分子的子女。此外，城市和農村的教育資源分佈也不平衡。大學都設在城市，課程設置也主要是滿足城市需求，絕大多數學生來自城市各階級。城市兒童一般至少都能接受小學教育，但許多農村兒童根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或只能得到最起碼的教育。

大躍進期間實行的教育政策，目的就是通過新的教育計劃，重點發展農村教育事業，克服上述教育不平等現象。根據大躍進提出的「讓群眾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差別的目標，短時期內便建起了各種各樣的「半工半讀」學校、「紅專大學」和工人農民業餘學校、夜校。在人民公社的管理下，農村地區普遍建立了六年制的小學和三年制的初中，以更好地滿足農村當地需要，實現馬克思主義把教育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目標。

1960年代初期，取消了這些平均主義的教育政策，恢復了1950年代中期的做法。財政緊縮迫使許多窮校關閉，城市和農村低收入家庭兒童的受教育機會受到限制，許多半工半讀學校和業餘學校下馬，農村地區的小學和中學的管理權從人民公社轉到了縣教育局，這樣，中央教育部門恢復了對農村教育體系的管轄權。中學和大學強調通過入學統一考試錄取新生，這種做法顯然有利於城市享有特權的集團成員的子女，有利於城市青年，而不利於農村青年。實際上，出現了城市和農村的雙軌制教育體制：農村地區的孩子在上完小學以後（並非所有孩子都能上完[9]），如果還想繼續上學，多數人進不了全日制正規中學，只能進「農業中學」接受農業知識培訓；在城市裏，建立了一些特殊的重點中學，培養少數受到特殊訓練的學生，補充技術知識分子隊

伍和官僚精英階層，學生的首要職責是學習和掌握專業知識。在較好的中學和所有大學裏，政治教育和參加生產勞動的要求只是流於形式。總之，1960年代初期的教育制度比十年前更加精英化，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和經濟上的差別。

正如教育制度的不平等反映和強化了社會和經濟上的差別一樣，在由國家財政負擔的其他社會部門中，情況也是如此，最典型的是衛生醫療部門。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消滅和控制流行傳染病和寄生蟲病、建立現代醫療體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新政府把醫療衛生重點放在以預防為主，通過發動群眾來提高環境衛生和公眾衛生水平。不久，政府就自豪地宣佈，新中國已經消滅了天花、霍亂、斑疹、傷寒、鼠疫、麻風、性病和吸毒，結核病和大多數寄生蟲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國家投入巨額資金修建醫學院校和醫院，而過去，醫院主要是靠西方慈善機構維持。從1949年到1957年間，國家建立了八百多家西醫醫院，使醫院床位從共和國成立時的9萬張增加到30萬張。受過正規現代西醫訓練的醫生數量由1949年的4萬人增加到1965年的15萬人，此外，還有17萬護理人員。到1960年代初期，每年約有2.5萬名從醫學院畢業的新醫生。[10] 成就雖然驚人，但並非人人同樣受益。城市居民享受著比農民更多、更好的醫療服務，城鄉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差別（與1960年代初期許多其他領域一樣）十分觸目，而且還在不斷擴大。正是這種狀況使毛在1965年警告說：

>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15%的人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現在醫院那套醫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辦法也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農民。[11]

所以，這個時期建立在非毛主義方式基礎上的經濟成就，導致了與毛的平均主義理想不相容的社會與政治結果。經濟進步付出的代價，是官僚和技術精英集團的出現，是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新形式

的不平等，是城鄉之間日益擴大的差別。這是毛澤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1963年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糾正熱月黨人路線的第一次嘗試。

註釋

1. 鄉的界線一般是按照傳統的「標準集貿區域」劃定的，通常由十個左右在經濟和社會方面聯繫密切的村子構成一個市鎮，這一觀點是由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在〈中國農村的市鎮與社會結構〉("Market Town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文中提出的。文章載於《亞洲研究雜誌》(*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64年第24期。
2. 這些措施是根據中共中央在1960年11月發布〈關於農村工作的緊急指示〉(即「十二條」)和1961年3月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若干規定草案〉實施的。
3. 趙綱(Chao Kang)，《共產黨中國的農業生產：1949–1965》(*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6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頁242–260。雖然趙引用的數字是1961年為1.6億噸，1965為2億噸，但反映的增長速度還是一致的。
4. 理查曼，《共產黨中國的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頁615。
5. 這是毛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提出觀點：「在稅收上使農民的負擔很重，在價格上農產品很便宜，工業品很貴。我們在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同時，必須把農業擺到一定的位置上，實行正確的農業稅收和正確的工業產品價格政策……工業產品的交換，在我們這裏，是採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工業品是採取薄利多銷的政策和穩定物價的政策。」(參見毛〈論十大關係〉講話的記錄稿 —— 譯註)
6.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64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1965年1月8日)
7. 〈鄉三級幹部會議報告〉，1963年2月9日。引自鮑瑞嘉和泰韋斯(Richard Baum and Federick C. Teiwes)，《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頁49–57。
8. 1962年大專院校畢業生的構成情況，反映出國家對科學技術教育的高度重視。根據官方統計，在17萬畢業生中，只有7,000人，即只有4%的學生

是學社會和人文科學的；工業畢業生有5.9萬人；理科畢業生有1.1萬人；農科和林業專業畢業生有2萬人；醫療衛生專業有1.7萬人；其餘5.6萬人畢業於教師或師範學校，師範院校的專業也是以理工科為主。小學與中學的情況也類似。

在1962年的17萬名畢業生中，只有1,000人考上了研究生。不過在1949年以前，除了個別醫學和專業研究院外，中國沒有一所研究生院。1949年後，中國的研究生教育發展比較慢，但其學術起點較高。多數有志讀研究生的學生都赴蘇聯攻讀，還有部分學生赴東歐國家攻讀。

9. 據報道，1965年，有3,000萬學齡兒童未能接受任何正規教育，其中多數是農村兒童。(《人民日報》，1965年5月18日)

10. 賽德爾(Victor W. Sidel)，〈醫療與公眾健康〉("Medicine and Public Health")，載奧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主編，《中國的發展經驗》(*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73)，頁110–120。有關人民共和國醫療發展的特殊觀點，參見洪若詩(Joshua Horn)，《趕走一切的害人蟲》(*Away with All Pes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11. 毛澤東1965年6月26日就衛生工作的談話。

第十六章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2–1965

1962年下半年，隨著經濟形勢的穩定，毛結束了政治隱退而復出，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新運動的目的是反對官僚化，糾正毛批判的「修正主義」導致新形式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使黨和整個社會重新樹立集體主義精神。這是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前，最後一次試圖通過黨和國家的系統實現自己激進社會變革的努力。

運動的起因是毛1962年9月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毛在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階級鬥爭，強調階級鬥爭在中國還會長期進行下去，他談到了「反動階級的復辟」的可能性，警告「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為了開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修正主義」之間的鬥爭，毛提出要開展以1942–1944年整風運動模式為基礎的延安式教育運動。[1]

毛當時雖然不直接管理黨的事務，但他有足夠的力量影響黨的決策。他依然享有崇高的個人威望，重要的是，他還指揮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因此，中央委員會作出決議，同意毛的觀點；決議大量引用毛的話，說明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歷史時期中，都存在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央委員會對黨內的修正主義傾向進行了批判，號召加強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建設。[2] 不過落實這些決議的行動十分有限，只是在1962冬季至1963初，在部分農村地區開展了小規模的思想整頓運動，以改進農村黨的工作，提高群眾的思想覺悟。直到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

的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才具體說明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的和方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社教運動。

1963年5月的決議，簡稱〈前十條〉，是一篇典型的毛主義文獻。文件闡述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針對的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人民公社的衰退和集體生產的名存實亡。第二個問題是黨內普遍存在的官僚主義作風和農村黨組織的腐敗現象。運動的相應目標是恢復集體生產，加強人民公社社會經濟職能，清除黨內的腐敗現象和官僚主義。

〈前十條〉中最主要的是提出開展「四清」運動，即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四清」的目的不僅是清除腐敗現象，而且要揭露黨員幹部與富裕農民串通一氣、盤剝大多數農民的情況。運動方式是通過「貧下中農協會」組織去「發動群眾」。

為了與官僚主義和領導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鬥爭，決議強調幹部必須定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以表明「我們黨的幹部同樣都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為了克服群眾和幹部不關心政治的現象，決議號召開展思想再教育運動，重點是進行「自我教育」。[3]

使〈前十條〉成為一個典型的毛主義文獻，不完全是文件宣稱的運動目標——因為黨的所有領導人也同樣關注幹部腐敗和「自發」的資本主義發展傾向問題，而是毛主義者提出在農村恢復社會主義原則的方式。文件以典型的毛主義語言表達了民粹主義和反官僚主義的思想，強調運動要依靠基層農民組織和農民的主動性，未強調依靠黨的組織系統。決議的民粹主義思想可以用毛在1941年說的一句話概括：「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決議最後以毛的一段冗長的話作為結論。毛警告說，中國共產黨不僅有變成修正主義的危險，而且還有變成「法西斯黨」的危險。毛用來描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口氣，幾乎就是對未來文化大革命的預言：

> 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燄壓下去，把這些勢

> 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幹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幹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脱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幹部。[4]

黨的領導人雖然同意毛關於幹部腐敗和缺乏集體精神的看法，但他們同時也認為，毛號召大規模發動農民，把階級鬥爭放在第一位的做法，對農業生產，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建設都是一項威脅——相對他們對黨政機構的控制也是威脅。官僚機構對貫徹〈前十條〉各項措施的反抗，在有關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兩個補充文件中得到集中體現；一個是由黨的總書記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被稱為〈後十條〉的文件，另一個文件(被稱為〈後十條修正草案〉)是劉少奇於1964年9月發佈的。[5] 兩個文件都對如何貫徹毛在1963年5月的指示提出了具體要求，都恰到好處地引用毛的語錄。但是，這兩個文件的實際目的是緩和運動的激進勢頭，限制其規模，最重要的是把運動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之下。實現這個目的的方法是向村和公社派遣工作組(黨的上級機關組織的幹部小組)監督地方幹部和群眾，派工作組是黨的傳統工作方法，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曾普遍使用，恢復派工作組是為了限制毛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在農民群眾普遍發動和自主的基礎上進行的要求。在〈前十條中〉，毛強調運動的首要步驟是「發動群眾」，劉少奇則主張，「各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發動，需要由上級機關派遣工作組，整個運動應該在工作組的領導下進行。」[6] 在〈前十條〉十分強調的農民協會，在〈後十條〉中根本沒有提及，相反，〈後十條〉規定，「首先應召開黨內會議」。[7] 與毛提出的農民應有自己的組織的觀點不同，鄧和劉強調黨的中心作用，強調由上級組織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領導和教育群眾，「團結95%以上的幹部是團結95%以上的群眾的前提。正確地解決了幹部問題，團結群眾的問題也就會得到解決。」[8]

大多數黨的領導人都是以正統的列寧主義觀點為指導思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相信，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和思想上

的成熟及黨幹部的質量和紀律性，是成功的政治與經濟工作的關鍵因素。黨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唯一載體（因此也是唯一能採取正確政治行動的機構），這一信念的具體體現，就是工作組所負的使命，它是中央機關派出的代表，它的任務是約束下級黨組織和幹部、自上而下領導群眾。

相反，毛澤東從來沒有以為黨在思想上是一貫正確的這種列寧主義信念。一方面，他把黨看成是「無產階級思想」的發源地，另一方面，他同樣堅信，革命創造性的真正源泉是群眾，尤其是農民。對毛來說，黨既是群眾的「先生」，但更是群眾的「學生」。特別是他在1960年代初期不再相信黨是革命的可靠工具後，更強調後者。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他主要寄望於農民，寄望於自下而上的帶有自發性的革命高潮。從這種基本的民粹主義信念出發，毛堅決主張，恢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精神的社教運動，必須以由大多數農民組成的農民協會為基礎，不能由上級機關派工作組指揮運動。

1965年1月，毛主持召開了「全國工作會議」（會議表面上是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會後發表了討論紀要〈二十三條〉，[9] 分歧明朗化了。〈二十三條〉一開始就提出，黨內鬥爭是社會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鬥爭的反映。文件中把運動的重點由原來的農村基層幹部變成「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件警告說，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的還在幕後，還有一些隱藏在黨（包括在中央）的高層。實際上，〈二十三條〉是一份對黨的官僚機構及其最高領導人的政治宣戰書，這場鬥爭要走群眾路線的原則，即毛說的「我們要大膽地發動群眾」，不能像小腳女人那樣裹足不前（他十年前談農業合作化時用的比喻）。文件號召重新組織農民協會，要求「讓群眾來判斷和決定」運動過程中出現的具體問題，上面不能包辦。迄今一直限於糾正農村幹部的具體政治和經濟違法行為的「四清」，變成了無所不包的「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無人能置身於這場清洗運動之外。這個文件清楚地表明，毛已把黨本身、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看作是政治和思想不純的主要根源，鬥爭已經沒有調和餘地。[10] 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反對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化大革命的戰線已無情地劃定。

軍隊的作用

隨著毛對黨越來越不信任，他把目光投向人民解放軍。軍隊成為革命價值觀念的主要來源地，是改造社會的榜樣，是與黨內官僚機構保守主義進行鬥爭的政治工具。當然，把國家機器中最官僚、等級最森嚴的常規軍，當成反對官僚主義、實現平均主義目標的工具，這本身就自相矛盾。不過，從人民解放軍的獨特歷史來看，毛主義這種目的與手段的矛盾不是很明顯(但決不是不存在)。在革命戰爭年代，紅軍不是一個職業化的軍事組織，而是一支主要由農民遊擊隊戰士組成的、高度政治化和帶有平均色彩的群眾武裝力量。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革命鬥爭主要採取武裝鬥爭的形式，在這種環境下，軍隊的職能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打仗，軍隊必然同時承擔政治組織、經濟生產、思想教育和發動群眾等多項任務。黨也許指揮著槍，如毛主義的原則，但軍事職能與政府職能、軍隊與黨之間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更準確地說，基本上是重疊的。軍隊不是由職業軍人指揮，而是由傑出的政治家，即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領導的。正是這種局面使人們、特別是毛澤東本人認為，軍隊和黨一樣，是革命價值觀與革命思想的載體。雖然自1949年以後，解放軍開始朝正規化職業化方向發展，但這種看法沒有改變。

1960年代初，林彪根據毛主義的原則對軍隊進行了改造，使軍隊重新革命化。1963年，在「學習解放軍」運動中，軍隊首次走上了平民政治舞台。軍隊最初的作用主要是宣傳，如宣揚革命戰士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第一個也最著名的英雄戰士是雷鋒，他完全符合毛主義的道德規範，具有傳奇色彩，被描繪成「毛主席的好戰士」。1964年，解放軍總政治部派軍人到學校、政府機關和經濟部門工作，軍隊對社會生活的干預更加直接了。解放軍對農村的影響主要是對民兵的控制，民兵由復員退伍軍人和青年農民組成。大躍進崩潰後，民兵工作一度陷於混亂，如今重振旗鼓。

然而，軍隊干預是有限的，干預的性質也十分獨特。人民解放軍沒有取代黨和政府的職能，黨政工作仍然由官方文職領導人負責；軍隊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結果也沒有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毛對四清

的結果並不滿意。軍隊干預的動力不是來自軍內，而是來自外部的文職政治層，正是這一點使其具有獨特的性質。軍隊不是主動去干預社會事務，它為黨內的政治家利用；更準確地說，是在黨內毛派的號召下登上政治舞台的。毛規定和限制了軍隊的作用，毛讓軍隊介入的目的，部分是為了在黨內鬥爭中得到軍隊支持，但主要目的是為了給政治、經濟和思想等各條戰線樹立一個學習的榜樣。但不管怎樣，軍隊干預的政治結果不是決定性的，1965年，「劉主義者」依然掌握著黨政機關大權，在軍隊支持下的毛派，是黨內持反對意見的少數派。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在這些年裏，軍隊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任務是大力宣傳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對毛的個人崇拜不是新現象，毛在他忠誠的追隨者和大多數農民心目中，有著神聖的地位。但在1960年代前，人們對毛的崇拜基本上是自發的，與毛在革命歷史中的巨大個人作用是相稱的。斯諾在1937年就寫道，早在延安時代，毛「富有魅力的生涯」的傳奇故事已在蘇區流傳。[11] 1940年代初期延安的整風運動，大力宣傳毛的著作，將他的「思想」奉為經典，對毛的個人崇拜迅速升級。而1949年的勝利，毫無疑問地使毛成了「救世主」和「大救星」。革命勝利進一步擴大了毛固有的巨大個人權力和聲望。在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雖然不乏對毛思想的創造性和毛的領導智慧的公開讚頌，但毛並沒有把自己凌駕於黨和國家的領導之上。直到1955年農業合作化運動時，毛才感到有必要越過黨的集體領導，自此，他開始創造有利於出現一個最高領袖的政治條件，培養有利於對自己個人崇拜發展的政治氣氛。簡言之，這些政治條件的核心，是人民的領袖通過凌駕於黨政機關之上，直接面向社會並代表社會發言，有能力克服官僚機構對領袖政策的抵制。這就是說，黨的個別領導及其思想具有比黨的機構更高的政治智慧。

由於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秘密報告中批判斯大林及其「個人崇拜」一事的影響，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步伐暫時放慢了。中國官方雖然也正式表態反對「個人崇拜」，但這並沒有真正反映毛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在1958年初的一次秘密講話中，毛提出要區分「正確的」和「不正確」的個人崇拜形式，他說：「問題不在於應不應該有個人崇拜，而在於個人是否掌握了真理，如果他掌握了真理，就應該崇拜他。」[12] 毛認為自己掌握著真理，因此應該受到崇拜，這在大躍進中得到充分表現，他在運動中，在一定程度上越過黨和政府的常規機構，像一個空想預言家一樣，直接向人民發出號召。大躍進的失敗極大地損害了毛的神聖地位，招致了對他尖銳的諷刺和批評 —— 主要採取借古諷今的方式。1960年代初期，黨和政府官僚機構重掌權力，使毛又一次深感建立個人權威和毛思想至高無上地位的政治迫切性，這一任務落在人民解放軍的肩膊上。

與過去對人們對毛的崇敬相比，1960年代的對毛的個人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製造的，不久後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出於政治需要的個人崇拜，本身也成為一種政治現象。1960年，林彪開始了一場把人民解放軍變成「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的運動，隨後，林著手用這所學校教育全國人民 —— 把教育過程變成神化毛和毛澤東思想的過程。正是軍隊的總政治部在1964年5月出版了第一版《毛主席語錄》。這本語錄不久便以「小紅書」著稱，人們對它頂禮膜拜，林為「小紅書」的再版寫了前言，他不遺餘力地誇大毛澤東思想的普遍效力和巨大威力，宣稱「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天才地、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人民群眾、幹部和知識分子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不久，林彪寫道：「毛澤東思想為廣大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無窮無盡的力量，變成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學習毛主席著作（也僅限於少數幾本）運動主要是由人民解放軍搞起來的，在其後的三年裏，解放軍出版了近十億冊《毛主席語錄》，大約一億五千萬冊《毛澤東選集》。供全國人民學習的英雄模範人物基本上都是解放軍戰士，所有英雄人物都把自己的功績歸功於毛澤東思想的教導。

1965年，個人崇拜已十分流行。被神化的不僅是「思想」，還有思想的生產者。當斯諾於1964與1965年相交的冬天訪問人民共和國時，對毛「毫無節制崇拜」的現象使他感到困惑不解：

> 他的巨幅畫像懸掛在街道上，每個房間裏都有他的半身塑像，他的書和相片無處不在，但沒有別人的。在劉少奇陪同穆罕默德沙阿國王和阿富汗王後出席的有2000演員表演的大型歌舞《東方紅》晚會上，長達四個小時的演出中唯一的英雄是毛。演出達到高潮時，我看到出現了一幅我在1936年拍攝的毛的照片，被放大到30英尺高。這使我產生了一種複雜的感情，我既為我的傑作自豪，又不安地回憶起我在大戰時的蘇聯看到的類似的對斯大林的那種崇拜……個人崇拜(在中國)還沒有普遍化，但這種趨勢是顯而易見的。[13]

顯然，毛對這種個人崇拜並不反感。他不僅區別了「正確的」和「錯誤的」個人崇拜，而且在接受斯諾的採訪(1965年1月)中，提出這種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富。毛坦率地承認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但他進一步提出，剛剛在三個月前發生的赫魯曉夫下台事件，與赫魯曉夫「沒搞個人崇拜」有關。[14]

革命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培養「革命接班人」。早在1964年春季，毛就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必要性，當然，毛是直接向中國青年發出這一號召的，因為青年不但是未來社會的主體，而且最少受到過去傳統的腐蝕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影響，所以，青年人比其長輩更容易接受實現革命目標所必需的正確思想。因此，首次公開討論培養「真正的革命接班人」問題是在1964年6月舉行的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上，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僅僅在兩年後，共青團就被作為繼續革命的障礙而解散。毛提出關於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首次公開發表在中國對蘇聯進行全面抨擊的一篇文章中，文章題目為〈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5] 選擇在這篇文章中發表，是因為在毛主義者看來，蘇聯現在完全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反面典型。在文章裏，毛對中國有可能像蘇聯那樣從修正主義走向資本主義公開表示擔心，毛警告說(此前只限於在黨內)，中國面

臨著「反革命復辟的危險」，中國共產黨有變成修正主義甚至法西斯黨的危險，在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要持續一個世紀甚至更長的歷史時期。毛提出的「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標準，並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此不再贅述。[16] 值得注意的是，培養接班人運動不僅反映了毛對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擔心，還反映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運動的實際含義是不能再依靠黨來繼續革命事業。真正的接班人不是黨培養的，而是通過直接學習和實踐毛澤東思想產生。這樣，培養接班人的運動與「學習人民解放軍」運動及對毛的個人崇拜融為一體，人民解放軍和青年成為真正革命觀念的代表，成為取代保守的黨和政府機構的革命選擇。

毛對淨化青年人思想的迫切需要的關注，也反映在他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日益不滿中。他批評說，與社會現實和革命實踐相脫節的「書本知識」毒害了青年一代的身心。1964年，他提出要縮短正規的教育學制，「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17] 儘管毛對正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體制）從來就沒有多少好感，但他從未像文化大革命前的幾年這樣，以如此尖銳的形式表達自己的不滿。他批評說：「現在的課程就是多，害死人。」他從傳統中國的歷史中得出的教訓是：「知識分子專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是害人的事。」因此，他的結論是「讀書不能讀得太多……讀多了就要走向反面」，真正的知識是來自現實生活中的實踐經驗，不是來自正規教育，孔夫子的情況就說明了這一點：

> 孔夫子從來就沒有上過中學或大學……高爾基只讀過兩年小學，學問完全是自學的。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報童出身，但他發明了電。瓦特是一個工人，發明了蒸汽機。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中國還是外國，許多科學家都是在實踐過程中自學。

從上述觀點出發，毛最後的結論是，「書讀太多就會成書呆子」。他要求改革現存的教育制度、舊式的教學方法與考試制度——所有他譴責為「摧殘人才」的東西。[18]

關於歷史和辯證法的論戰

毛澤東關注對青年一代的教育——他們是否能夠被教育成毛主義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但當時中國許多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提倡的理論觀點卻加深了他對未來的擔心。1960年代初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學者和作家對諸如傳統中國文化的繼承、農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人的本質、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及辯證法等一系列問題展開了討論。討論和論戰基本上是學術性的，是在一種相對自由和開放的氣氛中進行的，但從其理論內容和政治含義來看，其中的許多觀點明顯是反對毛主義的。[19]

例如，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和歷史學家吳晗(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大學教授)提出，傳統的儒家學說，尤其是「仁」提供了一種普遍適用的倫理道德體系和豐富的文化遺產，應為現代社會主義社會所繼承，這種觀點恰恰與毛主義激烈的反傳統態度、或毛主義要求與過去封建傳統徹底決裂的主張格格不入。與此同時，其他一些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例如劉傑提出中國歷史並不像西方歷史般為階級鬥爭規律所支配，所以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特點是進化式過程，「仁」的學說也緩和了中國歷史上的階級衝突，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仁」的學說在當代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這些觀點產生之際，恰恰是毛正在強調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時。還有一些學者就毛主義關於農民起義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的觀點提出置疑，一些學者認為，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農民都是一支保守的力量——而在此時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主義正對農民的革命力量和鬥爭精神大加稱讚。

與這些非毛主義的歷史觀點相呼應的是文學理論。針對毛主義強調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毛主義關於所有形式的意識形態、包括文學和藝術都是某種特定階級利益的反映的觀點，一些學者公開予以反駁，他們提出了一種「歷史主義」理論，認為在一個既定的歷史時期中，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必然要融合成為一種「時代精神」，從這一觀點出發，現代中國社會的革命與非革命的意識形態將在一定程度上融合成為一種普遍的民族精神，它們之間的矛盾自然得到調和，因此，沒有必要人為地製造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還有一些作家質疑毛提出

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學藝術的作用是宣傳革命英雄榜樣、批判反革命壞人的觀點。他們認為，現實主義要求按照群眾的本來面目、而不是毛主義所希望的形象來描寫群眾，現實中多數人都屬於所謂「中間人物」，他們被捲入革命洪流中，夾在革命力量與舊勢力之間搖擺不定。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就屬於這一類人，因此應該現實主義地反映農民在政治上的搖擺性；不用說，這當然不是毛主義希望見到的農民形象。

論戰最後集中於兩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上：如何正確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關於歷史唯物主義，非毛主義學者一般都訴諸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他們常從歷史決定論出發，強調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命題，反駁毛主義關於意識在改變歷史和社會現實中起決定作用的唯意志論觀點。在論戰過程中，這兩種不同觀點的政治含義逐漸清晰。批評者指出，在大躍進中，毛過分強調主觀的歷史因素，超越了客觀的歷史可能性，毛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做法也是如此；簡言之，毛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闡述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相反，對毛主義者來說，首要的信念就是「主觀能夠創造客觀」，他們不厭其煩地引證馬克思的「理論一旦掌握，群眾就會變成物質力量」的語錄，強調馬克思說的「到目前為止，哲學家們只是以各種方式來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的觀點。批評毛主義的人被指責為看不到群眾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偉大作用，企圖壓制群眾的革命熱情，他們宣揚的理論是要阻止群眾依照社會主義目標來改造世界。

1964年，圍繞楊獻珍提出的有關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展開的論戰，是這場意識形態之爭的高潮。楊是培養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校長，他是一位理論家，也是劉少奇的思想代言人。圍繞辯證法的論戰，出現了一大批關於認識論和其他哲學問題的文章，但問題最後被簡單地歸納為楊獻珍把「合二為一」作為辯證法的根本規律，反對毛的「一分為二」的觀點。毛認為，對立面的統一是暫時的有條件的，對立面的鬥爭是絕對的和永恆的；楊及其支持者則強調，對立面的相互作用及矛盾的統一是辯證唯物主義和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規律。楊的觀點為當時在政治上仍居支配地位的劉主義者及其實行的有秩序的、循

序漸進的發展模式的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而持毛主義觀點的人，則支持毛強調的通過階級鬥爭進行社會變革的必要性，支持毛關於矛盾和鬥爭的絕對性和永恆性的觀點。

毛主義者認為，這些知識分子在1962–1964年提出的理論是黨內修正主義趨勢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反映，是受傳統中國文化觀念以及當時蘇聯和東歐國家知識分子影響的結果。但對毛來說，觀念並不簡單地是社會現實的反映，思想本身就是決定社會發展方向的一種歷史力量。單純的學術爭論是不夠的，還需採取其他措施改變形勢。1964年2月，毛提出了一個既簡單、又嚴厲的解決辦法：「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分期分批下鄉下廠。」[20] 1964年6月，他號召按照1957年下半年開展的反右鬥爭路線進行一次「整風」運動。他批評說，在過去15年裏，知識分子

> 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21]

毛對知識分子中的修正主義思潮十分擔憂，但令他更不滿的，是黨對修正主義思潮聽之任之。負責1964年下半年整風運動的是由陸定一、周揚領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與歷次思想運動相比，這次整風不過是走個過場便草草了事，運動只限於彬彬有禮的學術爭論範圍。這倒不是因為陸定一或周揚一下子變成了知識分子自由事業的擁護者——尤其是周揚，長期以來他把自己作為文學和文化正確觀念的化身，以對不同政見者的無情迫害而聞名。他們所以敷衍了事，是不想讓黨和國務院文化部受到毛主義和解放軍的影響。無論如何，不可能指望黨的機構的領導人對「改造」這些知識分子的思想有什麼特殊的熱情，因為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為他們制定的政策提供理論依據。毛也並沒有指望他們能做什麼。實際上，毛對黨的狀況已經忍無可忍，以致於他在1964年8月的一次講話中，尖酸刻薄地說：「現在幾包紙煙就能收買一個支部書記，嫁個女兒就更不必說。」[22] 1965年初，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命運一樣，整風運動及這場歷史和哲學的論戰無疾而終。

1965年，持異端見解的聲音沉默了，但意識形態問題並沒有解決，正如毛主義者與黨的官僚之間的鬥爭處於僵局一樣。毛主義者僅在文化界一個有限的領域內取得了象徵性的勝利，在解放軍的干預下，毛的夫人江青對傳統京劇進行了改造；此外，毛主義佔上風的就只有形式上的意識形態領域。雖然「毛澤東思想」在表面上還被奉為經典，但實際的黨政權力依然掌握在非毛主義者手中，在激進的口號下實行的基本上還是保守的社會經濟政策。毛的思想和社會革命化的種種努力，在頑固的官僚機構的抵制和群眾的政治冷漠中屢遭挫折。在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沒有任何時候像現在這樣，理論與實踐的差距如此之大。

在這些年裏，採取行動的渴望與急躁一直困繞著毛的頭腦，他在1963年寫的一首題為〈答郭沫若〉的詩中，就流露出這種情緒，他寫道：「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全無敵。」毛的意願不久就化成一場規模宏大的政治運動。如果把大躍進後的五年看作熱月反動的翻版，那末自1966年初開始的事件就是毛反對熱月黨人的革命的開端。

註 釋

1. 參見毛澤東1962年9月24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2. 在全會作出的三個決定中，當時只公開發表了全會公報。其他兩份決議只在黨內傳達。
3. 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963年5月20日。
4. 前揭文。
5. 兩個文件的正式名稱分別是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
6. 〈後十條修正草案〉。
7. 〈後十條〉。
8. 前揭文。劉少奇在修正草案中，特別強調做好幹部的工作是運動正確發展的關鍵。他的結論是：「簡單地說，要教育群眾必須首先教育幹部，要解決群眾的問題，首先要解決幹部的問題。」
9. 文件的正式名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10. 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顯然想調和與毛的分歧，至少是想彌合分歧。他把毛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與〈後十條修正草案〉放在一起，統稱為〈雙十條〉。毛拒絕調和，於1965年1月制定了自己的〈二十三條〉，目標是針對由劉控制的黨的官僚機構，因此也遭到劉的拒絕。
11. 1937年，當毛澤東的名字除了在蘇區外，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都還鮮為人知時，斯諾對44歲的毛的印象具有驚人的洞察力和預見性：「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 —— 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 —— 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力量，那末，在這個極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斯諾，《西行漫記》，頁67。
12. 毛澤東1958年3月10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13. 斯諾，《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頁68–69。
14. 前揭書。
15. 這篇長文首先是以《人民日報》和黨的機關刊物《紅旗》的社論名義發表在1964年7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這是中共中央針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所發表的第九篇、也是最後一篇反駁文章。
16. 簡略地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的五項標準是：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
17. 毛澤東1964年2月2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
18. 前揭文。
19. 有關這場討論和論戰情況，參見戈德曼(Merle Goldman)在〈中國共產黨1962–1964年的中國共產黨「文化革命」〉一文中的出色分析，文章載於詹隼(Chalmers Johnson)主編，《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頁219–254。

20. 毛澤東1964年2月2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
21. 毛澤東1964年6月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
22. 毛澤東1964年8月關於哲學問題的談話。

第五部

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
1966–1976

第十七章

文化革命的概念

毛的最後一次革命活動成為他漫長革命生涯裏的最大悲劇——也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幸的後果。1966年，72歲的毛上演了他生平最後一幕革命劇作，發動了他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性大動亂。這是他為復興他認為已瀕臨絕境的革命所作的最後垂死努力，但他的努力始終失敗了。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失敗，在長達十餘年的時間裏支配和扭曲了人民共和國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也給他本人的歷史形象留下污痕。毛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宣佈了他已無能(或不能)維護的原則和理想，釋放了無法控制的社會政治力量，這些力量造成了巨大的人命損失和社會災難。在這場悲劇的最後一幕結束之際，它最終從肉體和精神上吞噬了它所有的發動者和支持者以及它的無數犧牲者——還有大批本來不願意捲入這場爭鬥的無辜者。在毛主義政權的最後十年，文化大革命折磨著中國，幾乎摧毀了中國。

毛在北京的繼承人——他們大多是毛最後這場革命的政治受害者——譴責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動亂」(官方將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作為文革時期)，根據官方的評價，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到自從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最沉重的損失」。雖然絕大多數最可怕的罪行都被歸咎於毛的那些邪惡同事，尤其是林彪和「四人幫」，但是毛應對運動負主要責任，他在極「左」路線的指導下，「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而極左理論不是毛思想的組成部分。但是毛個人的思想和政治錯誤，最後被歸結為數千年歷史的深層影響，特別是中國長期的封建傳統的影響。深深植根於兩千年小農生產傳統的有害

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產生了當代政治的「極左」現象，大躍進的空想主義就是極左的第一次全面表現，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封建法西斯」的後果中，極左思想在政治上的危害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然而，「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1]

自從毛澤東去世後，特別是自從1978年後，「文化大革命」中的發生的事情和受迫害人的具體情況漸為人知。近年來由官方或非官方途徑披露的大量事實，使人們、特別是那些曾對文化大革命一度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同情的人，要求對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重新進行全面評價，但這並不意味著要毫無保留地重複北京近年來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在毛後時代的中國，那些自由地談論和撰寫關於文化大革命情況的人，多數是在文革中受到政治甚至肉體迫害的人，他們在把文革十年描繪成十足災難時，帶有強烈的政治和感情色彩，這與當年毛主義者把文革看作最輝煌的革命勝利時的帶有的政治利害關係，同出一轍。正如何漢理 (Harry Harding) 曾提醒的：

> 中國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與過去的評價完全不同，不過這次我們不應太輕信。今天佈道、譴責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是文革中受害的幸存者，他們就是那些曾受到紅衛兵毆打、鞭撻和批判的「牛鬼蛇神」。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把當局修改後的版本原封不動地譯成英語，我們就會重犯1960年代末期的錯誤，當時我們僅憑表面的價值就接受了官方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解釋。[2]

今天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否定，與過去對文化大革命的全盤肯定一樣，都無助於對這一事件的歷史理解。

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後果的意見分歧，在今後很多年裏都會存在，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寫一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準確、深刻的史書。然而，在此之前顯然不能因此對「十年動亂」視而不見，同樣，也不能簡單地把這一時期的各種事件作為「失去的十年」而棄之如敝屣。因為文化大革命不僅是毛主義和毛時代發展的歷史頂點，而且，那個時代的經驗將支配著毛以後年代的中國人的政治意識。哪怕是粗淺地分析和論述文化大革命歷史，也絕非易事，這不僅由於文化大革命必然引起不同的政治感情，而且因為文化大革命導致的歷史和

道德的兩難困境。在中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任何時期像文化大革命這樣複雜和充滿矛盾，堪稱史無前例；沒有任何時期像文革這樣，一切歷史的類比都陷於無效；幾乎沒有任何社會像文革這樣，如此公開地裸露自己的矛盾和傷痕，會這樣展示出如此奇異、曲折和古怪的歷史事件。在現代歷史中，很少有這樣的歷史片斷，充滿著如此多諷刺和悖論，被手段和目的之間深刻的矛盾所困擾，受著動機和效果之間巨大鴻溝的痛苦折磨。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領導人疾聲宣佈的人民民主原則中開始的，但是，相信這種宣言的人民群眾從一開始就使自己臣服於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之下，這位「偉大的舵手」是作為人民集體意志的化身而出現。文化大革命宣稱是一場反對官僚特權階層和壓迫者的鬥爭(因而贏得了廣大群眾的支持)，但運動不久就處於軍隊的控制之下，而軍隊是國家官僚機構中最具有強制性、等級最森嚴的機構。毛主義領導人起初鼓動群眾攻擊中國共產黨，允諾建立一個更民主的政治結構，但正是這些領導人最後又宣稱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實際上是「鞏固」黨，隨後運動又變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為爭奪領導權進行的殊死鬥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它的領導人抨擊「四舊」，尤其是中國封建傳統遺留下來的迷信思想，然而，取而代之的是對毛的個人崇拜以及圍繞對毛的崇拜而出現的種種原始儀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國青年一代培養成五四時期老一代革命領導人的「革命接班人」，但其結果卻使整整一代中國青年人成了不關心政治、玩世不恭的一代人，在大動亂後，許多青年人稱自己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自從1927年中國無產階級受到蔣介石軍隊殘酷鎮壓後，文化大革命才使城市無產階級第一次在政治上活躍起來，但是，在運動初期成立的真正的工人組織，在文革正式結束之前很久就被解散或查禁了，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又一次因為政治上的消極而受到指責。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號稱是代表農村反對城市剝削，但大多數農民從動亂中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有些甚至還丟失得更多。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最初號召知識份子投身反對官僚專制的鬥爭中，許多知識份子響應了號召，但是，在這場蓄意反對精神產物的運動中，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知識份子更成為主要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國復活社會主義精神，防止「資

本主義復辟」，保證「向社會主義過渡」，但是，這場動亂最終卻使社會主義理想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破滅，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3] 破壞了人民共和國脆弱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動鬥爭的目的，是讓人民在追求美好未來的過程中更好地團結一致，不料留下的卻是至今尚未完全終結的暴力與報復的惡性循環。

在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和動亂產生的實際結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運動最終的結果與運動最初的理想和目標幾乎沒有共同之處。毫無疑問，應該要依據人們所作的而不是他們所說的來書寫歷史，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應與其他歷史人物一樣，應當依據他的行動結果而不是他的話語和動機進行判斷。然而，目標和動機在歷史上並不是微不足道的，何況還有道義上的聯繫。要認真理解1966–1969年發生在(和席捲)中國的事件的意義，都首先應該正視這項尚未完成的工作，即「將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意圖與把這種意圖歪曲成漫畫的實際環境區別開」。毛的意圖與他面臨的環境之間的衝突，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的核心。因此，探討文化大革命應當首先研究它的目的和目標——即使僅僅是為了評價它的失敗的意義。

文化革命的概念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文化革命」這個術語或概念都不是毛澤東的發明。「文化革命」的概念深深植根於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中。早在毛發動文化大革命前的半個世紀，實際上也就是在中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者之前，受西方影響而開展新文化運動(1914–1919)[4] 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新青年》雜誌的知識分子，就呼籲進行「文化革命」，徹底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在上個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裏，中國激進的民主知識分子使用「文化革命」這個詞語，傳達了兩種對當代中國思想和政治有著深遠影響的觀念：第一，中國反傳統的知識分子要求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他們認為，傳統文化不僅對中國在現代的復興毫無用處，而且在精神上是有害的，內容上是腐朽的；第二，他們非常強調人的意識在創造歷史中的作用。他們相信，文化和思想變革是有效政治行動和社會經濟進步的根本前提。

這兩種觀念對青年毛澤東的成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最終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版本 —— 毛主義的重要特徵。用正確的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能夠克服一切物質困難，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社會 —— 這種信念構成了毛澤東思想基本內容的基礎。毛雖然在理論上肯定正統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中說的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但他顯然相信，歷史的進程最終是由採取革命行動的人的思想和意志決定的。從這一信念出發，毛主義非常關注樹立人的「正確思想」，重視「意識形態的轉變」和「思想改造」。正如「人比武器更重要」是毛主義指導革命和戰爭的原則一樣，在革命勝利後，毛主義的發展戰略則是基於中國人民的思想覺悟，基於毛常讚揚的群眾的「無窮的創造力」。

毛認為，自覺的人的活動是歷史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與這一信念相聯繫的，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持無情的批判態度。按照毛主義的觀點，「正確思想」要求徹底清除傳統價值觀念和舊觀念的影響。在毛的文化革命概念中，反對傳統文化和相信自覺的人的活動是歷史的決定因素是兩個關鍵點。文化革命是毛從新文化運動時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下來的思想，無論是在革命的延安時代還是在革命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文化革命一直是毛的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中的核心內容。[5]

文化革命既是現代中國思想傳統的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組成部分。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勝利後不久，文化革命倍受重視，列寧就是文化革命的倡導者之一。列寧與毛一樣，十分關注在一個落後國家裏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漫長時期內，如何始終保持社會主義的精神與革命目標的問題。但是，列寧的文化革命觀點與後來毛的觀點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列寧主義與毛主義在理論上的距離。[6] 當列寧號召進行文化革命時，他一般是指那些依然保留「封建」習慣、風俗和生產方式的落後國家的群眾，應當吸收「資產階級文化」的成果。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是一項未來的任務，它的前提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和社會基礎。列寧設想，現代文化的載體首先是政治化的、受過技術教育的知識分子，其次是城市工人階級中比較先進的分子，他們將把現代城市工業文化的成果帶給生活在落後農村的農民。此外，列寧還相信，人民的現代文化變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它的前提是建立現代工業經濟。列寧在強調提高群眾 (特別

是農民）文化水平的必要性的同時，還特別強調說：「要成為文明國家，就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必須有相當的物質基礎。」[7] 列寧認為，文化革命需要繼承過去的文化遺產，這是理所當然的，他認為，重要的是要「掌握資本主義留下的全部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8]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都與列寧不同，與西方一般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也不同。列寧設想，俄國民族的文化發展以俄國的現代工業發展為前提，而毛澤東則不受任何正統馬克思主義觀念的束縛，他設想的是，中國通過一個「不斷革命」的進程，迅速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對毛來說，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共產主義社會，都無需把物質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先決條件，相反，根本的前提是人的思想的「無產階級化」，而通過「文化革命」的方式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在毛看來，雖然經濟發展可能有助於產生社會主義的歷史結果，但群眾在文化上的「無產階級化」，與其說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不如說是它的前提。毛總是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重要的問題是人的改造」。[9]

列寧在提倡文化革命時，讚揚資本主義文化形式和技術在落後的前資本主義國家的傳播，具有歷史進步意義；而毛澤東統治著一個更落後的國家，卻從未有這樣的念頭。對毛來說，西方資產階級文化和資本主義方式，與他深惡痛絕的中國封建儒家文化一樣，都是有害的，都與社會主義的目的水火不相容，文化革命就是要消滅這兩種邪惡文化的影響。實際上，毛最終否認了（列寧從來沒有）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進步階段的觀點。相反，他極力稱讚中國的落後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有利條件，他論證說：「中國有幸沒有經過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10]

在誰是現代文化的載體這一問題上，毛的文化革命概念與列寧的也完全不同。列寧認為，知識分子依然起著決定作用。正如列寧關於革命政黨的觀點要求把知識分子的「覺悟」灌輸給「自發」的無定形的群眾運動一樣，列寧還設想，精通技術的知識分子將是對俄國進行工業改造的先鋒，在工業化進程中，他們將把現代文化傳授給群眾。與此

相反，毛澤東不信任知識分子，他對群眾的自發性依然持民粹主義的信念，相信在群眾自己的革命實踐中會產生有文化的人，進而實現他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民族理想。對毛來說，自力更生有著內外兩層意義。正如中華民族在經濟上自力更生、不依賴於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人民在文化上也將自力更生，不依賴於知識分子和技術階層。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出現了流行於大躍進時毛主義的口號：「群眾應當成為文化與科學的主人」。

毛把對城市知識分子的不信任擴大到對整個城市的不信任；而列寧一直保持著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念，即歷史進步的力量在城市，所以他很自然地得出結論，文化革命將從城市擴展到農村。毛則一直保持著在農村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形成的強烈反城市傾向。在戰爭年代，毛的革命戰略是發動農村「包圍和戰勝」保守的城市，與此相似，他認為，把農村作為社會與文化創造力的真正源泉，才是革命勝利後的正確發展路線的核心。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歲月裏，毛依然與從前一樣，懷疑城市是使文化和思想墮落的基地。列寧提倡把城市的無產階級分子派到農村去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毛卻提倡把城市居民送到農村去向農民學習「無產階級的優點」──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大規模地把城市居民送到了農村。

也許，毛主義與列寧主義關於「文化革命」概念的最根本差別在於如何看待理想的新社會與過去文化遺產之間的關係問題。列寧和馬克思一樣，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將繼承前人的一切文化成就和物質成就，並在此基礎上創建社會主義。所以，他痛惜俄國文化的落後，在1924年逝世前不久，他把俄國革命的退化，部分地歸咎於文化落後。[11] 毛澤東正相反，他欣賞文化落後、或至少是欣賞「高水平文化」的缺乏，他曾經評論道：「在歷史上，總是文化水平低的人戰勝文化水平高的人。」[12] 這種看法反映了長期以來毛關於落後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信念。在大躍進開始時的1958年，毛用「一窮二白」公式概括了這種最極端的文化觀念：

> 除了別的特點以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因為窮則思變，要幹，要革

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13]

就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邏輯、[14] 反對馬克思和關於新社會必然要繼承過去的一切成就(和負擔)的觀點而言，人們很難再發明出比「一窮二白」更激進的公式了。在逃避歷史的烏托邦思想和把歷史文化一筆勾銷的反傳統願望的驅動下，毛宣稱中國人民是「一張白紙」。在否定了傳統中國文化遺產後，為了填補由此造成的感情真空，毛更激進地宣稱過去的一切在現在已不復存在。毛似乎相信，在一張新的畫布上，在一張沒有被歷史的瑕疵玷污的「白紙」上，就能創造出新文化。就毛的反傳統思想和關於人的意識力量能夠塑造歷史的信念而言，毛的文化革命概念更多地是受到五四時期思想傳統的影響，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統幾乎沒有關係。

1958年，毛在發動大躍進時樂觀地宣佈，中國是「一張白紙」，然而，到了1960年代初期，他又悲觀地得出結論，中國已變成被各種政治和思想的污漬浸染的一張畫布。1964年，在與他的老朋友、時任法國文化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談話時，毛強調說：「要破除新中國成立前的舊思想、舊文化和舊風俗，大力提倡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風俗和新文化。」[15] 1966年，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毛主義的要求是破壞而不是繼承，更不是建設。這種情況類似於半個世紀前，前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發動新文化運動時提出的口號。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烏托邦」運動，那麼，它與大躍進並不同，它的特點是一種奇特的消極烏托邦主義，它的發動者關注的不是未來積極的理想，而是消除過去的重負。

毛在1960年代中期發動這場大動亂，支配了他最後十年的統治。這場大動亂當然不單純是他文化革命思想的產物。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及其扭曲的發展形式，與毛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對權力的慾望和個人政治雄心有密切關係。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尤其是在人們往往對此視而不見的情況下)，這場極端形式的政治運動的目的，是企圖解決共和國成立後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日益發展的社會不平等，幹部和群眾社會主義理想的蛻變，以及根深蒂固的新官僚階層

等。這些趨勢使毛主義者擔心中國可能會出現蘇聯那樣的情況，權力被「官僚特權階層」所篡奪。[16] 毛主義者要全力解決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是非常現實的問題。所以，僅僅用毛澤東本人「錯誤」的思想和他對權力的渴望來解釋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是遠遠不夠的。

社會不平等

社會不平等產生於仿效蘇聯模式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期間，大躍進的平均主義暫時遏制了不平等現象的發展，但在1960年代又迅速滋生蔓延。至少根據官方的意識形態，中國共產黨是要縮小並最終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鄉和工農這「三大差別」的。但是，在大躍進崩潰後劉少奇實行的政策，使這些差別明顯繼續擴大。在城市工業部門再次加強管理者和技術人員的權威，擴大了工廠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差別——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在知識分子恢復了他們過去的專業和社會地位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明顯擴大，像毛主義者批判的，知識分子像趾高氣揚的「官僚」。為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實行的計件工資制和獎金制，擴大了城市工人階級內部的社會經濟差別。大幅度地削減國家就業人數，加劇了相對有一定特權的工廠正式職工與數量龐大的半無產階級的臨時工和合同工之間的矛盾，使問題政治化。[17]

在農村，人民公社形同虛設，農戶家庭自留地蓬勃發展，農村集市日益興旺，集體勞動越來越不景氣，這些不可避免地導致農民之間在經濟上的差別。官方在意識形態上批判說農村有「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在農村許多地區得到官方默許甚至鼓勵。

雖有少數農民從半市場經濟中受益，整個農村的景況遠不如城市。在農村大多數地區遭受饑荒折磨的時候，為了使國家從大躍進的混亂中恢復過來，國家採取了照顧城市居民、特別是官僚、知識分子和國家正式職工的財政和經濟政策。國家對大躍進時建立的農村企業採取了最嚴厲的措施，許多小工廠被迫下馬，毛為縮小農民與工人之間差別而實行的政策受到損害。農村學校和業餘學校的發展被放到次要地位，以集中資源發展城市的教育系統，包括專為高級幹部子女開

設的特殊學校。[18] 大躍進時建立的許多農村醫療網點也被迫關閉，而城市的醫療機構卻在不斷發展。在大躍進後的那段時間裏，城鄉差別和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現象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了1950年代。

社會主義理想的凋謝

隨著1960年代社會不平等的發展，集體主義觀念日益淡漠，人們在口頭上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目標，但這些目標與社會和政治實踐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大躍進失敗後，中國百姓對政治淡漠，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農村的情況尤其是這樣。隨著私人集貿市場日益興旺，傳統的宗教迷信和社會習俗也逐漸復活。與群眾的政治冷漠相對應的是黨的多數領導人的保守主義思想，在激進毛主義言辭的外表下，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尤其是越來越官僚化的黨的機構的權力。

黨和群眾的保守主義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大躍進的失敗。大躍進曾使人們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和經濟繁榮指日可待，當這種巨大的期望轉瞬變成為純粹的生存掙扎時，民眾士氣一落千丈，黨的多數領導人對毛的烏托邦計劃也產生懷疑。但除了大躍進的直接影響外，還有一些長期的因素對限制中國革命的激進主義發揮著作用。其中一個因素恰恰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更準確地說，是領導這場革命的共產黨的勝利。在建立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後，中國共產黨現在最大的利益就是維護這個新社會制度。毛的「不斷」革命不會給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帶來任何利益，黨的利益是永遠保持它的統治，這必須以它所統治的社會的穩定為前提。到1960年代初期，黨已發展成擁有約二千萬黨員的龐大組織，它嚴格地根據劉少奇制定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運轉。黨組織最初是為了實現革命目標而建立的，現在，黨組織的權力本身似乎成了主要目的。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曾評論說：「在激進運動的組織力量與激進主義本身二者之間，關係是倒置的。」[19] 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的前幾年，中國共產黨的保守特徵，證明了這一命題的真實性。

所以，毛澤東關於革命精神正在死亡的擔憂決不是空穴來風。被他認為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思想趨勢（本身性質

就已十分嚴重），是更深層的精神危機和政治退化的象徵。毛意識到，他和其他五四時代的革命領導人不久就將退出政治舞台，他為此深感憂慮。毛的擔心是有充分理由的，新舊兩代的交替往往也是政策改弦易轍之時。為了把革命事業進行下去，毛不寄希望於他直接的繼承人，而是像五四運動的先驅一樣，把希望寄託在中國的青年一代，把青年一代培養成「革命接班人」的運動在1964年就已經開始，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培養新一代革命者。

在毛看來，沒有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理想，社會主義在中國也不會長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使黨和人民的思想重新革命化。

階級與階級鬥爭

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因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革命勝利後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性質，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重大思想鬥爭都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毛主義理論顯得十分大膽，但也頗令人費解。

至少從廣義上來説，1949年後中國實際發生的一切在理論上是清楚的。土地改革完成後，傳統的地主統治階級被徹底摧毀。1955–1956年的合作化運動基本上消滅了富農階級和農民中間的重大社會經濟差別。與此同時，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城市資產階級不復存在，隨著買辦資產階級的大多數成員在1949年逃離大陸，它在中國大陸也毫無作為。1953–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國內「民族資產階級」的資產被國有化，作為對其工商企業的補償，國家定期付給其成員微不足道的定息，所以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變成一個逐漸消失的社會團體。到了1956年，城市和農村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已基本廢除，舊社會的剝削階級已不復存在。代替他們的是一支越來越龐大的黨政官僚隊伍，他們以所謂工人和農民代表的身份，行使舊剝削階級的經濟職能。正如在蘇聯的情況一樣，以經濟為基礎的統治階級覆滅後，取而代之的是以政治為基礎的官僚統治階級，這個階級還處在萌芽時期，它的成員稱自己是「人民的公僕」。

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現實是再清楚不過了，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卻含含糊糊，它的作者們在理論上不研究官僚主義現象，在政治上拒絕這樣做。在1956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在他的政治報告中，宣佈舊的剝削階級已經消滅，社會主義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20]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進而宣佈，中國已經消滅了階級差別，社會差別「僅僅是同一階級的內部分工問題」。[21] 因此，八大最後的結論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對抗性的社會階級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22] 在二十多年後，這一公式又成為後毛時代的主要理論原則。從這一觀點出發，黨在新的社會主義時期面臨的主要任務不再是進行階級鬥爭，而是著手發展經濟。

當然，階級和階級鬥爭也不是完全被忽視了。剝削階級的殘餘和其思想殘餘還存在，它表現為每個公民檔案裏記載的階級成份和政治結論，公民的檔案保存在黨組織和公安局裏。雖然在社會現實中已經不存在資產階級、地主和富農，但在黨和政府的檔案中，那些曾經是這些階級成員的個人(及他們的子女)的階級成份依然把他們劃歸為原有階級。官方劃定的階級成份，以及黨建立的一套複雜而多變的評價體系，即根據本人的政治歷史和表現做出的政治結論，[23] 經常根據政治需要，時而強調，時而可以忽略不計。在慶祝1956年社會主義勝利的輕快氣氛中，階級份和階級鬥爭也被暫時地淡忘了。

官方意識形態肯定了舊剝削階級的滅亡。官僚行使原來農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資產階級擔負的經濟職能，但1956年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沒有涉及官僚的社會地位問題。官僚雖然沒有私人財產，但他們享有原屬剝削階級的一切社會特權和經濟特權。在革命勝利後的官僚的問題上，八大只滿足於一般地號召反對「官僚主義行為」，象徵性地告誡全黨不要脱離群眾。

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的1956年，中國的社會結構和官方的意識形態都與蘇聯相似。與蘇聯一樣，舊政權的有產階級已經消滅，新官僚成為社會經濟的管理者，控制著(雖然在法律上不擁有)國家和集體財產。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也與蘇聯一樣，歡慶剝削階級的消滅，宣佈階級鬥爭不復存在，忽視(或否定)新的官僚統治集團的存

在。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蘇聯，革命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所導致的最明顯的社會結果之一，是出現了自主的、擁有特權的官僚統治。官僚的權力和特權以及官僚的產生，都植根於列寧主義政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是不言而喻的。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否認其官僚產物的社會階級地位，符合共產黨領導人的既得利益。對共產黨官僚而言，繼續延用革命前的、現在已不復存在的個人階級成份，遠比承認新社會有可能產生一個新的統治階級要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而這種做法在理論上也能大致交待得過去，因為私有財產的所有制是馬克思主義劃分階級歸屬的唯一根據。由此出發，衍生出一條普遍的共產黨教條(斯大林在1936年首次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已經廢除了的社會裏，不可能產生一個新的剝削階級。

1956年，毛澤東顯然同意黨的官方立場，即社會主義的勝利已消除了對抗性的階級矛盾(除了「資產階級殘餘」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外)，因此，沒有必要強調階級鬥爭的必要性。1956年12月，毛認為：「不應該像斯大林那樣，在階級消滅以後仍然強調鬥爭的尖鋭化，因而傷害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健全發展。」[24]直到1960年代初期，在大躍進失敗及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破滅後，[25]政治上失意的毛澤東，才開始重視廢除了私有制的革命後社會裏的社會階級關係問題，特別是新社會本身的政治結構產生出來的新階級的問題。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強調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問題，特別是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提出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他警告說，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復辟」。他進而補充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這是他最嚴重的和不祥的警告。[26]

毛的「資產階級」概念令人迷惑，含義模糊，但當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產生的「新資產階級份子」概念時，他顯然不是指舊社會剝削階級的社會殘餘和思想殘餘。他的注意力現在集中在革命創造出來的新社會中出現的不平等形式，這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佔有政治權力的基礎上，與財產所有制無關。1960年代初期，植根於嚴密官僚等級制和地位制的有組織的不平等現象在黨政機關中蔓延，並逐漸擴大到整個社會，毛對此提出越來越多的批評。他痛惜中國共產黨從一個

為正義和平等無私獻身的革命組織蛻變成一個保守的官僚機構，他指責黨的幹部貪圖享樂，走向腐化，只追求權力、地位和奢侈。[27]毛擔心下一代人會重蹈父輩的錯誤，「幹部子弟是讓人不放心的一個原因，他們缺乏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架子很大，還有一種巨大的優越感。」[28]毛還嚴厲地批評了斯大林「幹部決定一切」的觀點，在蘇聯歷史上，這一口號實際上是對不平等的制度的認可。[29]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幾年，毛得出了任何執政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敢苟同的結論。他確信，社會主義社會能夠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障礙，不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殘餘，而恰恰是那些從前的革命者、現在的官僚，革命使他們成了統治者，他們憑借手中的政治權力控制著社會，在社會進程中佔取大量社會勞動成果。毛有時是十分明確和直言不諱地談到這一點的，他在1965年譴責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30]毛還毫不猶豫地指出了這些「新資產階級份子」的地位和來源。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指控說，他們就是「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在當時看來不過是純粹的誇張言辭，實際上是對中國共產主義社會的未來的精確預言。

毛澤東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會產生官僚統治的剝削階級的人。在毛之前有許多人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其中有韋伯、托洛斯基、米洛萬・吉拉斯(Milovan Djilas)等人。毛關於新官僚統治階級的觀點的獨到之處，不在於他對這一問題的分析——無論如何，他的理論還是不很成熟的——而在於這個觀點是由一個共產黨國家的領導人提出的。這種事情過去不曾有過，將來也不太可能再出現。在官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中，毛的這種觀點不啻是異端邪說，在政治上十分危險，它動搖了馬克思主義極力論證的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然而，按照毛的觀點，中國的官僚確實具備了新剝削階級的形式，他們使用政治權力侵佔了工人和農民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他們不是靠私有財產而是靠由他們掌管的國家「公有制」獲取既得利益，通過公有制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謀取社會利益和經濟利益。他們不是通過財產所有權獲得自己的地位和特權——在多數情況下可能是微不足

道的，而是通過(用馬克思的話說)事實上的「生產條件的所有者」獲得的。在毛看來，他們是、或至少正在變成沒有財產但卻功能齊全的資產階級。

毛澤東雖然清楚地認識到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的現實，並且有時也談到這種現實，但他最終把中國的官僚等同於新統治階級的政治立場上退縮了。因為，如果將這種立場貫徹到底，那就需要進行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簡單的文化革命，實際上，這就要求用暴力推翻共產黨國家而不是僅僅進行思想改造。儘管毛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最「深刻」的革命，他清楚地知道，一場精神復興與一場真正的革命之間的區別；這裏無疑還有感情上和政治上的限制。無論如何，這批毛澤東現在深惡痛絕的官僚曾經是他的革命同志和戰友。[31] 全盤否定他們也就是否定了他自己領導的革命，否定了他為之奮鬥而創立的新社會。他寧可相信，其中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是可以改弦易轍的，能夠重新成為革命者。因此，撇開文化大革命的口誅筆伐和表面的轟轟烈烈外，與其說它是一場革命運動，不如說是改良運動、一場非暴力運動。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暴力行為，不是毛的本意，而是中國社會的條件使然。

從中國是處於新官僚統治階級統治的政治立場上退卻後，毛最終又把個人的政治行為作為確定其階級屬性的標準。一個人的階級地位不是由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這樣的客觀因素決定的，相反，是由一些更為主觀的因素決定的：對其思想傾向的評價，其「政治覺悟的水平」及其政治行為等。毛澤東斷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確定一個人的階級屬性時，重要的不是過去或現在的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一個人的「階級立場」。[32] 這種定義的長處是，它既廢除了已不適合1956年後的社會現實的舊的階級劃分體系，又堅持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包括「新資產階級分子」)立場，但又沒有把黨的官僚作為敵對階級看待。毛的這種階級觀與他過去的階級劃分標準完全一致，即確定某一團體或個人屬於哪個階級，主要依據他們對待革命行動、或者像在1960年代初期對反革命行動的政治態度，而不是他的社會經濟地位。但是，以主觀標準來劃分階級，容易導致任意地把政治

對手劃為「階級敵人」，使人們對個人政治行為比對社會集團政治行為更關注。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包含著三種不同的階級理論：第一種理論反映了1956年前的社會階級結構，它是舊政權遺留下來的，在官方的「階級成份」體制中仍有一席之地；第二種理論是關於社會本身會產生新官僚統治階級的問題，這種理論是毛提出來的，尚不成熟，一些激進的追隨者將之付諸實踐；[33] 第三種理論即是個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決定了他的階級屬性的理論。第一種理論在政治上比較保守，肯定了1956年後的社會體制，很自然地為大多數黨政幹部所接受；第二種理論隱含著有必要進行一場反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革命的思想；而第三種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是毛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的理論，即95%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黨作為一個整體是能夠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清除資產階級的影響，但是，這只能通過全面發動群眾和階級鬥爭的方式實現。

不過，所有這三種關於階級的理論，保守的、革命的和改良的，都成為中國人民政治意識的組成部份。他們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一場尖鋭的階級鬥爭。然而，怎樣判定誰是「資產階級」？為了反對誰而開展這場階級鬥爭？那些年間來自北京的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含混不清又常常自相矛盾，不可能提供任何答案，或者説根據不同的階級分析方法提供了不同的答案。毫不奇怪，文化大革命中無數個政治組織和表演者，都各自採用最適合自己特殊政治和社會利益的階級理論版本。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理論混亂，對文化大革命很快成為一場動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根據不同的理論和政治立場，輕易地給某些組織或個人戴上「階級敵人」的帽子並進行迫害。[34]

註釋

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式結論。
2. 何漢理 (Harry Harding)，〈對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評價〉("Reapprais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載《威爾遜季刊》(*The Wilson Quarterly*, Autumn 1980)，頁137。

3. 德力克 (Arif Dirlik)，〈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困境〉("The Predicament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現代中國》(*Modern China*, 9, No. 2〔April 1983〕)，頁188。
4. 關於1915–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參見本書第二章。
5. 毛澤東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特別強調了「文化革命」的思想，他提出，建立新的「革命文化」是政治勝利的保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口號之一「不破不立」也是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謂破也即是掃除傳統文化，與上個世紀第二個十年時的陳獨秀及其新文化運動追隨者的思想同出一轍。
6. 關於列寧與毛澤東在理論上的不同，參見邁斯納，〈俄國與中國的反傳統主義與文化革命〉("Iconocla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Russia"，載格利森 (Abbott Gleason,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等編，《布爾什維克文化》(*Bolshevik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本章部分內容即引自該文。
7. 《列寧選集》，第4卷，頁688。
8. 轉引自斯蒂茨 (Richard Stites)，〈俄國革命的反傳統趨勢：摧毀與保留過去〉("Iconoclastic Current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Preserving the Past")，載前揭書，頁17。並不是所有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同意列寧關於文化變革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觀點。一些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主張進行「文化革命」，例如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 (Alexander Bogdanov)，還有一些「無產階級文化」運動領導人認為文化與「思想」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這與後來毛的觀點十分相似。波格丹諾夫有關文化在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的觀點，參見麥克萊蘭 (James C. McClelland)，〈布爾什維克政策中的烏托邦主義與革命英雄主義：無產階級文化論戰〉("Utopianism versus Revolutionary Heroism in Bolshevik Policy: The Proletarian Culture Debate")，《斯拉夫評論》(*Slavic Review*, 39, No. 3〔September〕)，頁403–425。
9. 正如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對斯大林發展模式進行批判時提出的觀點一樣。見《毛澤東思想萬歲》，頁182。
10. 在社會主義與落後之間的關係問題上，毛明確地否定了列寧的觀點，也

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1960年代初期，毛寫道：「列寧說：『國家越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就越困難。』現在看來，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實際上，國家越落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就越容易，而不是越困難。」見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頁333–334。

11. 列寧對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官僚退化深感悲哀，他將這種情況歸咎於布爾什維克文明程度太低。有關列寧的這種看法，參見多伊奇爾在〈列寧的道德困境〉("The Moral Dilemma of Lenin")一文中的深刻分析，該文載多伊奇爾，《歷史的嘲諷》(*Ironies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頁167–173。
1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毛澤東思想萬歲》，頁240。
13. 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紅旗》1958年第1期。
14. 人們常常引用的馬克思關於歷史唯物主義主要思想的經典表述是：「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603。
15. 馬爾羅，《反回憶錄》(*Anti-Memoi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6)，頁373–374。
16. 〈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這是中蘇論戰的主要文獻之一，可能主要出自毛澤東之手。文章最初是以《人民日報》和黨的機關刊物《紅旗》的社論名義發表的。
17. 合同工主要來自城市失業人員以及靠近城市的農村地區的半失業人員，工廠、建築業和其他行業按照一定時間僱用他們進行勞動；與國家正式工人不同，他們沒有職業上的保障，也享受不到社會福利，實際上，他們構成了馬克思所說的「失業後備軍」。
18. 卡德納(John Gardner)，〈知識青年與城鄉不平等，1958–1966〉("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ies")，載約翰・路易斯(John W. Lewis)主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235–286。
19. 塔克(Robert Tucker)，《馬克思主義革命理想》(*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W.W. Norton,1969)，頁187。

20. 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21.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章的說明。
2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
23. 關於政治結論及其與階級成份劃分之間的關係，參見羅伯特・克勞斯(Robert Curt Kraus)，《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24.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9日。在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係〉講話中，毛幾乎沒有提及階級和階級鬥爭。但在幾年後，即1960年代初期，毛批評斯大林(斯大林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觀點經常自相矛盾，採取什麼觀點取決於政治需要)忽視階級鬥爭。
25. 正如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 Kraus)指出的，大躍進是純粹的毛主義理念的表現，但相對來說，大躍進中並沒有強調階級和階級鬥爭，其中部份原因可能是大躍進允諾要從社會主義向無階級的共產主義過渡。參見理查德・克勞斯，《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頁65–66。就毛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以及人民共和國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理論和實踐而言，克勞斯的這本書資料豐富，分析深刻，不可多得。
26. 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7. 毛澤東，〈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
28.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29. 毛在1962年寫道：「斯大林的書從頭至尾都不談上層建築，沒有考慮人民，見物不見人……他們(蘇聯人)相信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只談專，不談紅，只談幹部，不談群眾。」毛澤東，〈對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注〉。
30. 毛澤東1965年在一份蹲點報告上的批示。
31. 理查德・克勞斯，《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頁150。
32. 有關毛把政治行為作為判斷階級屬性的觀點及其與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關係問題，參見理查德・克勞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一書中第5章頁89–114的分析。
33. 雖然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有人堅持並在理論上精心論證這一點，但毛直到其生命的最後兩年(1975–1976)才又重新提出官僚統治階級的理論，此時他已沒有時間按照這種理論採取行動了。
34. 關於對文化大革命期間不同階級理論之間的衝突這一問題，參見當年曾是紅衛兵的林未然(Weiren Lin)撰寫的資料豐富、頗有見地的論文〈失

敗的中國啟蒙——文化大革命與階級理論〉("An Abortiv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lass Theory")。本文是林未然在威斯康星大學歷史系的博士論文。

第十八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1965年月11月，名不見經傳的文學評論家姚文元(後來成為「四人幫」中的一員)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該文成為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公開信號。《海瑞罷官》是歷史學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於五年前寫的劇本。這一諷喻性的戲劇描寫的是明朝年間，一個因反對地主和腐敗官吏兼併農民土地而被專制君主罷黜的清官海瑞的故事，歌頌了清官的英雄主義。對於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中國讀者來說，無需多麼豐富的想像力就能看出，專制君主說的是毛澤東，清官是指彭德懷，兼併農民土地的做法正是大躍進實行的政策的寫照，而彭德懷就是因為在1959年強烈地反對大躍進才被罷的官。

吳晗的劇作，不過是在大躍進崩潰後的「困難時期」中許多部反對毛主義的歷史諷喻和政治諷刺作品中的一部。作者不單純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是受到包括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在黨內高層的政治對手垂青的人物。比較有影響的作品還有雜文系列《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這些作品以比喻的手法批評毛澤東的缺點，暗示毛是一個精神健忘症患者，忘記自己的承諾，患有嚴重的精神紊亂症。[1]

隨著1962年9月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表的講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開展和對政治思想領域控制的加強，大多數以諷喻形式進行的抨擊中止了。毛在當時清楚地看到，在中國，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嘲弄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繼而正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2] 雖然公開用文學形式對毛進行的批評於1962年就銷聲匿

迹，但被斷定患有健忘症的毛澤東卻沒有忘記。正是在毛本人的授意下（在毛的夫人江青的幫助下），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於1965年11月問世。姚批判説，吳晗不僅歪曲了明朝歷史，而且該劇關於「退田」給農民的內容，給那些妄想「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復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的人以思想上的支持。所有這些就是當前「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焦點」。[3] 不久後的事實説明，反對的力量不是來自資產階級，而是列寧主義者。

在姚的文章發表後，毛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時間表，但時間在當時似乎已經不重要了。在其後六個月時間裏，文學和思想界的論戰也沒有發生什麼異乎尋常的事件。如果説文化大革命正在進行，它也主要局限在學術和文學領域。

但是，毛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領域內的又一場思想整頓，他看到了隱藏在文化和意識形態蜕變跡象下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弊端，而黨的機構似乎不願正視和解決這些弊端；實際上，毛已經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1965年1月，毛帶著這一命題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他説服了黨的領導人同意進行一場「文化革命」。受命貫徹這一模糊但似乎無傷大局使命的，是由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彭真是中央政治局第五號人物，兼任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五人之中只有康生是毛的支持者。在11月姚文元文章發表前，五人小組形同虛設。姚文發表後，彭真匆忙採取行動，想把毛主義的政治批判限制在學術範圍內。1966年2月，彭指責姚和其他毛主義者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對待」。雖然論戰的政治含義十分明顯，但在1966年春季前，彭和黨的機構還是千方百計把論戰主要限制在學術和歷史問題上。與此同時，毛從公開場合消失了。從1965年11月起，他開始了為期六個月在各省的視察，聚集對自己政策的支持力量。

毛於1966年春季返回北京後，各種事件便以令人眩目的速度發展。對吳晗和毛在文化界其他政敵——被稱之為「黑幫」——的抨擊越來越激烈和政治化。1966年初，總參謀長羅瑞卿（這位原為秘密警察首腦被指控把軍隊事務置於毛澤東思想之上）被清洗後，林彪牢牢地控制了軍隊。軍隊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聲稱要在不

斷發展的文化大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解放軍報》在5月初發展的社論中，要求不但要清除文化界的「反社會主義份子」，而且要肅清「黨內的右傾機會主分子」。毛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佈)，宣佈解散五人小組，譴責彭真阻撓文化大革命，指控說「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鑽進了黨的各級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準備建立「資產階級專政」，通知警告說「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正睡在我們身旁」。[4]

這樣，文化大革命很快變成了公開的政治行為。第一個倒台的高層領導人是彭真，不久彭真及其追隨者的職務就被解除，由李雪峰領導的忠實的毛主義者改組和接管了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緊接著是對首都的宣傳和文化部門的全面清洗，最引人注目的犧牲品是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他還掌管著權威的《人民日報》)以及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文學和文化界太上皇的周揚。在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組」的指揮下，毛主義者控制了北京和國家的主要宣傳機構。由江青和陳伯達領導的文化革命小組，主要由激進的知識分子組成，是為領導文化大革命而建立的一個準官方機構，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在許多方面行使著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權力。

但是，毛的目的決不單純是控制北京。毛主義的目標是完全改組國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生活，此外，還有人的思想改造。實際上，在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中，革命精神和覺悟被視為決定最終結局的因素。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基於這樣一種設想：現存的黨和國家機構已經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支配，由此，導致在整個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關係；只有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恢復社會主義精神和革命理想，在「無產階級思想」指導下改造國家結構，才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無論是從毛主義的選擇還是客觀政治需要出發，都只有動員群眾採取毛所主張的革命行動，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在革命鬥爭的過程中，群眾在改造客觀社會現實的同時，也會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毛號召的正是這樣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深刻」革命。馬克思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毛似乎相信，正是社會意識(以政治行動和國家機構為媒介)最終決定社會存在。

紅衛兵

在毛的文化革命小組和林彪領導的軍隊的大力幫助下，自下而上的自發群眾運動很快全面展開。最先響應毛向現行當局造反號召的是大學生和中學生。其中一些人真誠地相信毛宣佈的文化大革命的理想和目標；一些人是為了在學術界和政治界謀取自己的特殊社會利益；還有一些所謂「造反派」組織是由黨組織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改變鬥爭方向和對象。不同的動機和目的糾織在一起，導致了這場規模浩大、複雜多變和派別林立的青年運動。

席捲學校的動亂是從5月25日開始的。這一天，北京大學哲學系年青講師聶元梓在校內貼出大字報，批判北大校長壓制學生對吳晗 事件的爭論，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積極「投入戰鬥」。北大黨組織立即派人撕毀了這第一張「大字報」(大字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群眾進行政治交流的主要工具)，與大字報相關的人員也隨即受到了懲罰。但一星期後，毛歡呼這份大字報是「(二十世紀) 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毛在談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時，曾預言不久就會在中國看到一種「全新的國家機構形式」)，他下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廣播和轉載這張大字報。在各地學校，名目繁多的各種學生造反組織一哄而起。6月，中央和國務院發出通知，作出十八條規定，將高校新生入學考試推遲半年，以對整個教育體制進行改革。在通知的鼓舞下，學生造反積極分子向學校的管理者、教師特別是學校黨委發動了政治上的——有時是肉體上的——攻擊。

學生造反派組織不僅攻擊學校黨組織和教育管理機構，而且各派之間也打得難分難解。在6月初學生騷亂剛開始時，劉少奇就匆忙向學校派出了工作組，試圖把正在興起的運動置於黨組織的控制下。工作組也組織了「造反」學生組織，這些組織由高幹子女領導，他們支持學校黨委，企圖把文化大革命的鬥爭對象由毛說的「當權派」轉向「資產階級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所謂「資產階級權威」顯然是知識分子、教授、教師、作家和那些對政治攻擊毫無抵禦能力的人。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先開始對知識分子進行殘酷迫害的，不是毛主義的激進主份子，而恰恰是在黨組織支持下

成立的、旨在保護黨的官僚的「造反派」。北京鋼鐵學院院長高義升是最早的受害者之一，1966年7月，他在無法忍受工作組迫害的情況下，自殺身亡。[5] 在隨後的幾個月和幾年裏，許多人也遭受了類似的命運。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中最脆弱、最容易被當成「資產階級」的社會集團，在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政治上對立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拿知識分子開刀。但是，最早開始做這種聲名狼藉事情的，正是那些以黨的機構為靠山的造反派組織，而黨的機構正是毛主義者批判的對象。

工作組支持的學生造反派不但迫害知識分子，而且還把鬥爭矛頭指向出身不好的學生 —— 即從前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對這些造反派來說，使這些已經過時的階級成份永久化，自有其政治用途和社會利益。他們還發明了「血統論」(或叫「自來紅」論)，宣稱自己繼承了現在是黨政官員的革命老子的革命精神。隱藏在神秘的「階級分析」和攻擊知識分子背後的政治目的只有一個：保護現存的黨組織機構。

文化大革命充分暴露了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現象：在舊政權下來自被壓迫階級的革命者，在新政權下卻往往是社會和政治上的保守分子(並且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保守)；而在「解放後」的中國，社會和政治激進分子往往正是那些1949年前的特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女。無需多麼深刻的社會洞察力就可以解釋這種矛盾 —— 那些出身於貧苦農民和工人階級家庭的革命者及其子女，在1949年後享有政治地位、充分的教育和就業機會，他們在新政權下享有自己尚未完全習慣的很高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從前的資本家、地主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受到各種形式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歧視 —— 最典型的歧視是在教育領域。那些自稱出身於下層階級(至少有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的人，與革命勝利後的社會制度和新的不平等有著保守的利害關係；而從前的統治階級的後代，成了新的下層公民。所以毫不奇怪，後者熱烈地擁護毛批判官僚特權、實行社會平等的號召，而前者則集結起來保衛黨組織，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轉向攻擊從前的社會特權階級的子女。1966年夏的學生運動，在許多方面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學生之間的政治分裂(一直持續到文化大革命後)正是相互衝突的

社會利益的理性反映。出身於工農家庭、其父母又不是黨的幹部的學生，在中學和大學所佔比例甚小，他們大致對等地分別加入了激進的和保守的「造反派」組織。[6]

在1966年夏季的大部分時間裏，所謂「毛派」和「劉派」的學生組織互相口誅筆伐，間或還發生武鬥事件，工作組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圖操縱運動的發展。兩派喊的都是毛的口號，都宣稱自己忠誠於毛澤東本人和毛澤東思想，但是他們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對毛的思想、特別是毛關於社會階級的思想作出解釋，因而結論完全不同。7月下旬，毛不顧劉的反對，下令從學校撤出工作組，怒斥「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學生造反派現在可以不受黨組織的約束，按照毛的思想權威，自由地成立自己的組織。各種學生組織雨後春筍般成立，統稱為「紅衛兵」，但是，6–7月間學生中的社會與政治分裂在新的組織形式下，依然存在。

紅衛兵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歷史上有著神聖的意義。最早的紅衛兵（赤衛隊）是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奪取政權的武裝工農群眾。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支持紅軍的當地農民武裝就叫作赤衛隊。1966年8月初，佩帶著標有「紅衛兵」字樣袖章的青年學生出現在北京街頭，在毛主義領導人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裏，全國幾乎所有的大學和中學都成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百萬計的年輕造反派在「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口號下，衝向全國城鎮的大街小巷，響應毛主義的號召，掃除一切「牛鬼蛇神」。他們潮水般地湧向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8月18日，數百萬紅衛兵聚集在自1919年五四運動後象徵著革命動亂的天安門廣場，太陽升起時，毛如神降人間一樣，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鄭重地戴上紅袖章，這樣，他不但是「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和「偉大的舵手」，而且還成了紅衛兵的「最高統帥」。一個月後，72歲的主席暢遊了長江，報刊大肆予以宣傳，稱毛在65分鐘時間裏游了9英里，這也是一場造神活動，表明毛不僅在政治上超人一等，在體力上也無人可以企及。

無論是對年邁的毛的神化還是顯示紅衛兵的勃勃生氣，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為了貫徹文化大革命的計劃，後者是被選擇來實現前者各種「指示」和「教導」的工具。在8月初召開的為期12天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上，制定和通過了有關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許多非毛主義的黨的領導人被排斥在這次全會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紅衛兵的代表。「十六條」明確規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這一目的密切相關的另一個目標是後來所稱的「破四舊」。「十六條」中寫道：「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7] 這樣，資產階級就是那些有「舊思想」的人，而一切與毛澤東思想不相容的思想都是舊思想。毛澤東思想取代了黨的組織權威，成為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據。

正如「十六條」中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樣，「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是在黨內，主要來自黨的最高領導人；因此，清除黨內的危險，消除資產階級對全社會的影響，就不能由黨按照過去整風運動的方式來進行；確切地說，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勇敢地發動群眾」。「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方法」，這是當時反覆強調的方針。「十六條」規定，促進這場群眾運動的主力軍是紅衛兵。長者們稱讚紅衛兵是「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最新宣佈的「放手發動群眾」的原則，取代了原先在工作組領導下發動群眾的作法，進一步促進了紅衛兵運動的蓬勃發展。

如果說這一切還不足以使黨的領導人感到擔心的話，那麼，這場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最終政治結果是否就一定是簡單地根據列寧主義原則對黨進行整頓，對此，「十六條」並未明確說明，僅此一點，就足以使這些領導人寢食不安。「十六條」暗示，將根據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而不是列寧的黨的先鋒隊原則，重新組織未來的政治權力。「十六條」宣稱，在文革初期產生的新政治組織，「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和農村。」「十六條」還規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普選制」。實際上，毛個人是贊成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的。他曾在7月說過：「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60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它的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8]

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對建立什麼樣的新政治制度、以及黨在這種制度中的地位問題並沒有明確的設想；但毛澤東以黨和黨的主席的名義號召群眾向黨和黨組織造反卻是明明白白的（雖然並不令人吃驚）。8月5日，毛把自己的大字報貼到了中央委員會正在開會的會議室門上，敦促紅衛兵「砲打」他指責正在「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黨內對手的司令部。三天後，正式通過了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十六條」。8月18日，受毛思想指導、執行毛個人指示的紅衛兵，被官方認可為向黨政機關造反的先鋒隊。與此同時，現在被稱為是毛「最親密的戰友」的林彪，非正式地被任命為主席的接班人。此後，毛主義的攻擊矛頭直接指向整個黨的機構及其最高領導人，特別是被稱為「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國的赫魯曉夫」的劉少奇，[9] 以及被稱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黨的總書記鄧小平。1968年秋季，中國最主要的列寧主義者劉少奇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被他為之終身奮鬥的黨開除出黨，直到這時，官方媒體才公開點他的名（儘管牆上貼的大字報早已點名），但在1966年11月後，劉少奇已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並受到監禁。1969年，他被從北京送到開封（原文誤為合肥——譯註），死於肺炎（十年後人們才知道真相）。由於人民共和國主席在政治上倒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元首的禮儀性職能由孫中山的夫人、共和國副主席宋慶齡擔任。

在革命勝利後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的現象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號召向現行政治秩序造反的不是別人，恰恰是親手創立這種政治秩序的人，是那些革命元勳（毛當然是其中最德高望重的一位），他們親手創建了黨和國家機構，現在又認為這些機構非但不是他們追求的革命社會變革的工具，反而是其障礙。但是，就文化大革命而言，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毛為什麼要號召造反，而是為什麼成百上千萬普通中國人會響應毛的號召、又是如何響應的。

* * *

繼「八・一八」天安門廣場的壯觀集會後，紅衛兵以好鬥的姿態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頭破除「四舊」。他們的暴力行為和不分青紅皂

白的做法，遠遠超出了老一代人的預期和要求。雖然「十六條」規定要他們「敢字當頭」，但也要求他們在「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時，「要用說理的方法，而不是用強制壓服的方法」，即使對那些「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也要「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十六條」還規定，「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實際上，它強調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不能影響生產。但是，紅衛兵在最初的造反活動中，毫不理會這些區別和限制。年輕的造反派更多地是按照早期的紅衛兵宣言行動的，宣言稱紅衛兵將用從「戰無不勝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中得到的「法力」和「神通」，「把舊世界打個天翻地覆，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10]

在1966年最後幾個月的混亂日子裏，數百萬紅衛兵舉著毛的畫像（唱著「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揮舞著毛的「小紅書」（「小紅書」被賦予某種神奇的力量），走遍全國各地的街道和鄉村，進行大串聯，開展一場消滅過去封建主義的各種象徵和當代資本主義影響的運動。他們砸抄博物館和住宅，焚燒舊書和藝術作品；從孔夫子的課本到貝多芬的唱片等所有的東西都被抄出來，扔進了垃圾箱；街道和各種建築物的舊名稱都被廢除，改成了新的革命名稱，貼上了主席的畫像和語錄，倒霉的市民如果穿著西裝或留著港式髮型，就會被手持剪刀的紅衛兵截住，剪破衣服，剪光頭髮；同樣遭到厄運的還有佛教和道教的寺院和遺跡。文化大革命在摧毀文化的同時，也摧毀著人。隨著紅衛兵的攻擊對象從「四舊」轉向「當權派」，黨政幹部被抓起來，戴著高帽子遊街，被迫在群眾批鬥大會上承認自己的「罪行」，經常受到毆打和精神折磨，許多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自殺。最脆弱和沒有反抗能力的知識分子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老舍就是最早的犧牲品之一，他是中國最著名的劇作家，著名的《駱駝祥子》就是他的作品；他被中學紅衛兵反覆勒令參加「學習」班和「批鬥」會，他的家被洗劫一空，所有的書被付之一炬。最後，人們於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的太平湖裏發現了這位67歲老作家的屍體，據報道說，他是投湖自盡的。[11]

紅衛兵的行動並非到處暢通無阻。有時，到工廠和農村的學生造反派遇到對立的工人和農民造反組織，雙方間就會發生流血的武鬥。

但最激烈的武鬥發生在紅衛兵內部之間。紅衛兵運動一開始就存在著的社會和政治上的分裂，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深，越來越尖銳。運動中的「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間陷入了似乎無盡的暴力與報復的惡性循環圈。由於大批在前些年下鄉的城市青年都返回城市參加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隊伍更加壯大，但暴力和派性也越來越嚴重。這些人過去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他們怨氣最大，對黨心懷不滿，尤其怨恨高幹與軍人子女，因為這些人可以逃避下鄉，享有優先上大學的特權。「返城青年」通常都加入比較激進的紅衛兵組織。[12]

北京的文化大革命領導人既想限制、又要鼓勵年輕「闖將」的行動。他們規勸紅衛兵不要使用暴力；命令他們不要干涉工人和農民的生產勞動；告誡他們要把鬥爭矛頭對準個別的「走資派」而不是地方的黨組織；批評他們煽動群眾分裂而不是在共同的鬥爭中團結群眾。這種徒勞的努力，是為了使膨脹的、日益派性化的運動納入某種形式的中央控制之下。與此同時，解放軍受命幫助紅衛兵。紅衛兵可以免費乘坐火車、公共汽車和卡車，所到之處均免費提供食宿，這樣的待遇當然無助於限制紅衛兵的大串聯。10月底，宣佈學校繼續停課至下一學年度，但這對紅衛兵的造反熱情沒有多大影響。在1966年結束前，約有一千二百萬紅衛兵見到了毛主席，接受了毛的檢閱。天安門聲勢浩大的集會和毛神奇般地現身，更談不上是對紅衛兵運動的限制，何況，林彪和其他領導人發表的講話，對紅衛兵的革命熱情大加鼓勵，對他們的「極左」行為幾乎隻字未提。紅衛兵繼續走過大街小巷，穿過農村進行「長征」，使自己經過千錘百鍊，成為「革命接班人」；繼續在全國進行免費大串聯，「交流革命經驗」；繼續猛烈「砲打」各地黨組織的司令部，揪鬥幹部、知識分子和從前的資本家及所有一切能被貼上或冠以聲名狼藉的政治標籤或階級成份的人。

到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組的多數領導人感到紅衛兵已完成了它的政治使命。紅衛兵不僅實現了「揭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目標，而且還幹得更多。他們實際上迫使全黨處於挨打的境地。但紅衛兵對一切權威的攻擊有可能導致無政府主義的危險，也不符合毛主義「團結百份之九十五以上幹部」的目標。他們貫徹了毛「勇敢地發動群眾」的指示，但他們的做法卻逼得工人和農民奮起捍衛黨組織和社

會秩序，反對這些年輕傲慢的不速之客。此外，政令紀律幾乎全部廢馳，暴力的派性鬥爭、對文化和藝術的破壞行為以及時常發生的十足流氓行徑，所有這些構成紅衛兵運動特徵的事情，都使北京的毛主義領導人得出結論，紅衛兵已成為政治負擔。1967年，他們採取了一系列嚴厲措施，試圖把文化大革命的「先鋒」逐出政治舞台。但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紅衛兵政治生命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1967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從地方的、省和地區黨的權力機關手中「奪權」，新的政治角色登上了政治角逐中心：工人與軍人。事實說明，較之前六個月紅衛兵運動，新階段帶來的動蕩有過之而無不及。

上海公社的浮沉

1966年夏季和秋季，隨著文化大革命從北京擴展到其他城市和各省，對毛主義領導人來說，顯而易見的是他們低估了運動造成的混亂程度，低估了地方黨組織對運動的抵制能力。在10月下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承認：「文化大革命闖了一個大禍，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一張大字報」，「我也沒料到，北大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我這個人闖了這麼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13]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在談到為什麼群眾組織沒有實現大聯合、形成新的政治結構問題時，把責任推到那些「擔心會丟掉烏紗帽」，「擔心會丟掉尊嚴」、因此「煽動工人和農民反對學生」的地方領導人身上。[14] 當然，陳伯達不會提到，他和北京的其他毛主義領導人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操縱群眾運動，比起那些非毛派的黨的領導人，有過之而無不及。

毛主義者還低估了另一個因素：城市工人階級自發的社會政治激進主義，它很快就嶄露頭角。但是在1966年底時，毛主義擔心的是各省市舊的黨官僚機構東山再起，這些機構利用群眾組織的分裂來保護自己。實際上，從作為一個全國性組織行使職能的角度來看，黨事實上已不復存在。在北京的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獨攬了大權，以中共

中央的名義發佈指示，但在首都以外的省、市和地區，黨組織依然存在，固守自己的勢力範圍。所有的官僚機構都受到了衝擊，但舊機構的各個部份又都保持著自己相對的完整性，地方領導人一方面表示忠誠於毛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極力抵抗當地毛的支持者的進攻。為了打破政治僵局，北京領導人號召立即實現「十六條」中規定的目標之一：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上海是第一個奪權的城市。1967年的前幾個月，在這個擁有1100萬人口的城市中發生的事件，對於決定全國鬥爭的未來進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上海奪權事件不但暴露了文化大革命面臨的客觀限制，也暴露了它的主觀限度。

* * *

上海不僅是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而且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遍及都市的龐大的現代化工廠裏，集中著數量最多的中國無產階級，他們繼承了1920年代流血的革命鬥爭中鍛造出來的工人階級的戰鬥傳統。上海又是中國文明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時也是政治上最激進的城市，是成熟工人階級的搖籃，是現代中國激進知識分子聚集的中心。1921年，中國共產黨就誕生於上海。1965年，毛又號召上海的知識分子開展文化大革命。如果說中國必須要開展「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理所當然地應從上海開始。1966年底和1967年初在這座巨大城市發生的事件，是其他城市將要發生的事件——雖然規模不及上海——的預演。

在北京毛主義的鼓舞下，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夏季，學生組織了類似首都的紅衛兵組織。和其他地方一樣，由於自身的原因和黨組織的操縱，紅衛兵從一開始就陷於分裂。但無論派性有多嚴重，運動還是迅速發展，聲勢越來越大，從以大字報和群眾集會形式對黨組織進行口誅筆伐發展到對政府官員的人身攻擊，從批判學校的「資產階級權威」，發展到向由市長曹獲秋和華東局書記陳丕顯領導的上海黨政機構的全面挑戰。[15]

上海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發生了一樁具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誘發了群眾對統治他們的官員深深的憤恨，這就是「黑名單」事件，類

似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黑名單是由學校、工廠、居委會和群眾組織中的黨的工作人員和公安人員搜集的公民的政治檔案。黑名單使許多原來想響應毛的號召的人、特別是工人望而卻步，他們擔心，一旦黨組織東山再起，會對參加運動的人進行政治和經濟報復。10月5日，北京下令公開銷毀這些黑名單，學生造反派受到鼓舞，要求市當局銷毀黑名單，但是黨的官員拒絕交出這些他們稱為「國家機密」的材料。11月初，一些好鬥的紅衛兵組織在晚間襲擊市委辦公室，想搶走材料，因而與黨員幹部和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11月16日，北京再次指示，要求銷毀黑名單，但規定只能用說服的方法解決問題，不許動用武力。不過，黨組織並不容易被說服，結果，這些政治檔案沒有被銷毀，卻使造反派與黨的幹部之間的敵對情緒越來越深，這種黨與群眾之間的互不信任，直到文化大革命後很久依然存在。

圍繞著「黑名單」的鬥爭使上海市委威信掃地，它的權力為上海工人階級取代。早在1966年秋季，造反活動就從學校蔓延到工廠，這樣，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劇中，真正的無產階級登台了。然而，工人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加入戰鬥的，這是一個分裂成一方為老工人和技術工人、另一方為年輕的非技術工人和學徒工的階級。前者受益於舊的工資和獎金制度，在總體上希望保存現有的政治秩序；後者的生活和勞動條件使他們更熱衷於向黨的官僚機構造反。在享有國家正式工身份的工人與主要來自附近農村人民公社（以及少量的城市失業者）的大量半無產階級的臨時工、合同工之間，存在著更深的鴻溝。臨時工只在一定的期限內被僱用，隨時可能被辭退，合同工生活在最低限度的生存線上，他們不僅工資微薄，而且根本沒有正式工享受的基本社會福利及工作保障。人們最初認為，或至少在理論上論證說，合同制是縮小工農差別（三大差別之一）的一種途徑，但現實中的合同制不過是國家企業獲取廉價勞動力的途徑，是共產黨國家謀利的手段。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除了其他剝削勞力的形式外，合同制也有長足發展。[16]

在前些年被迫下放到農村的青年工人和學生也返回了城市，要求工作和住房，壯大了上海工人階級的陣勢，要求工作的還有復員軍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臨時工。

上海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同成份以及城市貧民，都有各自不同的、常常是相互衝突的社會經濟要求，相互敵對的各種政治組織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文化大革命第一次使心懷不滿的工人和其他人，在不受共產黨組織和思想約束的情況下，自由地表達心中的不滿，自由地(雖然為時短暫)成立自己的組織。各種群眾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令人目不暇給，所有的組織都號稱忠於毛和毛的路線，但都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解釋毛的路線。11月初，一些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一個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鬆散組織，由王洪文當司令，王洪文是一個紡織廠的年輕中層幹部。工總司是工人自己創造的組織，與北京的指示無關。事實上，當時來自首都的毛主義指示主要強調的是工人要促生產，而不是抓革命，要求工人只有在完成八小時的生產後才能參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致設想是，在工人委員會(特別強調是在業餘時間建立的)與管理幹部的合作下，在工廠平穩地進行生產關係的轉變。由於擔心影響生產，直到新的一年開始後，北京才號召工人成立「革命造反組織」。

但是，上海的革命高潮比毛主義領導人預計的要更快。11月8日，工總司向上海市委提出要求，明確提出要用人民政權機構取代舊的官僚機構。工人們要求市委承認工總司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合法組織，從而向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提出挑戰。他們要求市委為工人在全市各工廠建立組織提供條件，要求市政府對自己採取的措施作出公開說明。當這些要求被拒絕後，一些激進的工人決定上北京向毛澤東請願。11月10日，他們強佔了一列開往北京的火車，上海市委下令火車停在上海郊區的一個小鎮安亭，但有一半工人拒絕返回上海，他們在那裏被困了三天。

首都的領導人對如何解決安亭事件舉棋不定。第一個作出反應的是陳伯達，他發了一封電報警告說，「違背黨的指示是一個嚴重事件」，工人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其次才是參加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們必須馬上返回生產崗位」。[17] 但是在上海市委還沒來得及執行這一指示之前，張春橋來到安亭，帶來了北京的新指示；張在1966年7月到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前是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11月14日，張宣佈工總司是合法的革命組織，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在工人的要

求上簽字表示同意，迫使上海市長曹獲秋也勉強簽了字。顯然，北京的毛主義領導人認為，讓無產階級、至少是上海的無產階級參加被稱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此前，毛澤東對真正的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直沒有表態，上海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不久就將表明，毛對城市工人階級的信心只是暫時的。

隨著工總司在11月中旬的勝利，造反派組織在全市範圍內組織工人和其他階層人士，上海黨政機構的權力很快分崩離析。群眾運動以瘋狂的步驟發展，聲勢日益浩大，與紅衛兵結成鬆散聯盟的各工人組織，為爭取群眾支持和奪取權力互相爭鬥。當時比較著名的群眾組織有第二工人兵團(擁有50萬體力勞動者，由性格暴躁的耿金章率領)、第三工人兵團(由數十萬從工總司分裂出來的工人和學生組成)以及紅旗軍(復員軍人組成的全國性組織的一個部分)，這些組織最初都曾與工總司結盟，但在組織上是獨立的，政治上更加激進。[18] 與這些激進組織對立的，是一個自稱為「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的組織。赤衛隊是一個主要由技術工人和技術人員組成的相對保守的組織，號稱有80萬人，它最初可能是在原市委支持下、為反擊造反派的進攻而成立的。但是，赤衛隊不久就對上海市委屈從於造反派的政治和經濟要求提出強烈批判。支持赤衛隊的還有一小批工人和其他市民，他們希望保持文革前的秩序，但同樣也是打著忠於毛和毛思想的旗號。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分成了兩大對立陣營，分別由保守的赤衛隊和激進的工總司領導，當然兩派也非鐵板一塊。在年底前的最後一星期裏，兩派爆發了大規模的武鬥，導致工廠生產停頓，嚴重地影響了市政服務。12月31日，在不斷發生的罷工浪潮、政治示威遊行和日益加劇的武鬥的背景下，赤衛隊宣佈進行總罷工，使這個大都市經濟完全癱瘓。舊官僚機構為挽救自己進行了最後的掙扎，敞開了上海市及所屬工廠的財政大門，使混亂局面雪上加霜。市政府當局為了滿足幾乎是所有群眾組織都提出的經濟要求，討好工人，使他們在政治上不要過於積極，下令大量發放獎金，增加工資補貼和現金補助。這種作法後來被批判為「經濟主義妖風」，它是上海市委在絕望中的最後一招。在耗盡了自己全部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後，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群眾運動風起雲湧，最後徹底推翻自己。

被頌揚為「一月革命」的奪權，是在新年的第一個星期裏完成的。1月5日，十幾個與工總司鬆散地聯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組織(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和幫助下)，在兩天前剛被造反派奪了權的上海主要報紙《文匯報》上，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這篇宣言痛惜風起雲湧的群眾革命運動中的分裂(指責赤衛隊和原市委製造了分裂)，呼籲工人返回工廠，號召工人、學生、知識分子和幹部團結起來。第二天，為了顯示團結的力量，上百萬人聚集在城市中心廣場舉行大會，另有數百萬人看了電視實況轉播。會上批鬥了曹市長和市委其他高級幹部，宣佈撤銷他們的職務，迫使他們公開認罪。在以後的幾天裏，較低一級的幹部也受到了類似的批鬥，戴著高帽子、掛著黑牌子遊街。舊市委垮台了。

然而，取代舊市委的不是完成了「一月革命」的工人，而是張春橋。1月6日，他再次來到上海，不僅是為了就任勝利了的群眾運動的領袖職務，還是為了控制群眾運動，重建上海的秩序。[19] 與他一起到上海的還有他的助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張春橋和姚文元與工總司司令王洪文達成了政治交易，結為同夥；十年後，他們三人被作為「四人幫」的成員逮捕入獄。工總司成了張春橋主要的群眾基礎，但張春橋不只依靠群眾組織來恢復上海的秩序，他還接管了上海黨組織，運用他過去在黨組織的關係，爭取基層幹部的支持。張春橋還能夠動用城市公安力量和解放軍駐滬部隊，隨時動用武裝力量敦促工人返回工廠，拒絕工人增加工資的「經濟主義」要求，鎮壓罷工，重建政治秩序。到1月底，上海基本上恢復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和管理秩序。

在維持1月初奪權時群眾運動暫時的統一方面，張春橋沒有成功。赤衛隊雖然已經解散，其中許多成員加入了工總司，但一些參加1月奪權的激進組織卻成了反對派。由於擔心張春橋的新政權與為其取代的舊市委是一路貨色，代表體力勞動者和流氓無產者的組織(尤其是耿金章的第二兵團)對張統治的革命合法性提出挑戰。在1月的後兩星期內，派性戰鬥重新爆發，武鬥不時發生。[20]

群眾運動所以還能在表面上保持團結，是因為張春橋保證將按照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原則建立新的體制，即是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廣泛宣傳的巴黎公社模式。上海所有的政治積極份子都一致支持巴

黎公社的這些原則，毫無疑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對過去黨的專政不滿。1967年初，上海到處可以聽到「一切權力歸公社」的口號，當然，張春橋是否這樣認為則是另一回事。

由於派性鬥爭而延滯了的上海人民公社終於在2月5日正式宣告成立。這一天，百萬工人集會，慶祝「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上海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天」。但是，上海公社從一開始就不是按照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原則建立的。馬克思的模式要求建立一個「生產者自治的政府」，政府官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接受群眾的監督，群眾有權隨時撤換官員，而上海公社領導人張春橋和姚文元實際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張和姚的這種權力和合法性不是來自上海的工人，而是來自毛主席的最高權威。馬克思要求廢除常備軍和警察，而張春橋卻動用軍隊和警察力量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鎮壓持不同政見者。事實上，在新政府成立大會上，張就強調說，公社得到了人民解放軍的支持。此外，張在公社的計劃、組織和領導中，都排除他的政治對手，迫使其中一些人宣佈成立一個對立的「新上海人民公社」，並派出代表團到北京去抗議張春橋的鎮壓政策。[21]

然而，上海畢竟宣告要遵照巴黎公社的模式及其神聖的原則；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公社理想在上海人民心中生了根。上海公社成立初期情況雖然令人沮喪，但如果給予上海人民機會和自由，公社或許能在人民的普遍支持和參與下成長和成熟。

不過，這只是一廂情願。當上海人民翹首以待，以為北京會以歡呼一月革命的同樣熱情慶祝上海公社的誕生時，毛正在尋找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在1月期間，還有另外兩個省發生了「奪權」，一起是山西，另一個發生在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在這兩次奪權中，人民解放軍在「革命運動」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兩地在推翻了原省委後，導致的政治結果不是建立公社，而是建立了由革命群眾、黨的幹部和軍隊組成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軍隊在其中起著主要作用。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北京的毛主義領導人宣佈，「革命委員會」是奪權後唯一合適的政權形式。在此期間，對上海公社沒有公開發表任何看法。但在2月中旬，毛在北京召見了張春橋和姚文元，他們在北京逗留了十天時間，向他們作了交待。聽說有些上海革命者要求廢除一切「領導」

後，毛向張和姚談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說：「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非常反動的……實際上總還是要有領導的。」關於上海公社一事，毛懷疑公社的激進原則能否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行得通，對公社這種政治組織能否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表示懷疑，因為即使在上海，「公社在鎮壓反革命方面也太軟弱。人們到我這裏來抱怨說，公安局捕人時，前門抓人後門放。」所以，毛建議——主席的建議在當時就是最高指示——把上海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22] 在這個涉及到文化大革命未來前途的問題上，毛還擔心在公社這種機構裏能否有共產黨的的政治地位，所以他堅決主張，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需要共產黨及其富有經驗的幹部。[23]

張春橋在返回上海後，不得不在2月24日向全市人民發表的電視講話中，解釋為什麼上海公社將不復存在。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毛主義的理論家們早就廣泛公開地宣傳，毛主席不但繼承而且「發展和豐富」了巴黎公社的經驗，更何況毛本人多次讚揚過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模式。不管怎樣，默默無聞地存在了短暫19天的上海公社變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這一決定是北京而不是上海工人作出的。其他一些原來準備成立公社的城市也馬上放棄了計劃，轉而搞起了「三結合」。上海公社似乎從來就沒有存在過，在官方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它的成立和消失都沒有任何記載。

雖然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不可能改變上海政治權力的現實，公社的消失也不過是換了個名稱而已，但它的消失標誌著放棄了巴黎公社的原則，意味著希望破滅。無論是上海還是其他地方的「革命委員會」，都不是群眾民主管理的機構，在本質上是官僚工具。它最初是受軍隊支配。逐漸又回到了經過改造後的列寧主義政黨的控制，最後與黨合為一體。

1967年2月發生的這些事件，是毛主義從文化大革命最初宣佈的目標後退的第一步。這些事件還說明，在中國，所有的政治權力最終取決於並歸屬於一個人和他的「思想」，這種現象類似於馬克思曾描述過的，人民的政治權力最終變成了行政權力，「在行政權力的面前，國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意志」。[24] 對毛的個人崇拜已達到如此普遍的程度，以至於主席不但能決定個人的命運，而且也能決定社會運動的命

運。上海工人贏得了自己的政治權力，在1月初短暫的幾天裏實現了文化大革命宣稱的既定目標，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現在，他們不得不把權力交給「更高的權威」。顯然，文化大革命的「敢於造反」的權利不是人民固有的權利，而是由被神化了的毛的權威所賜予，因此，毛也可能隨時廢除這項權利。對上海工人來說，1967年2月，毛規定了他們造反的限度，決定了造反的政治結局。

奪權、軍隊和極左分子（1967年3月至8月）

1967年，在1月革命中達到頂峰的上海事件模式，也為其他地方所傚仿。但在多數城市和省裏，當地黨的力量更強大，群眾運動相對較弱，又常陷入派性鬥爭，缺乏像上海那樣的群眾運動領袖。此外，官方批准進行的「奪權」運動是有前提的，即奪權後只能建立以「三結合」為基礎的革命委員會。在理論上可以繼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但在實踐中，決不允許再進行這樣的嘗試。1月23日，林彪根據毛的命令，指示人民解放軍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鬥爭，支持「革命左派」，維護社會秩序。

同意軍方介入對局勢關係重大，但這一決定又顯得自相矛盾。軍隊是國家機構中最官僚化的組織，現在卻要由它來支持和幫助一場反對官僚精英的群眾革命運動。但對毛來說，採取這一重大步驟，也許並不像後來的觀察家 —— 還有當時捲入鬥爭的多數中國人認為的那樣，有什麼不協調之處。無疑，在毛看來，主要由農民組成的解放軍比起城市群眾來，是一支更可靠、當然也更有效率的革命力量，而後者缺乏自我約束，一盤散沙。此外，毛一直把軍隊視為保持革命鬥爭傳統和平均主義價值觀念的大本營。在林彪的指揮下，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前的幾年，人民解放軍就已經經歷了用「毛澤東思想」進行「活的思想教育」的階段。因此，人民解放軍已經做好了扮演其既定革命角色的準備，但並不是所有毛的追隨者都同意這種觀點。

毛沒有號召軍隊自上而下地強加一場革命，軍隊也無意以「秩序」的名義實行接管。總的來說，人民解放軍不一定服從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但毛對軍隊的權威還是至高無上的。然而，在黨無法作為一個

全國性組織行使職能、群眾運動陷入派性鬥爭這種天下大亂的局面下，軍隊不可避免地成為文化大革命鬥爭的仲裁者。隨著形勢日益混亂，軍隊不但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經濟生活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士兵們進入工廠和公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解放軍強制推行紀律，才使城市和農村的生產在這些動亂歲月裏得以維持。在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地方，軍隊通常在「三結合」中起主導作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站在群眾組織一邊，與老幹部保持一定距離。由於眾多的群眾組織都宣稱自己是毛主席的真正擁護者，要決定誰是「革命左派」頗為不易，軍隊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進的群眾組織。軍隊既要支持群眾的革命行動，又擔負著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任務，在兩者發生衝突的情況下，軍隊領導人一般選擇後者。

為了維護秩序，軍隊經常對那些非常激進的群眾組織進行武裝鎮壓。在1967年2月和3月，在後來被批判的「三月黑風」中，軍隊強制（有時運用武力）解散了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進的學生組織和工人組織，有數千人被捕、被殺或受傷。[25]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幾乎所有的群眾政治組織最終都訴諸暴力，但在動亂期間死亡的人，多數是在軍隊鎮壓時被打死的，而不是像一般認為的是死於「激進的毛份子」手中。在軍隊沒有動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被規定是一場學習毛澤東思想的運動。正如李洪雲所指出，把毛的思想作為學習對象而不是行動指南，有助於壓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是為了解決軍隊面臨的「口頭上的革命與實際上的保守」的矛盾。[26] 1月革命之後，在許多地區，正是軍隊、老幹部和保守群眾組織的三結合，阻礙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目標的實現。

如果說軍隊的介入遏制了文化大革命的激進勢頭，那麼這主要是因為毛在當時決定採取相對穩健的方針。1967年2月，毛宣佈「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是反動口號，並著手糾正一年前在他的號召下出現的無政府主義局面。由合同工、學徒工、復員軍人和農村返城青年組成的各種群眾組織——現在被視為過分激進的暴力組織——被宣佈是反革命組織而正式被取締。紅衛兵雖然還沒有被逐出政治舞台，但有針對性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限制其活動。學校（過早）宣

佈將於3月份復課，敦促學生返回校園。宣稱對衝擊政府機關、搶檔案和對黨政幹部進行肉體摧殘的行為要進行嚴懲。4月，已經沉寂了的劉少奇(雖然還是沒有點名)除了走資派的罪名外，又被指控為叛徒。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掌握「鬥爭大方向」，使分裂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更重要的是，由周恩來領導的政府機關開始重新行使職能，除了仍然由所謂劉少奇的追隨者控制的黨的機構外，黨組織的合法性也逐漸得到恢復。給黨的幹部恢復名譽的工作也開始進行，據說，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是忠於革命的，或至少是可以改正自己錯誤的。幹部被說成是「奪權鬥爭的中堅」。周恩來作出艱苦的努力，勸說群眾組織結束對幹部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在共同的鬥爭中團結一致。

儘管為使群眾組織團結一致採取了種種措施，並且還有解放軍的介入，但是「奪權」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仍然舉步維艱。許多地方的奪權沒有成功，另一些奪權又被說成是「假奪權」。「假奪權」有兩種情況，一種所謂奪權不過是原黨委的改頭換面。另一種是解放軍不讓那些過分激進的群眾組織掌權，把他們的奪權稱為「假奪權」。[27] 到1967年4月底，除了上海和北京外，[28] 在其餘27個省、市和自治區中，只有四個省成立了為中央認可的革命委員會：山西、黑龍江、貴州和山東。在其他地方，原來的黨組織雖然遭到各種造反派組織的圍攻，但依然根深蒂固。造反派組織不但自己內部打得不可開交，而且還常常與奉命來支持他們的軍隊發生衝突。混亂局面似乎陷入了僵局，除了導致流血外，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獲。

不久，後來被譴責為「極左份子」的毛主義領導人和組織又重新燃起了革命烈火。1967年春季，各地的軍隊領導人著手恢復「秩序」，這在許多地方意味著保護原來的黨的機構，支持保守的群眾組織，維持政治現狀，使造反派對軍隊越來越不滿。與此同時，由於周恩來在北京的努力，許多幹部又重新恢復工作，進一步加深了造反派的敵意。站在對立面的絕不僅是少數幾個極端份子，文化大革命的全部歷史清楚地表明，工人、學生和農民對黨的幹部普遍懷有怨恨情緒，他們反對的也絕不僅僅是「一小撮」被官方稱為「反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如果沒有群眾對官僚特權的普遍反感，就難以解釋為什麼成百上千萬群眾會響應毛的號召起來造反。

反對軍隊介入和老幹部恢復工作，意味著對革命委員會 —— 現在是毛主義的正統政治模式 —— 的抵制。不久，隨著所謂三結合排斥了群眾代表的指責聲鵲起，對革委會的抵制公開化了。幾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權力都落入了軍隊手中，而軍隊又依靠有經驗的黨政幹部維持社會秩序和生產。

5月，在一場所謂反擊「二月逆流」和前兩個月的「黑風」的運動中，這種不滿爆發了，運動很快變成了反對一切權威的瘋狂暴力活動。4月下旬，北京出現了批判周恩來是「紅色資本家階級」領袖的大字報。極左派的攻擊矛頭主要指向國務院及其各部委，特別是外交部。紅衛兵組織多次衝擊了外交部機關，搶奪和毀壞檔案室裏的機密文件，要求外交部長、陳毅元帥下台。從各省市不斷傳來對立的群眾組織在工廠、學校和街道進行武鬥的壞消息。雖然中央文革小組在北京三令五申，禁止武鬥、非法關押、從解放軍軍工廠搶奪武器，但武鬥規模不斷升級擴大。7月，在全國陷於武鬥和混亂的背景下，有人提出要成立毛主義過去號召過的「中國公社」。

為了調解武鬥不休的各派群眾組織，北京派出了政府和軍隊高級領導人到各省去幫助實現「革命大聯合」。當時武漢的形勢十分危急，武漢是中國主要工業中心之一，是全國鐵路系統的樞紐。從7月初開始，這個位於長江沿岸的城市已基本癱瘓，成了兩大派群眾組織角逐的戰場。一派組織是「百萬雄師」(由50萬熟練技術工人、國家工作人員和民兵組成)，它受到省委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將軍的支持，陳再道向來對不許鎮壓群眾組織的禁令置若罔聞。另一派組織是由更激進(也更年輕)的工人和紅衛兵組織結成的聯盟，稱為「武漢工人總部」，號稱有40萬人，該組織在1月曾進行過一次失敗的奪權。它受到了由陳再道將軍供給武器和士兵的百萬雄師的圍攻。[29] 在陳再道拒絕周恩來要求解除圍攻的命令後，中央文革小組的兩位要員王力和謝富治被派到了武漢。北京的特使於7月16日到達武漢，即令陳再道和其他軍隊領導人馬上撤銷對百萬雄師的支持，支持「工人總部」，並令其對自己的錯誤公開進行自我批評。武漢軍區領導人迅速作出反映，7月20日凌

晨，反叛的士兵扣留了謝富治，而百萬雄師則在軍隊的縱容下劫持了王力。謝富治是公安部長，被軟禁起來，而激進的一介書生王力，則被帶到軍區大院，受到毆打。消息傳到首都後，北京也同樣迅速地作出了反應，周恩來試圖調停衝突，但終因座機無法在被軍隊和坦克包圍的武漢機場著陸而未能成功，隨後，三個步兵師和一支空降部隊在武漢地區集結，海軍的砲艦也遊弋於長江口，在強大的軍事力量威懾下，陳再道才不得不屈服。7月25日，王力和謝富治回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群眾大會上受到了英雄般的歡迎。而武漢軍區的領導人則被灰溜溜地揪到北京。然而，誰能料到，幾個月後王力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受到清洗，而一年以後，叛軍之將陳再道卻與人民共和國的最高領導人並肩站在觀禮台上，就好像他一直是毛和文化大革命的忠誠支持者一樣。這是一個具有莫大諷刺意味的轉折，但它也許未超出自2月開始的從文革原則消退的無情政治邏輯。

武漢的反叛喚起了內戰的幽靈，還表明作為國家唯一穩定力量的人民解放軍也不是堅如磐石的統一體。在1967年8月的危急時刻，內戰的可能性似乎一觸即發，極左領導人對軍隊的革命性表示懷疑，造反派組織甚至對軍隊發動襲擊，這樣，導致黨分裂和群眾組織陷入派性武鬥的政治分歧，同樣威脅著軍隊的統一。毛主席在公開場合保持沉默，但毛夫人江青卻不然。她在7月24日的講話中談及武漢事件時，憤怒地告訴紅衛兵要「文攻武衛」。全國的造反派組織立即開始千方百計搜集武器(據說，人民解放軍曾聽命於中央文革小組，把部隊淘汰下來的舊武器給了紅衛兵和工人組織，但轉手給保守組織提供了更新式的武器，[30]導致對立的群眾組織之間發生了更大規模的流血事件)。7月31日，《紅旗》雜誌挑釁地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地掌握槍桿子〉的社論，號召打倒黨內和軍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月9日，林彪不點名地批評了軍隊將領們「壓制群眾」，要求他們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告誡他們要把「革命造反派」當做自己的老師——但他審慎地把武漢事件作為一個可以通過適當的思想整頓糾正的政治錯誤，迴避了叛亂問題。[31]然而，王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激進成員公開發表講話，要求揪出軍內「一小撮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像黨內走資派一樣，篡奪了軍隊的權力。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許多軍隊領導人就受到了批判，其中包括有「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在一段時間裏，朱德被説成是一個「鑽進黨內的大軍閥」。但是，由文化大革命的頭面人物把毛主義的革命樣板、「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的人民解放軍，說成也受到了「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嚴重影響，因此也應像其他組織和機構一樣，開展文化大革命進行清洗，這還是第一次。

在北京，武漢事件和極左領導人的講話，給8月左派的新攻勢火上澆油。極左分子攻擊的矛頭主要指向中央國家機關。成千上萬名示威者佔據天安門廣場達一星期時間，要求把劉少奇交給群眾公開進行審判。憤怒的群眾還包圍了周恩來的辦公地。文化大革命最令人瞠目結舌的一幕，是外交部被造反派實際接管了達兩星期之久。取代陳毅成為事實上的外交部長的是姚登山，他原是駐印尼的外交官，因在4月雅加達使館遭暴徒劫掠時挺身而出的壯舉名噪一時。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國的外交活動基本上陷於停頓，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以林彪1965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觀點為基礎的、新的「革命國際主義綱領」。載著北京發出的新的「革命」指示的電波不斷傳到中國駐外使領館，在北京的外國外交官們常常受到騷擾；英國政府接到了要求釋放在香港被拘留的中國記者的最後通牒；外交方面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短暫時代，隨著8月22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而達到高峰，但也因此而告終結。

中央政府的職能很快得到恢復，但在其他城市和省會城市，局勢日趨嚴重。造反派組織從兵工廠搶奪武器，有的甚至搶奪援越武器武裝自己，在許多地方與解放軍發生武裝衝突。在一些地區，武裝的農民開進城鎮，攻擊政府機關。此時的人民解放軍不但要保護自己，防止「敢於造反」的群眾的攻擊，還要保護依然在當地行使職能的政府機構，不管它是革命委員會還是原來的黨組織。血腥的、常常沒有任何結果的武鬥，威脅著整個國民經濟，造成一片政治混亂。

8月下旬，中國已經徘徊在無政府的邊緣。毛在結束了對各省的「視察」後回到了北京，他認識到，如果繼續以群眾的首創精神為基礎開展文化大革命，勢必要冒全面內戰的危險。他選擇了秩序，實際上也就是選擇了結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熱月

1967年9月5日，軍隊奉命恢復秩序。群眾組織被勒令交出武器，不得干涉軍隊執行任務。人民解放軍被譽為「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是由「我們偉大領袖毛主義親手締造、林副統帥直接指揮的軍隊」。為了使命令的權威性不容置疑，這一指示是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聯合發佈、由毛澤東簽署的，指示發至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所有群眾造反組織以及黨政軍各機關。在軍隊監管下恢復秩序的同時，開始重新建立黨組織，恢復周恩來領導的中央政府的權威。這一進程是緩慢而艱難的，但卻是邏輯的必然，已經落入軍隊的政治權力最終要歸還給逐漸恢復了元氣的共產黨。

這一「正常化」的進程點綴著大量的革命詞藻，它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標語和戰鬥口號，但顯而易見的是群眾不再有造反的權利了。公開宣佈這一決定的是江青，她利用這一機會迅速拋棄自己原來的觀點和左派同志，宣佈今後決不允許再攻擊解放軍和政府，即使是「口誅筆伐」也是反革命行為。現在，攻擊的矛頭對準了那些江青昨天還與之休戚與共的「極左」陰謀家，江青發現，這些人實際上是「一個極其典型的反革命組織」的成員，夏季幾個月的派性武鬥和暴力都被一骨腦地歸罪於這些人的陰謀。[32]

對所謂武鬥的煽動者公開判處死刑，強有力地傳達了恢復秩序的信息。1967年10月1日，許多在早些時候受到批判的軍隊將領，在天安門城樓上引人注目地站在毛的身邊，這是軍隊神聖不可侵犯 —— 至少是針對群眾組織而言 —— 的象徵。兩星期後，中央又下達指示，要求青年重新返回學校，這清楚地表明，紅衛兵也結束了其歷史使命。11月，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激進派喉舌、黨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被暫停刊出，這對中央文革小組不啻是沉重一擊。

按照後來官方的說法，1967年「熱夏」的混亂是一個在北京的小集團領導人策劃的陰謀結果，這些人組織了一個秘密的「五・一六」集團，名稱取自那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著名文件。據說，這些陰謀者在革命運動內部（特別是在沒有經驗的紅衛兵中）製造分裂，挑動武鬥，目的是推翻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奪取國家權力。在陰謀敗露

後，這些人被作為「無政府主義者」、「新托洛斯基分子」和「極左分子」受到清洗。但是，在一個充滿神話的極權社會裏，加上辯證魔法的推波助瀾，「極左分子」又搖身一變，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後來的調查又揭露出他們原來是劉少奇的人，官方對他們的定論是「形左實右」。[33]

陰謀集團的領導人原來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中那些顯赫一時的成員，特別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最緊跟毛澤東的人。最初，這些人只有著名的毛主義理論家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幾年後，陳伯達和林彪也包括了在內。[34]

革命運動通常不可避免地產生極端分子和過激行為，文化大革命更是有過之無不及。1967年中旬，不乏這樣的「文化革命者」，他們不折不扣地實踐毛在幾年月前批判的「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但是，這種虛無主義的趨勢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在一年前紅衛兵成立之時就一直存在著。要理解發生在1967年夏季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存在於革命歷史上的一個共同現象：當更高的領導人從最初的目標妥協、從激進的立場上退卻後，那些繼續堅持這些目標和立場的領導人就會成為「極端主義分子」；實際情況正是如此。毛在2月就已經開始致力使運動向穩健的方向發展，這與其說是大勢所趨，不如說是毛感到運動已難以為繼。所以，那些被貼上「極左分子」標籤的人，或因為沒有主席彎子轉得快，或不願意這樣做。此外，毛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已經獲得了自身激進的生命力，它幾乎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和指揮。

誠然，在與軍隊和其他官僚機構的鬥爭中，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確實操縱了紅衛兵和其他群眾組織，軍隊將領和官僚機構領導人也同樣利用群眾組織，而且一般比中央文革小組做得更成功。毫無疑問，上層的分裂導致群眾組織分裂的派性越來越深。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實際上也確實在分裂了的中央文革小組內組織了一個派別，取名為「五・一六」是為了表示他們堅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標，因為這與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密切相關。1967年5月下旬，人們可以看到那些自稱為「五・一六武裝組織」的好鬥青年在北京大街上遊行，他們無疑得到了北京激進領導人的支持，其中包括毛夫人江青，江青素以對青

年造反派發表煽動性演說而聞名。然而，當時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存在著一個要奪取國家政權的有組織的陰謀，遑論要推翻毛澤東了；更不可信的是說北京少數「極左的」知識分子，在沒有任何形式的組織的情況下，竟然能夠煽動和指揮整個夏季遍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群眾武鬥。中央文革小組的知識分子，除了能為那些願意接受的人提供精神鼓勵外，其影響主要限於北京。比較而言，倒是對「熱夏」的這種解釋更可信一些：這些事件主要是造反派組織的領導人和普通成員，因為普遍擔心文化大革命的諾言和目標被出賣而對局勢做出的自發反應。

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後的秩序，保留從動亂廢墟中搶救出的成果，既需要上層的團結一致，也需要下層的順從，這兩點都不易做到。9月初，在毛的命令下，逮捕了中央文革小組中最激進的成員王力和關鋒。但是，對「極左分子」的清洗(這與文化大革命毫不相容)卻一直持續到最終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領導人(除了毛本人之外)都被趕出政治舞台為止。因為每當毛轉向右的方向、或至少往中間挪一挪，他的絕大多數信徒就會發現自己太左了。在某種意義上說，對極左分子的清洗，最終將清洗到毛本人，雖說這發生在他去世幾年以後了。

在北京日益濃厚的拜占庭式的政治氣氛中，清洗並不單針對極左分子。1968年3月，自從1965年羅瑞卿被撤職後一直任解放軍代理總參謀長的楊成武被捕，總參謀長易人，與楊一同被捕的還有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和空軍政委餘立金。據報道說，林彪是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萬人軍隊幹部會議上親自逮捕楊等人的，雖然其中兩人自長征後一直是他的親密戰友。楊成武一直站在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最前列，因此江青等對他恨之入骨。但毛所以下令逮捕楊，可能並不是為了保衛中央文革小組，而是擔心軍隊介入政治真空的步子太快、權力太大；毛要在最高政治層的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維持一種表面上的平衡。無論是什麼情況，這一事件說明，人民解放軍已不再必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這樣，就為毛和周現在悄然領導的運動鋪平了道路，即重新確立黨和政府的最高權威，領導國家回到穩定和秩序的軌道。[35]

北京領導人內部的政治分歧和勾心鬥角妨礙著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社會穩定，但更大的麻煩是由群眾運動的現狀造成的。毛主義理想的

解決途徑，是讓群眾自覺自願地實現群眾革命組織的「大聯合」，在此基礎上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班子。但是，群眾並沒有真正聯合起來，更缺乏團結的願望。到1968年春季，大多數工人已經厭倦了無休止的衝突和武鬥，對這場運動的目的也越來越難以理解，轉而對政治變得冷漠，許多工人組織不是解散就是陷於癱瘓。有兩位在北京的美國教師，一直敏鋭地觀察著文化大革命，對當時城市群眾的情緒是這樣描述的：

> 一種陰暗的氣氛籠罩著革命的首都。當我們沿著北京偏僻的街道長時間散步、乘著公共汽車四處週遊時，我們默默地觀察著這些通過製造革命而學會革命的人們，毫無疑問，運動帶給他們的興奮已經煙消雲散。他們臉上的冷漠代替了冒險精神，他們依然走在火紅的旗幟和毛主席畫像下，但不過是出於習慣罷了。[36]

那些依然留在群眾革命組織的、在政治十分活躍的造反派，對於他們要結合的黨的幹部和軍隊幹部持不信任態度。和解是非常困難的，在很多情況下，常常是由軍隊強制進行結合，軍隊負責建立從省一級直到工廠、人民公社和街道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但群眾組織中一些好鬥的派別繼續進行武鬥，使武鬥一直持續到1968年夏季。在這些派別中，有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個激進的紅衛兵聯盟，簡稱「省無聯」(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省無聯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激進、但又有自身理論體系的組織，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理想，與毛曾提出但旋即在1960年代中期放棄了的新官僚統治階級的觀點結合在一起。他們擁護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但認為繼續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的「紅色資本家階級」；他們讚揚文化大革命喚醒了群眾，促進了人民民主，但是又批評文革領導人糾纏於攻擊個別人，沒有看到中國政治問題和社會不平等的社會階級根源。他們認為，這個根源就是依然掌握著國家機器並且篡奪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權力的「新官僚資產階級」。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徹底「砸碎」現存的國家機器，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則為基礎的「中國人民公社」。[37]省無聯，或至少其領導人無疑是激進的毛主義分子，但是在1968年，連毛都覺

得他們太激進了。1月，負責公安工作的康生和其他領導人，譴責省無聯是「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斯基分子」，在其後幾個月裏，他們受到軍隊和秘密警察的無情鎮壓。

文化大革命最後一次群眾運動的高潮出現在1968年春夏之際。對軍隊的嚴厲干涉的強烈反抗，與短暫的官方反對「右傾回潮」運動混在一起，使全國許多地方又爆發了新的武鬥。武鬥主要發生在對立的紅衛兵組織之間以及學生和軍人之間。在廣州市，各派組織之間的武鬥情況十分嚴重，以至於軍隊不得不在夜間實行戒嚴，但同時又給保守派組織提供武器。[38]不過，最殘忍的流血事件發生在偏遠省份，其中最嚴重的莫過於廣西。當時任軍區政委、後來是鄧小平盟友的韋國清，下令對激進的紅衛兵格殺勿論，即使按當時流血武鬥的標準來看，也令人震驚不已。[39]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種政治力量都製造過迫害和流血事件，而且愈演愈烈，但最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和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事件，卻是在1968年夏季軍隊鎮壓紅衛兵和其他激進組織時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的最後戰鬥發生在它兩年前開始的地方：北京的大學校園內。在三個月的時間裏，學生造反派把校園變成了武裝營地。這不僅是去年夏季派性鬥爭的重演（但用上了致命的武器），也是對當局自上而下強加的秩序的反抗。最後，毛在7月底召見了學生領袖，通知他們（據說是眼含熱淚）紅衛兵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40]隨即，由解放軍和工人組成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便開進了校園，制止武鬥，約束學生，當然，他們不如毛那麼溫和。在全國各地，那些冥頑不化的紅衛兵組織迅速遭到軍隊鎮壓，新的流血事件不斷發生。這樣，判處紅衛兵運動死刑的，正是當初幫助紅衛兵誕生的力量。許多學生造反派領袖被送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繼續留在學校的學生，則在軍人和工人的監督下努力學習。

被送到農村的還有成千上萬對文化大革命抱有牴觸情緒的黨政幹部（為了平衡政治帳本的需要）。官方期望他們通過幾年的墾荒和艱苦生活，克服身上的官僚主義習氣，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在文化大革命後期，「五七幹校」是中國政治生活中一個顯著的特點，被作為醫治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1968年，把那些太招搖的官僚們從城市打發到農

村，在當時不失為緩和群眾與幹部之間緊張關係、重建一個更純潔的黨的一條途徑。

但是，要徹底恢復黨至高無上的權威，首先必須實現所謂的「大聯合」，這是現階段文化大革命發展的政治結果。是否建立了由中央正式批準的省革命委員會，是衡量是否實現大聯合的標準。省革命委員會又要負責審批地區、縣和市級三結合革命委員會的建立；整個進程比預期的要慢得多。但隨著西南各省和新疆、西藏等地革命委員會的成立，到1968年9月，這一任務終於完成了。一般來說，所有的革命委員會都是在軍隊的主持下成立的。事實上，除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是由老幹部任革委會主任外，其餘各省都是由軍區司令或政委任第一把手。群眾，或更準確地說，那些被挑選出來的群眾代表也參加了革委會，但這些群眾代表很少出自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群眾組織，毋寧說是他們是群眾運動廢墟中的瓦礫。這種革命委員會與1966年曾許諾的「由普遍的選舉制」產生的「永久的群眾常設組織」，更風馬牛不相及。

隨著政治形勢日趨穩定和群眾運動風潮的平息，中央委員會以慣常的秘密方式於10月召開了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全會的主要議程是正式開除劉少奇的黨籍。同月底，正式宣佈了這個決定。在全會公報中，還宣佈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一職（雖然這一職務的任免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不是中共中央）。劉少奇不僅被指控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且還是「內奸、叛徒和工賊」，並且在1922年後就背叛了黨，成為國民黨的特務。這些荒唐的指控不由使人想起斯大林1930年代的大清洗時的做法，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恢復一貫正確的列寧主義政黨的革命形象。這樣一來，劉少奇的背叛不是黨內自然的產物，而是外部力量對黨侵襲的結果。於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不過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是整體上保持著革命純潔性的無產階級政黨與從外部混進革命隊伍的敵人之間的鬥爭。

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但對毛的個人崇拜卻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主席著作發行的數量驚人，毛的畫像、塑像和半身像的尺寸越來越大，數量越來越多；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毛的崇拜的產生和興盛，都還是出於群眾自發的真誠革命熱情；現在，這種

崇拜更像正統教會裏的儀式，例如，有報道說：「在北京在各地，軍宣隊召開各種談心會，在會上，對立組織的成員坐在一起繡毛主席像。」[41] 在家庭裏，通常都擺著毛澤東思想的「忠字檯」，家庭成員圍坐在台旁敬獻忠心；學校的孩子不說「早上好」，而是以齊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開始一天的活動；全國各地到處修建用傳統宗教象徵裝飾起來的紀念館，記載和紀念毛主席的豐功偉績；人們有組織地來到這些被官方媒體稱為「聖地」的地方朝聖。檢驗是不是忠誠於毛的標準，不再是看其是否能按毛澤東思想採取革命行動，而是看其能背誦多少句毛的語錄，掛在街道或家裏的毛主席像大或小。1966年，對毛的崇拜鼓勵人們去破除迷信；1968年，對毛的崇拜產生了迷信。

無論是毛本人還是對毛的個人崇拜，對發動文化大革命都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幾乎被埋藏時，對毛的崇拜卻達到了異乎尋常的程度。曾一度把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民群眾，宣佈自己永遠忠於無所不包的「毛澤東思想」，那麼他們就應該把自己隸屬於產生這種智慧的那個人的權威之下，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建立在群眾運動廢墟上的毛的個人崇拜，對於軍隊領導人來說，卻是求之不得的。長期以來，他們熱衷於用毛澤東思想開展「思想改造」工作，這比用真正的政治運動直接反對現存的國家機器更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軍隊現在是人民共和國居於支配地位的組織。

文化大革命最後一個正式運動，亦即中國共產黨全面復蘇的前奏，是1968–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表面目的，是審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黨政幹部和其他人員，以及在動亂中上升到領導職位的人的政治面貌。清理的標準，已不再完全是毛有關在社會主義社會劃分階級的準則。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要求按照政治行為來確定一個人的階級屬性，現在，他向舊官僚的政治路線作出妥協，後者認為，強調社會階級出身在政治上更簡易可行。因此，清理小組受命不但要審查本人的政治歷史，還是審查他與所謂「黑五類」的社會關係，黑五類是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為了順應當時的政治氣候，知識份子和文革中激進造反派組織的頭目成了運動清查的重點對象。據觀察，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最積極的是保守的政治領導人。[42] 清理運動一般是從幹部再到普通群眾，許多人因為家

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視和迫害。由於階級出身成為進行政治判斷的主要標準，那些與出身不好的人有宿怨的人，趁機挾嫌報復，利用這一機會解決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恩怨。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為「九大」)，文化大革命就此開始走下坡路。「九大」是1956年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第一次沒有邀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的大會。大會由權力和聲望都達到頂峰的林彪作政治報告。報告全面評價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現在又被說成是「鞏固黨」的運動)和國際形勢。報告在當時沒有什麼出乎意料的內容。大會決議強調，必須把學習「毛澤東思想思想」(官方的正式口徑)作為指導正確革命行動的唯一指南，並強調了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特別重申了重建已經恢復了先鋒隊性質的黨的必要性。在大會閉幕後的一次談話中，毛又提到了重建黨的問題，並補充說，在重建過程中，應該繼續由群眾對黨進行「整頓」；他還指出，「文化大革命應每過幾年就進行一次」。[43]

九大新當選的中央委員會名單，反映了軍隊在人民共和國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擴大了的中央委員會裏，共有170名正式中央委員和109名候補中央委員，其中有百份之四十九是軍隊幹部，其餘成員則由黨的老幹部和群眾組織的代表平分秋色。權力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中，除毛和林彪外，還有周恩來、陳伯達和康生。也許出於對重建和整頓後的黨是否忠誠於毛主義仍不放心，或是要體現軍隊的影響，九大的新黨章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44] 4月24日，在大會秘密進行的最後一天，發表了會議公報。公報繼續譴責「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劉少奇，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宣佈九大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一個勝利的大會」。

然而，所謂團結依然是一個有待驗證的問題，而勝利的本質也難以界定。文化大革命以對列寧主義黨的全面進攻為開端，以依據列寧主義正統形式重建黨而告終——雖然打倒了毛的主要對手。1967–1968年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在「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基礎上開展的，但到了1969年，群眾運動分崩離析，運動中被挑選出來的一些殘餘人物被吸收進了舊的官僚機構。文化大革命是血腥的，但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1969年春季，這個問題一定縈繞在許多中國人的心裏。

註釋

1. 除了北京副市長吳晗外，最著名的諷刺作家還有鄧拓和廖沫沙，兩人都是北京市委的高層領導人。他們的文章最初發表在北京的報刊上，包括由鄧拓主編的《前線》雜誌。
2. 毛澤東1962年9月24日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
3. 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海《文匯報》，1965年11月10日。
4. 直到一年後，即1967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才公開發表。
5. 李洪雲(Hong Yung Lee)《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一書中，敘述了這一事件(頁215–216)。李的這部資料豐富、分析深刻的著作，是迄今為止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階級問題最重要的著作。有關黨派的工作組在文革學生運動中的作用，參見該書頁26–63。李最後說：「在沒有特權的社會集團成為黨組織選擇的犧牲品的同時，最有特權的集團，即高幹子女，成為黨組織的主要同盟軍。」
6. 有關紅衛兵派別的社會基礎問題，參見駱思典(Stanley Rosen)，《紅衛兵派別和廣州的文化大革命》(*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2)。書中對這一問題有深刻而詳盡的分析。還可參見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關激進與保守的紅衛兵的階級出身的例證，見駱思典書中頁148–149。
7.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
8. 毛澤東1966年7月21日對中央首長的講話。
9. 有關對劉少奇的政治與政策的詳盡分析，參見羅德明(Lowell Dittmer)：《劉少奇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修訂版(*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8)
10. 〈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載《紅旗》1966年第11期。
11. 關於老舍命運的詳盡描寫，參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1)，頁343–349。
12. 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54–55。

13. 毛澤東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4. 陳伯達，〈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1966年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15. 有關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有許多著作，其中有尼爾・亨特(Neale Hunter)，《上海日記》(*Shanghai Journ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張春橋與上海一月革命》(*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坦納鮑姆(Gerald Tannebaum)，〈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述評〉("The 1967 Shanghai January Revolution Recounted")，《東方地平線》(*Eastern Horizon*)，1963年5–6月號，頁7–25；張旭成(Parris Chang)，《上海與中國政治：文化大革命前後》("Shanghai and Chinese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載克裏斯托弗・豪(Christopher Howe)主編，《上海革命與一個亞洲城市的發展》(*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林白(Lynn T. White III)，《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政體》("Shanghai Polity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約翰・劉易斯(John W. Lewis)主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 劉少奇的經濟和教育政策中另一個精心設計的、但被扭曲的社會理想，是涉及青年工人和學生的「半工半讀」計劃。這一計劃最早是為了縮小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為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提供受教育機會而制定的，但卻變成了另一個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參加這一計劃的學生也起來造反，卻被黨的幹部斥責是「社會渣滓」。參見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132–133。

17. 尼爾・亨特，《上海日記》，頁139–140。

18. 有關上海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組織的詳細情況，參見前揭書，在頁300–301中，列舉了18個最著名的組織。

19. 有關張春橋在1967年1–2月操縱上海革命運動的詳細情況，參見魏昂德，《張春橋與上海一月革命》，頁51–63。

20. 除了耿金章的第二兵團外，反對張春橋的著名群眾組織還有工人第三兵團(它是由工總司裏分裂出來的)，由復員軍人組成的紅旗軍，以及一些激進的學生組織，包括原來與工總司結為密切同盟的最大的學生組織紅

革會。前揭書，頁58–63；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146–150及尼爾·亨特，《上海日記》，頁221–267。

21. 「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導人是工人第二兵團的領導人耿金章，他宣佈得到了48個革命群眾組織的支持，擁有比張春橋更廣泛的群眾基礎。有關耿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參見尼爾·亨特，《上海日記》中第11–3章。
22. 毛澤東與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
23. 同上。
24.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頁690。
25. 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189–191。有關軍隊的保守作用，參見頁168–203、頁234–243。
26. 前揭書，頁183。
27. 關於廣西的例子，見前揭書，頁160。
28. 北京、上海和天津是直轄市，歸中央政府直接領導。
29. 數千人死於6月和7月雙方的武鬥中，工業生產下降了一半。見托馬森·羅賓遜（Thomas W. Robinson），〈武漢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鬥爭與省級造反〉（"The Wuhan Incident: Local Strife and Provincial Rebell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季刊》1971年9月號第47期，頁413–418。
30. 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249。
31. 林彪是在1968年3月24日在北京召開的軍隊幹部大會上發表這一講話的。作為軍隊最高領導人，林彪與中央文革小組的激進知識分子不同，他當然站在維持秩序的立場上。英譯見《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第4036期，頁1–6。
32. 江青講話的英譯本，參見《南華早報》第4069期，頁1–9。
33. 有關官方毛主義的版本，參見韓丁，《中國的轉折點》（*Turning Point in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頁71–78。
34. 本書第20章將談到林彪與陳伯達的垮台。
35. 在後來幾年裏，北京流傳著許多關於楊成武事件自相矛盾、有時含糊不清的解釋，其中包括1972年指責楊捲入了聲名狼藉的「五·一六」組織反對毛澤東的陰謀中。1974年，楊重新出現在政治和軍事舞台上。
36. 戴維·米爾頓（David Milton）和南希·多爾·米爾頓（Nancy Dall Milton），《風不會止息：革命中國的歲月1964–1969》（*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64–69,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6），頁330。

37. 有關省無聯的主要文件，包括其「綱領」和論文〈中國向何處去〉（"Whither China?"），參見梅納特（Klaus Mehnert），《北京與新左派》（*Peking and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省無聯的理論觀點主要來自中央文革小組的「極左分子」戚本禹，1968年2月，在省無聯受到鎮壓後，他也受到清洗。
38. 有關廣州的紅衛兵運動，參見駱恩典，《紅衛兵派別和廣州的文化大革命》。
39. 福爾肯海默（Victor Falkenheim），〈廣西、雲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ary in Kwangsi, Yunnan and Fukien"），《亞洲觀察》（*Asia Survey*），1969年第8期，頁580–585。卡諾（Stanley Karnow），《毛與中國：從革命到革命》（*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Viking, 1972），頁434–438。《遠東經濟評論》（*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68年7月4日，頁13。
40. 「毛主席與首都紅衛兵的談話」的記錄稿當時在中國廣為流傳。關於北京紅衛兵的「天派」與「地派」之間的衝突，參見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有關章節；韓丁，《百日戰爭：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米爾頓，《風不會止息：革命中國的歲月1964–1969》，頁317–329。在回答學生抗議時提出的鎮壓是由「黑手」操縱時，毛承認：「黑手不是別人，就是我。」
41. 米爾頓，《風不會止息：革命中國的歲月1964–1969》，頁335。
42. 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頁291。有關運動的詳細敘述和分析，參見頁287–296。
43. 毛澤東1969年4月28日在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
44. 「中國共產黨黨章」，1969年4月14日通過。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社會結果

1969年，文化大革命似乎在兜了一圈後，又使人民共和國回到了它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起點，政治權力復歸三年前的狀態，重新成為掌握它的黨、軍隊和國家三位一體的官僚機構。黨的重建，依然是以傳統的列寧主義觀點為基礎，黨恢復了其至高無上的地位。誠然，在各級政治權力機構和經濟部門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但是，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洞察力就能看出，在黨的最高權威已經重新確立後，革命委員會不過是執行黨內各項決定的工具而已。

不過，文化大革命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體制，但它確實使中國的社會特徵和政治生活發生了變化，姑且不論它是禍還是福。一個直接的明顯變化是政治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毛主義者手中，更準確地說，基本上掌握在毛個人手中，因為許多出名的毛主義者已在動亂過程中被打倒，還有一些很快也將在政治上失寵。權力現在集中在毛個人的手中，這是一個基本的政治事實，在政治權力對決定社會發展方向起著根本作用的歷史環境中，它會產生重大的社會結果。

毛運用從文化大革命中獲得的權力，在1960年代後期和1970年代初期，推行相對平均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徹底否定了劉少奇在大動亂前的政策和實踐。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風暴雨中產生的毛主義綱領，在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它的目的是抑制社會不平等和精英主義迅速發展的勢頭，不是要從根本上改變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毛主義綱領，並不像當時毛主義理論家們宣揚的那樣，是對現存社會關係的徹底變革。[1]此外，在毛主義政權的最後

歲月裏，從上到下的各級國家機構對政治權力的日益專斷和濫用，使毛主義的社會經濟戰略中許多可能的積極因素遭到破壞。文化大革命產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和現象，其中之一就是被毛後的繼承者們譴責為「封建法西斯主義」的現象。但是，動亂年代造成的變革，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都深深地影響了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生活。不管是動亂幸存的受害者還是參與者，文化大革命的慘痛經驗教訓都影響著他們在毛時代後期的政治觀點和意識，並持續到未來的鄧小平時代。無論人們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和結果，三年的動亂歲月本身就是歷史，它是不可能被簡單地一筆勾銷的。

文化大革命最明顯的後果，也即是人們在評價這場動亂時首先考慮的問題和出發點，是它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當時官方並沒有公佈死於非命的人數，而後毛時代官方公佈的數字也是不完整的，外國觀察家估計的數字，出於不同的政治傾向，結果相差甚遠；即使從官方不完全的統計數字來看，死亡人數也是驚人的。1980年審判「四人幫」時，[2] 官方的起訴書指控「四人幫」及其追隨者要對「十年動亂」(1966–1976) 期間3.4萬名無辜者的死亡負責。起訴書本身表明，死亡人數遠不止於此。起訴書還提供了一些具體事件的詳情，僅在西南的雲南省就有1.4萬人死亡，在人口稀少的內蒙古，有1.6人萬死亡。[3]

比較獨立和可靠的統計數字是李正田提供的。李是1970年代後期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根據李的統計，文化大革命期間廣東省有約四萬人被殺，多數是在1968年軍隊鎮壓紅衛兵運動時遭槍殺。[4] 李對廣東死亡人數的估計與人們普遍接受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國約有四十萬人死亡的數字基本一致，這一數字是由法新社駐北京記者站於1979年首先提供的，這個數字是根據非官方的但「通常是可靠」的中國人士透露的；[5] 實際死亡人數只會更多而不會更少。

除了死亡外，文化大革命的武鬥和鎮壓，給成百上千萬中國人在肉體和心靈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傷痕。許多人在無休止的「批鬥會」上受到毒打和折磨；還有許多人在沒有任何政治意義的純粹暴力的派性戰鬥中受傷；孩子因父母的所謂政治罪行 (或階級出身) 而受到迫害，不得不對父母進行批判；數百萬無辜群眾被非法逮捕入獄或遣送到勞改農場；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被發配到遙遠的東北或新疆去勞動或虛度

歲月，生活被毀，專業荒廢。無論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是什麼樣，它都是一個使人遭受巨大痛苦的時代。

知識分子和幹部遭受迫害的情況在中國國內外都有大量報道。鮮為人知的是，雖然文化大革命所有的派別組織，在似乎無盡頭的暴力與報復的循環中，最終都捲入了暴力和殺戮，但人民解放軍對群眾組織的殘酷殺戮更是駭人聽聞，許多人死於軍隊的槍口之下，特別是在1968年夏季對激進紅衛兵組織和工人組織的鎮壓時，情況更是如此。武裝的有組織的軍事力量，一旦被授權可以使用任何手段鎮壓那些把毛主義「敢於造反」的號召太當回事的群眾組織、扭轉無政府局面，那麼發生這樣的事情不足為奇。此外，軍隊主要是由青年農民組成，他們對城市造反學生本能地就反感。同樣不足為奇的是，無論是毛時代還是毛以後時代的北京領導人，都不願意使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的屠殺事件中起的作用公諸於眾，因為且不論解放軍是否「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但它肯定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的柱石。所以，黨的領導人寧願把罪名推到自己的政治對手頭上，這樣既省事，又保全了人民解放軍的名聲，何況軍隊領導人與黨的領導人又有著密不可分的政治關係。因此，在1980年審判四人幫的起訴書中，將雲南1.4萬名死亡者的悲劇歸罪於誹謗攻擊省委領導的「極左分子」── 絲毫不顧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些死者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當地駐軍打死的紅衛兵激進分子。毛時代後的中國當局，對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江蘇和南京對激進的紅衛兵組織和所謂的「極左分子」進行的血腥鎮壓也緘口默言，許將軍對造反派的鎮壓從1967年初開始，到1970年達到高峰。僅在揪「五・一六」運動的一年時間裏，就有十萬人被打成極左分子，許多人被處死、被捕或被送到勞改農場。[6]

北京對事實的歪曲，固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在政治上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一些外國學者全盤接受這種虛構的事實，卻實在令人困惑不解。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受到的摧殘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但軍隊的血腥鎮壓卻少有人提及；至少在比較流行的作品中，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暴行，都被籠統地歸罪於「極端的毛分子」。然而，極端的毛分子，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也是毛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 而且人數更多。

但是，所有捲入文化大革命的組織和機構，對這個時期產生的大量非人道的野蠻行徑都應負其應有的責任。1966–1969年時期的後果之一，就是留下了一份痛苦、懷疑、仇恨和復仇心理的苦澀遺產。

農民及城市與農村的關係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典型的城市運動，它角逐的主要政治戰場是在城市，城市的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是文革的主要革命角色；但是，文化大革命卻給農村帶來了某些社會利益。

在城市陷入一片動亂的時候，大多數農村地區在政治上依然比較平靜，只有城市郊區的一些村莊有時會捲入文化大革命的鬥爭中，舊的黨組織和和新的造反組織都曾試圖招募農民進城參加鬥爭。1966–1968年，偶爾有農民自己起來造反的，也多是出於「經濟主義」的目的，他們進城遊行，要求擴大自留地和集貿市場，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始終沒有捲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政治鬥爭中。這正是北京領導人所希望的局面，他們的政策就是要使農村遠離城市的戰鬥，禁止紅衛兵到農村串聯。雖然禁令常被紅衛兵當成耳邊風，但紅衛兵發現，農民對他們的革命呼籲幾乎無動於衷。誠然，北京有時也發佈指示，號召農民起來開展「階級鬥爭」，與「四舊」作鬥爭，但指示的重點還是維護農業生產和提高產量。北京領導人可以容忍工廠的暫時停工，但不能允許農村陷入混亂，因為即使是在風調雨順的年景，中國的農業收成也是不穩定的。1967年夏季，人民解放軍戰士被派到農村「支援農業」，幫助「貧下中農」，他們發現許多村民對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知道一些情況的農民對城市開展鬥爭也漠不關心。無論怎樣，士兵們的任務與其說是促進農村的階級鬥爭，不如說是保證階級鬥爭不會妨礙農業生產。

只是在1968–1969年當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後，運動才擴展到農村。農村也存在著政治和社會衝突，但與城市的衝突相比，情況並不嚴重；在農村，地區與地區、村與村之間情況差別很大。一些村子也學著城市和附近中學的樣子，分裂成幾個政治派別，但這種分裂主要不是因為政治分歧，更多地出於宗族關係或鄰間糾紛。[7] 許多

地方出現了緊張的階級對抗，但這通常是「貧下中農協會」對原來的地主和富農仇恨的再發洩，它是建立在對早已不復存在的階級對立的回憶的基礎上。這常常導致對出身地主富農家庭的農民的迫害，但並非像官方媒體宣傳的那樣，是什麼「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正如理查德・克勞斯(Richard Kraus)指出的，農村中存在著一種把原來的階級成分變成新的等級範疇的強烈趨勢。[8] 在許多村莊裏，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鬥爭」，主要表現為由解放軍組織的批判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思想運動和有組織地學習毛思想。農村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普遍特點是對毛的個人崇拜盛行，到處都建有毛思想的「忠字堂」，農民全家圍坐在家裏的「忠字檯」旁，向毛主席獻忠心，其形式與傳統的祖先崇拜十分相似。另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是在「階級鬥爭」的幌子下，農村的政治生活演變成為爭奪基層權力的殘酷鬥爭，文化大革命的口號成為清算個人和家族宿怨的借口。

然而，文化大革命確實使有關農村的社會經濟政策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這不是農村政治鬥爭和社會鬥爭的結果，而是毛主義控制下的黨和國家政權自上而下頒佈的命令。因此，毛在1960年代初流產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倡的農村政策，取代了受到批判的劉少奇的「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農村政策。雖然貧下中農對村子和公社的社會經濟事務有了更多的發言權，但總的來說，1970年代，上級黨組織和國家政府機構對農村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控制比1960年代加強了。不管怎樣，文化大革命肯定沒有使農民參與控制那些一直統治著他們生活的政權機構。

毛的農村政策主要是針對和遏制1960年代初期迅速發展的「農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原來佔農村可耕地15%甚至更多的自留地，現在被限制在5%之內，雖然沒有取消自由市場，但實行了嚴格的控制。農民在強大的政治和思想壓力下，不得不把自留地裏生產的「副產品」，以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商業機構。為了消滅在集體勞動的工分分配問題上幹部的普遍腐敗行為——這是文化大革命前農村社會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之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工分制依然保持不變，它以(至少在理論上)非平均主義的社會主義「按勞動分配」原則為基礎，而不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

在農村大多數地區的實踐中，否定了平均主義的做法，開展了一場「農業學大寨」運動。大寨大隊是毛主義集體主義和自力更生精神的榜樣，位於山西一個偏遠貧窮的地區，據説，一些無私的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通過艱辛的努力奮鬥，建設了一個繁榮的農村社會主義共同體。他們創造了一套新的集體勞動和分配制度，稱為「自報工分，群眾評議」，即工分的標準由政治覺悟、誠實、為集體利益從事勞動的獻身精神等因素決定。據報道，在毛的教導鼓舞下，他們通過全面調動過去沒活可幹的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建成了一個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社區，以生產大隊而不是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4年，毛把大寨經驗作為典型進行推廣，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寨大隊成了全國學習的榜樣。大寨大隊的領導人陳永貴成了聞名全國的政治人物，1969年，他當上了中央委員，1973年，又進入了中央政治局。但不論大寨取得什麼樣的社會進步和經濟成就，它不過是一個浪漫的榜樣，一個斯巴達主義和平均主義原則的例證，是毛認為農村公社應該仿照的典型，但並非就是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和可能的發展方向。[9]

文化大革命時期，新農村政策中最有社會意義和在經濟上的成功之處，也許是重新啟動了在農村進行工業建設的計劃。建立社辦工業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宣佈要實現的目標之一。1966年5月7日，毛在給林彪的一封信中寫道：「農民以農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10] 這不是一個新目標。早在大躍進時期，農村就曾建了許多小工廠，但是其中大多數在隨後的經濟危機中不是倒閉就是難以為繼，因此發展農村工業的計劃不得不中止。文化大革命後期，恢復了發展農村工業的政策。此後，農村工業作為毛時代發展戰略的一個主要創新而蓬勃發展，為鄧小平時代的鄉鎮企業全面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毛發展農村工業有雙重目的：在社會效益上，它是為了縮小「三大差別」中的工農差別和城鄉差別；在經濟上，充分利用當地農村的人力和物質資源，使其不致浪費，從而為農村發展和整個國民經濟作出貢獻。

最初建立的農村工業主要為了直接支援農業生產，重點是發展生產和修理農機具、生產化肥及加工當地的農產品的小工廠。農村還建立了許多推廣良種、普及農業知識的技術中心。到毛時代結束的1976

年，中國的化肥有一半產自地方農村工廠，全國迅速增加的農機產量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農村工廠製造的。此外，許多社辦工廠還生產水泥、生鐵、鋼材、建築材料、電力、化工產品、醫藥產品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商品。到1970年代中期，一個縣擁有上百家生產數百種不同產品的小工廠已不足為奇。[11]

農村工業發展計劃，是毛為實現農村地方經濟自給自足、縮小城鄉差別的宏偉戰略中的一個部分（也許是最成功的部分）。到毛時代結束時，農村工業發展已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農村中約有二千萬農民成了農村工廠的全日制或季節性工人，減輕了農村長期存在的半失業問題；那些辦得比較成功的工廠為農業發展和擴大農村工業的再生產提供了資金。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農村工業為使人民公社成為重要的社會經濟組織作出了貢獻，一些比較先進的公社成為向周圍農村傳播科學技術知識的小型科技中心。儘管農村工業的發展對消除城鄉差別起的作用並不明顯——城鄉差別的程度在文化大革命前及其後沒有變化，但總的來說，它正是按照毛在1961年提出的方針進行的：

> 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點，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12]

文化大革命還導致中國人生活中兩個至關重要的領域的重心從城市轉移到農村：醫療衛生和教育。在1960年代初期，在大躍進災難後的緊縮政策下，農村中的28萬個醫療診所，有20萬個被迫關閉，而城市裏的醫療機構卻翻了一番。[13] 1965年，毛批評說，醫生只是為了「城裏的利益」培養的，可是中國的大多數人口生活在農村。為了改變這種情況，毛提出了一些激進的措施：

> 醫學教育用不著什麼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學三年就夠了。主要在實踐中學習，提高。這樣的醫生放到農村，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騙人的醫生與巫婆好，而且農村也養得起。

毛還提出，要把重點放到對疾病的預防上，放到治療「常見病、多發病和傳染病」上，而不是放在他稱為所謂科學寶塔尖上的「高、深、難」病症上。他的結論是：「城市裏的醫生應該留下一些畢業一兩年本事不大的醫生，其餘的都到農村去……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14]

1969年後大體上就是實行這樣的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時期結束後，醫學院恢復了辦學，正式的學制也從六年減到三年，以培養適應這種直接需要的醫生，課程也作了相應修改，解決毛說的「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1971年，新推薦入學的包括大批來自農村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是年輕的「赤腳醫生」，他們雖然缺乏正規教育，但具有實踐知識和經驗。整個國民醫療衛生系統都下放到了地方，城市醫院和醫學院在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了診所和培訓機構，配備了相應的醫生。城市醫療中心和人民解放軍(擁有自己的醫學院和醫療系統)都派出大批流動醫療隊奔赴農村，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被要求在流動醫療隊或公社醫院定期輪換工作一段時間。1969年，培訓赤腳醫生的工作有組織地全面展開並且越來越系統化。到1970年代中期，有一百多萬這樣的醫療輔助人員(是1965年的四倍)活躍在農村醫療領域裏，為農民提供衛生保健教育，提供計劃生育的知識和用具，治療常見病，護送疑難病人到公社或城市醫院。雖然農村新的醫療衛生系統的經費，主要來自公社、大隊和生產小隊，但中央政府的支持是至關重要的。下放到農村的專業醫生由國家發放工資，流動醫療隊的費用也由國家承擔。政府還為培訓赤腳醫生提供經費。總之，雖然農村的醫療條件和水平還比城市低，但上述這些措施畢竟是一場從城市到農村的重要資源轉移。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教育制度的徹底改革，與醫療體制改革相似，使農村受益。在1966年以前，教育體制忽視農村的現象十分嚴重，城鄉教育的不平等愈演愈烈。教育資源集中在城市地區，這不僅

表現在大學和中學主要設在城市，而且城市小學的數量和質量都遠遠超過農村。入學考試、升學制度、嚴格的入學年齡限制以及必須繳納學費等因素，極大地限制了城市貧困家庭出身的青年受教育的機會，更不用說農村青年了。教育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城市培養專業人才，為城市精英特權的永久化服務。這當然是有意為之。1960年代初期，農村學校和業餘學校數量鋭減，與此同時，城市為黨政官員子女專設的預備學校卻增加了。[15] 此外，整個教育體制代價高但效率低。大學為已經人滿為患的政府機構和城市工業官僚部門源源不斷地輸送大量的專業畢業生，但卻很少培養農村急需的技術人才。

1966年前，這種教育體制就受到強烈的批評。最嚴厲的批評來自毛澤東。1964年，他說：「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他提倡縮短學制，提倡新的教育體制要建立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礎上，取代與實際生活脱節的書本教育制度。他強調自己長期堅持的一個信念，即最佳和最有創造性的教育形式，是在實踐中邊幹邊學。為了支持這個觀點，他不惜把孔夫子變成一個週遊列國的貧農，甚至是一個「群眾路線」的先驅者：

> 孔夫子出身貧農，放過羊，也沒上過中學或大學，他當過吹鼓手，什麼事都幹過……還作過會計，會彈琴、射箭和駕車子。他教出七十二賢人，諸如顏回和曾子等，還有弟子三千。他年輕時來自群眾，了解群眾的疾苦。[16]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使黨的各級組織陷於癱瘓後，這場意義深遠的教育改革才得以開始進行。文化大革命時，學校都停了課，在復課後，學校基本上就按照毛的新教育政策進行改革。新政策最積極的特徵是擴大和發展農村地區的教育。國家減少了對相對富裕的城市地區的教育投入，把更多的資金用於發展貧困地區、主要是農村的教育。雖然強調各地要堅持自力更生的原則，但在決定如何及在哪裏發展教育方面，國家的財政支持和政策依然是決定性的因素。新教育政策優先發展初級教育，由於初級教育在城市已經普及，所以，目標是在偏遠地區普及五年小學教育。在現在眾口一詞譴責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 裏，農村小學和初中入學人數迅速增長。小學生人數

在十年裏從1.16億人增加到1.5億人，初中(包括農村小學裏附加的兩年制初中班)人數從1500萬人增加到5800萬人。[17]

在發展農村學校的同時，也曾試圖解散國家教育官僚機構，下放學校管理權。文化大革命前，農村學校由縣政府(國家官僚機構)有關教育部門根據國家統一政策進行管理，新教育政策則要求把學校交由所在地管理。小學一般由生產大隊管理，中學由公社管理。這樣做的目的是讓農民在對教師和教材的選擇、推薦學生上中學或大學、根據當地的特殊需要改革課程設置等總問題上有更大的發言權。[18] 此外，學費、入學考試和對入學學生的年齡限制都取消了。許多大躍進期間的業餘學校和半工半讀學校得到恢復。中學和大學的入學標準與課程的改革，給農村青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上大學不再經過考試，代之而起的是推薦制度，由生產單位根據政治標準和文化程度進行挑選和推薦，優先貧下中農、工人、士兵和基層幹部。青年必須在工廠或農村進行數年的生產勞動鍛煉後，才有資格被推薦成為大學生，畢業分配實行「哪來哪去」的原則。

1970年代初實行的新農村教育計劃，與同期死氣沉沉的城市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形成顯明對比。不過，雖然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改革總的來說使農民受益，但動亂並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經濟利益。與人們對當時情況的推測相反，文化大革命沒有對農業生產造成多大破壞。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代初期的農業生產，以每年平均約3%的增長速度平穩發展，[19] 但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增加，農民的生活水平和人均糧食消費水平也沒有提高。與文化大革命前一樣，農村在經濟上依然受到城市的剝削，是國家為城市工業投資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國家通過稅收、強制性的徵購和價格政策，把本來可以用於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的農業剩餘產品收進國庫。儘管大批農民從農村工業化計劃、教育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受益，但是，文化大革命沒有使城鄉關係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工人階級與工業中的勞動分工

文化大革命給農民帶來了一定的社會利益(而不是經濟利益)，但

在1966–1968年的革命運動中充當主角的城市工人卻一無所獲。當然，毛主義廣泛宣稱，文化大革命使工業中的勞動分工領域發生了根本變革，這種變革，用一位評論家的話說，就是「逐步消除了生產與管理工作、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20] 沒有什麼證據支持這種自以為是的看法。實際上，所有的事實都説明，1969年後工廠的生產關係與1966年以前的情況沒有什麼兩樣。

誠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工人組織對整個工業組織體制進行了全面的攻擊，他們的行動有時還得到了北京激進領導人的鼓勵。工人們提出了各種政治要求，他們要求由生產者直接掌握生產資料；廢除工資差別和獎金，建立一個更平均的分配制度；廢除臨時工和合同工制；工人有在自己選擇的、而不是由國家分配的工廠和企業工作的自由權利；廢除黨對工會的控制等。

文化大革命後期實行的新工業政策，多少吸收了一些上述要求。[21] 隨著1966–1968年當地黨組織的癱瘓而不復存在的工會組織，與勞動部一起被正式宣佈取消。在精神和政治鼓勵取代物質刺激這一總政策下，取消了個人獎金和計件工資。由於減少了管理人員，廢除了管理勞動組織和工廠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萬條規章制度」是過去多年的產物，助長了劉少奇政權的官僚實踐)，企業中的官僚習氣和等級制情況有所改觀。為了縮小工人與管理人員、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在地位和作用方面的差別，恢復了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和工人參加管理的革命傳統。管理幹部和技術人員被要求拿出不少於三分之一的時間下車間勞動，經選舉產生的工人管理小組可以參加工廠的管理與決策。管理企業的主要責任由工廠革命委員會(由工人代表、幹部和軍人組成的三結合為基礎) 承擔。革命委員會取代了過去的一長制管理體制。為了下放企業管理權，原來由中央各部管理的許多企業被移交給省裏有關部門管理。

在1970年代初期，上述這類革新即使能夠勉強實行，也已面目全非了。與此同時，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一些更根本的要求，要麼就被束之高閣，要麼就被批判成「極左」。事實上，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工業體制的最明顯特徵不是改變了什麼，而是沒有改變什麼。對勞動力流動的嚴格控制依然如故——比蘇聯對勞動力的控制還要嚴格，官方

辯解說，這樣做是為了控制農民流入城市。自由選擇職業成了劉少奇的異端邪說，劉還被指責企圖採用資本主義的自由勞動力市場。[22] 剝削性的臨時工與合同工 (佔非農業勞動力的一半左右) 制度依然保留下來，全然不顧這樣一個事實：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制度被作為典型的資本主義剝削形式而受到廣泛批判，它在1960年代初期的發展，被作為劉少奇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證。基本的工資制度也維持不變，只是取消了各種形式的個人獎金 (其中一些早在1966年前就已經取消，另一些變換了形式) 。人們在各種政治思想運動中不斷批判金錢刺激，宣揚為人民利益無私勞動和集體勞動的精神美德。在國家企業中，職工的工資差別與文化大革命前大體相當。工廠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每月工資數額從30–108元不等 (不包括學徒工、臨時工與合同工，他們的工資在最低線以下) ，技術人員實行十五級工資制，管理幹部和其他幹部是三十級工資制。例如，1972年，在北京的一個模範工廠裏，工人工資的範圍在30–102元之間，平均工資為54元，而技術人員、工程師和幹部的平均工資約為150元。[23] 雖然激進的毛主義口號依然隨處可聞，但建立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的要求，被當成「極左」受到批判，工人和幹部中的等級制度沒有受到觸動。

此外，1970年代初期，在經歷文革破壞之後，重新恢復了工廠的勞動紀律 (主要針對政治上十分積極的青年工人) ，逐步恢復了此前被廢除的許多規章制度，越來越強調專家治廠和技術標準；[24] 對工廠規章制度的批判現在成了「極左路線」的表現，即使工會的解散也被證明是暫時的。1973年，成立了省一級官方工會組織，代替或吸收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工人代表大會」，繼之又恢復了全國總工會。黨領導的新工會組織的作用與文化大革命前沒有明顯差別。

然而，評價工業體制變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工廠革命委員會的性質和作用。畢竟，革命委員會被說成是文化大革命在組織上的主要成就，是工人參與經濟和政治決策的主要機構；這裏，一個明顯的和重要的事實是，工廠革命委員會是受黨領導的。自從1969年重建黨後，隨著省、市級黨委的成立，工廠中也很快恢復了黨委。廠革命委員會隸屬於廠黨委領導，廠黨委又對上一級黨組織負責，這在1969年就已很明確，以後更是如此。廠革命委員會的多數成員也是黨委成員，黨

委書記當然地是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廠長的角色。歸根到底，經濟和管理決策權在黨委，革命委員會不過是執行這些決策的工具。

在中國，無論是毛時代還是其後，集體工作並不是集體負責的。不管1970年代中國的工廠表面有什麼變化，生產關係的基本結構與過去十年沒有不同。斷言文化大革命使工人階級的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開始了勞動分工方面革命性的轉變，是經不住嚴格推敲的。至於在1966–1968年組成「革命群眾」大軍的城市工人，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在其後歲月裏依然如故，城市工人階級不可能對上述結果有什麼異議。文化大革命固然暴露了中國社會各種經濟和政治矛盾，但同時揭示了所謂無產階級(即終身制的國家正式工人)的大多數成員是擁護共產黨組織的，他們與現存工業體制有著保守的利害關係。

知識分子、學生與文化

中國社會沒有任何一個社會集團或機構能夠不受傷害地逃脫文化大革命，但是受害最深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自己是中國1915–1919年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思想繼承人，那場現代啟蒙運動打破了數千年封建文化和政治專制主義的傳統枷鎖——導致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誕生。半個世紀後，勝利了的共產主義運動領袖——他本人也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產物——卻發動了一場使知識分子成為主要受害者的新的文化革命。第二次文化革命是第一次的一幅諷刺畫，政治迫害、思想禁錮和文化蒙昧主義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標誌，它在毛稱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在這場極端強調「階級」和「階級立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中，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是懷疑的對象，他們的知識和他們相對富裕的物質生活，使他們遠離工人和農民。在一個已不存在資產階級的社會中，開展一場直接反對「資產階級」的運動，知識分子就是最醒目的「資產階級」。在這種場合下，他們成為機會主義者最方便的靶子，由於沒有抵抗能力，因而成為捲入文化大革命各派——不管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的政治代罪羔羊。他們既受到紅衛兵的捕獵，也受到那些力

圖把政治攻擊矛頭從自己身上轉移開的黨政官員的攻擊。除了黨政幹部外，知識份子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受害者，他們的家經常被抄，書被焚燒，手稿被銷毀。他們的所謂罪行株連了子女和家庭，而本人則常常在「學習與批判」會上遭受肉體和精神折磨。他們比黨政官員更為弱勢，因為沒有組織來保護他們。雖然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共產黨員——事實上，他們在黨內的人數比例比其他任何社會階層都高，但他們不掌握政治權力。沒有自衛能力的知識分子，受到的迫害最甚，受迫害時間也最長。1967年下半年，當毛決定重建黨以後，對黨政幹部的攻擊就基本停止了，1969年後，許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幹部官復原職。但是，在毛時代後期，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卻一直沒有間斷，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罷了。大批知識分子成為政治鬥爭和個人宿怨的犧牲品，許多人被捕入獄或被送到新疆或東北偏遠地區的勞改農場。數百萬知識分子被下放到農村參加體力勞動，虛度歲月，還經常受到當地幹部和農民的侮辱。不過奇怪的是，他們的關係還留在原來的工作單位，定期領取工資。留在城市或被經過勞動和「牛棚」改造後已經「無產階級化」因而被允許返城的知識分子，幾乎無事可做。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已經停止，科學技術研究所由於政治上的顧慮及缺乏研究設備和物質條件而陷於癱瘓。1975年，鄧小平在談到科學技術停滯不前的狀況時說，「科學院系統有15萬名科技幹部，沒有人敢進實驗室，都害怕被扣上『白專』的帽子。年輕人怕，老年人也怕。現在，研究人員不讀書。」[25]

高等教育的情況也不盡人意。大學幾年沒有招生，直到1970–1972年，才開始陸續招收一些學生，學校工作通常是在軍人的政治監督下進行的。到1975年中期，大學在校人數只是十年前的三分之一。校園裏死氣沉沉，缺乏學術氣氛，甚至也沒有真正的政治生活氣氛，情緒低落的（常常不具備必要的文化基礎）學生和教師只是無精打采地履行要求的政治與學術儀式。官方報道說，大學正在進行一場長期的實驗與改革，對如何辦學進行熱烈的討論和探討。但實際上，官方沒有採取什麼措施改變這種沉悶的狀態。毛主義的文化革命者摧毀了舊的精英教育體制，但除了農村的小學教育外，文化大革命沒有產生一套可以取而代之的有活力的教育體制。

文化和教育領域似乎進入了一個黑暗的蒙昧時代。作家不能寫作，或者寫出來後無法出版，除了毛的著作和有關當時意識形態問題的政論文章外，出版界一片荒蕪，藝術家不能繪畫，演員和音樂家不能演出，只有江青的「革命」樣板戲可以上演，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文化」成果；幾乎沒有什麼新電影問世，1966年前拍攝的影片被禁止播映；收藏有傳統或現代藝術作品的博物館基本上都不向公眾開放；書店裏空空蕩蕩，古今中外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被查禁；幾乎所有的學術刊物、科學刊物和文學刊物都在1966年停刊，直到毛時代的後幾年才允許少數刊物複刊；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成了對少數幾本官方指定的經典教科書或片斷的詮釋；就連圖書館的使用也受到限制。對知識分子來說，1966–1976年真正是「荒廢的十年」。對整個國家、特別是城市來說，除了艱辛暗淡的生活外，人才和經驗的巨大浪費令人痛惜。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長期以來毛主義具有強烈的反知識、反城市的傾向，這種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前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1964年，當毛宣佈「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分期分批下鄉」時，很少有人料到這一命令真的會付諸實施。

城市學生的遭遇與知識分子相似——從長遠的觀點來看，甚至更糟。1967年，當北京的毛主義領導人決定結束城市的文化大革命並解散紅衛兵時，毛澤東敦促城市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在毛時代的後幾年中，開展了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26]運動以縮小城鄉差別的革命理想為名，但實際上服務於當時最緊迫的政治和經濟目的，把政治上桀驁不馴的紅衛兵送出城市，同時，也給城市減少數百萬的失業者。繼被遣散的紅衛兵下鄉後，普通的中學畢業生也開始到農村插隊，1967–1976年，共有約一千七百萬城市青年自願或不自願地到農村落戶。最初還可能為革命理想主義而下鄉的知識青年，很快就產生了被出賣的感覺，在政治上變得玩世不恭。由於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和在城市就業的機會，被迫忍受農村超乎尋常的艱辛生活，知識青年把自己看作是「失落的一代」；這就是那些最早響應毛「敢於造反」號召的大多數青年人的命運。

政治權力與社會各階級：國家對社會的統治

文化大革命的重大失敗，不在於它沒有實現根本的社會變革。在缺乏必要的經濟條件的情況下，任何企圖激進地改變現存勞動分工、廢除階級差別的做法都注定要造成經濟混亂和社會動蕩。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敗在於，它沒有產生普遍的民主政治體制，這種體制可以使勞動群眾掌握生產資料，在發展現代生產力的同時，使勞動群眾自身獲得社會經濟上的解放，從而使整個社會獲得解放。

文化大革命在開始時，也曾許諾要進行根本的政治變革。1966年8月的「十六條」號召建立「長期的常設群眾組織」作為各級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權力機構」，還號召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與此同時，毛本人預言，中國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新的國家形式」，它將按照馬克思的巴黎公社模式的原則組織起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卻是從這些社會主義理想後退的歷史，這種退卻從1967年2月毛否定上海公社、同意建立軍管的革命委員會開始，以1969年黨的權威全面恢復、革命委員會很快變成執行黨的政策的官僚機構而告終。無論毛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的動機是什麼，到最後他只能滿足於重建一個經過了思想整頓的黨、一個經過了改造的國家官僚機構。

毛主義認為，政治上層建築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用這一觀點來衡量，文化大革命未能建立新的政治體制的失敗就十分明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基於這樣一種判斷（現在看來，這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判斷）：現存的黨和國家機構正在使中國倒退回資本主義。這一判斷又來自毛的兩個主要觀點（雖然有時並沒有這樣明確）——第一，黨的官僚機構的高層官員利用他們在國家機構中的權力和聲望，謀取物質特權，剝削全社會；實際上，他們正在變成新生的資產階級，只不過他們不是通過財產所有權、而是憑借政治權力獲得特權的。第二，根深蒂固的官僚階級特權地位是來自他們統治的現存社會體制，保護這種體制，是其既得利益之所在，所以，他們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願意容忍（甚至是促進）整個社會經濟關係和意識形態領域內的資本主義形式。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結果，恰恰正是那種被認為會產生修正主義趨勢、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威脅的政治結構的復辟。誠然，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這種政治結構經過了改造，但這與過去對官僚機構的整頓和控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按照毛「精兵簡政」的思想，據說至少在中央一級減少了政府部門和幹部的數量。1970年，周恩來宣佈，中央政府部門的90個機構已經大幅度精簡合併為26個，政府工作人員從6萬名減少到1萬名。不過，周恩來同時又報告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邊站的幹部，已有95%的人恢復了職務，[27] 在今後幾年還會有更多的幹部官復原職。舊官僚機器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後，基本上顯然沒有受到觸動，只不過在人員組成和組織形式上有所變化。[28] 官僚機構不但復活，而且是凱旋復活。文化大革命的許多積極分子需要得到獎賞，最普遍的獎賞就是封官。在黨員隊伍和官僚機構的花名冊上，又增加了數百萬個人名。文化大革命具有諷刺意味的結果之一，就是一場表面是反對官僚和官僚特權的運動，卻擴大了官僚的隊伍，尤其是在政治階梯的中下層。

當然，也不乏大張旗鼓地反對官僚主義作風和資產階級習氣、恢復黨的優良傳統的各式運動。不過，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建立在二十四級幹部級別制基礎上的幹部制度還是依然如故。幹部工資遠遠高於工人和農民的工資和收入。佔據領導職位的人依然享有許多傳統的特權，官方沒有為消滅這些特權作過任何積極的努力，例如，公款吃喝，履行職責時的種種開銷，高級幹部配備的住房、服務員及專人駕駛的小汽車、在特殊商店裏購物以及在官方療養地方度假等。這種遮遮掩掩但又牢固地建立的官僚特權和利益體系，與官僚機構一起，在經過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平均主義觀念的衝擊後又東山再起，只不過那些享受這些物質特權的領導人不再像過去那樣公開地進行炫耀罷了。

毛主義克服「官僚主義」的藥方是要求幹部和所有「腦力勞動者」定期參加生產勞動，以使他們「不脫離群眾」。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五七幹校」，為這種實踐提供了一個制度化了的方式。在五七幹校成立的第一年（第一個五七幹校成立於1968年5月7日），約有三十萬幹部下放到幹校勞動。在隨後幾年，數百萬幹部又體驗了這個「思想革命化」的過

程。在半年到兩年的時間裏，幹部們每天用半天時間參加自給自足的生產勞動，其餘時間就用來集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據說幹部通過「向農民學習」和「與群眾打成一片」，克服了身上存在的官僚主義習氣。然而，不管把幹部從辦公室送到田地裏去勞動的做法如何值得稱道，尤其是在一個傳統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存在著鴻溝的國家裏，但這種制度充其量只對醫治官僚作風有效，而對改造官僚體制無濟於事。如果下放的目的是為了教育幹部要「與群眾打成一片」，那麼奇怪的是，五七幹校獨立建校，與毗鄰的農民公社毫無關係，無論如何，農民還是農民，幹部就是幹部。幹部在農村下放勞動和學習期間(據宣傳，幹部們爭先恐後地自願報名，把下放當成一件光榮的事)，他們的職務繼續保留，按職務級別領取相應的工資。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鍛煉改造後，他們通常都返回原工作崗位或同級別的其它崗位。據說幹部們在經過了幹校生活後，在處理與群眾的關係時，舉止和態度都有了良好的變化，但既然如此，基本的政治結構和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改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改革可能使官僚精英在某些方面有所收斂，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關係仍然是國家(官僚是其代表)對社會的絕對統治。

政治權力統治社會權力，當然不是一個新現象，它是整個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特徵，實際上也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的特徵。但在歷史上，這種現象很少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文革後期表現得這樣突出，也很少這樣迫切和明顯地需要尋找解決辦法。按照馬克思的用語(毛主義者及其繼承人不喜歡這個詞)，這是一個「社會權力異化」的歷史問題，即作為社會產物的國家，凌駕於社會之上，與社會分離，進而統治社會生活。文化大革命非但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反而使其永久化了。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使這一現象更加嚴重。在毛主義的最後歲月裏，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嚴重派性和既存政治程序的崩潰，為國家權力越來越專制和獨裁創造了歷史條件。

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產生常設的群眾自治機構，而且也未能解決更為迫切的政治繼承問題。文化大革命的目標之一是「培養革命接班人」，但是，當1968年夏季毛把紅衛兵領袖召集到「無產階級司令部」，

正式通知他們的造反使命已經結束時(然後，把大多數紅衛兵送到了農村)，實際上就是承認年輕一代沒有能夠經受住政治考驗。文化大革命同樣沒有給如何解決高層的權力繼承問題——就是誰將或誰有可能繼承毛的問題——提供答案。1968年後，群眾在政治上沉寂了，但政治局的情況正好相反，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未解決的問題，在這裏演變成激烈的政治鬥爭，把所有的參與者都捲入充滿政治陷阱的拜占庭世界之中。

註釋

1. 貝特爾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在他所著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一書中，認為文化大革命確實使中國社會發生了根本變革，並作了詳細論證。
2. 本書第22章將談到有關對「四人幫」審判、在1976年毛去世後不久即逮捕了毛的信徒等情況。
3. 《北京周刊》1980年第48期，頁9–28。
4. 齊浩(Qi Hao)主編，《關於民主與法制》(Hong Kong: Bibliothèque Asiastique, 1976)，頁3及167；子川，〈李一哲與我〉，《北斗》1977年第4期；材料引自駱恩典在1982年4月由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召開的會議上提交的論文〈廣州的民主運動〉("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Guangzhou")，頁10–12。有關解放軍在廣東省和海南地區對紅衛兵的屠殺情況，參見駱恩典，〈文化大革命時廣州的民主運動〉("Guangzhou's Democratic Movement in Cultural Revolution Perspective")，《中國季刊》1985年3月第101期，頁5。
5. 法新社，北京，1979年2月3日。還可參見加塞德(Roger Garside)，《復活：毛後的中國》(*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entor, 1982)，頁45–47。
6. 麥考密克(Barrett McCormick)在其博士論文〈後毛時代中國的政治改革：列寧主義國家的民主進程〉("Political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Democracy and Due Process in a Leninist State",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85)中，對許世友在南京和

江蘇進行的鎮壓作了評述，頁61–63。許將軍於1970年代初調到廣州軍區任司令員。許世友和韋國清(1970年代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以1968年在廣西下令對紅衛兵激進組織進行血腥鎮壓而聞名)都是鄧小平的政治盟友，在後毛時代都位居要職。有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解放軍在南京和其他地方進行鎮壓的情況，參見布拉德沃斯(Dennis Bloodsworth)，《明顯的繼承人》(*Heirs Apparent*,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3)，頁94。

7. 韓丁，〈變革中的農村〉，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107。韓丁在文中提到的情況發生在龍寶村。有關龍寶村在文化大革命的具體情況，參見韓丁的傑作《翻身》，第6及9章。
8. 有關1956年後階級轉化為等級的情況，參見理查德・克勞斯，《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第6章。在農村地區，這種情況使得出身於地主和富農家庭的子女很難找到對象。
9. 有關大寨榜樣及其政治歷史，參見鄒讜(Tang Tsou)等著，〈國家農業政策：大寨榜樣與後毛時代的地區變化〉("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Daizai Model and Local Change in the Post-Mao Era")，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266–299。
10. 毛致林的信。下面有關農村工業化的討論，特別得益於西於爾茲森(Jon Sigurdson)的出色論文〈農村工業技術的內部轉讓〉("Rural Industry and the Inter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載施拉姆主編，《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頁199–232。
11. 賽爾登，《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變革的歷史》(*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9)，頁125。關於1975年夏季的農村工業報告，參見珀金斯(Dwight Perkins)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農村小工業》(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77)。
12.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引自《毛澤東思想萬歲》，頁389–390。
13. 安秉俊(Byung-joon Ahn)，《中國政治與文化大革命》(*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4. 毛澤東1965年6月26日對衛生工作的講話。
15. 卡德納，〈知識青年與城鄉不平等：1958–1966〉("Educated Youth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1958–1966"），載約翰・路易斯主編，《共產黨中國的城市》(*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頁235–236。

16. 毛澤東1964年2月3日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講話。
17. 佩珀(Suzanne Pepper），〈毛以後的中國教育：進兩步，退兩步，再重覆？〉("Chinese Education After Mao: Two Steps Forward, Two Steps Back, and Begin Again"），《中國季刊》1980年3月，第81期，頁6–7。小學學制從六年減為五年，村辦小學增加了兩年制的中學班，使中學入學人數劇增。
18. 學校交當地管理後，學校經費主要由所在的公社、大隊提供；國家負責發放教師工資；前揭文，頁7。當然，地方管理也要執行國家規定的統一課程，如各級學校的政治教育，特別是學習「毛澤東思想」、軍訓以及定期參加生產勞動等。有關文化大革命對教育政策和實踐的影響，參見卡德納和伊維德(Wilt Idema），〈中國的教育革命〉("China's Educational Revolution"），載施拉姆主編，《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頁257–289。
19. 在本書第六部中將探討1970年代農業經濟中的一些問題。
20. 貝特爾海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頁11。
21. 有關對文化大革命工業政策的結果的三種不同評價，參見安多斯(Stephen Andors），《中國的工業革命》(*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第9章；魏昂德，〈毛主義工業遺產的諷刺〉("Some Ironies of the Maoist Legacy in Industry"），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215–237；華安德(Andrew Watson），〈工業管理：群眾參與的實驗〉("Industrial Management: Experiments in Mass Participation"），載布魯格(Bill Brugger)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China: The Impa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78），頁171–202。
22. 克裏斯托弗・豪，〈工業中的勞動組織與獎勵機制：文化大革命之前及其後〉("Labor Organization and Incentives in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載施拉姆主編，《權威、參與和文化變革》，頁242。
23. 貝特爾海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頁15–16。1970年代初期，別的地區的工廠情況與此類似，有些工廠收入差距更大。
24. 有關這方面情況的具體例子，參見克裏斯托弗・豪，〈工業中的勞動組織

與獎勵機制〉，頁248–250；華安德，〈工業管理：群眾參與的實驗〉，頁180–199。

25. 轉引自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64。
26. 關於城市青年「上山下鄉」的情況，參見白思鼎，《上山下鄉》(*Up to the Mountain and Down to the Vill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7. 斯諾，《漫長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頁13–14。
28. 即使人員的變動也是有限的。到1970年代中期，各省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的主任都是由文化大革命前的原省裏的主要負責人擔任。有關省級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性質和廢除，參見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省級革命委員會1967–1979：訃告一則〉("The Provincial Revolutionary Committe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67–1979: An Obituary")，《中國季刊》1981年3月第85期，頁49–79。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後果與
毛主義時代的終結 1969–1976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大會宣佈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大會本身是一個「團結勝利」的大會。但就在這些話餘音未盡之際，爆發了新的政治鬥爭，團結化為泡影。鬥爭圍繞著文化大革命提出的但尚未解決的問題，大動亂刺激起來的政治慾望，給鬥爭火上澆油；但這種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群眾反對官僚權威的鬥爭不同，中國政治現在已轉變成黨內官僚領導人之間的派別鬥爭，完全避開了公眾的視線。

林彪的垮台

九大以後，支配著中國政治的兩個問題似乎書寫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後篇章：一個是關於人民共和國在由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控制的敵對國際環境中的國際地位問題；另一個是黨在文化大革命後體制中的地位問題。兩個問題奇妙地聯繫在一起，因為二者都源自文化大革命的經驗，而幸存的領導人對這種經驗的意義有著不同的理解。

乍看之下，很難看出文化大革命與外交政策問題有什麼聯繫。1966–1969年間，中國與世隔絕，先是敵對的美國，後是同樣敵對的蘇聯，千方百計孤立中國。由於忙於國內鬥爭，毛主義領導人似乎甘願讓中國的外交關係陷於停滯，他們甚至於1967年召回了大多數駐外使節。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時，美國對越南的軍事干涉正在大規模升級，炸彈已經落到了中國邊界附近，美國還威脅要把戰爭擴大到

中國。但是，中國所以要開展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像當時有些觀察家分析的，是因為美國對越南的入侵造成的威脅所致；[1]恰恰相反，毛認為，就事關「世界革命」而言，中國國內的鬥爭要遠比美國對越南的侵略更加重要。恰恰是劉少奇、而不是毛澤東發表了最強烈的抗議聲明，警告說，在越南人民抗擊美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中國人民將隨時準備支援越南人民。事實上，毛在1970年坦率地告訴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他決心打倒劉少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劉少奇提出恢復中蘇聯盟，抗衡美國在越南的威脅，這樣就勢必要延緩文化大革命的發動。[2]

在毛主義者看來，世界革命的命運取決於中國革命的命運，這反映出民族自我中心的膨脹。林彪在1965年寫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這篇典型的毛主義文章裏，把中國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表達得淋漓盡致。該文把中國革命的經驗引到世界革命進程的全球觀念中，提出「革命的農村」，即經濟落後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將包圍和戰勝「先進」的城市，即歐洲和北美。這雖然不過是對世界形勢的一種樂觀展望，而不是中國要在世界革命中採取行動的聲明，但它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時領導人的世界觀。在他們看來，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將保證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這會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榜樣。所以，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將取代精神上已經墮落的「資本主義」蘇聯成為「革命故鄉」，蘇聯在國內奉行的修正主義和國外奉行的機會主義，正在把世界革命力量引入歧途。這樣，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孤立就被冠之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美稱。在這些年裏，北京不時發表強烈的聲明，堅定地站在世界群眾革命運動一邊，[3]同時還全面地痛斥世界各國的反動政府和領導人，從緬甸的「法西斯主義者」奈溫（Ne Win）到法國的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當然還有約翰遜（Lyndon Johnson）和勃列日涅夫（Leonard Brezhnev）。1967年，毛不僅把中國稱作「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還提出要把中國變成「世界革命的軍事和技術中心」。[4]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蘇聯正是按照這種「國際主義」革命觀粗暴地干涉他人事務。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北京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強烈地譴責這種侵略行為。雖然中國共產黨人對杜布切克

(Alexander Dubcek) 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驗毫無同情之心，但中國一貫堅持國家主權的立場，這既是原則，也事關國家利益。蘇聯對捷克的佔領，引起中國對與蘇聯發生戰爭的擔憂。蘇聯的侵略，以聲名狼藉的「勃列日涅夫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有限主權論」為基礎。就是說，蘇聯有「權利」對屬於所謂「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進行軍事侵略。對中國來說，這種威脅是現實和直接的。蘇聯已經含蓄地警告要對中國的核裝備 (中國在1967年後擁有了氫彈) 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 (最好與美國共同一塊動手)。在中蘇5,000英里的邊境線上，蘇聯陳兵百萬，數百枚蘇聯核導彈已對準了中國各大城市。邊界衝突日益頻繁，不斷升級。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召開之際，中蘇兩國軍隊剛剛在黑龍江省冰天雪地的烏蘇裏江上發生了激烈的邊界流血戰鬥。

在九大通過的由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中國共產黨首次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與美帝國主義擺在同樣的位置上，兩者都是被壓迫國家和中國的主要敵人。美帝國主義還是「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但林彪對蘇聯也使用了同樣嚴厲的措辭，他譴責「新沙皇」如同希特勒建立「歐洲新秩序」一樣建立殖民地，採取「法西斯主義的強盜行為」。但是，林彪樂觀地預言說，無論是帝國主義還是社會帝國主義，在世界人民的革命力量面前，都不可避免要走向滅亡。[5]

對於毛澤東和周恩來來說，僅僅是譴責蘇聯和美國一樣邪惡，寄希望於世界革命的奇跡發生，並不足以對付來自北方的威脅。周提倡一種新的全球外交戰略，它是基於國家主權、和平共處、與「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的傳統原則，毫無疑問，周得到了毛的全力支持；這是一種把蘇聯作為主要敵人、相應地與美國實行策略緩和的戰略。這一戰略與美國的利益不謀而合，很快導致了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和尼克松 (Richard Nixon) 的北京之行。當然，這種新外交與風行一時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 (稱為救世主式的革命民族主義精神也許更合適) 格格不入。在林彪看來，這即使不是對原則的背叛，也是對他熱心鼓吹的世界範圍的「人民戰爭」觀點在政治上的完全否定。在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特別是與美國緩和的政策問題上，毛和他的法定「繼承人」林彪分道揚鑣了。

在與上述問題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問題上，毛與林也發生了衝突。

毛和周提出重建共產黨，恢復黨的權威。問題不在於要不要重建黨——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產生一個能取代黨的政治組織，而是要不要按照列寧主義原則建黨，是否恢復黨的壟斷地位，是否讓大多數文化大革命前的領導人官復原職。對毛、特別是對周來說，黨的迅速復原是國內當務之急，特別是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導致的不正常的政治後果，即軍隊成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力量的現象。不管解放軍具有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優秀品質，但眼前的局勢引起人們對波拿巴主義的擔憂，毛開始對軍隊將領的「驕傲」提出批評。此外，對蘇聯威脅的日益擔心，也迫切需要建立穩定的國內政治秩序。毛主義強調在復興和重建後的黨的領導下，實現國家的團結一致與和解。毛現在公開贊成讓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數領導人復職，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粗暴批鬥(和被打倒)的幹部全面恢復名譽。實際上，毛現在宣稱，他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不贊成對黨政幹部的「虐待」，指出，幹部的不滿情緒是重建黨的主要障礙。[6]

北京那些迄今為止躲過了對「極左分子」不斷清洗的激進領導人——最著名的是陳伯達——認為，恢復老的「走資派」職務一事過於急躁。新領導人的選擇，主要是依據他的行政能力和政治需要，很少根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標準。林彪也反對讓老幹部復出，這倒不是由於他對文化大革命的原則情有獨鐘，而是因為列寧主義黨的重建對他的政治野心構成了威脅。文革前的幹部復職加強了黨的組織，黨越強大，林彪決定政策和事務的權力就越小。因此，在黨的九大中，林彪提出三年前成立時就由陳伯達任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應繼續存在，發揮作用；這並不意味著在政治上支持中央文革小組。事實上，自從1968年林彪指揮解放軍野蠻地鎮壓了激進的紅衛兵後，他就與中央文革小組的多數成員發生了尖銳的衝突。顯然，林彪是利用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抗衡中央政治局的砝碼，阻礙重建黨的進程。無論如何，林的建議沒有成功，中央文革小組於1969年12月解散。

九大以後的政治鬥爭，或至少是林彪與毛澤東的衝突，不能簡單地解釋為軍方與文職政權、軍隊與黨之間的鬥爭，無論這種解釋對理解至今尚撲朔迷離的事件多麼有誘惑力。由於這場秘密鬥爭發生在1969至1971年，所以林彪不可能以軍方代表、或以軍方發言人自居。

1967年夏季，人民解放軍受到文化大革命極左分子攻擊時，林也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了這場攻擊，因此招致許多軍隊將領的怨恨。當時出面保護解放軍的不是林彪，而恰恰是周恩來。林彪在軍隊領導層中固然有追隨者，他們極力拉攏其他人一起維護林彪作為公認的毛的「接班人」地位，但與忠誠於毛和周的人相比，他們在人數和力量上都大為遜色。林對毛的挑戰，不是軍方對文職政權的挑戰，而是政治挑戰。

然而，這是一場極曖昧和混沌的政治挑戰，其中涉及的更多是權力和權術，而不是實際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林彪與毛之間的衝突是所謂「激進派」與「溫和派」的衝突。如果把林彪當成文化大革命原則的代表，以為他徒勞地反對九大後毛對這些原則的背叛，那就太牽強附會了。雖然後毛時代的中國領導人從政治需要出發，把「林彪與四人幫」一起都說成是「極左分子」，指控他們要為「十年動亂」的主要罪行負責，但事實真相是，林與後來被稱為四人幫的人是不共戴天的政治敵人。未來四人幫中的成員之一的江青，於1968年和周恩來結成同盟(雖然他們之間也有分歧)共同反對林彪，這一同盟對1971年林彪的垮台起了重要作用。[7] 命運不濟的四人幫另一成員張春橋，是1971年林彪流產政變要謀殺的對象之一。[8] 對林彪的指控包羅萬有，實際上包括了中國共產黨思想與政治異端清單中的所有罪名，其中最可信的指控，是說林彪是企圖篡奪最高政治權力的「野心家」和「陰謀家」。正如威廉・約瑟夫(William Joseph)評論的：「林彪不過是一個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者，凡有利於他自己權力的任何路線和政策他都支持。」[9]

對黨的全面重建與中美關係緩和顯然對林彪的權力不利，所以他反對這兩項政策。毛與林在這兩個問題上分道揚鑣，毛進而懷疑林的個人野心和詭密行事的方式，1970年8月下旬，毛與林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公開爆發了衝突，更準確地說，公開在中央委員會成員面前暴露了衝突。中國人民直到兩年後才被告知領導人之間的這場政治鬥爭，但這只不過是勝利者對事件和涉及問題的一面之辭。對政策的公開爭論已不再時興，這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作法形成了顯明對照。

根據毛後來的說法，林彪和陳伯達(在當時，把他們作為一個同

盟至少是出於臨時性的策略考慮）在廬山會議上發動「突然襲擊」。毛形容說，他的對手有兩個「綱領」：第一個是設國家主席，自劉少奇被撤職後這一職位一直空缺；第二個是在新的國家憲法中加上稱頌毛是「天才」的條款。[10]「突然襲擊」包括對周恩來外交和國內政策提出批評的會議發言，所以是突然，只是因為發言內容事先未請示毛。設立國家主席一職的建議，與毛在幾個月前決定的新憲法中不提國家主席——實際上就是廢除國家主席一職是相悖的。毛所以作出這樣的決定，也許是毛擔心削弱周恩來總理在政府中的最高地位，因此不願意讓他的「接班人」林彪當國家主席。建議宣佈毛是「天才」是一件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毛後來稱這是一個「理論問題」，但在當時，它似乎是一個十分突出的實際政治問題；稱頌毛是天才與文化大革命時的精神、特別是人民解放軍所熱衷的那一套是完全一致的，那時，毛作為至高無上的領袖和與群眾直接聯繫的烏托邦先知，淩駕於一切權力機關之上。1970年，把毛捧為天才，意在創造類似於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將所有的政治智慧和權威都集於毛一身，歸之於毛的思想而不是黨，以此阻礙按照文化大革命前的列寧主義原則重建黨的趨勢。毛很快就看穿了利用對他的崇拜來反對列寧主義建黨政策的政治含義，他拒絕把自己當作天才，後來，在談到這件事的政治意義時，他說：「天才不是靠一個人或幾個人，天才是靠一個黨，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11]

中央委員會既沒有同意設國家主席，也沒有宣佈毛是天才。相反，林彪和陳伯達卻因為阻撓黨的重建進程而受到批判。此外，在明顯經過激烈的辯論後，中央批準了周恩來制定的外交政策。經過兩星期秘密會議後發表的正式公報宣佈，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12]這是五年多來第一次公開這樣提案。

廬山會議還標誌著陳伯達的垮台。長期以來，他一直是毛的私人秘書，頗得毛的賞識，是毛主義出色的理論家。文化大革命使陳上升到權力中心，成為中央五位常委之一，與毛、林彪、周恩來和康生並列。現在，他成為這場短暫運動的犧牲品，被扣上「極左分子」的帽子，成了中國的「托洛斯基」。

如何處理林彪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林彪不僅是毛的正式接班人和

國防部長，而且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聲望僅次於主席本人。自從1927年南昌起義後，他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英雄之一，1928年與毛首次見面後，他就成為毛最親密的戰友之一。此外，在1970年秋季，林能夠在軍隊得到多大程度的支持還是個未知數，促使林倒台的戰略直到一年後才見分曉。

當然，毛與林彪的鬥爭完全是秘密進行的。對中國人民來說，林依然是毛選定的接班人，林繼續公開發表講話，主持官方會議，他的畫像在報刊上位置幾乎與毛同樣醒目。1971年5月1日，林與毛一起站在天安門前面廣場的檢閱台上，但在表面的團結之下，政治鬥爭越來越激烈。毛著手剝奪支持陳和林的政治或軍隊領導人的職務，其中包括北京軍區政委李雪峰。毛還以對付蘇聯威脅為借口，把林直接指揮的部隊從北京調回到他們原來在黑龍江的基地。

在為林彪垮台作準備的同時，林反對的政策也在實施之中。黨的重建工作加緊進行。在黨的九大後18個月內，沒有能完成建立省級黨的委員會的工作，但廬山會議起了清除政治障礙的作用。從1970年12月到1971年8月，所有的省都成立了黨的委員會，有效地控制了省革命委員會。與此同時，周恩來的新外交也取得了預期的結果。1970年11月，周恩來告訴斯諾，中國政府已對華盛頓提出的恢復一年前在華沙中斷的中美會談的建議，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但最好是另換地方舉行會談。[13] 新的地方將是北京。同年12月，毛對斯諾說，歡迎尼克松到中國來，無論是作為遊客還是總統都可以。[14] 毛的邀請很快傳到了華盛頓，斯諾也得到允許發表毛與他的談話，斯諾的文章發表在1971年4月美國的《生活》(*Life*) 雜誌上。也正是在這期間，林及其支持者在政治局裏作了最後的努力，以逆轉中國外交政策的進程。但是，「乒乓外交」的時代已經開始，[15] 並很快發展到「務實政治」時代。1971年7月11日，宣佈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已在北京與周恩來總理舉行了兩天的會談，為尼克松總統次年2月訪華作準備；這是中美外交上的雙贏。

9月，在基辛格訪華後的兩個月，林彪從公開場合消失了，在其後的十個月裏，官方對此事未作任何解釋。直到1972年7月28日，官方才首次下發了被稱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十次路線鬥爭」的有關

說明。據說，林彪發動了一場未遂的政變，企圖殺害毛澤東。政變失敗後，他和妻子、兒子及其他同夥乘坐一架噴氣式飛機企圖逃到蘇聯，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墜毀，機上人員全部喪生。

當然，沒有任何方式證實或否定官方的說法，跟許多類似的事件一樣，人們對這一事件的了解只限幸存者和勝利者有選擇地提供的說法和文件。能夠合情合理確認的，僅是1971年9月在中國發生了一場重大的政治危機，導致對軍隊和政府機構上層的一場清洗，21名政治局委員中，有11人被解職，不管是死在9月13日墜毀的三叉戟飛機上，還是死於別的時間別的地點，林彪確實是死了。[16]

在最近幾年裏，北京和其他地方公佈了大量關於林彪的「揭密」材料，但這些材料除了進一步敘述了被指控的陰謀奪權的細節外，有關1971年9月這場危機的起源和性質，提供的內容並沒有超出1972年夏季人們已經知道了情況。勿庸置疑，廬山會議後的第二年，在中國最高權力層發生了一道陰謀與反陰謀的鬥爭。這場鬥爭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生活性質一個不幸的評註。但是，不能當然地認為林及其追隨者從一開始就是陰謀家。看來很可能是毛出於權力和政策的考慮，在政治上採取主動，決定除掉林及其同夥。在1970年下半年，毛開始清洗林在軍隊和政界的支持者，1971年初，他改組了北京軍區，確保該部隊的可靠性。1971年8月18日，他開始了對南方各省的「視察」，此行的目的顯然是在反對林彪的鬥爭中，爭取各軍區領導人的支持，為一個月後與林攤牌作準備。在視察中，毛稱他一直是保護林，對林實行「治病救人」方針。他認為林有改過的可能性，但又預感地補充說：「犯了大的原則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17]

很顯然，毛打算徹底結束這場鬥爭，對林是否能「悔改」已不抱任何希望。面對毛這種頗具威脅的政策手腕，林很可能破釜沉舟，發動了一場未遂政變，實施據當局說早在一年前就已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暗殺陰謀。根據北京後來的說法，1971年9月初，陰謀者「企圖用火餤噴射器、40毫米火箭筒進攻毛主席專列，炸毀專列計劃要通過的蘇州附近的碩放橋，或者從空中炸毀專列，或者襲擊專列停靠的上海站附近的一個油庫」。如果所有這些精心策劃的步驟都失敗，下一步就是當毛到上海時，讓他的一位警衛員開槍殺害毛澤東。[18] 不過，周恩來

在1972年下半年會見一個來訪的美國報業編輯代表團時，承認「五七一工程紀要」並未付諸實施。實際上，不存在什麼暗殺毛和實施政變的行動。相反，由於害怕陰謀暴露，林彪倉皇登上了後來墜毀於蒙古的那架飛機。[19] 但是，不管林的動機和行動可能是什麼，他的垮台，以及他在黨內、軍內和革命委員會支持者的倒台，[20] 掃除了鞏固文化大革命後毛和周希望建立的政治秩序的最後障礙。

林彪垮台以後，這位一度是毛法定的「接班人」便被扣上了一大堆「極左」的罪行。他除了陰謀殺害毛、實行軍事獨裁外，還妄圖與蘇聯結成「罪惡聯盟」，反對毛給黨的幹部恢復名譽的政策和毛外交政策中的「革命路線」。林彪還被指控誇大了群眾的自發性；過分強調生產中人的主觀精神因素的作用；把大寨經驗絕對化，鼓吹直接向共產主義過渡，從而破壞了農村的穩定；煽動對毛的個人崇拜，讓人們死記硬背毛的語錄而不是認真學習毛的著作等。1972年，在一些外國觀察家眼中，林彪是被揭露出來的最典型的「極左分子」。[21] 確實，中國的高級官員在當時告訴來訪者，林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五一六組織」的「黑後台」。[22] 也許，對極左異端的批判，更多地不是為了揭露林彪，而是為了更好地實施毛澤東和周恩來領導的繼續從文化大革命向後退卻的政策。

在林彪垮台後的兩年時間裏，中國加快了糾正文化大革命極左的步伐。它的首要標誌是重新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威，黨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與文化大革命前完全一樣。不僅僅是黨組織得到恢復，大多數老領導人也官復原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作為「走資派」和「牛鬼蛇神」批鬥和打倒的幹部又重新啟用，越來越多的幹部被恢復名譽，而文化大革命的「過激行為」，都是林彪陰謀策劃的結果，除此之外，官方沒有給出別的解釋。大多數原省委的主要領導人及其副手重新身居要職，但為了避免麻煩，他們離開了1966年時他們任職的省，被安排在別的省就職。[23] 總的來說，老幹部和保守幹部力量，超過了文化大革命中上升到權力機關的年輕激進幹部的力量。那些著名的「牛鬼蛇神」如1967年武漢事變領導人陳再道、鍾漢華等，恢復了名譽，1972年公開露面，被任命為軍區領導人。過去由黨領導的群眾組織也恢復了活動。重新組建的共青團取代了紅衛兵，改組後的工會代替了工人代表大會。

隨著黨的重建，革命委員會和軍隊的政治影響越來越小。事實上，革命委員會已不合時宜，因為原來由它代表的群眾組織基本上不復存在。但出於行政管理和意識形態的原因，如果正式取消革命委員會，難免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所以，革命委員會還是保留了下來。與此同時，自從林彪在軍隊的支持者被清除後，人民解放軍逐漸從文化大革命期間奉命接管的政治權力中退出。1971年，毛在南方視察時再次明確地指出，黨要指揮槍。他告誡軍隊將領：「你們要過問軍事……地方黨委已經決定了的事，還要拿到部隊黨委去討論，這不是搞顛倒了嘛。」[24] 十年來，毛一直把人民解放軍作為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但是，現在的時興口號是人民解放軍學習「黨的優良作風」、「向全國人民學習」。

黨的重建，在邏輯上要求減少對毛的個人崇拜。個人崇拜是具有兩面性的現象：一方面，它是人民社會權力異化的極端表現，它並不簡單地是人民對淩駕於自己之上的國家權力的崇拜，而是人民完全地把自己（和自己的權力）都隸屬於某一個人的最高權威之下，把這個人當作是集體意志和全部智慧的具體化身；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中，個人崇拜是動員群眾反對統治他們的官僚機構、反對權威合法化的主要武器。儘管毛未必認識到個人崇拜的異化性質，但他十分清楚個人崇拜的政治作用。1970年12月，他在與斯諾談話間，再次坦率地承認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第一次在1965年），但他又說，在與不受他領導的官僚機構的鬥爭中，個人崇拜是一件必要的武器；現在形勢已經不同了，到了給個人崇拜「降溫」的時候，但這需要時間。他說，要使人民克服「三千年崇拜皇帝的傳統」習慣是很困難的。[25] 毛把「個人崇拜」與封建傳統聯繫起來，表明他充分認識到這種現象的社會根源，認識到個人崇拜所以能興起，是因為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為舊的農業傳統支配的農業國。他的這番評論說明，他是利用文化落後的條件來使自己的權威神秘化，削弱中國共產黨的權威。

1971年後，個人崇拜實際上已經「降溫」。雖然仍不乏公眾和官方對毛和毛思想的阿諛之詞，但現在的重點是強調黨的絕對權威（暫且不提一貫正確）。當然，黨是在如今更傾向於列寧主義的毛的領導下，以毛的思想指導。個人崇拜的狂熱一面被歸罪於林彪。誠然，林是個人

崇拜最熱心的鼓吹者，但是，在1970年以前，沒有證據表明毛曾反對過一度是他「親密戰友」的這種做法。

林彪死後的幾年，周恩來制定的外交政策，雖然付出了中國宣稱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沉重代價，但卻給國家帶來了豐厚的利益。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地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美國不願意也無法再繼續它實行了二十多年的阻撓政策。1972年2月，在眾目所矚的尼克松訪華結束後，兩國發表了《上海公報》，承認了中國自1949年後堅持的立場。公報保證將最終實現兩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要求美國逐步從台灣撤走其軍事力量，承認台灣的前途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由於水門事件和兩國國內政策中其他一些難以預料的因素，拖延了這些協議內容的實施。與此同時，中國完全地實行了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原則。當孟加拉發生暴亂時，中國繼續與巴基斯坦政府保持著十分「友好的關係」；1971年，在斯里蘭卡發生革命起義時，中國對班達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一如既往；1972年美國對越南發動了臭名昭著的「聖誕節轟炸」時，中國政府只是在口頭上提出抗議，但他們充分地克制自己，與基辛格和尼克松保持禮貌關係。各式封建君主和軍事獨裁者(許多人曾被北京斥責為法西斯主義者，有的甚至更糟)紛紛前往北京訪問，受到熱情款待。中國與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希臘的法西斯軍政權也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和貿易關係。在毛時代的最後幾年裏，中國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有力支持者，中國還是原來「社會主義陣營」中少數幾個依然與智利軍政權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而正是這個軍政權野蠻地推翻了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的馬克思主義政府。1976年初，在安哥拉事務中，中國又與美國和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站到同一條戰線上。

中國新外交政策取得的這些未免有些尷尬的進展，以及中國步入國際權力政治世界的舞台，都是為了一個目標，即反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所有任務都服從於這一目標。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特別是面臨蘇聯的直接威脅而採取的這種策略，最後被提到了一個這樣的原則，中國聲稱：世界各地革命運動的利益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這是一個具有斯大林「一國社會主義」特徵的原則，也是一個反映了毛主義中濃厚的民族主義內容的原則。

中國在1970年代初期的外交政策，至少就與美國的關係而言有了新變化，但它的國內政策並沒有變化，其主要特徵是從文化大革命的激進路線謹慎地退卻。1968–1969年，曾嘗試過恢復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策，但隨後又放棄了。1970年，經濟政策(主要由周恩來制定)的重點是穩定地、有秩序地促進經濟增長。在農業方面，農業學大寨的主要目標是建設「大寨縣」，重點不是進行社會變革，而是改進農業技術。在工業方面，文化大革命中被免職的管理幹部重操舊業，加強管理權威，嚴格勞動紀律，建立健全工廠的各項規章制度，與「無政府主義」和「極左現象」作鬥爭。對外貿易和進口國外技術明顯增長。[26] 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平反」的步伐加快，到1973年，據說「政府各部委現在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幹部掌權」。[27] 文化上的禁錮也明顯地鬆弛，一些西方交響樂隊到上海和北京演出，部分被查禁的書籍和電影重新面世。只有教育領域還在繼續進行文化大革命時的激進改革(雖然1972年曾局部恢復了高校入學考試)。除此以外，總的趨勢是返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狀況。但正如後來事情的發展揭示的，黨內不是所有的派別都能無保留地接受這種趨勢。

不過，1973年8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批准了毛和周實行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大會事先沒有公開宣佈，會議比以往更加保密。但是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開表明，雖然林彪垮台了，但現在的領導人依然忠實於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則，而林彪背叛了這些原則，實際上，他從來沒有代表過這些原則。王洪文在大會上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這是十大的兩個主要文件之一。讓王洪文作這一報告的決定，也主要是為了保持文化大革命的連續性；王洪文原是上海一個工廠的幹部，年輕的黨員積極分子，文化大革命使他青雲直上，進入了最高領導層。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毛主持大會但沒有正式發表講話。但很顯然，他極力在以王洪文為代表的「激進派」與周恩來為代表的「穩健派」之間保持平衡——即使還談不上調和。

周恩來和王洪文都煞費苦心地強調九大制定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不管九大的政治路線如何空洞乏味，它是連結現在的領導與文化大革命的紐帶。兩人都強調黨的絕對權威和不可替代的先鋒隊作用。

周恩來指出：「要進一步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一切歸黨的領導」。[28] 王洪文更進一步闡述了列寧主義政黨的基本概念，重申「黨是領導一切的」。當然，王洪文同時強調了毛主義關於黨的各級幹部必須接受「群眾的批評和監督」的原則。他還宣稱：「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殺頭，不怕離婚，要敢於反潮流。」這不免有一絲文化大革命的味道。[29] 不過，在林彪事件以後，恐怕少有人敢於進行這種挑戰了。無論如何，十大最主要的目的是批準按照正統的列寧主義原則進行黨的重建。在人民大會堂裏召開的這次大會制定的各種文件，反覆強調的都是「黨是領導一切的」(常用大號黑體字)。

黨領導一切的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得到重新確認，因此，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歷史就有必要重寫。所以，修改後的黨章莊重地宣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30] 王洪文還宣佈，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整黨運動」。[31]

周恩來用人們熟悉的泛泛語言闡述了國際形勢(「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32]，但是，外交部長姬鵬飛及其助手當選為中央委員，意味著周的務實外交政策實際上獲得了批准。與此同時，人民解放軍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明顯減少了。

十大面臨的最困難問題是解釋林彪的垮台。1972年，林彪和陳伯達被說成是「極左分子」。但是，官方很快發現這種說法難以自圓其說，對文化大革命兩位主要領導人的這種指控會引起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懷疑，或導致對現任領導人是否能真正代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和原則的懷疑。因此，林彪和陳伯達很快就又成了「極右分子」，被正式開除出黨。林彪的罪名是「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兩面派、叛徒、賣國賊」，陳伯達是「林彪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老牌反共分子、托洛斯基分子、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周恩來的報告中用了大段篇幅把林彪與劉少奇聯繫在一起。[33] 林彪被指控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他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而不是毛說的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因此他竭力鼓吹「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生產」的荒謬觀點。林彪的罪惡目的就是使中國共產黨變為「修正主義的法西

斯黨，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實行封建買辦法西斯專政……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似乎這些罪名還不夠，周恩來指責說，林彪的罪行可以追溯到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的早期生涯中。早在1929年，毛就對林彪「進行了嚴肅的耐心的教育」，但是事實證明，「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世界觀根本沒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關頭，他總是犯右傾錯誤，又總是耍兩面派，用假象欺騙黨，欺騙人民」。[34] 不過周沒有解釋為什麼毛用了四十多年才發現林彪的真相。這就是號稱忠於人民、相信群眾的黨的代表大會對林彪作出的裁決——相信群眾並不意味著需要告訴群眾關於他們領導人的真相。雖然很少有人為林彪的死感到痛心，但林彪事件及對這一事件的解釋，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後期開始在中國社會中鬱積的政治虛無主義。

十大對黨章作了修改，最突出的當然是刪除了林彪是毛選定的接班人這段令人難堪的文字。為給個人崇拜「降溫」，新黨章還刪除了1969年黨章中有關毛澤東思想威力的浮誇句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威力就是向黨造反的同義語。不過，為了體現文化大革命的連續性，新黨章保留了毛關於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著階級鬥爭的觀點、「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及「這樣的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的預言。這些觀點在1973年與毛強調的政治團結、統一和穩定似乎十分不協調。

最後，十大充分肯定了自林彪垮台後黨的政治領導，強調培養革命接班人的緊迫性。十大設立了五位黨的副主席，他們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和李德生，[35] 建立了在毛領導下的所謂集體領導體制。主席和副主席，再加上朱德、張春橋和董必武，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著一個已有2800萬黨員的黨。

批林批孔運動

十大非同尋常地只開了短短的五天時間。十大閉幕後不久，就產生了一個明顯的問題：在政治上埋葬林彪比文化大革命時處理劉少奇的問題更加棘手。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標，而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官方決定在林彪一長串罪名後，再加上一條

他是孔夫子的信徒，這進一步增加了為林彪垮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的難度。

1972年，毛主義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郭沫若，發動了一場表面看來是關於古代歷史分期問題的學術爭論，爭論的內容主要是關於公元前一千年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性質和時間。爭論不久就集中在孔子在歷史轉折時期的作用問題上。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不但儒學在當代是反動哲學，而且孔子其人在其所處時代也是反動分子，他的學説，阻礙了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進步。1973年夏季，報刊雜誌都普遍刊載了批判孔子和儒家學説的文章。在黨的十大於8月召開之後，對二千多年前死去的孔子的批判，與對兩年前剛死去的林彪的批判結合起來。

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批林批孔」運動支配著官方的輿論和公眾生活。在這場奇怪的運動中，發表的文章中充滿了晦澀難懂的歷史影射和複雜的文學比喻，但是，運動的主要目的是歌頌秦王朝(秦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了中國)的歷史進步作用和秦始皇，肯定秦朝奉行的獨裁的法家學説；相應地批判了代表垂死的奴隸主貴族利益、妄圖讓中國永遠處於政治和領土分裂狀況的歷史反動派孔子及其學説。秦始皇(他曾焚書坑儒)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但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秦始皇成為中國最偉大的統一者，不管他使用的方法有多麼殘忍，他的行動符合歷史發展的進步潮流。這場政治運動要表達的政治含義是十分清楚的：毛澤東作為現代的秦始皇，[36] 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建立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權，實現了經濟發展，因此，毛順應並代表著歷史變革的客觀規律和力量。林彪則恰恰相反，他是舊儒家在當代的代表人物(特別是賣國的、親儒家的大臣呂不韋)，他反對歷史進步力量，政治上搞宗派主義，領土問題上是分裂主義，代表著陳腐的觀念和舊的社會關係。這樣，林彪成了二千五百年舊傳統觀念的繼續人。似乎是為了給這樁歷史公案蓋棺定論，官方報紙鄭重地宣佈，林彪家裏還懸掛著儒家格言的條幅。

然而，「批林批孔」運動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批判林彪和孔夫子，運動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由誰領導中國步入後文化大革命時期和中國朝什麼方向發展。運動的意義不在於它對歷史編

纂真的有什麼貢獻，因為事態發展表明，這是毛時代最後一場攪起軒然大波的政治鬥爭。對峙的一方是老幹部，他們多是老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和打擊，他們把周恩來總理視為領袖和領路人；另一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獲得政治權力的幹部，他們竭力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即他們所說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其中最著名的領導人就是以「四人幫」聞名的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和王洪文，他們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和王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黨的老幹部與文化大革命新貴之間的衝突，圍繞著官僚機構的權力和整個社會政策兩個方面展開。在1971年反對林彪的鬥爭中，兩派曾結成臨時同盟，都透過林彪的垮台獲益。毛曾試圖把兩派的鬥爭限制在一定範圍內，雖然未必要調和矛盾，但盡力保持兩派的平衡。在1973年的第十屆黨代會上，毛給了周恩來和王洪文同等的發言時間。但是，不論批林批孔運動是怎樣發動的、它最初的目的是什麼，運動成為激烈政治角逐的戰場。鬥爭打著對歷史進行學術研究的旗號，但雙方都抓住一切機會抨擊對方的政策。在表面的歷史爭論中，談論的是公元前三世紀的宰相，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周恩來本人及其政策成為鬥爭的焦點。周恩來的支持者把周比作歷史上秦始皇忠心耿耿的宰相李斯，他努力發展經濟，提倡技術革新，是消滅諸侯割據後建立中央集權國家的總設計師，實行法治。另一方面，周恩來的反對者強調的是李斯堅定地反對儒家的反動思想這一方面(他主張焚書坑儒)，影射地攻擊周恩來給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老幹部平反的政策。這樣，讓老幹部回到原工作崗位，就是把潛在的反革命分子重新安插進國家機關。這場所謂歷史爭論涉及到的現實問題還有教育改革、婦女的社會地位和進口國外技術等。所有這些領域的鬥爭都採取借古喻今的方式，晦澀難懂。爭論主要是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間展開，絕大多數中國人如墮雲天霧海，運動對他們來說只是參加批判會，人云亦云地聲討早被遺忘的儒家。

到1974年秋季，評法批儒的文章越來越令人費解，運動已是強弩之末，逐漸為人淡忘。運動的發動者和參加者，都很難說清楚這場運動到底取得了什麼結果。但是，究竟是哪一方在歷史爭論中佔了上風已無關緊要，重要的是，1975年1月召開的黨的十屆二中全會和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表明，周恩來和老幹部顯然在政治上佔了上風。然而，在批林批孔運動餘音未盡之際，周恩來患了不治之症。由於肺癌的折磨，他於1974年5月住院治療。他在病床上繼續頑強地處理國家事務。毛與周一樣，也快走到生命盡頭。1974年底，81歲的毛身體狀況明顯惡化，他常向來訪者說他準備「去見馬克思」。折磨了他長達十年的帕金斯症已無法遮掩。[37]由於人民共和國的兩位偉大領導人將不久於人世(兩人都於多災的1976年去世)，政治繼承問題成為當務之急。在毛時代的最後18個月中，兩派為爭奪繼承權展開了激烈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

一個在幾年前悄然複出於政治舞台的人物成為這場鬥爭中的中心角色。在1970年代初期，隨著文化大革命前大批幹部復職，鄧小平也回到了國家領導崗位。當這位黨的前總書記在1973年春節的官方宴會上露面時，人們幾乎忘記(至少在公開場合)幾年前他還是在政治上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當時人們尚未充分認識到鄧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七年之後，他被重新任命為周領導的國務院的副總理，在黨的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不久又進入中央政治局。1974年春季，他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在會議上宣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主義陣營」已不復存在，中國屬於第三世界。[38]在1975年1月初的中央會議上，鄧又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又被被任命為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月下旬，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在國務院12名副總理中名列榜首，顯然成為周恩來的接班人。

周恩來對他為之奮鬥了半個多世紀的革命事業所做的最後貢獻，是熱切地呼籲實現中國「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中國在世紀末進入「世界前列」。鄧小平繼承了發展了「四個現代化」的方針。這一方針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毛提出的到2000年使中國成為一個「高度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強大國家」的藍圖。周恩來在1975年1月13–17日召開的拖延已久的四屆人大上，再次重申了這一崇高目標。這是自1964年後人民共和國正式的「最高權力機構」首次召開的會議。二千八百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對自從上次人大會議後國家發生的巨大變革投贊成票，頒佈新的國家憲法，像通常一

樣，批准黨中央在一星期前召開的會議上已經決定的方針、政策和人事變動。重病纏身的周恩來離開醫院病床，在會上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總結了過去25年取得的成就（這些成就使周恩來當之無愧地獲得了巨大的聲望），表達了對中國未來成為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勾劃了「四個現代化」的總體藍圖。毛澤東仍然住在他的家鄉湖南省，沒有出席這次大會，可能是出於健康原因，或是對會議議程表示不滿，或是僅僅是表示自己將退出政治舞台。[39]

周恩來的報告著重闡述了中國過去的經濟進步，強調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性，說明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沒有對中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他報告說，1974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64年增加190%，其中鋼產量增長120%，原煤產量增長91%，石油產量增長650%，發電量增長200%，化肥產量增長330%，拖拉機產量增長五倍。1974年農業總產值比1964年增長51%。周恩來還宣佈，自從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雖然中國人口增加了60%，但糧食產量增長了140%。[40]上述數字與多數外國經濟學家所作的估計相近；不過，這些數字固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沒有揭示出中國經濟存在的越來越嚴重的結構問題和其他問題，後毛時代的領導人則不得不加以正視。[41]

四屆人大通過了一個新的相對簡潔的憲法取代了1954年憲法。新憲法有許多重大的修改，概括了過去20年發生的廣泛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以及毛主義意識形態的發展。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假設下（這一假設不久就面臨挑戰），人民共和國不再被定義為「人民民主國家」，而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對國家的絕對權威不僅是事實，而且成為法律。1954年憲法申明「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新憲法補充說：「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工人階級通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領導。」此外，新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家權力機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42]「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國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新憲法還重申了毛主義的一些具體原則、特別是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鬥爭的觀點和「繼續革命」的理論。新憲法正式規定人民公社是農村政經合一的主要組織形式，但承認生產隊是「基本核算單位」，憲法認可了公社社員擁有自留地以滿足家庭需要的權利。革命委

員會成為常設機構，但主要是作為行政管理部門，而不是決策機構。成立革命委員會時的「三結合」原則被重新定義為「老中青三結合」，這無疑反映了對政治穩定與接班人問題的考慮。自從劉少奇被打倒後一直空缺的國家主席一職，索性廢除了事。國家元首的職責由年邁的朱德元帥以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名義履行。新憲法刪除了1954年憲法的某些自由權利，最突出的是「公民有從事科學研究、文學和藝術創作及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和「居住與遷居的自由」，這反映了當時總體上實行專制的特點。另一方面，新憲法又增加了公民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和大辯論」的權利，鮮明地體現了文化大革命的特點。根據毛的指示，新憲法補充了工人有權罷工的條款。但與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示威自由一樣，這些權利能否真正受到尊重是另一回事。

然而，雖然憲法規定的自由權利能否兑現的前景並不比過去樂觀，但周恩來在1975年1月卻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後文化大革命體制，為中國向毛和他之後的時代平穩過渡作了安排。周恩來和老幹部顯然在中央全會和全國人大會議上都佔了上風。新任命的國務院29個部長，絕大多數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幹部，其中多數人在個人關係和政治上都與周恩來過從甚密，只有文化部長一職為左派所有。鄧小平在政治上引人注目的復出，標誌著老幹部全面得勢。鄧小平似乎當然是周恩來——也許是毛的接班人。

「四人幫」的興衰

僅僅在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短短一個月時間裏，周恩來在1975年1月促成的團結局面便破裂了。極左領導人為爭奪權力作了最後一擊，在2月又發動了一場學習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運動的目標直指周恩來，或更準確地説，直接攻擊鄧小平。在周恩來長期患病臥床期間，鄧小平成為實際上的政府首腦。

最出名的極左領導人是張春橋（自封為流產的上海公社領袖）、筆桿子姚文元（他的那篇文章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王洪文（上海國棉二廠的普通幹部，在1973年黨的十大時進入最高領導層）和江青（毛

的夫人，號稱是中國的文化旗手），後來以「四人幫」聞名。不過，在被當成「幫」(1976年10月)之前，他們都是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成員，四人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和王洪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老幹部和文化大革命左派領導人基本上平分秋色。然而，極左領導人的權力遠沒有表面上看來的大，更沒有達到垮台後其對手所說的那種程度。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的影響主要限於文化界和輿論界，他們充分利用這些媒體誇大自己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自己的實際情況。國家和軍隊的權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幹部手中。四人幫在政治上的顯赫地位、他們的政治生命，最終依賴於毛的保護和支持，而此時的毛澤東已重病纏身，身體狀態每況愈下。

不過，毛對四人幫的態度是矛盾的，主席與這些聲稱是他最忠實的信徒之間的關係也非常複雜。「四人幫」這一詞正是毛本人提出的，在1975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批評了他們在一年前搞的陰謀活動，告誡這些所謂的信徒不要搞成「四人幫」。[43]看來，毛很可能在總體上贊成四人幫提倡的政策和意識形態，但不贊成他們的政治手段。事態的發展表明，毛肯定沒有把他們作為可以依賴或接受的接班人。並非像某些人認為的，四人幫操縱毛謀取自己的利益，[44]實際上，很可能是毛有意識地鼓勵四人幫提出關於社會階級和和政治權力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最後導致四人幫的政治垮台)，但又把這些問題留給未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去解決。[45]

無論是什麼情況，四人幫並不簡單地就是毛用線繩操縱的玩偶。儘管他們不代表他們宣稱自己代表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他們代表的也決不僅是自己和本身的政治野心。他們不了解農村，農民對他們也知之甚少；在城市工人階級中，他們能獲得的支持十分有限；文化大革命中曾聽命於他們的群眾組織早已被鎮壓，而那些代表著多數工人群眾的保守組織，從一開始就支持黨的老幹部和軍隊。四人幫所代表的只是那些產生於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尤其是數百萬在文化大革命中入黨或提拔起來的比較年輕的下層幹部，這些人並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左派，自1967年開始對極左分子不斷進行清洗後，左派基本上蕩然無存。他們是野心家和機會主義者(和四人幫一樣醉心於權力)，

善於察言觀色，能夠緊跟不斷變幻方向的毛澤東路線，為自己的仕途開闢道路，一位評論家貼切地把這些人稱為「既定的左派」。[46] 如果說鄧小平代表著老幹部，他本人是老幹部復出的具體體現，那麼四人幫代表的就是新幹部的利益。1975–1976年日益加劇的拜占庭式政治鬥爭，基本上是老幹部和新幹部為爭奪黨和國家權力而進行的鬥爭。毛的存在給這場鬥爭增添了一層宮庭陰謀的色彩，除此之外，老幹部在政治和軍事上都處於上風。

然而，毛時代最後一輪政治鬥爭雖然在本質上是不同利益的官僚集團的鬥爭，但圍繞著它的意識形態鬥爭所提出的問題，卻具有更廣泛的重要社會意義。根據毛的指示於1975年2月開始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焦點是社會不平等與政治權力之間關係這樣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極左理論家仍然強調上層建築的極端重要性，強調社會關係的革命轉變是正確的經濟發展方向的關鍵，但是，他們現在把這種觀點與傳統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不平等的解釋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作於1875年的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奉為經典，這是馬克思論述無產階級專政過渡時期問題為數不多的作品之一。在《批判》一文中，馬克思區分了共產主義社會的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指出前者不可避免地「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痕跡之一就是「資產階級法權」，這種法權造成新社會裏個人收入之間的重大差別 (依據個人不同的生產能力) 和其他社會不平等現象。毛主義理論家抓住「資產階級法權」這一概念大做文章，不是把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留下的必然遺產，而是把它當成對社會主義和未來共產主義的威脅。毛主義理論家、特別是張春橋 (他早在1958年就寫過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 [47] 認為，資產階級法權存在於中國的商品經濟、八級工資制、農村中私有和集體所有制形式的各個方面、生產過程中日益擴大的地位差別等領域。他們的結論是，資產階級法權是產生黨內修正主義、產生「新生的剝削階級分子」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物質基礎。因此，要保護所謂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即文化大革命的平均主義果實 (數量本來就少，能保留下來的就更少) 就必須用「無產階級專政」(即共產黨國家)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有必要縮小「三大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城鄉和工農差別)，從而防止產生

新的資本主義剝削階級。簡單地說，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意味著國家在分配領域實行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

極左理論家對「資產階級法權」的批判，導致鬥爭雙方圍繞當時的主要政策展開了一場無休止的論戰，鬥爭是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意識形態領域內進行的，當時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有：經濟發展戰略；正在實行的工資制度；教育方針，特別是大學入學考試製度；引進國外技術；知識分子政策；農村的自留地和自由市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老幹部的復出等等。這場鬥爭貫穿於整個1975年，在此期間，作為第一副總理、因而也是實際政府首腦的鄧小平，盡自己最大努力貫徹周恩來在1975年1月提出的現代化綱領。鄧對當時毛主義的理論觀點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沒有表示不同意見，但他直言不諱地提出，各項政策的正確與否，都要用經濟標準來衡量，或他所說的，看它「是阻礙了生產力還是解放了生產力」。為了這一目的，他於1975年秋季讓國務院發佈了三項政策性文件，要求通過加強管理和勞動紀律，整頓工業，通過積極引進國外技術，迅速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提高知識分子待遇，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恢復高等教育體制。[48] 雖然這些政策有利於經濟發展，但就其社會效果來看，只能擴大而不能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在關於「資產階級法權」及其他問題上，雙方理論家都求助於馬克思的經典權威。但是，雙方都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教條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當然，雙方得出的結論也完全不同。不過，最後解決老幹部與文化大革命分子之間爭端的，不是看誰能更巧妙地解釋馬克思主義理論，而是看誰掌握軍隊。但在最後裁決作出之前，從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還在持續進行。雙方劍拔弩張，政治氣氛越來越緊張。在嚴酷的派別鬥爭中，黨紀國法遭到踐踏，政治權力和專政手段的濫用越來越普遍。任意拘捕和不受任何限制的秘密警察活動，使全國、特別是城市籠罩著擔憂和恐怖的氣氛，就此而言，四人幫及其追隨者應負主要責任。他們雖然不像後來指控的，實行了野蠻的「封建法西斯專政」——因為他們沒掌握這麼大的權力，但在其權限範圍內，他們確實使用了強制和恐怖的政治手段，尤其是在他們牢牢控制著的文化領域，對知識分子採取嚴厲的鎮壓措施。此

外，在四人幫的主要政治基地上海和由康生和汪東興控制的秘密警察機構內，情況也是如此。

不過，雖然四人幫的政治行動受其實際權限的制約，但他們的理論對當時的政治恐怖卻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他們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最顯明的特點之一，是非常強調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中獨裁的方面，由於存在著激烈的階級鬥爭，所以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強化中央集權。張春橋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資產階級都死光了，這種階級鬥爭也決不會停止，林彪一類人物上台，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49] 階級鬥爭將長期存在，所以要實行張春橋說的「對資產階級進行全面專政」，就是說，要加強國家的專政和鎮壓功能。極左理論家竭力渲染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力色彩，鼓吹國家可以任意實行專制，「馬克思主義者歡迎而不是反對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革命暴力」。[50] 在對巴黎公社的評價上，他們突出讚揚其「革命暴力」。在理論上，巴黎公社仍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典範，但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看法形成顯明對比，現在更多地是讚揚巴黎公社的鎮壓職能，而不是它的「群眾民主」和「生產者自治」的原則。實際上，在極左理論家看來，巴黎公社的典範在一定程度上已經不再適用，因為公社過分沉溺於對階級敵人的「仁慈」，沒有充分行使國家的鎮壓權力。

毛主義理論家從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中得出的總結論是，國家、國家領導人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的核心部分，決定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尤其是決定著一種生產方式向另一種生產方式的轉變。當然，在此前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大力頌揚古代中央集權制的秦朝、秦始皇和法家的目的，也是突出國家的決定性作用，但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學習運動中，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被推到無以復加的高度——這充其量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荒唐的曲解。

伴隨著起落消長的派別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勉強維持到了1975年底。其間，秋季還有過一場短暫的評通俗歷史小說

《水滸》的運動。《水滸》是毛最欣賞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之一，[51]它寫於十四世紀，描寫了宋朝一群造反的綠林好漢的業績，其中的一位頭領背叛了造反者，向朝庭投降。據說，批判小說的「投降主義」，有助於防止現實中出現背叛民族和階級的危險。毛也許對林彪事件一直耿耿於懷，但一些人卻利用評《水滸》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批判他提倡用中國的原料（煤和石油）換取國外技術的所謂階級投降主義罪行。

不管評《水滸》運動發動者的意圖是什麼，這場運動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鬥爭都沒有產生明顯的影響。打破國內政治僵局的是周恩來的逝世，這種方式出乎人們的意料；周的逝世，宣告了毛時代政治史上最後一章的結束。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多時間裏，周恩來在病榻上頑強地處理國家事務，1976年1月8日，他因癌症去世，享年78歲。在中國舉國哀悼周恩來的日子裏，他的成就和才能也得到了西方輿論界的廣泛讚揚。接替周恩來任總理的既不是鄧小平（周選定的，人們也普遍這樣猜測），也不是第二副總理張春橋。顯然，毛既不信任老一代革命領導人，也不信任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被任命為代總理的是鮮為人知的公安部長華國鋒；華國鋒是一位忠實的毛主義者，或至少毫無疑問地忠誠於毛。華的主要長處是他與鬥爭的雙方在政治上都保持一定的距離。老一代革命家對華的任命還是滿意的，但四人幫卻不然。無論如何，華國鋒的主要任務是把政府凝聚在一起，把派別鬥爭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自從鄧小平在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會致悼詞後，就很少聽到他的消息。但在大字報和報刊上，鄧小平的名字隨處可見，他又成為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是江青又給鄧加了一個新罪名——「國際資本主義的代理人」。4月，左派分子又有了再次在政治上打倒鄧小平的機會。

4月初，隨著中國傳統悼念亡者的清明節的臨近，大批北京市民湧向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紀念周恩來。市民們來自工廠、學校、政府部門和附近的農村人民公社。他們的行動違反了政府的禁令，政府宣稱，清明節是陳舊的封建習俗，禁止人們在天安門廣場陳放花圈。在四天時間裏，湧向天安門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但帶著花圈，還在廣場張貼頌揚周恩來的大字報、詩詞，還有人發表

演說，其中許多內容都是批判四人幫的。清明節前一天，即4月4日是星期日，數十萬群眾來到廣場，悼念周恩來。到黃昏時，寬闊的廣場成了花圈和大字報的海洋。在第二天黎明前的夜暮中，市政府派遣工人匆忙地把花圈和大字報裝上卡車拉走。第二天，數十萬憤怒的群眾在廣場舉行示威抗議，這雖然違背政府禁令，但暴力事件發生的很少，因為許多警察和安全人員都同情示威者。大多數示威者被勸說和平地離開了廣場，但到天黑後，仍有數千人留在廣場，他們受到工人民兵的襲擊，一些人受傷，許多人被捕，數百人被投入監獄。[52]

這一事件後來被稱為「四五運動」，它在以後幾年裏成為強有力的政治象徵 —— 象徵著人民對專制國家的反抗精神。但是事件的直接結果是4月7日的政治局會議。雖然人們看到的是富有鬥爭精神的廣場示威者，舉起右拳行共產主義敬禮，高唱《國際歌》，[53]但政治局會議還是宣佈天安門廣場的示威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成為煽動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但保留了他的黨籍，「以觀後效」。華國鋒是鄧小平第二次被從政治上打倒的受益者，他被政治局正式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儘管還有待於全國人大在形式上正式批准），擢升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成為毛的接班人。

接踵而至的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官方報刊稱鄧小平為「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在1975年周恩來病重時領導國務院所做的工作被斥為「右傾翻案風」，他制定的關於現代化的政策文件成了「三株大毒草」。批鄧運動名為一場廣泛的群眾運動，但運動最缺乏的就是群眾參與。但是，與運動同時進行的是秘密警察的鎮壓活動，便成千上萬群眾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來。

當批鄧運動進行到1976年夏天時，毛的病情惡化，他親手創立的社會似乎面臨崩潰。工人的罷工、怠工或是曠工浪潮直捲城市，工業生產直線下降，群眾情緒低落，文化大革命的派性鬥爭又死灰復燃，犯罪現象和社會秩序問題嚴重。1976年7月28日，中國北部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之一，地震中心在北京東部約一百英里的新興工業城市唐山，城市被夷為平地，佔全市人口四分之一的二十多萬人死於地震。中國歷史上有一種傳統說法，大自然災害是王朝崩潰前兆，為了消除這種傳說的影響，北京的極左領導人命令幸存者要開展批判天

命論以及與此相聯繫的迷信活動，指示他們要繼續開展批鄧運動。在「自力更生」的旗號下，北京拒絕接受國際援助，救災的任務主要落在人民解放軍肩上。在其他各省的支援和配合下，解放軍確實有效地開展了救治傷員和恢復經濟的工作。到秋季初，唐山的主要煤礦和鋼鐵廠都恢復了生產。

毛澤東最後一次在官方場合公開露面是在1973年黨的十大上。隨後他便退居於他的書房。由於疾病折磨，他的身體越來越虛弱，有時甚至神智不清。他的活動只限於在他的寓所內短時的會見來訪的外國貴賓。毛在他生命最後幾年的政治事件中的作用一直是個謎，但很可能直到1976年初春他還對許多重大方針行使著最後裁決權。但到6月，他顯然已經難以為繼。官方宣佈毛不再會見外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終年82歲。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灰燼中像鳳凰一樣再生的中國政治和軍事官僚機構的領導人，幾乎馬上就採取行動斬斷了他們與激進的毛主義傳統的聯繫，當然，他們是以毛的名義、打著毛的教導的旗號這樣做的。10月初，在對毛的悼念活動剛剛結束之際，政治局便清洗了內部的激進成員。在一場軍事政變中，四人幫被逮捕，他們的罪名甚多，其中一條是陰謀篡黨奪權。[54]已經接替周恩來擔任了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又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主席，接替了毛的位置；但華國鋒既不是作為革命領袖，也不是作為一名國務活動家登上政治舞台，他不過是一個官僚政府機構的看守人。

1976年不僅標誌著毛澤東時代的結束，還標誌著在思想和政治上成熟於五四時期的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革命者歷史使命的終結。文化大革命及其災難性的結果，吞噬了許多老一代革命家(以及國家領導人)的生命，先是文化大革命最初要整的那些「走資派」，繼而是毛主義領導人，他們最初是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隨後成為不斷進行的反「極左分子」運動的犧牲品。毛的兩個既定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都出自完全不同的原因，喪身於大動亂之中。在漫長革命歷程中，已經有許多革命領導人及其家人為之獻身，幸存下來的老革命家現在也因年邁或疾病而相繼過世：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董必武於1975年4月去世；自從延安時期就有「中國的貝利亞(Beria)」之稱而追隨於毛的康生

死於同年12月；與毛長期默契配合的周恩來去世於1976年1月；紅軍之父、革命的正義與團結的崇高象徵的朱德於1976年7月逝世，享年90歲。老一代革命家中最年輕的鄧小平第二次被從政治上打倒，而這一次似乎永無出頭之日。

隨著毛的逝世，五四一代共產黨革命家全部退出了歷史舞台。在半個多世紀裏，他們是一批在一個最古老的國家裏實踐最現代的革命理論的先行者。歷史學家無疑會把他們作為最著名的、最富有理想的革命知識分子來記載，因為他們是現代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最富有生氣的革命的領導人，因為他們領導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也是最落後的國家開始了現代變革。1949年的勝利使他們贏得了政權，然而，這卻是一個最貧困的國家，它的人民忍受著極端悲慘的貧窮，處於絕望的境地。在極其可憐的物質基礎上，他們把中國改造成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奠定了現代工業經濟發展的基礎。

本書後面幾章還將進一步探討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這裏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老一代革命家奮鬥的目標，是使中國成為一個既現代化但同時又是社會主義的國家。無論他們在晚年如何苦於目的和手段的分裂，第一代革命家始終堅定地為實現他們在青年時代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目標而奮鬥。無疑，新一代領導人將會繼續追求中國的現代經濟和現代政治的發展，並且，他們最終也許會成功地實現艱巨而又光榮的「繁榮富強」的國家目標。但是，後毛時代的領導人是否會像他們的前任那樣，充滿熱情地繼續為社會主義的未來而奮鬥？這是毛時代結束時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

註釋

1. 例如，舒爾曼，〈中國發生了什麼：一場交換〉(“W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 An Exchange”)，《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67年1月12日。
2. 斯諾，《漫長的革命》，頁17–20。
3. 當然，中國對世界武裝革命鬥爭的支持主要是口頭的，而且是有選擇的。例如，中國媒體對格瓦拉(Che Guervara)之死沒有任何報道。

4. 引自毛澤東1967年夏季的談話及當時在中國廣為散發的宣傳手冊。英譯文參見多比爾(Jean Daubier)，《文化大革命史》(*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附錄4，頁307–313。
5. 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6. 1970年12月毛與斯諾的談話。斯諾，《漫長的革命》，頁174。
7. 有關周恩來和江青聯手反對林彪的情況，參見李洪雲，《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和結語。
8. 「五一七工程紀要」，參見本文註釋第18條。
9. 威廉·約瑟夫(William Joseph)，《中國的極左派集團1958–1981》(*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198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頁145。有關林彪倒台的其他敘述和解釋，參見高英茂(Michael Y. M. Kau)，《林彪事件：政治與軍事政變》(*The Lin Biao Affair: Power Politics and Military Coup*, White Plai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5)；欣內肯(Jaapvan Ginnekan)，《林彪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Biao*, New York: Avon Books, 1977)；梅勝(Livio Maitan)、《中國的黨、軍隊和群眾》(*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第14章；布裏奇漢(Philip Bridgham)，〈林彪的垮台〉("The Fall of Lin Biao")，《中國季刊》1973年第55期，頁427~449。
10. 〈毛主席在南方視察時與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記要〉("Summary of Chairman Mao's Talk with Responsible Comrades at Various Places during his Provincial Tour") 1971年8–9月，施拉姆主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與信件》(*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1974)，頁292–193。
11. 前揭文，頁293。
12.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九屆二中全會公報〉("Communique of the Secon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北京周刊》(*Peking Review*)，1970年9月11日。
13. 斯諾，《漫長的革命》，頁10–12。自從1950年代開始，中美大使在華沙共舉行了一百多次沒有任何結果的會談。
14. 前揭書，頁171–172。
15. 1971年4月初，在日本的中國乒乓球代表團邀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訪問人民共和國，大批美國記者跟隨運動員一起去了中國。

16. 9月13日，確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漢附近墜毀，但中國與蘇聯對機上人員的身份有不同的說法。
17. 〈毛主席在南方視察時與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記要〉1971年8–9月，施拉姆主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與信件》，頁294。毛在談話中列舉了前九次路線鬥爭的重要頭目，自從1927年的陳獨秀一直到1966年的劉少奇。當然，林彪不久就成為第十次路線鬥爭的頭目。
18. 新華社1980年11月17日公佈。
19. 《紐約時報》，1972年10月12日。
20. 被捕的陰謀同夥包括軍隊一些高級將領，其中有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員吳法憲等人。
21. 有關例子參見韓丁，《中國的轉折點》，頁39–40；貝特爾海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工業組織》，頁118–122。
22. 有關例子參見張旭成，〈中國的幹部政治平反：旅行者手記〉("Political Rehabilitation of Cadres in China: A Traveler's View")，《中國季刊》1973年4–6月，頁333。
23. 一個於1973年秋季訪問人民共和國的觀察家，至少認出了50名剛復原職的省委書記或副書記。無疑，實際人數不止於此，在後來幾年會更多。前揭書，頁335。
24. 〈毛主席在南方視察時與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記要〉1971年8–9月，施拉姆主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與信件》，頁296。
25. 斯諾，《漫長的革命》，頁18–19及169–170。
26. 1967–1968年，中國外貿大幅度下降，1968年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從1969年至1975年，外貿額從40億美元增加到140億美元。鄭宇碩(Joseph Cheng)，〈經濟發展戰略〉("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載布魯格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頁140–141。從1972年底至1975春季，人民共和國進口了價值28億美元的工廠設備，主要從日本、西歐進口。小島麗日(Kojima Reitsu)，〈積累、技術與中國的經濟發展〉("Accumulation, Technology,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248–249。
27. 李洪雲，《鄧小平的中國官僚體制改革》("Deng Xiaoping's Reform of the Chinese Bureaucracy")，《中國改革的局限》(*The Limits of Reform in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ilson Center, 1982)，頁31。
28. 周恩來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29. 王洪文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30. 《中國共產黨章程》。
31. 王洪文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32. 周恩來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33. 在林彪事件公諸於眾之前，官方在提到林彪等人時，用「跟劉少奇一夥的騙子」。
34. 周恩來1973年8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35. 葉劍英(1898–1986)，1920年代曾在黃浦軍校任教官，1927年後，成為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延安時期，在朱德和彭德懷領導的八路軍中任參謀長。林彪垮台後，他成為人民共和國最有權勢的軍隊領導人。李德生(1916–)，1935年19歲時就加入了紅軍，其後一直是職業軍人，革命勝利後任師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毛的堅定支持者，1969年黨的九大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被任命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36. 〈五一七工程紀要〉指控是林彪策劃反對毛的陰謀文件，林彪死後在內部傳達，以供批判研究，紀要中譴責毛是「現代的秦始皇」，毛對這一稱呼求之不得。
37. 1975年和1976年初，在毛的官邸受到毛接見的外賓發現，毛的身體狀況明顯惡化。他顯然在1974年某個時候中過風，身體左半部分已經麻痺，影響了他的說話能力，他常常不得不用潦草的字條進行交流。
38. 鄧小平所說的後來被稱為「三個世界理論」。據說是毛提出來的。根據這一理論，第一世界是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極大國，第二世界包括西歐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是佔世界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這一理論的目的是團結第二和第三世界共同反對美蘇兩國。
39. 毛既沒有出席這次中央全會，也沒有出席四屆人大會議。雖然他的身體狀況很差，但他在人大會議期間卻接見了西德反對黨領導人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ss)。
40.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13日。
41. 有關毛時代經濟上的成功與失敗，參見本書第21章。多數資料表明，在文化革命十年(1966–1976)裏，工業生產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增長。
42. 在張春橋關於憲法的講話中，他特別強調了這一點。他的講話重點放在「黨對國家機構的集中領導」。

43. 1977年1月24日《北京周刊》，頁28–29。
44. 例如，加塞德在《復活：毛後的中國》一書的頁57中寫道：「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四人幫)是作為毛的代言人，但在毛病重期間、他們明顯地為了個人目的而操縱毛。毛沒有別人可以依靠，但他不會輕易受騙。」
45. 如理查德・克勞斯在《中國社會主義的階級鬥爭》中，頁163所敘述的。
46. 這一術語是布羅茨加德(Kjeld Erik Brodsgaard)在《中國的民主運動1978–1979》(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1978–1979)，頁751中使用的。文章載於《亞洲研究》，1981年7月號。
47. 在1958年大躍進的高潮中，張春橋寫了一篇題為〈清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嘗試就毛的一個簡短評語進行了理論解釋，提出要用革命年代的平均主義供給制代替解放後實行的八級工資制，文章說，供給制不但適用於幹部，也適用於公社社員。有關這篇文章及其政治含義的情況，參見何漢理，《組織化的中國：官僚機構的問題1949–1976》(*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Californ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頁190–191。
48. 1975年根據鄧小平指示起草的三個文件是：〈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
49. 張春橋，〈讀全面專政〉，《紅旗》1975年4月1日。這是張春橋在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學習運動中的主要理論文章。姚文元在運動中的主要文章是〈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1975年3月。
50. 于東，〈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Programme for Consolidation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1974年1月18日，頁6。
51. 這本小說在西方由賽珍珠(Pearl S. Buck)翻譯出版，書名為*All Men Are Brothers*。
52. 關於4月初天安門事件有關目擊者生動而具體的描述，參見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101–126。如加塞德提到的(頁105)，類似的悼念周恩來的示威在全國多數城鎮都有，只是規模較小於北京。
53. 前揭書，頁107、109。
54. 逮捕四人幫(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是由華國鋒和國防部長葉劍英策劃的，得到了解放軍多數將領的支持。10月6日凌晨，由毛主義者汪東興指揮的精銳的「8341隊」負責。

第六部

鄧小平
與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
1976–1998

第二十一章

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贏得全國政權後曾許諾要進行兩場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及跟隨其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統治者在短短的時間裏，完成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遺留(實際上尚未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1950年代初，共產黨人迅速將腐朽的、四分五裂的舊中華帝國改造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億萬中國人有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隨著1952年的土地改革運動的結束，長期停滯的土地革命劃上了句號，最終在中國現代歷史上消滅了腐朽的地主階級，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從傳統形式的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中獲得了解放。共產黨實現了國家領土的統一，建立了強大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國內市場，廢除了農村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遼闊國土上蘊藏的巨大人力和物質資源，現在可以用來實現落後的、停滯不前的經濟發展，向現代工業經濟的轉變。

國民黨的創建人、有「國父」之稱的孫中山先生在二十世紀初曾提出他的奮鬥綱領：國家統一，民族獨立，「耕者有其田」，發展現代工業。人民共和國初期取得的成就，正是孫中山為之奮鬥的目標。共產黨完成了孫中山未竟的事業，他們可以當之無愧地宣佈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位最傑出人物的合法繼承人。1950年代初，毛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正如毛在1949年自豪地宣佈的，長期(直到不久前)置身於最悲慘、最貧窮的國家之列的中國，確實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了。今天，它作為一個獨立的、強大的和迅速現代化的國家屹立於世界。

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革命的傳統模式。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下進行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在中國大陸的成員，既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是受益人。此外，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典型特徵，是創造有利於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並非如此。城市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農村的個體農民所有制，無論在規模和存在的時間上都受到限制，這些限制是由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目的是廢除私有財產——統治的國家強加的。在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認為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歷史任務已經基本完成(現在看來為時過早)後，他們毫不遲疑地開始了第二場革命。1953年，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剛剛四年之際，便開始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但這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物質匱乏和貧窮的條件下開始的過渡。在毛時代其後的二十多年裏，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他們同步進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的建設。

許多研究者認為，毛時代最突出的特點之一，是追求工業現代化的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毫無疑問，這是毛的目標，也是毛主義的主張。但是到最後，毛澤東在經濟現代化上的成就遠遠勝過他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成就。當然，這種看法與現在流行的觀點是不一致的，流行的觀點是，毛為了「意識形態的純潔」而犧牲了「現代化」發展，毛晚年為了無謂地追求社會主義精神烏托邦，忽視了發展經濟。然而，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歷史記載表明，毛時代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時代。在毛後時代對毛時代的經濟發展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其經濟發展中的缺陷，而不是肯定其成就。批評家們承認，在毛時代，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重工業增加了90倍。儘管中國的工業基礎原來就十分薄弱，由於外敵入侵和內戰的破壞，工業產量在共和國成立時不及常年的一半。但是，從1952年(工業產量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國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遞增，在現代世界歷史上，與任何國家在類似的發展階段上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都是驚人的。[1] 在毛時代，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農業產值的比重從58%下降到34%，[2] 正如一位著名的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所說：

> 工業份額在國民收入中如此迅速增長（幾乎是30%）的現象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在工業化進程的最初40至50年中，英國的工業產值的比重僅僅上升了11%（1801–1841）；日本是22%（1878/82–1923/27）。在戰後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也許只有台灣在這方面的發展速度才可與中國大陸相媲美。[3]

中國從一個基本的農業國轉變為一個相對的工業化國家，反映在與現代化相關的產品的生產大幅度增長上——至少是在「信息社會」前。從1952年到1976年，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億噸；發電量從70億千瓦/小時增加到1330億千瓦/小時；原油產量從幾乎是零到28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從300萬噸增加到4900萬噸。[4] 到1970年代中期，中國能夠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中國還能夠製造原子彈和洲際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六年後，中國於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毛時代，雖然仍有佔人口的75%、約四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但工業勞動力從1952年的300萬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萬，這一數字包括在農村小工業化政策指導下，成為社辦或隊辦工廠工人的2800萬農民。此外，在與工業關係密切的交通與建築領域中，有2000萬工人。[5] 中國還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術知識分子隊伍，中國的科技人員從1949年的區區5萬人（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1979年達到500萬人，其中99%是1949年後培養起來的。[6] 毛時代還興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這些工程對1980年代初期農業生產的發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　*　*

毛的工業化建設也出現了許多嚴重失誤，在工業化進程中確實存在著毛的繼承人批評的「不合理」和「失調」的現象。像大躍進這樣的嚴重失誤，殃及全國，造成重大物質和人員損失。在共和國歷史上，毛時代一些失誤（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至少是在實踐中）還導致中國經

濟出現周期性的波動，毛採取的糾正措施和思想工作對此也無能為力。最嚴重的失誤莫過於農村生產增長緩慢，這對毛一貫強調要重視農業的思想是個諷刺。從1952年到毛時代結束，中國的工業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但農業產量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2.3%，[7] 勉強跟上人口年均增長2% 的速度 —— 在毛時代的25年時間裏，中國人口增加了一倍。

中國工業部門本身也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毛的政策雖然有助於減輕斯大林式工業化造成的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在1950年代初期建立起來的蘇聯模式的工業結構。因此，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工業面臨著與蘇聯及東歐國家的工業類似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部分原因。浪費、低效、人浮於事、官僚機構膨脹、生產率低下以及腐敗等現象成為中國工業領域的頑疾。為了增加重工業投資，不惜以犧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代價擴大積累的比例。長期不重視貿易、服務業和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勞動階級缺乏生產積極性。雖然在毛政權的最後十年(除了多災多難的1976年)，工業產量以年均10%的速度遞增，但這種增長速度卻是以忽視產品質量為代價，依靠國家不斷加大對現代工業經濟的投資維持的。積累率(即限制消費而用於擴大再生產的投資比例)從1960年代初期的23%增加到1970年代初期的33%，1978年竟然達到了36.7%的高峰值。[8] 在毛時代，國家資金主要用於支持重工業的發展，用於發展農業的投資只有12%，用於消費品工業發展的資金僅僅有5%。[9] 這些政策雖然有助於保持非常高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但抑制了消費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技術落後也加劇了工業中存在的問題。自力更生的政策限制(但不是完全阻止)了接受國外的先進技術，文化大革命又使高等教育和基礎研究受到損害，打擊了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因此，在毛政權的最後年代，1950年代建立，技術已經過了時的工廠得不到及時更新改良，科學家和技術力量嚴重不足。

然而，儘管有這些失誤和挫折，歷史的必然結論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代。1950年代初期，中國從較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基礎起步，到毛時代結束時，長期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

已經躋身於世界前六大工業國家之列。從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中，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了五倍，從600億元增加到3000億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為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1978年達到440。[10] 在毛時代的最後20年，即1957年到1975年（毛的繼承者對這一時期評價最低），即使把大躍進造成的損失也考慮在內，在這個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裏，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了63%，總量翻了一番多。[11]

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那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後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範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12] 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13] 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麼「蝸牛速度」。[14]

考慮到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條件下、在極其弱小的工業基礎上通過中國人民的自力更生實現的，這樣的成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除了蘇聯在1950年代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援助（中國在1960年代中期就還清了這筆費用，包括利息在內）外，毛的工業化是在完全沒有外國貸款和投資的條件下進行的。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國還處於一個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陷於孤立狀態，奉行的是神聖的「自力更生」原則。在毛時代結束時，中國既無外債，國內又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獨一無二的。

儘管現在談論毛澤東時代的成就會受到非議，但是，歷史事實說明，毛的政權在使中國實現工業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種進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國內和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沒有毛時代的工業革命，後毛時代舉世矚目的經濟改革就無從進行。

對中國人民來說，毛的工業革命要求他們進行艱苦的勞動和自我犧牲，正如日本和俄國工業化早期的情況。由於國家把大部分剩餘產品都用於擴大現代工業部門的發展，人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很低。簡

單地說，國家通過剝奪它統治的人民、特別是農民，建立重工業基地，支撐日益龐大的統治官僚機構。但是，情況決非像某些市場經濟的熱心擁護者所說的，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在毛的工業化年代沒有任何改善。誠然，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增長，但為此付出艱辛勞動的人民群眾的收入沒有獲得相應增長。由於沒有及時實行有效的計劃生育政策，新增國民收入的一部分被用於迅速增長的人口，但大部分社會剩餘產品流入國庫（從這裏轉向現代工業部門和官僚機構），在毛政權的後20年時間，只有很少部分用於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收入。在毛時代後期，國家職工、包括全民所有制工廠的工人的收入有明顯增長，1957年後，佔勞動人口總數75%的農民的收入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15] 但是，一些對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至關重要的成就，很難用經濟統計的數字體現。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毛時代，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的發展，學校數量大幅度增加，人民受教育的機會普遍增加。大規模的文化掃盲運動成就顯著。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相對普及的醫療衛生體系。在毛領導下的四分之一多世紀裏，中國的人均壽命增加了近一倍，從1949年前的35歲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65歲，這些成就，是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絕大多數人民帶來的物質和社會利益的最有力的證據。

偉大的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H. Carr）在結束他宏偉的多卷本蘇聯歷史著作時曾警告說：「危險並不在於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於我們企圖完全忘卻並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16]

卡爾的話值得研究當代中國歷史以及蘇聯歷史的學者深思，因為革命本身很難有助於自己獲得公允的評價。最典型的是，巨大的社會動盪喚起了巨大的難以實現的期望，當希望破滅後，接踵而至的必然是長時間的幻滅感和虛無主義情緒，而革命取得的實際歷史成就則被忽視或遺忘。只是在革命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成為遙遠的過去——通常需要幾代人的時間——之後，革命的歷史畫面才會真實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正是毛時代的污點、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深深地留在當代的政治意識和歷史意識之中，人們不能夠也不應

該忘記這些事件的巨大失誤及其帶給人的生命代價。但是，未來的歷史學家在看到這些污點和罪行的同時，無疑會把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無論他們對此作出的其它評價是什麼)作為世界歷史上最宏偉的現代化篇章，作為中國人民獲得了巨大的社會和個人的利益的歷史階段。

*　*　*

比較毛澤東作為一個現代化奠基者的歷史地位來說，他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創始人的形象(或失色的形象)更加複雜。如果說毛主義為中國現代工業革命的奠定了基礎，那麼，它是否實現了對中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個曾一度大力宣揚的、至今尚有許多人肯定的看法——特別那些在今天認為後毛時代的中國是放棄了「社會主義」才走向市場經濟的人。此外，曾備受推崇的毛主義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又產生了什麼樣的社會結果?

無論人們如何寬廣地定義「現代化進程」這一概念，都不應該簡單地把毛時代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變革理解為這一進程的翻版。現代化畢竟不是以廢除私有制為標誌的。在1949年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後，在短短幾年時間裏，就徹底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公有制構成了中國社會的根本特徵。到1956年，城市經濟中殘留的私有成分實現了國有化，農村經濟實行了集體化。如果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以及「按勞分配」的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當時北京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這樣定義社會主義的，那麼，中國早在毛時代初期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了。1956年，當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中國領導人慶祝社會主義改造勝利之際，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與蘇聯沒差到那裏。

和蘇聯的情況一樣，中國在實行了國有化和集體化的同時，開始全力以赴地實行工業化，而工業化當然是現代化概念的本質。但是，完全在國家領導下進行的人民共和國的工業發展，最初只是被當做實現社會主義目的的手段，工業化本身不是目的。蘇聯和中國的共產黨政權都是把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工業化放在同步進行，放棄了(以不同

的方式)社會主義必須以工業資本主義為前提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教條。但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毛的中國比蘇聯在許多方面更加積極。毛與列寧和斯大林不同，他不願意把社會主義的未來單純寄希望於非人的現代技術力量上。毛主義要求，經濟發展不能脱離對社會關係和人的思想進行根本變革的進程(實際上以此為前提)。毛告誡説，在建設馬克思所説的物質前提的過程中，必須創造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和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毛否定了生產力會自動地保證共產主義的實現這種簡單的蘇聯教條，他認為，在此時此地，就應該實踐現代經濟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統一。毛主義的新理論是，新社會以新人為前提，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社會主義新人與建立社會主義技術基礎同樣重要。因此，毛認為，不能單純以經濟發展水平來衡量社會主義的發展，而要以是否縮小了「三大差別」來衡量，即是否朝著經典馬克思主義提出的縮小長期存在的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工人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的差別的目標前進。

然而，毛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意圖(雖然在許多方面引人注目)，最終為毛的現代化目標與他的社會主義雄心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吞噬。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只有建立在資本主義提供的物質和社會基礎上才能取得成功，毛的實踐為支持這一理論提供了新的歷史證據。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工業化有自己內在的規則，它產生了與社會主義理想不相容的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還出現了官僚和技術精英集團。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為了工業化城市的利益而剝奪農村。經濟理性和官僚專業化的工業價值觀念支配社會的準則，而工業化為之服務的社會主義目標反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與蘇聯的情況相比，毛主義的政策緩和了社會不平等現象，但不可能阻止這種趨勢的發展。工業化要求不斷增加勞動的專業化分工，但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別的國家，專業化分工只會擴大而不會縮小「三大差別」，它不會因為毛主義的理論主張或意圖而改變。[17]縮小城鄉差別是毛主義最重要的目標之一，但在毛時代，無論是從相對量還是絕對量來看，中國城鄉實際的經濟差別越來越大。從1952年到1975年，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水平從62元增加到124元人民幣(按照現在的價格)，而非農業人口的人均消費水平從148元增加到324元人民幣。[18]

毛的社會主義事業中存在著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即共產黨國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矛盾。1949年革命勝利後的一個明顯結果，建立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和一個日益龐大的官僚體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説(雖然與斯大林主義的邏輯一致)，中國越來越「社會主義」，國家卻越來越居於統治地位。由於沒收了有產階級的財產，實現了工業的國有化和農業的集體化，國家不僅成為社會的政治主人，而且成為它唯一的經濟主人。雖然毛主義的理論家推崇群眾的自發性和創造性，但毛主義的國家機器卻日益脱離它所統治的社會，國家的官僚機器日益膨脹，越來越異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分裂越來越明顯，社會匍匐在國家腳下。面對政治權力任意支配社會權力的弊端，除了讓人民對號稱是人民意志化身的領袖人物頂禮膜拜外，毛主義並無良策。對毛的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社會權力異化為政治權力崇拜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到頭來，所有屹立著的毛雕像都成為巨大政治失敗的奇異象徵。

毛時代雖然為社會主義創造了一定的社會經濟前提，但它決不是一個為社會主義創造了根本政治前提的時代。社會主義不僅僅意味著消滅私有制和建立國有化的工業。社會主義意味著——如果它有真正的含義——這樣一種制度：政治權力由全體勞動群眾行使；允許生產者自己控制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徵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馬克思説的「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所有制」。毛時代常常求助於「無產階級專政」來論證政治專制的合法性，但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產階級專政是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裏，被國家篡奪了的社會權力全部歸還給社會，國家轉變為馬克思稱之為「生產者的自治政府」。在毛的中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沒有這些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概念。毛主義是一種在面臨(儘管它沒有解決)協調現代經濟發展手段與社會主義目標的矛盾中產生的理論，但毛主義始終未能認識到，普遍的民主既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手段，又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之一。

在毛時代，曾經有兩個重要的時期，明確地提出並試圖解決共產黨國家與中國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在雙百運動中，毛本人主動提出了「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問題，而運動本身就要求實行政治

民主和思想自由。但在隨後的反右鬥爭中，這些要求受到壓制。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依然沒有解決。文化大革命對黨和國家官僚是一次全面的衝擊，最初曾允諾要按照馬克思巴黎公社的原則對政治權力進行民主改造，但這一期望很快就化為泡影，文化大革命以列寧主義政黨的全面恢復統治而告終。毛澤東發動了雙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所以他要對未能實踐允諾，未能將國家從社會的主人變為社會的僕人負上主要責任——還要對這兩場失敗的運動所造成的人類痛苦負責。

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許多年中，毛主義者把蘇聯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面教員」，但是他們卻未能從蘇聯的歷史經驗中汲取最顯而易見的教訓：沒有自由和普遍的民主，就不可能「向社會主義過渡」，不可能永遠把落後的經濟條件和敵意的國際環境作為不實現這些權利的藉口。在可預見的未來歷史，「國家自行消亡」的馬克思舊夢不過是烏托邦希望，但是，中國人民享受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樣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的要求，決不是烏托邦式的要求。沒有回應這類並不過分的索求，無論怎樣高喊「社會主義民主」一類的口號，都不過是為了使國家能繼續操控社會而提出的空洞借口。在毛時代，卻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的訴求得到一絲的曙光。

* * *

因此，毛澤東留給他的繼承人的是一份複雜而矛盾的遺產，它的標誌是毛政權取得了進步的社會經濟成就與其倒退的政治特徵之間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如鄧小平所說，毛「締造了國家」，在人民共和國創建初期，完成了國民黨失敗的資產階級革命遺留下來的任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創造了部分前提條件，開始了中國的工業化革命，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創造了雖不充分但卻是必要的條件，保持著對社會主義未來的信念(在革命勝利後，這種信念持續的時間比一般預期的要長得多)。另一方面，毛主義又保留了斯大林官僚政治統治的基本方式，製造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和新的正統觀念與教條，鎮壓所有思想和政治上的不同政見者。誠然，毛澤東把共產黨官僚政治

看作是巨大的弊端，但他能夠採取來遏制自己創造出來的官僚體制，唯一措施，是依靠自己的個人聲望和個人力量。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毛的遺產都沒有包括反對官僚統治的體制保證。

所以，在毛時代終結時，中國處在一個由官僚支配社會的歷史迷霧王國裏，它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由於缺乏一個更好的詞來形容，故且稱中國為「後資本主義」或簡單地稱為「後革命社會」。毛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它已經廢除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即廢除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它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勞動群眾，即工農大眾，沒有權力支配產品和他們的生產條件，也沒有支配國家的手段，國家作為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管理者，日益淩駕於勞動群眾之上。毛政權成功地完成了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但它沒有能夠實現它宣稱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在毛時代結束之際，中國彷彿

徘徊在兩個世界之間，
一個已經死亡，
另一個又無力誕生。[19]

如果毛澤東和毛主義的生存時間能夠再長一些，那麼，不是沒有可能打破這種困境，社會主義也不是沒有可能興旺發達。然而，在毛去世以前，毛主義就已經耗盡了它曾有過的巨大創造力。毛主義發展現代工業的方式是剝削農村，如果不使農民貧困化，這種方式就難以為繼，而農民曾是共產黨力量的主要源泉。毛發動的最後一場群眾運動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沒有實現其聲稱的目標，留下的只是潰散後對政治冷漠的人民，冷漠之後是虛無，一個厭倦了的民族冷眼旁觀1970年代發生在上層的拜占庭式的政治鬥爭和宮庭陰謀，這些鬥爭和陰謀沾污了毛時代政治歷史的最後篇章。面對這些普遍的政治不滿和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毛主義已無力再提供有效的補救措施。一個逐漸玩世不恭、對政治冷漠的民族，已很難再為陳舊的革命口號和思想說教所打動。在毛時代的最後歲月，中國需要一條新的道路，但是，日益衰老的毛澤東和教條化了的毛主義，已經沒有能力為革命的振興提供所需要的理論和動力了。

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毛主義為自身的滅亡播下了種子。被奉為指導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形成於世界上最落後的國家裏的最落後的農村地區，正是在毛主義的旗幟下，農民組織起來進行了一場最偉大的革命。在取得政治成功後，勝利的革命者在他們統治的這片廣闊土地上，開始了現代化和社會主義建設。作為現代化者，他們取得了許多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考慮到他們所面臨的任務是如此艱辛和巨大。他們創造了一個現代的國家，建立了一套現代教育體制，開始了中國發展現代工業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進程。

但是，毛主義的政治手段和意識形態，依然是它所形成的那種落後環境的許多特徵的反映。歲月流逝，越來越多的新一代中國人遠離那曾經孕育了革命和老一代領導人思維方式的原始農村環境。毛主義的手段和思維方式越來越不適合現代化中的中國的時代需要。毛主義的許多方面，依然留有它極力要克服的落後胎記。毛的政權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是成功的，但它與現代化中的中國環境越來越不協調。因此，在人民共和國創始人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中，毛的繼承人早晚將不可避免地拋棄最典型的「毛主義」的許多內容。

註 釋

1. 馬洪、孫尚清主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卷(北京，1981年)，頁25–26。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3。
2. 郭益耀(Y.Y. Kueh)，〈毛的遺產與中國新工業戰略〉("The Maoist Legacy and China's New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中國季刊》1989年9月第119期，頁421；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1。其他統計方式表明，工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的比例從30%上升到72%，參見馬洪、孫尚清主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第1卷，頁25–26。
3. 郭益耀，《毛的遺產與中國新工業戰略》，頁421。
4. 資料源引自美國中央情報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手冊》；美國商業部，《中國經濟與外貿展望》(*The Chinese Economy and Foreign Trade Perspectives*, Washington, D.C.,1977)；國會經濟聯席委員會，《中國：經濟評估》(*Chin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 Washington, D.C., 1975)，賽爾登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獻材料》(*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表13、14，頁135–136。

5. K.C. 葉 (K.C. Yeh)，〈中國經濟在調整時期的宏觀變化〉(“Macr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hinese Economy During the Readjustment”)，《中國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表2，頁716。
6. 童大林 (Tong Dalin)、胡平 (Hu Ping)，〈科學技術〉(“Science and Technology”)，於光遠 (Yu Guangyuan) 主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4)，頁644。
7. 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3。
8. 董輔礽 (Dong Fureng)：《論中國發展中的積累與消費關係》(“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s Development”)，提交於1980年11月21–24日在威斯康星召開的「美中經濟戰略選擇」學術年會論文，頁26。轉引自瑞斯金 (Carl Riskin)，《中國的政治經濟：1949年後發展的探討》(*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頁271。
9. 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表3–7，頁130。
10. 前揭書，表1.1，頁2。
11. 前揭書。
12. 顧志耐 (Simon Kuznets)，《各國經濟增長：總產值與生產結構》(*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表4，頁38–39。
13. 羅茲曼 (Gilbert Rozman)，《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81)，表10.2，頁350。
14. 這一詞常被用來形容毛時代的經濟史，例如伯恩斯 (John Burns) 在1985年3月31日《紐約時報》E版的文章。
15. 已有的關於集體分配收入的資料表明，在毛時代最後20年人均收入明顯增長。但是考慮到其他事實，特別是1966年後對自留地和自由市場的種種限制，多數研究者同意拉迪的以下結論：「從1956、57年到1977年，農村的實際人均收入增長十分緩慢。」有關判斷事實真偽的難度，參見拉迪：《中國現代經濟中的農業》，頁160–163。
16. 引自塔裏克・阿里 (Tariq Ali)，《斯大林主義的遺產：對二十世紀世界政

治的影響》(*The Stalinist Legacy: Its Impact on Twentieth-Century World Politic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 Penguin Books，1984)，頁9。

17. 有關毛對勞動分工的觀點，參見邁斯納，《馬克思、毛澤東和鄧小平論歷史上的勞動分工》("Marx, Mao and Deng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History")，載德力克與邁斯納主編，《馬克思與中國經驗》(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monk, New York: M.E. Sharpe, 1989)，頁79–116。
18.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1949年後發展的探討》，表10.8，頁241。
19. 亞諾德(Matthew Arnold)，〈甜釀之詩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 Chartreuse")，阿駱特(Kenneth Allott)編，《馬修・亞諾德詩集》(*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s, 1965)，頁288。

第二十二章

鄧小平的復出
與對毛主義的批判

後毛時代是在毛主義的外衣下開始的。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在領導「一舉粉碎四人幫」後，[1] 立即就任了中國共產黨的新主席。據說這是毛澤東生前在病床上作的「安排」，這也是華國鋒繼任主席的唯一合法性根據。官方輿論反覆宣傳病危的毛給華的一個便條，上面筆跡潦草地寫著「你辦事，我放心」幾個字。在短暫的任期內，華國鋒在政治風格和個人外表方面，都極力模仿他的前任。華的畫像與已故主席的畫像並列地懸掛在所有的公共場所中。新領導人耗鉅資在天安門廣場建了毛的紀念堂，毛的防腐遺體被放置在水晶棺內，永久安放在紀念堂中，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瞻仰毛主席的遺容」。

為了表明毛經濟政策的連續性，華主持召開了一系列關於農業工作的會議——華正是在1955–1956年的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中」嶄露頭角的。農村工作會議是在「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進行的，大寨大隊是毛樹立的一個平均主義和自力更生的典型。1977年初，華以及其他毛主義者匆忙地作出了一個保證：「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的政治對手不久就給這一誓言的倡導者起了一個「凡是」派的稱呼。

但是，華國鋒是有選擇地遵循已故主席的「指示」的。在毛主義精緻的政治外表下，華緩慢而又謹慎地開始放棄毛時代晚期的政策，逐漸返回到1950年代的毛主義。首先改變的是文化教育政策，這是如今身陷囹圄的四人幫影響最大的領域。在恢復了毛的「百花齊放」政策後，新政權放棄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蒙昧主義政策，被禁演的戲劇、

歌劇和電影重新出現在舞台和銀幕上，1966年後停刊的文學和學術期刊重新出版，越來越多的新雜誌問世。文化解凍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出現了一大批年輕作家寫的短篇小說，描寫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經歷，因此被稱為「傷痕文學」。借助於毛曾提倡的「洋為中用」的口號，政府開始促進與國外的文化交流，出版了一批新譯的西方文學名著，逐漸消除了在過去十多年窒息著藝術生活的對外國「資產階級」毒害的偏見和恐懼。文化大革命中和之前被關押和被送到偏遠農村勞改的知識分子或保持沉默的知識分子，在1977–1978年悄然恢復了名譽，重新返回城市工作崗位。

除了文化解放外，政府還採取了新的教育政策，更確切地說，恢復了舊的教育政策。華在講話中雖然還繼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但他開始取消動亂中實行的平均主義的教育改革，逐漸全面恢復了1950年代的精英教育體制。政府特別重視大專院校和高等研究機構的恢復和發展，其規模和水平很快便達到了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新的文化和教育政策旨在贏得知識分子對華政權和「四個現代化」的支持，在新制定的黨章和憲法中，都莊嚴地寫上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但是，由於華國鋒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還披著毛主義的外衣，因此，他在政治上缺乏支持者。不過，他的政策確實使城市知識分子恢復了元氣，其中大多數人懷有反毛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不久便釋放了出來。

華政府努力緩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1977年10月1日，在建國28週年之際，國營企業工人的工資增加了10%，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實行更加嚴格的「科學管理」和勞動紀律的補償。在理論上，毛的大寨還是學習的榜樣，但在實踐中，國家新的農業政策允許農民擴大家庭自留地，生產農副產品，鼓勵農村集市貿易。

華國鋒試圖以一個經濟現代化者留名於人民共和國歷史。華的經濟政策點綴著大量的毛主義詞藻，他特別重視毛在大躍進前的著作中提出的經濟建設思想。周恩來的形象得到大力宣傳，以使現代化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但是華的經濟綱領主要依據於鄧小平在1975年為國務院起草的政策文件，當然，鄧的作用在當時是得不到承認的。1977年，鄧小平在兩年前就提出的建議得到實施，華政府大規模從先進的

資本主義國家引進現代技術，以出口煤炭和石油創匯支付費用。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培養科技人才的工作得到高度重視，為此，全面恢復了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教育體制。政府還制定了實現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綱要。工廠中實施的嚴格勞動紀律與給工人更多的物質獎勵的結合，使勞動生產率和工業生產迅速提高。

1950年代的經濟計劃者（在毛時代後期他們一直默默無聞）的復出，也反映了當時的發展趨勢。其中在政治上最著名的是陳雲，他是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的制定者之一，提倡用市場機制作為國家計劃的補充。

華國鋒在他的十年規劃（1976–1985）中——但只到1978年2月才公佈，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設想。這個規劃在大體上是國務院在1975年（在鄧小平的主持下）起草的文件的修訂版，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相似，其重點是強調大力發展重工業。規劃提出，到1985年，要建成120個左右的大型工業項目，其中包括龐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油氣田、煤礦、發電廠、鐵路和港口。[2]到2000年，華預言，中國的工業將接近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的水平。但是華沒有解釋如何籌措新工業化所需的龐大的資金，他也沒有提出如何解決毛時代留下來的比例失調及其他經濟問題。華的現代化規劃因為在財政上不可行而很快就被放棄了。

十年規劃的失誤是導致華在政治上倒台的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是受到人民擁護的鄧小平的權力日益增長。鄧小平在政治上第三次上台（第二次復出）後，決心將後毛澤東的時代變為後毛主義的時代。

鄧小平的勝利

鄧小平是著名的五四運動產生的一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最後一位重要成員。[3]早在1920年代初期，他就是黨的積極分子，他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作出的重要貢獻以及他作為毛派的成員，使他在新中國成立後身居要職。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和劉少奇一起，分別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政治報告（1949後的這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理論，在鄧小平時代又發揚光大），同年，他又

被任命為黨的總書記，直接控制著黨的組織機構，進一步加強了他與黨和軍隊領導人戰爭年代形成的密切關係。但在十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成了「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下放到遠離北京的江西省一個拖拉機廠勞動。1973年，在周恩來的保護下，經毛澤東同意，鄧小平回到北京，恢復了領導職務 —— 沒有按通常的慣例，要求他對過去政治錯誤作出坦白交待。不久，他就成了病危的周恩來總理的當然接班人 —— 但在周恩來去世後幾個月，就被作為「不肯改悔的走資派」、1976年4月天安門事件的煽動者再次打倒。[4]在毛政權最後陰霾的幾個月裏，由於四人幫的迫害，鄧小平到了南方，受到在軍隊的故交的保護。鄧小平有著堅強的政治意志，據說，為了重返北京，72歲的鄧小平曾考慮如果必要的話，不惜訴諸內戰。[5]但是，1976年9月毛澤東的逝世和10月「粉碎四人幫」，為鄧小平的第二次政治復出鋪平了道路。

鄧小平回到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層，不久便獨攬大權，成為中國事實上的「最高領袖」，已經沒有必要維持與四人幫鬥爭時形成的政治聯盟，這一不穩定的聯盟是由華國鋒領導的。華領導了1976年10月的政變，成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正式成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兩人的接班人。導致鄧小平權力上升和華國鋒逐漸失勢的進程持續了兩年，鄧小平熟練而無情地操縱著這一進程，沒有引起他不願意看到但有可能發生的「大規模動亂」的政治和社會鬥爭。

鄧小平的成功不僅有賴於他的個性和高超的政治技巧，他得到了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的擁護，其中許多人是他的多年故交，同樣重要的是，他得到了軍隊將領的廣泛支持，這得益於他在革命戰爭年代與紅軍建立起來的密切連繫。鄧小平堅決主張共產黨要堅持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強調提拔幹部要「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不能坐「直升飛機」。鄧的觀點迎合了黨和軍隊老幹部的思想及其既得利益。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和後果之後，恢復官僚秩序和社會穩定對黨政軍各界領導人有著特殊的吸引力，他們越來越把鄧小平視為當然的領袖。

除了老幹部和軍隊將領等高層官僚的支持外，鄧還得到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擁護。自從黨的八大以來，鄧一直是知識分子社會利益的維護者。[6]在1975年起草的國務院文件中，鄧特別強調知識分子在實現

四個現代化中的特殊重要作用，提出要給知識分子更高的待遇和更大的專業自主權。因此，許多知識分子認為鄧是受人尊敬的周恩來的合法繼承人。

鄧小平的政治抱負是建立在強有力的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支持的基礎上。但是，鄧的政治聯盟的動力來自文化大革命——來自幸存的受害者要求伸張正義和復仇的強烈情感。鄧本人就是動亂的受害者之一，而且兩次受害，這使他贏得成百上千萬過去十年的受害者的同情和支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羞辱和被「打倒」的黨員幹部、沉默和受到迫害的知識分子、被毛變幻的政治路線出賣的「迷失的一代」的往昔的紅衛兵、數百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以及更多的遭受不同形式的肉體和精神迫害的普通群眾，所有這些人都寄望於鄧能夠「撥亂反正」。

*　*　*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鄧擁有巨大的政治資本，而華則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包袱；鄧得到了中國最有權勢的軍隊和黨政官僚機構領導人的支持，而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躍居上高位，支持他的只是官僚機構的下層官員——這些人是動亂的受益者，多數是由基層幹部組成的烏合之眾；鄧要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因而贏得人們普遍的支持，至少是在城市裏如是；而華既沒有在官僚機構中的真正權力基礎，又缺乏社會的普遍支持。實際上，華在毛去世後，恰恰是因為缺乏權力和聲望，方成為能被不同利益集團的官僚派別接受的領導人，並在華的統領下，粉碎了可能對官僚集團利益構成威脅的四人幫。他雖然接替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位置，但他既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缺乏擔任這兩個職務的才幹。為了保住他幸運地得到的最高領導職務，他只能依靠維護毛的權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但在此時，毛的光環已經褪色，人們對文化大革命開始進行公開的批判。晚年毛澤東的遺產，是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根據，也是令他進退維谷的根源，在後毛時代，沒有這份遺產，他失去掌權的合法性，執著於這份遺產，他又不可能繼續掌權。

華國鋒本人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誤也加速了他在政治垮台。直到1976年12月底，他還不識時務地堅持開展最初由四人幫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運動，而這場運動在當時已明顯地成為時代錯誤。在粉碎四人幫後，他開始清查所謂四人幫的「隱藏的追隨者」，因此，削弱了自己在黨政官僚機構中的基礎。華的「百花齊放」政策，幫助了在城市裏強大的反毛主義（親鄧）輿論的出現。因為不切實際而放棄的十年發展規劃，暴露了他的無能。他本人平庸的個性和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與他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毫不相稱。因此，他沒有能力抵抗黨內領導層和日益強大的公眾輿論讓鄧小平復出的要求。1977年夏季，鄧小平正式恢復了他在1976年4月第二次被打倒前擔任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不久，他又與華和國防部長葉劍英一起，成為中國三位最高領導人之一。

一旦躍居權力中心後，鄧小平就不再願意與華國鋒分享權力，這毫不令人奇怪。鄧不會忘記，正是在自己受到批判和打擊的文化大革命中，華被提拔到中央領導層。現在，鄧決心要捍衛自己的最高權力地位。在「安定團結」的表面文章下，鄧式風格的「實踐派」打著雖然迂腐但政治上管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旗號，與華領導的被譏諷為「凡是派」在政治局內展開了新的角逐。

1978年，鄧小平的權力和威望不斷提高，對官僚機構內「極左分子」的持續清洗，為鄧的新老政治盟友騰出了位置。他許諾為知識分子提供更多的物質利益和更高的社會地位，解除對他們政治上的懷疑，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給知識分子在專業上更大的自主權、在現代化高等教育體系中更大的發言權，從而成功地贏得了知識分子的支持。[7]他還表示要實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民主化。

1950年代曾擔任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又先後回到領導崗位，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毛的許多政治對手也都陸續被「平反」，老幹部的行列越來越壯大，信心也大增，這進一步加強了鄧小平的權力。獲得平反的還有自1957年反右鬥爭後被關押或在政治上被打倒的十萬名政治犯，他們中有知識分子、黨的幹部及其他類型的人。[8] 1978年，他們被悄然解放出來。沒有人公開指責鄧小平就是1957年反右鬥爭的主要領導人。

在1978年「撥亂反正」中，最有政治意義的是黨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公開平反。這一事件當時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成為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第二次剝奪他的權力的藉口。但是在1978年秋季，當時下令民兵進入天安門廣場鎮壓的北京市長吳德被解除了職務，天安門事件成了「革命事件」。官方媒體現在大力宣揚兩年半前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英雄主義精神。在黨的兩次結論之間的時間裏，天安門事件作為人民要求民主、反對專制的反映，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由年輕的不同政見者在1976年發起的備受尊崇的「四五運動」，在1978年初以大字報的形式再次出現在北京的街頭。青年活動家們(多數是過去的紅衛兵和青年工人)呼籲「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黨對天安門事件平反一事使他們的行列迅速壯大。鄧小平及其盟友對他們的明顯支持使他們深受鼓舞。1978年下半年，他們在北京市中心的街道上多次舉行政治集會。一些大字報對毛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尖銳的批判，要求清除還在政治局中「毛主義者」，要求人權、社會主義法制和民主政治體制。這是一個令人振奮和充滿希望的時期。

*　*　*

民主運動(人們後來這樣稱呼)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如火如荼發展之際，在俯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裏，黨的領導人正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準備，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22日舉行。這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次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

三中全會是鄧小平和「實踐派」的一次決定性(即使不是全面的)的勝利。一大批鄧的支持者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使鄧能有效地控制這兩個機構，進而控制全黨。「凡是派」的大多數成員雖然還暫時保留著黨內的正式職務，但他們原來負責的政治和經濟工作已轉手他人。1978年12月三中全會上華國鋒依然是黨主席，但他除了這一頭銜外已沒有了實權。在全會上，華被迫作了「自我批評」，此後，他所作的只是在鄧小平的指示下履行儀式上的職能，直到1981年，在放棄權力的三年後，他又不得不放棄了黨主席的頭銜。

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決定是「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社會主義現代化不是一個新名詞，但卻有了新的含義。簡單地説，就是所有的工作都要服從現代經濟發展的任務。相應地，中共中央作出了結束階級鬥爭的決策，或至少是結束「急風暴雨」的「群眾」鬥爭，希望從此建立一個有利於四個現代化建設的社會和政治穩定局面。全會還提出了把「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相結合的方針。這樣，就為資本主義式的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據，這種改革成了鄧小平時代的主旋律。

* * *

繼在北京的三中全會的勝利之後，鄧小平於1979年1月成功到美國進行訪問，這次訪問標誌著在人民共和國成立30年後，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七年前，毛澤東和周恩來(與尼克松和基辛格一起)，開創了務實政治外交，鄧小平成為這一政策的政治受益人，中美建交進一步增加了鄧小平在國內外的聲望。不過，令人不敢恭維的是鄧小平傲慢地威脅説要「給越南一個教訓」。2月17日，在鄧訪美回國不久，中國軍隊侵入越南。動武的藉口是越南侵佔柬埔寨，推翻了中國支持的殘暴的波爾布特政權。經過幾星期血腥的但沒有取得預期結果的戰鬥後，中國軍隊撤出了越南。中國對越戰爭給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損害了鄧新政權在國際上的形象，這場入侵的唯一教訓是發現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能力大幅度下降。[9]

1978–1981年的民主運動

鄧小平很快發現，除了越南以外，他在國內也有敵人。曾在1978年下半年幫助鄧小平鞏固權力的民主運動，其人數和號召力在1979年上半年迅速增長。民運中的許多成員是已近30歲或30歲出頭的從前的紅衛兵，他們是「失落的一代」中堅持自我教育的成員，從事的職業三教九流。民運基本上沒有學生參加，老知識分子也沒有參加這場運動或公開對運動表示支持。然而，在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

主義法制」的鼓舞下，年輕的活動家們表現出非凡的思想號召力和組織能力，他們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準政治社團，出版了越來越多的涉及內容廣泛的刊物。民主運動迅速從北京擴大到其它大城市和省會城市。

1978年，雖然民主運動的多數成員支持鄧小平的權力，在1979年初也還寄望於鄧開始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但後毛政權的主要列寧主義領導人並不打算鼓勵一場不受黨組織控制的民主運動。他們更不能容忍反映社會各界不滿情緒的獨立社會組織的存在，特別是在面臨數百萬沒有工作、怨氣沖天的下鄉知青非法返回城裏之際。與那些在當時的文化和思想解放中受益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不同，多數年輕的民運積極分子表現出不妥協的反權威精神，他們批評黨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否定黨在思想上絕對正確。一些人還重新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時的「極左」理論，認為中國被一個特權「官僚階級」所統治。

1979年春季，政府開始鎮壓民主運動，查禁了所有非官方的刊物，開始逮捕民運的領導人。魏京生是第一批被捕的人員之一，他是《探索》雜誌的主編，他對鄧小平和毛澤東都提出批評，是著名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這篇大字報的作者。除了政治和思想罪名外，他還被指控向外國記者提供解放軍對越作戰的軍事情報。實際上，魏京生是當時中國少數反對中國入侵越南的公民之一。1979年10月，經過一天的審判，魏京生被判處15年徒刑。在其後兩年裏，許多魏的支持者都被捕入獄。

已經牢牢地鞏固了自己「最高領導人」地位的鄧小平，在鎮壓過程中，譴責他昔日的民主盟友是無政府主義者，是罪犯，指責他們恢復了文化大革命邪惡的政治方式。相應地，鄧小平要求禁止「四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毛澤東的提議下，這四大自由曾被寫入1975年1月的國家憲法中。儘管憲法中的這些權利在實踐中很少得到遵守，但既使是紙面上的東西也令鄧小平如芒在背，聯想起文化大革命對黨的攻擊。[10] 即便是在黨為了證明要實行「社會主義民主化」、開始制定和頒佈新法律條文的1979年和1980年，官方宣佈，許多參加民主運動的活躍分子在政府的命令下被送到了勞改農場。

鄧小平用「四項基本原則」代替了毛澤東的「四大自由」，前者是「堅

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11] 鄧強調說，在這四項中，最重要的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事實證明這是唯一能堅持下去的原則。

到1981年春季，曾一度蓬勃發展的民主運動銷聲匿跡。民運的多數領導人被捕入獄，少數幸存者轉入地下活動，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實際上，這次民主運動並沒有得到群眾的普遍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後毛政權推行的社會生活非政治化政策的結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導致社會上普遍的虛無主義，在群眾中產生了思想和政治信仰危機，鄧小平政權不是靠提出新的社會和政治理想去填補真空，而是簡單地誘之以利，鼓勵群眾去百貨商店購置更多的新消費品，或是根據取代了革命口號的廣告牌去選擇自己需要的東西。大眾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漠然置之，更談不上舉行抗議。民主運動是國家鎮壓和民眾冷漠的雙重犧牲品。

* * *

在鎮壓下層民主運動的同時，鄧小平著手鞏固他在上層對黨和國家政權機構的控制。他有條不紊地撤換了領導層內所有被認為忠誠於毛的人，換上了自己信任的人。在1980年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凡是派」剩下的基本成員都被撤職，其中包括原8341部隊的負責人汪東興，正是這支部隊當時執行了逮捕四人幫的任務，以及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提拔到中央政治局的農民領袖陳永貴。文化大革命中被當成「右派」的黨的資深領導人取代了「左派」空出來的位置。最集中地反映當時潮流的是為劉少奇平反，中國共產黨隆重地舉行追悼會，恢復這位中國共產黨最出色的列寧主義者的黨籍，鄧小平在追悼會上致辭。文化大革命對劉少奇的清洗，被稱為「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

在政治上埋葬華國鋒是以一種彬彬有禮、但重實效的方式進行的。作為對華政治合作(以及團結象徵)的回報，在實際權力已經轉移到鄧小平手中後的幾年裏，華從毛澤東和周恩來繼承下來的頭銜還繼續保留著。不過，1980年9月，他被迫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一職，讓位

於鄧在同年1月提拔進中央政治局的趙紫陽。[12] 還是在1980年，鄧小平決定恢復中央書記處作為黨的領導機關，1950年代，鄧就是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因而也是黨的正式領導人)，毛後來廢除了這一機構。鄧任命胡耀邦擔任總書記，[13] 這樣，華本來就有名無實的黨主席職務，現在只剩了一個純粹的空名。1981年6月，華默默地辭去了徒有虛名的黨主席職務，在同一會議上，中共中央還對毛澤東作出了正式評價。一年後，華又離開了中央政治局，但在由348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上，保留了華中央委員的資格，這是留給毛澤東的第一位、也是十分平庸的接班人的榮譽位置。

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黨員人數已增加到4000萬人)正式確認了三中全會後建立的新政治秩序，鄧小平稱這次代表大會是1945年(當時確認了毛的領導權威)以來黨的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會。大會主要是批準了鄧的新經濟政策(下一章將討論這一問題)和黨的領導層的人事變動。胡耀邦繼續擔任黨的總書記，取消了已經顯得多餘的黨主席一職。大會非同尋常地強調要加強列寧式的中央集權組織結構和對黨員的紀律約束，認為黨的基層幹部中存在著不可忽視的「左」的傾向。「左」的概念更加寬泛，凡是對新政權的經濟改革政策持消極態度都是「左」的表現。雖然鄧小平寧可垂簾聽政，安排自己的門徒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但在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毫無疑問地(也沒有人敢提出質疑)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毛的問題與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詮釋

鄧小平要建立後毛時代的秩序，不僅需要清除左派對手，起用忠誠於他的幹部，還要破除對毛澤東的神話。幾乎與毛本人支配他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一樣，毛的幽靈也支配著新時代的政治意識。鄧小平政權主要領導人物都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過迫害，只有削弱發動清洗的已故主席的神人地位，鄧政權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證明了毛也不是一貫正確，那麼再放棄毛的政策和理論就相對容易得多了。

對毛澤東和毛時代重新作出評價，不僅是出於復仇的渴望或是權

力的實際需要，對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特別是知識分子和黨的官僚來說，這是一種告慰死難的朋友和同事的精神需要。它不僅表現為給死者「平反昭雪」，還要昭告世人，黨已從災難中吸取了歷史教訓，毛時代的災難將不會重演。毛曾預言，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但是，他的繼承人決心證明，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然而，對毛澤東的歷史作用進行嚴肅的評價，是一項非常棘手的政治事業，這不僅因為已故主席的形象在群眾心目中依然是神聖的，更重要的是，後毛時代的領導人，無論在思想和血統上，都與毛本人有著深深的淵源。不管他們個人對前主席懷有什麼樣的感情，如果歷史上沒有毛澤東，也就不可能有他們在政治上的今天。畢竟，毛既是中國革命的列寧，也是斯大林，雖然他的思想、政治實踐和個性與這兩位俄國領袖有很大的差別。像列寧一樣，毛被公認是中國革命和新社會的締造者；像斯大林一樣，他在四分之一的世紀裏是勝利後的國家最高的統治者。如果簡單地像赫魯曉夫在1956年對待斯大林那樣，譴責毛是暴君和篡位者，不僅會動搖共產黨國家的政治合法性，而且也會令產生這個國家的革命的道義合法性成為問題。赫魯曉夫在譴責斯大林時，可以借助於列寧的名義。但對毛的繼續人來說，除了毛本人外，中國沒有一個列寧。正是基於這種根本的政治和歷史原因，在1980年夏季起草對毛的評價的官方文件時，鄧小平說：「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14]

鄧的評價表明，黨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僅涉及到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而且事關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因為毛不僅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領袖，而且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愛國英雄。正如鄧小平說的，他締造了新中國，使長期受壓迫受欺侮的中國「在世界上站起來了」。此外，作為革命家和民族領袖，即使是在他去世後，他生前享有的巨大聲望也長久地留在人民群眾、特別是在農民心目中，千百萬農民依然把神話了的毛澤東作為崇拜的對象。在中國共產黨黨員中、特別是那些曾在毛的領導下在革命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中，在數百萬在文化大革命中響應毛的號召造反的青年積極分子中，毛也同樣備受尊崇。

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政治生活的這一基本事實。在一次很能反映他的政治實用主義的講話中，鄧在談到要對毛的功績作出「恰當的評價」時，警告說，否則的話，「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15] 在起草對毛進行評價的正式文件時，鄧的助手們認識到，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慎之又慎地進行這一工作。

早在1981年6月黨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正式評價之前很久一段時間，由於發生了一系列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事件及人們思想上的變化，毛的聲望就已經受到損害。雖然1978年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放棄了毛的許多觀點和政策，明確地開始了後毛主義的時代，但全會並沒有對毛或毛時代作出任何正式評價。實際上，全會閉幕後發表的公報還煞有介意地借助於毛的著作的權威，並且宣佈在未來「適當的時候」再對文化大革命作出評價。但是，全會確實號召全面「平反冤假錯案」，給許多毛的舊政治對手平反了，其中最具有政治意義的莫過於給彭德懷平反。毛於1959年打倒這位深得人心的元帥一事，被普遍認為是毛時代最大的冤案之一，在近二十年時間裏，許多人都要求糾正這一冤案。彭德懷於1974年含冤去世，但彭德懷案是中國政治生活中最令人難堪的瘡疤之一。根據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共中央於1978年12月25日為彭德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讚揚已故元帥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英雄，恢復了他在1959年以前的歷史地位。這種儀式具有重要的政治含義，因為，給彭德懷以如此殊榮，意味著毛並不是在任何時候上都是值得尊崇的。讚揚彭德懷，就是對大躍進運動的批評，彭正是因為堅決反對大躍進才受到清洗。

在三中全會以後的1979年，官方的出版物上出現了含蓄地批評毛的潮流，而民主運動的積極分子則在非官方的出版物和街頭的大字報中，公開地對毛提出批評。隨著大批在毛時代後期被打成「右派」和「走資派」的人的平反，以及那些被清洗的幹部和知識分子重新回到政治和文化生活，大城市中批評毛的輿論呼聲越來越高。被平反的著名人物包括保守的官僚彭真，他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個被打倒的黨的高層領導人。鄧安排彭真負責起草新的法律條文。在全黨開展的反對「極左思潮」的運動，促使對毛的批評不斷升級。「極左」一直是鄧小平時代主要

的(但不是唯一的)思想和政治異端。反對極左運動表面上是批判早就死去的林彪和關在監獄裏的四人幫，實質是針對毛統治的最後20年中普遍的極左現象。一大批學者和黨的理論家提出了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根源。[16] 1979年10月，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元帥在紀念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發表的講話，給批判極左和毛的晚年時代進一步提供了政治動力。在這篇事先經過中共中央批準的講話裏，葉劍英把大躍進災難的原因歸結為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的「左傾錯誤」，譴責文化大革命是那些實行「極左路線」的人帶給中國的長達十年(1966–1976)的一場災難。[17]按照當時官方流行的政治提法，葉劍英把罪責歸因於林彪和四人幫，但是，很顯然，其他人也要對文化大革命負責，毛澤東要承擔主要責任。

官方在1979年和1980年對毛主義進行批判時，一直沒有點毛澤東本人的名字。實際上，在涉及其他政治或政策性事務時，出於權宜政治的考慮，官方還常常有選擇地引用毛的著作以增加權威性。但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越來越嚴厲，「個人崇拜」這一術語當時在中國與25年前在蘇聯反斯大林主義時一樣，是一種委婉的提法。官方為克服「個人崇拜」、有時也稱為「現代迷信」造成的惡果而採取的措施，是堅持「黨內民主」和「集體領導」，雖然這些大力宣傳的原則並沒有影響到權力完全集中在鄧小平手中。不過，「集體領導」的精神在官方對「毛澤東思想」重新定義時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刪去了毛澤東思想中激進的內容後，毛澤東思想現在變成了全黨智慧的結晶，而不單是毛個人的創造。中國共產黨60年的歷史也作了相應的修改，強調在毛時代歷史教科書中被忽視了的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貢獻。到1980年代中期，雖然有關毛本人的歷史地位還有待於公開作出結論，但已故主席最後20年的統治已經成為公開批判研究的對象。

1980年11月，在四人幫被捕後的四年，為了降低毛在群眾中的聲望，新政府開始對四人幫進行審判，審判情況由電視轉播。在兩個月的時間裏，四人幫和毛過去的秘書陳伯達，在北京公安部的一所建築裏，接受由35名法官組成的特別法庭的審判。另一個特別軍事法庭同時開始審判與林彪1971年反毛陰謀有牽連的五名解放軍將軍，兩個審判之間的關係沒有明確的界定。長長的起訴書列舉了48條罪狀，包括

陰謀推翻政府、企圖謀害毛澤東、非法拘押、逼供信以及對70萬人進行迫害，導致其中3.4萬人死亡等。[18]雖然這次大張旗鼓的審判是依據新頒佈的現代法律條文進行的，但審判當然是政治性的。法官與其說是聽命於法律，不如說是按中央政治局的旨意行事。從開始審判到最後判決，中央政治局自始至終指揮著審判的每一個細節。

對外國觀察家來說，對四人幫的審判並不足以令人信服鄧小平政權已經接受了國際公認的法律準則，實際上，這種審判不禁令人想起斯大林式的作戲審判，但審判卻達到了它所期望的國內政治目的。高度公開的審判本身，就是對毛時代最後十年政治生活的有力批判。電視在晚間播出了有選擇的一些證人出庭的審判片斷，他們詳盡地控訴了文化大革命中酷刑和死亡的恐怖事件。對那些在現在被稱為四人幫「封建法西斯」統治下受過迫害的城市知識分子和工人來說，能夠目睹戴著手銬的江青和其他人被關進鐵牢，接受審判，正應了「因果報應」，憤恨情緒得到發洩。對鄧小平和他的同僚來說，審判不僅是一樁令人快慰的政治復仇行為，而且有助於繼續在黨政軍官僚機構中清除「極左分子」。北京的公審是一個榜樣，各省市也先後對「四人幫的追隨者」進行了一系列的審判。但是，這種大張旗鼓的審判的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是要提出毛澤東在這些事件中——他的妻子和一度的同志因為這些事件而被指控犯罪——的歷史作用問題。

當然，從審判四人幫一開始，毛澤東就是不言而喻的被告。在審判過程中，桀驁不馴的江青一直利用他已故丈夫的權威來為自己辯護，無意中(但可以預料到地)在政治上正中鄧小平的下懷。在一次申辯中，江青甚至說道：「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讓我咬誰我就咬誰。」在審判長宣讀的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最後陳述中，說中國人民「十分清楚，對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難，毛主席負有責任。」[19]

但是，鄧小平的目的不是要在歷史上把毛與四人幫一視同仁，他恰恰是要通過把毛與四人幫區別開以挽救歷史上的毛，作為像普通人一樣也可能犯錯誤的毛得到了挽救，但毛的歷史地位和思想權威卻受到了損害。除了把毛與四人幫區別開以外，鄧在1980年夏天還提出，要把「政治錯誤」與「犯罪行為」區別開。在審判四人幫前後，官方報刊都採用了這種提法，反覆強調「毛澤東的錯誤與林彪、江青及其同夥的

罪行是有原則區別的」。[20]按照這種從歷史的角度來説是模糊的區別，由黨控制的法庭對四人幫進行了有罪判決，五個月後，黨又公佈了對毛作的正式歷史評價。

關於毛澤東評價的決議

1981年6月27日，在接受華國鋒辭去黨主席後的第二天，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早在人們預期之中的對毛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的正式評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文件準備時間長達15個月。據説有4000名黨的領導人參加了文件的起草工作，並按照鄧小平提出的具體「建議」反覆進行了修改。鄧小平的許多意見都是強調，除了批評毛的政治和思想上的錯誤外，要充分肯定他對革命事業作出的貢獻。儘管多數黨的高級領導人(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都渴望向毛的幽靈復仇，但鄧小平認為，保留毛作為革命和國家合法性的象徵是政治需要。

在鄧小平的堅決主張下，決議最後對毛在長期革命鬥爭中的領導作用，對毛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不可磨滅的功績」，作出了高度的評價。在稱讚毛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和現代化者的同時，決議還嚴肅地批評了已故主席在他統治的最後20年犯的錯誤。這些錯誤中包括1957年決定擴大反右運動的規模，導致許多無辜幹部和知識分子受到迫害，儘管決議還提出這場運動(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的)最初是「必要的」和「正確的」。決議尖鋭地批評了毛的「左傾」錯誤，認為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主要是由左的錯誤引起的，當然，決議也承認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和劉少奇)也曾滿腔熱情地支持大躍進。此外，決議還指責毛在晚年實行「個人專制」，鼓勵「個人崇拜」，破壞了列寧主義的「黨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決議嚴厲地抨擊了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嚴重錯誤」，文化大革命被籠統地稱為十年動亂，它「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雖然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罪責都被歸於林彪和四人幫，但毛也難辭其咎，決議的結論是：「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21]

黨所批判的年邁毛澤東這種全局性的、危害極大的「左傾」錯誤，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說的「烏托邦」和「非科學」的思想潮流，決議對此有詳細的敘述。根據這一官方評價，毛「誇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在理論和政策上「脫離實際」，在經濟十分落後的條件下，提出了共產主義烏托邦即將來臨的完全不現實的期望，違背了他的繼承人(他們是更為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所說的歷史「客觀規律」。然而，決議雖然對毛的左的錯誤和其它方面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但在對毛的總的歷史評價上，決議的結論是，「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的領袖和導師」。在決議公開發表以後，對毛的評價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公式，即毛是三七開：三分錯誤，七分正確。

許多知識分子和後毛時代黨的領導人私下裏對毛的評價，要比1981年6月決議中的評價低得多。但是，官方決議在對毛的「左傾」錯誤進行批評的同時，又對毛作了高度評價，絕不僅只是黨的新領導人為了保持革命的連續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它還反映了幸存的老一代黨的領導人對早期毛澤東由衷的尊敬欽佩(即使不包括感情色彩)——作為革命領袖的毛，作為中華民族解放者的毛，作為經濟現代化建設者的毛，即是在犯「左傾錯誤」以前的毛澤東。曾受到批判甚至迫害、如今又重返崗位的黨內老幹部，十分留戀他們早期革命生涯時作為黨的革命領袖的毛澤東，留戀在1950年代初期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毛澤東——他們心目中的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對鄧小平和他的許多同僚來說，他們對毛的讚揚，決非僅僅是出於實用主義的政治考慮，他們努力要恢復1957年前的毛主義，即毛在陷入有害的激進的烏托邦觀念之前的思想。

1981年的決議，至少從官方的角度來說，正式解決了毛的問題，其後幾年，對毛個人崇拜的殘跡也逐漸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不過，在通俗文化和非官方的政治生活中，很快又出現了令人稱奇的對毛的崇拜。但是在1981年，在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生活中，毛只是一位革命家，一位民族主義者和現代化的象徵。當然，這樣做的目的，是通過把後毛的政權與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歷史密切聯繫在一起，強化其合

法性，而毛當然是在革命歷史中長時間起著決定性作用的領袖。相應地，官方的出版物繼續經常引用毛的著作，當然也是有選擇性的。在後毛的歲月裏，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已故主席非激進的形象也常常出現並受到頌揚。

然而，除了把毛澤東作為政治象徵外，最重要的也許是同時否定了毛時代後20年的社會和思想激進主義，把毛從神降為一個也會犯錯誤 —— 也會犯「全局性的錯誤」—— 的領導人，這為放棄毛主義的社會經濟政策、實行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準備搞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保證。

註 釋

1. 有關四人幫的倒台，參見上述第20章。
2. 華國鋒，〈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府工作報告〉("Reports to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1978年2月26日，《北京周刊》1978年3月10日。華的報告描述了十年規劃的總體輪廓，政府隨後又宣佈了更加具體的建設項目和目標。有關這一規劃的詳盡分析，參見鄭竹園 (Cheng Chu-yuan)，〈中國工業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Industry")，鮑瑞嘉編，《中國的四個現代化：新技術革命》(*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0)，頁21–48。
3. 鄧小平於1904年出生於四川一個富有的地主家庭，鄧小平也算是五四一代的成員。五四運動爆發時，鄧小平還非常年輕，當時激進的政治觀念和思想潮流對鄧小平的影響很深，1923年，他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在法國加入了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法國支部。
4. 參見本書第20章。
5. 據說，鄧當時曾對他的支持者說過這樣一番話：「要麼接受任人宰割的命運，讓黨和國家變質，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用心血創立的國家毀在這四個人(即四人幫)手裏，……要麼我們與他們鬥爭……如果勝了，那所有問題都解決了。如果打敗了，我們還沒死，那就上山，或者跑到別的國家裏等機會。現在，我們至少可以用廣東軍區、福州軍區和南京軍區的力量跟他們鬥爭。」轉引自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130。

6. 參見本書第17章。
7. 有關鄧小平關於知識分子問題講話的原文，參見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之一，著名作家丁玲的作品對此進行了生動感人的描寫，參見史景遷，《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1)，特別是頁335–369。
9. 有關對這次入侵的原因和結果精練而深入的敘述，參見杜達拿(Daniel Tretiak)，〈中國的對越戰爭及其後果〉("China's Vietnam War and Its Consequences")，《中國季刊》，第80期(1979年12月)，頁740–767。
10. 鄧小平是在1980年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廢除「四大」的。參見鄧小平，〈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239–273。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正式從憲法中刪去了「四大」，同時刪去的還有工人有罷工自由的條款，這是一項本來就未曾認真實行過的「權利」。在1980年12月25日的中央會議上，鄧小平再次尖銳地抨擊了民主運動中，特別痛苦地否定了中國是由一個特權「官僚主義階級」統治的說法。參見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66。
11.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3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158–184。
12. 趙紫陽(1919–2005)，在共產主義革命最後十年裏在紅軍裏擔任政治幹部，共和國成立後，在官僚行列裏迅速得到提升，1960年代初期任廣東省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是1970年代初期經毛批准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的許多老幹部中的一員。1970年代末期，當他任四川省委書記時，他實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隨後被調進了北京。
13. 胡耀邦(1915–1989)，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在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作政治工作。1949年後，他一直是鄧的追隨者，他在政治上的浮沉與鄧的興衰息息相關。他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4.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47。
15. 鄧小平，〈對起草〈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298。

16. 有關對中國共產主義歷史上這一問題的深入分析，參見威廉·約瑟夫：《中國對極左思潮的批判，1958–1981》。

17. 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1979年9月29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葉劍英是代表中共中央、全國人大(葉是委員長)和國務院發表講話。華雖然仍是黨的主席，但由葉來發表30週年講話，這在當時是有著政治含義的。

18. 起訴書原文，參見《北京周刊》，第48期(1980年12月1日)，頁9–28。

19. 江青與張春橋均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兩人都死於獄中。江青患有喉癌，據說於1991年5月在獄中自殺。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1992年死於肺癌。姚文元被判20年徒刑，於1996年出獄。

20. 例如，參見《北京周刊》，第1期(1981年1月5日)，頁4。在審判四人幫前就已劃定了這一區別。例如，鄧小平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中提出的看法。

2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官方版本，參見《北京周刊》，第27期(1981年7月6日)，頁10–39。

第二十三章

市場改革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1978年底，鄧小平以提倡「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形象登上權力高峰。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承諾，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和城市工人階級，有著巨大的吸引力，鄧小平因此而贏得了城市的民心。鄧的政權將領導一場在世界歷史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改革運動，這場改革將使中國人民走上相對(且不論貧富懸殊)繁榮富裕的道路——但是，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民主的諾言，在鄧的中國都沒有兑現。

鄧第一個背棄的諾言是民主。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過去三個月，鄧便著手對付擁護他上台的政治聯盟中最脆弱的成員——民主運動中年輕的活動家。正是他們，在西單民主牆上的大字報中寫下了充滿熱情的政論文章和動人心弦的詩篇，他們為1978年下半年支持鄧小平的運動注入了最大的熱情和活力。1979年3月，以魏京生被捕為信號的對民主運動的鎮壓，預示了後毛時代未來中國社會的特點。

誠然，在鄧小平的統治下，總的來説，黨和國家對社會的統治比過去有所鬆動，釋放了成千上萬名政治犯，意識形態的控制也比過去寬鬆，這當然是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的重要收穫。但是他們的民主權利卻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新政權反覆強調，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還要進行「政治改革」，然而，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並不是指他曾許諾的、許多人以為是鄧的目標的民主化進程。他的政治改革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任務，是恢復中國共產黨的列寧主義組織原則，這種原則和紀律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第二，是指通過黨的幹部隊

伍(用鄧的話說就是)「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1]使黨的統治更加制度化和規範化。簡單地說就是，無論經濟改革走得有多遠，黨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根本的變化。要保持用列寧主義思想改造和武裝的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保留斯大林主義的政治體制。

如果說鄧的「社會主義民主」中還有一些民主的內容，那麼他說的社會主義最多也只有一絲影子。從1978年下半年到1979年初，當鄧小平和他躊躇滿志的同僚開始實行經濟改革政策時，他們熱衷於經濟權力下放，對嘗試用市場手段打破僵化的中國那種蘇聯式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興趣日濃，但對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卻毫無興趣，因為這種改造將使生產者獲得支配他們的生產條件和產品的手段。

為什麼不使用社會主義手段來解決問題，其原因值得人們深思，對社會主義的定義不清是其中原因之一。在斯大林主義(和毛主義)中，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社會主義」的概念都被扭曲，衡量社會主義的標準是國家對生產的支配程度。對於把中國經濟中的問題歸結為高度集中和官僚化的中央計劃體制的改革者來說，這種社會主義毫無吸引力。社會主義是直接生產者、而不是國家對生產進程的支配。但是，即使那些對社會主義有這種正確認識的人，也不願意訴諸於社會主義的手段解決問題。因為這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手段以政治民主為前提，因而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直接挑戰。確實，真正的社會主義是雙重的挑戰，它既威脅到原有的經濟體制，也威脅到共產黨官僚的政治權力。此外，以工人和農民支配為形式的社會主義，是歷史的新生事物，在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沒有過先例。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感到恐懼。無論中國的改革者最初有多大的氣魄，他們也只能在實際存在的經濟模式中進行選擇。

所以，在三中全會時，政治上取得勝利的鄧陣營裏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在對改革進行探討中，沒有認真考慮過用真正的社會主義選擇取代指令經濟模式。只有在現存政治體制中能被接受的改革措施被提到了議事日程，這些措施包括各種下放經濟權限的方式和引進市場機制。市場機制對黨的領導人和理論家有著特別的誘惑，因為當時在全世界，正是新自由派把「市場的魔力」捧到登峰造極程度的時刻。

在人民共和國歷史的早期，曾有過經濟管理權限和決策權限下放的實踐(特別是在1958–1960年的大躍進期間，激進的下放措施導致災難性的結果)，並沒有對黨的領導造成威脅——當然，在具體方案上，權限下放會使某些官僚部門受益，削弱或影響其他部門的利益。市場也並非像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為的那樣，會對共產黨的政治體系構成道義上的威脅。有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成功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為，中國也可以利用市場機制提高工農業產品的數量，改善產品質量，同時又不會削弱黨的權力或國家對經濟「指令高度」的控制。總的來說，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共產黨的國家在政治上依然居統治地位，在經濟上依然掌握著關係到國計民生的重要部門。此外，許多在最初對市場關係持懷疑態度的黨政官僚(一方面出於意識形態原則，另一方面因為既得物質利益)，很快就感到市場經濟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好處。當然，很多官僚迫不及待地為自己謀利，大撈一把，這個問題下面將作簡要敘述。

*　　*　　*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無論是從經濟、社會還是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看，市場當然地是與工業資本主義聯繫在一起的。[2] 市場經濟必然地產生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導致出現資本主義的不平等現象，對此，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十分清楚。但是，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同事沒有設想中國未來要走資本主義。雖然一些充滿熱情的改革者，像卡爾·瑞斯金 (Carl Riskin) 形容的，熱衷於「散佈一種關於市場奇迹的天真觀點」，[3] 但內在的價值觀又使他們中的多數人不可能鼓吹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政權，相反，他們把市場機制當成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作為打破僵化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加速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最有效的方式，進而為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奠定根本的物質基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市場社會主義」經驗，進一步增強了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信心。但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市場經濟所取得的有限成就，被西方持同情態度的評論家大大誇張了。

為了給使用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方式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目標尋找理

論根據，鄧時代的理論家求助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這與毛時代不同。鄧的理論家們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必須以資本主義為前提的觀點，正是這一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區別於19世紀其他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創造的物質和社會的基礎上，只能建立在大工業及與此相應的成熟的無產階級 —— 它是未來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代表 —— 的基礎上。所以，馬克思認為，無論資本主義在社會上具有怎樣的破壞性和非人性，它都是人類歷史發展上的一個必然的和進步的階段。實際上，馬克思的許多經典著作，包括《共產黨宣言》在內，都可以理解成(中國現在實際上也是這樣理解)是對資本主義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的讚揚。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改革者援引馬克思的權威作為選擇資本主義手段的依據，他們也常引用列寧的話，特別是列寧的這一類著名觀點，如「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麼社會主義。」[4]

在從馬克思主義中為市場改革政策尋找理論根據的過程中，鄧的理論家們特別強調中國封建傳統的有害影響。他們認為，由於資本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的失敗，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生活和意識形態中，依然存在著前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現代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封建主義殘餘」—— 因此它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發展的長期的最大障礙。毛澤東短暫的不徹底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封建思想」在人民共和國依然根深蒂固，這是毛時代後期的錯誤、特別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主要原因之一。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本主義是封建主義的歷史大敵，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仍然是需要的，起著進步作用。至於他們提倡的資本主義方式與他們追求的社會主義目標是否一致這個棘手問題，改革派基本上緘口默言。

市場改革政策的另一個準馬克思主義的依據，是鄧小平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來的命題。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上，鄧提出，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即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完成，階級差別(和階級鬥爭)最終也不復存在，所以，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對立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和落

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5] 當然，解決辦法就是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力，建立與社會主義的政治和社會「上層建築」相適應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對八大的這種提法不以為然，不久即否定了八大的觀點，重新強調階級鬥爭。但是，1978年鄧小平大權在握後，他在八大提出的觀點重新成為後毛時代初期的主要思想原則，根據這個原則，所有的社會考慮(以及社會主義的考慮)都要服從於迅速發展經濟這一根本任務——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方式，包括資本主義的市場手段來完成這個任務。如我們將要談到的，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的這一命題經過精心雕琢後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一個經濟決定一切的理論(在老生常談的馬克思主義外表下)，為把國民經濟發展放在首位提供了理論根據，絲毫不顧及可能產生的社會代價。[6]

* *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籠統地提出了把「市場調節」和「計劃調節」結合起來的方針，正式批准了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計劃，1979年，經濟改革正式啟動。這種籠統的提法，既照顧到市場改革提倡者的要求，也使那些堅持以中央計劃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人能夠接受。不過，最初的改革是為了糾正毛時代遺留的經濟領域內比例失調的問題，主要靠行政措施解決，基本上沒有涉及到採取市場機制的問題。1979年春季，新政府把華國鋒的十年規劃拋在一邊，開始大幅度削減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投資，增加對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政府還採取措施，有效地降底了「積累率」，即國家為擴大生產能力而調撥的社會產品的比例。積累率在毛時代越來越高，在華國鋒執政時達到最高峰，嚴重地抑制了消費，這種趨勢現在得到扭轉，政府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農民按規定上繳國家糧庫的糧食價格提高了20%，超出定額的糧食收購價格提高了50%。此外，農民可擁有的自留地從佔可耕地的5%增加到15%，國家對農村集貿市場的交易也不再過多干預。國營工廠實行了新的獎金和分紅制度，根據勞動生產率進行分配，城市工人也成為改革的受益者，不過他們的受益程度遠遠比不上農民。

鄧政權最初的改革政策促使農業和輕工業生產大幅度提高，與此

同時，農村和城鎮人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消費能力大增強，這又促使消費品的生產和進口空前繁榮。1980年代初期，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消費品亦呈購銷兩旺形勢，這是1979年政策調整的直接結果。

雖然消費的增長主要是由於收入增加，但在鄧小平政府大力鼓勵下，以驚人速度蓬勃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城鄉私有企業也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代初期，除了農村集貿市場迅速繁榮發展外，在城市街道上，出現了越來越多出售各種商品和食品的攤販，私人飯館和旅店紛紛開張，各種零售業、服務業雨後春筍般湧現，從理髮鋪、美容店到電視修理店應有盡有。在鬆散的集體所有制管理下，傳統的手工生產也得到恢復。匆匆建立起來的街道小廠生產著各種家庭日用品，新建立的來料加工制使婦女在家裏就可以製作衣服。

政府所以鼓勵這些私人或所謂集體企業的發展，原因之一是要填補經濟中長期處於空白狀態的零售業和服務業。在毛時代的後期，私人商店和集貿市場都被視作「資本主義尾巴」般割掉，居民常常要走很遠的路到國營商店去購買生活必需品，與那些冷冰冰的國營商店服務員（通常是超員）打交道。政府鼓勵私人企業發展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減輕城市失業的社會壓力。根據官方數字，到1984年，在城市日益繁榮的私人企業中就業的人數有400萬，在城市「集體」企業就業的人數超過3200萬，這種集體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逐漸都採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手段。[7]隨著政府不再限制私人企業可以僱用的人員數量，在私人企業中就業的人數成倍增長。到1980年代中期，私人和「集體」企業是城市經濟中發展最迅速的成分。

改革開始後一位著名的市場機制提倡者的一番話，典型地道出了在私人企業中自我就業或就業對政府的吸引力，他坦率地評論說，對於這些工人，「國家不用再給他們發工資了」，[8]國家也用不著再給數量越來越多的家庭傭人發工資了。在毛時代，傭人並不新鮮，只不過他們基本上都是在機關或黨政高級幹部家中工作的政府僱員。在後毛時代，技術精英、知識分子、中層幹部以及比較成功的中國新資本家和在華的外國人家庭中，僱用女僕、廚師、園林匠和保姆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鄧小平時代初期，私營個體戶的出現為中國的城市增添了活力，外國人熱衷於把這種情況與毛時代清苦和單調的城市生活進行對比——即使那些在毛時代從未去過中國的外國人對這種比較也樂此不疲。不久，豪華賓館、夜總會和奢侈品專賣店——還有乞丐和妓女，取代了街頭的小攤小販和露天食攤。進而，中國的城市逐漸與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城市沒有什麼不同，供人窮奢極侈的財富和赤貧現象形成顯明而令人痛心的對比，這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典型的特徵。

1980年代初期，許多西方觀察家把中國城市中出現的個體戶稱頌為充滿活力的中國資本主義誕生的跡象。當然，實際上不乏這樣的企業家，他們響應政府的號召，白手起家最後「致富」，然後被中國和外國的媒體大肆宣傳。但是，大多數這樣的個體戶和私人企業日子並不好過，有些只能勉強維持生存，這種情況與第三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十分相似。中國資本主義的真正起源不是城市的小商業資本主義，而是起源於在鄧小平「開放」政策下進入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外貿和投資——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國家和控制開放通道的官僚。

開放政策

1975年1月，周恩來宣佈「四個現代化」目標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認識到，要實現周恩來提出的宏偉經濟目標，需要大幅度擴大中國的對外貿易，從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引進最新的技術，也許還需要借外資，這就意味著要放棄——或是令其名存實亡——毛的「自力更生」國策。

「自力更生」的原則在毛的中國有著神聖的地位。不過，自力更生實際也是中國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孤立政策，使中國在長達二十多年時間裏被排除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外。1950年代後期與蘇聯交惡後，中國在共產主義世界中也陷於孤立狀態，在毛時代的多數時間裏，中國別無其他選擇，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毛主義的革命遺產，特別是延安時期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思想，[9] 也許給自力更生增添了一層神聖的色彩，並且無疑提供了理論上的根據。毫無疑問，一些黨的領導人，當然包括毛澤東在內，為

了使社會主義中國免遭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有害影響，願意為自力更生付出經濟上的代價。無論其是否自覺地意識到，毛和他的同僚們採納了19世紀末期弗裏德裏克·利斯特(Friedrich List)為普魯士制定的保護主義戰略，這一戰略旨在使工業經濟落後的德國實行相對孤立政策，直到其有能力與工業化的英格蘭競爭為止。不管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中國在1970年代末期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其條件之有利，較之1950年代進入有天壤之別。[10]

但無論其自覺的戰略或原則是什麼，在機會來臨之際，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立即作出反映，使中國進入國際貿易和金融的資本主義世界。這一行動開始於毛時代的最後幾年，始於中美關係接近及尼克松在1972年2月對北京和上海的訪問之後。從1971年到197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增長了兩倍多，多數是與非共產黨國家進行的貿易。[11] 在過渡的華國鋒政府領導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步伐大大加快，如已經提到的，華流產的「十年計劃」號召大量引進外國資本和技術。鄧小平的市場導向發展戰略及其「開放」政策，使中國迅速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接軌。從1978年到1988年，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增加了三倍多，在其後的六年裏又增加了三倍，日本、香港和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

總的來說，對外貿易的繁榮發展是建立在中國所說的「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可以說交易的各方在每筆生意上都獲得了自己的利益。引起中國人擔憂的不是貿易上的「開放」，而是中國向外國資本開放——為吸引外資而創造的環境和實踐，令人不安地回憶起半殖民地時外國勢力統治下的通商港的情況，這種現象最典型地反映在「經濟特區」中。1979年，政府在靠近香港和台灣的中國南部沿海建立了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隨後又建立了其他經濟特區，在十年時間裏，中國的所有沿海地區和一些有選擇的內陸地區都對外「開放」了，就是說，這些地區為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勞動力、迅速致富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並且給外國人提供他們在準殖民地環境裏期待的舒適生活方式。[12]

無論是從社會主義還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經濟特區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事物。當時，北京政權還感到有必要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特區的經濟是赤裸裸的真正資本主義，更加難以自

圓其說的，是政府還曾宣佈，特區是中國所有城市進行「改革」的榜樣。此外，特區還是外國資本家剝削中國工人的地方，是中國人為有特權的外國人提供各種服務的地方，特區是政府官員腐敗的溫床，不僅當地政府受到腐蝕，黨政高級官員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在進出口貿易和其他交易中為自己謀取私利，而且他們的那些有經商頭腦的子女也因此受到了反面影響。

然而，除了對特區在經濟上是否真正成功仍有待爭議外——即是說，特區生產出的資本是否比中國政府對環境的投資數量要多——可以比較肯定地說，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從總體上帶來了預期的經濟利益：為工業企業和各種其他現代化建設項目注入了外國資金，周期性的缺乏外匯狀況得到緩解，能夠從日本和西方國家中引進先進的科學和工業技術，減輕了中國工人就業的壓力。

「開放」政策最重要的成果當然是積累了生產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鄧小平政權領導下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奇觀之一，就是最初積累的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政府中的貪官污吏。例如，一個典型的現象是，中國後革命時期的新「資產階級」中的部分成員就是地方官員（及他們的朋友和親戚），他們能夠用國家規定的低價買進商品和物資，然後再轉手以高額市場價格賣出。同樣突出的事例，特別是在大眾的政治意識中，是高幹子女在1980年代初期由於政治上的有利位置，能夠在外國資本家和中國國有企業中充當賺取巨額利益的買辦。無疑，這些腐敗官員和高幹子女賺的錢有一部分會流向秘密的瑞士銀行賬戶，如傳言的那樣，但大多數資金投入到國內各種能賺到高額利潤的金融和工商企業，大大加快了資金積累過程和經濟發展速度。

外國資本對生產企業的投資數量也十分可觀，而且在整個1980年代基本上保持穩定增長，然後是1990年代初期，在利潤驅動下，投資急劇增長。僅僅在1994年一年時間裏，中國吸引的外資（340億美元）就相當於到1989年底為止的前十年的總和。[13] 中國的外資主要來自海外的華人投資者，他們的投資渠道主要是通過香港。雖然存在著政治上的障礙，但到1990年代中期，僅台灣資本家在大陸的投資就達250億美元，台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福建省。

中國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單純是能提供無數的廉價勞動力，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廉價勞動力(甚至常常更便宜)，它的吸引力在於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是一支有著嚴格紀律性的、受過相對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大軍。對潛在投資者來說，另一個十分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中國政府禁止工人自由組織工會，中國政府還在其他方面提供了「和平勞動」的保障。鄧和他的繼承人強調「安定團結」── 對列寧主義專制的委婉表述，這也深得外國投資者的青睞。吸引外國投資者的還有直接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可能性，中國正在發揮它長期存在的巨大潛力，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當然，鄧小平的「開放」政策獲得的明顯經濟利益是需要代價的。代價之一就是中國從一個沒有債務的國家成為一個主要的債務國 ── 雖然中國的外債在絕對數量上是巨大的，但用國際標準來衡量，從人均的基礎上或是中國的經濟規模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外債數量還是適度的。[14] 當然，中國對國際資本市場波動(它對發展中國家並不總是仁慈的)的依附程度越來越深，而且要受到「國際」(但卻是由美國控制的)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此外，「開放」為政府和非政府的腐敗創造了新的機會 ── 雖然如上所述，在中國資本主義產生的特殊條件下，官僚腐敗也是資金積累的主要源泉。另一個代價是在一定程度上(難以定量統計)失去了民族自信心，毛的自力更生政策，無論其付出了什麼經濟損失，卻使人民群眾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即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夠創造光明的未來。在一個長期受到西方列強支配和欺侮的國家裏，這種民族自信心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高。這種信念在毛政權的最後幾年開始動搖，但是，在後毛時代的領導人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手段和技術當成醫治中國問題的萬能良藥後，民族自信心受到致命的打擊，客觀上導致了西蒙・雷斯(Simon Leys)嘆息的「對西方盲目崇拜的突然再生」。[15]「盲目崇拜」可能導致它的反面民族主義，可以預見，在以後的年代裏，民族主義的情緒會越來越強烈和極端。

然而，埋葬毛的自力更生政策，並不像有些人擔心的那樣，實行「開放」政策意味著開始一個新的依附於人的時代。與1949年前的中國不同，在野心勃勃的外國列強與中華民族之間，是一個由具有強烈民

族意識的領導人領導的強大的國家，他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都有能力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一個獨立的中國，無論其在社會和政治方面還有什麼缺憾，將永遠是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成就之一。儘管如此，中國正在與之接軌的國際資本主義市場，已經是（還將繼續是）對中國經濟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一股強大力量。

農業的非集體化

正是在絕大多數中國人居住和勞作的農村，最早感受到市場經濟的經濟活力和帶來的消極社會後果。從1979年和1980年起，鄧政權開始進行農村改革，改革最初似乎是要回到1960年代初期劉少奇為克服大躍進的困難而制定的「調整」政策上，但是農村改革很快就成為一場全面變革的洪流，1950年代和其後建立起來的集體化組織在這股洪流衝擊下紛紛解體。到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已不復存在，個體農戶生產取代了集體農業生產。

農民勞動與生活方式根本性轉變的速度之快，遠遠超出了北京領導人的預期，這與過去二十多年的農村人口大起大落的流動情況相似，只不過這次轉變的動因不再是受新的社會理想的驅動。農村改革的動因依然是為了使國家能夠從農村獲得足夠的剩餘產品，為國家現代經濟的發展——現在以四個現代化為名——提供資金。在毛時代，國家對農村的剝削是資本積累的主要途徑，在鄧小平時代，情況依然如此。但是，毛的繼承人清楚地意識到，由於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和農業生產率的下降，現在的農業經濟提供不出國家必須的資金。因此，最根本的第一步，是要調動農民大幅度增加農業產量的積極性，為現代經濟發展籌措資金。用新的手段實現舊目的，就是在國家指導下使農村經濟商業化。

三中全會後，國家馬上採取措施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措施包括大幅度提高國家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定價，放開農村集貿市場，在毛主義的農業體系框架中，這些「調整」措施都不難實現——但中國的市場改革家的目標遠不止於此，他們認為，中國的真正問題恰恰在於毛主義的體制，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體制運作方式問題。所

以，在1979年對政策進行調整的同時，為鄧小平改革出謀劃策的改革知識分子，對集體農業進行了全面公開的批判。

按照這種批判的說法，在1955年和1956的所謂「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忽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的基本理論，在十分薄弱的經濟基礎上強行建立準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此外，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幹部對「中農」採取強制措施的現象十分普遍，打擊了農村中最有效率的生產者，使農業生產在二十多年時間裏停滯不前，從1950年代中期到1970後期，農民的人均收入基本上沒有提高，導致社會主義在多數農民心目中失去信譽。除了對集體農業從總體上進行批判外，過去曾大力宣傳的毛時代自力更生和社會平等的典型大寨大隊，現在被官方說成是「左傾」產物，大寨的領導人陳永貴也被從中央政治局除名。黨對大寨的批判，包括說大寨虛報生產數字、財務違規等，對於熟悉這個曾被廣泛宣傳學習的典型的歷史的人來說，似乎不足為憑。[16]

在批判集體化的同時，黨的理論家把鄧小平1956年提出的公式奉為經典，即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不是對立的社會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鄧的這一命題成為迄今為止經濟發展壓倒一切作法的根據，以使生產力與「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但是，對農業合作化的批判是對鄧這一公式的曲解，似乎只有退回到合作化前的社會組織形式，才有助於解決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明顯不相適應的矛盾，所以，他們提倡退回到家庭農業形式，認為建立在個體農民所有制基礎上的商業化資本主義體系，不僅更適合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水平，而且能夠激活市場的能量，加快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1980年9月，中共中央推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正式開始在中國農村進行重大體制變革以發展資本主義。根據「責任」制，個體農民與生產隊簽訂關於使用隊裏一定數量的「集體」土地的合同，合同中規定農戶應將一部分產品交給生產隊，除用於上繳國家的稅收和定購的糧食外，其餘作為生產隊依然承擔的集體福利項目的開支。過去屬於集體的傢具和牲畜也都分給了農戶，農民們又開始了個體農業生產。除了上繳生產隊的部分外，農戶可以自由地在

這塊土地上做他想做的事，可以選擇任何方式處理他的剩餘產品。

雖然在早期有各種各樣的「責任制」試驗，一些地區的農民甚至自己作主分了土地，但直到1980年秋季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後，這種體制才迅速為各地所採用。儘管最初規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要本著自願的原則，並主要適用於集體化搞不下去的貧困地區，但實際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快就成為強制性的，在1980年代初期就迅速在全國普及。地方農村黨員幹部生怕被當成「極左分子」而受到排擠，十分賣力地貫徹新政策（有時強迫不情願的農民執行），以顯示自己對鄧政權的政治忠誠。到1983年底，全國98%的農戶都採用了不同形式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與1955–1956年的集體化運動十分相似，非集體化也是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完成的，這種作法曾被認為是左的錯誤，因地制宜的政策原則完全被置於腦後。

瑞斯金將最初取代集體農業經濟的體制稱為「生產隊和國家為地主的佃農制」，[17] 這是十分貼切的。但是，佃農已不再是耕種著等份土地、彼此之間毫無差別的農民，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的發展，農民中的經濟與社會差別也以驚人的速度發展。造成新的社會經濟差別的情況十分複雜：首先，並不是所有在承包責任制下簽訂的合同都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在政府關於發展專業戶和促進農村市場發育的政策鼓勵下，許多農民致力於從事有利可圖的行業，如種植經濟作物、搞糧食加工、開辦小工廠或修理店，還有一些農民把精力放在貿易和交通運輸領域中的各種新生意上；總的來說，比起那些依然守著土地、種植糧食和其他基本農產品的普通農戶來，這些所謂的「專業戶」和各種生意人日子要過得更好。第二，1983年，政府為了解決農戶缺乏勞動力的問題，特別是為了鼓勵那些雄心勃勃、有企業家經營頭腦的農民——他們是提供資金積累的大戶，允許出租承包的土地、僱用付薪的勞動力。隨著政府放寬並最終放棄對剝削的限制後，[18] 新的二手承包人和僱工大量出現。那些擁有良好技能和經營頭腦、一有機會就全力施展的人，證明了鄧「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這句名言的真理性，這句話現在是日益增長的不平等現象的官方理論根據。

最後但也許是最重要的富人和窮人之間的差別，是由於農村黨員幹部在新的商業化經濟中佔有特殊的有利條件。許多農村幹部最初堅決反對回到個體農業經濟，原因之一是他們擔心失去自己的權力和收入。然而，許多幹部很快就發現，他們的政治地位和影響是為自己謀取經濟利益的獨特法寶。許多黨員幹部在領導解散集體經濟的進程中，首先確保他們自己和親朋好友分到最好的土地和農機具。他們原來的政治關係有助於他們獲得緊缺的商品和物資，在越來越興旺的黑市中進行非法交易以謀取暴利。[19]

解散人民公社對原有集體企業的非集體化起了主要作用。1982年底通過的新憲法，把原來人民公社的行政職能移交給鄉鎮或縣政府，即中央政府的下屬基層部門。公社的政治權力被取消後，它原來行使的集體經濟和社會福利職能或是不復存在，或是轉入私人之手，由個人、家庭或一些人合夥經營，以賺錢為目的，[20] 甚至醫療和教育機構在農村商業化的浪潮中也未能幸免。到1980年代中期，農村許多地方出現了私人醫生和私人學校，只為能出得起錢的人服務。

中國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是土地使用的私有化，儘管正式的所有者是誰這一問題一直懸而未決。個體農戶最初是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通過與生產隊(集體化時期留下的一種農村組織結構)簽訂短期承包合同獲得土地，在法律上土地還是集體財產。為了消除農民關於新體制可能是臨時的這一擔心，使他們不致對土地進行掠奪式使用，1984年，政府頒佈政策，允許把土地的承包期延長到15年。很快，土地承包期又延長到50年，這就意味著在一般情況下土地可以由後面幾代人繼承。這在事實上是把土地推向了市場。承包的土地可以轉租、買賣和抵押，就好像是可完全轉讓的私有財產一樣。

1980年代初期，新的農業政策產生了引人注目的經濟成效。從1978年到1984年，農業總產值以每年平均9%的速度增長。[21] 農村的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農民的人均收入在六年時間裏翻了一番，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主要表現在許多農民蓋上了新房，消費品購買力大幅度提高，飲食結構有了顯著改善。農業經濟發展的高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農業經濟的市場化，從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更主要的原

因）是1979年國家大幅度提高了糧食收購價格、放寬了此前對農業經濟施加的壓力，但是，這兩者都是在集體經濟的舊制度的體制框架內發生的。耐人尋味的是，農業生產高潮始於華國鋒政權時期的1978年（增長8.9%），1979年繼續增長（8.6%），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則是在1980年代初期以後才普遍實行的。[22] 但無論是什麼原因，也不論地區間發展還不平衡，鄧小平時代毫無疑問將被作為經濟發展最成功的時期載入中國農業歷史發展史冊。

然而，農業生產的進步卻未能一直持續。1985年，糧食產量突然大幅度下降，從前一年的4.7億公頓猛跌到3.39億公頓，在中國社會引起經濟和心理上的巨大震盪。這是自從大躍進以來糧食產量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令人回想起了饑荒年代的恐懼，也是在中國經濟越來越走向市場的情況下發生的糧食短缺和農產品價格的大幅度波動。對那些辛辛苦苦真正在農田耕作的農民來說，市場給他們的回報越來越少。這種狀況在許多農村地區又加劇了幹部和農民之間長期緊張的關係，幹部要完成國家的定購合同，他們常常在拿到農民糧食後只打一張「白條」代替現金。農民的稅收負擔過重，1980年代後期，腐敗的政府官員又發明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攤派給農民，農民對幹部的牴觸情緒越來越深。無論如何，自從1985年後，農業生產陷於停滯狀態，勉強跟上相對比較低的人口生育率。

1980年代中期後，維持農民收入及部分農村地區繁榮局面的，不是由於農業產量或農業生產率的增長，而是以「鄉鎮企業」形式出現的農村工業的飛速發展。農村的工業化，是毛在大躍進時期實行的一項重要政策（第十二章已作了交待），它的目標是為了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充分利用農村的閒置資源。同時，農村工業化也是為了實現更宏偉的社會目標、特別是縮小城鄉差別的手段。毛時代的農村工業化是比較成功的。到1970年代中期，在採用比較原始技術的社辦工廠和隊辦工廠中就業的人數達到2800萬人，幾乎佔農村勞動力的十分之一；不過，直到市場改革時期，農村工業才真正成為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在鄧小平政權的鼓勵和資金的湧動中——資金分別來自地方政府、私人資本、外國投資以及各種各樣的合作團體，各種門類和技術程度不等的農村工業企業，在數量和規模上以驚人的速度發

展。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產值以年均35%的速度增長，在1980年代末的短暫緊縮後，1990年代又以年均30%的高速度發展。到1995年，在鄉鎮企業中就業的工人達到1.25億人，鄉鎮企業成為中國經濟中發展最快的部份。正是這些在鄉鎮企業中工作的農家子弟的工資(雖然很低)，成為中國農村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政府把鄉鎮企業界定為中國經濟中「集體企業」的一部分，鄉鎮企業成為集體企業(其概念是模糊不清的)中的主力軍。然而，大多數農村的工廠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是個體資本家和當地政府，所有的企業都是建立在國內和國際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基礎上運行的。鄉鎮企業到底具備不具備人們説的社會主義性質是一個疑問——也許是一個至今還懸而未決的問題。[23]

鄧小平時代的農村經濟政策付出了社會的和其他方面的代價——也為未來的發展製造了新的障礙。非集體化的消極後果之一是1980年代初期農村人口生育率大幅度增長。個體農業經濟使農民希望多生兒子，既為了以後地裏有勞動力幹活，也為了長遠的養兒防老。這是農民對非集體化和返回個體經濟的本能(也是十分傳統的)反映，但卻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的考慮制定的獨生子女政策發生矛盾，政府的目標是到2000年，把人口規模穩定在12億。政府官員強制農民墮胎，絕望的農民溺死女嬰，無論如何要生個兒子，這是人類的悲劇。國家利益與農民個人利益的衝突造成了這種悲劇，而衝突本身則是政府自相矛盾的政策引起的。1985年，政府對獨生子女政策作了調整，實際上允許農村育齡夫婦可以有兩個孩子，緩和了政府與農民的緊張關係，但卻又破壞了在廿一世紀實現人口零增長的目標。

非集體化還損害了其他長期發展目標和規劃。由於分田到戶，使農村土地支離破碎，特別是在那些根據土地等級不同劃出相應比例進行分配的村莊裏，這種現象更為突出，導致許多地區無法使用大型農業機械進行耕作，嚴重地妨礙了中國農業機械化長遠目標的實現。此外，在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為主，由市場驅動的社會取代後，集體資金化為烏有，原來照顧農村老弱病殘的集體福利隨之萎縮。許多地區原有的大隊醫療診所先後關閉。農村學校的數量和質量都大幅度下降。由於家庭成了生產單位，農民需要把孩子留在家裏幫助幹活，學

生的入學率也下降了。沒有了公社和大隊，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從事大規模的公眾設施工程也變得十分困難，例如興修和維護水利灌溉工程和大壩。這是1998年華北和華中遭受特大洪水災害的原因之一。

非集體化也給中國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嚴重的影響。例如，由於各地農村都毫無計劃地大興土木蓋新房子，需要大量木材作為建築材料，亂砍濫伐森林(以及由此造成洪水氾濫)成為中國的一個嚴重問題。由於回到個體農業經濟，以及一些村莊相對比較富裕，農民把積蓄主要用於蓋房，大量佔用了可耕農田，使從1957年開始的可耕土地面積的減少已經到了警戒線。[24]

集體組織的解體，當然也瓦解了農民曾有過的集體價值觀念，傳統的風俗、信仰、迷信和禮儀很快填補了意識形態的真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四個現代化旗幟下進行的「農村改革」，卻使最典型的「封建主義」思想得到復活，而鄧小平和他的市場改革理論家們，一直批判封建主義的歷史危害，認為它是導致毛時代的政治錯誤和經濟失誤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與這些舊思想舊觀念的復活相比，政府更擔心的則是農民在婚喪嫁娶方面的「鋪張浪費」──把本來可以用於改良土地、購買農業設備和保水保商的資金都揮霍一空。對農業缺乏長期投資，是自1985年後農業發展停滯不前、越來越依賴進口糧食的主要原因之一。

非集體化的最嚴重社會後果，是農村中經濟不平等的急劇發展，出現了新的農村階級差別。中國農村的不平等現象一直就有，但在毛時代，這種不平等主要是地區差別，即由於歷史上形成的生態環境條件及其他差異造成相對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之間的差別，在同一地區內的經濟差別是很小的。[25]在鄧小平的改革時代，地區間的差別日益擴大，特別是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的差別，使自毛時代就存在的這種現象更加嚴重。鄧時代的創新，是在同一村莊、鄉鎮和地方出現的富裕家庭和貧困家庭之間越來越大的明顯差別，進一步驗證了鄧小平「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預言。

率先致富的人所佔農村人口的比例並不大，但其絕對數量仍是一個龐大的數字，他們善於利用新的市場機制獲取利益。這種體制有利於有經濟頭腦、有野心、身體強壯、有技能、頭腦靈活的人以及勞動

力多的家庭，那些掌握政治權力或是有政治途徑的人在這種體制內更是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那些當地的黨員幹部，在拋棄了自己原有的社會主義思想的限制後，從集體財產私有化中謀取了最大的利益，為自己及親朋好友撈到最好的土地、掌握最有利可圖的經營項目。農村黨員幹部是農村新資產階級的核心，他們控制著各種不同種類的賺錢企業的經營。這個新階級包括的人有：較為成功的各式「專業戶」的帶頭人 —— 他們採用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付薪僱用勞力在自己的土地或工廠裏工作；各種服務業、商業和企業的老闆或承包人；鄉鎮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掌握著鄉鎮企業的地方黨政官員，他們從事一切能賺錢的事，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新的二手土地小承包人，他們把土地轉手租給貧困農民，後者才是真正在田裏勞動的人。雖然這是一個複雜的階級，是一個由不同集團的成員組成的正在形成的農村資產階級，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點，即自己基本上不從事體力勞動，依靠剝削他人的勞動生存。這樣，在一個日益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環境中，他們承繼和延續了最古老的社會差別 —— 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

與農村新資產階級相對應的，是最古老的人數最多的農村社會階級 —— 農民。農民中的約二億勞動力依然在田間耕作，大多數都是個體農戶。他們之間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差別極大，從「新富裕農民」(主要是政府說的「專業戶」) 到農村中連溫飽都難以維持的赤貧家庭。貧困農民被迫出售或抵押自己承包的土地，加入佃農和打工的行列，或是失業。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絕大多數人口依然生活在農村，但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越來越少。在毛時代後期，人民公社至少為農村絕大多數人口提供了起碼的社會福利，但是自19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散後，農村的約四億勞動力中有近一半是多餘勞動力。在新近商業化了的農業經濟條件下，這兩億農村勞動力已經無法依靠土地生活，其中一億人在迅速發展的鄉鎮企業和其他在農村的非農業企業中當工人，其餘的一億人 (雖然人數隨經濟形勢的情況而波動) 變成了新的遊民無產階級，一些人在農村打短工，還有一些人被迫走上犯罪道路，但大多數人最終成為到處打工的「流動人口」，他們從一個城市漂泊到

另一個城市，尋找任何他們能幹活的工作。他們住在貧民窟裏，拿著可憐的一點工資，幹的是建築工這一類令中國城市人看來是十分現代和繁榮的艱苦工作。

這樣，非集體化和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展使農村出現了新的社會結構，由四個差別日益明顯的社會群體組成：第一個群體包括各種商業和企業事實上的所有者組成的資產階級精英、地方黨政官員、職業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第二個群體是依然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他們的數量在減少，但人數仍然眾多；第三個群體是工薪階層，主要在鄉鎮企業工作，他們的人數越來越多；第四個群體是下層的流動勞動力。這種社會結構對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十分有利——也有助於傳統意義上的農民的消失。[26]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雖然鼓勵農村經濟的商業化，並對其經濟成就感到歡欣鼓舞，但他們有時也考慮到(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重新實行農業生產的集體化問題。[27]他們強調，農業生產的集體化，不能通過行政命令實現，而是「客觀經濟規律」和生產發展的自然結果。[28]實際上，在1990年代中期，有來自北方一些省的報道說，農民們開始把村裏的財產收歸集體所有，重新走集體農業經濟的道路，這種作法顯然得到了政府的鼓勵。然而，很難想像市場經濟會自然地轉變成集體經濟，在現行的體制下，市場經濟正在人們之間產生著巨大的社會經濟差別，創造出了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日益兩極分化的農村社會中，在越來越多的人受到競爭和市場觀念的薰陶的情況下，無論是自上而下還是自下而上地重新實行集體化，勢必要引起社會的暴力衝突。一個以社會安定和諧為驕傲、強烈批判毛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政權，又為不可避免地導致真正的階級鬥爭創造了社會條件，這無疑是最具有諷刺意義的事件了。

城市工業和勞動力的商品化

批准實行「市場調節」的三中全會剛一結束，鄧小平陣營中的經濟改革家就向這位最高領導人提交了關於如何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龐大、低效、技術落後的城市國有企業的具體建議。他們認為，至少在

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上，如果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不再由北京的中央計劃者決定，而是由「自由的」市場力量進行調節，會更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他們建議，把經濟決策權下放到各個企業，他們的經營活動將以盈利為目標，採取關停併轉的方式解決虧損企業的問題，後面這點以後沒有再強調。企業自由權意味著在國家的宏觀指導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主決定生產計劃、工資水平和產品價格，企業有權支配盈利部分(如果有的話)。此外，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管理者有權根據市場條件和生產效率標準招收或解僱工人，當時稱為「打破鐵飯碗」，即是說，結束國家正式職工的終身工作制。改革家們稱，這樣做可以有效地解決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提高勞動生產率。[29]

概括起來，這些就是1979年提出的對城市工業按資本主義模式進行改造建議的基本內容。鄧小平和其他黨的領導人對這一建議很感興趣，這當然不是他們欣賞資本主義，而是因為這種模式可以為民族利益服務。市場經濟能夠提高經濟效益，能加快中國實現「繁榮富強」的步伐。因此，1979年下半年，政府選擇了數千家企業作為試點，把它們作為自負盈虧的、有自主權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開始了市場模式的試驗。1980年代初期，這種做法進一步推廣，佔國家財政撥款總數16%的工廠和其他企業被納入這一計劃。[30]

對工業進行這種資本主義式的初期改造未能持續很長時間。1980年代末期，由於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嚴重的財政和社會問題，政府被迫放棄了這一計劃。在前不久開始在農村和城市地區實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政策，導致了意料之外的嚴重通貨膨脹。儘管根據國際標準來看，官方宣佈的物價漲幅(根據官方有保留的數字，全國約為7%，城市偏高一些)並不算高，通貨膨脹震驚了三十多年來已經習慣了平穩物價的中國人。在毛時代的27年中，消費品物價平均每年上漲的幅度不超過0.5%。國家的財政赤字也到了警戒線，這對一直循規蹈矩地奉行財政平衡政策的中國政府構成極大壓力。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赤字，包括大幅度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關閉效益太差的工廠等，但這些措施反過來又加劇了長期性的城市失業問題，政府現在承認城市勞動力的失業率達20%以上。[31]

1980年，在政府全力對付通貨膨脹、失業和財政赤字時，它又面臨著重工業產值急劇下降的問題。下降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過分熱衷於糾正重工業生產與消費工業生產之間的不平衡，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府把重點放在企業的利潤指標上——但事實上基礎重工業在市場經濟中是不可能盈利的。1981年，根據官方數字，重工業產量下降了幾乎5%，但外國分析家的計算是在8%以上。[32] 為了解決經濟危機，政府採取了被稱之為「重新調整」的政策，中央政府重新對價格、工資、投資和原材料分配實行嚴格的控制，實際上是在城市工業中又重新建立了「指令經濟」。在恢復了中央計劃體制後，工業生產回升。1983年，重工業產量增長了12.4%，輕工業只增長了8.7%。[33] 這種增長速度以及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比例，與毛澤東時代後期基本相同。

如上所述，1980年代初期，在對城市工業部門實行「重新調整」的同時，政府把注意力放到農業經濟的非集體化、促進對外貿易和在沿海地區大力吸收外資方面。不過，政府並沒有完全放棄把市場機制引入城市經濟的努力。在對城市工業實行中央計劃控制的同時，政府大力鼓勵私人和「集體」企業的發展，鼓勵外商在城市和經濟特區建立合資企業。在城市工業經濟中，迅速發展的非國有制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模式五花八門，但它們卻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它們僱用的工人來自迅速擴大的勞動力自由市場。在「集體」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從1981年到1983年，僱用的工人增長到700萬）和在新的私人企業中勞動的工人（在1980年代初期，僱用的工人從100萬增加到超過300萬），拿到的工資遠遠低於國有企業的工人，而且他們沒有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職業保障和福利保障（如醫療保障和退休金），企業老闆可以根據經濟發展情況，任意僱用或解僱這些工人。他們與鄉鎮企業以合同制形式僱用的為數更多的領取薪水的工人一起，構成了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成員。在非集體化後，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成為流動勞動力，他們在城市之間漂泊，尋找他們能幹的臨時工作，從而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龐大。因此，雖然對城市工業進行大範圍改革的計劃暫時擱置，但在1980年代初期，「鐵飯碗」已經開始動搖，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改革者的基本目標之一。

1984年，隨著工業生產的穩定，加上受到農村改革成功的鼓舞，

政府又雄心勃勃地重新開始對城市工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經濟特區，媒體對此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官方媒體稱，鄧宣佈深圳的改革是成功的，為中國城市改革樹立了榜樣。鄧的視察為城市改革提供了動力。隨後，政府制定了與1979改革計劃基本相似的改革方案，但這一次改革的廣度和深度都遠非當時可比，政府進行改革的熱情和決心也更大。

改革方案有三個主要部分：第一，制定和頒佈了企業盈利的主要資本主義原則，相應地，約有四十萬個國有企業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工資、價格和投資的自主權。至少在理論上，衡量這些企業的成敗就看其在市場中是盈利還是虧損。

第二，1984年改革方案的目標是建立普遍的勞動力市場。在過去五年時間裏，中國已經朝著建立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方向發展。現在，鄧政權提出要「打破」國有企業固定工人手中的「鐵飯碗」(借用當時改革理論家的用語)，1984年，國有企業職工佔中國產業工人階級人數的40%。然而，這種「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對和尖鋭的批評，不僅是直接受到改革影響的那些相對有特權的工人反對，而且相當多的黨內老幹部也表示反對，對他們來說，工人終身的職業保障是革命取得的偉大成就之一。最後，政府作出了妥協：已經進入國有企業的職工依然享受終身職業保障和各項福利，但對新入廠的職工將實行合同工制。在隨後幾年裏，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合同制形式紛紛出台，逐漸取代了日益不穩當的「鐵飯碗」。[34]

1984年改革方案的第三部分是「價格改革」，三級價格結構取代了政府制定的官方價格的舊體制。關鍵的工業產品(如鋼鐵和石油)價格仍然由政府確定；允許其他工業產品價格在政府規定的範圍內上下浮動；絕大多數消費品和農產品價格不再由政府控制，允許根據市場行情自由浮動。

城市改革方案，伴隨著農業經濟的市場化，使中國進入一個動盪不定的五年期，一方面是工業經濟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另一方面是社會日益加劇的分裂。僅在1985年，本來就已十分龐大的工業經濟又增長了20%左右，城市地區、(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工業發展的高速度持續到1980年代末期。雖然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但城市居民的總體生

活水平在1980年代持續提高，不過，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由於1980年代初農村改革的成功(糧食和其他農產品成本相對較低)，而不是因為城市工業的效益得到改進。[35]無論原因是什麼，在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十年裏，城市工人的收入翻了一番多。人們的飲食結構也有明顯的改進，特別是肉類消費數量持續增加，衣服的數量、款式和質量也得到改進。家庭消費的大件，如彩色電視機、縫紉機和電冰箱，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城市人均住房面積增加了一倍，到處是大興土木的場面，城市居住環境日益改變。

物質進步是真實的，而且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歡迎，但是，伴隨著這種進步的，還有反覆出現的社會和心理的震蕩。繁榮和蕭條(官方術語是「過熱」和「緊縮」)的交替出現，頻率加快而程度加深，給城市居民帶來困苦和恐慌。特別是自從1985年實行「價格改革」後，在繁榮階段後繼之而來的通貨膨脹造成的蕭條周期性地出現。到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認的通貨膨脹率每年高達25%，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貨膨脹率還要更高。已經飽受桀驁不馴的市場力量衝擊的勞動群眾，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日甚一日的巨大不平等感到震驚。在有錢的企業精英和從「自由市場經濟」中千方百計謀取私利的官僚(他們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在充滿奢侈品店和夜總會的城市公開炫耀自己的財富)和那些居住在貧民窟裏靠到處打工謀生的遊民無產階級之間，其貧富差別之懸殊，與資本主義世界的任何大城市相比都不遜色。幹部的嚴重腐敗行為使民眾感到恐慌和憤怒，從高層到中下層的各級黨政官員，運用他們手中的政治權力操縱市場經濟，(與他們的親朋好友一起)率先致富。

*　*　*

1980年代後半期，中國經濟經歷了一連串的繁榮和蕭條的週期波動，城市人民遭受著與典型的資本主義早期時代相似的痛苦和不安。工業生產增長率依然很高，但通貨膨脹率和政府的財政赤字率也同樣高。在鄧小平時代第一個十年的後期，雖然官方的目標還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很少有人懷疑，在中國城市中已經形成了基本的

資本主義經濟。已經建立了勞動力的自由市場，還捧著「鐵飯碗」的工人數量越來越少；政府放開了對大多數商品價格的行政干預，商品價格根據市場環境自由浮動；大多數企業按照資本主義的盈利原則進行運作。缺少的只不過是正式由法律確認的財產私有制。但是，即使中國從根本上變成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它也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我們將扼要地概括其典型特徵。

官僚資本主義

所謂官僚資本主義，就是使用政治權力和影響、通過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方式謀取私利的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歷史上並不罕見，無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歷史中，它都曾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於許多社會之中。在中國歷史上當然也並不鮮見。有權勢的官僚與依附的資產階級為在商業和經濟活動中謀取利益而狼狽為奸，是二千多年封建時期的中國社會和經濟的一個顯明特點。[36] 在現代歷史上，1930年代和1940年代，資產階級依附於國民黨蔣介石政權的高官，就是現代世界歷史中典型的官僚資本主義例子之一。[37]

然而，共產黨中國的官僚資本主義的起源卻是非常獨特的。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官僚資本主義是在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準社會主義時期後出現的。在這段時期裏，作為一個有社會功能的中國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如我們在第六章中談到的，到1950年代中期，中國資產階級(當時用的術語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所餘資產已為共產黨國家贖買，這個階級的成員只不過是一小批日益年邁的養老金領取者，靠不可繼承的國家債券的有限紅利為生。這個垂死階級日益減少的成員，由於人數太少、年齡過大，承擔不了鄧小平的市場改革所需要的資產階級的角色。所以，創造一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資本主義階級的任務，便由共產黨國家承擔起來。在這個資產階級早被消滅了的國家裏，資本主義行為長期以來聲名狼藉並受到壓制，因此，新資產階級最合適的候選人，非日益膨脹的共產黨官僚機構的官員莫屬。

其中不少、也許黨的多數官僚最初對鄧小平的市場政策持反對的或最多是模稜兩可的態度。把經濟權力從國家和集體組織手中轉交給

家庭和私人老闆，似乎對官僚的權力、地位和收入構成威脅。市場經濟與共產黨領導人習慣的(許多人依然堅信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和共產主義目標難以相容。這是一種十分罕見的現象：官僚自身的利益與社會主義原則似乎完全一致。

然而，不管自己有什麼保留意見，官僚們履行著他們的職責，在「改革」和「四個現代化」的旗幟下，貫徹中央和國務院的政策。不久，幹部和官員們就發現，在市場經濟提供的為個人牟利的機會中——實際上取代資產階級留下的空位，他們佔據著獨一無二的有利政治位置。許多官員迫不及待填補了這個社會空白，最先幹上這一行的是人已中年的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子女，包括鄧小平和總理趙紫陽的孩子，他們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充當最能賺錢的買辦，主要活動於沿海城市和經濟特區，在外國資本和中國市場之間牽線搭橋，通過促成外國公司和國家貿易機構的生意，接受數目可觀的佣金。他們從有影響的掮客作起，很快就成立了自己的進出口公司，一些人以此為基礎，與國際金融組織和投資銀行建立了聯繫，並與香港和其他地方的龐大的資本主義跨國公司建立了關係。他們利用自己家庭的政治權力和影響獵取的財富，一部分無疑用於個人花天酒地的生活和海外投資，但他們把積累的大部分資金又投入到國內市場以牟取更大的利潤，為中國經濟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的高速增長提供了資金幫助。人們把這些有經營頭腦、貪得無厭的共產黨統治精英的子女稱為「太子黨」，他們是1980年代後期共產黨官僚機構中普遍出現的奸商和腐敗的最典型的象徵，引起人民群眾對鄧小平政權的普遍不滿，1989年的民主運動中就是這種不滿情緒在政治上的反映。

農村的地方黨員幹部也感受到手中的政治權力和影響能為自己帶來個人財富。雖然大多數幹部在開始時反對農業的非集體化，一方面是因為意識形態的信念，另一方面也是擔心自己失去權力和收入，現在，他們中許多人感謝鄧小平使農業經濟商業化的政策。因為解散集體組織、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地方幹部有權決定讓誰在土地承包和集體財產私有化中獲利。因此，在農村的多數地區，最好的土地和經營有利可圖的企業的權利，都由黨的幹部和他們親朋好友獲得。[38] 他們常常成為有錢的「專業戶」的帶頭人或保護人；他們擁有著

建築豪華住宅的土地和建築材料；他們(以及親朋好友)在作生意、創辦和經營工廠企業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簡言之，黨政幹部和他們的親戚成為新的農村資產階級中最醒目的成員。

1980年代初期，隨著農村主要由官僚成分組成的農村資產階級的形成，政府的市場取向政策，特別是在1984年重新開始工業改革後的政策，也同樣有利於那些有著強烈金錢慾望和野心的城市官僚。價格改革提供了賺錢的絕好機會，它允許多種商品價格隨著市場條件浮動——但還保持著平行的政府價格體系。這在實際上使黑市合法化，為官僚們致富提供了最普通、最簡單的手段——掌握相應權力的政府官員以較低的國家定價購買商品和物資，然後再拿到市場上以高出幾倍的價格售出。

1984年後，政府積極推進城市改革，鼓勵個人和家庭建立私人企業，也給城市官僚創造了牟利的機會。雖然直到1990年代後，黨政官員搖身變為私人資本家——當時把這種現象稱為「下海」——才成為普遍現象，但在1980年代，黨政官員充當由其親朋好友經營的企業的保護傘的現象已屢見不鮮，這些企業的最初資本通常就是由官員自己提供的，做生意需要官僚的保護傘，官僚想致富也要進一步開拓生意。一些官員實際上就是這些賺錢企業的所有者，但打的旗號卻是官方所謂的「集體所有制」。1985年後趙紫陽總理的「沿海戰略」，使中央放鬆了對地方政府的財政控制，鼓勵了地方主義，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和長江三角洲一帶，[39]為官員致富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更多機會。

這樣，在1980年代中期，新城市資產階級逐漸形成，新階級的組成，除了官僚資本家外，還包括人數迅速增長的大大小小私營企業主、國家、「集體」和個體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這是一個其成員還沒有自覺意識到自己共同階級利益的龐大複雜的社會團體，並將會繼續如此。然而，他們在社會和經濟意義上已經明顯區別於絕大多數城市人民——工廠和商業企業的工薪階層、中下層政府職員、小生意人和流動勞動力。但是，儘管新資產階級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但他們享受紙醉金迷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胃口卻越來越大。僅僅是他們對奢侈生活的追求這一點，就足以使他們完全與中國社會其他階

級區別開來 —— 他們盡情享受著豪華的賓館飯店和夜總會，擁有新的豪華住宅，在林林總總的專賣店中一擲千金，這使中國在國際貿易圈中獲得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費增長最快的市場的名聲。今天中國城市的貧富懸殊，與大多數西方和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大都市一樣巨大，而且最為耀眼。鄧小平政權提倡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標，無疑是超額實現了。

在人民共和國，官僚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是不只有官員個人或官員集體利用自己的政治影響經營或贊助私人盈利企業，而且是整個官僚機構本身，無論其是否情願，都捲入了市場，行使著資本主義企業的必要功能。由於中央政府大幅度削減財政支出，從小學到秘密警察部門的各種國家機構，都紛紛開辦公司或其他經濟實體 —— 從小商店到生產出口產品的大型工廠，從居民區的小飯館到接待外國人和旅遊者的豪華賓館。下海經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觀是人民解放軍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主力軍，除了生產和出口武器外，軍隊還開辦了許多民用品企業，經營著二萬多家工業、商貿和服務業的企業或公司。[40]

*　　*　　*

在鄧小平時代的中國，如此迅速成長的市場經濟的政治含義是什麼？當然，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民主在西方是不可分割的，自由市場不但產生經濟奇跡，而且還導致政治自由。著名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家和中國研究專家、已故的戈登・懷特 (Gordon White) 曾預言，後毛時代中國的市場改革的長遠結果，將是「社會經濟的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41] 然而，人們只要看一下現代歷史發展的記錄就不難發現，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42] 資本主義可以與包括法西斯政權在內的各種各樣的政權和諧共存。實際上，後期資本主義工業化潮流總是跟循著巴林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 稱之為「保守的現代化」的社會政治道路，明治時期的日本與卑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時代的德國就是明證，資本主義現代化也同樣可能導致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結果。[43]

不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一個充滿活力和獨立的資產階級、特

別是一個與現存政治制度有著利益衝突的資產階級，是議會民主不可缺少的成分，正如摩爾的總結：「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44] 如果說這一事實就是現代歷史留下的經驗，那麼這一經驗在中國並不適用。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與西方國家經典的資產階級不同，「後毛主義」的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是一個充滿活力的資產階級，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它是由共產黨國家創造出來的階級。這個階級主要的成分是共產黨幹部及其親朋好友，他們佔據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利用市場創造的新機會謀取財富。這個階級只有依附於共產黨國家才能發揮其經濟職能，它的成員需要國家的政治保護以免遭受工人階級和自由工會的侵犯。一句話，它是一個不具備民主素質的資產階級。對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構成嚴重威脅的，與其說是來自國家扶持的資本主義的受益人，不如說可能來自這種資本主義的受害者。在下一章中將對此作進一步的分析，追溯從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鄧小平時代結束這段時間的中國政治歷史。

註釋

1.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26。
2. 關於十九世紀市場社會和市場觀念在英國的發展歷史，參見波拉尼（Karl Polanyi）的經典研究著作，《大轉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3. 瑞斯金，〈中國的市場、毛主義和經濟改革〉（"Market, Maoism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318。
4. 例如，胡喬木在〈遵循經濟規律，加快四化建設〉的講話中就引用了列寧的這段話。參見《北京周刊》，1978年11月10日，頁10–11。
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
6. 參見本書第24章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扼要討論。
7.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14.1，頁355。
8. 1979年7月薛暮橋接受電台採訪的談話。引自加塞德，《復活：毛後的中國》，頁358。

9. 參見賽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
10. 關於人民共和國與普魯士的比較，參見德克爾斯 (Wolfgang Deckers) 頗有見地的文章〈毛澤東和弗裏德裏克·利斯特有關脱鈎的比較〉("Mao Zedong and Friedrich List on De-Linking")，《現代亞洲雜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第24卷第2期 (1994年)，頁217–226。
11.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9.1，頁208。
12. 有關經濟特區的產生和早期歷史的精彩扼要敘述，參見何漢理，《中國的第二場革命》(*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頁163–171；關於對特區的出色評論，參見佩珀，〈中國的經濟特區：拯救蹣跚的改革的一劑藥方〉("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Current Rescue Bid for a Faltering Experiment")，文章是1986年提交的大學研究報告，刊印於《亞洲研究學術公報》(*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第20卷，第3期 (1988年)，頁1–10。
13. 《每日中國消息》(*China Daily News*)，1989年4月21日，頁1，1995年1月9日，頁1。1996年，外國投資增加到400億美元，1997年也是400億美元。又見《華爾街日報》，1997年12月15日，頁A10。
14. 1995年，中國的人均外債大約為1000美元。相比之下。墨西哥的人均外債約為1.7萬美元，巴西為9000美元，匈牙利為3.1萬美元，波蘭為1.1萬美元。世界銀行，《經濟發展趨勢，1996年》(*Trend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數字引自該書頁60、109–110、236–237、430–431上的統計表。
15. 雷斯 (Simon Leys)，一位對毛主義持批評態度的學者，認為中國人迷戀西方的東西是一種「不健康的心態」，他的結論是：「(民族自信心是) (毛) 政權取得的最積極的成果之一，卻受到了這樣的挫折，令人悲傷。」《紐約時報》，1979年1月3日評論版。
16. 關於大寨在毛和鄧時代的實際歷史，有許多深入的第一手研究著述，例如，參見謝讜、白瑞琪 (Marc J. Blecher)、米歇爾·邁斯納 (Mitchell Meisner)，〈昔陽縣的組織、增長與平等〉("Organization, Growth and Equality in Xiyang County")，《現代中國》(*Modern China*)，1979年4月，頁139–186；謝讜等，《國家農業政策：大寨榜樣與後毛時代的變革》("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The Dazhai Model and Local Change in the Post Mao Era")，載賽爾登和利皮特主編，《中國的社會主義過渡》，頁266–299；謝讜，〈農業承包責任制：在昔陽與大寨的實行〉("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in Agriculture: Its Implication in Xiyang and Dazhai"），《現代中國》，1982年1月，頁41–103；韓丁，《翻身》。

17. 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頁288。
18. 1987年，所有對私人企業僱傭工人的數量限制均被取消。
19. 例如，參見陳佩華（Anita Chan）、趙文詞（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陳村：毛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歷史》（*Chen Village: The Recent History of a Peasant Community in Mao'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頁265–284。
20. 關於非集體化，參見維維恩・舒在〈人民公社的命運〉（"The Fate of the Commune"）一文中頗有見地的分析，《現代中國》，1984年7月第3期，頁259–283。
21. 沃克（Kenneth R. Walker），〈調整時期的中國農業，1979–1983〉（"Chinese Agri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Readjustment, 1979–1983"），《中國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表1，頁803；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表12.1，頁291。
22.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設的大規模灌溉、洪水控制和技術基礎設施，就不可能有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農業大豐收。參見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第296頁；韓丁，〈鳳陽之行：中國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調查〉（"A Trip to Fengyang County: Investigating China's New Family Contract System"），《每月評論》，1983年11月第6期，頁14。
23. 參見麻省理工學院崔之元（Cui Zhiyuan）教授的研究成果，崔之元認為鄉鎮企業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並對此作了清晰的有說服力的論證，例如，他的論文〈中國農村的工業化：靈活的專業化、默比烏斯（Moebius-Strip Ownership）的所有制和蒲魯東（Proudhonian）的社會主義〉（芝加哥大學研究論文，未正式發表）。有關河南農村最近的集體化和民主化情況，參見崔之元編輯的《從專制體制到民主體制的合作化：中國縣鄉級政治體制改革》（*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essurized System to The Democratic System of Cooperation: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24. 根據官方統計數字，從1949年到1992年，中國的可耕地面積下降了15%。一些國外學者認為實際下降數可能更高，參見斯米爾（Vaclav

Smil)，《中國的環境危機》(*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頁57–58。

25. 關於毛時代晚期的平均主義和不平等現象，參見瑞斯金，《中國的政治經濟》，頁223–256。
26. 在這一點上，中國加入了世界潮流。關於「農民的滅亡」，參見霍布斯邦(Eric Hobsbrawm)在《極端時代：世界歷史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一書中饒有趣味的探討。
27. 例如，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在198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曾這樣預言過。1982年9月13日《北京周刊》，第37期，頁18–19。
28. 例如，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Buil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當前中國的主要任務》(*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 Beijing: The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7)，頁53–58。
29. 例如，參見卡恩(Joseph Kahn)發表於1995年3月10日《華爾街日報》A1和A4版的報道。
30. 有關這個時期對工業企業進行調整的具體情況，參見埃德蒙・李(Edmund Lee)，〈毛之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知情人的評說〉("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An Insider's View")，《當代亞洲研究報告》(*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83年1–2月，第15卷，第1期，頁16–25；菲爾德(Robert Michael Field)，〈1978年後中國工業的變革〉("Changes in Chinese Industry since 1078")，《中國季刊》，1984年12月，第100期，頁742–761。
31. 老資格的軍隊將領、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一次講話中說，1979年城市的失業工人約有2000萬。香港《明報》於1979年6月14日登載了這個講話。中國城市的失業問題自1950年代就已成為周期性的問題，只不過官方未予以承認。在鄧小平時代，由於大批知青返回城市以及虧損企業的關閉，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32. 蘇黛瑞(Dorothy J. Solinger)，〈第五屆全國人大與決策過程：改革、調整和反對〉("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Process of Policy Making: Reform, Readjustment, and Opposition")，《亞洲研究》(*Asian Survey*)，1982年12月，第22卷，第12期，頁1263。
33. 國家統計局，〈1983年國民經濟計劃完成公報〉，《北京周刊》，1984年4月第14期，頁20–24。

34. 有關複雜的企業合同工形式的研究，參見白瑞琪和維維恩・舒，《被困住的鹿：中國縣級政府與改革》(*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頁109–121。該書通過對中國河北省一個縣的調查，深入探討了這一問題，頗有見地。
35. 正如瑞斯金在《中國的政治經濟》中所論的，見頁372。
36. 白樂日 (Etienne Balazs) 在《中國的文明與官僚》(*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一書中對中國傳統的官僚資本主義的運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參見該書頁1–4。《中華帝國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第3章。
37. 有關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的文獻很多。有關的英文著作，參見易勞逸 (Lloyd E. Eastman)，《流產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1937》(*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易勞逸，《毀滅的根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柯博文 (Parks M. Coble)，《上海資產階級與國民政府1927–1937》(*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白潔兒 (Marie-Claire Bergere)，《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歲月1911–1937》(*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8. 學者對廣東省一個村莊的跟蹤研究提供了極有說服力的例證，該村的黨支部非集體化中獲取了全村最好的土地和傢具，參見陳佩華、趙文詞、戈格，《陳村：毛中國的農民共產主義歷史》，頁265–284。
39. 關於趙紫陽任總理及其短暫的總書記生涯，參見第24章。
40. 有關例證，參見海耶 (Eric Hyer)，〈中國的軍火商：指令利潤〉("China's Arm Merchants: Profits in Command")，《中國季刊》，1992年12月，第132期，頁1101–1118。1998年7月，黨總書記江澤民下令人民解放軍與經商徹底脱鈎。對這一命令能否真正貫徹，人們普遍持懷疑態度。參見裴覺世 (Seth Faison)，〈中國開始解開軍隊－工業之結〉("China Moving to Untie Its Military-Industrial Knot")，1998年7月28日《紐約時報》A1版。

41. 戈登・懷特 (Gordon White)，《騎虎難下：後毛時代的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政治》(*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頁256。
42. 對這一複雜問題的深入分析，參見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民主與資本主義》(*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43. 巴林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專政與民主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特別是第5、8章。
44. 前揭書，頁418。

第二十四章

爭取民主的鬥爭

從1978年12月在三中全會上的勝利到1994年初——此時這位90歲的元老因太虛弱而不再公開露面——這段時期裏，鄧小平是中國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人」。換句話説，他是列寧式的黨和國的獨裁者和所有重大決定的最終仲裁者。

然而，在鄧小平統治中國的15年裏，與其前任不同的是，他從未謀求獲得與實際權力相匹配的最高政治頭銜。實際上，他挑選他的下屬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第一位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下屬是胡耀邦（1915–1989）。胡耀邦於1930年參加紅軍，時年15歲；作為長征的幸存者，他與鄧小平在長期的內戰歲月中建立了政治關係，他是鄧小平指揮的共產黨第二野戰軍下的一位政治委員。1949年後，他的政治生涯隨著其上司的命運而起伏。1980年，毛澤東的首位繼承人華國鋒被迫放棄了權力（隨後又放棄了頭銜）後，鄧小平選擇胡耀邦擔任重新恢復的總書記一職，即中國共產黨形式上的領導人，毛澤東長期擔任的黨主席一職也隨之不復存在。

胡耀邦是列寧式政黨中為數不多的提倡民主價值觀和民主程序的領導人之一。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有關自由理論的影響下，胡耀邦在鄧時代為毛時代受政治迫害、特別是在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平反」中起了關鍵作用。在最高領導人周期性（但卻是短命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特別是在1983–84年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中，胡耀邦雖然也受鄧小平的政策和偏好的左右，但他還是盡其所能地保護知識分子。1980年代初期，通過民主馬克思

主義者、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王若水、以報告文學見長的記者劉賓雁等人的努力，這家官方報紙曾一度提倡民主、揭露官員腐敗問題，在這期間，胡耀邦是《人民日報》的默默保護者。胡耀邦做的這些未必能使他贏得他所尋求的群眾的支持，但至少使他得到了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真誠的尊重。趙紫陽(1919–2005)是鄧小平選擇的另一位接班人，在其政治生涯結束之際，意外的事變使他扮演了類似殉道者的角色，若非如此，他遠不如胡那樣受到廣泛的尊敬。趙是湖南一個鄉紳的兒子，1930年代中期，當他還是一個少年時便參加了共產主義運動，在內戰的最後十餘年裏一直在紅軍裏做政治工作。如同這一代革命者中其他較優秀成員一樣，1949年後，趙在革命後的官僚體制中獲迅速擢升，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一度被罷黜。但當毛在1972年開始重建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的黨時，趙恢復了他作為廣東省委書記的職務，隨後，他在廣東小心翼翼地幫助了以「李一哲」三個縮寫字而聞名的民運人士。[1] 然而，在1970年代後期趙所以引起鄧小平的注意，並非是他充當了青年民運人士的保護者的作用，而是他在當四川省委書記時推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政策。1980年，鄧小平把趙紫陽調進北京，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曾長期擔任過的職務。身居要職的趙紫陽是鄧小平對中國農業和工業進行資本主義改造的政策、特別是中國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開放」政策的最積極、最有效率的執行人。

1985年，中國既感受到市場經濟帶來的經濟活力，也感受到其造成的社會負面作用。工業、商業和對外貿易處於典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中「繁榮-蕭條」循環圈中的繁榮階段。僅1985年一年，工業生產增長率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20%，但是，與此同時，許多人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痛苦後果。1985年上半年，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通貨膨脹的爆發使居民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升了30%，普通城市居民、特別是工廠工人和政府下層職員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此外，隨著貨幣和商品的迅速增加，官僚腐敗現象也越來越嚴重——群眾對幹部腐敗現象的憎恨情緒更是日益高漲，揭露出來的一些特大腐敗案件進一步激化了群眾的情緒。[2]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在越來越商業化的農業經濟中，由於穀賤傷農，很多農民不種糧食，轉而種植有

利可圖的經濟作物，導致1985年糧食產量意外地大幅度下跌。糧食產量下降在經濟上、更在心理和政治上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強烈的衝擊，這也是1980年代後半期中國社會焦躁和不安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許多中國人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都感到1985年是一個分水嶺，正是在這一年，疑慮和悲觀情緒取代了鄧小平時代初期的希望和樂觀情緒，[3] 鄧小平的個人威望開始下降 —— 到1989年初，這位曾享有崇高威望的領袖和改革時代的開拓者，成為城市群眾愚弄和嘲笑的對象。[4]

黨的最高領導層內對市場化的步伐和社會影響也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集中表現為鄧小平與老資格的經濟計劃決策者陳雲之間的緊張關係。陳雲主張市場力量只能作為一種輔助因素。陳雲成為那些維護國有工業和中央計劃體制的官僚部門的主要代言人。無論如何，日益混亂的經濟形勢 —— 用當時的話說，就是經濟「過熱」，迫使政府在1985年下半年實行緊縮政策，導致工廠關閉，工人失業。

然而，鄧小平、特別是趙紫陽繼續推進資本主義改造計劃。1986年，趙提出了他的「沿海戰略」，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太平洋沿海，即從東三省、山東到南方的廣東等地，大力加強對外貿易和引進外資的工作。他還主張擴大經濟特區的範圍，讓工廠和其他企業作為獨立經營單位，自負盈虧，即企業實際上要按照最盈利的資本主義原則進行生產活動。政府重新強調打破以「鐵飯碗」而聞名的職業保障體系，以創造更完全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事實上，一些與趙有密切聯繫的改革推動者，力主建立「勞動後備大軍」，就是說，始終保留一支失業工人大軍，在需要的時候廉價僱用，不需要時立刻解僱。

*　*　*

鄧時代的歷史與毛時代的情況相同，相對的思想和政治解放時期與政治鎮壓時期呈現出周期性的交替。1986年春季，為了紀念毛的「雙百方針」發表30週年，鄧小平時代出現了一個政治上相對寬鬆、思想上相對活躍、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時期。一些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他們把重點放在馬克思主義理

論中非正統的觀點上，並且指出，理論要隨著不斷變化的社會現實而發展前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出發點。理論界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對馬克思的異化理論 (concept of alienation) 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把異化理論作為分析新中國社會與政治現實的思想武器。對異化理論的討論，在後來的反對「精神污染」運動中受到批判。以「異化學派」理論家而聞名的原《人民日報》總編輯王若水，在反對精污染的運動中被撤銷了職務。1986年夏季，他在上海的一份報紙上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人的哲學〉的文章，與他在異化理論爭論初期的其他文章一樣，他在這篇文章中主要強調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關於民主和人道主義的思想。

1986年11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進行基層人大代表民主選舉的法律，這可以說是對鄧小平提倡的「政治改革」的具體 (但有限) 的回應。對這一選舉法的第一個考驗、也是對鄧小平政權民主誠意的考驗，來自位於省會城市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校園。科技大學是一所重點高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從北京遷到相對安靜的合肥市 (安徽省會)，此後便一直在合肥。

這所學校招生要求很高，很多學生是高級幹部或高級知識分子的子女。1986年12月5日，3000名大學生就地方選舉中缺乏對候選人的真正選擇舉行了抗議活動。大學生的民主要求得到了時任學校副校長、著名的天文物理學家方勵之以及許多與總書記胡耀邦有密切聯繫的知識分子的公開支持。在持續的抗議活動中，涉及到的問題越來越廣泛，包括對日本的民族憎恨情緒。在紀念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爆發50週年時，反日情緒達到高潮。在「一二・九運動」中，為了反對蔣介石對日本侵略實行的不抵抗政策，老一代的大學生發動了抗議活動。[5]

1986年的學生民主運動很快從合肥市擴大到長江中下游的十幾所城市，12月20日，上海市5萬名學生在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集會舉行抗議活動，並與警察發生了一些規模不大的衝突。此時，鄧小平以及其他支持他的、已經退休但依然有影響的黨的領導人已決意要制止大學生的民主運動。學生已經開始得到上海和其他城市中工人 (雖然人數不多) 的支持，他們與胡耀邦陣營中的某些民主知識分子似乎也有聯繫。

整個運動已超出了共產黨組織的控制範圍，實際上，運動本身就是對黨的控制的反抗。學生運動的勢頭使官方聯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景象，並通過媒體譴責學生運動。各大城市當局受命採取措施，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在政府進行鎮壓的威脅下，加上馬上要進行學期考試，學生運動在1987年1月基本上平息下來。然而，官方還是採取了報復措施。雖然為數不多的被捕學生不久就被釋放——據說他們是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欺騙，但在運動中被捕的工人依然被以各種罪名、包括「反革命」罪關在監獄。官方又開始了新一輪針對知識分子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這是鄧小平時代的第三次這類運動。方勵之被開除黨籍，撤銷了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致力於揭露黨內腐敗現象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也成了黨的敵人，被清除出《人民日報》社，同時，又第二次被開除黨籍。[6]

但是，這場反自由化運動的最大犧牲者是胡耀邦。1987年1月，他被免去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早在數月前，鄧小平就已決定撤銷胡的總書記職務，其中部分原因，是因為胡為限制高幹子女的腐敗現象而採取的措施及胡與民主知識分子的連繫，激怒了老一代黨的領導人。原計劃是在1987年秋季召開的中共十三大上，根據黨的有關規定正式解除胡的職務，但時間表不得不提前了，作為對1986–1987年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反應，以非正常程序解除了胡的職務。胡被指責放鬆了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被迫承擔了動亂的全部責任。解除胡的職務是作為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宣佈的，但中央政治局實際並沒有開會，是鄧小平在與一批黨的領導人——後來被稱為「老人幫」——的非正式會議上決定的。野心勃勃的趙紫陽總理可能出席了這次會議，雖然他後來否認自己與胡的下台有任何關係；無論如何，趙是這一事件政治上的最大受益者。1987年1月，他接替胡被任命為中共中央代總書記，在同年秋召開的黨的十三大上，他正式就任總書記一職。胡耀邦還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地位，而且還是六名中央常委之一，但他已失去了權力和影響。李鵬接替趙擔任了國務院總理，他是一個曾在蘇聯學習過的工程師，適應既存的「黨–國家」官僚體制的風格。作為一個技術官僚，李鵬只是一個執行者而不是政策制定者，因而是忠實執行鄧小平命令的合適人選。

*　*　*

在趙紫陽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期間，資本主義的步伐明顯加快。在趙為促進出口型經濟而提出的「沿海戰略」指導下，對外貿易蓬勃發展，各項吸引外資的優惠政策相繼出台。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和土地市場迅速形成。「價格改革」進一步推進，越來越多的商品價格完全由市場決定。外資的大量流入、房地產市場的迅速發展、由易於為人操縱的「市場力量」來決定商品價格 —— 所有這些發展都為官商和官員致富創造了新的絕好機會。

然而趙紫陽仍然感到有必要強調社會主義目標。因此，對所有人都再清楚不過的正在朝資本主義發展的經濟體制，在官方那裏成了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批與趙和鄧有聯繫的知識分子，紛紛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為這一政權的市場政策的合理性進行論證。他們從馬克思的原著中發掘有關馬克思稱讚資本主義經濟的活力及其歷史進步意義的論述，反覆強調鄧小平在1956年提出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按照這一公式，可以選擇任何能夠促進現代經濟迅速發展的方式，而不必考慮這種方式可能帶來什麼樣的直接社會後果。他們為趙紫陽發明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使其成為當時的主要理論建樹。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主要點是，由於生產資料「公有制」佔主導地位和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所以中國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這兩條所謂的社會主義原則本身當然就是虛構的，而且它現在脫離社會現實的程度更甚於毛澤東時期。根據鄧小平理論的定義，中國是社會主義 —— 但因為經濟上依然處於落後狀態，因此是不成熟的社會主義。只有在現代生產力發展到足夠高的水平後，才能實現發達的社會主義，但是這需要時間，實際上需要大半個世紀。[7] 與此同時，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有效方式，把所有的力量都完全投入到實現經濟現代化的目標上。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被用來論證使用資本主義方式的合理性。這一理論不無道理地設想，在有利的政治和國際環境中，市場經濟為迅速實現經濟現代化提供了最好的機會 —— 因此也是奠定發達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須的物質基礎的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發達」社會主

義被設定在遙遠的未來，人們很難看出它與生活在現在的人所作的努力有什麼聯繫。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尚未出生的後代人的任務和目標，因此對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人來說，它不過是一個超越想像的彼岸事物。此外，由於理想社會的實現被無限推遲，所謂的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已經毫無意義，而社會主義的手段和目標完全被混為一談。按照本來的理解，現代經濟發展只是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主義本身被定義為完全的經濟發展過程。造成這種思想混亂的始作俑者是身為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1992年，他在其最後一次公開談話中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最終達到共同富裕。」[8] 誠然，這種看法確實值得稱頌，但這段話也同樣可以用來形容資本主義的「本質」。

黨的領導人還常常把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統治等同於社會主義，它基於這樣一種理論，即無論道路有多麼曲折，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發展與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保證。這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觀點，但人們有充分的理由懷疑他們更關心的是共產黨在現在的統治而不是未來的美好社會。另一個普遍的作法是把社會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如鄧小平在1980年說(他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談到這一點)：「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9] 最終，鄧的時代在經濟上是成功的，但從社會意義上說卻是失敗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和價值觀念被隸屬於使中國「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目標，現代經濟發展和強大的國家機器是這一目標的主要因素。

1987年10月最後一週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正式任命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10] 大會還批准了趙自1月繼任胡耀邦職務後實行的政策——加快中國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政策，雖然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劃的組成部分。十三大的另一個主要內容是高度評價鄧小平的成就，對鄧的歌功頌德與當年對毛的個人崇拜有諸多相似之處。實際上，趙對鄧小平思想的評價，與當時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如出一轍，是「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典範」。[11] 1978年的三中全會與1949年的革命勝利有著同樣重要的歷史意義，是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具體歷史條件下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12] 這次大會對建立新的個人崇拜起了重要作用，講話、書籍和劇

作鋪天蓋地地宣傳這位最高領袖從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戰爭時期直到1980年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生涯和思想。

在十三大召開之前，一般都認為鄧小平(和其他老一代領導人)在這次大會上將不再擔任黨內的領導職務，不再具體過問黨和國家政策的制定。鄧和其他老一代領導人確實辭去了中央政治局的職務。在中央政治局的五名常委中，十三大後只有趙紫陽繼續留任，其他新當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要比前任年輕的多(喬石、李鵬、胡啟立和姚依林)，常委的平均年齡從77歲下降到63歲。新政治局常委身著西裝，繫著領帶出現在公眾面前(沒有穿老一代領導人喜好的「毛式服裝」)——用西方輿論界的話形容，這是「精力充沛」和「現代」的象徵。

儘管人事發生了變動，但在十三大後鄧小平依然掌握著最高權力，與在十三大前沒有什麼兩樣。鄧小平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他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所享有的聲望，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在十三大後出人意料地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從而實際上掌握著人民解放軍。[13] 此外，以「老人幫」而聞名的已經退休的一批老一代領導人，在長時間建立的個人關係的基礎上，通過非正式的政治網繼續對黨的政策和實踐發生著巨大的影響，他們團結在鄧小平身旁，也加強了鄧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

* * *

在十三大的決定和鄧小平關於更「大膽」地加快發展步伐的指示精神的鼓勵下，趙紫陽於1988年初加快了資本主義改造的進程。「沿海發展戰略」得到全面實施，有著2億人口的沿海地區(從東北到廣東)全面向外資開放。外資的大量湧入和擴張的財政政策，刺激工業經濟高速發展(1988年達到21%)，但同時也導致腐敗現象進一步發展蔓延，最終在這個十年結束之際幾乎吞噬了鄧小平的政權。

趙紫陽市場取向的改革還包括「企業改革」，取消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財政和管理方面的控制，但這種嘗試並未見效。為了推進改革，在鄧小平的積極支持下，趙又進行了「價格改革」，逐步取消國家對大多數商品、包括成品和原材料價格的控制，由市場決定其價格，但僅是

對放開價格的預期就引發了經濟和財政混亂。在已經遭受嚴重通貨膨脹壓力的經濟狀況下，對通貨膨脹的恐懼導致人們衝向銀行提取現金、瘋狂搶購、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工商企業也趁機大幅度漲價。到1988年秋季初期，大城市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年均30%。經濟已失去控制，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的緊縮政策，防止出現災難性的社會衝突。「價格改革」甚至還沒有正式開展就已夭折，信貸受到嚴格限制，貨幣供應量和投資量大幅度減少，中央政府對已實際上已獲得自主權的企業和地區又重新加以控制。

無論是通貨膨脹政策還是限制物價的緊縮政策，都給城市多數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困難，特別是工廠的工人、政府機構中的下層官員和職員、知識分子、學生和其他依靠國家工資或補貼生活的人受影響最大。由於化肥價格昂貴、政府低價收購糧食以及腐敗官員徵收的苛捐雜稅，農民、特別是那些直接從事種植穀物和其他基本農作物生產的農民，日子十分艱難。

1988年秋季，政府採取嚴厲措施給「過熱」的經濟「降溫」，使受通貨膨脹影響的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下降。這些措施包括嚴格控制貸款，導致工廠關閉、失業人口劇增。其中鄉鎮企業遭受打擊最大，鄉鎮企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產值以年均30% 的速度遞增。1980年代末期，在鄉鎮企業中的就業的人數約有1億人。然而，農村工業嚴重依賴於易於得到的貸款，而1980年代末期政府的緊縮政策，迫使一些鄉鎮企業關閉，多數鄉鎮企業縮小生產規模。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工人 (特別是青年女工) 失去工作，其中一些人加入了由貧困農民組成的民工「流動人口」行列，他們從農村湧向城市，然後又從一個城市流向另一個城市，尋找臨時工作。1989年春季，據估計，約有五千多萬人加入到了這支到處流動的遊民無產階級隊伍中。

儘管有通貨膨脹，或者說有時正是因為通貨膨脹，至少是在1988年經濟高漲的階段，有一些人發了橫財。這些率先致富的人包括從事對外貿易、特別是利用政治影響作外貿生意的人，他們有條件拿到國家的低價商品和物資，然後轉手在國際市場上以高價售出；迅速發展的私營或集體企業中的管理人員或老闆；農民企業家、甚至城市街頭的商販；特別是那些掌握著國家的低價商品和原材料的腐敗官員。但

是，在一個貧富差距以驚人速度拉大的社會裏，對多數人來說，通貨膨脹使生活水平每況愈下 —— 政府於1988年下半年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嚴厲緊縮政策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水平的下降，再加上對腐敗的政府官員和其他採用不正當手段牟取暴利的人的憤怒，釀成了1989年春季的社會動盪。群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不滿迹象隨處可見：工廠工人舉行罷工或是怠工；犯罪率大幅度上升(根據官方數字，1988年的犯罪率比1987年增長了50%)；城市和鄉村出現了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犯罪組織；吸毒、妓女、賭博和色情活動這些舊社會的沉渣迅速氾濫；大學生的政治活動從校園擴展到城市街頭，出現了非法的「大字報」；與當地農村幹部發生暴力衝突以及民工「流動人口」的急劇膨脹，反映出了農民的不滿。官方對社會動蕩的現狀十分清楚，專門組建了機動武裝警察以對付預期中的動亂，派警察出國學習鎮壓城市暴亂的最新技術。

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為保衛共產黨國家，官方除了進行物質準備外，還發明了新的理論進行論證。當時的一個重要迹象是，與總書記趙紫陽關係密切的知識分子，為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政治專制相結合 —— 實際上源自鄧小平經濟改革的一種奇異組合，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即所謂的「新權威主義」。他們提出，東亞國家，即日本、台灣、新加坡和南朝鮮經濟現代化成功的歷史經驗表明，現代經濟發展必然地、特別是在涉及控制大眾和管束勞動群眾方面，需要一個強大的的國家和強有力(而且開明)的領導人。不用說，在鄧小平領導下的現存政治結構當然符合這樣的要求；但是，新權威主義者一廂情願地說，除此之外，對一個明智和強而有力的領導人來說，中國經濟的成功還需要一個有像他們這樣的知識分子參加的「決策集團」，他們可以設計未來，並且向領導人提出如何才能實現未來的建議。與此同時，中國實行不起民主，因為民主會破壞共產黨政治，使那些市場經濟的受害者上街鬧事，從而延誤中國的現代化。新權威主義者沒有完全排除政治民主，但是，他們提出，政治民主必須以高度發展的經濟

和一個有活力的資本主義階級為前提，而這樣的前提現在還不存在，因此，民主只能是遙遠未來的事情。

新權威主義理論得到了總書記趙紫陽的默許，它是基於、或如其鼓吹者宣稱的是源自鄧小平的思想。新權威主義受到了民主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的批評。許多民主馬克思主義者，如蘇紹智等人，因與已下台的原總書記胡耀邦有密切關係而在政治上失意，對新權威主義的批評反映出他們對鄧小平和趙紫陽的不滿。[14] 他們提出，專制方式無論對發展經濟多麼有效，都不可能導致民主的結果，他們對東亞小國家的發展經驗能否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政治和經濟的需要表示懷疑。

雖然圍繞新權威主義的爭論內容並無新奇之處，但它確實反映出在市場改革時期的前十年裏，政治觀點和社會理想發生的變化。1978年，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民主」前景的鼓舞下，積極地加入了支持鄧小平的陣營。十年後，在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中，無論是趙紫陽的理論家還是其民主派的對手，都很少提到社會主義。雙方都主張實行迅速產生資本主義經濟的市場改革，區別僅在於是在專制領導下還是在民主政治政權領導下實行市場改革，但無論是在哪種情況下，他們都認為知識分子應發揮重要的歷史作用。馬克思主義基本上被遺忘了，趙的理論家用的是保守的西方政治學理論，民主派知識分子用的是老一套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在十年的時間裏，作為鄧小平政權的支持者和理論家的知識分子，放棄了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轉而鼓吹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專制的新權威主義理論；知識分子的轉變幾乎與社會經濟的根本性變革同樣醒目。

《河殤》

就在一些知識分子還在圍繞新權威主義進行爭論時，1988年6月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播出的電視片《河殤》，又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兩件表面上無關的爭論有許多共同點。兩者的核心問題都是知識分子的政治作用，這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多年來一直耿耿於懷的問題；兩者都涉及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有關的政治派別鬥爭；最重要的是，兩

場爭論都反映了資本主義在思想和物質上的勝利——在鄧小平以「社會主義民主」為旗幟掌握權力後僅僅十年的時間，中國的思想理論界中就已經沒有了社會主義觀念的一席之地。

《河殤》以宏大的場面和富有激情的解說，尖銳地批判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製片者在五四時期反傳統精神的影響下，認為中國千年來的停滯不前和近代落後的主要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念的有害影響。《河殤》用黃河的混濁和氾濫比喻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呈現出周期性的社會政治制度崩潰，然後又是依據亙古不變的價值體系重建舊的社會基礎。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這種「超穩定」結構，是中國歷史中的萬惡之源，窒息了人的創造力，阻礙了社會經濟、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黃河是中華文化和文明的搖籃，是中國這個以農民為主的內向社會的深層保守主義和落後的象徵，這種社會只能重複生產自身及其令人窒息的傳統。

《河殤》中黃河的對立面是充滿活力的藍色大海，象徵著西方資本主義開放的海洋文化，代表著現代科學技術、工業和民主蓬勃向上的文明故鄉。與1919年五四運動時主張「全盤西化」的先驅者(參見第二章)相似，《河殤》的作者找到了所有在中國和中華文化中沒有的東西，進而描繪了一幅供中國效法的浪漫化的「西方」圖象。但是，五四運動並不是只談向西方學習。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提倡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他們還清楚地認識到西方帝國主義的威脅和西方資本主義對社會造成的危害。這種認識促使他們常常是痛苦地把西方國家中進步的方面與反動的方面區別開來，許多人由此轉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尋找解決困境的出路。相反，在70年後，他們的所謂繼承者卻完全無視西方國家在中國現代史中既是老師又是壓迫者這一痛苦的困境，把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長期壓迫歷史，輕描淡寫地說成是充滿活力的「藍色」文明與停滯的「黃色」文明之間的「文化衝突」。

《河殤》的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的看法不同，在對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上，觀點也完全不同。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雖然承認先進的西方國家在物質和思想上的成就，認同西方的文明，但他們並不認同與西方科學和民主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實際上，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普遍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久

將作為現代西方文化最先進的代表而出現。而在1980年代後期，情況正相反，中國的知識分子把「西方」看作是一個完美的整體，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現代科學和民主的真正繁榮發展，以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為前提，無論如何，這一看法得到許多人的贊同——鄧小平的市場改革和官方的意識形態（即強調馬克思主義有關資本主義的進步性的觀點）對此當然求之不得。《河殤》的解説員的一句話最能説明問題：「馬克思很久前曾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喪鐘並沒有敲響。」[15]

鄧小平時代後期的知識分子、或至少是那些贊成《河殤》表達的觀點的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共同點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兩者都把現實的社會與政治弊端歸咎於傳統文化的有害影響，但是對傳統進行批判的內容卻發生了變化。在五四運動時期，傳統是與社會保守主義聯繫在一起，傳統服務於反動的政治目的，所以，反傳統具有激進的意義。但是在革命勝利後的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重負與其説是傳統文化，不如説是共產黨革命產生的斯大林主義的國家官僚機器。把中國的問題歸結為「封建」文化的消極影響，實際上是為了推卸共產黨政權對中國社會中的問題應負的責任。因此，在五四時期反對傳統文化是一種社會激進思潮，而在70年後，無論是出自有意還是無意，反傳統文化代表的卻是為共產黨政權進行辯護的保守主義。得到總書記趙紫陽欣賞的《河殤》的作者，把當代中國的種種弊端都歸咎於中國傳統文化，充其量不過是重複了鄧小平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斷言，即共產黨現在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中國長期存在的封建傳統影響造成的，與共產主義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政治制度無關。然而，與趙紫陽不同，並不是所有的共產黨政權的高級官僚（其中許多人在文化問題上持保守態度）都精明到足以欣賞反傳統文化在政治上的功用。

《河殤》多次提到1919年，但對1949年卻不置一詞。除讚揚周恩來、鄧小平及趙紫陽的「對外開放」外，《河殤》完全不談共產黨的革命或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河殤》作者眼中，毛的革命對改變中國僵滯的歷史，沒有任何積極意義，不過是「封建」落後意識的反映和繼續。

《河殤》基本上無視或是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由此，也否定了承擔

革命的主體，即農民，他們批判農民是落後傳統和「封建」意識的社會載體。一位著名的西方學者在評論《河殤》時說：「在片中，農民社會簡直無可救藥。唯一採訪的一位農民在回答他作為一名多子女的父親有何感受時，這位農民大談中國人口過剩的問題。」[16]

然而，儘管背負著沉重歷史和傳統包袱的中國現狀不盡人意，但《河殤》最後得出了充滿希望的結論，中國最終已作好與千年「超穩定」封建結構決裂的準備。一方面，先進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理想現實，給中國樹立了一個明確的可以傚仿的榜樣，《河殤》在最後一集中將這一有著巨大吸引力的榜樣稱為「蔚藍色」文明。另一方面，中國現在的領導人通過實行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市場改革政策，承認傚仿西方榜樣的必要性。《河殤》還特別(間接但十分明顯地)讚揚了趙紫陽和他的沿海發展戰略。但是，根據《河殤》的編導者，中國最大的希望在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智慧，他們是現代化的社會代表，真正懂得民主和科學，因此，在實行市場改革計劃中，為共產黨提供正確的指導。解說員在電視片滿懷激情地說，知識分子是歷史給予中國人民的「一個獨特的團體」。正是知識分子「掌握著摧毀無知和迷信的武器；正是他們能夠與海洋文明實行直接的對話；正是他們能夠將蔚藍而又清澈的科學民主清泉引入到黃色土地中」。[17]

《河殤》決不單純是一個思想和藝術作品。它的出現與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後的派別政治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總書記趙紫陽是《河殤》編導者的主要政治保護人，所以，片中對趙及其政策的讚揚也就不足為奇。此外，正是在趙的作用下，《河殤》電視片得以在全國範圍內播放。《河殤》在1988年6月中旬首次在電視上播放後，「老人幫」的成員和其他黨的保守領導人批判這部片子鼓吹「文化虛無主義」，7月，中央負責宣傳工作的胡啟立下令停播《河殤》。但在趙紫陽本人的干預下，8月中旬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播放。直到9月，中共中央才召開會議，決定無限期地禁放《河殤》，但這時，《河殤》的錄像帶和編輯成書的解說詞已經在全國普遍發行。甚至有報道說，趙紫陽個人還把《河殤》的錄像帶作為禮物送給新加坡的獨裁者李光耀，後者十分讚賞「新權威主義」理論。

鄧小平政權及其批評者都普遍認為，電視片《河殤》對學生和知識

分子採取政治行動起了煽動作用，因此，是導致1989年民主運動的原因之一。例如，劉賓雁寫道，1988年的這部電視片(以及早些時代播出的電視劇《新星》)，「在中國社會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說明知識分子有能力發揮比過去更大的作用。」[18] 1989年6月4日悲劇發生後，共產黨領導人反復批判《河殤》煽動了官方所謂的「反革命暴亂」，通緝作者蘇曉康，他流亡到了國外。

《河殤》作者們的意圖是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改革，為此，他們幾乎不加掩飾地批評那些反對趙紫陽的經濟與政治改革(雖然政治改革十分有限)的保守的共產黨幹部。政治上保守的官僚通常在文化上也是保守的，因此，《河殤》把當代中國政治生活的專制特徵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專制內容聯繫在一起，使得多數共產黨領導人感到雙重憤怒——否定民族文化遺產是對愛國主義的背棄，在政治上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產物。

然而，《河殤》本身並沒有提出民主的要求。由於得到總書記趙紫陽的支持，編導者從一開始就出讓了自己的民主信譽。趙畢竟是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人，他一直支持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贊成新權威主義理論。此外，電視片本身對西方的讚賞，主要是它的繁榮富強，而不是其民主的德行。《河殤》中最著力表現的，是知識分子是中國社會的當然領袖這種自命不凡的信息，知識分子肩負著按照先進的西方國家的「藍色」文明模式、用資本主義改造中國的使命。這種信息迎合了造就出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各種傳統和現代的力量的需要，它更符合列寧主義和新權威主義，與人民民主毫無關係。把西方浪漫化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是1989年的民主運動最大的兩個缺陷。

民主運動(1989)

民主運動(1989)不過是由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在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失勢的知識分子，對1989年民主運動的產生在思想上提供了幫助。一些知名的知識分子，包括方勵之(在1986–1987年冬天的學生示威後，他被開除了黨籍，撤銷了科技大學副校長職務)在內，於

1988年夏、秋在北京大學和其他高校中由學生組織的非正式論壇上發表演講。這些論壇被稱為「民主沙龍」(模仿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激進的貴族聚會時的形式),其中最著名的沙龍是由北京大學學生王丹組織的,王丹後來成為民主運動的學生領袖。

1988年12月,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鄧時代曾參與經濟決策(胡耀邦下台後,他被撤銷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一職)的蘇紹智大膽地抨擊鄧小平政權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僵化的教條」,與中國和世界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經濟現實相脱節。為了推動思想和政策的發展,蘇紹智主張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理論進行自由討論,而這些理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中國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範圍。

1989年1月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釋放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以此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還可以再加上紀念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其「自由、平等、博愛、人權」200週年。[19] 方勵之的信對其他知名知識分子是一個極大的鼓勵,在其後的兩個月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大批致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呼籲信,要求對所有政治犯實行大赦。

不久,學生採取的政治行動使知識分子(或更準確地説,是知識分子中的一小批人)的政治熱情相形見絀。1989年初的幾個月,在北京的幾所大學裏,1988年時還是不定期地舉行的「民主沙龍」已經變成一些學生團體定期進行討論的活動。學生團體常常在類似於「孔子研究會」這一類無關痛癢的名稱下,舉行會議,討論民主理論和其他異端思想。此外,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校園裏,學生組織了準政治性的秘密團體,策劃舉行紀念五四運動及其神聖的「科學與民主」70週年的示威活動——以此來抵制由政府組織支持的官方紀念活動。

但是,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提前引發了大規模的政治行動。1989年4月15日,原總書記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胡雖然失去鄧小平信任,但他依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時,因突發心臟病而去世。政治嗅覺敏鋭的學生,馬上抓住了這個機會,除了真誠地悼念具有民主意識的胡之外,開始採取政治行動。學生們知道,在黨的高級領導人去世之際,當局會暫時地容忍不同政見,而胡的去世正是一次傳統的「以悼念死者來批判生者」的良機。因此,4月15日夜,中國人民大學黨

史系的學生(其中許多人出身於高幹家庭)，騎著自行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獻上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北京其他高校馬上紛紛行動起來，在首都街道上開始「長征」，他們唱著〈國際歌〉和其他革命歌曲，向天安門廣場和政府部門行進。

學生自發的遊行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與政府的對抗程度的也逐日加深。一些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開始靜坐示威，要求全國人大代表接受他們的請願書，請願書呼籲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一些基本的權利，譴責政府官僚的腐敗行為和裙帶關係。另一些學生及一些失業青年在黨中央領導人下榻和辦公的中南海新華門前，與警察發生衝突。隨著工人和其他城市市民加入到學生民主運動的遊行示威行列，天安門廣場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多。

面對日益擴大的群眾遊行活動，政府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大會舉行的當天，禁止群眾進入天安門廣場。但是政府低估了群眾的智商，當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離開人民大會堂時，約十萬名群眾在廣場上默默地表示對鄧政權的抗議。從人民大會堂到首都西郊的八寶山火葬場之間的長長街道上，逾百萬群眾佇立在街道兩旁。八寶山曾是安葬革命英雄和先烈的神聖殿堂，現在成為共產黨高級官僚的官方公墓。

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幾天，學生領袖宣佈成立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統一組織協調北京地區21所大專院校學生的行動；他們正式宣佈在校園裏「罷課」；一些學生積極分子通過街頭演講等方式直接動員北京市民支持民主、譴責政府官員的腐敗行為。鄧小平感到憤怒，但最激怒這位越來越不受歡迎的「最高領導人」的，也許莫過於對他的嘲笑，他被比作十九世紀末腐朽清政權中垂簾聽政的反動的慈禧太后。而鄧小平則把1989年參加運動的學生比作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造反派，兩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製造「動亂」。[20] 4月26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反映了這位最高領導人的怒氣，這一社論的作者顯然就是鄧小平本人。社論把學生示威說成是「在全國製造動亂」的「有計劃的陰謀」，是為了「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社論因此警告說，將嚴格禁止非法組織和未經批准的遊行，禁止學生與工人、農民和其他學校的學生串連。[21]

《人民日報》的社論激怒了學生，在此前的兩個星期的示威遊行中，學生一再表現自己對祖國、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忠誠，學生的良苦用心適得其反。社論發表後，學生並沒有像鄧預期的那樣被嚇住。相反，社論起到了在政治上動員和組織學生的效果，學生運動很快發展成一場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4月26日整個夜晚——從這時起，學生中開始充滿了自我犧牲的英雄主義感情，北京市二十多所高校的學生緊急地組織第二天抗議鄧小平政權的大遊行。4月27日清晨，各高校學生衝破封鎖校園的警察和民兵的阻攔，走出校門，匯聚在一起，共有約八萬名學生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學生到達廣場後，分散成小分隊行動，他們揮舞旗幟，高唱革命歌曲，從早到晚走進北京的大街小巷，贏取公眾的支持。一些市民也加入了學生遊行隊伍，許多市民自發地給學生送水送飯、捐錢捐物，表達他們與學生休戚與共的感情。

在如何處理學生運動問題上，政府及其領導人內部產生了分歧，從鄧小平4月26日提出的毫不妥協的立場上後退，同意與學生領袖對話。在以後的三個星期裏，民主運動越來越壯大，而共產黨卻陷入派別之爭，莫衷一是。4月30日，結束了對北朝鮮一週訪問的趙紫陽返回北京，使鄧小平政權內部的混亂局面更加複雜化。

1989年初，鄧小平對自己這位門徒是否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產生懷疑，兩人之間的關係開始惡化。與此同時，趙紫陽在社會上的威信每況愈下。席捲城市的通貨膨脹被歸咎於他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的結果。由於他的兩個兒子在進出口貿易中大發橫財，趙氏家庭成為共產黨官僚普遍腐敗行為的具體化身，引起了群眾強烈的憤恨。毫無疑問，趙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鄧小平要把他作為當時經濟困難的替罪羔羊——像兩年前清洗胡耀邦那樣把他趕下台。

既是出於政治上自我保護的考慮，也出於自己本來的思想傾向，趙與那些主張對示威學生採取妥協政策的黨內領導人站在了一邊。這樣，在這場內部政治鬥爭中，他站在了他長期的保護人鄧小平的對立面，從而使共產黨機構在半個月的時間裏基本陷入癱瘓，放任民主運動發展壯大。

1989年5月4日，趙紫陽把學生的要求說成是「合理的」，敦促學生採取民主的方式和合法的途徑。[22] 同一天，為紀念五四運動70週年，

北京三十所大專院校的6萬名學生和平地從校園遊行到天安門廣場集會。雖然遊行違反了市政府有關禁止未經批准的遊行的規定，但警察並沒有採取行動阻止手挽手、揮舞旗幟的遊行隊伍。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代表也加入了北京學生的行列，但更重要的是，非學生的團體——老知識分子、黨控制下的新聞媒體的記者、工人和其他市民也加入了學生示威的行列。這一天，總共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聽關於讚揚五四的民主和愛國精神的演說。一些演說者在呼籲民主的同時，又不得不痛苦地表示擁護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截至當時為止最大的一次遊行示威，示威者高度的自我約束力以及學生的組織能力令觀察家們驚嘆不已。

然而，雖然5月4日的大規模遊行集會對學生來說是一場明顯的勝利，但它看來並沒有產生什麼效果。在其後的一星期裏，隨著許多罷課學生返回課堂，遊行的人數和次數越來越少，形勢似乎逐步恢復正常。但是，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將決定民主運動的最後結局。

領導層的鬥爭是總書記趙紫陽站在他從前的提攜人、「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對立面。趙為了自己政治上的生存，贊成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儘管他小心翼翼地與學生本身保持一定的距離，以免進一步激怒鄧小平。但是，趙同意學生的要求，撤回已經聲名狼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而鄧小平正是這篇社論的作者。趙讚揚學生的愛國精神，支持他們提出的許多要求，包括保證新聞自由和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趙還要求政府與學生領袖在民主的基礎上進行對話。但是鄧小平拒絕作出這樣的妥協。他從學生運動的自發性中又聽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回聲，決意懲罰向共產黨權威和後毛時代神聖不可侵犯的「穩定」提出挑戰的新一代青年人。支持鄧小平的有「老人幫」(他們與鄧一樣，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和大多數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儘管如此，鄧還是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確保住自己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地位。

學生內部的分裂對鄧小平在5月中旬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戰勝趙紫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場主要是青年人參加的自發運動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混亂的派別衝突。學生內部在思想和組織方面有很多分

歧，有些甚至是非常瑣碎的，但其中一個根本性分歧卻事關民主運動的目標和策略問題。一方面，於4月中旬發動這場運動的年級稍大的研究生(及其支持者)，想通過支持趙紫陽及與趙相聯繫的知識分子，影響中國共產黨內部政治的走向。另一方面，是人數眾多、缺乏組織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十分激進的大學本科生，他們與研究生的觀點日益相左，他們不信任任何權威和現存的官方機構，他們要擺脫共產黨的組織控制，尋求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在他們看來，趙紫陽與鄧小平沒有什麼兩樣，對當時共產黨高層激烈的內部政治鬥爭視而不見。在5月4日大規模遊行及其後相對平靜的一段時間裏，更年輕、更激進的學生領袖，如王丹(北京大學歷史本科學生)和吾爾開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成為民主運動最引人注目的領導人。

新的學生領袖缺乏耐心，他們對政府的分裂及遲遲不答覆學生「對話」的要求感到憤怒，決定採取絕食行動以打破僵局，使運動不致無疾而終。5月13日下午，500名學生向天安門出發，在數千名支持者的圍觀下，開始在廣場中心舉行絕食，他們的營地恰恰就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前方。無獨有偶，這也正是中國政府計劃在兩天後舉行歡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來訪儀式的地方。

1989年，戈爾巴喬夫是世界政壇上炙手可熱的風雲人物。他在中國特別受到歡迎，他的寬鬆政策、開朗的性格和他使共產黨政權民主化的努力，與鄧小平刻板的個性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形成顯明對比。此外，戈爾巴喬夫是自從1959年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不歡而散的會談後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蘇聯國家元首，他的中國之行將標誌著中蘇兩國正式結束長期而痛苦的敵對狀態。這次訪問被認為是廿一世紀歷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此，全世界的電視記者都雲集北京，準備報道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的歷史性會見。也正是因為這一長期期待的重要外交事件，才使得有如此之多的電視境頭對準北京，向全世界現場直播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興亡過程。

在戈爾巴喬夫到達的這一天，絕食學生及其支持者無視公安局的威脅，拒絕趙紫陽的呼籲，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使一向以「穩定」和「秩序」為榮的鄧小平陷入尷尬境地。5月15日，政府不得不臨時在機場為戈爾巴喬夫匆匆地舉行了官方歡迎儀式，蘇聯領導人在北京的訪問

被限於室內的會談和宴會，避開公眾視線，直到5月18日飛抵上海。在這三天時間裏，群眾對民主運動的支持行動一浪高過一浪 —— 鄧小平動用軍隊鎮壓運動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動用軍隊實行戒嚴的決定，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趙紫陽反對的情況下勉強通過的。

絕食行動為學生贏得了北京市民的廣泛同情，再加上戈爾巴喬夫來訪引起的興奮情緒，從政治上動員了大批群眾參加運動。5月15日戈爾巴喬夫到華的這一天，約五十萬群眾在天安門遊行表示對學生的支持。5月17日，一百多萬群眾在天安門下面積超過一百多英畝的廣場上聚集（又從廣場出發遊行），這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0週年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群眾集會。[23] 5月中旬遊行示威最引人注目的不僅是參加的人數之多，而且在於參加遊行的人代表了社會各行各業 —— 他們毫不掩飾地舉著寫有自己工作機構或單位的旗幟參加遊行。在運動開始時就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和官方媒體的新聞記者，直接走上街頭參加遊行，成千上萬的工廠工人、黨政幹部、機關工作人員和教師也加入了遊行行列。在示威者中，還有政府的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編輯和記者、專門培訓黨的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的教員、穿警服的警察，甚至還有人民解放軍院校的學員。一位正在中國訪問的澳洲學者評論說：「他們不是匿名的示威者，而是井然有序地（儘管不是嚴密地組織進來）行進在大街上的各種社會團體。」[24]

社會各個階層如此之多的群眾參加、並實際上得到了相當多黨政幹部支持的的民主運動，對鄧小平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但示威者的自律和輕快的舉止，在表面沖淡了這種威脅的含義。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安營扎寨，表示對絕食學生的支持，他們在廣場創造了一種反傳統的狂歡節氣氛，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這場政治運動的嚴肅性。一些美國的觀察家把廣場這種情況稱為「中國的胡士托節（Woodstock Festival）」（1969年8月在紐約州東南部舉行的一次反傳統的搖擺舞音樂節 —— 譯註），在似乎是反文化的節日氣氛下，中國的年輕人模仿1960年代的西方激進青年的舉止。他們與幾位流行歌手和搖滾樂明星一起，在廣場跳舞唱民歌；他們自發地演講，舉行政治辯論，又模仿日本和韓國的激進學生，在頭上扎著各種顏色的布條，同時放肆地高喊嘲弄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鄧小平和李鵬的口號；他們

在廣場上組織起了行使臨時市政功能的各種基本服務項目，保障食品和飲用水的供應，處理垃圾，建立醫療站，指揮救護車把脱水的絕食學生送到城市各醫院。

隨著5月中旬民主運動的規模和聲勢越來越大，鄧小平加緊了鎮壓「動亂」的準備。從5月初開始，那些從國家和軍隊領導職位上已經退下來、但依然保持著其影響的老人就在鄧小平家裏開會，討論如何處理「造反」。5月中旬，黨政幹部和產業工人加入到遊行示威行列，使他們感到震驚，「老人幫」要求立即在北京實行戒嚴。5月18日，在戈爾巴喬夫離開北京去上海的當天，總書記趙紫陽被召到鄧小平家中，得知了這一決定。同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匆忙召開會議，通過了實行戒嚴的決定，已經與鄧小平關係破裂的趙紫陽投了唯一的反對票。據説，一些中央政治局成員對在首都部署軍隊持保留意見，但沒有人願意冒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5月19日晚，在經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象徵性地批准後，總理李鵬在電視講話中，宣佈了在北京主要地區實行戒嚴的決定。與此同時，趙紫陽採取了在中國共產黨政治中罕有的舉動。在5月18日深夜的會議上反對中央政治局關於戒嚴決定未果後，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一人孤獨地前往天安門廣場。在過去一星期裏，趙曾稱讚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對他們的許多要求表示支持，懇求他們撤離廣場，但是他一直迴避與學生代表直接對話。現在，在5月19日黎明，在他的黨內生涯即將結束之際，他在絕食者中間漫無目標地走著，他眼含淚水承認説，「我來得太晚了。」他還説：「我們也是從年輕時過來的，那時也是精力充沛，上街遊行……不計後果。」[25]

趙的痛悔行動，也許是他多年政治生涯中最富有人性味的片斷，卻成為6月下旬中央全會上正式解除他總書記一職時的罪狀之一。在鄧小平時代的其餘歲月裏，趙一直被軟禁在北京市中心的一個別墅裏，過著舒適而沉寂的生活。

* * *

在北京，群眾對宣佈戒嚴的直接反映是抵制。5月19日，在李鵬宣佈戒嚴前不久，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宣佈暫停絕食，又於5月20日繼續

絕食。5月21日，一百多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抗議戒嚴，5月23日，又爆發了另一次百萬人的遊行抗議。在一些工廠地區，市民們堆起路障，阻止包圍北京的解放軍部隊進城。工廠因罷工而停產，公共交通陷於癱瘓。從東北城市到廣東和香港，民主運動自發地席捲全國。一向馴服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起了支持學生要求的聲明，呼籲撤銷戒嚴令。一批退休的軍隊高級將領公開致信鄧小平，要求恢復軍隊的革命傳統，提醒這位最高領導人「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不能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實際上，第一批進入北京的年輕士兵就與他們要鎮壓的北京民眾建立了友好的關係，一些軍人還應學生之邀共同高唱革命歌曲。

年輕士兵的部隊很快就被撤走，取而代之的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部隊。到5月下旬，北京周圍的軍隊人數已達到二十多萬，他們對鄧小平的命令無條件地服從。在重壓之下，民主運動開始解體。絕食行動第二次停止。佔據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人數急劇減少，多數學生返回了校園，一些學生加入了遲來的「走向人民」的活動。到5月底，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數不超過五千人，大多數學生來自北京以外的大學。

隨著學生積極分子的退卻，民主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位於廣場東側數英里和北京郊區的工人階級居住區。經歷了十年市場改革後，雖然工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但工人的怨言有增無減。自1987年後，通貨膨脹困擾著全國，尤其給城市居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改革初期得到的實惠逐漸為物價上漲所抵消。鄧小平和趙紫陽麾下的新自由經濟學家，鼓吹的「自由勞動力市場」、特別是盡快打破「鐵飯碗」的改革主張，令國有企業工人害怕失去職業保障和福利待遇。目睹黨的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從鄧小平、趙紫陽到下屬的各級黨政官員的驕奢淫逸，工人對自身職業不穩定的擔心常常轉化成對政府腐敗的憤怒。工人們對由毛時代繼承下來的工作單位對自己日常生活的官僚控制，一直採取著抵制態度。

對舊政治制度的壓制和市場改革造成的不公正社會結果的不滿，使城市工人階級成為民主運動的堅定的支持者，5月17日，大批工人引人注目地直接參加了遊行示威活動，清楚地表明了工人的態度。這一

事件使共產黨領導人的「波蘭恐懼症」復發。這正是他們十年來所害怕的，工人與知識分子結成波蘭團結工會式的聯盟，反對共產黨的統治。這種恐懼，又反過加強了官方實行戒嚴的決心。其實，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大可不必擔心工人與知識分子結成聯盟。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排除了這種發展的可能性。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抱怨工人賺錢比知識分子多以外，很少關心工人階級的其他狀況。[26] 這種階級偏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學生，許多學生反對工人參加民主運動，理由是工人不守紀律，有暴力傾向。他們提出，工人參加運動，就會給政府製造動用暴力鎮壓運動的借口。因此，在運動最初的幾個星期裏，學生遊行時常常是手挽手前進，就是為了防止工人和其他市民加入到遊行行列中。學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他們獨特的非暴力遊行的「純潔性」。然而，到了5月中旬，由於這場聲勢浩大的運動已明顯地接近與共產黨政權對抗的緊要關頭，學生開始歡迎工人的支持——和保護。

無論如何，鄧小平決意「教訓」這些他認為在改革中受益卻又不識好歹的群眾，而且是要動用軍隊進行教訓。由於黨和軍隊領導人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第38軍的士兵(最先進入北京的部隊)亦不願意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以及把部隊從基地調動到北京附近地區涉及到的後勤保障等事項，使鄧小平政權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戒嚴的部署工作。6月初，鄧已調動了大批軍隊，20萬軍隊兵臨北京城下，隨時準備出擊。中國首都好像受到了一支外國軍隊的圍困。

工人和城市市民以一種英雄主義的氣慨奮起保衛城市——保護還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他們在人民解放軍的坦克和裝甲車進入市中心的必經之路沿線堆起了各種路障，在天安門廣場周圍的交通要道，他們用推倒了的公共汽車和大卡車封鎖了街道。為了動員群眾保衛北京，工人和學生張貼大字報，在街頭散發傳單，向參加前所未有的自由政治辯論的群眾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講。市民與學生組織起了自行車隊和摩托車隊(後者主要由同情學生的小企業主組成)，在城市各處通報軍隊的動向，提醒市民可能發生的危險。警察和其他市政當局無影無蹤，工人和學生負責維護公共秩序，指揮交通。對許多北京市民來說，他們短暫地體驗到了團結與獨立的全新意義。

*　*　*

6月3日晚上，軍隊開始進入北京城區。裝備著坦克和裝甲車的4萬名先頭部隊，在天安門廣場的東西兩側街道，清除路障，向市中心進軍。在廣場東側，軍隊在稠密的居民區受到大批群眾的阻擋，行動暫時受阻。在廣場西側人口分佈較少的地區——主要是政府機關的建築群，工人、學生和其他各界市民聚集在街道和路口，阻擋軍隊的前進。解放軍使用坦克、機關槍和AK47自動步槍對付用磚瓦、棍棒和汽油瓶武裝(如果這可以稱得上武裝)起來的群眾，開始了以無情殺戮為標誌的恐怖之夜。在廣場東側稠密的居民區，類似的命運也降臨到城市保衛者身上。午夜後不久，解放軍進入了天安門廣場，在他們身後留下的是死亡和毀滅。大多數傷亡事件發生在居民區(遠離對準天安門廣場的電視鏡頭)和天安門兩側的東西長安街，軍隊在向天安門廣場推進途中，用血腥的手段粉碎人體路障，射殺反抗者。學生雖有不少傷亡，但絕大多數死傷者是那些在街道上設置路障、試圖阻止軍隊前進的工人和其他居民。

天安門廣場上基本沒有發生人員傷亡。廣場上所以避免能發生流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幾位不像英雄的人物——搖滾樂明星侯德健[27]和文學評論家劉曉波，他們是6月2日開始絕食以示對學生的支持。在軍隊進入廣場後，他們出面與軍隊指揮官談判，商定了5,000名滯留在廣場上的學生撤離的安全通道。6月5日清晨，在戴著頭盔的士兵們威脅的目光注視下，最後一批學生排隊離開了一片狼藉的廣場。他們似乎置身於一座為外國軍隊佔領的城市。他們經過的街道上，到處是磚瓦碎石，還有冒著濃煙的軍車，建築物外表上佈滿前一晚上槍擊留下的彈痕。全副武裝的士兵在街上巡邏，武裝直升飛機在低空盤旋，機上的探照燈不祥地掃向下面的街道。這天清晨從廣場的最後撤離，實際上標誌著民主運動的終結。在以後幾天裏，在北京一些地方還繼續有零星的抵抗軍隊佔領的行動，在全國其他十幾所城市裏也出現了抗議北京鎮壓活動的遊行示威(很快就遭到鎮壓)。

6月9日，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他向鎮壓了他所謂的「反革命暴亂」的軍隊和警察力量表示祝賀，向數十位在鎮壓過程中遇難軍人的家

屬表示哀悼。然而，鄧對平民受害者沒有隻字的同情，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社會渣滓」。根據政府後來的聲明，死亡的平民人數不超過300人。一些目擊者抨擊說，官方的數字是荒謬的，據他們中的人說，僅他們看到的在市中心幾所醫院中的屍體，就超過了政府所說全部死者的總數。[28] 儘管確切的死亡數字難以知曉，但據當時在北京的獨立觀察家的估計，平民死亡人數在2000至7000人之間，而傷者的數量要數倍於此。然而，與槍殺本身同樣令人寒心的，是作出大規模動用武裝力量進行鎮壓決策時的冷酷無情 —— 鄧小平和一批老人作出這一決策，他們決意懲罰年輕的示威者，恐嚇那些不識好歹的普通群眾，完全無視和平解決危機的種種機會。

在軍事鎮壓之後，出現了全國範圍的逮捕浪潮。據估計，僅在6、7兩個月，秘密警察就逮捕了約四萬人，其中數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數百人被處死刑。大多數被判刑的和所有被處死的都是工人和其他普通市民。除了學生領導人外，學生 —— 其中一些人的親戚身居高位 —— 受到了比較寬大的處理，政府對運動中的21名學生領導人發佈了通緝令，大多數年青的不同政見者或流亡國外，或被捕入獄。

* * *

在北京慘案後的歲月裏，一直到1990年代，中國的政治和思想領域比1980年代多數年份更為壓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迫害越來越甚，秘密警察的活動幾乎無處不在，任意捕人的現象更為普遍，黨的報紙、刊物、書籍和電視的檢查控制更加嚴厲。然而，儘管政治上越來越壓制 —— 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正是因為這一原因 —— 社會和經濟生活卻不可思議地恢復了「正常」。中國的市場改革繼續朝著資本主義方向發展，就好像1989年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實際上，在1990年代這一步伐更快了。令人不可思議和沮喪的是，造就了民主運動的強烈的政治和道義感情，如此之快地就煙消雲散 —— 完全為政府提倡的消費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淹沒。

註釋

1. 「李一哲」三個字分別代表1970年代廣東的三位民運人士姓名中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個字 —— 李正田、陳一陽和王希哲。他們以其著名文章〈論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而聞名全國，該文以大字報的形式於1974年貼在廣州街道的牆上，長度有一百碼。
2. 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是海南省的汽車走私案。1983年，按照趙紫陽總理的計劃，海南省要成為市場經濟的窗口，其發展目標是與台灣競爭。海南省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經濟自主權。海南省的官員不失時機地利用該島的特權地位，進口了10萬輛汽車、卡車和數百萬件電視機和錄像機，然後以高出三、四倍的價格在島上售出。這一活動一直持續了整整15個月，從1984年1月到1985年3月。有關這一事件的情況，參見佩珀，〈中國的經濟特區：拯救蹣跚的改革的一劑藥方〉；劉成厚 (Lau Shinghou)、羅迅之 (Louise de Rosario)，〈欺詐剖析〉("Anatomy of a Scam")，《中國貿易報告》(*China Trade Report*)，1985年10月，頁8–10。
3. 例如，劉賓雁在《中國的危機與希望》(*China's Crisis, China's H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一書中頁103提出的。
4. 鄧小平的威望雖然在中國下降，但他在西方仍然因為他的市場改革而受到好評。例如，1985年底，他被《時代》雜誌第二次評為當年的世界風雲人物，《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雜誌將其作為當年世界風雲人物。西方對鄧的好評直到1989年6月4日前才沉寂，但在1990年代初期又審慎地重新開始。
5. 有關「十二・九運動」的情況，參見易社強 (John Israel) 和克萊因 (Donald W. Klein) 在《反抗與官僚：中國的12月黨人》(*Rebels and Bureaucrat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一書中的出色研究。
6. 1987年劉賓雁再次被開除出黨，給他精神上造成的痛苦，遠遠不如30年前他第一次被開除時的感覺，這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道德水準的下降。參見劉賓雁，《中國的危機與希望》，頁xv–xvi。
7. 趙和鄧都經常談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大約在2050年實現。
8. 《鄧小平文選》，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73。
9. 鄧小平在1980年11月會見羅馬尼亞一個代表團時的談話。《紐約時報》，1980年12月30日，第1版。
10. 1987年趙成為「代理」總書記。中共十三大正式任命他擔任總書記，去掉

了「代理」兩字。與此同時，趙辭去了國務院總理一職，他同時擔任這兩個職務的時間為十個月。李鵬繼任他任總理。

11. 歌頌鄧小平是中共十三大的主題之一。這一基調是趙紫陽在十三大前5月13日的一次講話中定的。參見1987年7月10日《人民日報》。
12.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年10月2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13. 由於鄧小平不再是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成員，黨章不得不作出相應修改，使鄧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合法化。
14. 有關爭論情況的有說服力的敘述，參見戈德曼(Merle Goldman)：《中國的民主種子：鄧小平時代的政治改革》(*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頁275–282。
15. 蘇紹智、王魯湘：《黃河的喪歌：中國電視劇「河殤」的讀者指南》(*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n Program, 1991)，頁183。
16. 耿德華(Edward Gunn)，〈《河殤》的語言：從文化批判到社會行動〉("The Rhetoric of *Heshang*")，《亞洲研究學術公報》第23卷第3期(1991年)，頁19。
17. 蘇紹智、王魯湘，《黃河的喪歌》，頁218。
18. 劉賓雁，《中國的危機與希望》，頁xxii。
19. 方勵之，〈致鄧小平的公開信〉(1989年1月6日)，見方勵之，《推倒長城》，頁242–243。
20. 鄧小平4月25日講話的英譯本，參見*FBIS*，1989年5月31日，頁35–36。
21. 《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的英譯本，參見《中國季刊》(1989年9月)第119期，附錄A，頁717–719。
22. 會見當時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首腦會議時的講話。參見韓敏洙編撰(Han Minzhu)：《民主的呼喊：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的文章與講話》(*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頁132–134。
23. 有關5月17日的遊行示威情況，參見李斐工(Lee Feigon)在《中國的崛起》(*China Rising*, Chicago: Ivan Dee, 1990)頁205中作了生動的描述。在有關

民主運動的產生和原因的大量著作中，李的著作無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部。本書中關於民主運動的看法，即以李的書為依據。

24. 白傑明 (Geremie Barme)，〈北京的白天，北京的夜晚〉("Beijing Days, Beijing Nights")，安戈主編，《中國的新民主運動》(*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1)，頁49。
25. 轉引自李斐工，《中國的崛起》，頁209–210。
26. 正如陳佩華在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後不久指出的：「如果仔細閱讀過去幾年所有不同派別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著述，不難發現，幾乎沒有人談到中國工人的困難境地。」陳佩華，〈中國漫長的冬天〉，《每月評論》(1990年1月)，第41卷，第8期，頁5。
27. 侯德健是台灣人，1983年移居大陸，他是一位著名歌手和搖滾樂作曲家。
28. 舉例説，目擊了鎮壓過程的韓丁寫道：「人們(被解放軍士兵開槍打傷的人)不敢留在醫院。他們怕軍隊到醫院抓人，所以，他們在醫院草草包扎後馬上回家。許多人因此而死於家中。到第一週的星期三(6月7日)，在北京協和醫院裏，有近百具屍體無人認領，復興醫院有67具屍體無人認領，周圍其他醫院的情況也是這樣。所以，單在醫院停屍房中無人認領的屍體的數量，就已經超過了官方公佈的所有死者的總和。許多人在街上被打死，不少人受傷後去了醫院，然後死在家中」。韓丁，《巨大的反覆》(*The Great Revers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頁183。

第二十五章

鄧小平時代的結束：1990年代的中國

在1989年6月3–4日北京大屠殺後的一段時間裏，人們普遍預言，經濟停滯將是中國為其領導人的野蠻政治行動所付出的代價。當時，許多西方評論家正在歡呼西方資本主義和政治自由主義對歐洲共產主義的勝利，一些觀察家宣稱，「自由市場」的勝利，是人類進步的頂點，預示著「歷史的終結」。[1] 這種烏托邦式的預言，強化了一個長期為人們信奉的理念，即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從這一理念出發，自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下令對民主運動進行軍事鎮壓的中國共產黨「強硬派」，必然會終止曾在過去十年促進了經濟進步的市場改革。鄧小平轉瞬就成了1989年強硬派的代表人物(確實，他當時被稱為「北京的劊子手」)，但這與他同時又是中國資本主義最熱心的推動者產生了明顯的矛盾，從權宜出發，人們對這種矛盾視而不見。

就鄧小平而言，他不認為在資本主義經濟手段和其斯大林式政治體系之間有什麼矛盾。他在6月9日祝賀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或他說的「反革命暴亂」時的講話中，強調市場改革和向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開放」的政策不能改變；實際上，他主張改革開放的步伐還要「加快」。[2] 這不僅能增強國家的實力和共產黨的力量，而且會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淡化人們對「北京之春」的記憶，這就是鄧的邏輯。加快資本主義發展，符合民族、黨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鄧在1989年6月28日對黨的高級幹部發表的秘密講話中提出，把追究1989年春季這場災難的政治責任的難題放在以後再說，以便於黨的領導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發展經濟上。[3]

但是，天安門事件後，中國進入了一個政治上更加專制的時期。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數千名黨員幹部因為支持民主運動、或被懷疑同情民主運動的目標而被開除黨籍或撤職。知識分子也遭到清洗，他們在1980年代獲得的來之不易的有限的言論自由，也立即受到剝奪。曾經獲得一定程度(雖不穩定)自主權的報紙和刊物，又重新退回到黨和國家官方喉舌的地位。對宗教和政治異端的迫害愈演愈烈，不同政見者陷入牢獄之災，他們受到的非人待遇常招致國際輿論的抗議。

然而，也正是在政治上更加專制的1990年代初期，中國創造了令人不可思議的經濟成就，各種數字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大經濟體(按國民經濟總產值計算)，[4] 一個新的超極大國正在形成之中。

誠然，中國在1989年正處於典型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蕭條」階段，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問題，為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所困擾。大城市中高達年30% 的通貨膨脹率，是由於趙紫陽總理在1987–1988年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政策造成的，而經濟衰退則是趙在1988年下半年為遏制通貨膨脹而被迫採取的緊縮政策的結果。兩者的結合導致城市經濟的困難，這又反過來驅使城市群眾支持1989年的學生運動。1989年最後的六個月和1990年初，生產下降，失業率增加。不過，到1990年夏季，通貨膨脹的壓力減小，政府的緊縮政策開始放寬，經濟增長回升。1991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增長了7.5%。在鄧小平1992年1月的南巡後，中國經濟在1990年代中期獲得了持續的高速度增長。

「南巡」

1992年初，鄧小平在中國政治領導層內沒有任何正式職務。1989年夏季，在解放軍鎮壓了民主運動後不久，他辭去了最後一個官方職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然而，鄧小平雖然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但依然保持著政治上的最高地位，他非正式地與他這一代已退下來的黨的老領導人舉行會議，決定國家最重要的事務，然後令其安排在黨和國家官僚機構的領導人執行。鄧小平選擇的接班人是

原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他於1989年6月接替被罷黜的趙紫陽出任總書記，他不折不扣地執行鄧的決策。

但是，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期所以能夠保持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主要是由於他本人的聲望和個性——籠罩在他和他的事業周圍的一層神秘光環。他的支持者為他營造了一種個人崇拜的環境，特別是在1989年後，他像當年的毛澤東一樣，開始凌駕於黨組織之上，繞過黨的正式程序，自上而下地按照自己的好惡干預決策。最典型的毛式干預是他著名的「南巡」。鄧的南巡改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和性質。

1992年1月18日，87歲的鄧小平開始了他五個星期的中國南方之行，他視察了廣東的一些城市、武昌、上海以及位於深圳和珠海的經濟特區。他在這次大張旗鼓視察活動的每一站，都告誡地方官員要加快經濟發展速度，「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讚揚深圳經濟特區的資本主義和廣東省實行的自由市場經濟政策為全國樹立了榜樣。他警告說：「低速度就等於停步，甚至等於後退。」這只是他在巡視過程所作的評論（一些評論十分費解）之一。鄧的評論幾乎立即變成了官方的政策和實踐。就這句評論而言，意味著政府放棄天安門事件後，為了防止通貨膨脹和社會不穩定而實行的把經濟增長速度限制在6% 以內的政策。

這位「最高領導人」在南方講話中，還鼓勵加快進行全面市場經濟改革的進程。針對有人對進一步市場化會在中國導致資本主義的擔心，鄧小平的回答是，只要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無論採用什麼方式，只要經濟能發展，就對社會主義有利。他安撫批評者說：「政權在我們的手裏。」

但是，鄧小平的目的不僅是要打消懷疑者的顧慮，而且是要消除懷疑論者的領導人物的權力和影響。為此，在「南巡」過程中，他宣佈黨面臨的主要危險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右」的東西——即導致1989年「反革命暴亂」的東西，而是「左」的東西。他說的「左」的東西，主要是指對他主張的資本主義改造和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缺乏積極性。這樣，鄧小平為黨內鄧派與「保守派」最後一場思想鬥爭奠定了基調，所謂保守派，主要指強調中央經濟計劃和國有企業應發揮重要作用的

人，其主要代表是陳雲，長期以來，他和鄧棋逢對手，是鄧最堅韌的對手。1992年春季後，陳雲的思想不再為人所提，標誌著「鄧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完全佔了上風。

1992年5月，鄧在「南巡」時的評論和談話被彙集起來，以「中共中央4號文件」的名義向全黨下發，成為全黨工作的具體指導方針。隨後，以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主要特點、使經濟更加資本主義化的運動在全國展開。國有企業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權，根據國內和國際資本主義市場需求進行生產經營，包括有權直接從事對外貿易。此外，開始了複雜而漫長的半私有化進程，一些國有企業作為試點，被允許通過發行能為個人和集體投資者購買的上市股票，逐步改變其所有制。這類股票在新成立的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進行交易，這兩個地方都是鄧「南巡」視察過的，一些股票後來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成為搶手的「紅籌股」。此外，為吸引想來華擴大業務的外國銀行和外國投資者，新制訂了更優惠的政策，又「開放」了一批城市。為了讓上海成為遠東最大的貿易和金融中心，國家投入大量財力和物力，並給上海以特殊政策。據有關人士預計，上海將最終取代香港的地位。

以上這些措施再加上擴張的財政政策、鄧的「南巡」在政治上開的綠燈、地方官員和黨的官僚放手增加投資並進行金融投機（同時抓住時機給自己斂財），使中國經濟在中國歷史上、也許在世界史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在經濟規模已經很大的基礎上，1992年，中國的國民經濟總產值增加了12%，實際上放棄了天安門事件後，政府關於中國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只能承受不超過6%的經濟增長速度的決策。1993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增長速度達到驚人的14%，1994年又達到12%，儘管政府為控制通貨膨脹採取了緊縮政策（十分有效），但在1990年代中期，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原來被認為是烏托邦式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時間裏使中國經濟翻兩番的目標（鄧小平時代開始時制定的），到1990年代中期已提前超額完成。從1991年到1997年，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11%，是當時世界上所有大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的。

1992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對鄧小平的政策 —— 以及鄧小平本人 —— 給予了高度評價。大

會同意完全採用資本主義的方式和觀念加快經濟發展，雖然大會把這種社會結果正式命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為了讓這個杜撰的自相矛盾的名稱能夠自圓其說，大會將其拔高到是鄧小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不協調，但這依然是官方國家意識形態的名稱) 做出的又一個「重大的理論突破」。中共十四大不僅標誌著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政策和理論的絕對勝利，而且也是他本人在中國共產黨內政治上的絕對勝利，雖然他本人已經沒有任何官方職務。鄧小平在政治上勝利的標誌是十四大取消了以陳雲為主任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中顧委是1982年成立的 (最初由鄧小平領導)，它的主要作用是為退下來的黨的領導人提供一個干涉黨和國家事務的講壇 —— 此外，也是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依然能夠享有他們長期已經習慣的物質奢侈生活和特權。鄧在政治上的另一個徹底勝利是中央領導機構人員的大調整，調整後的中央領導機構成員全部是鄧小平一派的人。雖然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中有一半委員是新當選的，但他們都是鄧最堅定的支持者。這不僅保證了黨能夠繼續忠誠於這位最高領導人及其政策，而且也使中央委員會的平均年齡下降到相對年輕的56歲，其中80% 的人畢業於理工科大學。這樣，十四大就向著實現鄧小平的「政治改革」目標前進了一步，鄧的政治改革並不是指人民民主，而是使官僚統治向技術官僚方向發展，正如他在改革初期說過的，目的是使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5]

但是，西方多數人最關注的是鄧小平的經濟發展計劃，而不是他的政治方針。在整個1980年代，西方媒體讚揚鄧放棄了毛主義，是一個偉大的現代化者。不過，當他在1989年下令人民解放軍鎮壓民主運動後，他又被西方輿論普遍譴責為野蠻的共產黨獨裁者。但是，當他在1992年的「南巡」及其後積極地提倡資本主義時，西方媒體又給他平反，他再次被西方譽為是一位開明的市場改革家。

1992年加快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改革後，很快就出現了人們熟悉的發生在1980年代的「繁榮—蕭條」的周期性結果。第一個結果是通貨膨脹。1993年，在一些大城市，年度通貨膨脹率達到25%，1994年，根據官方很可能是保守的數字，全國的通貨膨脹率為24%，但在大城

市，這個數字還要更高。通貨膨脹，新一輪的政府腐敗和官僚經商浪潮，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主在房地產、股票市場的投機，中央政府失去對一些經濟發達地區 —— 特別是廣東省 —— 的經濟控制，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的惡果，都轉嫁給了勞動群眾。

為了解決這種混亂局勢，鄧小平起用了他的另一位支持者、副總理朱鎔基。1989年6月時，朱是上海市市長，他妥善地保持了上海這座中國最大城市的穩定，既沒有激怒當地的群眾，也尊重了北京的權威。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鄧小平對他的經濟工作才能一直十分讚賞。朱鎔基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授權恢復經濟秩序，遏制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地方主義傾向。朱鎔基實行了強硬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即限制信貸，壓縮政府開支和投資)，以抑制通貨膨脹但又不致使經濟陷於嚴重的衰退。除了重建中央對地方財政的控制外，朱的目標，是把經濟增長率從超過12%壓低到年均8%，他認為這是社會和自然環境所能允許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速度。

然而，鄧小平卻不同意。1993年，鄧下了一個簡短有力的指示：「低速度不是社會主義。」結果，朱鎔基的嚴厲計劃作了調整，使得1994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2%。但是，朱鎔基緊縮財政政策已經見效，1994年25%的通貨膨脹率，令人吃驚地大幅度下降到1996年的6% —— 而國民經濟總產值依然保持了10%左右的增長速度。朱鎔基的政策取得了世界上所有資本主義中央銀行都夢寐以求的結果 ——「軟著陸」，即低通貨膨脹率與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完美結合。國際金融界和西方記者對朱鎔基給予高度評價。[6] 在國內，朱鎔基成為1998年李鵬任期結束後國務院總理的首位人選。

鄧小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1994年的春節團拜會上，中央電視台在全國播出了五分鐘這位最高領導人在上海與有關黨政領導人互致問候的境頭。根據官方的報道，正是在這次團拜會上，鄧最後一次號召加快經濟發展速度。不過，在電視播出的片斷中，沒有聽到鄧說話，實際上，他明顯的虛弱和茫然的表情，已經預示著他將不久於人世。此後三年，帕金斯症 (Parkinson's disease) 和其他老年疾病使他在體力和精神上，都已無法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繼續發揮作用。1997年

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終年92歲。他為中國開闢了一條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中國也沒有因為這位最高領導人的去世而放慢經濟發展步伐。

鄧小平是中國最後一位老革命家，是出生於五四運動革命知識分子中傑出的共產黨領導集團裏的最後一位重要成員，鄧之後的領導人基本上都是在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而鄧小平早在1920年代初期，當他還是一名青年學生時，就在法國加入了少共中國支部，在政治上開始成熟。在1925–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他返回中國參加革命。在城市革命鬥爭失敗後，他轉到了農村，在國內革命戰爭中，他很快就成為毛的農民軍隊中的主要領導人之一。1949年後，至少是在文化大革命他暫時被打倒之前，他是毛領導集團中的六位主要成員之一。

雖然鄧小平有著漫長的革命生涯，但他留給人們記憶的卻是他作為中國資本主義之父的形象。資本主義當然不是鄧小平的目標，他寧願相信，他創建的經濟體系只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在廿一世紀中葉將會興旺發達。然而，他發現資本主義經濟方式是實現現代化最有效的途徑——與其他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樣，鄧小平世界觀的核心，是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藍圖。

*　*　*

在某種宿命的意義上說，鄧小平辭世的方式，也為他一生中最珍視的「穩定和團結」作出了貢獻。他在病榻中度過生命的最後三年，恰恰給了他親手挑選的接班人江澤民鞏固自己及鄧後統治集團的權力的時間。在這期間，江清除了黨內可能的反對力量，把留在大陸的不同政見者關進監獄。與此同時，總書記江澤民又增加了幾個新的頭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使他同時成為國家元首、人民解放軍統帥和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江澤民繼續執行鄧小平制定的基本方針政策：快速發展經濟、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保持列寧主義政黨的專政。即使是在實行

緊縮政策的時間裏(1994–1996),國民經濟總產值的年均增長率也接近10%。同時繼續增加吸引外國投資,主要的跨國公司(其中以美國和日本的跨國公司為主)在中國的投資,有超過海外華人通過香港和台灣在大陸的投資規模的趨勢。[7]

江澤民最大膽的經濟舉措——也完全是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計劃發展的邏輯結果,是對國有企業實行部分私有化。1997年,國有企業以及與之相關的企業佔中國工業經濟的40%以上,在國企中就業的工人達1.2億人。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特別是重工業(如鋼鐵、石油化工、礦產和機器製造業等)的骨幹企業,對新技術的採用和發展至關重要。[8] 但是,根據改革家們的企業盈利標準——這已經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國有企業處於虧損狀態。按照共產黨領導人現在信奉的市場觀念來衡量,這不但消耗了國家財政,而且在理論上也是不能接受的。1980年代中期,隨著對國有企業的「鐵飯碗」、終身職業保障及福利待遇的批判,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就是說,運用資本主義方式進行改革),這項改革已進行了十多年。但是,除了一些小型的、基本上陷於破產境地的企業從政府手中剝離出去外,大型國有企業基本上還是維持原樣。黨的領導人對處理國有企業的問題畏首畏尾,一方面是考慮到放棄國有企業的所有權會被認為是放棄了社會主義,但是,更重要的是擔心城市工人階級會因此而鬧事,因為他們是這種「改革」的主要受害者。國有企業所以「虧損」,與其說是管理不善,不如說是因為企業對職工過於大方,國企職工的工資和福利待遇遠遠高出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工人。畢竟,非國有企業所以能夠盈利,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廉價的、隨時可以解僱的「自由勞動力」。

但是,儘管有政治風險,日益壯大的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要求,使江澤民成為私有化的提倡者,當然,官方是不會使用這樣的術語的。1997年春季,江總書記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激烈地抨擊了「左派」的「僵化」思想後,提出了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的方案。除了與國防、高科技相關的企業和糧食貿易企業仍實行國有制外,大多數企業都將私有化或至少部分地非國有化。在「抓大放小」的口號下,除了特大型和關係國計民生的骨幹企業外,其餘大多數企業

都以前所未有的步伐開始了各種非國有制形式的改制。即使是最大型的國有企業也要轉變所有制形式，包括由外國和國內的投資者——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諸如養老基金會和地方政府等)——購買股權。此外，「國有制」這一概念也重新作了定義，只要政府持有的股份達到30%，就可以說還是「公有制」。

同年夏季，江的講話發給黨內各級幹部徵求意見，隨後又於7月在《光明日報》上公開發表。[9] 在1997年9月於北京召開的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批准了江的私有化建議。

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

鄧小平時代結束後的首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主要議程，是使鄧小平親手挑選的接班人江澤民的領導地位合法化，在毫無爭議的情況下，出席大會的2000名代表一致投票表示贊成。江澤民在黨內的唯一對手、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喬石，不但退出了中央政治局，而且在中央委員會的193名委員中也未有一席之地。一種解釋認為，喬石，這位前秘密警察機構的負責人，提倡民主與法制，因此，他的失勢是民主化進程的倒退。[10] 離開最高領導層的還有劉華清將軍，這樣，新產生的由七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沒有一位人民解放軍的代表。在中共十五大以後，中國最有權勢的三名政治家，按其在等級中的排序慣例，依次是總書記江澤民，總理李鵬(他不久後接任喬石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金融專家朱鎔基(將繼李鵬後任總理)。十五大後，江澤民集黨的最高領導、國家元首和軍隊統帥三個最高職務為一身，他的權力和聲望大幅度上升。但是，儘管江澤民的官銜要比他的前任毛澤東和鄧小平更多，他的個人權力卻遠不如其前任，因此，他的領導方式更多地是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專斷。不過江在十五大後在政治上居於支配地位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在取得國內政治勝利後，他旋即對美國進行了為期八天的訪問，與克林頓總統舉行了最高級會議——他刻意地、有時十分尷尬地模仿鄧小平1979年對美國凱旋式的訪問。克林頓於1998年夏季對中國進行了回訪，他的訪問頗有帝王氣勢，僅隨行人員就超過一千人。克林頓的訪問出人意

料地大大加強了中美關係 —— 雖然美國國內一些人指責美國總統「出賣」了美國利益，給他的訪問蒙上了一層陰影。[11]

中共十五大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批准國有企業私有化的方案，江澤民在1997年5月的講話中提出這一方案後，曾於夏季廣泛徵求了黨內的意見。依照慣例，大會並未就這一問題再展開討論，而是一致投票通過。儘管如此，對於一直信奉生產資料的國有制是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斯大林教條的許多黨的領導人來說，這一方案令人尷尬，他們無法接受黨不再為社會主義而奮鬥這個事實。因此，整個私有化問題被披上了種種冠冕堂皇的理論外衣，在定義模糊的所謂「合股方案」以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空洞含混的理論下，官方不遺餘力地強調要繼續堅持「公有制」。

不過，無論最終新出現的是什麼形式的所有制，有一點是明確的，即國有財產的私有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能需要十幾年或更長的時間。壓縮國有經濟勢必造成大量工人失業。官方承認，在一億多國有企業職工中，至少有三分之一工人是多餘的，這樣就會造成社會和政治不穩定，這正是共產黨擔心的。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俄羅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的災難記憶猶新。而且，中國實行私有化方案的時機也不吉利，中共十五大召開的時間正是整個東南亞和世界金融、經濟危機加劇的時刻，金融危機很快又波及到香港。雖然東南亞金融危機暫時還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其對中國造成的心理壓力卻是直接和深遠的，人們對把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混亂的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開放股票市場方面依賴外國資本投資以給新近私有化的國有企業融資是否明智產生了懷疑。

中共十五大也不是沒有協調的地方。江澤民作的政治報告，最突出的內容是把大多數國有企業出售給私人投資商 —— 無論用什麼標準衡量，這都是向全面實現資本主義經濟邁出的一大步。在江澤民作這一報告的主席台背景上，高懸著鑲有黃色的斧頭和鐮刀的巨大的黨旗。即使出席黨代會的2000名代表中有人注意到這種不協調之處，恐怕也沒有人願意作出評論。也沒有人談到1989年的北京屠殺事件，人們呼籲官方重新評價這一事件，但它依然是政治討論的禁區。[12]

*　*　*

江澤民出售國有企業的方案，預示著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擴張，這是對北京政權自稱的社會主義又一個沉重打擊。從一開始就是脆弱的、也許是虛假的中國社會主義，[13] 主要的標誌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佔統治地位。國有財產的私有化，進一步削弱了原本就所剩無幾的中國社會主義——即常規理解的那種社會主義。

為了填補社會主義觀念消失後留下的思想真空，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共產黨政權不遺餘力地提倡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1990年代，江澤民進一步加強了這方面的努力，日益強烈的大國民族主義最終成為共產黨中國的唯一意識形態。

當然，民族主義一直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強大力量。從五四運動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直到整個革命戰爭年代，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幾乎總是交織在一起。在1920年代中期的城市革命和1930年代、1940年代毛以農村為根據地的革命中，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革命密切相關。[14] 事實上，毛的革命——與日本對中國的入侵巧合——在許多方面，必然採取民族獨立和社會革命融為一體的戰爭形式。無論是在1949年之前還是之後的毛的時代，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目標以相互推進的方式結合在一起，儘管在1949年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兩者之間的內在矛盾越來越難以協調。

然而，只是到了鄧小平時代(1978–1997)，民族主義最終壓倒了革命理想和革命價值觀念。1978年後，社會主義理想和目標迅速衰退，最終完全讓位於單純的「繁榮富強」的民族主義目標。實際上，在鄧小平時代之初，社會主義就被認為毫無實際意義，鄧小平早就取消了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差別，1980年，他宣佈：「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使國家繁榮富強。」[15]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先驅者反傳統的精神，這種精神與後來數十年人民革命鬥爭的目標是基本一致的。現在，反傳統文化的精神為讚美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的保守的民族主義精神所取代，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官方的歷史哲學的演變就是這種現象的反映。舊的毛主義所強調的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基本上被丟棄，取而代之的是歌頌歷史上帝王將相的成就和近代企圖使中國現代化的統治

人物 —— 包括鎮壓了十九世紀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曾國藩，甚至還有蔣介石。與之相應的是對傳統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頂禮膜拜，在江澤民擔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後的這些年中，這種現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這種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表現為1994年大張旗鼓地慶祝孔子誕辰2545週年紀念活動、在學校重新開設儒學、在北京成立「國際孔子研究會」—— 研究會聘請信奉新儒家學說的新加坡獨裁者李光耀擔任名譽會長，最不可思議的是由準官方組織的朝拜神話中的「黃帝陵」儀式，包括叩頭和焚香。

香港回歸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只局限在模糊的文化民族主義領域。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在人民共和國和海外華人社團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愛國主義熱潮，其熱烈程度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投降後所僅見，是中國民族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

對中國所有的政治派別來說，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是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侮辱的最典型的象徵。1839–1842年鴉片戰爭後(鴉片戰爭是為保護英國鴉片走私者和保證東印度公司 —— 印度事實上的殖民政府 —— 的利益而發動的)，英國把香港作為戰利品而侵佔的。英國對香港的侵佔，是當時帝國主義強加給中華帝國的許多「不平等條約」中第一個產物。它很快成為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強加給亞洲和非洲殖民統治的模式。由於英國在其對香港統治快要結束之前，開始在香港建立所謂「民主」和「自治」體系，所以，需要切記的是，在英國對香港的統治歷史上，香港總督是由英方任命的擁有貴族身份的官員* 擔任，他只對設在倫敦的英國外交部負責，香港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社會，一小批外國精英統治和剝削臣屬的當地居民，在這個殖民地社會裏，對中國人的種族歧視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16]

1949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的中國統一，敲響了英國對香港

* 其實近幾十年來的大多數港督都由英國外交部派出，他們退休回國後才封為貴族，進入上議院。—— 編者註

殖民統治的喪鐘——假設是蔣介石的國民黨贏得內戰，也將會是這個結果。但在事實上，可能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才延長了英國的殖民統治，如果是一個非毛的政權取得勝利，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因為，在毛澤東統治期間(1949–1976)，經濟上的「自力更生」使中國基本上與世隔絕，這樣，處於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得以成為中國對外經貿往來、與世界經濟聯繫和吸收先進技術的經濟紐帶。正因為如此，儘管毛政權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形象因此而受到損害，香港的政治前途問題還是被擱置起來。

然而，在後毛時代，隨著鄧小平大權在握以及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實行「開放」政策，英國統治下的香港不僅在政治上是時代錯誤，在經濟上也已變得多餘。所以，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請到北京來，告訴她殖民時代結束了。其後，在中方主導下雙方就此展開談判，達成了1984年中英兩國的「聯合聲明」，聲明規定，香港(大英帝國在海外最後一個有影響的殖民地)將於1997年歸還給中國。中英雙方還同意，香港的經濟制度保持50年不變，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原則下，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

在香港正式回歸中國的前幾個月，鄧小平逝世，未能目睹這一盛事；因此，江澤民能夠主持1997年7月這一民族主義的凱旋勝利，純屬他的政治運氣。雖然先前有許多關於金融和政治混亂的猜測，但香港政權的移交進行得十分順利，只是各種儀式太多——當然是指中方，旨在顯示巨大的愛國熱情和滿足民族心理。考慮到這一舉世矚目的事件的重要歷史意義，這種愛國熱情確實是十分真實的。但是，北京早就在培養忠誠於「祖國」的愛國情操。1984年，至少是在涉及到香港問題時，鄧小平對愛國主義作了新的定義：「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他還說：「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17]

香港的中國富豪最熱烈地響應北京的愛國主義呼籲，他們匆匆地加入了各種「愛國協會」。許多富有的香港資本家早就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有著巨額投資，與共產黨政權有著不可分割的金融聯繫。其中一些

資本家，例如船業大亨董建華，成為香港新政權——即由北京控制的「特別行政區」的領導人物。香港的中國大資本家的愛國主義和他們與中國共產黨精英水乳交融的關係，對理解鄧小平時代人民共和國發生的社會變革，意味深長的。

台灣

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後，台灣成為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最後障礙。然而，台灣與大陸的分離，無論從歷史和政治上來看，都是一個遠比結束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更加複雜的問題。台灣問題充滿了危機。

在現代世界，根據衡量國籍的一般通行標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是毫無疑問的。台灣的種族、文化、語言和居民都屬於中華民族。除了少部分已逐漸消失的屬於少數民族的原住民外，台灣的居民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雖然在許多世紀中為數不多)，大陸居民早在公元1000年就開始移居台灣。1683年，台灣正式歸屬於滿清帝國，被作為福建下屬的一個地區。現在台灣的大多數居民，都是在十八、十九世紀從海峽對岸的福建來到台灣的移民後裔。

現在有關台灣地位問題的不確定和爭議，主要是由一些歷史原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戰爭，台灣作為戰利品，成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地。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持續了半個世紀，台灣民眾與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和思想主流完全隔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台灣才回歸中國。1945年，當時的中國政府是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國民黨軍隊不是把台灣當成解放了的殖民地、而是當成一塊被征服的領地對待。[18] 國民黨在內戰中被共產黨打敗後，其殘軍和官僚逃到台灣，在台灣原有的1000萬人口上，又增加了200萬大陸人。台北的國民黨政權宣稱是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對此表示支持。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事實上給台灣提供了軍事保護，美國還慷慨地給台灣提供經濟、外交以及軍事援助。雖然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生存依靠美國的第七艦隊，但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代表全中國的政府這一虛構的基礎上。因此，國民黨政權逮捕、有時甚至處決鼓吹台灣獨立的人，這在今天看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卻完全合乎邏輯。實

際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任何主張台灣與中國大陸分裂的人，與同情北京的共產黨政權同樣是政治異端。

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統治的這種虛構的合法性，不可能無限地繼續下去。1970年代初期，尼克松總統開始了與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 台灣的精神支柱開始倒塌。1972年中美雙方發表的「上海公報」，宣佈美軍將逐步從台灣撤出（雖然沒有承諾放棄軍事援助），台灣的未來是中國的內部事務。1979年中美係正常化後，美國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然而，由於鄧小平急於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因此同意美國堅持的在台灣保留美國「非官方的」政治與文化代表處、繼續給台灣提供先進的軍事技術的條件，從而造成了新的模糊性，為未來的衝突留下了隱患。

在近二十年後鄧小平時代即將結束的1995年，這種安排導致的衝突、實際上是戰爭的可能性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暴露出來。北京的立場在鄧小平時代基本上沒有變化，即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盡可能採取和平的方式，在必要的情況下不排除使用武力。但是，台灣在這些年卻發生了變化。1975年蔣介石去世，其子蔣經國於1988年去世。此後，在已經現代化和富裕的台灣，民主改革加速了政治上的「台灣化」進程。實際上，國民黨統治集團本身也逐漸由台灣人控制。1988年，台灣的副總統李登輝繼任小蔣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和國民黨主席，1996年，李登輝又成為台灣第一位經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台灣局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出於他所領導的國民黨的立場和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的要求，李登輝在口頭上也承認一個中國的目標，但是，他逐漸放棄了「一個中國」的政策，企圖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採取了最聰明的方式推進台獨政策，即改善與北京共產黨政權的關係——允許台灣人訪問大陸（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湧入大陸）；鼓勵與人民共和國的貿易；允許台商在大陸投資，台商在大陸的投資不久就超過了美國，達到250億美元；與北京的代表就一些實際問題進行會談，諸如台灣與大陸的直接通航、捕魚權利和移民問題等。但是，貿易、投資和關於雙方共同利益的會談，並沒有像北京期望的那樣促進「和平統一」，反而顯出台灣作為一個小小的獨立國家，在大國支配的世界中，勇敢地為自己開闢道路。

然而，1995年6月李登輝在美國的訪問，完全揭開了他遮遮掩掩的台灣獨立運動（包括為了加入聯合國而許諾提供10億美元這一徒勞而尷尬的事件）的面紗，暴露了台灣獨立可能給國際安全帶來的威脅。自從1972年尼克松開始與中國關係正常化進程後，有關各方都理解，「一個中國」的政策，包括台灣高級官員只能以個人身份、而不是官方身份訪問美國。在二十多年裏，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遵守了這一約定。但是，李登輝總統接受了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回校聚會的邀請，因而向美方申請入境簽證。美國國會兩院中包括開明派的民主黨黨人以及保守派的共和黨黨人，儼如過去〔五十年代初替國民黨説好話的 —— 編者〕中國走廊客（China Lobby）的復活，在他們雙方的斡旋下，參眾兩院都通過決議，歡迎李登輝來美。當時面臨再次大選壓力的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很快作出妥協，不顧國務院的反對，批准給予李登輝簽證。

北京對李登輝這次大張旗鼓宣傳的所謂「私人」訪問的反應可想而知。北京中止了江澤民與與李登輝間接進行的有關「和平統一」問題的談判，也中止了與台灣就捕魚權利和移民等問題進行的卓有成效的磋商。中國召回了駐美國大使。1996年6月和8月，中國在台灣附近海域進行了先進導彈的發射試驗，又在秋季再次進行導彈試驗，企圖影響台灣的總統大選。美國對此作出緊急反應，派遣了由兩艘核動力航空母艦組成的艦隊進駐靠近中國的海域。戰爭陰雲密佈，令人生畏，中國和美國都作出了妥協。在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同意於1998年進行互訪後，兩國恢復了低級別的軍事和外交聯繫。

要為一個獨立的台灣尋找歷史根據並不是一件難事。在日本殖民統治的半個世紀裏（1895–1945），台灣人民在現代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與中國分離，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標識，1949年後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道路，進一步加深了兩岸差別。[20] 然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難以作為台灣獨立的歷史例證，國民黨本身的存在就是中國統一和「一個中國」的證明。此外，在後殖民統治時期，把由於外國殖民統治製造的「國家」作為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歷史證明，是牽強附會的民族主義論點。

但是，無論借助於歷史案例或道德論據來論證台灣獨立有多強的

說服力，鐵一般的事實是，一個獨立的台灣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行不通的。台灣目前的準獨立地位完全是在美國軍事力量的保護下才得以存在。但是，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優勢不會永遠保持下去；大多數軍事專家認為，事實上，這種優勢最多保持到新世紀的頭十年，甚至在此之前就可能不復存在。幾乎所有的亞洲國家都承認中國在東亞的支配地位，沒有一個國家支持台灣或美國對台灣的模糊政策。正如一位享有盛譽的亞洲「老資格政治家」在回答《紐約時報》記者關於為什麼沒有一個亞洲國家在1996年的台海危機中支持美國時說的：

> 中國在這裏存在了三千年。美國在亞洲才五十年時間。我們認為，美國在這裏還能有二十年時間。但是在美國人離開後，我們還得繼續與中國相處，我們無法跟中國抗衡。[21]

因此，無論採取什麼方式，「和平統一」是台灣最明智的選擇。1998年夏季克林頓總統在對人民共和國進行正式國事訪問時，明確闡明了自尼克松總統於1972年簽署〈中美聯合公報〉後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的具體含義，他說：「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不認為台灣應該成為任何需要以國家名義加入的組織的成員。」[22]

儘管很難保證台海兩岸都能理智地解決這一問題，但人們必須要求當事的有關政府（台灣、美國和北京）要努力避免會給太平洋兩岸都帶來災難的戰爭。人們希望，和平統一進程（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進程）將在承認台灣獨特的現代歷史的基礎上，給予台灣充分的自治權，希望在中國與其斯大林的過去徹底決裂、開始進行意義深遠的民主改革的基礎上，實現和平統一。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

鄧小平開創的市場經濟改革時代，產生了令人嘆為觀止的經濟成果。自從1978年開始，中國經濟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長，在現代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經濟大國像中國這樣在這麼長的時間裏能保護如此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就翻了兩番

—— 如果中國能繼續保持這樣的經濟發展速度，那麼在新世紀的頭幾十年時間裏，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就會接近美國。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社會結果卻難以讓人恭維。當然，經濟繁榮使絕大多數中國人得到了物質實惠，生活水平比鄧時代前有了很大的提高：更好的住房、改善了的飲食結構、有條件購買琳琅滿目的消費品。[23] 對於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被剝奪了自己勞動果實的人民來說，不應該低估這些物質成果在物質和心理上的意義。

然而，經濟進步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後毛時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付出的代價和造成的後果，是中國的環境在人類歷史上以空前的規模遭到破壞，包括可耕地面積鋭減、工業對空氣和水質的大範圍污染。[24]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還有官商和政府官員嚴重的貪污腐敗，貪得無厭的官員巧取豪奪，盤剝貧困和政治上沒有反抗能力的民眾、特別是農民。事實上，正是腐敗的地方官員的横徵暴斂，是1990年代中國農民越來越頻繁和激烈地進行反抗的主要原因。[25]

在物質進步的同時，由於市場經濟對生產「效率」要求越來越高，絕大多數勞動群眾的生活保障越來越不穩定。市場經濟的效率要求取消毛時代的勞動者享有的社會福利和職業保障，增加了勞動者失業的威脅（現實中失業率不斷上升）。即使有工作的工人，特別是那些在草草建立的私人或「集體」企業中勞動的青年工人和女工，安全生產常常難以得到保證。在私人或「集體」企業中，許多工人在生產事故和火災中喪生或致殘，其情況之嚴重，在現代工業史上實屬罕見。正如澳大利亞著名學者陳佩華（Anita Chan）總結的，中國工人所受到的虐待，還包括「強迫勞動；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物質虐待；只能拿到勉強維持生存甚至更低的工資；對工人的普遍施暴」。[26]

經濟快速增長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分化，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刑事犯罪潮（根據官方數字，從1978年到1990年，犯罪率增加了十倍），城市和農村都出現了犯罪集團，僅在1997年，中國處決的罪犯就達到3000人，超過了同期全世界死刑犯的總和。[27] 1949年前的社會醜惡現象又在城市死灰復燃 —— 妓女、吸毒、賭博和黑社會。共產黨政權在1950年代曾徹底地消滅了的這些醜惡現象，如今又氾濫成災。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不幸的社會結果，是極端的社會和

經濟不平等現象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中國從一個相對平均的社會，轉變成一個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最明顯的社會，其兩極分化程度甚至遠遠超過了作為亞洲資本主義榜樣的台灣和韓國。毛時代留下來的不平等——城鄉差別、沿海與內地的差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差別——在改革時期進一步加深。但是，更有深遠影響的，是在同一地方、同一地區內部出現的巨大的社會經濟差別，這種差別是國家推動的市場關係迅速導致社會階級分化的反映。例如，農村的商業化已經產生了一個新農村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由控制著相對大量的土地(僱用勞力耕作，或出租)的資本主義式的農民、擁有各類工商和服務企業的私人老闆、農村黨員幹部組成，新農村資產階級與黨員幹部有著密切的聯繫，其成員有許多直接就來自共產黨。[28]

與此同時，新的市場機制已經驅使幾乎佔農村勞動人口的一半的二億多「剩餘」勞動力離開了土地。他們的命運與世界上所有經歷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農民的命運一樣，是無產階級化，而且，毫無疑問，他們也將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無產階級化進程最快的農民。這些離開土地的農民，可能約有一半的人在鄉鎮或其他企業中找到了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作。其餘的一億多農民成為流動勞動力，組成了「流動人口」，他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地尋找一切他們能幹的工作。不用說，他們是無情剝削下的受害者——如果算上那些倒閉或將被出售的國有工廠的失業工人，他們的人數將達到2億人。

城市地區的經濟和社會差別比農村更加醒目。在清貧的毛時代，中國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基本相同，現在，由共產黨腐敗的高級幹部及其利用一切市場機會發財的親戚、私營工商企業主、銀行家、領取高薪的技術人員和經理組成的精英，成為城市的主人。這些佔人中總數比例不大、但絕對數量龐大的暴發戶，支撐著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奢侈品市場[29]——他們中一些人赤裸裸地炫耀自己在一頓晚餐上喝的進口葡萄酒的價錢，就比一名工人全年的工資還要高。至於那些在工廠裏辛苦勞作的工人——世界上最龐大的工業無產階級的成員，他們的「鐵飯碗」——為狂熱的市場改革家們冷嘲熱諷的、國有企業職工傳統上享受的一定程度上的職業保障制度——已經由於市場改造和國有企業的出售而被「砸碎」了，其結果是越來越多的城市工人被

驅趕到由流動勞動力構成的流動無產階級的行列中，這是世界最大的、人數增長最快的一支失業大軍。一方面是新生的城市資產階級精英在時裝沙龍和進品汽車商店裏揮金如土、窮奢極慾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住在貧民窟或睡在火車站的流動勞動力，中國城市的貧富兩極分化之懸殊與任何資本主義大城市都沒有什麼兩樣。就貧富的極端兩極而言，上海和廣州完全可以與紐約、倫敦、里約熱內盧、墨西哥城和加爾各達相比。

市場經濟產生的不平等現象並非完全出乎意料。畢竟，對毛的「平均主義」的激烈批判是改革時代的前奏，鄧的知識分子把「平均主義」視為中國社會的萬惡之源，是經濟落後和社會弊端的禍根。回顧歷史，為進入市場社會所作的輿論準備，當首推鄧小平對個人慾望和貪婪的鼓勵以及他對不平等的預先認可，這反映在他的兩句名言中：「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而，雖然出現社會經濟差別沒有出乎人們的意料，但無論市場經濟的支持者(甚至是反對者)都沒有預見到貧富之間的實際差別會如此懸殊。當然，鄧小平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導致的不平等和其他社會後果，並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普遍特點。但是，這些現象在中國卻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發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堪稱世界歷史之最。中國的資本主義給經濟帶來的活力和給社會造成的破壞，是此前的任何國家都難以比擬的。

事實上，作為後繼者的中國的資本主義，已經達到馬克思當年極富遠見的預言的頂點，即它導致「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關係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30] 這是一個苦澀的歷史嘲諷，難以駕馭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及其造成的所有不可避免的社會後果，卻是在共產黨政權領導下實現的，而植根於近一個世紀中國思想傳統的共產黨意識形態，恰恰主張避免資本主義邪惡的社會弊端。[31]

不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雖然開創和促進了 —— 並且從中獲利 —— 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野蠻發展進程，但他們仍感到有必要宣稱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在正式批准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的中共十五大上，總書記江澤民多次提到中國正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宣稱中國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在

1989年趙紫陽下台後就很少提及），[32] 把自己擺在從馬克思到毛澤東、鄧小平的革命領袖行列中。他還(似是而非地)大談「社會主義民主」。20年前，他的保護人鄧小平在自己的復出過程中，曾嫻熟地運用了「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

猜測這些含混不清的理論概念對江和鄧後的其他領導人在思想和心理上有什麼影響(如果有的話)是徒勞的。但是，這些概念的政治含義卻是再明白不過的。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及其在中國的主要信徒一脈相承的思想形式，為江澤民作為1949年革命的捍衛者提供了法統依據，因為正是這場革命創造了江如今統治的這個國家。此外，這層薄薄的思想外衣，也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即專政)提供了根據，因為正是在黨的領導下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創建了人民共和國——也正是中國共產黨依然宣稱自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目標的忠誠實踐者。

社會主義與民主

江澤民重提「社會主義民主」這一概念不免令人費解。在國家的推動下，資本主義在中國已經緊鑼密鼓地發展了近二十年，與此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政治專制，即使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念都已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異端。江澤民畢竟與鄧小平的遺產緊緊捆在一起，實際上，他把鄧小平的思想和政策，冠之以「鄧小平理論」，上升到國家官方的意識形態高度。但是，他所謂的「鄧小平理論」，只不過意味著迅速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政治專政的結合。在中國的這一發展理論中，更多地是民族主義的內容，與社會主義幾乎毫不相干。不過，北京政權依然含含糊糊地保證要實現社會主義，這顯然是建立在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信念的基礎上，即經濟和技術發展到一定的高水平階段，社會主義就會自動降臨。如同鄧小平反覆強調的，只要生產發展了，就必然會出現社會主義，[33] 雖然他沒有解釋怎樣出現。而這也正是他的繼承人理解的「鄧小平理論」的主要原則。然而，按照鄧小平的觀點，建設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發達的」社會主義轉變所必需的物質基礎，至少要到2050年才可能實現。他的繼承人又進一步發展了這個理論，把

社會主義實現的時間又向後推遲了半個世紀。江澤民預言，社會主義社會將在廿一世紀末實現。[34] 無論是那個時間實現，社會主義都被推到將來，在事實上與現在的希望和行動沒有任何聯繫，因而也是毫無意義的。

任何可以想像的中國社會主義的真正源泉，不可能是在遙遠未來共產黨體制下的發達經濟之中，而是存在於此時此地反對共產黨政權的民主鬥爭中。社會主義既需要理想，也需要社會實踐者。社會主義的理想不可能由偉大導師自上而下地灌輸，只能是在與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社會邪惡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自然產生。而社會主義的實踐者，很可能就是無產階級，這並不是因為馬克思的正統教義中是這樣規定的，而是因為工業化正在迅速使中國工人成為人數最多、受剝削最深、政治上最重要的社會階級 —— 也是中國共產黨最害怕的階級。

從中國歷史的特點上來看，中國無產階級 —— 中國共產黨至今還宣稱是這個階級的代表 —— 並不是共產黨政權的主要威脅。畢竟，這種情況只是發生在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東歐共產黨國家 (在較低程度上，也包括蘇聯) 中。在中國存在著一個悖論，即任何真正的中國社會主義運動，在反對資本主義的同時必然地要反對共產黨，這是一個運動的參加者和觀察家都不得不面對的悖論。這種明顯的自相矛盾是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的資本主義基本上是共產黨國家創造出來的，共產黨領導人和幹部是建設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角，在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主義體制依靠於共產黨國家的權力保護，而許多黨的官員則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獲得巨額利益。共產黨與資本主義這種看來怪異的聯盟 (如果回顧一下共產黨國家是如何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也許人們對這種聯盟就不會感到吃驚)，使中國的新資產階級完全不可能成為民主變革的熱心推動者。相反，對共產黨國家的挑戰將來自中國資本主義的受害者，而不是其受益者，將來自日益壯大的、深受剝削的工人階級及其同盟。因此，在當代中國的政治中，能否自由地組織成立獨立的工會將成為最根本的問題，這是爭取民主和人權鬥爭的關鍵一環。

在鄧小平後的中國進行民主變革的前景如何？隨著1978年後中國令人眼花繚亂的巨大經濟變革和後毛時代的有著重要意義的政治變

革，已很少有人還執著於一度十分流行的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形象，即一個一成不變地實行獨裁專政、沒有能力進行內部調整的共產黨政權。誠然，鄧小平一旦大權在握，便毫不猶豫地背棄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的諾言，也背棄了曾是他同盟的1978–1981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參加者（有時甚至把他們投入監獄）。然而，早期的鄧小平政權曾經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毛時代的專制實踐，釋放了成千上萬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改農場的政治犯，其中絕大多數是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為他們「平反昭雪」。在1980年代，儘管情況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思想文化界的多元化在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雖然實際數字難以確定，但所有的觀察家都同意，在1980年代初期，因所謂政治罪行而入獄的人數（用《人權觀察》報告中的話說）「驚人地下降了」。[35] 總的來看，國家對社會日常生活的控制也顯著放寬。

然而，斯大林式的政治體制依然如舊，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進一步加強了這種體制，[36] 鄧的繼承者也如同鄧一樣，把這四項基本原則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一黨統治（更準確地說，是列寧主義等級制中處於核心的一個委員會的統治）繼續保持不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提出挑戰。宣稱有6000萬黨員（這也不過只佔總人口的5%）的共產黨本身，拒絕在內部等級中進行任何民主化的嘗試。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上，沒有就任何重要事項進行公開的辯論或爭論，沒有一個代表對江澤民或黨的其他領導人提出批評意見，所有的決定都按照慣例一致通過。這正是斯大林主義的傳統。

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它作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而存在，其官僚觸角從首都一直延伸到全國所有的角落，政治警察（由數量龐大的秘密警察組織構成）的權力沒有絲毫削弱。這不由不使人們對正在進行中的村級選舉的民主意義產生疑問。在鄧小平時代剛開始的1979年，選舉法中就規定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採取直選形式，1986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此又作了修改。但是，當民主積極分子提出要在地方選舉中增加一定程度的民主內容時，1980年和1986年的兩次民主選舉試驗又被中止。[37] 1990年代中期的早些時候，又恢復了村級民主選舉。隨後，江澤民許諾要盡快把民主選舉推廣到鄉鎮一級（即人口不超過十萬的小城市）。村和鄉鎮的選舉也許有助於反映群眾

對地方事務的意見和對地方政府一定程度的監督，但無論地方選舉有多少長處，它對於總的民主進程並沒有多大影響。村和鄉鎮中的黨組織和警察機構，將使地方選舉只能涉及純粹的地方事務。

自從1980年代中期後，農村一些(部分工業化了的)地區悄然開始了自己的民主創新，比起官方組織的村級民主選舉，這種民主創新更有意義，它使群眾對當地黨政幹部有了一定程度的監督權，同時也促進了半集體制的經濟生活，一些參與了民主創新的知識分子將這種發展稱之為「合作制式的民主體制」。[38]

雖然中國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在1980年代明顯放鬆，但在1989年6月軍隊鎮壓了民主運動後，中國又開始了一個新的漫長的政治專制時期。在解放軍鎮壓了民主運動後，秘密警察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搜捕，除此之外，對社會又重新實行了鄧小平時代之前的政治控制和思想鉗制。知識分子、記者和大學生是政治警察的主要目標，不過，共產黨內部也進行了清洗，數千名黨員幹部因同情學生運動被開除出黨或受到紀律處分。參加「北京之春」的工人受到了最野蠻和殘酷的對待，許多工人在草草審訊後即被處死或被判處漫長的刑期。對報紙、刊物和書籍實行了更為嚴厲的檢查制度。

當然，1989年的民主運動及對運動的血腥鎮壓，是鄧小平時代後期和江澤民「集體領導」初期實行這些極端的壓制政策的直接原因。但是，東歐和蘇聯共產主義的解體造成的恐懼也是導致專制氣氛的原因之一。鄧小平和中國其他領導人從蘇聯的解體中得出的教訓是，必須加強列寧式的國家和黨的專政權力，像戈爾巴喬夫所推行的這些民主政策，對共產黨政權的生存是極其危險的。他們得出的另一個教訓是，必須「深化」市場經濟改革，以加快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緩解人民的不滿情緒。1989年後，正是這種資本主義發展與政治專政的結合，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指導原則，1980年後期在一些知識分子中極有影響的新權威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就已預示著這一原則。正是這一原則，滿足了鄧小平害怕發生「動亂」的心理。對鄧小平來說，任何動亂都會使他聯想到毛的文化大革命和後毛時代的民主運動。1990年代初、中期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幸運地為鄧及其繼承人堅持的自相矛盾的「社會主義制度」撐起了門面。

在成千上萬名政治專制的受害者中，最著名的是鄧小平的老對手魏京生。魏在1979年就曾提出警惕鄧小平「蛻變為獨裁者」，[39] 他因這類言論而於1979年3月29日被捕，自此開始了對民主牆運動的鎮壓。在經過僅一天的審判後，魏被以「反革命」行動罪名判處15年徒刑。魏是中國受迫害的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中第一位著名的受害者。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在中國一直未曾中止過，雖然鎮壓的程度隨著共產黨領導人的政治利益和傾向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1993年9月，還差六個月就滿15年刑期時，魏京生被釋放出獄。但是，在現在中國狂熱的資本主義世界中，這位44歲的民運人士的「自由」時期卻十分短暫。雖然面臨再次入獄的威脅，但魏在1993年時如同在1979年時一樣，沒有向當局低頭。他抓緊時間發表呼籲政治改革和民主改革的文章。為此，他又一次被捕入獄，1995年12月，他被指控參加「陰謀顛覆政府」的活動而被判刑14年。魏京生第二次服刑時間不到兩年。在越來越強大的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北京政權於1997年11月，即江澤民即將訪問美國之前，釋放了魏京生，並讓他流亡國外。

在兩次刑期之間的短暫時間裏，魏京生曾寫信給王丹，建議中國分散的不同政見者要「互相幫助」。後來這一建議被國家檢察官當作魏京生和王丹陰謀顛覆政府的罪證。王丹是北京大學的學生，1989年民主運動的學生領導人，他因「反革命宣傳」罪而入獄，在服刑四年後，被假釋出獄。獲得自由後，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為其他政治犯的家庭提供人道援助的活動中。他還撰寫文章，呼籲進行民主改革，一些文章刊登在香港和台灣的媒體上。他被控與「境外敵對勢力」相勾結，從事「顛覆政府的陰謀活動」。[40] 1995年5月，王丹受到「住所監視」，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不得與外界有任何聯繫，直到1996年10月，他被指控犯有「顛覆」罪，隨後被判刑11年。但在服刑不到兩年後，他於1998年4月，即克林頓總統正式訪華前不久被釋放出獄，被迫流亡海外。

在第二次審判中，無論是魏京生還是王丹都沒有被指控犯有過去說的「反革命」罪，這與對他們的第一次審判不同。他們現在是以參加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的罪名被捕入獄。這一用語的變化是因為共產黨決定取消《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一方面是為了避免給國際輿論以中國進行政治迫害的口實，另一方面純粹是為了從法律上正式承認革命

早已結束，雖然這種承認來得太晚。1997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決定制定新的刑法，刪除原刑法中的「反革命」罪，給那些已經在牢裏的犯人新增了一條「危害國家安全」罪。這種改變不過是概念遊戲。對那些原來被作為「反革命分子」關押的犯人來說，對新的「國家安全」範圍的解釋，已足以包含過去所有的「反革命活動」。

法律的這種改變，並沒有改變北京長期以來以普通刑事罪名來關押政治犯的實踐，特別是政治犯常被籠統地加上「流氓」或「小偷」的罪名。從刑法中刪除了「反革命」罪，也沒有減少通過行政手段而不是司法程序判決入獄的政治犯的人數。劉曉波的命運就是如此。1989年6月4日凌晨，他也在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與解放軍的談判，為廣場上的學生爭取到安全撤離的通道。[41] 他因此而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入獄兩年。1990年代中期，劉寫呼籲書和公開信要求進行民主改革、與台灣和平統一、與達賴喇嘛就西藏的地位進行談判。其結果是，1996年10月7日，他在北京的家中被捕，公安局判他進行三年的「勞教」，就是說，把他送到勞改農場。

許多不同政見者為避免入獄而逃亡海外，特別是在1989年以後。其中一人是王希哲，他在1996年下半年逃到美國之前已經坐了近二十年監獄。王是筆名為「李一哲」的三位年輕知識分子中的一位，他們是1970年代初期十分有影響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一文的作者，這篇文章激勵了1978–1981年的民主牆運動的知識分子。但早在此之前，文章的三位作者就已被捕。1975年3月，在毛政權最後一年拜占庭式的派別政治鬥爭中，王希哲和其他兩位作者被送進了監獄。1979年2月，鄧小平已經復出，「李一哲」三人被釋放出獄和「平反」。其中兩人適應後毛時代的潮流，利用鄧小平政權提供的新機會作生意。但是王希哲作為一個獨立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繼續致力於自己的事業。他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毛和鄧時代缺乏社會主義和民主，在魏京生被捕後，他更加尖銳地批評鄧小平，不久，他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共產黨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官僚統治階級，他的這一結論是鄧小平時代最異端的思想罪。1981年4月，他被作為「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入獄，刑期14年。1993年，王希哲被假釋。擔心由於繼續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而被抓，儘管他的觀點在日益非政治化的中國基本上沒有引起什麼反

響，王希哲還是決定躲藏起來，最終也流亡海外，1996年下半年，他到了美國。

*　*　*

1989年後，對工人階級的政治鎮壓是最殘忍的。在整個1980年代，中國領導人一直懷有「波蘭恐懼症」，他們害怕出現由工人和知識分子組成的團結工會式的聯盟，這將對共產黨政權構成嚴重的政治威脅。雖然很少有知識分子有意與工人聯盟，政府還是對可能導致這種結果的工人的任何不滿或騷動迅速採取鎮壓行動。參加1989年民主運動的工人受到的懲罰，遠遠比學生積極分子要嚴厲得多。1989年6月，許多工人因所謂的暴力活動在短暫的審訊後即被處決。[42] 被捕的工人數量遠遠超過學生數量，在同一罪名下，工人被判的刑期比學生更長。即使是政府通緝令中所列的學生要犯，受到的待遇相對也是比較寬大的。例如，通緝令中最引人注目的王丹，被判處四年徒刑，而參加民主運動的工人積極分子，通常受到的懲罰最低是15年徒刑直到死刑。[43]

對那些在民主運動中企圖組織工會但未能成功的工人，政府特別採取了最殘酷的懲罰。1989年6月，一些組織者被公開判處死刑，其他一些參加了完全是和平的工會活動的工人，被政府加上從事暴力活動罪而判處漫長的徒刑。在一些情況下，工會組織者被關進監獄，既不審訊也不提出任何指控，韓東方就是一個例子。韓東方是北京鐵路局的一名維修工，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1989年6月他被捕入獄，官方沒有提出任何指控，直到1991年，因害怕他因肺結核死於獄中，才被從獄中放出。獲釋之後，雖然患有疾病、身無分文並常受到警察的騷擾，但韓東方繼續他組織工人的運動。他解釋說，正是因為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才有必要成立自由工會，「如果中國現在允許這些資本主義組織迅速發展，為什麼不能允許成立自由工會以保護工人的利益？我希望黨的工會能保護工人，但是他們的行動令我失望。他們沒有盡他們的職責。」[44]

1992年5月，在國際輿論的強烈批評下，北京政權允許韓東方以

到美國學習的方式流亡。但是，1993年夏季，韓東方回國時，在海關被拒絕入境，實際上他成了永久流亡。

中國共產黨當局在鎮壓致力於組織自由工會(尚無成功先例)的工人活動家時，粗暴地踐踏工人基本的人權，這是中國人權記錄最差的領域。由於事關根本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秘密警察和國家安全機構特別致力於處理「勞工問題」。這種政治擔心由來已久，即對任何不受共產黨組織控制的團體或組織的列寧式的擔擾。正是出於這種夢魘，共產黨領導人決意鎮壓對中華全國總工會——堅定地在黨的控制之下——的壟斷地位任何可能的政治威脅。鄧小平市場經濟改革所產生的經濟利益，使得共產黨國家的生存日益依賴於它所創造的官僚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功。中國的資本主義反過來又依靠共產黨國家向其提供足夠量的勞動力，以壓低工資和制約工人。正是這些功能，是人民共和國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以能夠如此吸引國內和國際投資者的主要因素，也是經濟迅速增長的主要因素。這些「特色」與自由和獨立的工會是不相容的，因此，成立自由工會就成為中國最大逆不道、最危險的政見。

總的來說，共產黨國家把獨立工會作為非法組織、在這類勞工組織處於萌芽狀態時便堅決鎮壓、逮捕工人活動家(或令其流亡國外)，最大限度地滿足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利益(特別是企業官僚們的利益)。

對工人的壓制正是在中國城市工人階級處於最艱難的時期進行的。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觀念和實踐統治著弱小的、收入菲薄的勞動群眾的時期；是政府計劃把部分國有企業私有化、從而給已經十分龐大的失業大軍再增加4000萬人之多的時期；是「市場經濟」要求基本上取消毛時代留下的社會福利體制、使企業和政府減少在失業救濟、養老金和醫療等方面的開支的時期；是許多城市工人家庭因家中的女性成員、特別是年過30歲女性成員不得不下崗而收入下降的時期。[45] 此外，新官僚們名目繁多的橫徵暴斂，例如公立小學的亂收費等，使工人階級家庭的生活雪上加霜。大城市中官方公共建築的速度放慢，減少了外出打工的就業機會，而中國的「流動人口」已發展成世界歷史上人數最多的「勞動力後備軍」。

由於國內經濟發展速度不可避免地逐漸放慢，城市和農村勞動群

眾在經濟上的窘境已經持續了幾年時間，而在千禧年末突然爆發的席捲世界的金融危機，又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影響。自1980年代初期，中國為了在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上謀取經濟利益，開始加入世界經濟，現在，人民共和國不得不同時也經歷世界體系中不那麼令人愉快的動盪起伏。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首先於1997年春季在泰國和韓國爆發，不久便影響到中國的沿海地區。由於出口下降、外資減少以及亞洲其他國家更便宜的商品競爭，中國經濟在1998年上半年的增長速度降到7%，隨後又進一步下降。[46] 從世界經濟來看，7%的速度不能算低，但中國經濟在前幾年的增長率是在12%到14%之間。朱鎔基和其他中國領導人曾反復強調，中國經濟最低也必須保持8%的增長率，才能減輕失業的壓力，保持社會的穩定。

因此，7%的增長率顯然太低了。中國工人階級面臨著來自三個方面的夾擊：中國國內的「市場經濟」、共產黨國家和動盪的世界經濟。他們還被剝奪了建立自己工會的自由，實際上處於毫無自我保護能力的境地，只能進行一些自發的、零散的反抗。進入1990年代後，工人的這種反抗活動迅速增加，他們在當地罷工、怠工，越來越多的失業者、面臨失業危險的工人、領不到工資的工人、拿不到退休金的老工人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這些分散的反抗活動是否能匯成有組織的反抗共產黨統治的運動，人們還將拭目以待——實際上很難想像能發展到這一步。但是，十分清楚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最害怕的正是工人階級會對其利潤頗豐的專制政治權力構成最大的威脅。他們也許陰鬱地回想起年輕時讀到過的馬克思的預言，資本主義創造了自身的掘墓人——現代無產階級。假若馬克思這一久遠的、幾乎被人遺忘的的預言未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應驗，卻在中國——在反對一個仍然自稱代表著現代產業工人階級的利益、渴望和歷史使命的執政的共產黨鬥爭中——得到證實，那將是歷史上最大的嘲諷。

註釋

1. 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2. 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04。
3. 《遠東經濟評論》，1989年8月10日，頁13。
4.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於1993年夏季發表的報告，按照新的「購買力平價」標準來衡量，當時的中國經濟在經濟總量上居世界第三位，略低於日本，儘管與美國的差距還很大。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向國會同時提交的年度報告，中國經濟規模已接近或即將超過日本，日本經濟自從1990年起就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韋納（Tim Weiner），〈中情局以為中國經濟逼近日本經濟〉（"CIA Says Chinese Economy Rivals Japan's"），《紐約時報》，1993年8月1日，A版頁6。根據不同的計算標準和變動假設，中國經濟在世界上的排名分別為第2位、第3位和第4位。
5. 鄧小平，〈關於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26。關於中共十四大的主要文件的英譯本，參見《北京周刊》，1992年10月26日–11月1日。
6. 例如，參見裘覺世，〈中國經濟修正案〉（"China Economy's Class Act"），《紐約時報》，1996年11月14日，頁C18；克雷格・史密夫（Craig Smith），〈中國預測下年度GDP增長為10.5%〉（"China Expects GDP to Expand 10.5% over Coming Year"），《華爾街日報》，1996年12月31日，頁4。1997年，中國實際的國民生產總值為8.8%，大大低於官方的預期。
7. 布勞希利（Marcus W. Brauchili），〈外國在華投資繼續攀升〉（"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till Climbs"），《華爾街日報》，1997年1月14日，頁A14。
8. 有關中國國有企業的客觀公正的評價，參見辛格（Ajit Singh），〈計劃、市場和漸進的經濟改革〉（"The Plan, The Market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研究論文》（*UNCTAD Discussion Papers*），第76號，1993年12月。
9.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的理論旗幟〉，《北京週刊》，1997年8月25–31日，頁10–13。
10. 例如，劉賓雁，〈江的利益，黨的損失〉，《中國焦點》，第5卷，第10期（1997年10月1日），頁1。
11. 關於克林頓訪華扼要敘述，參見莫里斯・邁斯納，〈超越對中國的老生常談〉，《洛杉磯時報》，1998年6月5日，第M1版。

12. 趙紫陽在致中共十五大的信中，呼籲對1989年民主運動重新進行評價，據說這封信為江澤民扣壓。參見劉賓雁，〈江的利益，黨的損失〉，頁1。
13. 有關毛時代與鄧時代的「社會主義」的分析，參見本書第21章。
14. 參見本書第3–4章。
15. 鄧小平1980年11月會見一個羅馬尼亞代表團時的講話。《紐約時報》，1980年12月30日，第2版。
16. 種族主義在社會生活和住房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例如，1904年，英國殖民當局在香港實行住房隔離政策，而且使其成為法律，在「山丘地區保護條例」中，禁止中國人（不管多麼有錢）居住在「半山地區」（the Peak），即香港島中心拔地而起的美麗山丘的上半部分。
17. 鄧小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61。
18. 國民黨政權對台灣的殘暴統治，導致1947年2月28日台灣人民在台北起義，起義時間持續一個星期，迅速擴大到整個台灣島。國民黨軍隊血腥地鎮壓了這次起義，數千台灣人被殺害，還有幾千人被捕。在這場事變後，台灣中產階級的領導層不復存在。參見葛超智（George Kerr）：《被出賣的福摩薩》（*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ufflin Co., 1965），特別是該書中的第12–16章；格克蒂克（Ong Joktik），〈一個福摩薩人關於福摩薩的獨立運動的觀點〉（"A Formosan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曼考爾（Mark Marshall）主編，〈今日福摩薩〉（*Formosa Today*, New York: Praeger, 1964），頁163–170。
19. 參見本書第20章。
20. 我在過去曾對兩岸較早時期不同的政治環境作過較詳細的敘述。參見莫里斯・邁斯納，〈福摩薩民族主義的發展〉，曼考爾主編，〈今日福摩薩〉，頁147–162。
21. 引自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應徵：交易者〉（"Help Wanted: Deal Maker"），《紐約時報》，1996年3月24日，第1部份，頁15。
22. 卡爾姆斯（Jack Calmes）、克雷格・史密夫，〈克林頓在台灣問題上明確表示支持中國〉（"Clinton Backs China on Taiwan, Loud and Clear"），《華爾街日報》，1998年7月1日，A13版。
23. 聯合國發展計劃署在《中國：人類發展報告，1997》（*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77, Beijing: 1998）中，提供了關於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民由於經濟發展而受益的大量的數字證明。

24. 有關中國市場經濟對環境的影響，理查德・史密夫 (Richard Smith) 曾進行了詳細和深刻的評論，參見理查德・史密斯，〈製造毀滅：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中國的環境〉("Creative Destruction")，《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 第222期 (1997年3–4月)，頁3–41。
25. 有關農民在1997年夏季的抗議情況，參見程木 (Cheng Mu)，〈湖北與江西農民的反抗〉("Peasant Riots Erupt in Hubei and Jingxi")，《中國焦點》(*China Focus*) 第5卷，第10期 (1997年10月1日)，頁1。
26. 有關基於第一手資料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調查，參見陳佩華，〈工人權利就是人權〉("Worker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中國人權論壇》(*China Human Rights Forum*) (1997年夏季)，頁4–7。
27. 美聯社刊載的大赦國際的報告，《威斯康星州雜誌》(*Wisconsin State Journal*) (1998年9月4日)，頁8A。
28. 關於中國近年來迅速發展的不平等現象，參見阿齊茲・拉赫曼・汗 (Azizur Rahman Khan)、瑞斯金，〈中國裏的收入跟不平等的關係：家庭收入的構成、分配與增長〉("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the Household Income, 1988–1995")，《中國季刊》第154期 (1998年6月)，第221–251頁。
29. 據《華爾街日報》1993年1月13日A版，頁10報道。
30.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頁254。
31. 自1890年以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中的一個主要信念之一，是相信中國可以在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產生的社會弊端的情況下，獲得現代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的成果。與此相關的另一個信念是中國「可以利用落後為優勢」。關於對中國知識分子這種認識的深刻分析，參見王彥一 (Wang Yaan-iee)，〈中國理念〉("The Chinese Idea")，博士論文，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歷史系，1997年。
32. 本書第24章曾敘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
33. 例如，可參見鄧小平，〈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62–66。
34.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35. 雖然政治犯的總數是保密的，但從一個省中獲得的數字有助於說明發生

的這種變化。1959年末，黑龍江省犯人總數為97,332人，其中57,933人(約佔60%)是作為「反革命分子」而被關押。1981年，該省的犯人總數為23,685人，其中只有577人(不到3%)是「反革命分子」。《黑龍江檢察誌》(黑龍江：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由「人權觀察/亞洲部份」(*Human Rights Watch/Asia*)，第9卷，4期(1997年4月)，頁31轉載。

36. 參見本書第22章。

37. 關於1980年的選舉，參見黎安友(Andrew Nathan)，《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頁193–223。關於1986年的選舉，參見莫里斯・邁斯納：《鄧小平時代》，頁360–361。

38. 關於河南新密縣民主變革的說情，參見榮靜彬(Rong Jing-ben)、崔之元(Cui Zhiyuan)等主編，《從強制到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essurized System to a Democratic System of Cooperation: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區，許多所有制形式並不明確的農村企業，允許工人及社區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企業管理。

39. 魏京生，〈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處》(JPRS)第73421期，頁28–30。

40. 北京市中級人民檢察院，〈對王丹的起訴書〉，(1996年10月7日)。其英譯本作為《人權觀察/亞洲部份》(第8卷第10期，1996年11月)的附錄，頁11–13。

41. 參見本書第24章。

42. 已知的因參加民主運動而被處死的工人為60人，實際人數無疑要更多。《亞洲觀察》，第4卷，第17期(1992年5月28日)，頁2。

43. 例如，1994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關押的因參加1989年6月4日事件的犯人共104人，其中大多數被官方認定為是工人，他們的刑期最長。見《人權觀察/亞洲部份》，第6卷，第11期(1994年10月)，頁7–13。

44. 合眾國際社，1992年3月25日。引自《亞洲觀察》，第4卷，第17期(1992年5月28日)，頁6。

45. 根據半官方的全國婦女聯合會的統計，婦女佔國有企業勞動力總數的39%，但在1998年春季時，60%的下崗工人是女工(多數年齡超過35歲)。珍妮花・林(Jennifer Lin)，〈死要面子：歧視婦女的中國經濟改革〉

(“About Face: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it Hardest against Women”)，《芝加哥論壇報》，1998年4月26日，第13部份，頁9。

46. 《華爾街日報》，1998年7月20日，頁A15。

有關文獻的說明

杜 蒲

當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博士囑我就莫里斯・邁斯納教授的《毛的中國及其後》一書中所使用的文獻作一簡要說明時，我不假思索地就應承了，這確實是一件對讀者有益的事情。但當我為此重新瀏覽全書的注釋和參考文獻時，面對如此眾多且內容廣泛的文獻，一時頗感躊躇。一般而言，西方學者著作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是重視註釋、文獻和索引，邁氏本書尤為如此。此書敘述的是一個數億人口國家上下五十年的歷史，而且是一部他國歷史，其內容以政治史為主，社會領域方方面面，無所不包。然而，通覽全書，作者旁徵博引，縱橫捭闔，史料信手拈來，評議隨境而生，毫無生澀之感，從中可以看出，作者不僅研究功底深厚，而且非常善於借鑒已有研究成果，通曉相關文獻。總的來說，邁氏在本書中使用的文獻大致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中國官方公佈或出版的文獻

主要有：《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1956年)；《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1957年)；《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61年)；《毛澤東選集》(1961年)；《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文化大革命重要文獻選編》(1970年)；《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1973年)；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毛澤東選集》第5卷 (197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彙編》(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主要指數》(1979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歷史的審判》(1981年)；《鄧小平文選》(1975–1982) (1984年) 等。

這類文獻主要代表中國官方的理論、政策和對國家歷史的詮釋。

掌握這類文獻，是理解和研究當代中國史和中國現實不可或缺的環節。但這類文獻易於受政治條件的制約，有一定局限性；例如，在1976年四人幫被捕後，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立刻出版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主要收錄毛在1950年代的講話和文章，是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的重要史料，但因內容包括一些後來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隨後便不再發行。

第二類：海外出版的史料文獻

主要有：鮑伊與費正清 (Robert Bowie and John K. Fairbank) 編：《共產黨中國1955–1959：政策文件及分析》(哈佛大學，1962年)；博伊德·康普頓 (Boyd Compton) 編：《毛的中國：黨內整風文件1942–1944》(華盛頓大學，1966年)；《毛澤東思想萬歲》2卷本 (台北，1967、1969年)。香港聯合研究所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編：《共產黨中國人名辭典》2卷本 (1969–1970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件》2卷本 (1971年)；陳志讓 (Jerome Ch'en) 編：《毛著作：選集與傳記》(牛津大學，1970年)；施拉姆 (Stuart R. Schram) 編：《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與信件1956–1971》(企鵝書局，1974年)；莫斯·羅伯茨 (Moss Roberts) 譯：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紐約，1977年)；韓丁 (Harold C. Hinton) 編：《中華人民共和國，1940–1979：文獻概述》(學術資料，1980年)；切斯特·程 (Chester J. Cheng)：《不同政見文選：自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想》(斯坦福，1980年) 等。此外，海外情報部門搜集到的具有史料價值的資料也屬於這類文獻。

這類文獻的主要特點是提供了許多未曾在中國大陸公開發表的內部材料和文件，對歷史研究十分珍貴。但文獻的來源一般不明確，部分文獻不夠準確，引用時往往要進行比較和考證。

第三類：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成果或提供的資料

例如馬洪、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北京，1981年)；蘇紹智：《中國與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產生》(中國社會科學

院，1981年)；許滌新：《中國探索經濟增長》(北京，1982年)；薛暮橋編：《1981年中國經濟年鑒》(香港，1982年) 等。

這類文獻一般較為準確，但由於其作者的背景往往代表著中國官方的立場，因此，易為海外研究所忽視。但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所改變，中國大陸學者的見解越來越受到海外研究者的重視。

此外，還有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到海外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大陸學者，他們一般不代表官方立場，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如李洪雲 (Hong Yung Lee)：《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加利福尼亞大學，1978年)，《在社會主義中國從革命幹部到技術官僚》(加利福尼亞，1991年)；高原 (Gao Yuan)：《生為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編年史》(加利福尼亞，1987年)；崔之元等編：《從強制到民主合作制的轉變：縣鄉兩級政治體制改革》(北京，1998年) 等。

第四類：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

這是邁氏本書中參考最多的文獻。

主要有：費正清：《人民的中國與美國》(哈佛大學，1967年)，《中國瞭望：中美關係的形象與政策》(紐約，1974年)，《美國與中國》第4版 (哈佛大學，1979年)，杜希德 (Dennis Twitchett) 與費正清編：《康橋中國史》(紐約，康橋大學，1978–1991年)。施拉姆：《中國的不斷革命》(巴黎，1963年)，《毛澤東》(紐約，西蒙，1967年)，《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紐約，1969年)，《三中全會後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政策1978–1984》(倫敦大學，1984年)；史華哲 (Benjamin Schwartz)：《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哈佛大學，1951年)，《共產主義與中國：湧動的意識形態》(哈佛大學，1968年)；麥克法誇爾 (Roderick MacFarquhar)：《雙百運動與中國知識份子》(紐約，1960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2卷 (倫敦，1974年，1984年)；拉迪 (Nicholas Lardy)：《中國現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劍橋大學，1983年)，《中國經濟增長與分配》(劍橋大學，1983年)；鄒讜 (Tang Tsou)：《文化大革命與後毛時代的改革》(芝加哥大學，1986年) 等。

這類文獻多是出自西方較有影響的學者，不少人是所謂「中國

通」。他們往往從不同的理論框架和角度，對當代中國歷史進行了較為系統和深入的分析。其見解不僅在西方受到重視，也為中國大陸的學者、甚至於領導人所重視。

第五類是當時生活在中國的西方人的記述

主要有：斯諾 (Edgar Snow)：《紅星照常中國》(紐約，1938年)，《紅色中國散記1936–1945》(哈佛大學，1957年)，《大河彼岸》(紐約，1961年)，《長期的革命》(紐約，1972年)；卜德 (Derk Bodde)：《北京日記》(紐約：1950年)；米達爾 (Jan Myrdal)：《一個中國鄉村的報道》(紐約，1965年)，《重返中國鄉村》(紐約，1984年)；尼爾・亨特 (Neale Hunter)：《上海日記》(波士頓，1969年)；內特・李、白傑明 (Bennet Lee, Geremie Barme) 編：《受傷者：文化大革命的新故事》(香港，1979年)；包德甫 (Fox Butterfield)：《中國，苦海餘生》(紐約，1982年)；林培瑞 (Perry Link)：《北京夜話》(紐約，1992年) 等。

這類文獻都是作者依據自己在中國的親身經歷而撰寫，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內容豐富生動，不乏獨到見解和分析。這類文獻彌補了許多西方學者缺乏對當代中國的直觀認識的遺憾。

此外，邁氏在書中還參閱了一些在海外的不同政見者或為官方所不容人士的著作，如阮銘的《鄧的帝國》(西點，1994年)，方勵之的《推倒長城》(紐約，1992年)，以及曾當過毛澤東保健大夫的李志綏寫的《毛主席的私生活》(紐約，1994) 等。這裏就不一一詳述。

在翻譯本書及對其文獻作分類時，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許多西方學者研究當代中國的著作裏，直接使用官方公佈的材料或說法作為論據的似乎不多，這種現象有多種原因，很多學者盡可能使用所謂民間的或內部的材料，或是引述當事人的採訪，以避免給人以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的口實，力圖保持其研究的客觀性和中立性。但除此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特別是涉及到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或敏感歷史人物及重大決策的檔案多數還沒有公開，這種狀況在改革開放後有了改觀，但從研究的需要來說，還遠遠難以滿足學者研究的需要。這裏，有中國文化中為尊者諱的影響，但

更多地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所幸的是，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畢竟有了長足的發展，言論自由和市場化的影響，使得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開始用自己的話、按自己的理解來敘述當年的歷史，那些重要歷史人物的親屬、身邊工作人員的各種回憶錄也使大眾對那些始終像霧一般的人物有了多層面的瞭解，為理解他們的行為及其對當代中國發展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角度，使當代人對歷史過程的瞭解更接近於真實。

然而，邁氏不同。他尊重當事人，即中國產黨及其領導人的觀點、立場和解釋，然後用他們的行為及其社會後果加以對照進行研究，得出自己的結論，正如他所說的：「我試圖按照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宣稱的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和馬克思主義目標，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作出歷史的評價。」因此，在他使用的文獻中，他以官方公開宣佈的發展路線和實行的政策為出發點和立論的根據。我們看到，他引述了很多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以及官方公開的文件，因為這些代表著中國共產黨治國的大政方針，而這恰恰是決定共和國歷史的主要因素。他沒有更多地涉及到中國高層的決策過程和內幕，這正是當今許多學者所熱衷的，在缺乏檔案材料的支援下，很多這類的解釋不免流於推測；他對重要歷史人物的性格及其鮮為人知的私生活也沒有表現出太多的興趣。畢竟，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決策結果及其實施，才是真正影響一個國家和千百萬人生活最重要的因素。這正是邁氏此書的一個明顯特點。

從書中不難看到，邁氏對他所的人民共和國歷史傾注了深深的感情，惟其如此，你或許不同意本書的觀點，但卻不能不為作者字裏行間表現出對人類普遍命運的深切關注所折服。

但他首先是一個嚴肅的批判家，他以近乎於苛責的目光審視他書中人物所說的一切，然後與歷史事實及其後果所映照，找到常人所不易發現的矛盾，做出一個思想家合乎邏輯的判斷。

邁氏又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尊重歷史事實，他的立論、觀點和結論，是建立在歷史材料支援和事實的基礎，因此，當新的歷史材料和歷史進程與他最初的觀點相悖時，他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看法，這對任何歷史學家都是極其痛苦的。邁氏此書第一版出版於1977年，正值文

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大陸還基本處於閉關鎖國狀態，外界對大陸的了解十分有限，他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材料大概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由各種紅衛兵組織編印的材料，這些材料陸續流向海外，如台北在1967、1969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施拉姆編寫的《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講話與信件1956–1971》，以及一些西方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在中國生活的日記等。他在這一版中最後得出的研究結論是：「在毛時代結束之際，中國仍然是一個由官僚體制支配的社會，它既不像是資本主義，但也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1986年，「基於在後毛時代初期得到的關於毛時代的新資料，特別是關於不幸的大躍進運動（1958–1960）和19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新資料」，在對全書作了較大修訂後，出版了本書第二版，邁氏認為，龐大的共產黨官僚機構，既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無法逾越的障礙，也是實行資本主義無法逾越的障礙，而市場化不過是中國民族主義和實現現代化的權宜之計。在讀者看到的這一最新版中，邁氏根據自己掌握的文獻和過去20年中國的實際變化，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結論，他現在認為。共產黨的中國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根本代表和推動者。從理想出發，他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但作為歷史學家，他始終尊重歷史文獻和歷史真實。

參考文獻

有關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出色研究文獻，均見載於各期刊，這些期刊主要包括*Asian Survey, Asia Watch,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hina Quarterly, China Focus, Contemporary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Human Right, Asia Watch, Issues and Stud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odern China*及*Pacific Affairs*。曾於上述或其他刊物的文獻，又與本書所述的歷史相關的，實在浩如煙海，不少已在註釋中提及，但囿於篇幅，恕未能一一在此列舉。以下所列僅包括本書正文曾經引用、或作者於編著本書時曾經參閱的書籍，並未收錄本書所有參考文獻；讀者如有意深入研究個別題目、或了解有異於本書各章的詮釋，惟望本書目略有助益。

英文參考書目

Ahn, Byung-joo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Ali, Tarik, ed. *The Stalinist Legacy*.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84.

Andors, Phylli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Andors, Stephen. *China's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tics,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194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77.

——, ed. *Workers and Workplace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7.

Arkush, R. David. *Fei Xiaotu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1.

Arnold, Matthew. *The Poems of Matthew Arnold*. Edited by Kenneth Allott. New York: Barnes & Noble,1965.

Bachman, David M.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dustrial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Bahro, Rudolf. *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Verso, 1981.

Balazs, Etienn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Banister, Judith. *China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Bardenson, R. D. *Half-Work Half-Studies School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 1964.

Barme, Geremie and John Miniford, eds. *Seeds of Fire: Chinese Voices of Conscien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Barnett, A. Doak. *Cadres, 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hina After Ma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Praeger, 1963.

——. *Communist China: The Early Years 1949–1955*. New York: Praeger, 1964.

——, ed.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Baum, Richard.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The Cycles of Reform*.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ed. *China's Four Modernization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0.

——, and Frederick C. Teiwes. *Ssu-Ch'ing: The Socialist Education Movement of 1962–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Becker, Jasp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96.

Bennett, Gordon A. *Huadong: The Story of a Chinese People's Commun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 and Ronald H. Montaperto. *Red Guard: The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i Hsiao-ai*.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Benton, Gregor, ed. *Wild Lilies, Poisonous Weeds: Dissident Voices from People's China*.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Bergere, Marie-Clai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Bernstein, Richard.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e Search for the Truth About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1982.

——, and Ross H.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Knopf, 1997.

Bernstein, Thomas P. *Up to the Mountains and Down to the Villages: The Transfer of Youth from Urban to Rural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ettelheim, Charles.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and Neil Burton. *China Since Mao*.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Bialer, Seweryn.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Blecher, Marc, and Vivienne Shue. *Tethered Deer: Government and Economy in a Chinese Coun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odde, Derk. *Peking Diary*. New York: Henry Schuman, 1950.

Borg, Dorothy,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Bowie, Robert,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Com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Brandt, Conrad. *Stalin's Failure in China, 1924–192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Benjamin Schwartz,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Brinton, Crane.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65.

Brugger, Bill. *China: Libe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1942–1962*. London: Croom Helm, 1981.

——. *China: Radicalism to Revisionism, 1962–1979*. London: Croom Helm, 1980

——. *Contemporary China*. London: Croom Helm, 1977.

——, ed. *China Since the "Gang of Fou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 and David Kelly. *Chinese Marxism in the Post-Mao Er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ed. *China from Mao to De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83.

Butterfield, Fox. *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2.

Cell, Charles. *Revolution at Work: Mobilization Campaigns in Chin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Central Committe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1.

——. *Socialist Upsurge in China's Countrysid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Chan, Anita, Ricard Madsen, and Jonathan Unger. *Chen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5.

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 vols.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1971–72.

Chang, Parris H. *Power and Policy in China*. University Park: St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8.

——. *Radicals and Radical Ideology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esearch Institute on Communist Affairs,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

Chao, Ka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5*.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 *Man and Land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o, Kuo-chun. *Agrarian Policies of Mainland China: A Documentary Study (1949--1956)*.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en, Erjin. *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London: Verso, 1984.

Ch'en, Jerome. *China and the West*. Bloomingto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ed. *Mao Papers: Anthology and Bibl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Chen, Johsi. *The Execution of Mayor Yin and Other Stories from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Ch'en, Theodore H.E. *Thought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eng, Chester J. *Documents of Diss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Mao*.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0.

Cheng, Chu-yua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 *Communist China's Economy 1949–1962: Structural Change and Crisis*. South Orange, N.J.: 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eng, Peter. *A Chro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1972.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easant Revolts in China, 1840–1949*.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Ci, Jiwei. *Dialectic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From Utopianism to Hedon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Clark, Anne B., and Donald W. Klein. *Biograph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1–196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oble, Parks M.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Cohen, Jerome Alan.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 research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Cohen, Warren I. *Americ'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ollection of Important Documents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hina, Inside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Bantam, 1972.

Compton, Boyd, ed. *Mao's China: Party Reform Documents,1942–1944*.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

Croizier, Ralph C.,ed. *China's Cultural Legacy and Communism*. New York: Praeger, 1970.

Croll, Elisabeth. *Chinese Women Since Mao*. London: Zed Books, 1983.

——.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ed. *The Women's Movement in China: A Selection of Readings*. London: 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e, 1974.

Cui, Zhiyuan, Rong Jingben, Wang Shuanzheng, et 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ressurized System to a Democratic System of Cooperation: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1998.

Cumings, Bruc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90.

Davin, Delia. *Woman-Work: Women and Part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aubier, Jea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1974.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cern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6.

Deng, Xiaoping. *Fundamental Issues in Present-Day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7.

——.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2)*. 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 *Speeches and Writing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4.

Dernberger, Robert F., ed.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Deutscher, Isaac. *Ironies of History: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ommun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Marxism in Our Time*. San Francisco: The Ramparts Press, 1971.

——.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Russia 1917–19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Dirlik, Arif.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4.

——.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Dittmer, Lowell.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vised edi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Domes, Jurgen, ed. *Chinese Politics After Ma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The Internal Politics of China*. London: C. Hurst, 1979.

——.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London: C. Hyrst, 1980.

Donnithorne, Audrey. *China's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7.

Draper, Hal.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1: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Dreyer, June. *China's Forty Millio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unayevskaya, Raya.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Dell, 1973.

Dunn, John. *Modern Revolution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Eastman, Lloyd E.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Eckstein, Alexander.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Quantitative Measures of China's Economic Outpu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 Walter Galenson, and Ta-chung Liu, eds. *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ocument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Encausse, Helene Carrere, and Stuart Schram. *Marxism and Asia*. London: Allen Lane, 1969.

Esmein, Jea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Anchor, 1973.

Fairbank, John K. *China: 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China Perceived: Image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Knopf, 1974.

——.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Fang Lizhi. *Bringing Down the Great Wall*. New York: Norton, 1992.

Fei Hsiao-t'ung (Fei Xiaotong). *China's Gentry: Essays in Urban-Rur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 *Toward a People's Anthropolog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Feigon, Lee.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hina Rising*. Chicago: Ivan R. Dee, 1990.

——. *Demystifying Tibet*.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Feuerwerker, Albert, ed. *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Fewsmith, Josep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E. Sharpe, 1994.

Fokkema, D. W.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 1956–60*. The Hague: Mouton, 1965.

Friedman, Edward.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and Mark Selden, eds. *America's Asia*. New York: Vintage, 1971.

——, Paul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jress, 1991.

Frolic, B. Michael. *Mao's People: Sixteen Portraits of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Fung, K. K. *Social Needs versus Economic Efficiency: Sun Yefang's Critique of Socialist Economics*. Armonk, N. Y.: M.E. Sharpe, 1982.

Gao Yuan. *Born Red: A Chronicl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Gardner, John. *Chinese Politics and the Succession to Mao*. London: Macmillan, 1982.

Gargan, Edward A. *China's Fate: A People's Turbulent Struggle with Reform and Repression*.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Garside, Roger. *Coming Alive: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Mentor, 1982.

Gasster, Michael. *China's Struggle to Modernize*. New York: Knopf, 1983.

Ginnekan, Jaapvan. *The Rise and Fall of Lin Biao*. New York: Avon Books, 1977.

Gittings, John. *China Changes F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urvey of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63–67*.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The World and China, 1922–72*.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Gleason, Abbott, Peter Kenez, and Richard Stites, eds. *Bolshevik Cultu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Goldman, Merle. *China's Intellectuals: Advise and Dis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Goodman, David S. G., ed. *Beijing Street Voices*. London, 1981.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Gray, Jack and Patrick Cavendish. *Chinese Communism in Crisis: Mao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Pall Mall, 1968.

Gray, Jack and Gordon White, eds. *China's New Developmental Strategy*.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2.

A Great Trial in Chinese Histor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1.

Grieder, Jerome.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A Narrative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Greider, William.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7.

Griffith, William E. *The Sino-Soviet Rif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4.

Grunfeld, A. Tom.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Guillermaz, Jacqu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1949–197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6.

——.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49*.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Gurley, John G. *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oist Strateg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Hamrin, Carol Lee.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Harding, Harry. *Organizing China: The Problem of Bureaucracy, 1949–1976*.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Harris, Nigel. *The Mandate of Heaven: Marx and Mao in Modern China*.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8.

Harrison, James P.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New York: Atheneum, 1969.

——. *The Long March to Power: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1–1972*. New York: Praeger, 1972.

Heilbroner, Robert I.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85.

Herzen, Alexander. From the Other Sho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56.

Hinton, Harold C.,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A Documentary Survey*. Wilmington, Del.: Scholarly Resources, 1980.

Hinton, William.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Vintage, 1966.

——. *The Great Revers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 *Turning Point in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Extreme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1914–1991*. New York: Pantheon, 1994.

Hoffman, Charles. *The Chinese Work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4.

Hofheinz, Roy.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Honig, Emily.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and Gail Hershatter.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Hopkins, Terrence K.,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eds. *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0.

Horn, Joshua. *Away with All Pes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Houn, Franklin. *To Change a Nation: Propaganda and Indoctrin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61.

Howe, Christopher.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Hsia, Adria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2.

Hsiung, James C. *Ideology and Practice: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Praeger, 1970.

Hsu, Immanuel C.Y. *China Without Mao*.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Hsueh, Chun-tu, ed. *Revolutionary Leaders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ed.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China: A Symposium*.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80.

Hunter, Neale. *Shanghai Journ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Isaacs, Harold.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Israel, John. *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and Donald W. Klein. *Rebels and Bureaucrats: China's December 9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Joffe, Ellis. Between Two Plenums: China's Intraleadership Conflict, 1959–62.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5.

——. The Chinese Army after Ma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Johnson, Chalmers. *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Johnson, Kay An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the U.S. Congress. *An Economic Profile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

Joseph, William A., ed. *China Briefing 1995–1996*. Armonk, N.Y.: M.E. Sharpe, 1997.

——. *The Critique of Ultra-Leftism in China, 1958–198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Karnow, Stanley.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Viking, 1972.

Karol, K.S. *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 New York: Hill & Wang, 1967.

——. *The Second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Hill & Wang, 1974.

Kau, Michael Ying-mao, ed. *The Lin Piao Affair*.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 Press, 1975.

——, and Susan H. Marsh, eds. *China in the Era of Deng Xiaoping: A Decade of Reform*.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Kerr, George H.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5.

Klein, Donald W, and Ann B. Clark,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Knight, Nick. *Li Da and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Kraus, Richard Curt. *Brushes with Power: Modern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ianos and Politics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Kung, Chi-keung. *Intellectuals and Masses: The Case of Qu Quib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5.

Kuznets, Simon.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Lardy, Nicholas. *Agriculture in China's Mod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Economic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and Kenneth Lieberthal. *Chen Yun's Strategy for China's Development: A Non-Marxist Alternative*. Armonk, N.Y.: M.E. Sharpe, 1983.

Lee, Bennet, and Geremie Barme, eds.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79.

Lee, Hong Yung. *From Revolutionary Cadres to Technocrats in Social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Lee, Leo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Lenin, V.I. *Collected Works*, 45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46–1967.

——.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2.

Levenson, Joseph R.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Levine, Steven I.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Lewis, John W. *Leadership in Communist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 ed.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ed. *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 and Litai Xue.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ys, Simon. *Broken Images: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0.

——.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London: Alison & Busby, 1981.

——. *Chinese Shadows*. New York: Viking, 1977.

Li, Choh-m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59.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Liang, Heng, and Judith Shapiro. *Son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83.

Lichtheim, George. *Marxism: 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Preger, 1961.

Lieberthal, Kenneth. *Governing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5.

——. *Revolution and Tradition in Tientsin, 1949–195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Lifton, Robert Jay.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 *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61.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 *Marx's Conception of the Non-Capitalist Route*. Beijing: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1984.

Lin, Weiran. *An Abortiv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lass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Madis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6.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Lindbeck, John, ed. *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1.

Link, Perry.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New York: Norton, 1992.

——.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9–198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Lippit, Vict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87.

Liu Binyan. *China's Crisis, China's H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People or Monsters and Other Stories and Reportage from China After Mao*.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with Ruan Ming and Xu Gang. *Tell the World*. New York: Pantheon, 1989.

Liu Shaoq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Shao-ch'i*. 3 vol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8–69.

Liu, T.A. and K.C. Yeh. *The Economy of Mainland China: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Luxemburg, Rosa. *Rosa Luxemburg Speak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Macciocchi, Maria Antionietta. *Daily Lif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 II: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ed.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6.

——, ed.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New York: Praeger, 1960.

Madsen, Richard.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Maitan, Livio. *Party, Army and Masses in China*.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Malraux, Andre. *Anti-Memoi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8.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4.

——, ed. *Formosa Today*. New York: Praeger, 1964.

Mandell, Ernest. *Power and Money: 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 London: Verso, 1992.

Mao Zedo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Translated by Moss Robert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 *Mao Papers*. Edited by Jerome Ch'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ed. by Stuart R. Schram. Armonk, N.Y.: Sharpe, 1992.

——. *On the Correct Handing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7.

——. *Poems of Mao Tse-tung*. Edited by Wong Man. Hong Kong: Eastern Horizon Press, 1966.

——.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4 vol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54.

——.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V.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Marks, Robert B.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Martin, Helmut. *Cult and Canon: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Marx, Karl. *Capital*. Vol. I. Chicago: Kerr, 1906.

——.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Edited by T.B. Bottomore and Maximilien Rubel. London: Watts, 1956.

——.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Edited by Lloyd D. Easton and Kurt H. Guddat. New York: Anchor, 1967.

——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

——. *Selected Works*. 2 vol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 *Werke*. Berlin: Dietz, 1964.

McComick, Thomas J. *America's Half-Centur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in the Cold War and After*.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McCough, James P., ed. *Fei Hsiao-tung: The Dilemma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9.

McDonald, Angus W., Jr.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2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Mehnert, Klaus. *Peking and Moscow*.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At Home and Abroad*.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69.

Meisel, James H. *Counter-Revolution*. New York: Atherton, 1966.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Mao's China: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7.

——.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Michels, Robert. *Political Parties*.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49.

Milton, David, and Nancy Dall Milton. *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64–1969*. New York: Pantheon, 1976.

Moody, Peter R. *Chinese Politics After Mao: Development and Liberalization, 1976–1983*. New York: Praeger, 1983.

Moore, Barrington.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Mosher, Steven. *Broken Earth: The Rural Chines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3.

Munro, Donald J.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

Murphey, Rhoads. *The Fading of the Maoist Vision: City and Countryside in China's Development*. New York: Metheun, 1980.

Myrdal, Jan. *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65.

——. *Return to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Pantheon, 1984.

—— and Gun Kessle. *China: The Revolution Continued*. New York: Pantheon, 1970.

Nathan, Andrew.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China's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National Program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1956–1965.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Nee, Vict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Peking Univers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 and David Mozingo, eds. *State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Oksenberg, Michael, ed. *China's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New York: Praeger, 1973.

——, and Robert Oxnam, eds. *Dragon and Eagle: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1.

Orleans, Leo A. *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1.

——, ed.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eck, James, and Victor Nee,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Pantheon, 1975.

Peng Shu-t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Power*. New York: Monad Press, 1980.

Pepper, Suzanne.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1980s*.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0.

——. *China's Universities: Post-Mao Enrollment Polic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ructur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4.

——.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erkins, Dwight 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9*. Chicago: Aldine, 1969.

——. *Market Control and Planning in Communist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ed. *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ed.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erry, Elizabeth.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ickowicz, Paul G.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Ch'u Ch'iu-p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and Chin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0.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57.

Price, Don C. *Russia and the Root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rice, R.F.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rybyla, Jan 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t China.* Scranton, Pa.: International Textbooks, 1970.

Rawski, Thomas G. *China's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0.

——.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Rice, Edward. *Mao's W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Richman, Barry M. *Industria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Riskin, Carl.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Robinson, Joan. *Economic Management in China.* London: 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Institute, 1975.

——. *Reports from China.* London: Anglo-Chinese Educational Insitute, 1977.

Robinson, Thomas W., 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Rosen, Stanley.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zhou (Cant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2.

——. *The Role of Sent-Down Youth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ase of Guangzhou.*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Rosenberg, William G., and Marilyn B. Young.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ozman, Gilbert, e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1.

Ruan Ming. *The Empire of Den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Rue, John. *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 1927–193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aich, Tony, ed. *The Chinese People's Movement: Perspectives on Spring 1989.*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Salisbury, Harrison. *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5.

Schell, Orville. *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New York: Pantheon, 1988.

——. *To Get Rich Is Glorious*. New York: Pantheon, 1985.

Schiffrin, Harold Z.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Schram, Stuart R. *Ideolegy and Policy in China since the Third Plenum, 1978–84*. Lond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4.

——. *Mao Tse-tung*.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7.

——. *Mao Tse-tung Unrehearsed: Talks and Letters, 1956–71*.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4.

——.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New York: Praeger, 1969.

——. *La "evolution permanente" en Chine*. Paris: Mouton, 1963.

——, ed. *Authority,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ed. *The Scope of State Power in Chin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5.

Schurmann, Franz.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2nd ed, rev. and en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Schwarcz, Vera. *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a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Schwartz, Benjamin.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Communism and China: Ideology in Flux*.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Selden, Ma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 *The Yenan Wa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9.

——, and Victor Lippit, eds.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Seybolt, Peter J., ed. *The Rustification of Urban Youth in China*.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7.

Seymour, James D., ed.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China's Human Rights Movement, 1978–79*. New York: Human Rights Publishing Group, 1980.

Shaffer, Lynda. *Mao and the Workers*. Armonk, N.Y.: M.E. Sharpe, 1982.

Shanbaugh, David.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4.

Shanin, Teodor,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Sheel, Kamal. *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Sheridan, James. *China in Disintegr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hirk, Susan L.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Shue, Vivienne. *Peasant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toward Socialism, 1949–19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Sidel, Ruth. *Women and Child Care in China*. New York: Hill & Wang, 1972.

Sidel, Victor W., and Ruth Sidel. *Serve the People: Observations on Medici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Josiah Macy, 1973.

Sigurdson, J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77.

Singer, Daniel. *The Road to Gdansk*.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2.

Siu, Bobby. *Women of China: Imperialism and Women's Resistance, 1900–1949*. London: Zed Press, 1982.

Siu, Helen F., ed.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and Zelda Stern, eds. *Mao's Harv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medley, Agnes. *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6.

Smil, Vaclav. *The Bad Earth: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 Armonk, N.Y.: M.E. Sharpe, 1984.

——.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3.

Snow, Edgar.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 *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Solinger, Dorothy J. *From Lathes to Looms: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79–198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egional Government and Provinci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949–1954: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Spence, Jonathan D.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New York: Viking, 1981.

——.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Stalin, J.V.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2.

Starr, John Bryan. *Continuing the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Stavis, Benedict.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in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Strong, Anna Louise. *Tomorrow's China*. New York: Committee for a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1948.

Su, Shaozhi.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Beijing: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1.

——. *Develop Marxism Under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Beijing: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3.

——. Marxism in China. Nottingham: Spokesman, 1983.

Su, Xiaokang and Wang Luxi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n Program, 1991.

Sun, Yan. T*he Chinese Reassessment of Socialism, 1976–199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Sweezy, Paul M.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Tawney, R.H. *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32.

The T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ocument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Terrill, Ross. *800,000,000: The Real Chin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2.

——. *The Future of China After Mao*. New York: Dell, 1978.

——. *Mao*.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Thaxton, Ralph A. *China Turned Rightside Up: Revolutionary Legitimacy in the Peasant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e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ocument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7.

Thompson, E.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Pantheon, 1964.

Thurston, Anne F. *Enemies of the Peop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Tien, Hung-Ma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1927–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ie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t Mao's Court: Gao Gang and Party Factionalism in the Early 1950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0.

——.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White Plains, N.Y.: M.E. Sharpe, 1979.

Townsend, Jam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Trotsky, Leon. *Our Revolution*. New York: 1918.

——.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4.

——.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ioneer Publishers, 1932.

Tsou, Tang.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9–1950*. 2 vo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Post-Mao Refor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Tucker, Robert C. *The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 New York: Norton, 1969.

Twitchett, Dennis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1991.

Ulam, Adam.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 Essay on the Sources and Influence of Marxism and Communism*. New York: Vintage, 1964.

Unger, Jonathan.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ed. *The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China: Reports from the Provinces*. Armonk, N.Y.: M.E. Sharpe, 1991.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ed. *The Case of P'eng Teh-huai, 1959–1968*.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70.

——, ed. *Documen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2 vol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71.

——, ed. *Who's Who in Communist China*. 2 vols. Hong Kong: Union Research Institute, 1969–1970.

U.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1987 and Outlook for 1988*. Washington, D.C.: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8.

——. *The Chinese Economy in 1988 and 1989*. Washington, D.C.: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89.

——.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ndbook of Economic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1976.

Vogel, Ezra.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akeman, Frederic, Jr. *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5.

——.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Walder, Andrew G.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7.

——.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Wales, Nym. *Red Dust: Autobiographi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Walicki, A.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9.

Waller, Derek J.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1981.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949: The Impact of Independence, Modernity and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7.

Wang, Ming. *Mao's Betrayal*.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Wang Y. 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6.

Wang, Yaan-iee. *The Chinese Idea*. Ph.D. Dissertation. Madis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7.

Wasserstrom, Jeffrey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Watson, James L.,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Weber, Max. *The Religion of China*.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1951.

——.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4.

Weil, Robert. *Red Cat, White Cat: China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6.

Wheelwright, E.L. and Bruce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Econom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White, Gordon.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White, Lynn T. III. *Careers in Shangha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Whiting, Allen.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Whitson, William A. *A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1961*. New York: Praeger, 1973.

Whyte, Martin K.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and William Par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Wilson, Dick. *The Long March: The Epic of Chinese Communism's Survival*.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1.

——, ed. *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son Center, ed. *The Limits of Reform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s, 1982.

Witke, Roxanne. *Comrade Chiang Ch'ing*.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Wittfogel, Karl A.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Wolf, Eric.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Wolf, Margery, and Roxanne Witke, eds.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Womack, Brantly. *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 Honolulu: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Wong, John. *Land Reform in China: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New York: Praeger, 1973.

Woo, Jung-en. *Race to the Swift: State and Finance in Korea's Industri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Wood, Ellen Meiskins. *Democracy Against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World Bank. *Trend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1996*.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7.

Wright, Mary C.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 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rev.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Wu, Hongda Harry. *Laogai — The Chinese Gulag*.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Wu, Yuan-Li. *The Economy of China: 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Praeger, 1965.

Wylie, Raymond F. *The Emergence of Maoism: Mao Tse-tung, Ch'en Po-ta 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Xu, Dixin, et. al. *China's Search for Economic Growth*.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82.

Xue, Muqiao, ed. *Almanac of China's Economy, 1981*. Hong Kong: Modern Cultural Co., 1982

Yahuda, Michael. *Towards the End of Isolationalis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Mao*. London: Macmillan, 1983.

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9.

——.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9.

Yao, Wen-yuan. *On the Social Basis of the Lin Piao Anti-Party Cliqu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5.

Young, Marilyn B.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Collins,1991.

——, ed. *Women in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and Williams Rosenberg. *Transforming Russia and China: Revolutionary Struggl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Yu Guangyuan. *On the Objective Character of Laws of Development.* Beijing: Institute of Marxism-Leninism and Mao Zedong Though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2.

——, ed.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4.

Yu, Mok Chiu and J. Frank Harrison, eds. *Voices from Tiananmen Square.*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0.

Yue, Daiyun and Carolyn Wakeman. *To the Storm: The Odyssey of Revolutionary Chinese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Zagoria, Donald 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61*.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Zweig, David. *Agrarian Radicalism in China, 1968–19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中文參考書目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發展主要指數》，北京：1979年。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萬歲》，2卷本，台北，1967、1969年。

王希哲，《王希哲論文集》，香港：七十年代雜誌，1981年

馬洪、孫尚清編，《中國經濟結構問題研究》，北京，1981年

遲新，《四人幫案》，香港：天地圖書，1977年。